第八卷・1972-1976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

從批林到批鄧

史雲、李丹慧 著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八卷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

史雲、李丹慧　著

1972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發生了一系列至今仍眾說紛紜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毛澤東曾考慮哪些人當接班人？周恩來為甚麼要做痛苦的反省？中阿、中越為甚麼翻臉？譚甫仁中將為甚麼被刺殺？公安部長李震是自殺還是他殺？毛是否因「紅都女皇」事件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周恩來對美國人說了些甚麼話而被批判？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是防備誰？批鄧是毛的決策還是「四人幫」的挑撥？「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是毛的遺囑嗎？誰首倡粉碎「四人幫」鬥爭？「四人幫」有沒有政變計劃？作者利用檔案資料，認真考辨，揭示箇中真相。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ISBN 978-988-172748-0
9 789881 727480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第八卷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

——從批林到批鄧

(1972–1976)

史雲、李丹慧 著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 (1972–1976)
史雲、李丹慧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88–17274–8–0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發行及總代理：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箱：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8
When the "Continuous Revolution" Goes Awry: From the Anti-Lin Biao Campaign to the Anti-Deng Xiaoping Campaign (1972–1976) (in Chinese)
By Shi Yun, Li Danhu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17274–8–0

Publisher: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序：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金觀濤

經過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終於分批出版、與讀者見面了。對我來說，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視為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把當代中國人經歷的驚心動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經歷了苦難，又見證了啟蒙時期思想的風雨雷霆，這一切理應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然而我深知這一工作又是多麼困難。

首先，作者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近年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和口述歷史資料，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與中共高層決策有關的檔案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為寫作帶來困難。在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除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為複雜和重要的，是對史料的辨偽和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只有少數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專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十分幸運的是，本套書的撰寫正是依靠了這批有深厚檔案功底、又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家。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省及市縣檔案資料館，搜集整理檔案並對史料辨偽。史料之豐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書的重要特色。

歷史研究者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搜集史料、整理檔案只是第一步。歷史學家在研究和寫作中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如果不能做到對歷史場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內心

重演歷史事件展開過程以及理會當時支配事件展開的普遍觀念，就無法接近歷史的真實。本套書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論述主線，這二十餘年正是毛澤東思想支配中國的時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令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於本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近幾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這些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氛圍，這就使他們具備了某種比西方史家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優勢。當然，作者要發揮這種優勢，僅僅停留在感性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某一種意識形態中走出來、盡可能價值中立地審視過去，達到反思的高度，以獲得超越的視野。開始注意到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與重大社會事件的互動，特別是這些事件是如何從中央決策到地方、再到基層展開的，是本套書的另一特色。由於各卷作者是獨立寫作，分批出版，雖然現在對全套書作出整體評價尚為時過早，但是，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中國人終於開始為不尋常的二十世紀中國撰寫大型歷史著作了。

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設主編，以便各位作者在寫作時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統一風格、使十卷著作組成連續的整體。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在動筆之前充分討論各卷內容，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工作會議，切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今，我仍不能忘懷一次又一次的國史寫作討論會。窗外是北國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會議室中不分晝夜地討論，最後形成會議紀要。這一場景使我想起1970年代末青年時代和朋友的徹夜長談。很多時候，大家就某一觀點、細節甚至是提法，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使我十分感動的是，無論在討論中發生多大的爭論，甚至是立場和價值上的分歧，最後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實之上得到統一。根據時段，本書大約以兩三年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兩位作者撰寫，而其他作者都把自己對該時段的見解和史料提供給該卷作者，整個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一種今日中國學術界罕見的真誠合作精神。在此意義上講，這套書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組織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這套書

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沈志華和李丹慧夫婦，從確定撰寫計劃到尋找適當的作者以及整體工作的協調，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其次，我要感謝青峰和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強先生、林立偉先生、張志偉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張素芬小姐。他們在青峰的帶領下，以巨大的熱忱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否則，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編輯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還要感謝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本書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方正兄，該書從醞釀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雖已退休數年，但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的出版，認為它對香港中文大學有着重要性。在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時期那種注重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意義的「中大精神」。

這套書出版之時，我也到達退休年齡，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我想指出的是，由於可以看到的檔案和其他種種限制，這套書只寫到 1981 年。如果不談此後發生的波瀾壯闊的 80 年代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 1989 年震驚世界的事件，我們仍無法理解今日中國和世界。在這一意義上，僅僅由前十卷組成的二十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不完備的，寫史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歷史傳統，但很少有史家為當代寫史，故這套書的出版是一種新現象。它說明中國歷史學家已走出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並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歷史反思意識已經產生，並開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後繼者。

2007 年 12 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錄

總序 ..... 金觀濤 xiii

導言 1

第一章　林彪事件後的中國政局 7

一　批林整風運動和恢復舊秩序的努力 8

1 林彪事件的擴散、傳達激起強烈的社會反應 8

2 毛澤東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部分錯誤 25

3 撲朔迷離的「批林整風」運動 32

4 周恩來在各個領域恢復政策的努力 38

5 國家政體的部分恢復 45

二　懷疑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思潮崛起 49

三　糾「左」還是批「右」的衝突 62

1 錯綜複雜的權力結構 62

2 周恩來的糾「左」努力受挫 66

3「反右傾回潮」運動 71

第二章　中美關係緩和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變化 79

一　尼克松訪華和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79
1 尼克松訪華和中美上海聯合公報 79
2 田中角榮訪華和中日聯合公報 90

二　毛澤東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 106
1 把蘇聯作為中國外交和國防上的主要敵人 106
2 中美緩和在國內產生的分歧與影響 111
3 結束越南戰爭進程中的中越、中美複雜關係 116
4 設計「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構想與中美建交徘徊不前 122

三　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思想，聯合所有國家反對美蘇霸權 127
1 「三個世界」和「兩個中間地帶」思想的由來 127
2 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 131
3 聯合第三世界開展反霸鬥爭 135

四　調整意識形態至上對外方針及「親密夥伴」關係的演變 141
1 毛澤東調整意識形態至上的對外方針 141
2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中阿關係出現裂痕 146
3 在西哈努克親王和紅色高棉之間斡旋的勝利 154
4 越南戰爭結束伴隨中越蜜月結束 160

第三章　毛澤東在選擇新的接班人中尋求平衡 167

一　周恩來失寵和「幫周」會議 168
1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疑慮 168
2 「幫周」會議的風暴 173
3 周恩來究竟對美國人說了些甚麼 178

二　毛澤東關於接班人的抉擇：張春橋、鄧小平、王洪文 184
1 張春橋的致命問題——「叛徒」歷史 184
2 鄧小平再度被重用 197
3「劉盆子」王洪文後來居上 205

三　中共十大形成暫時平衡格局 208
1 唯一一次在執政時期秘密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208
2 兩軍決戰前的暫時平靜 219

第四章　「抓革命、促生產」模式下中國經濟的跌宕起伏 223

一　全國經濟管理體制大變革與「三五」計劃的勉強完成 224
1 毛澤東的「大躍進」情結和經濟管理體制大變革 224
2「三五」計劃（1966 — 1970）在高投入下勉強完成 232

二　「三個突破」的出現和周恩來主持經濟調整 237
1「四五」計劃（1971 — 1975）的編制和國民經濟「三個突破」.... 237
2 周恩來主持經濟調整與降低「四五」計劃高指標 243
3「文革」衝擊下部門經濟和地方經濟的不平衡發展 248

三　三線建設掀起第二次高潮 258
1 三線建設的由來和中共中央領導層的分歧 258
2 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和歷史評價 263

四　「農業學大寨」壓迫下的 1970 年代前期農村經濟 280
1 周恩來調整農業政策與「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強行推廣 ... 280
2 農村社隊工業在夾縫中悄然興起 288

五　擴大引進和擴大援助的兩個對外經濟熱潮 292
1 向西方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 292

2 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熱潮和降溫 302

第五章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與批林批孔運動 307

一 一批高級將領被捲入漩渦 308
1 中共建國以來第一個被刺殺的黨政軍大員——譚甫仁中將之死 308
2 捲入中央內部鬥爭而自殺的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少將之死 311
3 先說是他殺後說是自殺的公安部長——李震少將之死 317
4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和繼續清查與林彪有關聯的軍隊將領 .. 321

二 貌似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運動 329
1 毛澤東為甚麼把批判林彪與孔子聯繫起來 329
2「梁效」等御用班子的影射史學 338
3「儒法鬥爭」和「反潮流」鬧劇 338

三 毛澤東批評江青，批林批孔運動收場 362
1 各地重新掀起造反浪潮迫使中央發出控制運動文件 362
2 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 377
3「紅都女皇」之謎 383

第六章 圍繞四屆全國人大的鬥爭 391

一 組閣之爭與「總理還是總理」 392
1 三次夭折的四屆人大與新的權力再分配鬥爭 392
2「風慶輪事件」與王洪文長沙告狀 399
3 毛澤東、周恩來長沙會談 405

二 充滿矛盾的四屆全國人大 410
1 周恩來重申「四個現代化」宏圖 410

2 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國務院 416
3「繼續革命」的新憲法 421

第七章　動盪中的社會、文化與思潮 429

一　畸形發展的教育文化衛生事業 429
1 對舊教育的「兩個基本估計」與新教育的「上、管、改」.... 429
2 官方創作理論體系控制下的極端政治化文化 442
3 毀譽參半的醫療衛生「新生事物」 456

二　激化的社會矛盾和孕育中的異端思潮 460
1 上山下鄉成為社會火藥桶 460
2 暗流潛動的地下異端思潮 472
3「文革」後期的地下文學 487

第八章　不摸脈的鄧小平 1975 年整頓 501

一　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四人幫」反「經驗主義」..... 502
1 毛澤東提出「三項指示」 502
2「四人幫」借力發動反「經驗主義」活動 511
3 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 519

二　鄧小平在各個領域的整頓 527
1 從鐵路開始的工業整頓 527
2 其他領域和地方的整頓 534
3 鄧小平整頓的指導思想與綱領 550

三　「四五」計劃的完成與制定十年遠景規劃 558
1 三次降低指標才勉強完成的「四五」計劃 558
2 無法實施的高指標十年遠景規劃 573

第九章 「批鄧」把民眾推向公開造反 577

一 整頓越界與風雲突變 577
1 毛澤東同意開展評《水滸》運動 577
2 中央權力支點的悄然轉換 581
3 劉冰上書事件引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589

二 周恩來去世和華國鋒成為準總理 600
1 周恩來在寒風凜冽時刻去世 600
2 華國鋒坐收漁利 607
3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全面鋪開 613

三 「四五」運動：真正的群眾造反 622
1 壓制悼念周恩來活動點燃導火索 622
2 「四五」狂飆席捲中華大地 628
3 鎮壓「四五」運動與撤消鄧小平一切職務 635

第十章 「下不為例」的粉碎「四人幫」 647

一 天怒人怨的1976年 647
1 天象示警 647
2 唐山大地震 651

二 毛澤東逝世 657

三 撥開解決「四人幫」前的迷霧 668
1 誰是這場鬥爭的首倡者？ 669
2 中央政治局裏有多少委員參與和預知了這場行動？ 672
3 「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的陰謀偽造嗎？ 679
4 「四人幫」有沒有一個政變計劃？ 686

四 「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 695
1 武力解決方案的確定與準備 695
2「四人幫」束手就擒，華國鋒順利即位 699
3 軟硬兼施平息上海叛亂陰謀 707

後記 717

附錄
大事記 719
參考文獻 731
索引 747

導言

文化大革命，當時又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按其十年歷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66年至1971年的五年，是「繼續革命」發動、擴大和矛盾激化的時期。第二個階段，從1972年至1976年的五年，是繼續、限制和勉強撐持「繼續革命」的時期，即本卷書名所述《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

「文革」發動三十周年和結束二十周年的1996年前後，境內境外出現了兩種有價值的觀點。

首先是境外學者提出的「兩個文革」說，即認為一個「文革」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文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文革」是民眾反抗上層暴政的鬥爭。筆者不同意這種定義的敘述，因為其機械地將「文革」劃分為上下兩層，並且主觀地製造了一個下層自覺反抗上層的性質。而「文革」不同於中外以往任何時期政治運動的特點，恰恰在於其是上下結合的、不可分割的：最高領導者代表黨號召下層民眾起來反對整體意義上的執政黨成員和組織，使「反黨」有了合法性，這是古今中外沒有過的；而下層民眾在被動的參與中逐漸地體現了主動的異化意識——失控的「全面內戰」和「四五」運動。最高領導者代表黨號召與下層主動異化意識，這兩個條件缺一則將成為傳統的權力鬥爭和「階級鬥爭」模式，都不是「文革」。

雖然「文革」最後的結局，是一個回復體制的輪迴，但其過程是動態的而非簡單的靜態，各個時期有不同的重點。正如一副有趣的對

聯所說：「當權派，派當權，當權派當權；群眾鬥，鬥群眾，群眾鬥群眾」。[1]在這一點上，「兩個文革」說恰恰是用僵化的「階級鬥爭」思維來解釋了。

但是，「兩個文革」說也有其價值，在於強調了上下兩層對「文革」的不同訴求，主要是民眾的動能。這是過去將「文革」災難簡單地歸咎於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或毛澤東的錯誤，而視民眾同玩物的觀點所不能包括的。其誤區在於走向極端，把上下兩層簡單地對立起來了。筆者以為，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對立，不同時期不同層面，聯繫與對立的側重不同。從這個角度反思「文革」，顯然要困難得多，但捨此無法理解這場政治運動為甚麼確實是「史無前例」而有那麼多民眾大規模參與，為甚麼導致政局的長期動盪不休而欲罷不能。

其次，是境內主流學者胡繩提出的把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區別開來的觀點。前者作為政治運動，應當徹底否定；後者作為一個時間與空間的歷史平台，包含着錯誤、正確及兩者的混合物。這本來就是一個常識性的基本概念，無庸再強調。難道我們在評價秦始皇時，否定他的焚書坑儒暴行，也要因此否定這一時期統一文字、郡縣制、度量衡的行為？但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1980年代，人們在「徹底否定」的思維定勢下，確實是分不太清楚。比如，被聯合國作為人類征服大自然和宇宙空間的三大標誌之一的成昆鐵路，在1984年申報中國首次頒發的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時，就因為其建成於「文革」時期而兩次被取消參選資格；再如，受到廣大農民歡迎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在1980年代也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產物而廢止。就連胡繩自己，也說不清楚甚麼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他主張將1977、1978年也劃入文化大革命時期，理由是華國鋒還在繼續「文革」路線。

其實，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不僅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樣一個常識性概念是必須澄清的，就連文化大革命本身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

---

1 陳云：《集體健忘》；《人民日報》，1989年3月6日。

由此，筆者將本卷定名為《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就是要動態地考察，這一時期與前一時期相比出現的帶有本質性區別的不同特點，同時保留着的大量前一時期若干性質和形式的特點：

一、這一時期「文革」的主要活動和鬥爭，集中在高層。與前一時期抵制「文革」活動總體上是潛在地、被動地相比，抵制、糾正「文革」路線和堅持、維護「文革」路線的鬥爭形成了兩軍對壘。以周恩來、鄧小平的調整和整頓為代表的這種糾偏活動雖然被兩次中斷，但趨勢是進攻和擴展的。廣大民眾已經厭惡、憎恨無休止的無政府主義造反浪潮和上層政治鬥爭，而部分民眾的參政熱情，也由奉命地、盲目地參加「文革」轉為逐漸自發地、有意識地投身於對抗「文革」，可以稱之為真正的群眾造反。

二、毛澤東由於「文革」實踐的失敗和自身精力的衰減，不得不逐漸採取維護「文革」路線的守勢。他糾正了「文革」前期的一些最帶有「文革」本質性的錯誤——如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掌權、倡導「天下大亂」等，而着力於在意識形態上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恢復「安定團結」的舊秩序。這種恢復由於毛澤東揮灑的個人性格甚至導致外交、經濟方面出現了一些帶有改革性質的試驗，如中美關係緩和帶來「聯美反蘇」外交戰略及對西方的大規模技術設備引進的單邊開放，如社隊企業的興起為日後鄉鎮企業發展準備條件等。

三、毛澤東晚年不得不採取的意識形態上肯定「文革」而經濟、外交上放棄「文革」的做法，在他能夠有效控制政權和社會時，還可以勉強地取得平衡。但當他年老力衰愈來愈步不出戶，僅靠身邊秘書和翻譯來得到信息反饋時，必然導致矛盾疊出而無法維持。在鄧小平和江青之間，毛澤東最後選擇了華國鋒，實際上也是一個沒有選擇餘地的選擇。正像毛自己在臨終囑咐中說「這件事沒有完」，「文革」最後也是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

本卷的撰寫，採用了《劍橋中國史》的專題與通史相結合的方式。「文革」結束三十年以來，國內出版的「文革」通史，已經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和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等等，再寫一部純

粹按照歷史脈絡平鋪直敘介紹史實的「文革」通史，不能說沒有必要（還有些史實需要介紹），但也不能說很有必要。讀者對於基本史實「是甚麼」，已經並不陌生，但對「為甚麼」的問題，則仍然迷惑。因此，本卷在敘述基本史實的過程中，一方面注意填補新檔案史料，介紹過去不被人們所詳知真相或忽略了的史實，另一方面更重視對重大史實的考證和辨析，尤其是那些已經成為習慣定論而本非如此的。

所以，你可以在本卷中看到若干帶有專題性的考證，單獨提出就是一篇新觀點或者新史料的論文，比如：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曾經考慮過哪些人當接班人？

周恩來為甚麼要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做痛苦的歷史反省？

江青、張春橋歷史上真的是叛徒嗎？

中國與阿爾巴尼亞、越南先後翻臉的原因是甚麼？

譚甫仁中將被刺殺的真正原因是甚麼？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少將為甚麼被逼死？

公安部長李震少將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

毛澤東有沒有因「紅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周恩來對美國人到底說了些甚麼而被毛澤東下令批判？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是要防備誰？

批林批孔是毛澤東還是「四人幫」發動的？

鄧小平的 1975 年整頓流產是不摸脈還是不想摸脈？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的決策還是「四人幫」的挑撥？

「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嗎？

誰是粉碎「四人幫」鬥爭的首倡者？

「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的陰謀偽造嗎？

「四人幫」有沒有一個政變計劃？

中央政治局裏有多少委員參與和預知了抓「四人幫」的行動？

從「文革」結束三十周年後的研究狀況看，提出這些考證和辨析，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仍舊是當前爭論不休的謎。當然，很多地方由於史料的匱乏，只是提出了自己的個人見解，並沒有真正完全地解開這些謎。然而，困難又不僅在這裏。

歷史學家常常譴責「為尊者諱」的做法，而很多人又在感情上自覺和不自覺地陷入了另一個「為污者諱」的怪圈——不願意去洗刷那些事實上並不屬於污者的污垢。

由於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對人類道德倫理的挑戰，因此發動者至今仍然不被人們所理解，尤其是缺少基本修養的江青等更為全世界所憎惡。所以，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共識——凡是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都是毛澤東和「四人幫」造成的；凡是文化大革命的罪惡，無論說到甚麼程度都是合理的。以至於本卷中一些恢復歷史本原的考證和辨析文字，反而有了為文化大革命「喊冤叫屈」的嫌疑——比如：張春橋歷史上並不是叛徒，林彪和周恩來以此發難是政治鬥爭的需要；「文革」中惡果最嚴重的民族事件「沙甸」事件並不是「四人幫」造成的，反而是當時主持整頓工作的中央軍委負責人的決策；「按既定方針辦」不是「四人幫」的陰謀偽造，而是出於一個記錄錯誤；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沒有一個政變計劃……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對「文革」的認識，曾經經歷了三個轉折。華國鋒把「四人幫」說成是資產階級，與他們的鬥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鄧小平掌權後，進行了對林彪、江青集團的法律審判，「四人幫」被說成是一夥野心家和刑事犯罪集團；惟有陳雲，獨特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在本質上仍然是黨內政治鬥爭的意見。

本卷基本同意陳雲的意見。更重要的是，本卷的任務，不是一個政治決議，而是一本歷史著作。因此，唯一的標準就是按照歷史的本原，來向讀者介紹。至於那些事實背後的真正含義，則相信讀者自己會得出結論，又何必由作者來下呢？

第一章
林彪事件後的中國政局

林彪事件使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層突然塌陷出一個黑洞，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裏有三分之一的成員——林彪、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候補）遭到清洗和審查，這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中央委員會裏，出任解放軍各軍兵種和政府各部委、省市革命委員會一把手的軍隊將領們，也有很多被隔離審查，如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成都軍區政委梁興初、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程世清、七機部部長王秉璋等等，用軍隊幹部體系支撐的權力構架一時群龍無首。

原來在林彪、江青兩大集團之間勉力周旋的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立即抓住有利時機，進行了批判林彪集團、恢復文化大革命前各項舊政策的努力，起用一批國務院系統老幹部，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江青集團自恃為和林彪集團鬥爭的最大功臣，決不能允許大權旁落，他們利用毛澤東仍然堅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製造了批「左」還是批「右」等種種事件，終於使得周恩來的恢復舊制度努力被迫中斷。

這一時期的政局特點，是圍繞如何批判林彪的問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調整和糾正文化大革命路線的一軍，與江青集團為代表的繼續

堅持文化大革命路線的一軍，展開了實質是爭奪中國列車方向盤的鬥爭。發生在社會底層的許多表面看來是「左」、「右」文字遊戲和光怪陸離事件，背後往往折射出中央高層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一　批林整風運動和恢復舊秩序的努力

1 林彪事件的擴散、傳達激起強烈的社會反應

林彪事件的傳達，是一個頗為棘手的事情。起初，在事件真相和林彪集團成員未能弄清楚之前，中央曾經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盡可能長些，要盡可能贏得時間處理善後事宜，以防不測，還要求在宣傳報導中暫時保留林彪的名字。中共中央1971年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只在9月18日傳達到黨內省、軍級以上幹部。28日才擴大傳達範圍到地、師一級。

但是，即將到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二周年國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難題。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節日慶祝方法改革的緊急通知，宣布1971年國慶節不舉行慶祝遊行和焰火晚會，改為各種形式的分散性慶祝。通知指出：為了加強戰備，中央在幾年前已考慮節日慶祝方法的改革。分散性的慶祝活動包括在廣場、公園、街頭和各單位舉辦小型的慶祝，領導幹部可分頭參加。10月1日，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在首都各大公園同群眾一起「遊園聯歡」，「共度佳節」。這是建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慶祝國慶，毛澤東由此永遠告別了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壯舉。

一切似乎仍然正常、有序。9月26日，越南河內舉行歡迎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宴會，越南副總理黎清毅在講話中仍然「祝林彪副主席、周恩來總理以及其他中國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身體健康！」，來訪的李先念團長也面帶笑容地答謝。10月1日，朝鮮、越南及東南亞各家共產黨發給毛澤東、林彪的國慶賀電依然刊載在《人民日報》上。

然而，細心的人們還是注意到了一些不正常：

「林副主席」這個僅次於「毛主席」的「光輝」詞匯，《人民日報》從9月下旬起突然急劇減少，只偶爾地出現了六次，而且都來自地方的通訊稿，終於在9月30日一篇〈夜闖「花柳口」〉的短篇通訊裏被一次性提及後，就永遠失去了蹤影。頤和園佛香閣等北京高大建築上的巨幅林彪題詞和語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開始圍上了施工架。10月1日國慶節的《人民日報》上，破例地沒有刊登毛澤東和林彪的大幅單幅照片，連集體的都沒有。

各種內部傳達和小道消息在隱秘中不脛而走，傳者和聽者心態各異，頗耐人尋味。

9月18日，被定為黑幫分子身陷囹圄的北京市委書記劉仁的妻子甘英，獨自一人在勞動時，忽然聽見有人在她的背後喊了一聲：「林彪摔死了！」當她回頭看時，卻不見了人影。這位能夠最早知悉林彪死訊而敢於向她通風報信的人，顯然認為這對她是個好消息。[1]

筆者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情景：9月19日晚上，一個與筆者家關係甚好的高幹孩子突然造訪，甫坐定，就冒出一句：「林禿子死了！」我不經意地問：「誰？」「是林彪啊！」目瞪口呆的我和母親，木然地聽着他描述林彪死亡的情節。直到他匆匆趕往別家去繼續傳播，仍然是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也不敢回答——這是不是「反革命」謠言呢？

10月3日，林彪事件後第一個在現場見到林彪屍體的中國人——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等秘書孫一先，直到當天在外交部禮堂聽了中央文件傳達，才知道自己帶回國內向周恩來匯報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飛機殘骸，竟是林彪等人的遺體和座機。感到「我的腦袋轟的一下脹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麼會是他呢？！」。[2]

1　莽東鴻：〈九一三事件消息的傳播〉，《中外期刊文萃》，2004年第9期。

2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262。

1972年的1月8日，被長期關押的彭德懷元帥才從審查他的專案組得知林彪出事，「很長時間心神不定，煩躁不安」。[3]專案組催他寫揭發林彪的材料，他說：「高崗、林彪都是反革命，還有彭德懷。」將近一年後的8月23日，他才正式聽到了傳達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當天夜間激動地說：「打電話給周總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這樣把林彪殺了我有意見，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來總理來親自參加這個審查。」[4]

最令人震驚和耐人尋味的，當然是已經廣為人知的周恩來的痛哭。「九一三」事件後第二天，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帶回的照片，證實了林彪的確折戟沉沙，自取滅亡。深夜，原本瀰漫着高度緊張氣氛的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裏終於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其他人都已經如釋重負地離開了，房間裏只剩下周恩來、李先念、紀登奎（在林彪黨羽還沒有查清的時候，周恩來處理林彪事件的主要幫手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員，而是當時處於二線與林彪集團來往很少的紀登奎、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回憶說：

> 見總理獨自一人坐在他臨時的辦公室裏發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兩人不知道他究竟為甚麼事情悶悶不樂，便進去好言勸慰。開始時，總理只是聽着，一言不發。後來當聽我說到「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着又號啕大哭起來，其間曾經幾度哽咽失聲。我們兩人見總理哭得這麼傷心，一時不知說甚麼好，就站在一邊陪着。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下面就甚麼也不肯再說了。[5]

---

3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736。

4 三趙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838、839。

5 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組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

周恩來為甚麼痛哭？紀登奎說一言難盡，周的傷心苦悶恐怕主要在於毛、周兩人治國的思路不同，毛強調階級鬥爭，周注重抓經濟，更看重國計民生問題，為此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難酬。

這不失為一種合適的解釋，但過於籠統。但如果是這樣，林的倒台本應該是周致力扭轉形勢的契機，至少他不應該由林的死亡立刻聯想到自己的委屈而表現如此痛苦。周說的李、紀「不明白」的「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是指甚麼？從周恩來的感情歷程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與林彪的關係，還可以作更多的分析。

據說，周恩來的一生在此之前僅有過兩次痛哭，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建國執政以前。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周恩來的父親周助綱在重慶突然中風去世。鄧穎超等人沒有立即告訴剛做完手術的周恩來。三天後周知道了，在辦公室「鬆開喉嚨，大放悲聲，並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突然地抬起頭來。悲痛、怨懣、懊悔、憤怒在剎那間爆發出來，淚飛如雨，斥聲似火：『你們沒爹啊？你們怎麼能這麼做？啊，嗚嗚，他是我父親！』哭聲斥責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我父親死了你們封鎖我，馬克思主義也沒說不要爹！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親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嗚嗚……』」

第二次痛哭是1946年的4月8日，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乘坐飛機前往延安，空難逝世。「周恩來從胸腔裏發出一聲顫抖的呼喚，馬上以窒住聲息，憋了很久，蒼白的臉已經重新脹紅起來，那哭聲、訴說聲才再次急泄地湧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兩架、兩架飛機……我怎麼沒想到呢？我對不住同志啊……』」[6]

這兩次痛哭的共同點，可以說都是周感到內疚的自責，第一次是未能盡孝，第二次是未能預料飛機安全問題，而不是自己受到委屈，更不是受到殘酷現實的打擊。那麼林彪事件是否使他感到內疚和自責

6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權還將另兩次也歸於「痛哭」，筆者以為那兩次視為傷心流淚較妥。

呢？從林與周的關係看，自1926年在黃埔軍校相識，周是政治部主任，林是四期學員，直到後來身居黨內高位，兩人未在黨內發生過大的矛盾。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林彪稱病在大連不參加，毛澤東要秘書打電報招他來。林到了機場，周隻身上飛機與他長談，內容已經無人知曉，但肯定是向他轉達了毛要林出任接班人的意思，並苦口婆心勸說他出山。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即使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超越了周的地位，他對周也是尊重的。據知情人說，1970年3月毛澤東提出「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現在看來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來當」，[7] 周恩來向毛澤東寫信匯報時，曾經有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當林彪提出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時，事先曾經徵求了周的同意，甚至有說是周建議林提出的。雖然此說只是口碑，沒有留下任何檔案文字，但是1970年8月22日，即廬山會議前一天，在毛澤東處商量是否設國家主席問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四個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還特別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8] 周對林的種種示意，對後來的局勢急轉直下直至林焚屍大漠，是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的。所以，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發生上有幾分內疚，也是合乎情理的；擔心這件事「還沒有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周與林的關係，從吳法憲回憶中可見一斑。1969年九大時期，康生、張春橋悄悄對吳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人民日報》上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這個口號的出籠，周恩來要負責任。吳立即電話報告了林彪，林馬上把他找到家裏說：「胖子，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

---

7 中央文獻研究室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1983年11月。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86。

了，也可能是一時的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9]

值得一提的是，在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後不久，毛澤東就要汪東興告訴周恩來，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控制起來。但令人費解的是，周恩來並沒有立即採取措施，而且對幾人表態說他們沒有大問題。當十天後的 9 月 23 日毛澤東再次要汪東興追問時，周恩來才吃驚地拍案驚呼：我忙昏了頭，忘記了！他立即和汪前往毛澤東處匯報：黃永勝等人正在拚命燒材料。這時候，黃、吳、李、邱已經在家中銷毀了大批材料，主要是與林來往的信件等，黃「燒得臉盆都裂了」。毛澤東說：他們是在毀滅證據，這些人是要頑抗到底了。[10]根據毛的指示，周表示要立即處理黃等人的問題。按說，這樣的大事，記憶力過人的周恩來是絕不會忘記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周恩來知道，由於林彪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肯定會有很多軍隊將帥甚至中央領導人和他有工作上、私人關係上的往來文字材料，未必都是上了賊船，而一旦這些都被列入罪證，中央專案組的江青、張春橋等人必定主張追查株連，將會羅織更大範圍的冤案。因此，寧可冒險縱容黃等人一燒了之。

還值得指出的是，從中共九大開始，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出現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鬥爭，到九屆二中全會形成不共戴天的總爆發。因此，文化大革命派的江青集團是林彪集團的主要對手，在林彪事件後成為最大的勝利者，這並非完全是他們的自我標榜。而周恩來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與林彪集團的關係，因為長期革命、軍事鬥爭生涯、經濟建設歷程中的來往和對江青等「文革」筆桿子的共同不滿，立場較為接近，也是無庸諱言的事實。在那個〈「五七一工程」紀要〉[11]中，林彪集團充滿了對江青集團

9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845。

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85。

11　在有關文件中，「五七一工程」和「571工程」經常混用，本書統一用「五七一工程」。

的仇視，如「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還直接籌劃了對江青集團的鎮壓行動，如「一定要把張（引者註：指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卻沒有表現對周恩來等國務院系統的任何敵視，反而極為同情過去被打倒的高級幹部（是否也包括劉少奇？）地說：「戳穿了說，在他（引者註：指毛澤東）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呼籲「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引者註：指毛澤東）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這個事實，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往往被人忽略。

總的來說，出了這樣一場大事變，毛澤東的處理是比較寬容的。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指着「聯合艦隊名單」等材料問紀登奎：究竟哪個是（其骨幹名單）？經過研究才確定較小範圍的「聯合艦隊名單」是他們的骨幹分子。毛澤東親自決定，將「聯合艦隊名單」上的九十三人全部抓起來。[12]10月4日，他對中央軍委辦公會議講話說：「對他們這個集團的一些人，高級幹部，能爭取的盡量爭取，能拉的盡量拉。」[13]這和斯大林晚年的捕風捉影大清洗是不同的。11月20日，毛澤東接見武漢地區領導人時說：

> 你們大概不是死黨，是活黨。就是說，犯過錯誤的人有好有壞。
>
> 我們黨歷來的方針對犯錯誤的同志以教育為主，「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目前有那麼一些人，跟着副統帥，跟着他上當，不光彩。還是跟着黨，不要跟着個別人。統帥也好，副統帥也好，個別人容易起變化。我跟的是路線，你領導者路線正確，我跟，至於你路線不正確，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詞說「緊跟」，我不願聽這個話，甚麼緊跟呢？改過來就好，你們是跟着跑的。死黨只有那幾個，主要是葉群，從去年到今年主要是林立果，連他父母也不相信了。

12　三靈害：〈紀登奎談毛澤東〉，〈南方周末〉，1988年2月17日。

13　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談話（記錄傳達稿），1971年10月4日。

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讓他們改，表示歡迎的態度。比如在林彪下面的幾十個工作人員和秘書，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給他們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錯了覺得面上無光。連8341在毛家灣的那個中隊也覺得無光了。這種思想要解釋。是黨給的任務，是組織派到他那裏去工作的嘛，他那時是副統帥嘛，你怎麼知道林彪要叛黨呢？不知道是壞人嘛，要說無光，是中央臉上無光，也是整個黨無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臉上無光。[14]

但是，對林彪事件採取寬容政策只能穩定上層，不能穩定社會。如果說像周恩來這樣對毛忠心耿耿，像彭德懷這樣與毛澤東、林彪有歷史仇怨的人都無法面對林彪事件，那麼一般幹部群眾更難以面對這個晴天霹靂。就在傳達林彪集團罪狀的過程中，不斷報來各地的異常反應。國家計委軍代表向中層幹部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時，出乎意外地沒有出現以往的高呼口號熱烈響應，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響起了哭泣聲。某野戰軍連隊傳達時，甚至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開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陷林副主席」的「壞蛋」。

為了使全國人民盡快地擺脫昔日「最親密戰友」的形象，認清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家的醜惡面目，必須向全國宣布充分的林彪罪證材料。林彪事件剛發生，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成立林彪的中央專案組，主要成員有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把收集罪證當作查清林彪餘黨之外的最重要任務。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通知〉。針對當時黨內外對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九大」產生巨大疑問，連帶對林彪在「九大」上代表中央做的政治報告高度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產生疑問，〈通知〉劃出了底線，正式確定林彪集團的實質是反對九大路線，把林彪和文化大革命隔離開來。〈通知〉指出：

14　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談話（記錄傳達稿），1971年10月4日。

中央在審查林陳反黨集團案件中，從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北京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查獲了林彪一夥制定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個〈紀要〉證明，林彪一夥發動這次反革命政變是早有預謀的。

它的實質，是反對黨的「九大」路線，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和政策，改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他們要聯合地、富、反、壞、右，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蘇聯美反共反華反革命。如果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得逞，中國就會像毛主席曾經指出的那樣：「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15]

在此之前，由於〈「五七一工程」紀要〉無以復加地惡毒抨擊毛澤東，咒罵他是「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懷疑狂、虐待狂」，還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攻擊為「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制度，負責林彪專案的紀登奎認為不能印發，對周恩來談了自己的想法。周恩來說：主席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他自己的考慮。建議報送毛，由他本人來決定。[16]毛澤東看了後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17]11月8日，毛澤東接見中國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全體成員，參加接見的還有周恩來和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到〈「五七一工程」紀要〉時，毛澤東說：「等一會兒把這件東西唸給他們聽，要盡快全文印發到全國各個黨支部。」周恩來說，這裏面盡是惡毒誹謗主席的謊言，怎麼能印發？毛澤東說，怎麼不能？一個字都不改，原原本本發下去，讓所有的黨員所有的群眾都知道。[18]毛澤東的考慮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如果

15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採訪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

17 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8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354。

沒有這份〈「五七一工程」紀要〉，很難向全國、全世界解釋林彪事件。即使如此，還有不少人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政變可行性表示懷疑，連毛澤東自己也不完全相信。〈「五七一工程」紀要〉印發的當天，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談到〈「五七一工程」紀要〉籌劃的陰謀政變措施，毛澤東笑着說：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麼搞得成呢？

但是，這時候〈「五七一工程」紀要〉印發的範圍還只限於省軍級高級幹部。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印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主要介紹了九屆二中全會前後毛澤東與林彪集團的鬥爭。印發通知指出：「粉碎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陰謀的鬥爭，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是九大以來、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是兩個司令部，即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同以林彪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鬥爭的繼續。」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中共中央在印發通知中指出：「傳達討論的重點是批判林彪一夥炮製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反革命綱領」．傳達的步驟分兩步，先黨員幹部，後群眾，即第一步先在黨員幹部中傳達，第二步再向群眾傳達。「材料之二」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制定〈「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背景和過程。第二部分用大量的材料揭露林彪集團按照〈「五七一工程」紀要〉進行武裝政變的十個方面的準備活動。第三部分主要是批判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實質，指出：「這個反革命綱領，是地、富、反、壞、右和帝、修、反多年來反華、反共、反人民的大雜燴。它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衊我們黨在毛主席領導下半個世紀的革命歷史，一筆抹煞全國人民長期英勇奮鬥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把國內外大好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材料中引用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破除迷信〉的講話說：「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他們說得不夠，往往還要我們加以補充。」

「材料之二」包括三個重要附件，即「附件一：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影印件）」，「附件二：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原文印件）」，「附件三：李偉信的筆供」。

今天看來，這個「紀要」作為歷史文獻，其中採取政變行動的內容，已經被證實多數是無法實施的空想，沒有多少價值了。倒是「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政策和策略」的部分內容，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政變宣言書，對於我們分析林彪集團包括當時部分軍隊高層幹部對待毛澤東、對待文化大革命、對待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對待美國蘇聯及國際關係的基本政治態度，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茲分類節錄部分內容，予以定位，設想其政變成功後要宣布的基本政策：

（1）對待毛澤東——徹底否定毛澤東，但承認毛澤東在歷史上起的「統一中國」作用，對被毛「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解放」

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

打着B－52旗號打擊B－52力量

他是一個懷疑狂、瘡（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

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批，各個擊破。

【他們一批】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們這樣做，不】【他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

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羣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

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

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識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搭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出於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於〔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

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

(2) 對待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江青集團的「文革」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形勢

9．2後〔據李偉信交代，是指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

軍隊受壓

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

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

眾叛親離

（1）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醞〕釀，

（2）奪權正在進行。

（3）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4）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5）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

（6）他們「故計〔伎〕重演」。

（7）政變正朝着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

B－52〔據參與反革命政變的案犯交代，是林彪一夥反革命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代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

對我們不放心。

有利條件：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

危機四伏

——獨裁者愈來愈不得人心，

——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

——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3) 對待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否定「社會法西斯、封建主義」，要求堅持「真正的馬列主義」，建立「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

篡權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

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

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

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

全黨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

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的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政策和策略）【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

緩和群眾的輿論

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數

【我們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數〕

保護（團結）一大片

（4）對待蘇聯、美國及國際關係——與蘇聯、美國談判，爭取其支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國外矛盾激化

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

【美國（中美談判）】

借蘇力量柑（箝）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暫時核保護傘〔林彪一夥要把我國置於蘇修核武器的「保護傘」之下，也就是要把我國變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動員群眾口號、綱領）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19]

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中共中央轉發這兩份材料的通知說：各地在傳達討論「材料之三」時，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為武器，深入地進行批林整風運動。中央專案組編印的「材料之三」題為〈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第一部分為「林彪反黨集團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罪證」；第二部分為「林彪反黨集團準備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罪證」；第三部分為「林彪反黨集團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證」。材料中選錄了大量照片、信件、揭發材料、供詞，並酌加按語和註釋。

中央專案組〈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證，共分五個部分。（1）陳伯達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2）陳伯達1929年在莫斯科參加托派組織，回國後繼續進行托派反共活動；（3）陳伯達1931年在天津被捕叛變，成了特務；（4）陳伯達背着毛主席、黨中央，同蘇方人員秘密來往、進行陰謀活動；（5）陳伯達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一貫堅持修正主義、妄圖復辟資本主義。中央〈通知〉說：陳伯達到延安以後直至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的反革命罪行，還在繼續審查中。有關陳伯達罪行的揭發材料，望各地繼續報送中央。[20]

19　〈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附件二，中共中央1972年1月10日發出。文中劃【　】者，是「紀要」原本中刪去的句、段。黑體字是「紀要」原本中的小標題。〔　〕內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時加的文字說明。（　）內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時改正的錯別字。

20　根據文化大革命後的調查，有關陳伯達的叛變、成為特務的結論，並不屬實。

相對內部緊鑼密鼓的傳達批判而言，公開的輿論批判仍然是隱晦的，雖然1972年7月毛澤東曾經主張：對外國人也無需隱瞞林彪的問題，「誰人問都應直告，不應躲躲閃閃。」[21]但始終沒有對林彪等公開點名。1971年12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總結加強黨的領導的經驗〉的社論，首次針對尚未公開的林彪叛國出逃事件作出反應，指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要搞分裂活動，就一定要搞陰謀詭計。」「我黨歷史上那些堅持機會主義路線、玩弄陰謀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裏通外國分子，最終都逃脫不了身敗名裂，自取滅亡的下場。」

1972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社論以批判所謂「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形式批判林彪說：「劉少奇一類騙子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活動，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是極端孤立的，是見不得人的，他們只能靠玩弄陰謀詭計，造謠誣衊。」此後至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對林彪點名前，「劉少奇一類騙子」就一直被作為林彪等人的公開場合代名詞。

中央公布的林彪罪證材料在批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地在向群眾傳達時，採取了總結試點經驗，開辦學習班，重點培養骨幹，然後向群眾普遍展開傳達宣傳的辦法。以「材料之一」為例，傳達辦法是：

> 工、礦、企業發至班組，二十人以下的發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發兩份，四十人以上的發三份；農村發至生產隊，三十戶以下的發兩份，三十戶至五十戶的發三份，五十戶以上的適當增發，居住過分分散的酌情增發，大隊發二至三份；軍隊發至排，每排發兩份；大、專院校和中學，每個教學班發兩份，小學五、六年級，每個教學班發兩份，教職員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發一份；商業部門發至班組和營業點，二十人以下的發一份，二十人以上的

21 毛澤東在外交部關於向美國友人等談林彪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批語，1972年7月。

發兩份：機關發至科、室，大體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發至居民委員會，大體上按有閱讀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發一份。除地、富、反、壞、右和反動資本家外，均可閱讀。[22]

全國人民對林彪一夥「喪心病狂地迫害毛澤東」的政變活動表示了極大的義憤。但是，公布這些材料的負面作用也是明顯的。材料揭露林彪集團的活動越「反動猖狂」，越歷史久遠，人們就越離不開一個問題——為甚麼毛澤東一直沒有發現林彪的罪行而給予極大的信用？當時還是個小學生的朱學勤回憶說：「人民不會聽信這些『惡毒攻擊』，但傳達以後的效果則恰恰相反。多少年後我問同代人促其覺醒的讀物是甚麼，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會回憶起這份〈「五七一工程」紀要〉！」[23]這背後隱藏着一個令人窒息的爆炸潛能——毛澤東犯有嚴重錯誤，他自己必須向全國有個檢查姿態，否則不能平撫人心。

2 毛澤東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部分錯誤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很大刺激，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第一次發作後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體參加國事活動，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他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24]這樣糟糕的病狀，過去毛澤東從

22　中共中央關於擴大〈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發放範圍的通知，1972年1月13日。

23　朱學勤：〈「娘希匹」和「省軍級」——文化大革命讀書記〉，載〈書齋裏的革命：朱學勤文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611。

來沒有過。不久，又爆發了更為危急的一次，是2月12日[25]凌晨的突然休克。護士長吳旭君在身邊拚命地呼叫，見毛沒有任何反應，一摸脈搏，顫抖地對趕來的秘書張玉鳳和醫生胡旭東說：「摸不到脈……」周恩來聞訊，萬分驚恐，立即趕到中南海游泳池毛的住所，由於過度緊張，他甚至抬不起自己的兩腿，很久下不了車。跟隨他去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那個時刻說：

> 「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來呀！主席，你聽見了嗎？」周恩來走到牀邊，雙手握住毛澤東的一隻手，大聲呼喊着。他的嗓子有點沙啞，而且有些發顫。毛澤東沒有絲毫反應。毛澤東的臉色青紫，呼吸極其微弱，幾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26]

經過眾多專家大約二十多分鐘的注射、按摩、捶背、輸液搶救，毛澤東的面部逐漸由青紫泛起了淡紅，胸部也隱隱約約感覺到起伏。他終於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知道自己剛剛與死神話別，極為疲乏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從這場重病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行走困難，整日半躺在牀上，靠吸氧輸液維持。

毛澤東的重病，既是肌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描述說：

> 他的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難以琢磨。看到我們，也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着面孔，沒有一句話說，他的心情是沉重的。[27]

林彪問題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這是壓在毛心頭的一塊巨石。顯然，僅僅依靠文化大革命前期那種向全國宣布又揪出一個暗藏的階級

---

25 日期有多種說法，此據《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15。

26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245。

27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178。

敵人集團方式，是遠遠無法讓全國、全世界信服的。因為，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出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前期製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並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態。

> 你們再不要講他（毛澤東指着葉劍英說）「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甚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關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來：後來楊成武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
>
> 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甚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一些人不能夠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甚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着，這些都是證據嘛。

11月22日，毛澤東會見范文同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他含蓄地提到不久前的林彪叛逃事件時說：

真正講黨內矛盾解決得比較好一點，就是現在這個時候，軍隊可以統一了。過去軍隊就是不統一嘛！一分為二嘛！那是對立統一，unity of the opposites，經過struggle鬥爭才能解決矛盾嘛。現在各國都在猜想中國出了甚麼大問題。中國出了大問題是在一年以前廬山會議上，在那以後逐步解決了。我這個人犯了錯誤，就是進城以後，不管軍隊。結果就鬧山頭主義，也鬧宗派主義。（你們）將來和平了，不要學我們犯錯誤。[28]

毛澤東說：「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在場的周恩來馬上接着說：「我們也犯了錯誤。」

雖然歷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干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布了為文化大革命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由於沒有完全摸清毛澤東這些表態的意圖，葉劍英遲遲沒有向曾被誣衊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29]葉才匆匆趕到病牀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陳毅夫人張茜氣憤地說：「為甚麼早不來，這時候來已經聽不見了，傳達有甚麼用！」[30]

陳毅去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治喪程序與只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比陳毅的元帥軍銜和軍委副主席均低兩級的李天佑相同，規格略高。建議參加追悼會的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

---

28 陳東林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4782。

2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06。

30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255。杜為陳的秘書。

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郭沫若等。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註明因太冷江青、宋慶齡不參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參加。[31]由於中央還沒有對「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詞如何寫？無人願意表態。1月8日，周恩來審查修改陳毅悼詞稿，仍謹慎地增加了陳毅「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刪去了周恩來補寫的這段文字，批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32]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追悼會規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臨時接到參加許可的宋慶齡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也趕來參加。追悼會改由周恩來致悼詞。

與兩個月後的3月26日逝世的謝富治相比，已經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之死雖然沒有獲得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禮節，卻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的殊榮——從1950年任弼時逝世後，毛出席的追悼會惟有這一次。[33]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對他昔年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着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34]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裏，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重要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

31　一些著作中所說因受江青集團控制，追悼會降低規格，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能參加。不屬實。見劉岩：〈我所了解的陳毅追悼會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07。

33　1963年12月羅榮桓逝世，毛澤東曾向遺體告別，未出席公祭大會。

34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64－265。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作出批示，予以肯定。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復出指日可待。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作出批示，指示對陳雲、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范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範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復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作出安排。他在批示中作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35]還特別批准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志，應當讓他回來」。[36]

1973年2月2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詞」。[37]但是張春橋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也沒有着手為賀龍平反。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作了自我批評：「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12月21日，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毛澤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講話，再次指示要為賀龍平反。他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了：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不過這個人身上經常有武器（周恩來：一枝小手槍，後來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86－412。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620。

37 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632。

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他還略帶調侃地說：「有幾次聽一面之辭，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評。」[38]

毛澤東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鍛煉部隊，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時訓練。」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39]此後，當年被毛大加讚賞在解放軍中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即停止進行。

1972年6月，他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第一次對外點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極左派說：

> 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甚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我們這裏早幾年天下大亂，全國各地都打，全面內戰。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100萬枝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外交部）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的「左派」手裏。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沒有多少問題，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總後台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摔下來了，見上帝去了。[40]

38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76。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87。

40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823、4824。

12月，毛澤東對劉建章家屬反映監獄中搞「法西斯審查」的來信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41]

1973年1月，李德生傳達了毛澤東針對破壞民族政策現象作出的指示：「政策問題多年不抓了，特別是民族政策。現在地方民族主義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漢族主義比較大，需要再教育。」[42]

儘管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和指示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上作出根本性的改變，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認識，有些說法更不符合歷史事實，例如他把「全面內戰」的總後台說成是林彪，而林彪恰恰是反對地方軍區分裂和給造反派發槍的。但毛澤東的這些表態，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調整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主動權。

3 撲朔迷離的「批林整風」運動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的通知，指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總結和交流這一時期的經驗，以利於進一步揭發和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使全黨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解讀出來，就是要把揭發運動轉入批判運動，在思想上為批判林彪確定基調，並且解決前一段時間揭發批判中出現的種種內部矛盾。

5月21日至6月23日，「批林整風」匯報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各大軍區負責人共三百一十二人參加。周恩來主持了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做了重要講話，就會議印發的文件逐一作出說明、解釋，回顧了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以來與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過程。

---

41 《周恩來書信選集》，頁623。

42 《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部編：《當代中國民族工作大事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頁219。

周恩來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宣布把以前開展的「批陳（伯達）整風」運動和「林、陳反黨集團」提法，統一改為「批林整風」運動和「林彪反黨集團」。周恩來說：

> 這一次我們這個會議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風了。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幹部，還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個錯誤的嚴重，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也是如此。《我的一點意見》，把打擊的矛頭對準了陳伯達這個騙子，由於主席的教導使相信他的人、上當的人覺悟了，警惕起來了。使跟他搞陰謀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從九屆二中全會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林整風。
>
> 但九月十三日把這個問題真相揭穿了，頭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陳，不像高饒聯盟那樣。林彪搞的是陰謀活動，他反黨、反主席的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劉少奇以後就是他掛帥來反對主席了。他是搞陰謀的，但是陰謀逐步要暴露，最後滅亡。這次第十次路線鬥爭，主要矛頭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這個反黨集團，教育大批幹部，團結大批幹部，是這樣一個精神。
>
> 所以，這次開的會議，就定名為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也不要再說林陳反黨集團了，就是林彪反黨集團。[43]

從字面上看，稱「林彪反黨集團」和「林、陳反黨集團」並沒有大的區別。實際上是頗具苦心地把林彪和「文革」派擇清。陳伯達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雖然小組大權一直掌握在江青手中，但他畢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象徵。一般人都認為他是江青的「文革」派集團頭腦，而不了解從中共九大陳伯達就開始靠攏林彪了。如果把林、陳並稱，很有可能導致憤怒的群眾在批判林彪過程中株連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文化大革命。

43　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2年5月21日。

周恩來講話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以介紹會議文件的形式，說明毛澤東對林彪早有覺察。會議經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確定的文件，主要有〈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和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談話〉（共十二件）、九屆二中全會以來的中央的有關文件（共兩本）、〈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陳伯達的歷史罪證、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會議參閱的文件有：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軍事路線的罪行材料、朱德等九位老人的書面揭發林彪材料、李力群（高崗夫人）對林彪的揭發材料、林彪〈論短促突擊〉文章、關於中蘇關係的十一個問題。

周恩來說：「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指的是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信中毛澤東曾表示對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感到不安，說：「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引者按：指林彪主持編發的《毛主席語錄》），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44]

周恩來在講話中着重說明了這封信的產生背景和經過，強調毛澤東當時已經看出林的問題、預見到林要搞政變，又反覆地解釋了為甚麼毛當時不揭露林。他說：

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寫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裏，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裏頭有些話講過頭，敘述政變那種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1，72。

寫法也不當。但是當時是為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眾之氣，要打擊、掃除那種修正主義的風。所以說話有點過。……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冷水了嗎？

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當然了，當時不是說林彪這個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來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極左的話，這個極左，就形左實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個右派。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得這麼清楚。這封信貫穿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45]

與會者學習了這封信，政治局的九名成員分別到各組解釋了這封信。江青的解釋刊登在會議簡報上，她說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她也承認不少老同志早看出林有問題，但是解釋為顧全大局沒有說。對於周、江這些說明，不少與會者口頭上保持沉默，內心卻將信將疑。事實上，毛澤東在那封晦澀的信裏只是對林的政變提法和個人崇拜語言略有微詞，一方面是表示謙虛，一方面也表示了不滿，但總的來說肯定林的動機——「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現在把它和預見到林彪以後要代表右派搞政變，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還有些智商低下的造反派人物，胡攪蠻纏地質問，為甚麼那些老同志看出林的問題不說，難道還有比毛主席的安危更重要的大局嗎？

出乎意料的是，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在會議後期6月10日、11日、12日連續三個晚上在會上作〈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講話。這個講話稿，周恩來花了十個晚上寫，內心十分痛苦，寫出提綱後送毛澤東批准。信中說：

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

45　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1972年5月21日。

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以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和教育我的。[46]

周的講話依次就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1930年代土地革命時期的瞿秋白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冒險主義、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歷史過程、錯誤危害等詳加論述和說明。在談到王明「左」右傾錯誤問題時，周恩來結合個人親身經歷，迫不得已地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批判乃至過分的檢討，稱自己為「罪人」：

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能有今日？

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在講述了黨的歷史之後，周恩來又說，這幾年我常說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來也並不容易。[47]現在凡是在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中沾了邊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應該得到啟發，不應該有任何顧慮。要徹底交代，認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周恩來的檢討使在座的黨的高級幹部普遍感到震驚。他們對周恩來幾十年前反對毛澤東的「罪狀」並不清楚，也不理

46 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1972年6月7日。

4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29。

解為甚麼這時候要提到這些舊賬。但是，每個與會者都毫無例外地表態，基調都是：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迫於形勢，鄧穎超也不得不發言，「說她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一位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甚麼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48]

毛澤東為甚麼要周恩來在批判林彪的會上做帶有算歷史舊賬性質的痛苦回顧？比較合理的分析是，周恩來原是林彪之後的第三號人物，林倒台後周恩來全面主持工作，威望極大提升。毛要通過對周恩來歷史的這次批判，向全黨發出一個明確信號：林倒了，但周恩來並不是接班人。

也許是意識到對周恩來的打擊過於嚴厲，根據毛澤東6月23日的指示，周恩來在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又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中共中央又發出文件予以說明，並附若干原始材料傳達至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說，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此前，13日，陳雲在批林整風匯報會小組會上就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發言：「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負責任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同日，陳雲又寫了書面發言，再次肯定：「這是國民黨的陰謀。」[49]

這次「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並沒有真正地揭示林彪集團的本質，也沒有就批判林彪問題形成一致的方向和見解，反而暴露了隱含在林彪事件後中央和社會的尖銳內部矛盾，為以後的批「左」還是批「右」爭論埋下了伏筆。

4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266。

4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31。

4 周恩來在各個領域恢復政策的努力

早在中共九大以後，周恩來就已抓住戰備需要國內安定的一些機會、對部分受極左幫派勢力控制，始終動盪不定的地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

1969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處理山東問題的會議，決定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調離領導崗位（王效禹文化大革命前為青島市市長，「四清」運動中曾被定為「四不清」幹部。1967年通過康生子得到康生指示，帶領造反派到濟南奪取山東黨政領導大權，成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由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全面負責山東工作。1969年12月，周恩來親自主持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解除了劉結挺、張西挺的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使四川長期動亂的局面有了改觀（劉、張為夫婦，原為中共四川宜賓地委、市委書記，因製造冤案打擊他人，1965年被鄧小平代表中央決定予以撤職、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張得到江青支持，起來造反奪權，成為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0年7月，周恩來批評黑龍江省說，根據戰備形勢，黑龍江不能再大亂了。其後又指出：「黑龍江問題的根子在潘復生那裏。」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潘復生的極左錯誤受到了批判（潘復生1950年代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1958年因反對「大躍進」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農場勞動。文化大革命前復出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1967年通過毛遠新得到毛澤東的示意，出面支持造反派奪權，成為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實際工作由省軍區負責人劉光濤主持。同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導致兩派武鬥不休的貴州省領導班子進行調整，批判了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的錯誤，次年5月正式解除他的職務（李再含原為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文化大革命前夕因向林彪、江青寫信反映貴州省委問題而得到江青支持，1967年起來奪取貴州省黨政大權，成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貴州省長期分裂的局勢有了好轉。同年，中共中央還對頻繁發生武鬥的山西省問題進行處理。次年4月解除了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的職務（劉格平是1937年唯一一個沒有執行中央指示從北平

國民黨監獄履行自首手續出獄的中共老幹部，建國後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後被定為「地方民族分裂主義者」，調任山西副省長。1967年被江青看中召見，回省後組織造反派奪取山西黨政大權，成為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由當地駐軍負責人謝振華主持省內工作。[50]

這樣，在1967年「一月奪權」中成立的五個省、市革委會，除上海市外，其他通過造反奪權產生幫派權力機構，致使局勢動盪不安的現象都得到了改變，造反派勢力很大的湖北、浙江等省的領導班子也得到了初步調整，朱鴻霞、張永生等造反派頭目被審查。代替他們掌權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幹部和軍隊幹部。這樣，在1970年左右，周恩來已經逐漸把國家行政權力收攏到自己的國務院手中。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着手糾正冤案，恢復、落實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

1971年11月，周恩來派人到貴州找到賀龍夫人薛明，要她將賀龍被迫害致死前的情況寫報告給中央。但此後一直被耐人尋味地擱置。1974年9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催問說：「賀龍恢復名譽搞好了沒有，不要核對材料了。」[51]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於9月29日發出了1974年25號文件，即為賀龍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賀龍專案一直為「林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人所把持」之後，對所捏造的賀龍通敵問題指出「完全是顛倒歷史、蓄意陷害」。對文化大革命初期軍隊內部指摘賀龍所謂「圖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認為「經過調查，並無此事」。但對康生提出的所謂賀龍搞「二月兵變」的問題，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純係訛傳」。1975年6月9日，即賀龍逝世六周

50　據《當代中國的山東》、《當代中國的四川》、《當代中國的貴州》、《當代中國的山西》〔《當代中國》叢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黑龍江四十年》（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等書。

51　《賀龍傳》，頁663。

年的時候，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抱病出席，他一下車即悲痛地邊走邊喊：「薛明！薛明呢？」然後握着薛明的手流淚說：「我沒有保護好他呀！」[52]在哀樂聲中，周恩來到賀龍遺像前深深地一連鞠了九個躬。

1972年4月24日，經周恩來指示和親自閱改，《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恢復和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把文化大革命中對幹部「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情況歸結為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求：「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採取教育為主的方針」。社論特別指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這個對新幹部、即造反派的「寶貴財富」評價並不新鮮，而對老幹部的這一評價卻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罕見的，為解放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幹部，起到了促進作用。

8月1日，由周恩來安排，經毛澤東批准，陳雲、王震、滕代遠、陳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迫害和排擠的老幹部出席了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招待會。此後，每逢重要節日的慶祝活動，周恩來都盡可能地安排一些受迫害尚未解放的老幹部出席，為他們恢復名譽。

這年12月毛澤東批評監獄中搞「法西斯式審查方式」的現象後，次年1月8日，周恩來審閱公安部〈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對監管工作重要指示的報告〉，批示要求關押重大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監獄「在一個月內整頓好，並定出新的規章，嚴格遵守，容許各省來開監管工作會議的人參觀批評和學習」。此後，秦城監獄在押人員的居住、飲食、醫療衛生條件均有所改善。[53]

---

52 1967年1月19日，周恩來曾經代表中央與賀龍談話，宣布並安排對他隔離審查。

5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72。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中央政治局討論恢復鄧小平工作的情況，建議中央對此作出一個決定，傳達到縣團級。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指出：

> 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毛主席的批示，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總是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面地、歷史地評價他們的功過，認真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由國務院分配他擔任適當工作。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學習毛主席有關正確對待犯錯誤幹部的一系列指示，對犯錯誤的同志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進一步落實黨的幹部政策。[54]

作為附件，〈決定〉還下發了鄧小平1968年6—7月寫的約三萬言〈我的自述〉全文，認為「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這個〈決定〉並沒有為鄧小平的所謂「錯誤」進行平反；相反，〈決定〉還以落實對犯錯誤幹部的政策為其出發點，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表明當時對解決鄧小平問題的一種歷史的局限性。尤其是江青集團更是憤憤不平。中共上海市委收到〈決定〉後，主持工作的馬天水就說：「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可沒有想到。」在討論時表示「我們對他不大放心……」。他在為上海市委起草的給中央的「擁護」電報中這樣寫道：「鄧小平同志原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裏搖羽毛扇的人物，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決心改正錯誤並作了自我檢查。現在毛主席、黨中央對他十分寬大，決定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我們表示堅決擁護。」這封電報由於不滿情緒太露骨而遭到了張春橋的批評。[55]

54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鄧小平研究專題，www.cass.net.cn/webnew。

55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頁349。

然而，根據這個〈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得以復出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一種否定。它對於進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無疑是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

4月12日晚7時30分，在人民大會堂一樓宴會廳，鄧小平自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以來第一次公開參加了歡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從柬埔寨解放區回到北京的外事活動，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他的名字在出席的十五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排在最後。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許多新聞媒介對鄧小平重新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不是西哈努克親王而是鄧小平成了當晚新聞的無冕之王。這時距他1966年12月14日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即到醫院向吳玉章遺體告別和參加追悼會，已經六年零四個月了。

3月9日這天，周恩來還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建議抓緊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並提出由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擬定「先易後難」的具體方案，即先解放問題小的幹部。

周恩來抓住原八機部部長陳正人、內務部部長曾山、教育部部長何偉因在受審查中缺少醫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衛生部要盡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並親自安排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為約五百名副部長以上幹部作了體檢。許多在外地被審查的老幹部藉此機會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他還提出，要對黨內老幹部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中的愛國人士進行體檢。在他的督促下，中央組織部提出了一個三百多名高級幹部的名單，周恩來、葉劍英又排除江青、張春橋的百般阻撓，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逐一討論、通過，為一大批被打倒和排斥的領導幹部重新安排了工作。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底，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被中斷的全國民族、公安、衛生、科學、出版等部門工作會議，以此推動國家各個部門健全制度、落實恢復政策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期，國家的民族政策遭到了嚴重破壞，許多民族地區發生了粗暴干涉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迫害民族幹部群眾的惡性事件。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關係一度處於十分緊張的狀

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固原地區是包括五個縣的回族聚居區，人民生活極為貧困，十幾歲的女孩還穿不上褲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這一地區先後發生過七八次叛亂。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革命委員會又強迫回民養豬，引起極大抵制和反抗。回民憤怒地說：今天讓我們養豬，明天還讓我們吃豬哩！就在1972年1月周恩來指示解決執行民族政策及平叛擴大化等問題，召開寧夏固原地區民族工作座談會剛過，3月固原地區隆德縣又發生叛亂，殺死縣保衛處長，搶奪槍支，民兵和民眾共死亡幾十人。中央調查組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採取寬大政策，發放救濟物資，較好地平息了這次事件。由固原入手，周恩來先後派出五個調查組，分赴內蒙古、新疆、西藏、廣西、雲南、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民族政策執行情況和群眾中存在的生產、生活問題。7月，中共中央在批轉寧夏座談會報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幾年來，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黨的民族政策的觀念十分淡薄，甚至發生了嚴重違反政策的情況，因此應當對執行民族政策的情況進行一次檢查。此後，全國各民族地區在檢查中初步改變了嚴重違反民族政策的現象，糾正了一些錯案，民族矛盾得到了緩和。

公安司法部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重災區。1967年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曾經多次提到要「砸爛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還說他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就高興。他的本意是要改變他認為的官僚主義加特務機關作風，推行「群眾專政」，但是卻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在「徹底砸爛公檢法」這一口號指導下，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等造反派組織衝擊公安部門甚至監獄奪權，後來中央又決定對公安機關實行軍管，在廣大公安幹警中大搞清查「特務」、「內奸」運動，公安部有7名副部長被打倒，遭到關押，北京市公安局155名處長、分縣局長以上領導骨幹中，有72人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多達46%以上。周恩來當時就氣憤地指出：「公安部把所有局長的權都奪了，只剩謝富治一個人，還怎麼做工作？這是剜心戰術。」但謝富治自恃有毛澤東的指示和江青的撐腰，仍然多次講話宣布要把公、檢、法「砸個稀巴爛，粉碎越徹

底越好」。[56]1970年，李震給毛澤東寫信說，大家對「砸爛公檢法」口號意見很大，請示怎麼辦。毛澤東指示：「『砸爛公檢法』口號不科學，應該提『公檢法徹底鬧革命』。」1971年在重新召開的全國公安會議上，周恩來批評說：「公安機關現在組織沒有了，制度沒有了，辦法也沒有了。……那些老人為甚麼都不用了？老的不能不要，不能不用。」[57]但是公安部一直按兵不動，周一再督促，謝富治病死後不久的1972年7月，公安部才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公安系統落實幹部政策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建議對應解放的幹部抓緊落實工作，及時解放，原則上都應在公安部門分配適當工作；公安機關的軍管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應當予以撤消。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

1973年3月8日，周恩來主持舉行有外國來華專家和家屬參加的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茶會。不顧在場的江青的不滿，他嚴厲批評了文化大革命前期將馬海德、陽早、寒春等許多早年追隨中共的外國專家、朋友污衊為「外國特務」、「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進行批鬥、驅逐、關押的極左做法，沉痛地向受迫害的與會者逐個表示賠禮道歉說：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他深情地說：今後我們一視同仁，像一家人一樣生活，來個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58]他的講話獲得了外國專家熱烈的掌聲。講話在國外傳開以後，引起強烈反響，一些被迫出走的外國專家、朋友回到了中國。

在林彪集團掌握較大權力的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訓練工作受到了嚴重的干擾，大肆鼓吹「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把軍事訓練當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加以批判，使得正常的訓練項目被取消，訓練時間被排擠到只佔40%，全軍軍事院校由125所銳減為1969年的43所，部隊技術人員和先進裝備得不到及時補充，軍事素質急劇下降，訓練事故屢有發生。毛澤東覺察到了這種情況，

---

56 中發〔1980〕77號文件附件14：〈謝富治推行「砸爛公檢法」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57 王芳主編：《當代中國的公安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24、25。

58 高岩：〈周恩來對在華外國專家的關懷〉，《人物》，1993年第1期。

1971年8月批評說：「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59]林彪事件後，葉劍英開始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相對林彪時期的軍委辦事組，葉劍英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權力有所增大，也有了中央軍委的名義。「九一三」事件後不久，毛澤東特地叮囑：「軍委辦公會議，這次是叫改組，不是摻沙子。今後辦公會議要研究大事」，「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不要用辦公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的問題，是用中央的名義嘛。要好好準備，開次軍委全會，各大區同志來參加，徵求他們意見。」[60] 1972年2月，葉劍英針對林彪排斥軍事訓練、「只搞文不搞武」的做法，提出：軍隊訓練問題「看來一般的方法不行，一般方法扭轉不過來這個局面」。[61]他要求軍隊首先以師為單位，辦好教導隊，在兩年內把軍隊基層幹部輪訓完，學會平時組織訓練、戰時組織打仗。徐向前堅決支持這個主張。從當年起，人民解放軍各部隊掀起了練兵大熱潮。形式主義的「突出政治」被糾正，正常的軍事訓練時間得到恢復和保證。全軍重新建立了訓練規章制度，修改、編寫了各種條令、條例、教材。1973年，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恢復和增建四十一所軍事院校，加強對軍隊幹部的培訓。7月，解放軍在華北地區舉行了歷時十五天的首次大規模諸軍、兵種協同軍事演習。通過這一系列措施，解放軍的秩序得到了初步恢復，軍事素質得到了加強。

經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後兩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國混亂局面逐步出現轉機。

5 國家政體的部分恢復

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民主黨派」就被停止活動。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談到糾正林彪的極左影響時說，保留民主黨派比較有

59　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61。

60　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的談話（傳達記錄稿），1971年10月4日。

61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利。對個別人來說，鬥批改是要參加的；對於黨來說，比如民盟、民革還要保留。[62] 1972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央委員會在北京舉行孫中山誕辰一百零六周年紀念儀式，江蘇、上海、廣東等省市「民革」也分別舉行了紀念儀式。這是「民主黨派」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恢復活動。12月18日，停止活動達六年之久的政協全國委員會機關成立臨時領導小組，恢復了全國政協機關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組織原來的政協成員梁漱溟、黃維等人學習和參加一些統戰、紀念活動；而且各地革命委員會中仍然沒有政協和「民主黨派」的機構和組織。

與之相反，文化大革命前被譽為中共外圍組織的三大支柱「工、青、婦」（共青團、工會、婦女聯合會）的恢復活動卻是首先從地方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這三種組織分別被強加上「全民團」、「福利工會」等罪名中止了工作，代之而起的是由形形色色的群眾造反組織產生的「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革命職工代表會議」（簡稱「工代會」）。1968年學校開始上山下鄉和畢業分配後，大學裏的紅衛兵組織不再存在，中學裏新入學學生中的紅衛兵也變成按班級組成的「官辦」形式，不再是群眾自發的組合。

在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整團的問題。197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整團建團工作在全國各地逐漸展開，1972年10月，中共中央在轉發上海籌建團市委的報告時，要求着手籌備建立各省、市、自治區團委。1973年2月12日至19日，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恢復活動的第一個地方共青團組織。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人王洪文、馬天水等出席了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了共青團上海市第六屆委員會。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生氣勃勃地開展共青團工作〉的社論。由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領袖當時多數犯了錯誤，或者挨批判或者被下放勞動，社論從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立場指出，我國這

62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781。

一代青年是大有希望的。我們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正確看待青年，要看他們的本質和主流，不能只看他們的弱點、缺點。甚至任意誇大。7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先後召開共青團代表大會，恢復了共青團的領導機構和組織活動。但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仍然保留，小學仍採取紅小兵的形式，少先隊組織未予恢復。

1973年4月16日至21日，北京市工會第六次代表大會和上海市第五次工會代表大會分別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恢復活動的第一批地方工會組織。至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先後建立了工會領導機構，文化大革命前期成立的「工代會」名稱中止使用。

1973年6月27日至7月1日，天津市召開第六次婦女代表大會。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個恢復活動的地方婦聯組織。至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召開了婦女代表大會，恢復建立了各地的婦聯領導機構。

這樣，到1973年10月1日建國二十四周年國慶前夕，地方的「工、青、婦」三大群眾團體都得到了恢復。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表現出這樣的四個特點：

一、只成立了省市自治區以下的機構，沒有召開和恢復全國的共青團、工會、婦女代表大會。這和只有地方革命委員會，沒有全國革命委員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政體一樣，是個有下無上的怪胎。以後雖然建立了「工、青、婦」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推選了地方代表，但由於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和地方的爭權奪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始終未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二、造反派人物在各種組織中把持了權力。上海最甚，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上海工總司」主要負責人王秀珍、金祖敏、陳阿大、葉昌明、汪湘君等，都進入了上海市「工、青、婦」領導機構並擔任重要職務。其他如：北京的劉錫昌、張世忠，安徽的郭宏傑，吉林的許肇昌，黑龍江的陳造反，遼寧的魏秉奎，湖北的夏邦銀、朱鴻霞，江蘇的華林森，四川的江海雲，浙江的翁森鶴、方劍文，湖南的唐忠富、胡勇，浙江的華銀鳳，新疆的胡良才，河北的申茂功等，都

是地方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名噪一時，權勢傾人。造反派人物中，以工人、農民造反派為主，學生和知識分子較少。

三、選拔「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標準，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路線鬥爭正確者」開始與文化大革命前的「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標準相混合。有部分文化大革命前的英雄人物和勞動模範被吸收進來，如河北的邢燕子、侯雋（均為上山下鄉女知識青年代表），遼寧的李素文（女，模範售貨員、學習毛著標兵）、尉鳳英（女，工人工程師、學習毛著標兵），北京的李瑞環（青年工人突擊手），雲南的徐學惠（女，保護國家財產負傷英雄），山東的郝建秀（女，紡織勞動模範），湖北的王超柱（工人工程師）、夏菊花（女，著名雜技演員），山西的申紀蘭（女，農業勞動模範）、宋立英（女，大寨「鐵姑娘」），上海的楊富珍（勞動模範）。這些人除文化大革命初期參加造反的個別者外，多是點綴，不掌握實權。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物擔任重要職務，如北京的謝靜宜（毛澤東身邊機要員）。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如北京的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上海的潘國平，陝西的李世英等都不見蹤影，他們或者被定為「五一六」分子打倒，或者下放工廠農村勞動。這標誌着毛澤東心目中的「紅衛兵闖將」已經完成歷史使命，逐步淡出歷史舞台。

四、女性代表人物較多。這種傾向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色。被大肆宣傳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中，有五個主角是女的，而且是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如《沙家浜》中的阿慶嫂、《白毛女》中的喜兒、《海港》中的方海珍、《龍江頌》中的江水英、《杜鵑山》中的柯湘。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江青、葉群分別作為毛澤東、林彪夫人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批女性政治局成員。1974年，河北的呂玉蘭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女省委書記。[63] 1975年，又出現了中國

63 呂1974年任河北省委副書記，1977年任河北省委書記。但文化大革命後的黨史多不予承認，而將1985年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的萬紹芬，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位女省委書記。

第一個女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這當然和江青的女權主義思想影響有關，歸根結柢還是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極端個人化使然。如果說江青是靠文化大革命中的呼風喚雨進入中央核心的，那麼使她得到這種權力機遇，還是毛澤東的重用。因此，這種婦女地位的提高只是畸形的政治需要。

儘管這一時期恢復的國家和社會機構仍然帶有濃厚的文化大革命產物痕跡，但這些地方組織恢復活動，畢竟反映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在形式上開始逐步走回舊路。

二　懷疑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思潮崛起

中共中央發出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和林彪集團武裝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使全國人民無比震驚，他們對林彪集團表示了極大的義憤，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的各項措施。這種感情是真實的。有人後來說：「當年，我曾就林彪事件寫了一首詩：聞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畢竟漁陽鼙鼓來。……」。[64] 應該說，這種無法證實的當時為林叫好態度，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只能暗藏在心中。在毛澤東當時的崇高威望和絕對個人權威面前，即使是他自己樹起來的林彪，也不存在任何公開挑戰的可能性。

但是，「批林整風」運動一開始就是躲躲閃閃的，迴避了毛澤東為甚麼沒有能識破林彪真相的問題，也沒有分析產生林彪集團的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更沒有觸及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罪行。揭發和批判主要集中於林彪的歷史問題和九屆二中全會以來的分裂、政變活動。這樣，即使宣傳輿論在江青集團控制下，將粉碎林彪

64　胡平：〈惜乎不中秦皇帝〉，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頁 50、51。

集團的鬥爭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稱為中共歷史上「第十次大的路線鬥爭」。周恩來也解釋說：「林彪叛黨叛國，乍聽起來是壞事，但轉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穫，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二年來的偉大勝利」。[65]這些都消釋不了全國人民在「九一三」事件震驚之下產生的種種疑團。

林彪事件過後剛剛兩個多月，內蒙插隊的一位北京知識青年在筆記本上寫出了〈一九七一年學習總結〉，記錄了當時自己心靈深處的震撼：「林彪叛黨叛國事件，激起了人們的憤恨，同時把人們推入一個疑惑的深淵。雖然為人們預備了許多現成和完美的理解方法和結論，但是，不，人們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了。」「一定要世襲一般地事先選定接班人嗎？」「真是不堪設想人們在這幾年貧乏的文化和思想空氣中是怎樣生活的，人們的呼吸幾乎都要窒息了。」「許多報紙、雜誌上的理論文章，八股味十足，不分析矛盾，不講道理，對一切問題以扣上一頂大帽子完事。」文章最後提出當前的任務說：「林彪反黨集團的出現，驚雷般地震醒了人們，人們又朝着思想的解放前進了一步，舊的武器不能解決新的矛盾，新的武器就要出現了。」

他把這種思想大膽地通過書信，與分散在內蒙、陝西和北京的幾個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中學同班同學進行交流，同時閱讀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試圖「用自己的腦子」進行探討。他們的討論得到了更多的外圍者的關注。1972年11月，由於信件被當地農村管理插隊知識青年的公安機關幹部發現上報，作為「理論通訊事件」，參與和關注的知識青年都遭到了批判，有的還被開除了工農兵大學生的學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分別獲得平反。[66]

當時，人們「用自己的腦子」爆炸性思考的問題，最直接的起源於三個方面：

---

65 周恩來在在京上層愛國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1971年12月29日。

66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北京大學博士論文，未刊稿，2005，頁112－114。

——為甚麼林彪這個以「大樹特樹」毛主席形象為主要功績的「毛主席最好學生和戰友」，被定為副統帥寫進黨章，竟然在一夜之間就成為不擇手段謀殺毛主席的罪魁禍首？林彪集團產生的基礎和根源是甚麼？

——為甚麼被譽為「高瞻遠矚、洞察一切」的毛主席，竟然在打倒劉少奇後又選上了一個「更壞」的接班人？毛主席還有沒有更嚴重的錯誤？

——為甚麼這場以「反修防修」、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竟然造成了「修正主義」和「反革命野心家」越反越多，幾乎每年都出現政局大地震的動盪？文化大革命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甚麼關係？

以林彪事件為轉折點，1970年代前期，中國社會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抵制進入了一個突變階段。

文化大革命初期，雖然也有一些人以各種方式進行了抵制活動，但多是由於自身利益受到損害而針對個人，並沒有觸及到這場災難性錯誤的整體和本質，如參加了「破四舊」的「聯動」成員轉而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打擊老幹部。隨着文化大革命動亂的繼續，人民群眾開始普遍感受到了這場災難的危害，在社會中積蓄的懷疑和抵制情緒愈來愈多，以林彪叛逃事件為導火索，開始爆發。幾年中，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有較深思想水平的傳單、大字報、上書、書信通訊，矛頭指向，不僅限於林彪集團，也指向尚未被揭露的江青集團，甚至指向毛澤東，呼籲為一大批被打倒的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平反。這些行動的代表人物，有知識分子、幹部、工人、軍人，甚至包括文化水平很低的農民。

這裏只列舉一些有典型意義的代表。

屠德雍是解放軍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電工教研室副主任、中共黨支部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2年曾被評為全國通訊兵系統先進分子集體代表。就在這時候，他內心世界卻是對極左路線給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極為擔憂，憤然寫出了〈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狀〉文章，1973年3月23日通過郵局開始向南京、北京、黑龍江、

廣西、河北等地投寄。文章寫道：「文化大革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眾受到各種精神上的打擊，政治上的迫害，以至肉體上的摧殘，極大打擊了幹部和群眾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對黨的忠誠」，「文化大革命使林、康、江、陳、張等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把黨和國家引向災難的深淵」，「文化大革命使工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破壞，生產停頓，財政枯竭，國庫空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文化大革命使科學、文化、教育、藝術遭到空前的災劫」，「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一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造成世界人民思想混亂」……此後到1974年4月，他堅持多次投寄這一文章，呼籲：「一小撮叛徒、內奸、工賊林、江、康、姚及其同夥必須交人民揭露、批判、審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治迫害予以解除」。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震動。1975年11月3日屠被捕，遭受殘酷批鬥，在獄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一度被考慮判處死刑，1976年5月23日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11月中共成都市委、四川省人民法院先後宣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恢復黨籍。

段正寶是河北省棗強縣卷子公社張屯大隊青年農民，曾在衡水地區電力公司做合同工。他一直認為「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確的，對打倒劉少奇極為不理解，1973年春到北京中央接待站上訪未果，於1973年4月1日寫出紀念劉少奇的文章，次日通過郵局寄給毛澤東、周恩來。文章共分五個部分：「一、是中國的『議會迷』嗎？」「二、是工賊還是工運領袖？」「三、是叛徒還是老革命？」「四、是走資派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領袖？」「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人』歷史作用」。文章深情地寫道：劉少奇「這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工人運動領袖，就在這幾年中突然地『爛掉』，這是真的嗎？」「我一個無知的青年，決定寫篇文章紀念紀念他。」他的文章落到了公安部門手中，4月26日他被逮捕。在審訊中他仍然堅持說：「我認為劉少奇是工人運動領袖，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是老革命。」1974年1月8日，他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0年4月，中共棗強縣委宣布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67]

白智清是重慶鋼廠的技術員，從1974年4月到1975年3月，他先後以「心赤客」的筆名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寫道：「總理啊！總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列強的瓜分，民族的屈辱又會重新出現，在中華民族的面前，您難道願做一個民族的罪人麼？難道您真的相信在帝國主義的實力面前，『思想』會比鴉片戰爭時期的『天朝聖威』有用麼？」在給李德生的信中他呼籲：「當前鬥爭發展到此時此刻，我想你是非常明白的了，是要周總理，還是要王洪文、江皇后……」在給江青的信中他痛斥：「你的屁瘋又發了，又把大好河山整成這個樣子。……人民，全中國人民和海外華僑將活活處死你這個民族的罪人。」在給葉劍英的信中他懇求：「為了拯救國家，拯救民族，因勢利導，擔負起這個沉重又偉大的擔子吧，……對林彪系統的將士，只能安撫，不能壓服，……我想他們其中絕大部分多數人都是恨這群狗和愛國的，還是聽你們的話的。」在給鄧小平的信中他指出：「國家落到這步田地，難道不是『賞罰不明，忠臣死於非命，邪臣起於非功』麼？難道不是不納忠言，忠臣不敢進諫，而邪臣專其政麼？……我們深信，您能拯救中國，救民族，也救自己。」1976年6月，白智清遭到公安部的通緝在廣漢被捕，反覆被批鬥，考慮判處死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為他平反、恢復名譽。[68]

在長征和陝北曾擔任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的張聞天，1959年廬山會議後被罷官，下放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資料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又被流放到廣東肇慶。林彪事件後不久，他仍在監管中，開始撰寫一組後來稱為「肇慶文稿」的理論文章，尖銳地

67　屠、段事跡均見《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下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內部發行，頁170。

68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205－216。

抨擊、批判極左路線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闡述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問題的看法。文稿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產力論」的做法寫道：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首先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荒唐到把為人民群眾物質利益而鬥爭的原則，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咒罵，那就是不可容許的糊塗和欺騙！」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的做法他寫道：把人民內部矛盾誇大為敵我矛盾，「給黨造成極大的危害」。把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誣陷為「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那更是顛倒是非，混淆敵我，是對黨的嚴重破壞」。[69]

1972年10月，民主人士周世釗、胡愈之、楊東莼、楚圖南、薩空了等人懷着為民請命的深情，經過反覆討論，利用各種渠道，向毛澤東晉言，表達他們通過林彪事件及文化大革命動亂總結出的建議：要嚴懲林彪反革命集團，要發揚民主，廣開言路，落實幹部政策，解放知識分子，糾正「上山下鄉」的嚴重後果，恢復尖端科學研究和理工科、文科大學，開放書禁，受理群眾申訴並健全法制等等。

這些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憑着耳聞目睹的事實，從憂國憂民的滿腔熱忱出發，以各種形式表達了要求結束這場災難的真誠願望。在文化大革命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情況下，他們必然遭到各種迫害，不少人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張志新，是他們中的最傑出人物。

張志新是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幹事，女，1930年生，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報名參加志願軍，先後入河北師範學院、解放軍軍事幹部學校、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盤錦幹校勞動。張志新有很強的政治熱情，極為關心祖國的命運，目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決心挺身而出，揭露極左路線的錯誤。1969年8月，她在個人崇拜極其嚴重、文化大革命鎮壓殘酷的時候，在黨組織召開的會議及後來的交代中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尖銳地批評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錯誤：

---

69 張培森編：《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590－599。

毛主席在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豐功偉績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中，毛主席也有錯誤。集中表現於大躍進以來，不能遵照客觀規律，在一些問題上超越了客觀條件和可能，只強調了不斷革命論，而忽視了革命發展階段論，使得革命和建設出現了問題、缺點和錯誤。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難時期的一些問題上，也就是三面紅旗的問題上。

把觀點明確一些講，就是認為毛主席在這個歷史階段犯了左傾性質的路線錯誤。

毛主席在大躍進以來，熱多了，科學態度相對地弱了；謙虛少了，民主作風弱了；加上外在的左傾錯誤者的嚴重促進作用。具體地說，我認為林副主席是這段歷史時期中促進毛主席左傾路線發展的主要成員，是影響左傾錯誤不能及時糾正的主要阻力。導致的結果從國內看，是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受到挫折和損失。這種局面確實令人擔憂和不安。

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鬥爭是建國後，1958年以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的繼續和發展。並由黨內擴大到黨外，波及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多個環節。這次路線鬥爭，錯誤路線一方伴隨了罕見的宗派主義和資產階級家族式的人身攻擊，借助群眾運動形式，群眾專政的方法，以決戰的壯志，實行了規模空前的殘酷鬥爭，無情的打擊。因此，在它一直佔有了壓倒優勢的情況下，造成的惡果是嚴重的。因為它破壞了黨的團結，國家的統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削弱了黨的領導；影響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的正常進行。

張志新還說了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搞「三忠於」，到處跳「忠字舞」的看法：

過去封建社會講忠，現在搞這個幹甚麼！搞這玩意幹甚麼！再過幾十年的人看我們現在和黨的領袖的關係，就像我們現在看從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樣不可理解。

無論誰都不能例外，不能把個人凌駕於黨之上。
對誰也不能搞個人崇拜。[70]

這些語言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大逆不道。她立即被逮捕關押，遭到殘酷批鬥和迫害。丈夫、兒女和她劃清界限，脫離關係。她仍然在獄中堅持鬥爭。1970年5月14日。盤錦地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判處張志新死刑，立即執行。案件呈送到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會把張志新案給一處副處長高振忠審。高私下說：毛主席指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張志新是動口不動手的，不搞破壞的。在組織會議上，黨員在黨的會議上發表自己的看法，構成犯罪嗎？軍管會認為高振忠執行不力，換上的周某某感到壓力很大，決心這次不能再右傾了，考慮判兩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他在謄抄審判意見稿時，又加重為十五年，自以為無法再重了。誰知審判意見稿送到軍代表那裏，被連寫了六個「惡毒攻擊」，結論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最後，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發話：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為好。於是改判無期徒刑。

1973年11月16日，在一次批林批孔大會上，精神已失常的張志新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因此被認定「仍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5年2月26日，中共遼寧省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審批張志新案件。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毛遠新、黃歐東、魏秉奎、蘇羽等十七人。會上，蔡文林作了〈關於現行反革命犯張志新的案情報告〉。毛遠新最後說：「在服刑期間，這麼囂張，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蘇羽、魏秉奎表態：「乾脆。」3月6日，監獄有人提出張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問題。3月19日，上級批示：「她的假像，本質不變，仍按省委批示執行。」1975年4月4日，張志新在瀋陽被

70 陳少京：〈張志新冤案還有新的秘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

慘無人道地割斷喉管，槍決殺害。屍體被作病理解剖實驗用，至今不知下落。

張志新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她的一切言論行動，都是維護中國共產黨利益的。她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在總體肯定的前提下。她在慘遭厄運時仍然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祖國萬歲！毛主席萬歲！」因此，她的死，就更具有悲劇性。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9年3月31日，中共遼寧省委宣布為她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8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長篇報導〈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張志新烈士獄中鬥爭紀實〉，立即轟動和震驚全國。但由於當時社會環境的關係，張志新冤案的真相並沒有全部公開，人們只知道她是反對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集團迫害而死的。她更突出的思想和勇氣，直到逝世二十五年後才被披露報端。

以上所列舉的例子，具有一個共同的「殉道」特徵，就是站在文化大革命前黨的立場和思維上反對文化大革命，矛頭所向，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種背離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他們寄予的希望，是毛澤東能夠自己糾正錯誤恢復「明君」的形象，或者周恩來等賢臣能夠「清君側」。

與張志新相比，思想上更觸及離經叛道底線的是「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李一哲」是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位青年的筆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經作為造反派頭目積極參加廣州運動，但在彷徨痛苦中逐漸覺醒和反叛，從極左走向極右。儘管從字面上看，「李一哲」的大字報主要是抨擊林彪集團，沒有批評、反而歌頌毛澤東，甚至江青、王洪文，但是它卻涉及到了當時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根本性的弊病——缺乏民主機制。

紅衛兵和造反派的一代人，受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無時無刻不在的思想教化，把他們的思考羈縻在正統意識形態的軌道上。儘管有少數人對考試、學制等表現了不同程度的不滿，仍然只是思想的火花。一方面，父輩拋頭顱灑熱血、創下豐功偉績的革命教育在激盪著他們的心扉。另一方面，現實又無奈地向他們反覆說教，要

甘當雷鋒式的鑼絲釘，當農民、售貨員並不低人一等……。多數人幻想的是，再給他們一個過雪山草地的創造史詩的機會，去實現自我價值，哪怕是在白色恐怖中獻出生命。究竟這種價值應當換來的是甚麼，卻很朦朧。

文化大革命給了他們一個「懷疑一切」的巨大能量釋放機遇，他們不再有父母的管束和組織的教誨，突然擺脫了常規的、慣性的軌道，衝殺於狂熱的「破四舊」、揪走資派和遊行吶喊之中。通過大串聯、批判會、武鬥、上山下鄉……，置身於尖銳的社會矛盾漩渦。然而，當他們被離棄到上山下鄉的村落裏，塵埃尚未完全落定，他們突然覺得，面對着破碎、痛苦、醜陋的社會現實，他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信奉的主義，他們在理想中構建起的神廟，是那麼耐不住思想的衝擊，尤其是經不起現實的驗證。

王希哲在回憶這一思想轉折時講到有三件事對他思想上震盪極大：一是林彪一夥在「左」的旗幟下鎮壓廣東群眾；二是廣東發生風起雲湧的「復退軍人要求恢復附加工資運動」使他感到文化大革命極左的經濟政策及極左派鼓吹的共產主義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三是在社會實踐中，親眼目睹廣東大規模的農民、知青逃亡港澳潮流。他們不僅對文化大革命，而且對整個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都進行了重新審視，他開始「朦朧地感覺到：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充分給個人以發展天地的經濟制度，現代資本主義對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擋的」。因此，「李一哲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喊出「民主與法制」的口號，就是必然的了。

「李一哲」從1973年9月13日至1974年11月7日三稿寫出了這篇大字報，於11月10日起在廣州市街頭貼出。這篇大字報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形式，矛頭直指建國以來極左運動踐踏民主和法制的種種弊病。針對林彪集團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罪行根源，大字報指出：林彪集團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實質是極左。大字報還未點名地指出了當權者的許多罪行，並且聯繫這些現象，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的存在的嚴重問題。文章寫道：

這種體系——即使我們也可承認我們具有某種體系的話，也決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外的東西，我們只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系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清理罷了。實際上我們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成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觸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須要打倒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群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

文章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名猛烈地抨擊當時的封建專制，這在當時為數不多的反主流上書、傳單和大字報中並不罕見。但獨特的是，文章還同時不遺餘力地謳歌了文化大革命和「大民主」，提出了以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反封建的看似荒謬命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形式上說，實際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武器。

上了憲法的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都在這場大革命中真正實行起來，並得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支持，這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沒有過的，生氣勃勃的，這是革命的成功。

但是，這場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為它並沒有使人民群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

> 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為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71]的人們又能到哪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但是，林彪體系壓迫着他們，「忠」字化的森嚴禮儀在束縛着他們，鐐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72]

文章所說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只是下層群眾對領導幹部特權和專制的造反活動，而把中央領導層面的個人崇拜、專斷集權、殘酷打擊異己等界定為「林彪體系」，這使文章充滿了自相矛盾，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實際。但是，它深刻地提出和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乃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嚴重壓制人民民主的制度問題，肯定了以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反對專制的價值。從這一點看，無論文章提出的結論或解決辦法是多麼的荒誕，也無論作者後來是否改變自己的觀點，它確實是一分為二對待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是二十世紀90年代盛行的「新左派」和「兩個文化大革命說」[73]理論的鼻祖。

大字報貼出以後，在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爭論。中共廣東省委把這篇大字報定成「反動大字報」，宣布「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2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群眾大會，宣布為「李一哲」案件平反。1979年2月14日，《人民日報》報導了為「李一哲」錯案平反及其群眾大會的消息。「李一哲」大字報

---

71 指毛澤東提倡的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72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引自《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頁229－266。

73 199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三十周年之際，海外一些人提出了「兩個文化大革命說」，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把『文化大革命』分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兩種，認為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後者則是人民大眾反抗共產黨『暴政』的『人民起義』。」見金春明：〈「兩個文化大革命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2期。

的出現，標誌着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一代人，正在走向它的反面，成為文化大革命甚至整個文化大革命前極左制度的掘墓人。

在動亂中，除了挺身而出、以血相諫的抗爭者外，也值得尊敬的，是身處逆境繼續默默埋首祖國經濟建設事業的更多人。從開國元勳到普通群眾，處處都可見到這種感人肺腑的事例。彭德懷元帥在身陷囹圄、屢遭批鬥、被打斷兩根肋骨的情況下，仍然惦念着國家的建設。1967年4月20日，他從4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國際市場鎂供不應求的銷售情況，在關押中提筆給周恩來寫信，建議對自己去年4月視察三線地區看到的安順場石棉礦渣進行利用：「此種礦渣中含大量的鈣鎂，其次是磷，還有其他礦物質。加工後即成鈣鎂磷肥，用於農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小事情本不應打擾您，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74]歸國華僑、著名飛機設計專家陸孝彭被誣衊為「反革命」、「外國特務」，遭到多次審訊和批鬥。造反分子竟撅着他的雙臂說：「這就是你的噴氣式！」此時此刻，陸孝彭想到的仍是葉劍英元帥交給他的試製「強5」噴氣式飛機工作仍未完成。他在勒令寫交代「罪行」的紙上，繼續論證着「強5」的技術遺留問題和今後的提高發展方向。[75]水稻專家袁隆平被扣上「搞資產階級盆盆缽缽」、「走白專道路」等帽子，毛澤東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他卻說還要加一個字——「時」。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他精心培育的試驗秧苗被人扯掉丟在井裏，試驗室的稻種幾次被人搗毀，仍然冒着危險在陰溝中秘密地進行着籼型水稻雜交的育種工作。[76]國防工業某廠的一位技術幹部因不同意打倒劉少奇、鄧小平，被投入獄中八年。他在監督勞動中搞成了多項技術發明，還主動為犯人上技術課，並把自己節省來的錢寄給災區。

74　〈彭大將軍的最後歲月〉，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一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頁114。

75　趙藍田、楊平：《一代精英——陸孝彭與強擊機》（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76　聶冷、莊志霞：《綠色王國的億萬富翁：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傳》（北京：華藝出版社，2000）。

林彪事件無情地擊破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神話，成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社會上的追隨文化大革命政治熱情一落千丈，1966年夏季那種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一人振臂高呼，即有百萬群眾排山倒海響應的現象再也不可尋覓了。許多人開始在內心苦苦思考和自問，逐漸形成了1976年天安門廣場群眾性「四五」抗爭運動的思想前奏。

三　糾「左」還是批「右」的衝突

1 錯綜複雜的權力結構

周恩來接替林彪成為第二號人物後，採取了一系列集中權力的措施。他領導的恢復舊秩序、批判極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文化大革命派的驚恐不安。他們擔心發展下去將不可避免地觸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組織基礎，因而極力阻撓周恩來的各項部署實行。兩軍的對壘終於走向交鋒。三個主戰場分別是教育、外交和輿論宣傳領域，這是「九一三」事件前後的國家權力結構造成的。

中共九大以後的黨和國家主要事務，分為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四個方面。毛澤東通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集團部署意識形態即政治戰略，通過林彪的中央軍委辦事組部署軍事戰略，通過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部署外交戰略。而對經濟工作，毛澤東並沒有特別的興趣，江青集團也不願揹上這個費力不討好的包袱。倒是林彪集團藉口加強戰備，曾把一些與國防有關的重要經濟部門劃為中央軍委辦事組領導，但林彪事件後很快就恢復到國務院建制來。因此，經濟部門始終在周恩來的國務院控制之下，他的主要運作班子是國務院業務組。

文化大革命前期，全國人大停止活動，國家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外的所有事務幾乎都由國務院處理，而國務院各部委實際上也癱瘓，日常事務都集中到這個國務院業務組的臨時性機構裏，帶有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性質。1967年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業務組會議，成員有

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聶榮臻、粟裕、余秋里等。到1969年3月，增加紀登奎、李德生進國務院業務組。1971年9月30日又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77] 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後，到1974年10月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在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直到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之後，國務院業務組才結束歷史使命。

國務院業務組下屬的國家各部委，正式恢復是在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國務院〈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國務院各部委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九十個精簡為二十七個。人員編制僅佔原來的百分之十八。其中設立革命委員會的經濟部、委是：國家計委、經委、國務院工交辦、國家物委、物資部、地質部、勞動部、統計局、中央安置辦公室合成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國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合成國家基本建設革命委員會；一機部、八機部合成一機部；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合成燃料化工部；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的郵政部分合成交通部；紡織部、一輕部、二輕部合成輕工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合成財政部；商業部、糧食部、供銷合作總社、中央工商局合成商業部；外貿部、國際貿易促進會合成外貿部；農業部、林業部、農墾部、水產部、國務院農林辦、中央農林政治部合成農林部。

這時候，除了取消法院和檢察制度，沒有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之外，文化、教育、科技等部委也沒有恢復，而是另外規定設立國務院文化組、科教組，不設革命委員會。文化組、科教組雖然名義上在國務院直轄下，思想政治領導卻屬於中央政治局，分工歸中央「文革」管。由於毛澤東經常通過江青集團直接指示意識形態工作，其逐漸成為江青集團直接控制的一個部門。以文化組為例：

1970年3月10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設立國務院文化組問題。會議商定：一、在國務院之下設立一文化組，管理有關文藝、電影、出版、圖書、博物等方面的工作。二、文化組的思想政治領導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歸中央文革小組；文化組的行

7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99、486。

政領導屬國務院，黨中央對該組的指示和決定，由國務院組織實施。三、文化組設組長、副組長和組員若干人。四、文化組設一小的工作機構。次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聯名向毛澤東、林彪報告此事。毛澤東批：同意。[78]

1971年7月國務院文化組正式成立。組長吳德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副組長劉賢權原是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因堅決支持造反派而調到中央軍委辦事組。此外，成員有石少華、于會泳、浩亮、劉慶棠、王曼恬、吳印咸、狄福才、黃厚民。後于會泳任副組長。石少華、吳印咸是駐中南海的老幹部資格新華社攝影記者；于會泳是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樣板戲團的作曲家，浩亮是樣板戲京劇《紅燈記》主角李玉和的扮演者，劉慶棠是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主角洪長青的扮演者，都是靠江青的樣板戲起家的造反派新貴；王曼恬是毛澤東表兄王季範的女兒，在天津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狄福才是中南海警衛團即8341部隊的幹部，曾指揮「楊余傅」事件中逮捕楊成武的行動，後到北京電影製片廠負責支左工作。

這種錯綜複雜的領導結構和不同政治出身的人員組成，往往使周恩來在領導文化組工作中陷於被動，甚至「犯錯誤」。

吳德的回憶生動地說明了當時文化組內部的尖銳衝突：

> 中央指定我做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我感到很難辦。萬里同志為我出主意說，要有一個能和毛主席見得上面、說得上話的人進文化組才好。我說到哪裏找這樣的人呢？萬里說可以把王曼恬調到文化組來。……後來，王曼恬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組兼職的事情報告了，毛主席同意。這樣，王曼恬每星期來一兩次。
>
> 文化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狄福才是8341部隊在北影廠支左的，他是個老粗，不懂文化、藝術、電影。可能是在北影廠或科影廠開的一次會議上（這次會議我沒

7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53。

有參加），劉慶棠他們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辦」的意思。狄福才也發了言，他強調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這下闖了禍，得罪了江青。不久，江青、王洪文發動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貼揪狄福才的大字報。……然後，開了一次大會，有幾千人參加，這時，局勢就控制不住了。

以後，文化組是一個人一個人地被整，先是石少華，然後是黃厚民。石少華因為《紅嫂》一劇出了問題，江青說他不可靠，讓他寫檢查。……他後來回新華社了。當時，戲曲方面辦了一個學校，把那時不被喜歡的京劇演員都集中在這個學校裏，……這個學校由吳印咸負責，好像只辦了一年就停辦了，吳印咸也就勢退出文化組。

1973年，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9月12日舉行歡迎蓬皮杜總統的文藝晚會，由中央芭蕾舞團演出《紅色娘子軍》。……外賓退場後，江青讓我留下來。她說〈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歌是誰譜唱的，問我聽了這首歌後發現有甚麼問題沒有？這個歌是反革命分子李劼夫譜的曲，為甚麼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來歡迎外賓？……劉慶棠真會做戲，當場大哭起來，說他不在場，是外交部提出來由周總理點頭的。……我向周總理匯報了這個情況，周總理只說了「這沒有甚麼了不起」一句話。這時，我知道江青的矛頭是對着周總理的。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會議上，江青又提出了這個問題。周總理淡淡地解釋了一下，沒多說。江青繼續說個沒完，好像非要追究到底不可。[79]

國務院科教組同樣是矛盾重重，最後被江青集團控制。1970年6月國務院決定設立科教組，負責原國家科委和教育部的工作。李四光任組長，劉西堯、遲群任副組長。1971年李四光逝世後，劉西堯繼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劉西堯原是周恩來的秘書，主要分管科技工

79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93－100。

作，1975年四屆人大後調往中國科學院。遲群原為8341部隊（中南海警衛團）宣傳科副科長，1969年3月24日受毛澤東派遣隨楊德中率8341部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控制局面，兼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及北京大學黨委常委。1973年8月，國務院科教組的科技組人員撤回中國科學院，以科學技術辦公室的名義繼續負責民用方面的全國科技工作的管理。科教組的大權就由通過遲群操縱教育口的江青集團獨掌。

輿論宣傳領域，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由中央文革小組控制，主要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1970年中央組織宣傳組成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繼續以這個名義控制着輿論宣傳。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輿論宣傳也由他主管。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將住院治療，中央政治局經毛澤東批准決定：組織宣傳工作由江青、張春橋批辦或上報。宣傳工作的權柄又倒向了江青集團。

外交部門一直是毛澤東感興趣的領域，重大決策全部由他決定。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翻譯唐聞生、章含之等後「文革」利益集團崛起，成為毛澤東在分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之外的另一隻手。

這種錯綜複雜的權力結構，注定了周恩來領導的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必然要與江青集團在上述領域發生嚴重的衝突。

2 周恩來的糾「左」努力受挫

在教育領域，1972年7月14日，周恩來根據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的建議，指示北京大學負責人、物理學家周培源說：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有甚麼障礙就要掃除，有甚麼釘子就要拔掉。周培源即於7月20日致函周恩來，分析了我國基礎科學現在這樣落後的一些原因，認為「要使我國基礎科學趕上去，關鍵在於領導」，建議「是否可以讓中國科學院統一領導全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綜合性大學的理論研究工作」。周恩來於7月23日將周培源的信等批轉給國務院科教組和科學院的負責人遲群

等，嚴肅指出：「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80]

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根據周恩來指示精神撰寫的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從理科的內容、理與工的關係，理科的培養目標，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三個方面，對「教育革命」中「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辦工廠來代替實驗課教學」、「按產品劃分、設置專業」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極左派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見。指出「理與工、應用與理論都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偏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還草擬了一個教學和科研中加強基礎理論的初步意見。周恩來於11月8日批示，要求按兩個大學的特點改寫一下，通過教職員和新老學生認真討論後上報。

這篇文章本來是應《人民日報》之約而寫的，但是張春橋、姚文元藉組織座談會徵求意見為名，進行阻撓；最後以「可能引起爭論」為由，不准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本來就是供討論用的文章。《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後，張春橋、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在他們的指使下，上海的幫派分子通過《文匯報》連續發表〈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馬克思主義是最基礎的理論〉、〈打甚麼理論基礎〉等文章，對周文進行圍攻。張春橋還赤裸裸地指示：「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把矛頭指向支持周培源的周恩來。

在外交領域，8月1日至2日，周恩來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部門負責人講話指出：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如果在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81] 11月28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中聯部、外交部提出〈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認為「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

80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81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832。

左思潮在一些單位和地方還沒有得到徹底批判和肅清」，擬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以批林整風為綱，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11月30日，周恩來批示：「擬同意。」將報告送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12月1日，張春橋閱後對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提出異議，批道：「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12月2日，江青也閱批：「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判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判林彪叛徒的同時應着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82]周恩來批示將此件送中聯部、外交部有關領導傳閱，並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由此，圍繞當前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和江青集團的一場鬥爭已經不可避免。

鬥爭的焦點，集中表現在主導全國走向的中央輿論宣傳領域，也就是當時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7月至8月，周恩來多次批評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說：「有些東西又臭又長，林彪就搞這一套。你們批林整風就從文風開始。」他尖銳地指出：人民日報社、新華社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就是形左實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義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極左的不批透，還會犯錯誤。運動就是要落實到政策上，政治掛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83]張春橋、姚文元立即在8月8日召見《人民日報》負責人，針對周恩來批評說：「在批林時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批判「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都是「過頭」的例子。同時，他們還不顧多數幹部的強烈反對，極力維護他們在《人民日報》的親信魯瑛的領導地位，藉此控制《人民日報》。魯原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總編室主任，1966年5月陳伯達對《人民日報》奪權時帶到《人民日報》社，當時

82 周恩來、張春橋、江青對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的批示，1972年11月30日，12月1日、4日。

83 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華社大事記》，未刊稿，1989。

是主要負責人，因為文化水平不高，常出現把「墨西哥」、「釣魚台」、「赤裸裸」唸成「黑西哥」、「鉤魚台」、「赤果果」的笑話，被譏諷為「白字總編」。9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國慶社論，寫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姚文元審稿時刪去了這句話。

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龍岩」的文章〈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同時配發了一篇關於介紹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小冊子的文章，及另一篇學習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章，組成一個版面。「龍岩」的文章是中共黑龍江省委根據李先念、余秋里、華國鋒接見東北三大工廠負責人時的指示「無政府主義不反不行」而撰寫，由《人民日報》部門負責人王若水等趁報社負責人魯瑛不在安排發表的。文章指出：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紀律，鼓吹『群眾說了算』，鼓吹『規章制度無用論』，叫嚷要『砸爛一切』」，就是「徹底破壞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瓦解社會主義生產，從根本上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文章還尖銳地指出：「無政府主義的表現是在下面，根子卻在上面。」並且揭露林彪集團「一面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一面又拉山頭，結死黨，挖空心思地『大樹特樹』他們一小撮的『絕對權威』」，「對幹部和群眾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統治」。顯然，文章的矛頭是針對文化大革命派的。

文章發表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極為不滿。他們立即授意《文匯報》以組織工人座談會為名討論「龍岩」的文章。姚文元說：「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的抬頭」，「不能說甚麼都是無政府主義，不要批到群眾頭上，不要混淆兩類矛盾」。[84]江青說，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11月4日，《文匯報》內部刊物《文匯情況》刊出座談會紀要，猛烈攻擊「龍岩」的文章。張春橋說：「上

84　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的談話，1972年11月14日。

海工人對這篇文章意見大啦。」11月24日，《文匯情況》又列舉「龍岩」文章發表後各地一些報刊相繼發表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提法，作為反面觀點批判。[85]

12月4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了《人民日報》內部關於批極左還是極右的鬥爭，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問題。信中說：

>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過了頭，還是沒有批透？我覺得總理的指示是正確的。對春橋、文元同志的講話，我有些想不通。……由於這兩個講話精神不一致，在報社編輯部已經造成了思想混亂。……我認為批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匯報的觀點是不是有甚麼來頭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匯報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反過來說，如果是中央精神，為甚麼人民日報不知道？我不相信文匯報的觀點是來自主席。[86]

王若水的信以極大的勇氣把周恩來和張、姚的矛盾公開化，逼迫毛澤東攤牌。究竟林彪、江青等文化大革命派的實質是極左還是極右？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如何表述的形式問題，並沒有理論意義。就其手段來說毫無疑問是極左，但就其後果來說，動搖和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和國家政權根基，也被稱為與「資產階級」同一性質的極右。關鍵在於——批極左將把矛頭對準「文革」派。毛澤東正是這樣認識的。林彪事件之後，他首先考慮的是，不能因批判林彪的極左而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整體方針。因此12月6日，他約見江青，要他把信轉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時，已經表態說：林彪歷史上一貫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12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召見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在談話中更明確地作出了結論：

---

85 〈圍繞批判極左思潮的一場激烈鬥爭〉，《人民日報》，1978年3月23日。

86 〈王若水上毛澤東書〉，引自《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頁178－180。

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87]

12月19日，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負責人開會，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周恩來在講話中承擔了《人民日報》發表批極左思潮文章的責任，並且批評王若水是分裂中央。江青在講話中說，王若水這封信客觀上對中央起着挑撥離間作用，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了。至於他某一個時間、某些事情上，利用極左思潮，實質上也是極右。張春橋在講話中說，怎麼能說千千萬萬工農群眾是無政府主義？怎麼能說他們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這是極右的思想。毛澤東關於批極右的意見傳達到全黨、全國後，形勢發生了逆轉。對林彪的批判，除外事工作外，只准批極右，不准再批極左。1973年3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更直接地批駁認為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觀點說：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88]這種蒼白無力的辯駁，仍然能左右當時的局面。

3 「反右傾回潮」運動

利用毛澤東關於批「右」不批「左」的這個決策，1973年，江青等「文革」派針對周恩來的糾「左」部署，不斷製造出各種光怪陸離的事件，在教育、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反右傾回潮」的運動。

87　王若水：〈毛澤東關於批林是批極左還是極右的談話〉，引自《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頁184。

88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毛澤東講話的記錄，1973年5月26日。

「文革」派在《人民日報》進行了「批邪」運動。江青指示，要追查是誰趁魯瑛不在時安排了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和版面，要追查後台。她說：「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個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張春橋殺氣騰騰地說：「《人民日報》裏的壞蛋，利用在報社工作方便，搞了一個版批無政府主義」，《人民日報》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氣。」《人民日報》廣大幹部批判極左的強烈要求被壓制下去。

「文革」派在教育領域組織起一場「反擊右傾回潮」的運動，先鋒是遲群和謝靜宜。謝靜宜原為毛澤東的女機要員，與遲群同時到北大、清華兩校，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兩人是天子近臣，能時時得到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因此影響遠遠超出兩校。在他們的控制下，1973年5月，國務院科教組提出報告，指摘教育、科技領域群眾要求批極左的看法是「思想混亂」和「攻擊文化大革命」。提出要繼續批判林彪的極右，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改造。7月，遲群對北京大學說：「北大要研究批林整風如何深入、思想教育如何搞的問題。要注意抓典型。像北大這地方，不抓幾個典型鬥一鬥是不行的。」8月3日，遲群又提出：要注意抓意識形態的鬥爭，抓右派。北大、清華這樣的大學，隔幾年就要搞一次抓右派。我們要提醒有些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能就是發動群眾反右派。9月，國務院科教組召開教育戰線批判孔子問題座談會，遲群提出：要把批孔作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風的一項大事來抓。又說：「哪些地方不重視批孔，哪些地方就屬於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對遲群的言論，周恩來進行了批評。10月15日，遲群在國務院科教組本月中下旬召開的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上講話，繼續指摘教育界出現的「復辟、回潮」現象，並對其在9月召開的批孔座談會上的言論進行辯解。遲群說：「科教組開的那個批孔會是正確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科教組沒有降調，誰降調誰負責。」又說：「反對批孔，就是復辟。」當晚，周恩來約遲群、謝靜宜等談話，但兩人置若罔聞。[89]

---

8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28。

11月5日，北京大學召開動員大會，在全校開始了「反右傾回潮」的「上揪下掃」運動。校報《新北大》社論提出：「那些認為教育革命影響了業務，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搞左了的，實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夢想回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是一種右傾回潮的思想表現。」11月20日清華大學校報《清華戰報》評論文章提出，「反擊右傾回潮運動」的要求，就是要「整人」，要「繼續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大批幹部和教師被扣上「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帽子受到迫害，周培源等人制訂的加強基礎理論規劃遭到批判。僅到11月底，北大校運動辦公室就提出157個被整對象。如數力系全系教職員123人，一個月中就揪出12人，還揭出了一個「31樓暗室反動集團」（實際是橋牌俱樂部）。[90]

同時，張春橋也在上海發難，組織《文匯報》、《解放日報》，藉上海師範大學一個學員的談話記錄，掀起批判「智育第一」的三個月大討論。

1973年12月至1974年1月，國務院科教組在北京召開小學教育革命座談會，根據各地中小學教育革命的情況，提出要「向着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開展新的進攻」，「要打退資產階級右傾勢力的猖狂進攻」。「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主要危險」，要「學習小將敢衝敢闖，英勇善戰的精神，經常運用『四大』武器，揭露矛盾」，「抓典型」。還群還在會上提出「要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隊伍向頑固派反擊」。反擊「右傾回潮」運動開始擴大到全國中小學校。

文化大革命派利用遼寧省的一份文化考試答卷，製造了所謂「白卷」事件。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題為〈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文章是《遼寧日報》7月19日發表的。起因是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在參加大學招生考試中，考物理時交了白卷，卷子背後寫了一封信說：

90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738－746。

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18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學習。我的時間只在27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的翻讀了一遍教學教材，對幾何題和今天此卷的理化題眼瞪着，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幾個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

在這時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甚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的並非可恥，可以勉強的應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

1973年6月，遼寧省文教組開會研究大學招生問題，遼寧省委負責人毛遠新聽到錦州匯報張鐵生的情況後，指示派人調查，在《遼寧日報》上發表，並親自寫出編者按語說：

這裏刊載的是張鐵生同志在今年大學招生考核試卷背面寫的一封信。張鐵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共青團員，現任新城縣白塔公社桑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長。他對物理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當然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大學招生，在群眾評議、群眾推薦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文化考試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試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檢查記住多少中學課程？錄取的主要標準，是根據他在三大革命運動實踐中的一貫表現，還是根據文化考試的分數？是鼓勵知識青年積極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再教育，努力鑽研和完成本職工作，還是鼓勵他們脫離三大革命運動實踐而閉門讀書？

毛澤東看到報導後稱讚張鐵生是「反潮流的代表」，指示《人民日報》轉載。《人民日報》在發表這篇來信時特意加了編者按語。〈按語〉說：「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

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報導發表後，一些人來信反對，認為「揀了個渣子」。毛遠新得意地回答說：我「只不過揀了塊有棱角的石頭，打痛了那些反對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的人」。此後，張鐵生被樹立為「交白卷」的「英雄」，當選為四屆全國人大常委。[91] 各地也紛紛效法，樹立起各種明目繁多的「白卷英雄」。文化大革命後的調查證明，張鐵生的考卷並未交白卷，有的科目得了一二十分，他還在信中懇求對他予以照顧。所謂「白卷事件」，完全是毛遠新等人編造出來的。

「文革」派製造了「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事件。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發表題為〈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這封信是北京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紅小兵黃帥和班主任產生了一些矛盾之後，在家長的參與下寫成的。10月21日，這封來信附上黃帥本年9月5日至10月19日寫的幾則反映她和老師矛盾的一些具體情況的日記，分別寄給《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和《北京青少年》雜誌。不久，《北京日報》在該報一個內部刊物上刊登了這份材料。遲群和謝靜宜看到後，備加讚許並接見了黃帥，表示支持這種「反潮流精神」。《北京日報》根據謝靜宜的意見在當天報紙的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並加了編者按說：

> 這個12歲的小學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在教育戰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還遠沒有肅清，舊的傳統觀念還是很頑強的。在教育革命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黃帥同學提出的問題雖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師道尊嚴」的問題，但在教育戰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遠不止於此。

91　張鐵生由於緊密追隨江青集團，1983年被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十五年徒刑，1991年10月16日獲釋，後開始經商。

12月28日，《人民日報》根據姚文元的指示全文轉發，並加編者按語。此後，全國掀起了批「師道尊嚴」的浪潮。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19團政治處宣傳幹事王文堯、放映員恩亞立和新聞報導員邢卓對此有不同看法，決定以「王亞卓」作為筆名，給這位小學生黃帥寫一封信，闡明自己的觀點，替老師說幾句公道話。信中對黃帥提出善意的批評，指出她的「矛頭指錯了」，「提意見的態度大錯特錯了」，「師生關係緊張了，並非甚麼『師道尊嚴』在作祟……你們之間的爭執不屬於原則問題，只要有一個高姿態便可解決」。同時強調，「『師道尊嚴』不對，『學道尊嚴』也不對！」「王亞卓」的信轉送到遲群手中，他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復辟勢力的語言」。根據江青、遲群等人的旨意，《人民日報》在「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的通欄標題下，發表了黃帥覆「王亞卓」的一封公開信，嚴加批判。各級報刊也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文章，同時江青等派出工作組，把王文堯等三人打成「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代表」、「急先鋒」、「反革命」，多次批判，遣送到最艱苦的地方勞動改造，家屬也被株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12月10日，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為「王亞卓事件」平反。黃帥則於1979年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後恢復的高考，作為不再施行「株連」政策的典型被北京工業大學計算機科學系錄取，1988年自費到日本留學，1998年回國後到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

「文革」派製造了「考教授事件」。1973年6月，瀋陽醫學院在遼寧省文教組會議上匯報說，他們把數學、物理、化學三科入學考試題要教授、講師先答了一遍，結果這些在醫學領域的專家，面對突如其來的中學試題，大多數人都不及格。毛遠新聽後十分感興趣，在省委常委會上大肆宣講，用來證明專家並無真才實學。這個經驗由他向毛澤東匯報後，得到了肯定。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學院的教授集中起來，出一批題目，要他們考。他們總是看不起學生。」「現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你們那個青年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麼高明，我就

不信。」[92]12月30日，國務院科教組、北京市科教組在遲群、謝靜宜主持下，突然在清華大學召集會議出題，然後乘坐幾十輛小轎車，分頭到北京市的十七所高等院校去考教授。清華、北大各派一名工農兵學員監考，遲群、謝靜宜先後到場察看。各校教授起先接到通知說是開座談會，大家都拿出筆記本準備記錄，面對基礎知識的考卷，毫無精神準備，認為是極大的侮辱，許多人採取了不答卷或隨便應付、在考卷上寫反對意見及拒絕參加的方法表示反對和抵制，如北京大學121人中有51人交白卷。[93]結果參加考試的北京市地區17所高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只有53名及格，佔8.6%，560人不及格，佔91.4%，還有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在1974年1月江青私自召集的「批林批孔」大會上，遲群、謝靜宜公布了這次考試結果，江青得意地說：因為教師「經常用這種方法來整學生啊」，所以考他們「我覺得是應該的」。

江青等人利用毛澤東的支持而發動的這場「反右傾回潮」運動，使周恩來在文化、教育領域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被迫中斷，節節後退。一度稍有好轉的教育領域形勢又面臨着新的混亂，學校又出現了幹部不能管、教師不能教、學生不能學的無政府主義狀態。文化領域內因批判極左思潮而稍有生氣的一些事業又受到壓制，重歸於蕭條。

92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927。

93　《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747。

第二章
中美關係緩和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變化

1972年，是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形勢實現質的變化的一年。國內發生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掌握了主動權，開始糾正極左派的錯誤，國家緩慢地向着回復的趨向發展。如果說這種國內趨向還遠沒有回復到「文革」前的程度的話，那麼在外交方面，由毛澤東做出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實現和解，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向蘇聯「一邊倒」戰略及1960年代初以來「反帝反修」外交戰略的一個翻天覆地的大位移。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設計了一個聯合美國對付蘇聯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並進一步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這種外交戰略的提出似乎和國內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並不合拍，其反映了中國的外交方針由單一的革命外交向靈活的務實外交的轉化。

一　尼克松訪華和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1 尼克松訪華和中美上海聯合公報

根據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達成的協議，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美國方面實施「波羅二號」

行動計劃，基辛格再次來華訪問，為尼克松訪華做基本的安排。周恩來、葉劍英、姬鵬飛等人與基辛格一行舉行了多次會談。雙方除討論了尼克松訪華日期、會談方式、通訊聯絡等問題外，還就台灣、印度支那、朝鮮、日本、南亞次大陸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重點對尼克松訪華的中美聯合公報草案進行了談判。周恩來提出：美國的對外政策有一個歷史傳統，不可能一下子隔斷，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相信尼克松總統和毛澤東主席談話時，雖然立場不同，但能互相了解，能談到點子上，能找到共同點。開始，美方提出的經尼克松批准的聯合公報草案只強調共同點而迴避雙方的分歧，周恩來表示不能接受，指示中方人員另外起草對案，提議各說各的，明確寫出分歧，同時也寫出雙方的共同點，以便共同遵循。對案起草後呈送毛澤東。毛澤東認為：各說各的這個辦法好。「他們不是講甚麼和平、安全、不謀求霸權嗎？我們就要講革命，講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講大國不應該欺負小國。不突出這個，我看不那麼妥當。」[1] 中方重新起草的公報草案，以明確的語言闡述了中國政府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並留出一些空白頁，讓美方填寫其相反的立場。討論中，美方認為這份風格獨具的公報草案措辭強烈，而且形式也為外交史上前所未有，表示無法接受。周恩來為此作了大量的解釋和說服工作，使基辛格逐漸認識到中方草案有利於解決一些難題，最終接受了中方關於聯合公報的基本原則，並提出了美方修正案和補充意見。

關於台灣問題，美方表示希望改善中美關係，同時一再強調不能立即放棄台灣這個「老朋友」，並力圖將美國從台灣撤軍同中國保證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聯繫起來。周恩來針鋒相對地指出：如果當年美國不以武力援助蔣介石，二十二年來的中美關係可能大不相同。問題在於把爭取一代和平的希望寄予前進方面，還是寄予「老朋友」。

---

1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17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0、491。

並進一步指明：中美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就要改變一些關係，否則就無改革可言。如果一切照舊，怎麼能迎接新時代呢？掌舵者應善於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沒。只有掌握時代精神，才能改進世界情況。使基辛格受到震動，經過反覆斟酌，獨具匠心地發明了關於台灣問題的新說法：「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2]周恩來表示贊同，雙方終於取得了諒解。10月26日，中美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了初步協議。公報明確列舉了雙方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分歧，也突出了雙方都反對霸權主義，都強調希望加強雙邊關係的共同點。11月30日新華社發表公告，宣布尼克松總統將於1972年2月21日開始對中國的訪問。

較量在最初的接觸中就開始了。由於雙方並沒有外交關係，卻有着十幾年的敵對關係，雙方都很在意自己會給世界留下甚麼樣的形象。美國試圖打蘇聯牌壓中國承認其「世界領袖」的地位，而中國認為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

1972年1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準將率領先遣組到達北京，為2月的尼克松訪華做準備。在歡迎的晚宴上，黑格忽然向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的翻譯故作神秘地說：「國務卿有重要情況要我向周總理指定的人談。」1月4日午夜，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親自會見了黑格。黑格轉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說：「蘇聯政府決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變對次大陸的政策，他們企圖樹立一些你們的敵人或敵人的代理人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並強調指出：「我們認為蘇聯的戰略首先是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失去作用，然後是要進攻美國。」甚至宣稱：美國認為，中國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脅，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他還說：希望尼克松總統訪華能「加強總統的世界領袖形象，這對我們雙方都是有利的」。

2　中美《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72年2月28日。

黑格的口信激怒了中國的領導人，加重了他們本來就對尼克松訪華不無疑慮的心態。如果按照美方的要求，尼克松將以一個保護者的姿態來到中國。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匯報了黑格的言論。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企圖借蘇聯的威脅對中國進行恫嚇，迫使中國在原則的問題上，特別是在台灣的問題上讓步。對此必須做出相應的反擊。

1月6日晚11時30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第二次接見黑格，當面嚴厲批駁說：「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殖民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不斷抗擊外來干涉侵略和壓迫的鬥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而且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周恩來表示：「我們早已說過，我們準備敵人從四面八方打進來，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奮鬥到底，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一切企圖孤立、包圍、遏制、顛覆中國的陰謀都只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針對美方希望通過尼克松訪華加強其「世界領袖」形象，周恩來略帶譏諷地說：「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於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我們從不認為有甚麼自封的世界領袖。」他隨後又坦誠地說明：「中美關係並未正常化，但中國方面將以應有的禮儀接待尼克松總統，並將為謀求中美高級會談取得積極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3]

黑格沒有料到周恩來的態度如此強硬，一再解釋：因為用了「軍人的樸素語言，收到了過分直率的效果」，引起了「誤解」。關於台灣問題，周恩來指出，中方在公報草案中已盡力照顧到美方的困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是有着非常強烈的情感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就應該對中美關係的這個關鍵問題採取解決問題的積極態度。談到兩國的貿易時，周恩來說：中美兩國關係沒有正常

3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359－360。

化，貿易發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緩慢的；但中美雙方總要向遠處看，中美關係總要走向正常化。[4]

先遣組是為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進行技術安排而來的。周恩來召集會議研究了美方提出轉播尼克松在華活動的有關問題，指出原則同意美方提出的通過衛星轉播尼克松在華活動實況，決定由中國政府出資買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訊衛星，然後租給美方使用。周恩來說：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一點不能讓。美方原來說他們自己帶通訊設備，不要我們付費。我們說，這不行，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買下來，租給你們用，你們付費。這樣一方面維護了我們的主權，另外我們在跟他們使用時總能學到一點技術。[5]

就在黑格訪華結束後的1月7日，中國又進行了一次新的核試驗。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我國進行必要的和有限制的核試驗，是為了打破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核訛詐。這次核試驗明顯的是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與1969年得知蘇聯威脅要對中國實施核外科手術打擊後進行的核試驗一樣，是一顆表明中國強硬態度的信號彈。

經過緊鑼密鼓的準備，2月21日上午11時4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開始他稱之為「改變了世界的一周」的對中國的訪問。周恩來親往機場迎接。尼克松走下飛機舷梯，快步向前，主動伸出手來同周恩來熱烈握手，周恩來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像十分興奮的尼克松一樣，毛澤東隨時關注着尼克松的行止，急不可待地要會見他。下午2時5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會見了尼克松以及隨行官員基辛格、洛德。周恩來陪同會見。這是毛澤東重病脫險後的第九天。他的腳腫得很厲害，過去的鞋已經穿不進去了。為了準備會見，工作人員事先特地畫了腳樣，定做了兩雙肥大的圓口黑

4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組為尼克松訪華安排的經過〉，載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8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06－507。

5　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

布鞋。當美國人進門時，工作人員攙扶着身體虛弱的毛澤東站起來，向客人們致以問候。毛澤東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語言流利地表達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來向客人解釋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患了支氣管炎的緣故。而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卻判斷：「這實際上是中風造成的後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澤東的病情實際比他的判斷還要嚴重得多，書房的屏風後放置的就是應急搶救的醫療設備，醫護人員正在隔壁的房間內待命。[6]

雙方就中美此次高級會晤的進程和歷史背景、哲學以及其他國際事務問題認真地、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毛澤東說：「今天你在飛機上給我們出了個難題，要我們吹的問題限於在哲學方面。」[7]尼克松說：「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讀了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毛澤東指着基辛格說：「他是博士，今天主講要看他。」基辛格回答：「我過去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文選。」毛澤東說：「我那些東西算不了甚麼。」尼克松說：「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說蔣委員長，他不贊成。他說我們是『共匪』。其實我們跟他做朋友的時間比你們長得多。」

談到美國大選，毛澤東說：「講老實話，這個民主黨如果再上台，我們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尼克松說：「這個我懂得，我們希望我們不會使你們遇到這個問題。」毛澤東說：「你當選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說：「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兩個壞傢伙中選擇好一點的一個。」毛澤東說：「我喜歡右派。人家說你們是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談到這次會晤的歷史背景時，毛澤東說：「是巴基斯坦總統把你介紹給我們的。當時，我們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們接觸。」

---

6 杜修賢、顧保孜：《紅鏡頭中的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

7 除另註明外，本次會見內容均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95。

尼克松極力想把話題轉到具體政策上來：說，我知道多少年來我對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主席和總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們帶到一起來的是，認識到世界出現了新的形勢。他提出了台灣、越南、朝鮮、日本，當然還有美蘇關係問題：

> 為甚麼蘇聯在與中國交界的邊境上部署了較多的兵力，而在與西歐的邊境線上部署較少呢？……就日本而言，完全無防務，保持中立很好嗎？……我現在正在談論哲學領域的問題，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即我們不能留下真空，……問題是中國面臨誰的危險，美國侵略或者蘇聯侵略是否存在。這些是很艱難的問題，我們不得不討論它們。[8]

毛澤東說：「這些問題我不感興趣，那是他（周恩來）跟你談的事。」他接著說：

> 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可是我們兩家也怪得很，過去22年總是談不攏，現在從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個月，如果從你們在華沙提出建議時算起有兩年多了。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來往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9]

最後，尼克松表示，他懂得「只爭朝夕」。毛澤東指着基辛格說：「『只爭朝夕』就是他。」「大概我這種人放空炮的時候多。無非

8　〔美〕威廉·伯爾（William Burr）著，龐偉譯：《基辛格秘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頁44－45。

9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95。

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套。」尼克松笑着說：「就是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匪徒。」毛澤東說：「就個人來說，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內。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又說：「我跟早幾天去世的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着呢？一定要談成。」毛澤東稱讚尼克松寫的《六次危機》不錯。尼克松說：「你讀的太多了。」毛澤東說：「讀得太少，對美國了解太少了，對美國不懂。要請你派教員來，特別是歷史和地理教員。」毛澤東在談話中反覆表示台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台灣事小，世界事大。由此表明了中國所關心的國際大事就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為中美雙方的會談定下了基調。

原定這次會見只是禮節性的十五分鐘，實際卻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延長到了一小時五分鐘。在會談中毛澤東思維機敏，但會談一結束，他卻疲憊得不得不在沙發上靜坐了三十分鐘，隨後即臥牀休息。這次會見的報導中沒有出現「神采奕奕」、「身體非常健康」一類的用詞。根據中美雙方事先的意向，毛澤東還準備會見尼克松一次，毛自己也有這個強烈慾望，但終究因為身體狀況而中止。

22日至28日，周恩來同尼克松等人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坦率、深入的會談。尼克松正式重申了對台政策五原則，強調說：「基辛格博士前次來訪時曾表明了我們所接受的五點原則。我完全贊成。以後不管我們就其他問題發表怎樣的看法，總理可以相信我們對這些原則的贊同。」這五點原則是：

一、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我控制着我的政府系統，就不會再有任何類似「台灣地位未定」的聲明。

二、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

三、在我們逐漸撤出台灣時，我們會竭盡所能地運用我們的影響力阻止日本返駐台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四、我們將支持任何能夠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與此相關的一點是，我們不會支持台灣政府想借軍事手段返回大陸的任何企圖。

五、我們希望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我們知道台灣問題是全面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但我們要在我先前闡述的框架裏尋求正常化，我們將朝此方向努力，並力爭實現之。

尼克松還表示：「正如基辛格博士曾經解釋過的，我們目前保持在台灣的軍隊，其中三分之二是用來支持東南亞戰場的。我已經決定，一旦東南亞的問題得到解決，不管我們在這兒談得如何，我們都會從台灣撤走這些軍隊」。「我的計劃是，在我仍然大權在握的期限內，將剩餘的三分之一兵力全部撤走」。這「需要四年的時間」。[10]

這五點對台政策原則，可以說是中國通過與美高層會談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勝利。不過，由於尼克松以國內現在有反對力量為由，沒有確定美國從台灣撤兵的日期，並且要求這些內容不寫進公報，也不向外披露，因此，這五點原則長期以來一直未公諸於世，直到1999年才被美國國務院解密。會談中，當雙方重提中國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話題時，周恩來表明了中國的立場：我們將為和平解放台灣而努力。但這牽涉到雙方，我們要和平解放，蔣介石不幹怎麼辦？表示：當美國的軍隊仍駐在台灣的時候，中國不會和美國的軍隊發生武裝衝突。[11] 尼克松口頭承諾將盡快履行五點原則，事實上美國不久即開始撤軍。五點原則為以後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確定了不支持「台獨」的底線，有着深遠的意義。

周恩來與尼克松還討論了其他國際問題。尼克松試圖以美國對台灣問題的讓步和在越南撤軍問題來換取中國對越南施加影響，使越南

10　1972年2月22、24日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National Archiv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

11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National Archiv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

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做出讓步。周恩來指出：台灣問題很容易討論，我們對這個問題已經等了二十年，我們還能再等幾年。我們還能讓一步，就算台灣回歸祖國後，我們不會在那裏建立核武器基地。「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印度支那。全世界也在關注着」。針對尼克松表露的「美國決不會撤軍並推翻南越政府，再將政權交給北越」，如果那樣做了，美國必將遭到世界各國的鄙視的意思，周恩來指出：「還是那句話，不願意丟掉『老朋友』，其實老朋友已經丟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應該有選擇嘛。」而對於美方關於如果從越南撤軍，那兒將出現真空，蘇聯會來填補這個真空的想法，周恩來勸說道：只要我們相信人民，就不會有真正的真空出現。美國越晚從印度支那撤軍，你們的處境就越被動。他表示同意基辛格的說法：中國希望越南戰爭結束，而蘇聯希望戰爭繼續下去。同時幾次重申：這個問題，只有印度支那人民有權發言，並與你們談判。「我們只有同情他們的義務，沒有干預他們的權利」。但是由於印度支那這個區域與我們也有關，我們應該有權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更重要的是，我們有義務對印度支那人民提供協助與支援。如果那裏的戰事持續，那我們當然將繼續援助他們，「因為我們也要說到做到。但是，我們決不會直接介入，除非你們打我們」。[12]

關於蘇聯問題，尼克松表示美國為了維持中美雙方利益，就必須維持現在的軍事規模和部署。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的軍事力量，比在歐洲還多。他提議美國在高度機密情況下，向中方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等提供有關蘇聯對中國部署軍事力量的情報。他還提出，美國和日本訂立共同防護條約，在日本駐軍，是為了不使亞洲出現真空。如果美國從日本撤軍，日本可能靠近蘇聯，或者建立自己的軍事力

12 1972年2月22・28日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National Archiv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364。

量。周恩來表示，美國蘇聯在世界上大搞軍備競賽，造成了世界緊張局勢。中國希望和平，對美國蘇聯限制核武器的談判沒有任何反對意見。「下個世紀會批評為甚麼用那麼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搞核武器。我們希望你們達成協議，減少核軍備」。[13]

姬鵬飛外長與羅杰斯國務卿同時也舉行了多次會談，雙方探討了發展中美經濟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途徑。喬冠華副外長和基辛格舉行了起草聯合公報的會談。由於雙方在台灣問題等方面的分歧，在措詞上發生了爭論。美方擔心，如果公報不能發表，尼克松的訪華成果就無法體現。周恩來告訴美方，反正雙方的觀點已經接近，我們也報告了毛主席，說已商定要寫最後從台灣撤軍的問題，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美方同意。

經過反覆磋商，27日在從杭州去上海的飛機上，公報終於定稿。28日下午，雙方共同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聯合公報〉關於中美在重大問題上的內容如下：

> 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着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實行這些原則。
>
> 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365；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National Archiv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

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聯合公報〉是一個奇特的外交產物，在以往國與國的交往中，很少見到兩個尚未建交的大國能夠舉行最高首腦的會晤，而且還能避開建交問題在一起商談雙邊和多邊關係；也很少見到會談雙方共同發表各自坦率闡述各自分歧的「聯合」公報。在〈聯合公報〉這一中美高層會談達成的最終成果中，雙方互有所得，也互有讓步。美方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雖然還未像中方希望的那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未規定從台灣撤軍的最後期限，但畢竟第一次公開承認了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承諾了美國從台灣撤軍的前景。這就為下一步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打下了原則基礎。公報關於反霸的條款，實際已明確地向全世界宣告，中美雙方將共同反對蘇聯或蘇聯集團試圖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的一切努力；而公報關於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國家利益，中美雙方中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的聲明，則表明了中國對美關係緩和不是針對第三國的立場，為消除越南、印度等有關國家的疑慮提供了依據。

中美敵對狀態的結束，對中國同日本、歐洲包括蘇聯的國家關係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一個新的世界戰略格局正在形成，它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所有國家提供了新的機遇。

2 田中角榮訪華和中日聯合公報

196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雖然與蔣介石集團簽訂了「日台和約」，卻又不能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於是圖謀通過腳踩兩

隻船的方式使日本兩面受益。代表人物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認為，「中華民國」還在，蔣介石政權在法理上還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蘇聯「一邊倒」政策不會長久，與中國開展貿易既對日本必不可少，又可產生離間中蘇的作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着中國的絕大部分領土的現實，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日本也應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打交道。與此同時，日本始終沒有放棄對台灣的野心，仍希望在蔣介石死後把台灣重新納入日本的版圖，即實現所謂的「再統合」。吉田茂的親信明確提出要搞「台日邦聯」（Union between Formosa and Japan）或「日台聯合王國」（Japanese United Kingdom），要把蔣介石政權的統治範圍限制在台灣，並暗中支持台獨勢力的活動，同時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政權。[14]

1966年3月佐藤榮作政府公開承認日本加入美國「遏制中國」的核戰略體系，強化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日關係一直保持在惡化狀態。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隨着美國對中國不斷發出種種緩和關係的信號，佐藤首相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中國問題是1970年代日本外交的課題」，日中兩國「作為鄰國，必須友好」。認為「改善日中關係要雙方付出努力」，但「首先需要日本方面的努力」。表示如果會談「不便在日本舉行，也可以在駐外使館中進行」。[15]日本外務省曾設想在巴黎或其他地點的駐外使館中與中國政府進行接觸。1971年7月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尼克松總統應邀訪華的公報，之前沒有得到消息的日本政府陷於尷尬境地，受到朝野猛烈抨擊，被迫加緊考慮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問題。

1971年8月，日本一貫主張日中友好的自民黨元老松村謙三病逝，周恩來派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國權以總理特使身份前往東京參

14　參見陳肇斌：《戰後日本的中國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有關章節。

15　〔日〕古川忠雄等編：《戰後日中關係資料》、載宋成有等：《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頁343。

加弔唁活動，並特意向他交代了此行的任務和須注意的問題。[16]在松村謙三的葬禮上，佐藤主動走到王國權面前鞠躬，與他握手，並請王國權代他向周恩來總理表示問候。這一姿態引起了日本新聞媒體的轟動。王國權還與日本防衛廳長官中曾根康弘進行了秘密會晤。中曾根表示願意為日中友好貢獻力量。是年，佐藤在國會中提出考慮派遣相當於內閣成員級別的官員訪華，並於9月兩次親筆致函周恩來，表示希望訪華，說他曾在議會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政府，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9月17日，自民黨議員藤山愛一郎率日本「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議員聯盟」代表團訪華，中方在與日方的會談中正式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這三項原則載入了雙方於10月2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17]不過，日本同時又追隨美國向聯大第二十六屆會議提出「重要問題」和「雙重代表權」兩個提案，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10月末，佐藤內閣官房長官保利茂托即將訪華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帶給周恩來一封信，信中承認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台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周恩來認為這封「保利書簡」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為策動「台灣獨立」留後路，拒絕接受。[18]1972年4月，日本自民黨顧問、前外相三木武夫一行訪華，周恩來在會見他們時說：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對立下去。二十二年來兩國人民間的交往從未中斷過。應該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恢復中日邦交三項原則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19]但是佐藤在其任期內，始終未能跨出

---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76、477。

17 唐家璇主編：《中國外交辭典（1970－197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頁3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0。

18 孫平化：《中日友好隨想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頁122、123。

1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20。恢復中日邦交三項原則，即中日復交三原則，內容同上述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參見《中國外交辭典》，頁715）。

廢除「日蔣條約」、恢復日中邦交的關鍵一步。5月15日，周恩來在與日本公明黨第二次訪華團談中日首腦會晤問題時提出：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國來談中日兩國關係問題，我們歡迎。[20]此後不久，佐藤內閣終於在尼克松訪華這一拋開日本直接同中國發展關係的「越頂外交」的衝擊下，於6月17日辭職。

1972年7月6日，田中角榮新任首相。他在首次內閣會議上即表示，要努力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並開始着手採取實際步驟謀求解決日中兩國關係問題。面對日方在對華關係上出現的新氣象，周恩來特意指示在東京的中日友好協會副秘書長孫平化，要抓住時機，爭取向田中當面轉達周恩來的邀請和傳話：「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21]7月25日，日本公明黨中央執行委員長竹入義勝受田中角榮委託，帶着田中決心訪華的信息和準備與中國談判的二十項內容抵達北京。27日，中方與竹入第一次會談後，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通過了〈中日聯合聲明要點（草案）〉，並送毛澤東審閱。[22]8月3日，田中內閣發表關於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針，對中方的復交三原則表示理解。田中角榮還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中，沒有一個繼續與台灣保持關係的，日本也不能例外。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正式轉告中方，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決定為談判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訪問中國。中國外長姬鵬飛隨即宣布：周恩來總理歡迎並邀請田中首相訪華，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23]9月14日，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自民黨代表團由日本眾議員、自由民主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阪善太郎率領抵京，作為日本政府的正式代表團，為田中角榮訪華做準備工作。9月20日，中日雙方同時發表了關於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華的公告。

2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25。

2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35、536。

2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40。

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44。

這樣，中日雙方經過多次交換意見，對田中首相訪華時將要簽署的聯合聲明的內容基本達成了共識，中方也將草案文本非正式提交給了日方。雙方認識上還存在差距的關於恢復中日邦交三原則的表述、日台關係、結束戰爭狀態的提法等問題，將留待訪華的田中角榮一行與中國領導人磋商解決了。[24]

9月25日至30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9月25日至28日，周恩來與田中角榮進行了四次會談，主要討論了日台條約、台灣、結束中日之間戰爭狀態、中國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國際事務等問題。姬鵬飛與大平正芳則從26日上午10時20分至28日零點30分進行了三次正式會談和一次非正式會談，着重討論了中日雙方各自正式提交的聯合聲明草案。日方準備的草案以中方此前非正式提交的草案為基礎，尊重中國政府的見解，同時反映了在若干問題上日本政府的立場。[25]

在此次中日高層會談中，雙方事實上達成了一些折衷方案，其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

（1）關於台灣的領土歸屬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中美英三國在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中即明確表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布的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但是，長期以來日本政府以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1；張曉剛譯：〈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昭和53年5月打字付印，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存，〈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25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昭和63年9月打印形成；〈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昭和53年5月打字付印，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存，〈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所謂的「日台和約」的「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堅持台灣歸屬未定論，仍承認蔣介石政權的「中華民國」，拒不表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就在1972年8月田中角榮宣布對中國的復交三原則表示理解之後，自民黨內親台勢力還想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悅三郎在台灣宣稱日本將把「同中華民國的歷來關係包括外交關係在內照過去原樣保持下去」。8月18日、19日周恩來會見小阪一行，獲悉這一消息後，堅決重申中方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絕無改變餘地」。田中、大平一行實際是抱着「不成功就難回日本」的悲壯決心到達北京的。

9月26日，姬鵬飛與大平正芳舉行第一次外長會談，討論中日聯合聲明將闡述的各項問題。雙方正式提交了各自的聲明草案文本，對於台灣的歸屬問題，中方草案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贊同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草案所附的「默契事項」內容為：1、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2、聯合聲明發表之後，日本政府從台灣撤走其大使館、領事館，而且採取有效的措施，使蔣介石集團（台灣亦可）的大使館、領事館撤離。3、戰後，在台灣的日本團體和個人的投資及企業在台灣開放之際，給予適當的關照（當然是中方給予適當關照之意）。日方草案則採取了一種間接的表述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並且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

會談中，日方參加會談的條約局長高島按照從東京帶來的〈日中聯合聲明的對中方說明要領〉，就日文本的聲明草案向中方做出說明，其中第四項對應中方的「默契事項」，介紹了日本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立場：

> 根據《舊金山條約》，我國放棄了對台灣的一切權利，不能對台灣現在的法律地位表明獨自認定的立場。我們十分清楚中國

對《舊金山條約》的見解與日本不同，但我國作為該條約的當事國不能破壞上述立場。然而，同時對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所述事情的原委，台灣根據宣言的意圖，是應該返還中國的，這是日本政府不變的見解。我國還全面尊重中國的「一個中國」的一貫立場，當然毫無再把台灣變成日本的領土，或者支持台灣獨立的意圖。因此，我國也不設想將來台灣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以外的任何法律地位。

從這一見解出發，日本政府認為，台灣現在處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同的另一個政權的統治下，由此產生的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即作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來解決。另一方面，我國對於各國與台灣存在的國民政府維持外交關係的政策不持否認立場，而且，美中間的軍事對決應予避免，這是全體日本國民的願望，基於此，台灣問題最終也應和平解決。這是日本政府的基本見解。

聯合聲明草案第四項第二句「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一立場，而且對此表示尊重」的表述，如上所述，是把日方的意見與中方的立場相對應的簡潔的表述。[26]

由此，日本實際已通過此番關於台灣問題立場的闡述，在這一事項上向中國政府做出了正式承諾；中國方面則對日方的解釋採取了理解的態度，接受了日方草案的表述內容。以後有日本學者根據聲明中「充分理解和尊重」的用語，宣稱日本政府從未直接承認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實證明，這完全是臆想和推測。

9月28日，周恩來與田中角榮進行第四次首腦會談，大平正芳在宣讀事先準備好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後的日台關係」文稿時，重申了日方的上述立場：「日本政府，今後當然也不會採取『兩個中國』的

26 張曉剛譯：〈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立場，完全沒有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想法，對台灣不抱任何野心。對於這一點，希望信賴日本政府。」根據日方的記錄，周恩來等中方人員，在認真聽完大平的陳述後，嚴肅的表情沒有了，都放心地點了點頭。[27]

(2) 關於日台條約問題。

9月25日，周恩來與田中角榮舉行第一次會談，田中角榮一開始就提出「迄今為止阻礙邦交正常化的是與台灣的關係」，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必須應付現實發生的問題。對此如果處理不好，國內就要發生混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對台灣的影響」。大平正芳隨之解釋說，關於「日華和平條約」問題，「我們能夠充分理解中方採取的此條約非法化、無效的立場。但是，此條約是得到國會的議決後政府批准的。日本政府在同意中方意見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必須承受在過去20年間一直欺騙國民和國會的惡名」。「『日華和平條約』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實現的同時，即結束了其任務，希望得到中方的理解」。其後，高島條約局長在26日上午中日外長第一次會談中就日方草案做出說明時也指出：「如果達成日中邦交正常化，『日華和平條約』實質上就完全喪失了其繼續存在的意義。所以，作為日本政府在明確今後日中關係完全在新的基礎上出發的意義上，根據某些適當的方法，有了公開確認終結該條約的準備。」以此，日本方面表述了對復交三原則第三點「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不做公開表態的意思。

對此，周恩來9月26日與田中角榮進行第二次會談時指出：「在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上，加入『日台條約』和舊金山條約的話，問題將變得難以解決。因為對此表示承認，蔣介石就是正統，而我們則成為非法的。因此，希望以充分理解中國的『三項原則』為基礎，

27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蔣立峰：〈中日邦交正常化與台灣問題〉，載朱佳木主編：《當代中國與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屆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485。

日本政府對面對的困難給予關心。」同日下午，姬鵬飛與大平正芳舉行了第二次會談，針對日方提交的草案前言中已寫明「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中日恢復邦交三原則」的情況，姬鵬飛表示，中方草案寫進了「中日復交三原則」，中方認為這些原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礎。「日方也已經表明了對此充分理解的態度。因此，不存在甚麼特別的問題了。」有鑑於此，中方草案「在三原則裏只記述了二原則，而沒有涉及『日台條約』的第三原則」。由此，照顧了日本政府所面臨的現實困難。翌日晚，姬鵬飛在與大平正芳進行第三次會談時進一步提出了根據日方草案寫成的訂正方案：「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見解。中國方面對此表示歡迎。」日方接受了這一表述。

9月28日，在中日首腦第四次會談中，參加會談的大平正芳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後的日台關係」聲明，明確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解除了現在統治台灣的政府與我國的外交關係。」在重申日本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之後，提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台關係上暫時需要保留的，諸如保護在台日本國人的生命財產等具體問題，以及日本駐台使領館處理善後事宜等事項。根據出席會談的橋本中國課長在日方記錄中的夾註，「周總理及以下中方人員看上去以為大平大臣或田中首相對日台關係也許會提出甚麼問題，表情嚴峻地聽着大平的發言。但是，大平發言結束後，都恢復了釋然的表情。對大平的發言雖然不能說從正面確認，但因為有了了解，因此點頭表示放心。」

會談即將結束時，周恩來高興地談道：「明天（29日）大平大臣簽字後，是記者招待會，聽到聲明斷絕日台外交關係，當甚表歡迎。感謝田中、大平兩位首腦的信義。中國也一定實踐說過的話。中國有句諺語叫：言必信、行必果。」「希望今後中日之間建立起新的關係。」田中角榮則坦率地陳說：「我們下了非常大的決心訪問了中國。明天大平大臣在記者見面會上，明確台灣問題。為了盡到責任，我們想堅持克服困難、實行下去的意見。作為日本的政治負責人，必

須做萬全的考慮，對善後處理也要盡最大的努力。希望能給予理解。」「在明天大平大臣的記者見面會上，自民黨內要提出違反黨的決議的問題。但是，由於我是總理，同時又是總裁，所以想做出結論。」[28]

〈中日聯合聲明〉簽署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說：〈開羅宣言〉規定台灣歸還中國，而日本接受了承繼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鑑於這一原委，日本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場是理所當然的；日台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認為條約已經完結；日台間的「外交關係」也不能維持，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以關閉。隨後，日本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並於1973年初與中國互設大使館，互派大使。

(3) 關於結束中日之間戰爭狀態問題。

對結束中日之間戰爭狀態表述的分歧，實際是由中日雙方關於日台條約基本立場的差異而產生的問題。中方始終認為日台條約非法、無效，故在聲明草案中提出「自聲明公布之日起，戰爭狀態結束」。日方則堅持該條約是經過國會批准的法律文件，日台已通過締結〈日華和約〉結束了兩國間的戰爭狀態，因此不同意中方的提法，主張寫為「確認日本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結束」。由於使用「確認」一詞實際即意味着承認日台條約為合法，中方不能接受。

周恩來在9月25日首次與田中角榮會談時即提出：「雖然我認為戰爭狀態終結的問題對日本很麻煩，但是對大平大臣的提案不能完全同意。舊金山條約以後，如果說至今沒有戰爭狀態，中國儘管是當事者，但是並沒有包含在其中。」接着他表示將此問題委託給中日兩位外長，尋找雙方能夠同意的方式。

翌日，中日外長第一次會談，姬鵬飛在正式向日方遞交中方的聲明草案時特別說明「有關戰爭狀態的第一項是中方原來的寫法」。指出：「日方的困難似乎是關於廢除『日台條約』很難得到國會的同意，

28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但是日方草案不能令中國人民同意。必須向中國人民清楚表明何時結束戰爭狀態。希望日方認真研究中方的草案。」大平正芳則在第二次外長會談時表示，關於這一問題「日方頗費心思」，隨即提出兩個試行方案，希望與中方討論。

第一方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此宣布：中國與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結束。」以主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為特徵。這樣，只有戰勝國一方宣布戰爭結束的例子，過去在聯合國與德國戰爭狀態結束之際曾經被採用過。

第二方案是：「日本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此宣布在日本國和中國之間今後存在着全面的和平關係。」何時結束戰爭並沒有加以明確。關於這一問題，因雙方立場不同，採用以面向將來，向前看的態度來處理。

姬鵬飛聽後同意對此方案再做研究，同時強調說：「中方極為重視結束戰爭的時間問題。這是無論如何必須解決的問題。」大平正芳也強調性回覆說：「日方認為，無論如何要以能在國內被接受為底線。」姬鵬飛於是表示：周總理也明確地說過日方的困難我們明白，所以總得設想一個好的方案。

此次會談結束後，姬鵬飛與周恩來一起花了很長時間進行多方考慮，確定了新的表述方式，即在聲明前言中寫入：「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正文第一項條款寫為「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國與日本國之間的極其不正常的狀態宣告結束」。在兩位外長的第三次會談中，姬鵬飛就此折衷方案解釋說：「據此，關於戰爭結束的時期，中日雙方就有了可以分別進行不同解釋的餘地。」大平正芳旋即對「極其不正常」的用詞提出疑義，認為這將意味着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兩國之間仍然繼續保留着一些不正常的狀態，希望中方將「極其」替換為「一切」、「所有」等詞。經過反覆磋商，日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前言中的新表述，對於正文第一項的內容，兩位外長最終確定為：「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雙方意見調和，問題解決後，田中角榮仍為事態的發展難以預測而惴惴不安。在與周恩來進行第四次會談時，他於表達了不懼自民黨內反對勢力，堅持斷絕日台關係的決心之後，不無憂慮地說：「因為台灣說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後，就回到戰爭狀態，所以作為日本總理，我很為難。」對此，周恩來一方面表示，中方之所以考慮到「戰爭狀態」問題的表述，就是由於關注了這一點；一方面寬慰對方，既告知「對於美國，我們已經通報了」，又分析蔣介石患重病等情況，以此示意外有美國方面的壓力，內有蔣氏政權領導層自身的弱點，「在台灣的一群人能掀起小波浪，但是幹不成大事。這叫做小伎倆」。周恩來的一番話顯然起到了作用，田中角榮接着再次表達了他的決心：「對於和台灣的關係是考驗我和大平的政治能力的問題。但是，為了日中的長期歷史，我們對那種程度的困難，有精神準備。」[29]

此外，中日雙方還討論了如何看待日本侵華戰爭、戰爭賠償、日美安保條約、釣魚島等問題。

關於日本歷史上侵略中國的戰爭問題。由於1972年7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社會黨副委員長佐佐木更三時，佐佐木說到田中等人打算來華謝罪，周恩來說：不要講甚麼謝罪的話了。現在日本新政府離過去發動侵略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相當遠了。現在我們應該向前看，而不應該向後看。[30]這番寬容的話引起了日方的誤解。田中角榮在9月25日中方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致祝酒詞時對此只輕描淡寫地表示說：在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26日，周恩來嚴肅地指出：「我們高度評價日本政府首腦所說的希望以政治的而非法律的形式解決邦交正常化問題。因為戰爭，幾百萬的中國人犧牲了。日本的損失也很

29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638。

大。我們不能忘記這種歷史的教訓。田中首相所說的『反省過去不幸的事情』的想法，作為我們也能接受。但是，田中首相的『給中國人民添了麻煩』的言辭招致中國人的反感。因為在中國所謂麻煩只在小事上使用。』次日，在往返長城遊覽的汽車中，兩國外長進行了非正式會談。姬鵬飛再次提出：「『反省』和『麻煩』這種表現方法是否過於輕描淡寫了？」兩人就「反省」含義的微妙差異交換了意見。最後，雙方商討的結果是，在聯合聲明中將此問題寫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31]

關於戰爭賠償問題，日方本來打算當作一個難題來與中國談判，但當了解到中國準備放棄戰爭賠償時，卻又得寸進尺。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提出中日聯合聲明中不必再提戰爭賠償問題，因為日台條約已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的說法。對此，周恩來在9月26日第二次首腦會談中鄭重聲明：「這是蔣介石的問題，蔣介石放棄了賠償，而中國沒有必要對此放棄。聽了外務省的這種想法我很吃驚。蔣是在逃到台灣以後，而且是在舊金山條約之後放棄了對日索賠。不能用別人的東西給自己留面子。是大陸遭受了戰爭的損害。」「我們也知道賠償的苦楚。不想讓日本人民品嘗這種苦楚。」「田中首相訪華提出解決邦交正常化問題，所以我們考慮為了日中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了賠償。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因為蔣介石放棄了，所以問題已經解決了這種想法。這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尊重田中、大平兩位首腦的考慮，但是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不是違背兩位首腦的意見嗎？」中國的這一立場，是毛澤東提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田中角榮隨之表示「非常慶幸聽到了關於放棄賠償的發言」，「對中方超越恩仇的立場非常感動。對中方的態度表示道謝」。次日，高島也在聯合聲明起草小組上表示，他對中國方面放棄戰爭賠

31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人民日報〉，1972年9月30日，

償一條的說明希望不要引起誤解，日本國民對中國放棄戰爭賠償要求深為感動。[32]

田中角榮一行走後，10月6日周恩來會見旅日旅美華僑時對不要日本戰爭賠款一事解釋說：賠款不能要。我們自己吃過賠款的虧的。甲午戰爭，中國賠款二億兩白銀；庚子事件，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直到抗日戰爭，還沒有賠完。鑑於這個教訓，毛主席說，賠款要不得，要了賠款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雖然半個世紀來日本欺負我們，現在平等了。我們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們起變化。[33]

在9月26、27日的首腦會談中，兩國總理還相互做出了一些口頭承諾。周恩來談到，「思想沒有國界。思想是人民選擇的問題。但是，革命不能輸出」。「日本具有甚麼程度的自衛能力是日本自身的問題，中方不會干涉內政」。田中角榮則表示，「日本沒有核武器。防衛力量的增長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1%以下」。日本「恪守軍隊不向海外派兵的憲法規定」，並且「絕對不搞侵略」。「所以，日本沒有危險」。他還特別提出，「作為邦交正常化的結果」，希望中方能對「中國不干涉內政，不培養日本國內的革命勢力」「加以確認」；說：「中國不輸出革命，這將成為給予我的最大的禮物」。日本「絕對不可能復活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是極少數。日本人現在只生兩個孩子。這樣下去，300年後，日本人就將所剩無幾了。沒有必要對日本恐懼。」[34]

9月27日，毛澤東會見了田中角榮。周恩來、姬鵬飛、廖承志等等參加了會見。當田中角榮表示只要雙方誠心誠意地進行談判，就一定可以取得圓滿的結果時，毛澤東風趣地說：現在彼此都有這個需要，這也是尼克松總統跟我講的。他問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說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4；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33　周恩來會見旅日、旅美華僑陳煜旺、梅子強等四十六人的談話，1972年10月6日。

34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是的。我說，我這個人現在勾結右派，名譽不好。我對尼克松說，你競選的時候，我投了你一票。這回我們也投了你（田中角榮）的票啊。正如你講的，你這個自民黨主力不來，那怎麼能解決中日復交問題呢？解決中日復交問題還是靠自民黨的政府。毛澤東問起田中關於所謂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的問題怎麼解決時，田中角榮表示，我們準備按中國的習慣來改。毛澤東回顧中日兩國兩千年來的交往史時講道，歷史記載中第一次見於中國歷史的是後漢嘛。到了三國，孫權想找你們，派遣了一個三萬人的船隊，結果不僅沒有找到日本，也沒找到台灣。毛澤東還談起他年輕時的讀書生活說，五經四書，除了《春秋》、《易經》，我都讀過。讀了呢，一點啥用處也沒有，只是一次跟我父親作鬥爭時用上了，我也利用宋朝王安石說過的三句話頂了我的老師：「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毛澤東說，我是中了書毒了，離不了書。並拿起《楚辭集註》送給田中角榮。田中角榮表示十分感謝。

9月29日，中日雙方正式簽署了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宣布：

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35]

35 《人民日報》，1972年9月30日。

〈聲明〉還提出，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實際表明中日雙方要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方面相互支持。〈聲明〉同時宣布，兩國盡快互換大使；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及政府間的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的談判；雙方決心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從1972年7月田中角榮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到9月中日兩國決定建交，中日關係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就實現了新的突破，充分反映了中日雙方在國際新形勢下的共同需要。對於日本來說，能與中國復交，有利於其抗衡蘇聯對日本的威脅；對於中國，即如外交部起草、經毛澤東批准的內部宣傳提綱所強調指出的：這是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於反對美蘇兩霸特別是反對蘇修的鬥爭，有利於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有利於我國解放台灣的鬥爭，有利於緩和亞洲緊張局勢。[36]

日本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後，中日兩國於1973年初互設大使館，互派大使。1974年中日雙方簽訂貿易、航空、航海三協定；1975年又簽訂政府間漁業協定，並開始進行了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37]中國和日本兩國間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關係不斷發展。

隨着中美關係的緩和，自1970年代初以來，中國與歐洲國家出現了建交高潮。1969年前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除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外，只有瑞典、丹麥、瑞士、芬蘭、挪威、法國六個，英國和荷蘭與中國僅有代辦級外交關係。而至1970年代末，除安道爾等四個國家外，中國已與西、北、南歐所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包括與英、荷關係從代辦級升為大使級，同聖馬力諾建立總領事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16。

37　孫平化等監修、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368、369、375、377、395、386。

外交關係。1975年中國還與歐洲共同體建立了正式關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也於1970年代初先後與中國建交。

二　毛澤東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

1　把蘇聯作為中國外交和國防上的主要敵人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之戰發生後，毛澤東在蘇聯要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打擊的威脅下，考慮國際格局時曾經滿腹憂慮地說：「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38]國家的利益促使他必須尋找能夠聯手抗禦強敵——至少是利用——的夥伴，集中力量對付另一個主要敵人——蘇聯。毛澤東決定把蘇聯作為主要敵人，分析起來，大致上來源於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蘇聯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近代史上，沙皇俄國侵佔了中國東北、西北大量領土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然承認了歷史造成的基本狀況，但中蘇兩國7400公里長的邊界線上還存在着許多爭議地區，雙方之間領土歸屬邊界事件的頻繁發生和不斷升級，給了蘇聯以「保衛領土」而發動戰爭的充分口實。1960年代起蘇聯在中蘇邊界地區陳兵百萬，蘇軍機械化部隊幾個小時就可以像當年進攻日本關東軍那樣佔領中國東北，或者由中國內蒙經張家口長驅直入北京。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國防體系，基本是建立在以蘇聯為後方依托的設計藍圖上的，蘇聯軍事專家通過指導中國的國防建設，對中國的國防重點和防禦設施瞭如指掌（1950年代初期，中國的沿海邊疆地區空防，一度由蘇聯航空兵師直接負責）。至少，蘇聯軍隊進攻並佔領中國部分地區的威脅，比遠在大洋

38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等人的談話，1969年3月22日，〈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

彼岸的美國從海上攻擊中國的威脅要大得多，也更為現實。至於美國升級越南戰爭對中國南部安全環境的威脅，已由中美兩國達成的美國地面作戰部隊不越過17度線、中國的地面作戰部隊也就不參戰的默契而基本化解。[39]另外，就中國的傳統軍事戰略而言，戰國時代秦國統一中國時所使用的遠交近攻軍事謀略的成功，也為把蘇聯當作主要敵人的戰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蘇聯對中國最具現實意義的政權替代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與蘇聯是同盟關係，新中國建立之初就仿效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1950年代中國曾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方面面得到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中國也曾大張旗鼓地學習蘇聯經驗、宣傳中蘇友誼，中國的大批幹部是受蘇聯專家培訓和經在蘇聯留學培養出來的。儘管隨着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分歧的加深，蘇共的社會主義理論被指摘為「修正主義」思潮，中蘇兩國的同盟關係發生了動搖，但是長期以來具有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國際共運旗手形象的蘇聯，在政治、經濟基礎相同的中國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場。而美國則不同，經過建國以來的思想教育和朝鮮戰爭，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妖魔感」大大加強，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勢如水火，涇渭分明，即使中美關係實現緩和，也不可能使中國人公開接受資本主義理念。由此毛澤東認為，蘇聯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險性」。[40]1959年彭德懷被毛澤東罷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毛懷疑彭訪問蘇聯期間與赫魯曉夫有不軌的勾結；在「文革」前夕，他由於擔憂蘇聯入侵會利用彭德懷、黃克誠等有政治影響和軍事才能的異端者，決定把兩人下放到內地的四川和山西；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又曾經懷疑周恩來對蘇聯鬥爭的堅決性，多次談到打起

39　對於此問題的考察，詳見李丹慧：〈三八線與十七度線——朝戰和越戰期間中美信息溝通比較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0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編輯部聯合文章，《紅旗》，1972年第10期。

仗來誰會當兒皇帝的問題。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出，毛對這種來自相同意識形態國家的威脅的深度憂慮，大大超過了對美國威脅的憂慮。事實上，蘇聯1968年8月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並建立傀儡政權的情況，已使中國感受到了政權的威脅實實在在地就來自於這個強大的鄰國。1969年9月16日，有蘇聯高層背景、常作為其代言人的西方記者維克托・路易斯在倫敦《星期六晚郵報》上即曾披露說：蘇聯正在計劃建立一個能夠呼應莫斯科「拯救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共替代領導機構。[41]這種扶植反毛政權的警示，無疑將在毛等中國領導人的心中投下濃重的陰影。

再次，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分歧，使中蘇敵對關係比中美關係更難以修復。中國和蘇聯同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常理，共同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應該使他們至少比與美國更容易接近。但是，由於中蘇兩黨的重新團結關係到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為統一的標準、共同的規律，以誰為領袖的大勢，意識形態的分歧已與兩黨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聯繫到了一起。當意識形態問題與政治問題掛鈎時，兩黨分裂的命運也就難以扭轉。伴隨着中蘇兩黨1960年代中期那場剪不斷、理還亂的意識形態大論戰而來的是，國際共運的嚴重分裂和中蘇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這一死結，已很難用單純的改善國家關係的外交政策來化解了。根據「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理論，「文革」中的中國在國內把暗藏的黨內走資派當作比公開的「黑五類」和資本家更有威脅的打擊對象，進而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新階級鬥爭理論——「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同時，在國際上也把蘇聯當作比美國更危險的主要敵人，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實際是「反帝必先反修」）的口號。

以上考慮，長期影響着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使中國從1960年代末期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甚至1980年代初期止，始終奉行把蘇聯

41 〔俄〕賈恰羅夫等：〈蘇聯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4期，頁22。

作為外交和國防上的主要敵人的外交戰略。中國與蘇聯的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的準戰爭狀態：蘇聯繼續向蘇中、蒙中邊界地區增兵達100萬以上，戰略核武器部隊也將戰略導彈的目標指向了中國。中國方面則以蘇聯為主要假想敵，以抵抗蘇聯入侵為戰略防禦的主要目標，擴充了烏魯木齊軍區，加強了內蒙古軍區，並把戰備的一線地區由沿海地區擴大到「三北」地區（東北、西北、華北地區），將在甘肅、內蒙古的國防基地撤離到內地。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論壇上利用一切機會毫不妥協地抨擊蘇聯的霸權主義。兩國之間的外交摩擦事件不斷發生，如1974年1月中國政府以蘇聯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等五人在北京從事間諜活動為由，將他們驅逐出境。作為報復，蘇聯政府也立即驅逐了中國駐蘇使館隨員關恆廣。等等。

雖然從1969年10月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仍在持續進行着，但1975年雙方談判代表有所更換，級別略為降低。至1978年6月，中蘇雙方共進行了九年十五輪談判，由於雙方在邊界問題立場上的分歧無法彌合，談判徘徊不前，始終未能達成任何協議。不過，儘管談判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兩國邊界上也沒有再發生武裝衝突。

其間，雙方還各自做出了一些示好姿態。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會見了參加中蘇邊界談判的蘇聯代表團副團長，對他說，我們應當好好談判，談出個友好睦鄰關係。要有耐心。要文鬥不要武鬥。[42]表明了中蘇爭論不應導致邊界衝突，不應妨礙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態度。11月，中蘇兩國重新互派大使，周恩來在接見蘇聯新任駐華大使時指出，1969年9月在北京機場會見柯西金時提出的雙方恢復政務載波電話、互派大使、恢復貿易談判三件事，中國方面都做了，兩國關係總比一年前有點改進。同時就中蘇邊界談判問題闡明觀點：現在關鍵在於應就爭議地區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達成協議。[43]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作家斯諾，當斯諾詢問中國與俄

42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42。

4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12。

國的問題是否打算解決時，毛澤東表示：俄國的問題總也要解決。總要雙方都願意才行，只一方願意不行。翌年3月，蘇方在未就兩國總理北京機場會見達成諒解的諸項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又提出了關於維持蘇中邊界現狀的臨時措施新方案。對此，經毛澤東批准，中方的對策是，歡迎蘇方的迎合態度，但只能把蘇方的方案與中方的草案合成為一個臨時措施的協議，才能對討論邊界走向和結成中蘇邊界新的條約有所促進。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曾請訪華的越南勞動黨代表團捎轉口信，表示希望到中國來談一些事情。[44] 1974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談話時表示，當前仍要繼續強調備戰。並問：如果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要來談，應如何做？周恩來回答：如蘇聯領導人真想來談，可作考慮，但我方不主動去請他。毛澤東表示贊同。[45] 1975年12月27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三人無罪，罪在上級」，「請他們吃一頓飯，歡送」，中國釋放了1974年3月越入中國境內的蘇聯武裝偵察直升機和三名機組人員。

當然，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也清楚地看到，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和中東而不是亞洲，其主要對手是美國。蘇聯要想跨越西伯利亞廣袤的荒原去與中國作戰，實際上很困難。因此，中國領導人在同美國、歐洲國家的交往中，不厭其煩地陳說蘇聯才是對歐洲的真正威脅，一再勸歐洲人注意蘇聯。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心中也仍然存在着極大的憂慮，擔心美國「踏着中國的肩膀跑莫斯科」，與蘇聯緩和，搞新的慕尼黑協定出賣中國，將「蘇聯這股禍水」引向東方。[46] 這種矛盾心態貫穿整個1970年代，並在外交活動中充分顯現出來。

1975年5月鄧小平會見巴基斯坦外賓時的談話，概括了當時中國對蘇聯的基本判斷。他說：蘇聯在東邊的一百萬軍隊，第一是對

---

4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178，23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42。

45 陳東林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5005。

46 1975年4月20日毛澤東會見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談話記錄，1975年9月21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談話記錄，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記錄。

付美國，也是對付日本，當然也是對付中國的。但我們不排除蘇聯搞小動作。所謂小動作，無非是像珍寶島事件那樣。我們還是要作準備的，不僅是為對付蘇聯的一百萬軍隊，而是要準備兩個超級大國打世界戰爭。這種戰爭真正要來，恐怕危險主要還是來自蘇聯，美國在世界戰略上處於防禦地位。蘇聯想從次大陸打開一出海口，這是肯定的。[47]這種思路直到1980年代初由於陳雲的提出才進行了修改。

2 中美緩和在國內產生的分歧與影響

1966－1969年，中國閉關鎖國搞「文革」，政治局勢基本不受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政治勢力大致上是三足鼎立：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集團，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江青為首的「文革」集團。毛澤東就是這個鼎身。但是，在他做出中美關係緩和決策後，國內各種政治力量都開始緊張地思索，評估着自己權益的得失。

毛澤東做出緩和中美關係的抉擇，其首要原因當然是像尼克松面對他時所說的「你是兩害擇其輕」。這時候，他的不受羈絆的個人性格就起到了作用。毛澤東給人的公開印象往往是「反帝反修」毫不妥協的鬥士，這一點尤其在中蘇論戰中表現出來。但他的內心深處，卻對美國的鼓勵自由發展的靈活體制頗有好感，而厭惡蘇聯管得死死的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代，他就曾對美軍觀察組成員謝韋思說過，未來中國的工業化必須有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中國可以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並以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作為美國投資和貿易的「補償」。[48]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係時談到蘇聯的弊病和美國的制度，也曾經不加掩飾地說，美國這個國家很發

47　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91。

48　董志凱等：《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114－115。

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實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這麼一個發展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來我們也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49]在與尼克松會談時他說，我喜歡右派。這可以視為是國家利益需要的使然，也可以說是他內心的獨白。

周恩來無疑是堅決支持中美緩和的。但這種緩和決策的動力，其唯一的來源卻是毛澤東。周恩來的努力事實上只起促進撮合的作用，有時他恰恰要做出毫不妥協地對美、蘇進行鬥爭的姿態，以避免引起極左派的攻擊和毛澤東的誤解。例如在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問題上，儘管周內心十分希望這樣做，但他還是不露聲色地否定了外交部的請示報告。其他一些老帥們在打開外交局面上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雖然現在我們看到1969年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在受毛澤東委託研究國際戰略問題時曾經提出過一些好的建議，陳毅並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50]但實際上這種作用被後人誇大了，他們當時報告裏說得更多的是戰爭——包括中蘇戰爭——的不可避免。在毛澤東拍板之前，周恩來的主要作用是積極地把各種有利於中美關係緩和的新動向報送毛澤東，悄悄地促成毛澤東做出邀請尼克松訪華的重大決策。在毛澤東定案之後，周恩來顯示出了空前的積極性，幾天內旋風般周遊各國將這一情況通報僅有的幾個鐵桿兄弟黨——阿爾巴尼亞、越南和朝鮮。

中美關係解凍將結束中國四面受敵的狀況，其有利於國內經濟由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逐漸向重視沿海地區的常規建設轉化。這種前景的實現，勢必對國內支持備戰的林彪集團是一個打擊。

林彪本人對中美關係緩和持何種態度，由於他的沉默寡言的性格及很少出席會議，而沒有留下甚麼可資佐證的材料。但是據說林彪也曾私下表示過，周恩來和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吃虧的，栽跟斗的。有

---

4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88。

50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四十二輯，頁72、87。

部紀實著作說林彪集團的成員在這個問題上表過態：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後，達成了尼克松訪華的協議。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立即回覆了一封萬言長信，對中國的做法表示質疑和反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這封信的會議上，李作鵬知道林彪對於周恩來搞跟美國改善關係的政策十分不滿，便公然稱讚說阿爾巴尼亞同志的信寫得多麼好啊，是一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只是他發言過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及葉群等人，並沒有站出來支持他的觀點。[51]

1971年5月29日，周恩來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情況，寫出〈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告針對黨內有人提出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釋。由此可以看出，對於中美緩和，黨內確實存在很大疑慮，這也包括林彪等人。如有人認為，中美會談不同一般，會影響美國人民的鬥志。有人問，中美會談會不會妨礙印度支那抗美戰爭和巴黎談判？尼克松、基辛格這一手是否有詐？表面談和，實質不變，以渙散我備戰士氣，小則放蔣出籠，大則引蘇東向。報告指出，美國群眾運動，在尼克松上台後，確是高漲，重點在反戰和反種族歧視。有人說，運動處於拋棄改良走向革命的過渡之中。他們正好以從越南撤軍和從台灣撤軍，走向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這兩張牌動員美國群眾，影響當權派和反對派的政策，增長群眾的鬥志。幾年內，還不能預言美國有爆發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戰爭，中美人民來往和兩國會談，正是動員美國群眾、考驗群眾領導的好機會。中美會談對印支抗美戰爭和巴黎談判可能有一時波動，但談清楚了會更有助於印支抗戰和巴黎談判，因為尼克松已認清美蘇爭霸的焦點在中東和歐洲，不是在遠東。中美會談如有進展，必將有助於印支撤軍和巴黎談判。即使步驟有先後，也更利於支援印支抗戰。今天的形勢是我們不斷同帝、修、反鬥爭勝利的結果，也是美帝內外交困和美蘇爭霸世界的必然趨勢，姑不論美帝有無欺詐的可能，我現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鬥、批、改階段，戰備不懈是我經常任

51　陳敦德：《毛澤東尼克松在1972》（北京：崑崙出版社，1988），頁216、145，

務，若有風吹草動，正好鍛煉我動員和作戰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動面目，提高人民覺悟。反之，如能談好，至少可使兩霸相爭加劇，我可增強戰備力量。敵戰方能言和，談和更需備戰。[52]

在對待越南戰爭的戰略上，毛澤東與林彪也有着細微的差別。1966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武元甲、黎筍時，主張在越南最南方金甌半島發展一點主力軍，「從打小勝仗到打較大的勝仗，再到打大的勝仗」。他說：「單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動，我看也不行，部隊不能天天打仗。」而1965年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後則主張越南進行長期的游擊戰，他為越南領導人設計的戰略方針，總括為一個字——熬。即用游擊戰和美國人拖下去，既不進行正面主力作戰，也不談判，十年二十年拖下去。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越南領導人批判林彪說：我們過去黨內意見也不統一。一派人就是勸你們把美國抓住不放，一個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擊戰，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勸你們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敗敵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麼舒服的呀！不是這樣，你們談判桌上得不了這樣的結果。[53]

在沒有更多具體資料之前，我們只能判斷，毛與林的分歧，還只是戰略認識的不同，至多說明林彪集團最希望這種與美國打有限戰爭的戰略能夠保持下去，以利於軍人集團在長期而緊張的備戰狀態中控制權力。除此以外，未見到其他可以佐證林彪反對中美緩和的直接材料。但是，林彪出逃之後，毛澤東、周恩來都曾指摘過林彪反對調整對美政策。1972年7月10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時說，林彪想到蘇聯去，現在中國人罵他賣國賊，他反對我們跟美國接近，跟你們西方接近。1972年11月27日，周恩來會見美國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夫婦談到中美關係時說：可以說，1969年是轉折點。但這個事確實耽誤了，原因是有很多干擾。中國內部也有干擾嘛，就是林彪。[54]

---

52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742。

53 司任：〈毛澤東與「出逃」前的林彪〉，《傳記文學》，1995年第2期，頁14。

5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64、565。

吳法憲認為，在整個中美關係轉變的過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外，沒有說過任何其他的話。毛澤東批評林彪反對中美緩和的話，「是極不負責任的」。[55]

江青集團從其一貫主張的反美反蘇反對各國反動派的激進立場出發，自然不希望中美關係實現緩和，從而削弱其激進派的話語霸權。中美緩和和中國加入聯合國，也意味着中國將在一定程度上進入國際社會，由此便要考慮遵守一些國際遊戲規則，這對經常用「反帝反修」大棒打擊別人、標榜自己的江青集團，是一種壓抑力量。其次，中國調整對外戰略，中美關係解凍，是震動國內外的大事件，其勢必使周恩來的形象得到極大提高，周掌握的外交部門也將獲得空前的權力提升，這對江青集團而言無疑是個威脅。只是，既然這個決策是毛澤東做出的，他們又自認為是毛的最忠實信徒，也就不得不接受下來。其實就江青的個人性格來說，倒是具有濃厚的親西方色彩。她青年時代棲身於十里洋場的上海電影界，內心深受西方世界的薰陶，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直至她成為中共內部最堅定的「左派」後，仍然會強烈地表現出來。由此，江青身上的矛盾暴露得也很充分：一方面，她常常在不同場合攻擊中國的外交、外貿部門「崇洋媚外」，「甘心當帝國主義的走狗」。這在她反對擴大對西方貿易的「四三方案」時最為突出，甚至把美國康寧公司向談判引進彩色電視生產線的中國代表團贈送玻璃蝸牛的行為說成是暗諷中國「爬行」，是對中國的侮辱。另一方面，她又熱衷於西方的文化和物質，要求外貿部門給她進口西方電影、西方照相器材。甚至在尼克松訪華時親自越權安排挑選演奏西方樂曲。與江青相比，張春橋、姚文元則是堅定的反西方派，時時在中美關係緩和的問題上冷言冷語，施放攻擊周恩來的冷箭。

國內的政治需要影響着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的外交政策反過來又影響着國內的政治形勢。內政外交的一番互動之後，中美兩國的握手言和，使國際格局呈現出表面上的美蘇中三足鼎立的局面；與此同

55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752。

時，國內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卻隨着林彪集團的垮台變換為兩極天平。毛澤東則成為天平的支點。他總的傾向是利用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但又時刻警惕着避免出牌的權力為美國和國內的其他人所左右，並且偶爾還會利用時間差來敲打一下走得過快的周恩來。而江青集團則在嫉妒和仇視中等待着毛澤東的這種敲打，準備撲上去給予周恩來致命的一擊。周恩來的務實集團處於江青勢力的抨擊和毛的監督的夾擊之中，這種狀況使得周一直以平衡大師的高超技藝，戰戰兢兢地走着鋼絲。

3 結束越南戰爭進程中的中越、中美複雜關係

1970年代初世界形勢最大的變化，就是越南戰爭的結束。中國在這個進程中採取的態度，一方面是繼續支持越南進行戰爭，另一方面是勸說越南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做出讓步，給美國以脫身機會。毛澤東從1968年起逐步改變了完全用戰爭手段解決越南戰爭問題的設想。在中國領導人看來，通過談判讓美國「體面地」撤出越南戰爭，實際將有利於越南以後的統一戰爭。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說：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麼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由此，中國一方面繼續保持中美之間的接觸，同時抗議美國在越南北方的野蠻軍事行為；另一方面盡量滿足越南的一切物質要求，同時勸告越南放棄過高條件，適時地結束戰爭。正如在中國支持下北越堅持了越南戰爭的前半段一樣，後半段的美越邊談邊打也是在中國的影響下進行的。

美國尋求與中國緩和關係的考慮中，解決越戰問題是一個重要因素。尼克松政府期望通過中美和解為美國提供外交上的機會，直接由中國對越南施加壓力，使美國盡快脫離戰爭的泥淖。因而，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的議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戰略基礎外，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越南戰爭。基辛格在與周恩來會談時着重解釋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試圖讓北京說服越南方面加速和

平談判的進程。為了把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與美國結束越戰的願望聯繫起來，基辛格告訴中國領導人，越戰結束後，美國準備在短期內從台灣撤走三分之二的軍隊。但是，周恩來沒有為此而答應敦促越南改變談判立場，並且鄭重指出：結束越南戰爭的唯一途徑是美國撤出自己的軍隊。否則，戰爭一天不停，中國就支持越南一天。基辛格走後，外交部在發往各駐外機構的《外交通報》中闡明中國的對美方針時，特別強調說：中國將「堅持既定的原則立場，絕不會拿原則作交易」。[56]

尼克松訪華前，美國再次開展外交攻勢，要求中國支持其對越施加軍事壓力的方針。對此，中國方面在積極準備接待尼克松的同時，對美國的這種方針採取了既反對又不介入的謹慎態度。1971年12月，針對越南北方軍隊大量集結的情況，美國政府不顧輿論和國會的憤怒抨擊，對北緯20度線以南的越南供給基地進行了兩天的轟炸，同時向蘇聯和中國發出強硬的照會，警告說，如果北越發動攻勢，就會招致最嚴重的報復行動。中國沒有立即做出答覆。但是，當1972年1月初為尼克松打前站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一行到達北京時，周恩來即重申了中國對越南的道義上的支持，並敦促美國迅速結束越南戰爭。當時，黑格轉達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幾點口信，其中關於越南問題，黑格說：美國政府最近決定對北越領土進行空中襲擊。美國已經做了種種讓步，而越南還在襲擊。「對所有這些行為的解釋只能是，河內努力要侮辱美國，而這種侮辱是任何大國都不能接受的」。對此，周恩來一方面表明中國將為謀求中美高級會談取得積極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指出，在越南問題上，中美之間有根本分歧。美國對北越大肆轟炸，越南是受害者，中國當然支持。事實上不是河內侮辱美國，而是美國侮辱了河內。大國可以任意侵略小國，小國進行自衛卻成了「侮辱」，這是

56　NSC files,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69。

甚麼邏輯？美國這種政策不僅動搖不了越南決戰決勝的意志，而且為美國自己撤軍和謀求釋俘製造了障礙，也給總統的訪華帶來了不利因素。[57]1月25日尼克松發表了敦促越南恢復和談的公開講話，同時與蘇聯和中國聯繫，表明美國的讓步已經到達極限，如果河內發動軍事攻勢，美國將做出強烈反應。周恩來通過私下渠道措辭尖銳地回覆說：中國不了解越美和談內情，中國自己也沒有就越南問題對美國做出過任何許諾。[58]2月，在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喬冠華在與尼克松、基辛格會談中討論越南問題時，仍然堅持不干預越美談判的立場。周恩來強調說：最緊迫的是印支問題，如果印支戰爭不停下來，中國只有援助他們。「我們只有同情和支持他們的義務，沒有干涉他們的權利，或代替他們提出主張和代表他們談判的權利」。[59]

1972年3月底，越南軍隊在越南南方戰場發起全面進攻後，尼克松政府一方面採取報復行動，大規模恢復對越南北方的空中轟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蘇聯和中國施加外交壓力，希望蘇中兩國能迫使河內回到談判桌前。面對美國的壓力，中國方面繼續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戰，同時不介入和談問題的立場。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國，指出美國採取軍事行動以促進和平解決越戰對於尼克松政府的極端重要性，並提醒說，美國在印度支那受辱，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對此，中國除了以外交部名義公開批評美國對越南北方的空襲，還在4月12日通過秘密渠道覆函美國，對越南表示聲援，於重申中國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同時，警告美國不要在越南問題上「越陷越深」，[60]同日，周恩來接見越南駐華使館臨時代辦阮進，聲明中國政

---

57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組為尼克松訪華安排的經過〉，載《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頁73－74，79－81。

58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ited, 1979), 1102-1103, 1052, 1104.

5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364。

60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1113-1115, 1118-1119, 1123.

府和人民堅決支持越南政府聲明的嚴正立場，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61]

此後，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援越行動。5月9日和10日，針對美國實施對越南港口布雷和海空襲擊的行動，中國領導人連續召集外交部領導成員會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對策。5月13日和14日，周恩來與越南外長春水會談，商議由於美機轟炸造成的交通運輸受阻問題。除了拒絕蘇聯使用中國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來答應在鐵路修復、開闢海上隱蔽航線、增加武器裝備援助、搶運糧食和汽油以及掃除水雷等問題上，統統給予幫助。18－25日，國家計委、軍委工辦在北京召開全國援越任務動員會。參加會議的有26個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交通和軍工生產的負責人和224個企業的代表。會議對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務進行了認真研究，對要求提前的133項落實了98項，新增加的120項安排了92項，其餘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進一步發動群眾積極安排落實。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在會上指出，增加援越物資生產，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國鬥爭，是一項緊急任務，「我們必須千方百計地充分滿足他們的需要」。援越任務是「光榮的、重大的、長期的」，「不能討價還價」，必須認真研究，安排落實。[62]

此期中國對越南最大的幫助是掃清海防港水雷。海運是援越物資進入越南的主要渠道，據美國方面估計，海防港接受的援越物資是鐵路運輸的七倍。當美國以7963枚水雷封鎖越南北方沿海地區所有港口和河口時，越南面臨困境。越方緊急要求中國幫助掃雷。經商議，中國海軍組織由12艘掃雷艇、4艘保障艇和318人組成的掃雷隊，自5月28日起陸續進入越南。掃雷隊工作一年多，出海586艇次，航程2.78萬餘海里，相

6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1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 22, 181-182.

62　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務動員會議上的講話。

繼疏通了越南北方的各條航道。[63]正是由於中國的幫助，1972年進入越南的援助物資以及從越南北方運往南方的物資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64]用參加中越談判的越方代表外貿部副部長李班的話說，中國這次向越南提供的補充援助，「對一些主要物資可以說百分之百地滿足了要求」，越南黨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興」。[65]

當1972年在越南問題上的軍事行動及和平談判都進入到最激烈、最關鍵的階段時，尼克松於5月訪問莫斯科，雙方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美蘇接近的趨向威脅到中國發展對美關係的外交戰略，中國希望美軍及早撤出越南，以進一步實現聯美抗蘇的外交目標。由此，中國對越南的外交方針，特別是對巴黎和談的態度發生微妙變化。同時，中國也對越南進行了力所能及的勸說。

在1972年5月美蘇最高級會談之前，周恩來仍然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國不過問巴黎和談，支持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並贊成搞掉阮文紹政府。[66]此後，7月6日周恩來會見越勞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越美談判代表春水和李班等人時指出：越南戰爭是繼續打下去，還是美國有所鬆動，談判解決，今後四個月是關鍵時刻。幾天後他又告訴黎德壽，「從1968年開始，你們邊打邊談的策略是正確的。起初，當你們開始談判時，我們一些同志認為你們選擇的時機不對」。「不過，毛澤東同志說，你們當時進行談判是對的」，「只有你們才知道談判應在甚麼時候進行。你們的決定是正確的，這也說明毛澤東同志比我們更有遠見。」周恩來還介紹中國內戰時的談判經驗，指出應與

---

63 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553－555；春水：《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142－147。

64 越南國防部軍史研究院編，廖賢春等譯：《越南人民軍歷史》，第二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292。

65 1972年6月28日葉劍英、李先念與李班（Le Ban）等人談話記錄，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1972年，卷號53，頁73－79。

66 1972年6月18日周恩來與黎德壽談話記錄，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1972年，卷號52，頁19－36。

其他方面的首腦談，並建議河內直接與阮文紹及其代表談，認為既然阮文紹還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還沒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67]在越南放棄談判而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時，中國方面通過這種表態，提醒越南恢復談判，並示意中國不支持越南提出的停戰條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國撤換阮文紹的政治主張。12月18日美國動用包括幾百架B－52轟炸機在內的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空軍力量，開始對河內、海防和整個越南北方進行密集轟炸後，越南被迫同意美國的要求，重新舉行會晤。中國為防止越南問題再次出現反覆，勸告將赴巴黎談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談成功。12月29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阮氏萍。毛澤東說，如果你們談好了，那麼不但南越，而且北越，可能跟美國人搞成某種程度的正常化。現在有一些所謂共產黨人就說你們不應該談判，應該打下去，打他一百年，就叫做革命，不然那就是機會主義。[68]周恩來則在12月31日會見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時指出：尼克松還是想走的，所以這次談判要認真去談，目的是要談成。翌年1月3日，周恩來再次提醒黎德壽注意：「尼克松有許多國際國內問題要解決，看樣子他還是想從越南和印度支那脫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後，形勢會起變化。」[69]

中國在勸說河內的同時，也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在越美巴黎和談恢復以後，10月25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帶信給美國大使，明確責備西貢在製造麻煩，表示相信華盛頓的誠意，並勸告美國抓住目前「極為有利的時機以結束越南戰爭」。[70]當美國因南越阮文紹政權反對而拖延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時，中國再次「以最憤怒的語言」

6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34；1972年7月12日周恩來與黎德壽會談記錄，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 22, 182-184.

68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856－4857。

6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69，571。

70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1396.

譴責南越阮文紹政權，要求美國「堅決制止」南越阮文紹政權的行為，同時也提醒白宮，如果美國延長戰爭，拖延談判，「那麼人們又將如何看待美國自稱願意努力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聲明呢？」[71] 在11月13日基辛格宴請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再次希望北京說服越南讓步時，喬冠華勸告美國做出讓步，說大國是有能力採取寬大態度的：「不應該僅僅為了得到南越而喪失全世界。」[72]

經過艱苦的討價還價，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美國、南越阮文紹政府四方在巴黎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持續十年的越南戰爭走向結束。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春，北越軍隊控制了越南南方全境，越南實現了統一，北越贏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

1973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裏會見了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黎德壽、阮維楨。當談到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時，毛澤東說：這個美國人不那麼頑固，就沒料到居然談出這樣一個協定，美國歷史上聽說是少有的，事實上承認自己失敗了嘛！那個時候，我們有些朋友不理解，為甚麼我們要請尼克松到北京來。你不打敗敵人，不打痛它，不是這樣，你們談判桌上得不到這樣的結果。暫時休整一個時間，很有必要，只能是這樣的方針，列寧從前就是這麼做的。[73]

4 設計「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構想與中美建交徘徊不前

1972年5月尼克松訪問莫斯科，雙方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美蘇接近的趨向引起了中國的警惕，下決心進一步緩和中美關係，以防止美蘇聯合對付中國。越南戰爭的結束，是一個機遇，使中國從有限地聯合蘇聯支援越南的立場，轉變為有限地聯合美國，共同抵禦正在日益崛起而對中國威脅更大的蘇聯霸權主義。在世界上形成

---

71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1403.

72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1413.

73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864。

的新的不平衡大國三角關係中，美國、蘇聯各為勢均力敵的一方，而作為第三方的中國，就其實力而言，顯然還遠不足以獨立對抗另兩方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如果中國支持某一方，則會使美蘇抗衡的天平發生傾斜變化。三個大國之間互相打對方牌的遊戲，是這一時期的主流。毛澤東聯合美國壓制蘇聯的「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構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1973年2月15日至22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周恩來、外交部長姬鵬飛等同基辛格進行了四次會談，着重討論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基辛格表示，美國設想在尼克松第二任的頭兩年削減在台灣的軍事力量，後兩年用類似日本方式建立外交關係，但同台灣保持民間往來。他再次強調美中雙方面臨的共同威脅是蘇聯。2月17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他稱讚基辛格在越南問題談判中的努力說，你的事情幹得好，到處飛。越南問題算是基本解決了。在談到中美關係時，毛澤東說：「只要目標是一致的，我們不會傷害你們，你們也不會傷害我們。」可以「摘一條橫線……實際情況是，有時我們要批評你們一下，你們也要批評我們一下。這就是你們總統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共產黨！』我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帝國主義者！』有時我們要說這類話」。毛澤東還說，我們希望你們跟歐洲、跟日本合作。[74]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向美國明確提出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一條線」和團結這條線周圍「一大片」國家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戰略構想。基辛格說，我認為我們雙方應該忠於各自的基本原則，實際上如果雙方講同樣一個調子，只會使局勢混亂。我對（周恩來）總理說過，在歐洲，你們出於自己的原則，可以講得比我們更堅定。針對美國以蘇聯的威脅恐嚇中國的意圖，毛澤東指出：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其政策是聲東擊西。他告誡說：美國總有些人想把禍水東引。另一方面毛又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能否

7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367。

前進的癥結所在。美國如果想同北京建交，原則上必須同台灣斷交。但這並不是無法解決的難題。在毛澤東確定的這種靈活方針的指導下，2月22日中美發表公報宣布：「經商定，每一方將在不久的將來在對方的首都建立一個聯絡處。」5月1日，中美雙方互設的聯絡處正式開始工作，雙方的聯絡處主任黃鎮和布魯斯分別到達華盛頓和北京任所。

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時又提出：「我看，美國、日本、中國，連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歐洲，都要團結起來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團結。」[75]

「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構想確立之後，毛澤東更加注重爭取處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之中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把它們看作是反霸鬥爭中可以團結的重要力量。在毛澤東看來，儘管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繼續維持殖民剝削殘餘等方面還保持着帝國主義的特徵，但是他們同樣受到霸權主義的控制、威脅和欺負，他們同霸權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與霸權主義侵略擴張之間的矛盾。這些國家是戰爭的制約因素之一，屬於國際反霸、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軍。因此，中國應大力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毛澤東反覆向來訪的西方國家首腦指出：「你們還要注意，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口裏講要打中國，實際上想要吞併歐洲，危險喲。」[76] 同時，中國對歐洲試圖從中蘇對峙中取得好處的投機做法也十分敏感，多次警告歐洲不要投機。1973年6月姬鵬飛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訪西歐國家的中國外交部長，先後會見了英國首相希思、法國總理梅斯梅爾和總統蓬皮杜。在會談中，姬鵬飛揭露了蘇聯分化瓦解西歐的陰謀，指出：綏靖主義到頭來只能害人害己，中國政府已做了應付最壞局面的準備。法方則辯解說法蘇發展關係，決不是為了讓蘇聯放手對付東方。[77]

但是，儘管中國這一時期對沒有建交的美國給予了很大熱情，由於美國不願意徹底割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

---

75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932。

76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97。

77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889。

係的進程處於徘徊中。1974年4月6日至19日，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時，與美國代表團團長基辛格談到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基辛格推託說，美國正在研究如何實現「一個中國」的設想，但尚未想出辦法來。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表示：中國希望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能較快地解決，但也不着急。[78]

1974年8月福特就任美國總統，辦公的第一天就約見了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12日晚，福特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表示：「我保證繼續信守上海公報的原則，建立在這些原則基礎上的新關係已經表明是符合雙方的重要而客觀的利益的，而且已經成為世界局勢中一個持久的特徵。」[79]儘管福特表示要繼續執行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並打算在自己任期內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但後來在實際中，他並未下定決心採取實質性的步驟，來消除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根本障礙——台灣問題。

1974年11月25日至29日，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第七次訪問中國。25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基辛格，於介紹自己的病情後說：這次由鄧小平副總理和喬冠華外長代表中國政府跟你進行談判，給我一個機會休息。談話中，周恩來明確向基辛格指出：「我們有一條共同戰線，就是對付『北極熊』。」「『北極熊』主要是對你們的，不像你們所估計的。」[80]26日至28日，鄧小平和基辛格連續舉行會談。基辛格提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處境與其他國家不同：一是美國同台灣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二是美國國內存在着一股親台勢力。因此，（1）美國願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要在台灣設「聯絡處」；（2）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台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台「防禦關係」。基辛格這番話表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確有後退。鄧小

78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954。

79　朱洪：《黃鎮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頁34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368。

8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369。

平當即指出：從本質上說，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中國不能接受；至於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根據〈聯合公報〉的原則必須加以廢除；在美國同台灣斷交、廢約、撤軍後，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那是中國的內政，用甚麼方式解決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81]

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再次來中國訪問，為接替尼克松的美國總統福特訪華做準備工作。鄧小平在會談中指出：毛主席多次強調，中美之間當然有雙邊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國際問題。對待國際問題，要從政治角度考慮，才能把問題看得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達到協調。我們強調，蘇聯的戰略重點在西方，在歐洲和連接歐洲的中東、地中海，甚至波斯灣。對蘇聯戰略形勢的判斷，不是一個誇誇其談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質問題。[82] 21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他分析國際形勢說：現在世界不太平，風雨要來。風雨欲來燕子忙。風雨可以推遲，但要阻止風雨難。毛澤東還說：敦刻爾克戰略不是不可取的，我們就是敦刻爾克，要讓敵人佔領北京、天津、武漢、上海，這樣，我們就勝利了，敵人就失敗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然後取勝。[83] 兩人的意思，都是敦促美國從世界局勢着眼，在台灣問題上讓步。

此後，12月1日，福特總統訪華，與毛澤東就國際問題進行了談話。毛澤東說，兩國關係應該繼續。我看現在我們兩國之間沒多少事，今年、明年、後年沒有事，以後可能會要好一些。福特表示，中美要努力協調行動，以便採取強硬態度對付蘇聯擴張主義的挑戰。毛澤東表示贊同。鄧小平與福特舉行了三次會談。福特說，由於美國國內形勢的需要，解決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須推遲到197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後再仿照「日本方式」採取行動。他重申「期待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針對美國在會談中採取拖延的方針，鄧小平明確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斷交、廢約、撤軍三個原則，

---

81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998、4999。

82 〈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2。

83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5073。

但美台間的民間貿易關係可繼續保持，關於用甚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應該由中國自己決定。[84] 12月7日，福特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發表講話，提出了被稱之為「新太平洋主義」的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六點政策綱領，強調了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並重申在亞太地區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區反對霸權主義的立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關於美國對蘇搞「綏靖主義」的批評。但是，由於美國始終沒有在台灣問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加上1976年中國國內開始「批鄧」，鄧小平失去了主管外交的權力，周恩來、毛澤東又相繼去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的總統競選中失利，致使中美關係處在原地踏步的狀態。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中國聯美抗蘇的外交方針取得了一定成效，使中國周邊面臨的巨大壓力得到緩解，開拓了一個對外關係新格局。但是，由於過分強調對蘇聯的抗擊姿態，對蘇關係缺乏靈活性，在與美國、歐洲的交往中有些被動，某些問題上不得不對他們做出讓步，同時也引起了越南、朝鮮等與美國對峙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不滿。相反，美國、歐洲則利用打對蘇緩和牌，在台灣等問題上向中國謀取利益；或是打中國牌，向蘇聯討價還價。所謂「一條線」、「一大片」的構想，只是一個鬆散的立意，並未能切實地得到實現。

三　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思想，聯合所有國家反對美蘇霸權

1　「三個世界」和「兩個中間地帶」思想的由來

如果說毛澤東提出的聯美反蘇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是中國1960年代「反帝反修」戰略的改變，那麼他稍晚提出的「三個世界」

84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5082。

的思想，就是中國1960年代支持亞非拉國家獨立和解放戰略的轉變。進入1970年代，世界上絕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已經獲得了獨立，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1960年代那種「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洶湧高潮已經過去。如何用新的旗幟來號召和統率多數國家？又如何把這面旗幟與反對蘇聯聯繫起來？毛澤東一直在觀察思考着。這一時期他對國際問題投入了空前的熱情，多次批發各種國際動態資料。他敏銳地看到，當今世界，由於美國、蘇聯的爭奪霸權，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地被捲入其中，有的受到經濟制約，有的受到政治壓迫，還有的直接被軍事控制。根據程度不同，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國家。這兩大類之間，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結盟不再是不可跨越的鴻溝。於是，他提出了重新劃分「三個世界」的理念。

「三個世界」術語的明確提出，始於1950－1960年代。其中「第三世界」一詞是最早提出，也是使用最廣泛、沿用最久的政治術語。沃爾夫・菲利普在〈何謂「第三世界」〉一文中提出，是法國人口統計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艾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於1952年首次使用了「第三世界」這一術語。[85] 1960年代，此術語開始逐漸為西方學者所接受。1970－1980年代被普遍採用，並沿續下來。關於「第三世界」的界定，索維最初使用的含義是「第三等級」，指的是一種「被忽略、待開發、具有革命潛力」的力量，顯然，這裏帶有某種階級界定的色彩。在外交上，「第三世界」又稱「第三種力量」、「第三種勢力」，由法國總統戴高樂首先提出，1950年代被世界一些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所接受，聲稱自己作為獨立國家集團，是「冷戰」期間東西對抗中的「無核武器的第三種力量」。這類界定表明，「第三世界」在當時代表了獨立於美國、蘇聯兩大力量之外的第三種政治勢力，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民族主義內涵。此外，「第三世界」還有一層

85 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克勞德・鮑迪特（Claut Bourdet）早在1949年4月就已創用了這個詞，但大部分西方學者都確認「索維1952年創用」說。

意思，那就是「不結盟」。1965年法國學者皮埃爾·雅勒（Pierre Jaiee）從經濟類型劃分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範圍——拉丁美洲（包括古巴），整個非洲、亞洲（包括以色列、日本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就已把中國納入了第三世界。

關於「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1966年美國華盛頓大學歐文·路易斯·霍羅維茨教授在他的《發展中的三個世界》一書中第一次提出範圍劃分：第一世界是「由美國，包括其西歐聯盟和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衛星國所控制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基本持點就是經濟發達，它不僅是資本主義者，而且還是殖民主義者；第二世界則是「由蘇聯，包括其東歐聯盟和亞州部分地區的衛星國所控制的世界」，這個世界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上實行民主集中制。」[86]這種界定是對二戰後美蘇兩極對峙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認定，隨着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而實際上已經逐步失去意義，因而在世界上並沒有很大影響。

毛澤東使用「第三世界」和「三個世界」的概念比較晚，在此之前他建立的是「兩個中間地帶」的認識架構。早在1946年8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就曾經提出過「中間地帶」的思想，他將世界政治力量劃分為美國、蘇聯和歐亞非資本主義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三種。[87]但第二年由於國共戰爭爆發，毛澤東立即接受了蘇聯關於「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的論斷，排除了「中間地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布了新中國倒向蘇聯陣營的「一邊倒」方針。此後，毛澤東雖然在具體判斷上有些微調，但「兩大陣營」的立足點沒有變化。中蘇分裂後，在1964年1月5日同日共中

86　以上均見李丹慧、陳東林：〈論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思想〉，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學術部編：《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120。

8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193。

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1月17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談話中，毛澤東再次提出和申明了「兩個中間地帶」的看法：在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之間，亞非拉國家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大洋洲國家和日本是第二中間地帶。毛澤東同時還強調了「兩個中間地帶」反對美國控制及東歐各國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認為「第二中間地帶」是反帝的「間接同盟軍」。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現有的資料，在這兩次談話中，毛澤東不是簡單地回歸「兩個中間地帶」，而是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提出了中間地帶有兩部分和兩個「第三世界」的觀點：

> 美國現在在兩個第三世界都遭到抵抗，第一個第三世界是指亞、非、拉。第二個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壓迫別人，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國的壓迫，同美國有矛盾。[88]

但這種觀點很快就被「文革」中的「反帝反修」極端戰略淹沒。

1970年6月和7月，毛澤東在幾次接見外賓談話中又問到「三個世界」的概念和含義問題，並且表示，我們願跟你們非洲站在一個行列，就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嘛。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89]這是他第一次明確表示中國屬於「第三世界」。這時候，他還沒有形成自己系統的「三個世界」框架，而是在了解和改造這一概念，把兩個中間地帶的概念向此過渡。同年10月1日毛澤東在與緬甸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指出，「第一中間勢力是第三世界」，要爭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間勢力」，「這對我們有利」。

1973年，毛澤東對「三個世界」的劃分及其含義有了比較成型的表達。3月26日，他對喀麥隆外賓指出：亞非拉都叫第三世界，但日本除外。6月22日，他對馬里外賓說，我們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

---

88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13－517。

89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670。

叫做發展中的國家。7月29日，他會見剛果外賓時，把蘇聯同全世界帝國主義並列作為壓迫第三世界的國家，並再次指出日本不屬於第三世界。[90]這樣，他的「三個世界」劃分範圍和概念初步形成：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其他發達國家和亞洲的日本是第二世界。但這只是小範圍探討中他的分散認識，並沒有形成體系和宣示。因此，不僅中國的外交部門沒有對此予以重視，就連主管外交、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親耳聽到這些話語的周恩來，也沒有深刻理解。

2 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周恩來、王洪文陪同會見。在談話中，毛澤東明確、完整地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先說：「希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第三世界人口多啊。」然後問卡翁達：「誰是第一世界？」卡翁達仍然按照舊有的中國「反帝反修」口號回答說：「我想應該是那些剝削者和帝國主義者的世界。」毛澤東又問：「第二世界呢？」卡翁達回答：「是那些已經變為修正主義分子的人。」周恩來跟着附和說：「總統閣下說得很準確。」毛澤東卻委婉地反駁說：「搞不清楚呢。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卡翁達表示：「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澤東又從政治、經濟角度解釋了這樣劃分的標準：「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91]2月25日，毛澤東又在同阿爾及利

90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頁4875、4892、4899。

91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600。

亞革委會主席布邁丁的談話中補充他的觀點說：「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92]

聰明的周恩來立即改變了原來以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分陣營的提法。在毛澤東22日會見結束後，周在與卡翁達的會談中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間地帶的歷史演變過程，進一步闡發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周恩來說，禍根還是從第一世界來的，兩霸爭奪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間派，是從第二中間地帶演變過來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亞非拉。他強調說，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應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兩個超級大國。[93]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闡述了毛澤東的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

> 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着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
> 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妄圖稱霸世界。它們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時還要欺負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
>
> 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達國家的情況是複雜的。它們當中的一些國家，至今還對第三世界國家保持着各種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的關係；……同時，所有這些發達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制、威脅或欺負，其中有些國家在所謂「大家庭」的幌子下，實際上被超級大國置於附

9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79－381。

9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53。

庸的地位。這些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擺脫超級大國的奴役或控制，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的要求。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它們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都還面臨着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這些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這些國家受的壓迫最深，反對壓迫、謀求解放和發展的要求最為強烈。它們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鬥爭中，顯示了無比巨大的威力，不斷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它們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94]

這篇講話是據毛澤東的歷次指示寫成的，並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報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語：好，贊同。鄧小平還加進了一段話：「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從此以後，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就成為中國新外交方針的主要宣傳口徑。1975年1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闡述了這一思想，四屆人大還將這一思想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判了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但仍然肯定「三個世界」的思想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期僅有的幾點積極貢獻之一。

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根據1970年代世界民族獨立高潮已經過去和中美蘇三國關係發生變化所做出的新的國際形勢判斷和外交戰略抉擇。其本質是要從根本上扭轉以往外交戰略

94　〈人民日報〉，1974年4月10日。

由單純強調「反帝反修」而造成的中國在世界上孤立無援的局面，通過劃分「三個世界」，中國可以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同第二世界國家的聯合，集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國際反霸權主義統一戰線，將奉行霸權主義政策的美蘇兩國，主要是蘇聯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由於中國提出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不做超級大國，不稱霸，把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基本立足點，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取得重大進展，很快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在理論意義上，「三個世界」的劃分，實際上拋棄了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友的極左準則，向着謀求國與國之間共同利益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回歸。

毛澤東的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與他早於一年前提出的聯美反蘇「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構想是甚麼關係呢？可以這樣說，「三個世界」戰略思想支持弱小國家，反對霸權國家，是中國公開打出的一面道義旗幟、是中國外交理念的基石。因為，第三世界受超級大國壓迫的狀態在短時期內不會改變，中國的經濟落後、受美蘇威脅狀況在短時期內也不會改變，兩者的結盟有着長遠和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礎。而聯美反蘇「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則是一種互相利用的實用主義大國關係謀略操作，是中國基於自己國家利益，認為蘇聯威脅更大而考慮要打的一張牌，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利益不一定吻合。在某種場合，如在歐洲，中國需要第二、三世界國家支持美國抗衡蘇聯；在某種場合，如在越南和中東地區，中國又需要這些國家支持蘇聯與美國抗衡。「一條線」及「一大片」的構想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條線及這條線周圍一大片的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這實際上又打亂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構架。因此「一條線」及「一大片」戰略，中國並不正式宣揚。在公開場合，中國仍將美蘇兩霸並提，但實質上已只是一種形式的需要，「美帝國主義」在其中僅起陪襯作用。正如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對基辛格所說：中美要共同對付蘇聯，有時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不講不行呢。

但是，劃分「三個世界」戰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中找不到任何支持的理論依據，不僅與列寧以階級分析方法得出的「社會主義戰勝帝國主義」的時代特徵格格不入，也放棄了1960年代中共以「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劃分敵人的意識形態標準。既然如此，「三個世界」的具體劃分，也就存在着模糊區。第一世界只有美國、蘇聯，是非常明確的；但第二、第三世界中一些國家的界定，就無法解構。比如，中國將除了日本的亞洲都劃為第三世界，但無論從經濟發展程度還是與美國的軍事結盟關係，韓國、以色列都很難與北朝鮮、阿拉伯國家屬於一類。再比如，華沙條約國家中與蘇聯保持嚴密軍事結盟的保加利亞、波蘭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狀況比較落後，是否應劃到第二世界，也沒有合理的解釋。如果從國家一律平等的國際準則考慮，「三個世界」的劃分也帶有某種不結盟的結盟色彩，在國際關係變化中顯得不夠穩定，不如1950年代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通用和穩固。缺乏客觀標準和理論支持，注定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只能發揮過渡時期的過渡作用。1982年中共十二大開始，中國放棄了「三個世界」的提法，回歸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上來。但「第三世界」的提法在很長時期內仍然作為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代名詞。

3 聯合第三世界開展反霸鬥爭

197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在維護獨立和發展經濟中不斷壯大，成立了「77國集團」、「非洲統一組織」等國際組織，成為國際事務中愈來愈重要的力量。美國、蘇聯在世界上爭奪霸權的鬥爭，也給第三世界製造了新的矛盾，帶來了錯綜複雜的局面。

重新回到聯合國並且聲明自己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稱霸的中國採取甚麼樣的態度，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關注並寄予厚望。在歡迎中國代表團回到聯合國大會上，上沃爾特代表非洲國家致辭說：

「願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我們組織的生活和活動對於解決我們世界的重要問題方面會成為寶貴的貢獻，這只會對第三世界有利。」[95]

毛澤東首先針對第三世界內部的分裂和矛盾，強調第三世界要團結起來。他指出：「第三世界的國家要互相幫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只要「第三世界團結起來」，就使「日本、歐洲和兩個超級大國」「都得要注意一點」。[96]在這些原則指導下，中國首先修復了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出現的裂痕，同尼泊爾、緬甸、肯尼亞、突尼斯、布隆迪、錫蘭和加納等國恢復了外交關係；然後，在聯合國講台多次代表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發言和使用表決權，抨擊和阻止美國、蘇聯的霸權主義；同時加大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1970年代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得到了迅速發展，出現了一個高潮。

中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進一步密切。1972年2月後同中國新建交的國家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孟加拉、馬爾代夫、科威特、土耳其、伊朗等十二國。截至1971年，中國給尼泊爾的援助共約6370萬美元，斯里蘭卡共8480萬美元，阿富汗2750萬美元，巴基斯坦最多，達4.457億美元，而1971年至1975年，中國對越柬老三國的經濟技術援助支出佔同期經援總支出的43.4%。與此同時，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也不斷得到發展。貿易總額由1966年的20.1174億美元，增至1976年的69.3956億美元，最高時的1975年，達到了77.3606億美元。[97]

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有了大發展。過去因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與中國關係惡化斷交的布隆迪、肯尼亞、達荷美（貝寧）、中非、加納、突尼斯六國，全部同中國復交或關係好轉。新建交的國家有毛里求斯、多哥、加爾加什、扎伊爾等二十二個國家。1970年代以來，中

9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171。

96 《毛澤東指示要點》，1974年9月12日；毛澤東與尼雷爾的談話，1974年3月25日。

97 石林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57；《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1984年）》（香港：華潤貿易諮詢有限公司，1984），頁833。

國與整個非洲的五十個國家中的四十四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這一時期，訪問中國的非洲國家首腦達二十五位，1974年一年就有八國領導人訪華。[98]與此同時，非洲國家在政治上給予中國的支持也很顯著。1971年10月聯大第二十六屆會議投票表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非洲有二十六個國家投了贊成票，佔贊成票總數（七十六票）的三分之一。[99]毛澤東說：「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中國與非洲經濟技術合作關係也有很大發展，對非洲的經濟援助大幅度增長，1970年至1976年，中國援非金額高達18.15億美元；接受中國經援的非洲國家由1966年以前的十一國增至1977年的二十九國。中非貿易總額從1970年的1.7721億美元增到1975年的6.7126億美元。[100]

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得到重要突破。從1970年中國與智利建交後，又先後與秘魯、墨西哥、阿根廷、圭亞那、牙買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委內瑞拉、巴西、蘇里南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堅決支持拉美國家提出的200海里海洋權、保衛原料合理價格、建立拉丁美洲無核區，以及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並對巴拿馬政府為恢復巴拿馬運河主權所進行的鬥爭表示同情與支持；對尼加拉瓜人民推翻索摩查獨裁政權、建立民族復興政府的勝利，表示祝賀。

在團結第三世界國家的基礎上，中國努力引導它們開展反對美國、蘇聯的霸權主義的鬥爭。這一時期，中國的反霸方針在一些國際重大衝突問題上的準則是「反對兩霸、側重打擊蘇霸」。[101]但由於第三世界國家與美國、蘇聯的關係各不相同，有的要依靠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有的與美國結盟甚至國內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因此，許多國家為了自身利益在東西方或者中蘇之間搞平衡甚至見風使舵。雖然

98　筆者據新華通訊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頁497－502的資料統計而出。

99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中國與第三世界（論文集）》（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頁211。

100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1984年）》，頁851。

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6。

多數國家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也有部分國家對中國的方針不予支持，還有些國家追隨蘇聯，與中國關係惡化。由於中國在鬥爭中過分強調反對蘇聯，有時也出現了當事國已經讓步妥協，而中國仍然堅持原先立場的僵局。有這樣幾件大事：

在南亞的孟加拉國獨立和印度、巴基斯坦戰爭中，中國堅決反對蘇聯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

1970年12月，巴基斯坦舉行全國大選，拉赫曼取得東部巴基斯坦的絕對多數，要求獨立。巴基斯坦政府出兵鎮壓，印度乘機插手。1971年8月，印度與蘇聯簽訂條約，規定任何一方「遭到進攻和進攻威脅」時，雙方應「採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在蘇聯的支持下，印度軍隊於11月21日大規模出兵東巴。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派特使來中國請求出兵。中國政府多次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印度在蘇聯支持下的軍事侵略，同時也與持相同立場的美國進行了協商。12月10日，美國基辛格與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紐約舉行秘密會談，雙方都極力想讓對方在援巴問題上做出更直接更堅決的軍事行動，但都未能成功。[102] 美國尼克松政府考慮到國會多數人贊同東巴獨立，不敢公開支持巴基斯坦，只在暗中運送大批飛機和軍事武器，並把第七艦隊派到印度洋遊弋威懾。中國與巴基斯坦是友好鄰邦，早在1965年夏季巴基斯坦與印度爆發戰爭時，巴基斯坦向中國求援出兵，毛澤東曾經予以同意，對周恩來說，要出兵就應尋找與巴最近處出兵為好。[103] 後來由於形勢發生變化而中止行動。但是，1971年形勢發生了較大的變動，中國正處於林彪事件後的混亂中，而且剛剛進入聯合國，只能在政治、外交上支持巴基斯坦，並運送給巴一批飛機和常規武器。不久，戰爭以孟加拉國獨立而告終，中美因而在外交上失分。此後，中國仍然在聯合國堅持不承認孟加拉國的立場。1972年7月，孟加拉國先後通過南斯拉夫、羅馬尼

---

102 〈有關政府高級機密談話錄的獨家報導〉，載〔美〕威廉・伯爾：《基辛格秘錄》，頁28－33。

103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283。

亞、斯里蘭卡、緬甸等國轉達希望中國同意孟加拉國加入聯合國的意思，中國都未同意，並對蘇聯、印度讓孟加拉國進入聯合國的提案使用了否決權。[104] 直到1974年印、巴、孟達成戰俘協議，中國才投票同意孟加拉國加入聯合國，但兩國仍然沒有外交關係。1975年孟加拉國發生軍事政變，拉赫曼被打死，中國才在巴基斯坦之後與孟加拉國建交。

在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中，中國堅決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武裝鬥爭，在強烈抨擊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同時，也嚴厲譴責蘇聯對阿拉伯國家的「出賣」。

從1950年代起，蘇聯就在阿以衝突中給予了阿拉伯國家大量軍事援助，派駐軍事人員達17000人。同時也加緊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限制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戰爭行動，因而引起了阿拉伯國家的不滿。1972年埃及薩達特政府宣布驅逐蘇聯軍事專家，蘇聯立即逼債、停止供應武器零件，中國即向埃及提供了一些武器零配件。但是，中國畢竟國力有限，無法取代蘇聯。1973年9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我們總是支持你們的。因為蘇聯在那裏，我們不好插手，我們也沒有那麼多飛機和坦克。[105]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敘利亞為收復失地而發動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十月戰爭」）。周恩來分別致電埃及和敘利亞總統，會見兩國駐中國大使，表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反擊以色列侵略的鬥爭。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屆會議上，中國代表團高度評價「十月戰爭」打破了超級大國製造的僵局，開創了反侵略、反霸權主義的新局面。中國政府還向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提供了現匯、糧食和軍事援助。由於美國提供的大批先進武器的支持，以色列在10月中旬轉而掌握戰爭主動，埃及等被迫尋求停火。10月22日，聯合國表決美國、蘇聯提出的停火決議。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發言表示中國堅決反對兩個超級大國擺布安理會，

104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一共使用否決權四次，其中1972年即兩次。另一次是否決英國等西歐國家在安理會上提出的有關中東問題的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修正案草案。

10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151。

不參加投票。決議通過後，以色列置之不理，乘機繼續進攻，佔領了更多領土，10月24日方正式結束戰鬥。蘇聯代表馬立克指出，由於喬冠華的講話推遲了安理會的行動，阻撓了中東停火的實現，是幫助以色列進行侵略，是同以色列結成「同盟」。中國代表黃華立即進行反擊，譴責蘇聯「流的是鱷魚的眼淚」。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美蘇提案「不容別人進行充分考慮和協商，強行加以通過。十多天來，兩個超級大國推行強權政治、合夥撲滅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正義戰爭烈火的陰謀，就這樣公之於世了」。[106]今天看來，雖然中蘇之間相互指摘「出賣」、「幫兇」都是言過其實，但中蘇衝突的確像在越南戰爭中一樣，給中東地區人民的鬥爭蒙上了一層陰影。這一時期，以色列一再向中國頻頻示好，先是在聯合國投票贊成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繼而向中國發去賀電。但都遭到中國的冷遇，賀電被退回。中國始終堅持對阿拉伯國家一邊倒的支持政策。

在支援南部非洲地區國家的爭取獨立鬥爭中，中國同時也進行了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活動。

1970年代初，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津巴布韋、納比米亞和南非等仍然在葡萄牙、法國、英國等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民族解放運動組織由於部族矛盾和政治觀點不同，都分裂成為兩派或三派。安哥拉有人民解放運動（安人運）、民族解放陣線（安解陣）、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盟）三派；莫桑比克有解放陣線（莫解陣）、革命委員會（莫革委）、人民黨三派；津巴布韋有民族聯盟（津民盟）、人民聯盟（津人盟）兩派；納米比亞有西南非洲人民組織（人組）、西南非洲民族聯盟（民盟）兩派；南非有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泛非大）兩派。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淖，使蘇聯乘機在非洲特別是南部非洲進行了勢力擴張。蘇聯利用各派別之間的分歧，以援助為手段，力圖對這些組織進行控制，由此造成了該地區民族解放運動中矛盾的加劇。例如安哥拉在1974年獨立後，三派之間仍然內戰不休，蘇聯通過軍事介入，建立了三個海軍基

106 《人民日報》社論：〈強權政治的露骨表演〉，1973年10月26日。

地和四個空軍基地。對南部非洲解放組織各派，中國採取都支持的態度，其中主要支持在本國堅持武裝鬥爭的莫解陣、安人運、納人組、非國大等組織，並通過坦桑尼亞、贊比亞、剛果、扎伊爾等對中國友好的國家向他們提供武器援助，建立基地訓練游擊戰士。1974年起又增加通過非洲統一組織向非洲解放運動提供武器和資金援助。1971－1972年，非洲解放運動自非洲以外獲得的武器援助中，中國佔75%，蘇聯佔25%。另一方面，中國也勸說各派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向他們揭露蘇聯以援助為名、行控制之實的霸權圖謀，要他們警惕不要「前門拒狼，後門進虎」。

中國聯合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霸權主義鬥爭，遏制了美國霸權主義特別是處於上升時期蘇聯霸權主義的擴張勢頭，也保障了中國自身的安全。同時，由於中國對第三世界不計回報的大量政治、經濟、軍事支援，也使得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把中國視為在國際上可以依靠的一個大國，中國實際上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及在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的發言人。這也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可以說，中國真正成為一個有影響的世界政治大國，是從1970年代開始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107]

四　調整意識形態至上對外方針及「親密夥伴」關係的演變

1　毛澤東調整意識形態至上的對外方針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澤東在考慮國家關係、雙邊關係問題時，始終將意識形態放在首位。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中國堅決反對受蘇

107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69。

聯「修正主義」嚴密控制、率先攻擊中共的華沙條約和經互會成員國波蘭、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將他們一體視為「修正主義集團」；同時也抨擊雖然抗拒蘇聯控制但仍被視為修正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與古巴關係冷淡。當時，中國親密的戰友夥伴，首先是堅決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其次是在中蘇爭端中傾向中共路線的朝鮮、越南，最後是反對攻擊中國的羅馬尼亞，僅此幾國而已。

在與非執政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關係中，毛澤東認為全世界一百多個共產黨、工人黨，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數幾個黨、十幾個黨，多數黨是跟着蘇聯「修正主義」跑。因此，他主要注重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的左派聯合，支持這些黨中的左派起來造反，依靠他們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支持各國的革命鬥爭。1966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波蘭共產黨領導人楊力時，就關於「中國的廣泛的革命群眾運動，必將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的說法談道：在中國看到了希望，在世界也看到了希望，波蘭、蘇聯、美國、日本、印尼、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都有希望。當時，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國黨多數都分裂成為幾派，陷入了與中國國內一樣的「全面內戰」的混亂局勢。支持中國的一派多數是非主流派，中國在對其稱呼後加以「（馬列）、（左派）」等進行區別；支持中國的主流派黨，主要是東南亞國家中一些與中國歷史淵源較深、堅持武裝鬥爭的緬甸、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印尼共產黨。

中國堅決支持東南亞地區共產黨的武裝革命鬥爭，不惜因此與這些國家的政府發生衝突甚至破裂關係。毛澤東相信，這些國家的情況與革命勝利前的舊中國十分相似，因此中國共產黨走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可以對他們起到重要指導作用。1967年當泰國的武裝鬥爭革命運動興起時，毛澤東高興地說：泰國革命發展起來是件大事，這就把東南亞的幾個主要國家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接起來了。我們總是相信人民的大多數，就是說工人階級、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是佔人口的絕大多數，地主、資本家總是少數。1970年他又說：你說也要搞解放軍進行武裝鬥爭，我看東南亞

都要搞，光有越南、柬埔寨、老撾不行，還要包括馬來西亞等國家。在泰國、越南南方有很多柬埔寨人，你們可以招他們來參加。你們還可以派人來中國訓練，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要來。你們現在在走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路。不搞武裝鬥爭光搞城市群眾運動不行，敵人可以像在印度尼西亞那樣在一個早晨把工會、農會都掃光。甚麼叫政權，軍隊就是政權。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中國政府對這些國家的人民武裝鬥爭給予了從人員組織、武器物資供應、思想指導等方面的重要援助。這些地區的共產黨武裝力量（通常稱為「人民軍」）的骨幹領導，不少在中國接受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教育和人民戰爭戰術培訓；中國還在湖南等地為他們建立游擊戰訓練基地，設立廣播電台向國內進行革命宣傳。在 1966 － 1969 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時，中國少數紅衛兵和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知識青年在極左思潮影響下，也曾越過邊境，組成自發的「國際支左部隊」，參加越南抗美戰爭和緬甸人民軍的武裝鬥爭。

調整這種專重意識形態的對外方針的開端，出現在1968年8月。通過建立基層革命委員會和派駐工人、解放軍宣傳隊，中國社會進入相對有序領導軌道，無政府主義極左思潮開始受到抑制；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劇變，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毛澤東感覺到蘇聯的現實威脅。8 月 23 日，《人民日報》第一次公開給蘇聯做出新的定義：「蘇修叛徒集團早已墮落成為社會帝國主義。」但仍然出於意識形態和黨的關係的判斷，把蘇聯的入侵視為「修正主義」內部爭鬥，指出：「蘇聯叛徒集團的這次悍然出兵，是整個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內部矛盾極度尖銳化的結果。」[108]

10月1日，毛澤東接見來華尋求支援的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談到蘇聯入侵時他指出：鐵托也很緊張，現在南斯拉夫成了我們間接的同盟軍。它和蘇聯有矛盾，我們要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包括羅馬尼亞，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東歐國家要一分為二看

108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人民日報》，1968 年 8 月 23 日。

待。[109]這次談話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標誌着一個新的國際戰略的即將出台。一個月前，《人民日報》還在公開抨擊南斯拉夫，而毛澤東現在卻稱為「同盟軍」，他甚至把杜布切克也列入了與羅馬尼亞等同的一方。此後，中國不再公開抨擊南斯拉夫。逐步改變原來「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的四面出擊國際戰略，緩和與其他國家的矛盾，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軍事威脅。

1970年，毛澤東進一步考慮緩和與東歐國家的關係。5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波蘭駐華大使館代辦表示「問哥穆爾卡同志好」，向南斯拉夫代辦表示「祝南斯拉夫發展」。7月，周恩來也向匈牙利大使表示「對卡達爾同志、福克[110]同志和匈牙利其他領導同志的問候」。[111]這種一般性的禮節在相互關係冰凍三尺之寒的時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此後，中國和波、德、保、捷、匈東歐五國減少了相互攻擊，恢復了一些經濟貿易合作，但仍然沒有黨際關係。直到毛澤東逝世，中國共產黨還退回了東歐黨通過郵局發來的慰問電。

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也降低了過去對「左派」的要求。1970年12月6日，毛澤東在中聯部〈關於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上批示說：

> 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已說了多遍了。至於他們除了馬、列主義外，還雜有一些別的不良思想，他們自己會覺悟，我們不必當作嚴重問題和外國同志交談。只要看我們黨的歷史經過多少錯誤路線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軌，並且至今還有問題，即對內對外都有大國沙文主義，必須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112]

---

109 1968年10月1日毛主席同巴盧庫談話記錄。

110 時任匈牙利政府總理。

1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25。

112 毛澤東：〈關於對外宣傳和外事工作的一組批語（1967年3月－1971年3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83－284。

翌年6月29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文化界代表團時說：我們聽有的朋友說，凡是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都要相信毛澤東思想，換句話說要相信馬列主義。我們聽了很吃驚。這樣一來就把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這個組織變得狹窄了。我們中國朋友絕沒有這樣主張，認為只有相信毛澤東思想，才能進行文化交流。[113]

同時，毛澤東還考慮與東南亞國家政府修復外交關係，將公開支持東南亞黨的武裝鬥爭做法，改變為暗中支持。1970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特意就此事向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徵求意見，巴登頂表示對緬甸革命運動前途擔憂，毛澤東說：即使我們同奈溫政府恢復國家關係，也不會影響你們打仗。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並強調指出：我們同四十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基本上是靠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是靠這些國家的政府。蘇聯是靠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是靠這些國家的人民。這是路線問題。1975年6月，鄧小平向柬埔寨共產黨中央書記波爾布特介紹中國政策的轉變說：我們一方面在國內加強自己的建設，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做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的工作，加強自己。最近我們同亞洲的一些鄰國建交了，同新加坡、印尼可能晚一點，但總有一天會建立外交關係的。他指出，中國支援東南亞人民革命鬥爭的態度沒有變化，但方式要改變，要符合國家關係原則。此後，中國降低了支持東南亞黨武裝鬥爭的公開宣傳基調，但是這種支持原則和援助行動沒有改變。毛澤東曾多次明確提出，我們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產黨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還算共產黨？！我們就是要站在各國人民方面。請問，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那麼共產黨還算不算馬克思主義者？！[114] 1974年5月，他在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時，更是針鋒相對地表態說，中國要支持馬來西亞共產黨和人民軍的革命鬥爭。當拉扎克要毛

113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頁594。

114 1973年7月毛澤東與外賓的談話。轉引自譚乃彰：〈十年對外關係研究（1966－1976）〉，《國史研究參閱資料》(29)，頁9－10。

澤東保證他與馬共和人民軍沒有關係時，毛澤東果斷地表示：現在也有關係，將來還有！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呢！怎麼沒有關係呢？談到拉扎克所說的對馬共要採取鎮壓、殺人的手段，毛澤東說：至於你們採取甚麼政策，我們不能干涉。我們同他們是黨派之間的關係，跟你們是國家關係。我們跟各國共產黨很多都有關係。我們不隱瞞這一點。他們如果有勝利，有發展，我是高興的。[115]

中國調整意識形態至上的外交方針，使得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支離破碎的外交關係得到修復，減少了中國對美、蘇霸權主義鬥爭的壓力，改善了國際形象。同時，也必然引起一些原來「親密夥伴」的疑慮和反對。首當其衝的是阿爾巴尼亞。

2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中阿關係出現裂痕

中阿的靠攏，一開始就是建立在濃厚的一致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共同反對蘇聯的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兩黨關係迅速升溫。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使這種友誼達到了頂峰。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幾乎在中國發動「文革」的前夕，阿爾巴尼亞已經發動了與中國「文革」頗為相似的「思想文化革命」運動（簡稱「思想文革」）。

1965年12月24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樹立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的決議〉，揭開了「思想文革」運動的序幕。提出反對黨裏政府裏的官僚主義，說官僚主義是「黨政機關最大的禍害」，使國家出現特權階層，蛻化變質。這場鬥爭是「避免出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階層的決定性條件」，「必須像反對階級敵人那樣反對官僚主義」。[116]

---

115 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的談話。轉引自譚乃彰：〈十年對外關係研究（1966－1976）〉：〈國史研究參閱資料〉（29），頁10。

116 陳東林：〈二十年恩怨未了清：60－70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透視〉，〈黨史博覽〉，1999年第1期。以下引文未註明者均引自該文。

1966年3月4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發表告全體共產黨人和全國軍民的公開信，號召全國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公開信指出：必須從根本上清除官僚主義，「黨中央已經發出指示：要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審查所有的法令和主要的指示，徵求人民的意見，並在人民群眾的廣泛參加下重新加以制訂」。這場針對舊體制的「思想文革」運動又稱「進一步革命化」運動。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運動給予了關注和讚許，《人民日報》和多家報刊曾予以專題報導。但是，當1966年5月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後，阿爾巴尼亞的「思想文革」就顯得火藥味不夠了。這時，輪到阿爾巴尼亞的報刊為中國更為激進的行動歡呼了。

兩國「文革」有很多的共同點：

(1) 運動的主要矛頭，都是針對執政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機制和幹部，這和過去「矛頭向下」的傳統階級鬥爭模式是不同的。阿爾巴尼亞雖然沒有接受毛澤東的「走資派」理論，但他們的反「官僚主義」也上綱得頗高，提出要消滅領導階層的「紅色蛀蟲」，指出「官僚主義者是蛻變為資產階級分子的表現，是受資產階級支持的對工人階級的一種背叛」。不同的是，阿爾巴尼亞由於周邊環境、國家大小、領袖權威和魄力、傳統意識的區別，「思想文革」沒有採取普遍「炮打」黨組織和具體領導人的手段，也沒有定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反「官僚主義」對黨組織的影響主要是：為了加強與群眾聯繫，取消了黨總基層組織，直接代之基層組織。他們的運動也造成了嚴重的內部危機，後期也清洗了一大批領導幹部。從1973年到1975年，先後有包括國防部長巴盧庫、人民軍總參謀長杜米、總政治部主任恰科的「軍隊反黨集團」和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凱萊奇、戴奧多西及部長恩杰拉的「經濟反黨集團」被殘酷地處決。前者的罪名是企圖發動軍事政變，當時被人們與中國的「林彪事件」相比附。後者的罪名是「搞資本主義經濟」。六屆中央委員會中共有十四人被開除，佔13%。全國有三萬人被清洗，佔人口總數的1%。

(2) 運動的主要方式，都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中國開展紅衛兵運動以後，阿爾巴尼亞一度出現了少數紅衛兵，但只為和中國交往，

用。他們發動群眾的主要形式是中國後來採用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霍查在報告中提出了「工人階級監督一切」的口號，要求「黨應該組織各種工人小組，經過訓練後派下去監督一切，不僅在本單位，而且到外單位去監督一切，如果認為必要，甚至還可以監督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委員會」。另一方面，黨大量吸收了工人、青年、婦女入黨，黨政機關吸收了大量直接來自工廠的工人。

1968年毛澤東不得不派和工作組性質相同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大學，結束無政府主義狀況。阿爾巴尼亞在1973年也開始了「保持馬列主義純潔化」的鬥爭，加強黨組織對群眾的管束，反對「外來表現和自由主義」，撤換了積極反對官僚主義的地拉那市委宣傳書記帕奇米拉和團中央第一書記梅羅等一批官員。這時，可以說原來意義的「思想文革」群眾運動已經結束了。

(3)「思想文革」運動的內容，和中國的「文革」很多相同。

「閃電報」運動：相當於中國的「大字報」運動。讓群眾用簡短的文字，公開批評自己和別人的缺點和錯誤。都拉斯港口的「納伊姆・弗拉歇里」學校學生約塞，在「思想文革」運動中貼出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閃電報」，首先提出反對宗教迷信和落後習俗的倡議，以後這種形式蔓延到全國。

「處處把整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運動：類似中國「鬥私批修」和「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內容包括：取消自留地，動員平原地區無償支援山區牲口等物資，取消軍銜，取消稿酬，降低幹部和知識分子工資，禁止業餘有償勞動等等。

反宗教和外來影響運動：類似中國「破四舊」運動。內容包括清除家庭神像、廢止禱告儀式等，全國共關閉了2169所教堂、清真寺、修道院。霍查在講話中正式宣布廢除宗教，稱阿爾巴尼亞是「世界上第一個沒有教堂和清真寺，沒有神父和阿訇的國家」。同時嚴格控制外來文化影響，在機場出告示說留長頭髮和大鬍子的外國人不准進入，否則將由機場強行剪短。

「學校革命化」運動：相當於中國的「教育革命」運動。1968年3月，霍查作了〈關於我國學校的進一步革命化〉報告，指出學校還

沒有完全擺脫資產階級教育學和資產階級學校的影響，而且還受了「蘇聯學校資產階級教育學」的影響，教學脫離生活和勞動。為此，阿爾巴尼亞黨號召重新審查教育體制，從根本上修改教學大綱和教材，採用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學方法，把學校和農場、工廠聯繫起來，促進教師的思想革命化，廣泛組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和體育鍛煉、軍事訓練。這些，都和中國「文革」的「教育革命」同出一轍。

「文藝工作革命化」運動：和中國「文革」中的「文藝革命」相似。如加強對文藝創作的政治思想指導，確保作品有很高的「革命」內容，當時在中國反覆放映的電影《海岸風雷》、《廣闊的地平線》是其代表作；要求文藝工作者定期深入工農業生產第一線，接受教育；限制和禁演外國的古典和現代作品等等。

「上山下鄉」運動：早在1966年2月，阿黨中央就號召幹部和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參加勞動。都拉斯區的十二名專家到農村安家落戶，被譽為榜樣，掀起了一個熱潮。到2月下旬，已有七千多人離開城市到農村和礦山去，其中有幹部、軍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還包括十二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等高級幹部。和中國精簡機構、下放幹部相似，阿大幅度減少政府機構，大量下放幹部到基層和農村勞動，總的減少了四分之一到一半人數。1966年3月17日，謝胡在國會第九次會議上專門作報告提出要削減四分之一的冗員，僅留三個副總理，部長由十九個減少到十三個，其他各級領導也相應減少。

「徹底解放婦女」運動：這是中國「文革」沒有獨立開展的運動。由於歷史傳統，阿爾巴尼亞的婦女地位一直很低，在這場運動中，提出了消除宗法制、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各種奴役婦女的習俗，讓婦女廣泛參加政治生活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霍查夫人由此成為黨內有重要發言權的人物。

「一手拿槍，一手拿鎬」運動：相當於中國的「抓革命、促戰備」運動。像中國的「深挖洞」一樣，1960－1970年代，阿爾巴尼亞掀起了修碉堡之風。在四百七十多公里的海岸線和首都地拉那周邊的漫長輻射線地區，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以平均每座1.5萬美元至5萬美元的造價，修建了幾十萬個鋼筋混凝土碉堡。

無獨有偶，兩國的「文革」中都伴隨着濃烈的「個人崇拜」氣氛和粗野的語言。霍查在講話中甚至揮着拳頭叫喊「火燒舊社會的殘餘」、「砸爛他們的腦袋」等語句，類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炮轟火燒」、「砸爛狗頭」。

建立在共同極左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中阿關係，必然要隨着意識形態的認識差異而出現裂痕。按照毛澤東的阿語翻譯、1980年代中國駐阿大使范承祚的比喻，中阿關係在1972年前是「春—夏」季節，而1972－1978年進入「霜秋」。[117]導致中阿關係蜜月的結束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直接原因：

（1）阿反對中美關係緩和。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商定次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中美公開發表〈公告〉的前後，周恩來兩次會見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希望他們理解中國的這一決策。8月12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交來了一封萬言長信，聲稱：「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你們這一決定。」認為中國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讓美國從越南撤軍是「和帝國主義妥協」、「右傾機會主義」。為了爭取阿爾巴尼亞理解，中共中央先後派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及姚文元、王洪文訪阿說服，但未奏效。毛澤東聽取李德生匯報後，很不高興地說：「他們是『左派』，我們是『右派』。他們怕美帝從亞洲撤出來會增加對他們的壓力，要我們把美帝拖住。」他嘲諷地說：「阿爾巴尼亞怎麼成了『明燈』了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業、農業生產都不好，中央的領導人也不團結，他們是極左的。」[118]1971年11月，阿黨召開六大，霍查在講話中含沙射影地攻擊中國說：對美國的態度「不是簡單的策略問題而是政治路線的內容問題」，[119]「不能依

117 范承祚：〈阿爾巴尼亞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始末〉，《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4期。

118 毛澤東與李德生的談話，1971年9月12日。

1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59。

靠一個帝國主義來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首先是對待美帝國主義的態度，是檢驗世界上一切政治力量的試金石」。

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的這些極左做法很不滿意。1973年7月他說：「對於越南問題，美國自己要撤兵，有一個國家死也不讓撤，說是世界革命風暴在亞洲，亞洲革命風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他還對王力起草的稱讚阿是「明燈」的電報極為不滿，自嘲地說：「我這幾年名聲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馬克思、一盞明燈是在歐洲。那個地方放一個屁也是香的，奉為聖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嗎！鄙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啊！」只是這時，他隱忍地注意不在公開場合提到這種分歧。

1974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阿爾巴尼亞黨堅決反對，認為是「反馬列主義的」。此外，中阿在聯合西歐、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反霸等問題上也有分歧。周恩來向阿方提出建立有中國參加的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反蘇聯干涉聯盟的建議。[120]由於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有着深刻的民族矛盾和歷史宿怨，以及霍查堅持「惟我獨革」的觀念，阿勞黨拒絕了中國的建議。

1973年至1975年，阿勞黨中央開始了黨內大清洗，並連帶到中國。1974年7月清洗的「巴盧庫反黨集團」，罪狀之一就是「同意中國領導人提出的關於阿爾巴尼亞與南、羅結盟反對美蘇兩霸的意見，並暗中執行這項與阿爾巴尼亞為敵的戰略計劃」。1975年5月清洗的「凱萊齊反黨集團」，罪名之一也是與中國有「勾結」。當時中國國內鄧小平正復出主持整頓工作，霍查竟將凱萊齊稱作是「阿爾巴尼亞的鄧小平」。[121]

120　南斯拉夫阿問題專家佩羅·茲拉塔爾著，陽泉、雲飛譯：《霍查政治傳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對此事的記述有矛盾。該書一處說1966年5月謝胡、巴盧庫訪華時，中國即對他們提出此項計劃；6月周恩來訪阿時又向霍查解釋這一建議；1968年10月毛、周再次對巴盧庫重申此設想（頁271－272、282）。另一處說1968年10月巴盧庫首次向霍查報告中國的這個計劃（頁304）。根據現有材料以及1966年中南關係狀況，認為後一說準確。

121　陳東林：〈二十年恩怨未了情：60－70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透視〉，《黨史博覽》，1999年第1期。

（2）阿不滿足中國的經濟、軍事援助。

中國對阿援助從1950年代開始，到1960－1970年代形成高潮。據統計，從1954年到1978年6月，中國對阿援助包括：

第一，提供援助資金共75筆，協議金額60.45億元人民幣（均按國內價格），其中30億為無償援助，其餘為貸款。考慮到中國將軍援作價非常優惠，如果按當時國際價格，總計對阿援助約合100多億元人民幣。其中1966－1972年佔80%。這僅次於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數額，在中國對外援助中居第二位，按人口平均則佔第一位。相當於阿平均每人得到3850元人民幣，而當時中國的人均年收入才只有200餘元。

第二，提供成套設備142項，已建成90項，在建24項，尚未施工28項。幫助阿爾巴尼亞興建了鋼鐵、化肥、製鹼、製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使阿第一次能自行生產鋼鐵等多種產品；為阿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紡織、輕工、建築、通訊、廣播等部門項目。此外，中國還向阿爾巴尼亞派出了6000名專家，同時在華為阿培訓了2000名技術骨幹。

第三，無償軍事援助，包括飛機、坦克、軍艦、導彈、火炮，以及大量槍枝、彈藥、汽車等等。到1975年，中國供應的裝備已可供阿40萬正規軍和30萬民兵之用。[122]

可以說，阿的現代工業、國防、科技和農業基本上是依靠中國援助建立起來的。在阿的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或東風牌汽車，當地人騎的是永久牌自行車，戴的是上海牌手錶，聽的是紅燈牌收音機。作為交換，阿輸入中國的只有不受歡迎的劣質香煙。但是，在接受援助過程中，阿的胃口愈來愈大，不斷提出新的得隴望蜀要求。中國考慮到自己也很困難，過去對阿援助已經很多，部分企業已經投產，阿可以自力更生自己製造，因而沒有完全滿足阿的要求。這引起了阿的極度不滿。但即使在中阿之間發生分歧，關係趨向冷淡之時，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各項援助仍然一如既往地進行。

---

1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71。

1970年阿向中國提出1971－1975年的經濟要求達32億元人民幣，中國同意19.5億元，阿還表示滿意。1972年11月阿國防部長巴盧庫訪華，提出1973－1977年對阿軍援價值30億元人民幣，遠遠超過1961－1972年中國對阿軍援總和。經過雙方一個月艱苦的商談簽訂了協議，中國決定1973至1975年向阿提供槍枝、火炮、飛機、艦艇、坦克、導彈、小麥、咔嘰布等及相應器材等軍事裝備物資，新建擴建坦克修理廠、軍服廠等12個，共計13億元人民幣。1974年阿又向中國提出「六五」計劃（1976－1980年）的經濟要求，其數額更達50億元人民幣，中國認為太過分，只同意貸款10億元。周恩來、李先念對來訪的查爾查尼進行了解釋。阿極為不滿，以黨中央名義宣稱：「很不理解，很不滿意，嚴重不安。」說阿在遭到封鎖時刻，中國減少援助，使阿處於極為嚴重的局面，對此「表示遺憾」。1975年11月，霍查、謝胡寫信，提出阿即將遭到蘇、美聯合進攻，要求中國在六五計劃時期提供輕武器25萬枝、炮1500門、坦克800輛、噴氣式飛機45架、魚雷快艇24艘、子彈14億發、機用導彈10萬發。中方認為，中國援阿的武器彈藥已使其能滿足戰時需要，而且有相當儲備，各種援建的兵工廠也已開始投入生產，而且中國還要援助其他國家，故不能照阿單提供。副總參謀長楊成武說：「你們提的單子太大、太大、太大，我們確實心有餘而力不足。」阿方激烈爭執，年底才勉強按照中方單子簽訂協議，同時卻宣讀聲明說：我們「很不滿意和無比痛心」。[123]

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經濟援助的不滿，逐漸導致阿爾巴尼亞在各種場合對中國進行批評。中國方面為了維護團結，也為了不抬高其身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罵不還口，不與爭論」，[124]從不公開回應。毛澤東逝世後，阿黨領導人開始公開攻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徹

1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262－266。

124 范承祚：〈阿爾巴尼亞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始末〉，〈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4期。

底結束了兩國「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牢不可破」的「親密戰友」關係。

阿勞動黨下台解體後，1992年2月霍查的接班人、原阿黨中央第一書記阿利雅回顧說：「1965年至1975年是阿大發展時期。毫無疑問，這種經濟、文化的蓬勃發展，也是中國援助的結果。但在這一時期，從政治方面看，也受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談到中阿分裂時，阿利雅感慨地說：「阿中關係的破裂並非是不可避免的。尼克松去中國與我們有何相干？那是中國的事，三個世界理論也是中國的事，同意與否，本來是可以討論的，而不應把關係搞到破裂的程度。歸根到柢，是阿爾巴尼亞本身遭到更大損失。」[125]

3 在西哈努克親王和紅色高棉之間斡旋的勝利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在支持印度支那各國的抗美鬥爭中，始終與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保持了特別緊密的關係，這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顯得十分突出。西哈努克親王於1955年出任首相以來，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敢於抗衡美國，同時重視與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中國政府對西哈努克親王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的愛國行動，一直十分讚賞。兩國關係不斷發展，成為中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小國平等友好相處的一個範例。其間，也發生過一些小摩擦，主要因為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和中國支持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而引起，但不影響大局。

抗美援越戰爭期間，中國政府修建了通過北越、老撾、柬埔寨到達南越的1200公里運輸線，即胡志明小道，日夜搶運軍援物資。北越軍並深入柬境內十餘公里，從那裏出發，頻繁襲擊南越軍隊和美軍。美國對西哈努克親王的態度深為不滿，不斷指使南越對柬埔寨實施戰爭威脅，向西哈努克施加壓力，最終於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

125 陳東林：〈二十年恩怨未了情：60－70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透視〉，《黨史博覽》，1999年第1期。

親王出國訪問之機，策動柬政府中的朗諾軍人勢力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宣布廢黜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朗諾政府。

政變發生時，西哈努克親王正在蘇聯訪問，蘇聯為避免他提出在蘇成立流亡政府的要求，遲至親王登上去中國的飛機前兩三小時，才向他通報政變的消息。無家可歸的西哈努克親王懷着悲戚的心情，3月19日上午和夫人一行十七人由莫斯科飛抵北京。令他吃驚的是，中國仍以國家元首的規格予以盛大歡迎，周恩來、李先念等前往機場迎接，並動員各國使節到機場迎接。周恩來對西哈努克說：「我們絕不承認朗諾集團，我們只承認你是柬埔寨唯一國家元首，我們將全力支持你。」[126]《人民日報》於當日發表了西哈努克親王作為國家元首抵達北京的消息。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研究柬埔寨問題會議，毛澤東批准了會議關於支持西哈努克在京進行各項活動的決定。

3月22日，周恩來在與西哈努克會談時重申：中國決心支持親王直到親王勝利回國。只要親王有決心鬥爭到底，我們一定支持你。西哈努克表示：有中國的支持，我一定堅持鬥爭，決不後退。[127]次日，西哈努克即在北京向中外新聞界宣布成立以他為首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發表了告高棉同胞書和聲明。周恩來立即急電邀請越南總理范文同來北京商談建立印支共同反美聯合陣線事宜。

另一方面，中國也在勸說柬埔寨共產黨與西哈努克合作。柬埔寨共產黨一直在國內領導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1965年11月至次年2月，柬共領導人之一的波爾布特曾到中國上海，和各國來接受訓練的武裝鬥爭游擊隊一起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理論和經

1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72。

12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56。

驗。從1968年起，柬共游擊隊已經擁有三千人和四個根據地。西哈努克政府軍對柬共進行了圍剿和鎮壓，喬森潘、胡榮、符寧等三位柬共議員也逃進了游擊隊。1970年3月朗諾發動政變後，周恩來、康生分別與秘密來華的柬埔寨共產黨中央書記波爾布特會談，介紹各方面形勢，勸說柬共從國家大局出發，不計前仇，與西哈努克組成統一戰線。波爾布特起初不同意，建議中國單獨支持柬共進行武裝抗美鬥爭，後來才表示同意。柬共中央做出決定，停止攻擊西哈努克親王，聯合起來打擊朗諾政權。柬共領導人喬森潘等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毫無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親王3月23日在北京發表的告高棉同胞書和聲明。至此，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親王舉起的抵抗旗幟下；喬森潘等柬共領導人也成為柬第一屆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內閣成員。

此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國方面着手協助西哈努克籌備召開印度支那三國四方會議。1970年4月24－25日，柬埔寨、老撾、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北越領導人在廣州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印度支那當前局勢及印支三國反美鬥爭的〈聯合聲明〉。周恩來專程趕赴廣州，舉行盛大宴會，招待出席會議的各代表團，並先後同三國四方領導人會談，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完全支持會議通過的聯合聲明。

5月1日，毛澤東於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了西哈努克和夫人。毛澤東說，你們要搞一個民族統一戰線，一是反帝國主義，一是反封建，現在集中對付美帝國主義，法國等可以暫時不提。由你這個國王來領導反封建，豈不是怪事？但你是民主國王，不是封建國王。有些共產黨也靠不住。毛澤東向西哈努克親王講述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提醒他要重視農民，減租減息，分配土地，取得農民的擁護。他還告訴親王，中國準備向柬埔寨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援助，不要償還。柬埔寨需要甚麼，只要中國有就給。中國所給的東西，同西哈努克親王領導柬人民鬥爭給予中國的東西，是無法相比的。西哈努克後來回憶說：毛主席同一個小國的國家元首的談話，使人們多等候了整整一個小時，「而這個小國恰好在幾小時之前成了一場最殘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試問，還有比這種入侵方式與我在北京受到的禮遇，更能說明這

兩個世界的區別嗎？」[128] 5月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由柬民族統一陣線領導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中國政府第一個承認這個新政府，並從金邊撤出外交機構。在中國的影響下，朝鮮等一批國家也表示承認。而蘇聯則選擇了承認朗諾政府，繼續向朗諾政府提供政變前答應給柬的軍事援助。中蘇對立的背景，使中國更加堅定地支持西哈努克的鬥爭。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建議：推遲中美會談，由毛澤東發表聲明支持國際反美鬥爭和西哈努克政府。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了極具激情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聲明（簡稱「五二〇聲明」）。聲明由周恩來創意、才子喬冠華根據毛澤東會見黎筍談話內容執筆修改而成。[129] 聲明指出：

>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敗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130]

次日在天安門百萬人集會上，西哈努克情緒高昂，先後用華語喊了十幾次「毛主席萬歲！」，毛澤東也說：「柬埔寨萬歲！西哈努克

128　王爰飛：《西哈努克沉浮錄》，上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頁180。西哈努克所言使人們多等候了一小時，指原定毛澤東一登上天安門城樓就開始放焰火的計劃因毛會見西哈努克而推遲，此次會見持續了一個小時。

129　張序江：〈重溫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520聲明發表的前後〉，《世界知識》，2004年第12期。

130　《人民日報》，1970年5月21日。

親王萬歲！」毛澤東還說：我們東方國家、亞洲國家，一百多年來是受氣的，現在逐步聯合起來，要翻身。

1970年6月美國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軍隊，實施「戰爭高棉化」的方針後，以柬共為主要領導的解放武裝力量開始集中打擊朗諾政權。由於有中國支援和越南軍隊參加作戰，幾年內，即建立了大片解放區，使朗諾政權陷入了政治上孤立、軍事上難以自保的境地。西哈努克曾經秘密回國，視察了已經解放的領土。到1974年，柬埔寨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已經解放，金邊解放也指日可待。

柬埔寨共產黨和西哈努克親王之間的關係，始終是中共對柬政策中最費周折的問題。西哈努克擔心柬共建立政權後對他實施報復，柬共則擔心西哈努克利用其影響與新政權進行抗衡。中國領導人為此花費了大量心血來說服兩家進行團結。1974年4月2日，毛澤東會見柬共代表喬森潘、英・薩利和西哈努克親王，談到柬埔寨解放後的聯合政權建設問題，毛澤東問喬森潘和英・薩利：你們對兩位親王，是要打倒他們，還是要團結他們？喬森潘連忙回答：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沒有理由打倒他們。西哈努克則不無憂慮地點出：主席閣下是指將來。英・薩利解釋說：在中國和越南援助下進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點。我們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會階層，即不排斥任何階層。我們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團結起來，而沒有理由排斥一個階層。毛澤東指出：要排斥朗諾集團，要團結兩位親王。我贊成你們的方針。西哈努克則表示：我現在和柬埔寨共產黨人為了共同的事業而戰鬥在一起。將來權力應當歸他們，因為軍隊和政府都不在我手裏。我甚麼都沒有了。因此，將來獨立的、拒絕任何外國統治的柬埔寨由共產黨來掌權是完全正常的。柬共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保留王國正統形式。[131]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紅色高棉收復金邊。4月18日，鄧小平前往元首府向西哈努克和賓努親王面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祝賀

---

131 毛澤東會見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代表團團長喬森潘和副團長英・薩利談話記錄，戴丹童：〈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爾布特與中國〉，《黨史文匯》，2000年第1期。

金邊解放的賀電。電報宣稱：在今後的鬥爭中，中國人民將永遠同你們站在一起，共同前進。6月19－21日，波爾布特率領的柬共中央代表團訪華，與鄧小平、張春橋等進行會談。鄧小平說：「今後你們維護同西哈努克、賓努之間的合作與團結，能使柬埔寨國家政局穩定、發展順利。」[132] 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毛澤東說：我們贊成你們啊！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不要完全照抄中國。8月26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即將返國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喬森潘等人，他語重心長地談道：希望柬埔寨人民加強團結。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國現正在這條道路上前進，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133] 8月27日晚，毛澤東會見了西哈努克親王和喬森潘等人。毛澤東要喬森潘向波爾布特轉達他的意思：「你們把這兩位親王接回去，要好好地幫助他們，吵架會有的，小吵架，大團結。」他還要求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親王的兩個兒子西哈莫尼與納林卡朋，不要強迫他們從事重體力勞動。並對西哈努克說：「如他們對你不好，你們再來中國，我們會熱烈歡迎你們。」[134]

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回國後即遭到軟禁，被迫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繫。1976年4月，西哈努克親王聲明宣布退休，賓努首相率原政府成員辭職。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實際已告結束。中國只能繼續支持柬埔寨共產黨獨掌的政權。同月，張春橋、耿飆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金邊，張向柬埔寨共產黨介紹了毛澤東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及辦「五七幹校」等實踐經驗。

中國支持西哈努克親王是真誠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都與西哈努克本人有着深厚的友誼。其實中國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個以柬埔寨共產黨為核心、團結西哈努克親王等開明人士的聯合政權。但是由於波爾布特等人改變了原先的承諾，推行極左政策，終於使中國的心血付諸東流。

---

1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78。

13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718。

1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78。

4 越南戰爭結束伴隨中越蜜月結束

在越南長期的抗美救國戰爭中，中國一直是支援最大、態度最堅決的國家。

僅1971年至1973年，中國向越南提供的經濟、軍事援助金額就已經超過90億元人民幣。1974年援助總額達到25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1.3億元美元的現匯。使這年成為中國援助越南數額最大的一年。從1950年代到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中國援助越南總額為203.6845億元人民幣，其中一般援助100.6742億元，包括糧食500萬噸、石油200萬噸、汽車3.5萬輛、船隻600艘；軍事援助金額為49.6679億元，其中輕重武器裝備可供200萬軍人使用；成套項目援助為36.2619億元，建設項目為450項，已經完成339項；美元現匯援助折合人民幣為17.0805億元。上述援助中除14億元是無息貸款外，其他全是無償援助。[135]

此外，中國還對越南進行了大量軍事支持。從1965年起，派遣大批掃雷、運輸、防空、工程、鐵道及後勤部隊進入越南，總計32萬人次。共擊落敵機1700架，俘虜美軍飛行員42人；修建改建鐵路479公里，公路1231公里。中國援越部隊共犧牲1442人，受傷4000多人。還為越軍培訓了大批軍事、政治和技術人員。從1965年越戰升級至1976年，大到導彈，小至牙膏，中國向越南提供的槍、炮、槍彈、炮彈、艦艇、坦克、裝甲輸送車、汽車、飛機、炸藥、通訊電器、軍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裝、藥品、衛生器材和食品等軍事物資，約合人民幣42.6億元，可裝備200餘萬人。[136]中國生產的新型裝備研製成功後，中國解放軍尚未裝備，就優先援助給越南。當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國的生產能力，中國人

1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51。

13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52；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272、273。

民解放軍即使動用庫存，甚至抽調現役裝備也要盡量滿足越南的急需。[137]

在整個越南抗美戰爭期間，中國對越南總援助加上中國援越部隊開支，已經超過200億美元。[138]這相當於中國六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經濟困難時期，每人每年拿出半個月平均收入支援了越南。但是，隨着越南戰爭的即將結束，中越之間關係卻出現了裂痕，由蜜月滑向低谷。其原因有四個方面：

（1）越南對中美關係緩和不滿。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後，為了消除越南方面的疑慮，周恩來第二天就秘密訪越，並於7月13日和14日連續與黎筍和范文同會談，通報了中美會談的情況。越南領導人當時未表示反對，內心卻十分不滿，在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聯美反蘇」、「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對此，周恩來批告說：「文中表現出越南同志的擔心和估計。……我認為可以全文發表，不要摘要，表示我們的光明磊落態度。」他還指出：「事變的進程，可以證明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始終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戰到底的。」[139]周恩來並對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阮氏萍說：「基辛格訪華剛走，我就立即去河內，把情況告訴親近的兄弟黨，等於我把心都掏出來了。……赫魯曉夫可以去美國談判，但我周恩來並未去華盛頓，你們可以去巴黎同美國談判，為甚麼我們不可在北京同美國談判，我們僅要求美國盡快撤軍，我們並未出賣朋友。」[140]此後，周恩來又反覆對外國新聞界發表講話，闡明中國的立場。周恩來強調：中美會談的內容都是兩國間的問題，不是針對第三國的；中國人民堅決

---

137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冊，頁273；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617。

13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52。

1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69－470。此文後因張春橋反對未能發表。

1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60。

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直到最後勝利；解決印支問題是屬於印支三國人民的主權，別人無權干預，而越南問題就必須由越南代表同美國直接談；中國沒有出賣任何原則，不像蘇聯那樣，公開不敢談，背後做買賣。[141] 在 11 月 25 日中越雙方簽署的聯合公報中，中國方面強調申明：中國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國戰爭是「不可動搖的既定方針」，中國支持越南關於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基本立場，即美國實現全部撤軍和放棄對阮文紹政權的一切支持。[142] 但是，越南領導人仍然堅決反對中美關係緩和。

（2）越南對中國提供的援助不滿足。

中國在爭取中美關係緩和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了不拿原則做交易的立場，一如既往地支持印支三國的抗美鬥爭。1971 年 9 月 27 日，中越政府在河內簽訂 1972 年中國向越南提供經濟、軍事物資援助協定。包括這項援助協議在內，僅1971年中國就與越南簽訂了七項無償援助協議，折合人民幣36.14億元，佔該年度中國援外協議總額度的 48.67%。[143] 1971－1973 年，即中美關係和解時期，恰恰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協定金額達 90 億元人民幣。[144] 僅就軍事援助而言，近兩年中國的援越物資超過了以往二十年的總和。[145] 把 1971－1975 年的援助項目與 1965－1970 年逐一進行比較，中美關係緩和時期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特別是棉

---

141 周總理同英國作家兼記者馬克斯韋爾的談話，1971 年 11 月 20 日，外交部編：《當前重大國際問題和我國對外政策》，福建省檔案館，全宗244，目錄1，卷宗77，頁53、54。

142 福建省檔案館，全宗 244，目錄 1，卷宗 77，頁 021－022；《人民日報》，1971 年 11 月 27 日。

143 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 484。百分數為筆者計算所得。

144 《當代中國外交》，頁 16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 51，另據蘇聯方面估計，1972 年中國對越援助額約為 50 萬美元。參見 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 1973. SCCD, f. 5, op. 66, d. 71, p. 88. 轉引自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 R. Dee, 1996), 231。

145 1972 年 5 月 19 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務動員會上的講話，國家計委檔案，20-0149。

布增加 1.6 倍，鋼材增加 1.25 倍，煤炭增加 17.1 倍，動力油料增加 17.85 倍，汽車增加 6.34 倍。[146]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在支援越南戰爭中消耗很大，對於越南方面愈來愈高的援助要求已無力完全滿足。在 1972 年底剛剛簽訂 1973年中國無償援助越南的協議後僅僅半年，黎筍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簽訂 1974 年援越協定，並提出了一個總值 80 億元人民幣的龐大計劃。周恩來認為該計劃不切實際，中國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應了 25億元的援助總額。[147] 越南方面隨即轉而向蘇聯提出要求，從莫斯科得到了它所要的東西：蘇聯決定將過去向越南提供的貸款改為無償援助，並答應到 1975 年向越南提供 10.7 億美元的援助。[148] 雖然蘇越之間也存在分歧，越南曾對尼克松訪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蘇聯則對越南人的「黷武情緒」頗有微詞；[149] 但是，越南為了得到物質援助，還是積極向蘇聯靠攏，蘇越關係進一步升溫。越南南北統一後，中國決定減少對越援助，越南對此更加不滿。1975年9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訪華，鄧小平對他說：

> 「儘管我們之間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我們仍盡力幫助你們，但我們這些年搞文化大革命，影響經濟的發展，已答應給你們援助的 200 多億人民幣，已付 170 多億，還有一部分需繼續完成，我們負擔仍很重。現在你們勝利了，我希望你們也讓我們緩一口氣，我們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原先答應援建項目，我們將盡力完成。」[150] 但這些解釋並未奏效。

---

146 《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頁 58。以上數字為筆者計算所得。

147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頁 51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598。

148 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103。

149 多勃雷寧著，蕭敏等譯：《信賴——多勃雷寧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 282－283；謝爾巴科夫關於越南勞動黨印度支那政策的報告，1971 年 5 月 21 日，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八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頁 4485－4503。

15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 63。

（3）在中蘇爭端中越南開始倒向蘇聯一邊。

中蘇發生論戰之初，越南的態度是盡力彌合，胡志明曾流淚對毛澤東說：蘇聯是大哥，中國是大姐，哥哥姐姐吵架，我們小弟弟難過啊。但是，中蘇矛盾仍然不可調和。即使在支援越南問題上，雙方也互不相讓，無法採取聯合行動。1966年10月5日，周恩來曾向前來斡旋的羅馬尼亞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堅決表示：在越南問題上，中蘇立場絕對相反，無聯合行動可言。蘇聯援越物資要通過中國，我按協議辦事。這個問題無聯合行動的可能。[151]在越南戰爭前期，越南在中蘇衝突中還是偏向中國一邊的，反對蘇聯攻擊中國。但是1970年代初，由於中國已將蘇聯視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中國聯美抗蘇的戰略目標與越南依靠蘇中抗美的外交方針發生了嚴重衝突。由此，在中國全力援越的同時，中越之間的矛盾卻逐漸加深。從與中國有特殊密切關係的胡志明逝世後，特別是越南戰爭即將結束、蘇聯加緊對越南實施拉攏時，越南的外交政策出現了重大轉折。

1971年4月，蘇共二十四大專門就越南問題做出特別決議，稱印度支那有可能成為蘇聯「通向整個東南亞的一把鑰匙」。根據這一決議，蘇聯一方面繼續分離中越關係，提出對越南獨立自主傾向的增強要支持、鼓勵，要使越南依靠蘇聯頂住中國的壓力；並特別注意在中美關係緩和問題上做文章，評說所謂「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的特徵」，挑撥越南認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是對越南的「出賣」和「背棄」，激化中越矛盾。一方面將對越援助「由短期過渡到有計劃的、以長期合作為基礎的援助」；特別是不斷增加軍事援助。[152]使蘇聯援助在一個時期裏質量和數量上都超過了中國。[153]

---

151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頁505。

152 謝爾巴科夫關於越南勞動黨印度支那政策的報告，1971年5月21日，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八卷，頁4485－4503。

153 在1972年春季攻勢中，越南使用的裝備90%是蘇聯製造的，而坦克和新型無後座力炮則全部是蘇聯提供的。參見多勃雷寧：《信賴》，頁280；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陳培華等譯：《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四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頁59。

越南方面開始改變胡志明路線，倒向蘇聯。1975年10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訪問蘇聯，雙方簽署宣言，確定兩國、兩黨實行全面合作，蘇聯答應將過去給越南的巨額貸款改為無償援助。1977年、1978年黎筍又兩次訪問蘇聯，與蘇聯簽訂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越南加入蘇聯控制的「經互會」，允許蘇聯在越建立海、空軍基地。

(4) 越南實行地方霸權主義和領土擴張政策。

越南、老撾、柬埔寨在歷史上曾是一個共同政權的殖民地國家。越南戰爭結束後，越南依靠龐大的軍隊，企圖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和蘇聯的支持，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越南曾經兩次向柬共提出建立「聯合軍隊」、「聯合經濟」、「共同外交政策」，均被拒絕。雙方在邊界不斷發生武裝衝突，越南並且支持柬共中的親越派製造分裂。中國反對越南的這種做法，也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一個原因。

同時，越南在統一南方的過程中，還對中國提出了領土要求。巴黎停戰協議簽訂後，1973年12月，越南主動向中國提出兩國商談「至今尚未劃分」的北部灣海域。但在談判中，越南又否定「至今尚未劃分」的建議，一開始就提出要按照1887年法國和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續議界務專條〉，將北部灣三分之二海域劃歸越南。結果談判流產。

在此期間，1974年1月15日，南越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派出軍艦入侵中國西沙群島海域，侵佔了金銀、甘泉等島嶼。1月19日，南越海軍向中國海軍巡邏艦艇開炮，雙方發生激戰，南越海軍潰逃。次日，中國海軍一舉收復了包括甘泉島、金銀島、珊瑚島在內的永樂群島，捍衛了中國的神聖領土。對於西沙、南沙群島，北越政府歷來發表的聲明、照會和出版的地圖，都承認是中國領土。但1975年4月北越南下解放南越時，派兵侵佔了中國南沙群島的六個島嶼；6月北越政府又發表聲明，宣稱西沙和南沙群島是「越南的領土」；隨後正式修改地圖，把中國西沙、南沙兩個群島標屬為越南領土。對此，1975年9月鄧小平對黎筍指出：「一年來，兩國邊界發生一些爭議，但問題不難解決。最近越南輿論界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愈來愈多地宣傳『北方威脅』，這會損害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對此感

到不安。」[154]但越南置若罔聞，於西貢解放後，還對越南南方的一百五十萬華僑採取了驅趕、分化和迫害政策。

到1976年，中越兩國關係進入了寒秋。雙方幾乎沒有互訪。中越邊境地區不斷發生衝突，1975年為493次，1976年高達986次。中越之間「同志加兄弟」的關係不復存在。

15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頁62－63。

第三章
毛澤東在選擇新的接班人中尋求平衡

從中共九大開始，毛澤東對激進的天下大亂表現出了疲態，開始反覆強調團結。他發出了九大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和「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號召。然而，剛過去不到一年，就在接班人問題上出現了尖銳矛盾，林彪與江青集團開始你爭我鬥。毛澤東在1970年廬山會議前，就已經覺察到了。當時，他實際上已經有隱約的傾向表示。在一次對汪東興等人的隨意談論歷史中，他說到，齊國和楚國打仗，我支持誰呢？我支持弱小的齊國。不僅少讀經書的汪東興當時沒有理解這段話的含義，就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學者也沒有看出其中的玄機。因為戰國時期齊國和楚國並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反而是聯盟，於是整理談話記錄者就認為「楚」是「魯」的相近發音，而將著名的「齊魯長勺之戰」張冠李戴。一段很有政治含義的話就被曲解為一般的談論史實了。其實，毛澤東說的齊國，是指江青、康生、張春橋等籍貫山東的「文革」派；而楚國，是指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籍貫湖北、江西的軍隊派。與林彪集團比較起來，江青集團是比較孤立和弱小的。

在林江之爭中，毛澤東再次提出「三要三不要」原則：「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寄託了他希望團結起來維護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衷腸。但是，事實又一次將他團結的願望擊得粉碎。林彪事件後一段時間，他

終於考慮出一個折衷方案——把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分而治之，尋求平衡。具體表現在選擇接班人問題上，同時起用王洪文和鄧小平。

一 周恩來失寵和「幫周」會議

1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疑慮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了空缺。從1950年代起，毛澤東就在為接班人的問題苦苦思考。在設置中央一線、二線的講話中，他確定了劉少奇為接班人。但是，隨着大躍進的失敗，劉少奇愈來愈顯示出對毛的思想、路線、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 1964 年底制定「四清」二十三條的時候，他開始考慮更換接班人。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庫的談話中提出了關於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條件。但是，這些條件都是目標性的，並沒有可操作性。

文化大革命發動之時，他確定了林彪作為接班人。其原因之一，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階級大搏鬥」中獲得軍隊支持，穩定局勢。內心裏並不覺得林是個合適人選。這一點，連林本人也認識到了。於是有了 1970 年代初期的激烈抗爭。

林彪出事後，毛澤東在反思中總結選擇接班人的教訓，一條就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和他共同開創事業的戰友，很難理解新的開創——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須從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中選擇。但是，這種人資歷甚淺，也沒有治國經驗，還必須有合適的人來輔佐。另一條是，接班人不宜像過去選林彪那樣只確定一個，過於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繼續考察和調整的機會。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選有：周恩來、張春橋、鄧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齡稍大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周恩來都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班人人選。但是，毛澤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來沒把周

當作接班人考慮過。其歷史原因，是他認為周在關鍵時刻容易動搖，難以把握正確路線。首先是1930年代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時期，周恩來作為最高決策層成員，與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傾錯誤路線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戰時期在長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進」。第四，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是表現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後，毛又出現了新的疑慮。

林彪事件中，周恩來殫精竭力，嘔心瀝血，籌劃局勢的穩定和善後工作。最長的一次，有兩天兩夜沒有合眼。儘管周恩來自己謹慎地不出人頭地，但他的大智大勇、無私奉獻仍然不脛而走，傳遍全國，確實是眾望所歸。

在打開中美關係緩和大門的決策中，雖然最高決策是毛澤東做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澤東設計和批准的，但是國內外對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神采奕奕的周恩來往來迎送、演說講話、磋商談判。再結合到周恩來向來是溫和派的代表，因此，國際上幾乎都把周當成了這一決策的主角。一時期，國外報章對周好評如潮。經常在毛澤東身邊活動的那兩個女翻譯因個人恩怨對周恩來不滿，就大加渲染地挑選這些材料讀給毛澤東聽，說：誰還把你毛澤東放在眼裏啊！這也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顯然從林彪出事、他上升為實際的第二位開始，就時刻在考慮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說明問題的預演。周恩來的姪女周秉德寫到了顯然是從周恩來當時衛士長張樹迎那裏得知的情景：

>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伯伯，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帶着小跑往電梯方向趕。衛士長張樹迎扶着伯伯走進電梯，他明顯感到總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裏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裏出事了。果然，一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平躺在牀上的毛澤東主席臉色發青，嘴唇發紫，彷彿已經沒了呼吸。張春橋、

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着。伯伯進去後立即向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席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着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牀邊，雙手緊握着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1]

現在看來，周的這種表白毫無作用，反而證實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澤東的憂慮是一致的。但若說毛只是怕周會分割他的權力，也不準確，毛深知他在世時周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死後周恩來會否定他的「文革」路線。「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於是，他又繼續對周進行敲打。

國際形勢成為國內矛盾爆發的一個導火索。利用中美緩和時機來到中國的各級美國官員，一再鼓吹蘇聯的主要打擊對象是中國，企圖利用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保護」，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同時又利用中國吸引蘇聯兵力，減輕美國在中東及世界其他地方與蘇聯爭霸的壓力。這個一石二鳥的計謀，首創者是基辛格。在這個背景下，1973年6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與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舉行了會談，兩國達成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協議〉等十三個文件。

周恩來在6月25日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指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按照周恩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蘇聯東歐司蘇聯處幾人討論，副處長張再執筆，寫成了一篇文章〈對尼克松—勃烈日涅夫會

1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頁330。

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簽定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不知甚麼原因，周恩來對這篇與他和布魯斯談話精神不同的文章卻批示稱讚：「值得研究。」又在給外交部的電話裏說：「寫得不錯。」[2]

7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3]

姑且不論毛、周之間在其他問題上的個人恩怨，僅就對當時世界上美蘇關係主要是勾結還是對峙的戰略判斷來看，周恩來稱讚《新情況》的傾向是欠準確的。1970年代，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幾乎相等，出現了一種相持狀態，但這並不意味着兩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是兩國更加尖銳的鬥爭。20世紀後期以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美蘇之間的聯合是暫時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直至蘇聯瓦解。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了更高人一等的戰略眼光。

因此，毛澤東聽了女翻譯關於《新情況》的匯報，對此文大為不滿，說「放屁一通」。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後，7月3日，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及美大組負責人寫信，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誠懇地承擔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鑑，發揚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來交換意見。不要怕我忙，為大事而撇開小事，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毛澤東看了周恩來與布魯斯的談話紀要，稱讚說：「這下腰杆硬了，布魯斯就『舒服』了。」[4]

2　宋進一：〈153期《新情況》和基辛格第六次來訪給周恩來帶來的政治災難〉，《中華兒女》，2001年第9期。

3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56－357。

7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張春橋及兩個女翻譯王海容、唐聞生進行了一次談話，仍然針對周恩來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評說：

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甚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

都說此文（引者註：指外交部《新情況》簡報）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不要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7月5日，他在周恩來給外交部的信上又批示：「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有，宜研究改正辦法。」7月15日，周恩來將外交部起草的檢查文章〈《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送毛澤東，並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澤東將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中的「嚴厲」刪去，並批示：「檢討不要寫了」。[5]

根據毛澤東這次談話精神，起草中共十大報告的張春橋在報告中寫進了實際是批評周恩來的這樣一段話：「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6]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他唸到這段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說：對。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56－357。

6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3年9月1日。

事態到此，並沒有繼續發展。但是，基辛格的第六次訪華又釀成了更大風波。1973年11月10日的下午，一架美國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上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夾着他那隨時不離身的皮包，走下了舷梯，開始了他的第六次訪華。和以前五次相比，這次並沒有引起外界更大的關注，因為，中美兩國已經在5月互設了聯絡處，結束了帶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

11月14日上午，行色匆匆的基辛格登上飛機，離開北京。四天裏，他會見了毛澤東，與周恩來進行了多次會談，但沒有產生甚麼震驚中外的新聞。然而，基辛格走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令美國人大惑不解、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不明內情的事件[7]——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奉毛澤東指示，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四人幫」乘機對周、葉進行大肆攻擊。周恩來被迫進行了違心的、甚至是過分的檢查。這次事件被中共黨史界稱之為所謂「幫周」會議。

2 「幫周」會議的風暴

周恩來、基辛格會談的第二天，王海容、唐聞生來見周，拿着會談的記錄稿，有些段落下面已經畫了紅杠杠。王、張將有杠杠之處唸出來，一一詢問：「您是這樣講的嗎？」周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8]

王、唐來到毛澤東處，從張玉鳳那裏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沒有見毛澤東也沒有來電話。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甚麼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9]

7　外交部老人戲說，奇數年訪華的基辛格是個「災星」，他1971年訪華後出了林彪事件，1973年訪華後開始批周，1975年訪華後開始批鄧。

8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頁330－336。

9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11月17日，聽了兩位女翻譯匯報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的談判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雷霆震怒」。當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10]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事先了解毛澤東態度的江青首先發難，斥責周恩來迴避實質，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拍案而起與之爭辯：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大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江青冷笑說：走着瞧！會後，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18日，王海容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和以前與美國國防部長會談的葉劍英的錯誤。從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釣魚台十七樓開會，開始還只針對中美會談中周的問題，但是沒過幾天，毛澤東住處游泳池傳來話：後排議員要參加批判修正主義，政治局會議多加幾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幾個人，一塊兒討論討論。外交部負責人姬鵬飛、喬冠華、黃華、仲曦東及擔任中美會談翻譯的章含之、羅旭共六人，被毛澤東點名與會。

會議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周恩來主持變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員也連夜趕來參加。王海容、唐聞生是這次會議的毛澤東聯絡員，每天由她們向毛匯報會議情況，再把毛的指示傳達給會議，控制會議走向。由江青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一個「幫助周恩來」小組，成員有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汪、華後來退出，全由「四人幫」和王、唐做主。

---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670。

會議中，江青和張春橋等人肆無忌憚地批判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給美國人下跪」。範圍已經擴大到從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以來的所有外交活動，繼而上升到權力之爭。江青說，這是繼林彪事件之後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錯誤路線的頭子」。王海容特地說明：7月4日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中批評的「賊船」，指的就是周恩來。與會的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列席者，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對周恩來進行了批評。[11]不明真相的個別人如許世友甚至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想當兒皇帝」。還有人趁機討好江青。周恩來本人進行了過分的自我檢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他「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面擺個茶几，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他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鬥的架勢」。葉劍英儘管解釋自己不管外交，與美國人談判是被周拉進來的，也沒有逃脫批判矛頭。有一次，葉劍英坐在後面，江青大聲叫他坐到前頭來。葉回答：「坐前頭就前頭，怕甚麼！」周恩來因為手顫抖，請喬冠華幫忙整理記錄，誰知遭到女翻譯怒斥喝止，規定周的檢查只准自己寫，不准秘書幫忙。會議結束，第一個讓周恩來出來，會議再繼續進行，商量下一次怎麼批判。周恩來「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面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衛士趕緊用雙手架着他上電梯。[12]

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從「十次路線鬥爭」說法而來。即「文革」中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鬥爭」。這「十次路線鬥爭」，後來被歷史證明，有些並不是「路線」性質，還有些根本就是顛倒是非的（如對彭德懷、劉少奇）。江青將周恩來說成「第十一次錯誤路線」的頭子，目的就是想將他置於死地。會議

11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87－289。

12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頁330－336。

期間，她迫不及待地將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毛澤東。

會議是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進行的。出入會場，專為會議服務的人員都經過挑選和特殊的交代。剛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來的服務人員流淚說：「這哪裏是甚麼幫助總理啊？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他們是想要打倒總理啊！」連江青的服務員小趙也哭着對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總理。他們開完會回去，一起喝葡萄酒慶祝乾杯呢！」原來主動向周請示問好的一些中央政治局成員，現在見面盡量迴避周，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示冷淡。連對周的隨從工作人員也不敢理睬。把他們冷落在一邊。周的隨員互相之間甚至提起了要準備被捕。只有葉劍英、紀登奎暗地裏向他們關心問候周恩來的身體狀況。[13]

在這十多天裏，周恩來仍然要繼續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動。他先後會見了阮友壽率領的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塞克率領的塞內加爾政府代表團、岡崎加平太率領的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訪華團、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艾什瓦爾雅，與他們進行多次會談，簽定協議。周恩來的疲倦和痛苦，被細心的日本人發現了。11月28日，岡崎嘉平太在日記裏寫道：一個小時的會見，「總理消瘦，顯得疲倦……」。[14]以後，基辛格也寫到：「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他的地位已經遠在毛主席之下」。[15]

按照周恩來對鄧穎超的交代，這是他「文革」以來繼「伍豪事件」風波後面臨的第二個最困難局面。

毛澤東了解到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以後，12月9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後，曾分三批先後同王洪文、周恩來和翻譯王、唐

---

13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10－315。

14 《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編：《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484。

15 〔美〕威廉·伯爾：《基辛格秘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頁185。

談話，指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16]他還說：不能搞紅衛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那一套，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幾個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於人世的了。[17]毛澤東還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譯說：「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18]於是，「幫周」會議宣告結束。王海容不動聲色地對周恩來衛士高振普說：「你又可以吃宴會了。」[19]意思是周恩來仍然負責外事工作。

但是，毛澤東既然肯定了「幫周」會議，周恩來面臨的態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12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根據毛澤東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幫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提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20]對周恩來的「批評」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他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裏來。」在談到打仗問題時，他再次指摘「投降派」說：敵人「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兒皇帝的」。[21]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35。

1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472。

18　毛澤東與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會談記錄，1973年12月9日。

19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37。

2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36。

21　據王海容、唐聞生當時的解說，「兒皇帝」是指周恩來。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接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後，對陪同接見的周恩來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毛澤東笑着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這年夏天，毛澤東會見外賓，因為沙發不夠，周恩來便坐到椅子上，把沙發讓給翻譯。毛看到了，指着翻譯王、唐對外賓說：總理可憐哪，被這些娘們整得這個樣子。[22]

這次「批周」事件就這樣結束了。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離不開，又總不滿意，實質是覺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卻絕不會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機鬧事，結果也被毛澤東批了一下。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讓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團大失所望。[23]

3 周恩來究竟對美國人說了些甚麼

三十多年過去以後、由於缺乏資料，這次事件仍然撲朔迷離，在人們中流傳着種種不同的說法。當時的傳言是：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對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問題沒有正確表態，也有人認為是關於台灣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後，在中共中央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還有人提出，周恩來並沒有任何錯誤，是毛澤東在對美問題上態度「出爾反爾」。現在的說法，也多因周後來受到嚴厲錯誤批判而持同情態度。

風波因對美方針而發。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在會見中，毛澤東曾經談笑風生地提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歐洲的「一條線」戰略，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

---

22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2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87－289。

毫無疑問，毛澤東、周恩來的聯美反蘇原則是明確的，也是一致的。那麼，是周恩來確實對基辛格說錯了話，還是毛的「出爾反爾」？1999年初，美國國務院宣布解密一批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其中包括當時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為解開這個謎案提供了一些根據。

美國確實有一個「核保護傘」計劃。

1973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向尼克松總統提交了核武器應用政策草案，其中關於「中蘇案例研究——一個例子」假設提出：「蘇聯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清除中國的核能力。在用核武器打擊了發射場之後，蘇聯空軍奪取了某些中國核武器發展和製造設施，並開始從蒙古和中亞進行地面會合作戰，並威脅侵略滿洲」。「此時，中國向美國尋求幫助」。報告提出美國的對策是，用核武器襲擊蘇聯軍隊，支援中國：

兩個地區核選擇被加以討論：用戰鬥轟炸機對中國境內某些蘇聯控制的空中支援機場進行打擊，以及用戰鬥轟炸機對侵入中國境內的蘇聯核能力進行打擊。

四個有限核選擇被加以討論：

1、B－52打擊蘇聯侵入新疆的軍隊。

2、用B－52或北極星導彈打擊蘇聯的鐵路和公路走廊以截斷其供應。

3、用B－52和海軍飛機打擊經挑選的空防系統。

4、用B－52和北極星導彈打擊蘇聯在本土基地的常規力量。[24]

基辛格就是帶着這個「核保護傘」計劃來到北京的。當天，也就是11月10日，晚上9時25分，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同行的官

24　菲爾·奧迪恩致基辛格備忘錄，1973年6月8日。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 June 8, 1973. Top Secret Subject: NSSM 169—Nuclear Policy June 8, 1973.

員洛德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單獨會談。基辛格先向周恩來簡要介紹了5、6月他訪問蘇聯時與勃列日涅夫會談的情況。他別有意味地特別提到這樣一件事：

勃列日涅夫安排和他一起去樹林打獵，實際上是從一個搭好的台子上射擊驅趕來的動物。勃列日涅夫津津樂於此道，疲而不倦。打獵結束後，在用野餐時，勃列日涅夫忽然屏退左右，只留下翻譯，鄭重其事地對基辛格說：「蘇聯和美國有共同的責任阻止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怎樣阻止呢？基辛格立刻意識到，這就是要對中國核基地進行毀滅性打擊。因為在1964年中國原子彈即將試驗成功之際，美國約翰遜總統也曾向蘇聯提出過相同的襲擊中國核基地的建議，那時被蘇聯拒絕了。

這回，同樣的建議再次提出，只不過雙方調了個兒。基辛格表示，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朋友，沒有認識到美蘇兩國有這樣的共同責任。勃列日涅夫不耐煩地吼着：「好吧，你們可以交你們想交的任何朋友，但你們和我們必須是夥伴。」他再次重複：「我們有共同的責任防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

基辛格對周恩來說：「自那時候起，蘇聯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會上提出與我們交換有關中國的情報，他們這樣做意味着蘇聯應與美國享有同等權力，並且還要有足夠的武器摧毀中國，這些武器還應隨着中國的形勢變化而每年有所增加。」

周恩來對基辛格的這一說法提出疑問：「蘇聯有人造衛星，每天都可以觀測中國。那他們還想要交換情報？」

基辛格解釋說：「他們想從我們這裏得到一個暗示，當作一個合作的標誌，而不單單是情報。他們希望我們接受的是破壞中國的核力量的要求。」他還說，美國政府內部安排了一些研究，向中國提出可以使中國在遭到蘇聯突然襲擊時減少軍隊傷亡和提前報警的技術建議，並表示可以由隨行的豪爾司令來具體介紹。這件事只有四五個人知道。

周恩來並不相信蘇聯馬上要攻擊中國，但他最後還是說：「不管怎樣還是謝謝你的情報和忠告。」

11月11日下午3時15分，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廳與基辛格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基辛格也許是出於真心，欽佩地對周恩來說：「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着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係。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談問題，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不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恩來馬上制止他的話說：「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你剛才說我們的關係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們同意這一說法。本着這種態度，我們甚麼問題都可以討論。」

11月12日下午3時一5時2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賓館三號樓進行第二次會談。然後兩人驅車前往中南海，毛澤東要會見基辛格。

毛澤東對基辛格的用心一目了然，說：「蘇聯統治不了，它野心很大，能力不夠。你看，你們當年在古巴把它一威嚇，它就跑了。」

基辛格說：「我們知道蘇聯在中國邊境每一個師的位置。」

毛澤東說：「它在亞洲要對付這麼多方面，要對付太平洋、日本、中國、南亞，好幾個國家。統共只有一百萬軍隊，守也不夠，更談不上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基辛格立即矢口否認美國想這樣做。

毛澤東下結論說：「所以我的意見是蘇聯野心很大，歐洲、亞洲都想霸佔，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當基辛格說到他對周恩來說過蘇聯首先想摧毀中國的核力量時，毛澤東笑了：「我們的核武器只不過是一個小手指頭。」

這個比喻的意思是：首先，蘇聯不會把中國當作主要敵人，與蘇聯擁有的幾千枚導彈相比，中國的幾十枚導彈對它構不成威脅，蘇聯的戰略重點還是在歐洲。其次，中國人從不迷信核武器，當年沒有核武器，中國還是在朝鮮與美國交了手。

顯然，基辛格沒有能挑起毛澤東對蘇聯的恐懼，美國提供情報援助的建議也沒有機會提出來。

11月13日晚10時，基辛格與周恩來、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再次進行會談。基辛格進一步提議：「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在裝備上及其他方面給予援助。」「目前基於互利，我方應提供給你們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衛星系統可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遞給你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衛星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將消息傳給你們。」「另一個方法是我們雙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上簽署協議，就像我們和蘇聯簽署的一樣，並且也建立一條熱線。」基辛格還說：「我只是在考慮如何建立一條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熱線。我們也可以提供某種雷達的科技，但是你們必須自己去建造。」

對此，周恩來只謹慎地回答：「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必須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離去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着。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

當晚的會談一直進行到次日也就是14日的0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要馬上答覆，要報告主席。立即前往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

14日早上7時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最後一次「一對一」會談。參加者僅有中方的周和翻譯唐聞生，美方的基辛格、豪爾和翻譯。

對美國的建議，周恩來沒有明確答覆，只說：「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如此一來，我們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

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回答：「在我們這邊，主要負責的人是我本人與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25]」

25　指中方參加會談的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秦洪江。

基辛格最後留下了兩份協議，一份是建立熱線的，另一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26]

到基辛格離開北京前，美方提供情報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明確結果，周恩來僅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實際上，由於此後的周受到批判，中方以後再也沒有提起協議問題。

送走基辛格後當天即1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提交了送審基辛格訪華公報稿的報告，當日毛澤東等人圈閱。[27]以後，就有了上述兩個女翻譯登門核對會談記錄的軒然大波。

撥開所謂「幫周」會議的迷霧，可以看到：這次會談中，周恩來是遵循毛澤東的聯美反蘇外交原則進行的，他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也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放棄甚麼。美方雖然有個「核保護傘」計劃，但基辛格鑑於以前黑格提出「保護」被怒斥的教訓，只謹慎地提出了建立熱線的建議，也沒有要求任何交換條件。今天看來，如果在平等基礎上中國能夠得到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軍事情報，自然對國家安全極為有利，何樂而不為？畢竟中美兩國在1988年還是建立了熱線。當然，美國也可能企圖用一些信息來誘導中國，但畢竟判斷權在中國。這談不上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

同時，周恩來也確實對美方提議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雖然他沒有做明確的許諾，也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才能決定。但是，畢竟有了基本接受和繼續商議的表態。基辛格的「核保護傘」建議雖然會給中國帶來某些實際好處，但是這種直接商議對中國領土提供軍事保護的建議，顯然會傷害「文革」時期本來就神經過敏的中國領導人的自尊心。從程序角度上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不請示最高領導人也是難以想像的。尤其是周恩來這種指定中方繼續會談負責人只有周、葉、

26　以上引文均見：〔美〕威廉·伯爾：《基辛格秘錄》，頁189－243；傅建中編著：《季辛吉秘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153－176。留下的協議中是否就是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關於「核保護傘」的內容，尚不明確。

2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70。但是否當面匯報了14日晚基辛格提出的軍事合作建議，仍然不得而知。

蔡的表態，發生在毛澤東已經產生疑慮、批評外交部《新情況》的時候，事後周又沒有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對一貫謹慎的周恩來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時失策。

毛澤東是否「出爾反爾」？關鍵在於他是否同意了周、基13日晚會談時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合作建議。據喬冠華回憶，14日早晨會談前周對他說，毛主席同意了，現在就答覆基辛格。但是，據張玉鳳的回憶，周確實事前沒有報告毛，其他有關著作也都記載是周恩來當夜因毛已睡並未能見到毛，沒有報告。[28]由於當事人均已作古，這只能成為一個永遠的謎了。毛澤東的一貫態度是比較明確的，一方面做出聯美反蘇的決策，一方面警惕美國利用蘇聯壓力打「中國牌」和控制中國的圖謀，因而強調反對「投降主義」。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對美國人的建議仍然耿耿於懷。他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時說，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送給我們「保護傘」，我們說：非常感謝，我們不要。

表面上，之所以發生這場風波，歸根結柢是在「文革」的不正常狀態下，複雜的中美蘇三角外交決策完全依賴毛澤東個人決斷，信息反饋僅僅信用個別身邊人的匯報。實質上還是毛對周的基本判斷在起作用。當然，毛的態度和「四人幫」上綱上線打倒周恩來，是不同的。

二　毛澤東關於接班人的抉擇：張春橋、鄧小平、王洪文

1 張春橋的致命問題——「叛徒」歷史

除了周恩來之外，從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看，毛澤東最合適的接班人選是張春橋。

28　由於喬並未直接見到周向毛報告，因此筆者傾向於周未向毛報告之說。

(1) 他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大功臣。在「文革」中，他歷經了六次鬥爭，也可以說是押了六次賭注，都取得了毛澤東的最後表態支持。

第一次，是張春橋秘密組織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與彭真、陸定一代表的中央宣傳部門鬥爭。

從1964年開始，他就在江青策劃下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張春橋自己回憶說：「我在1964年，90%的時間在搞兩個戲和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篇文章。」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意圖的了解，甚至早於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和組長陳伯達。那時，張曾經上北京向康求教，不知道底牌的康對他不屑一顧。因為江青對毛澤東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到了批《海》劇文章發表，康知道幕後情況，不得不對張刮目相看。而陳伯達，是在1966年4月主持起草中央〈五一六通知〉時，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這個月，林彪在看張策劃的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時，才第一次和張見面，知道其人。林還是輕蔑地一言不發。當時，張冒的政治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起初毛對寫批判文章沒有表態支持，而瞞着中央進行這種活動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寶盒揭開，張押中了，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彭真、陸定一倒台。

第二次，是1966年6月，華東局書記處和上海市委先後開會，討論如何控制局勢。張春橋反對派工作組的做法：「要放手發動群眾，要讓孫悟空大鬧天空，不准設置障礙。」7月，劉少奇來到上海，支持了曹荻秋派工作組控制局勢的做法。張又陷於孤立。直到月底毛澤東回到北京，指摘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使張又一次中彩，他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小組會上第一個點名尖銳批判劉少奇派工作組並揭發其「歷史」問題：「毛主席還健在，（劉少奇）不只講一次，全國到處講！攻擊調查研究，實際上就是攻擊毛主席思想的基礎。完全是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報告的口吻！我看這個問題太大了！」

第三次，是1966年11月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身份擅自表態支持了上海安亭事件中的工人造反派。如果說前兩次是因為從江青那裏摸到了底牌。這次確實是張的個人決斷。當時，周恩來、陶鑄，包括陳伯達三個常委都支持上海市委、指示不向造反派讓步。張春橋再次回味了毛澤東「文革」以來支持造反的種種談話和指示，決定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再孤注一擲，賭上一把，簽定了承認造反派行動的協議。11月16日的中央常委會上，毛澤東拿出〈憲法〉來，說：「工人有結社自由。」這是肯定了「工總司」的成立。然後支持了張春橋的處理辦法：「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張春橋又取得了勝利。上海市委不久被徹底打倒。

第四次，是眾所周知的1967年2月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張春橋與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等一批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激烈交鋒。因為導火索由張春橋在上海的奪權引起，江青未到會，陳伯達又不善言辭，張成了眾矢之的，獨自舌戰。結果，毛澤東對老帥大發雷霆，定性為「二月逆流」。張的氣焰達到了頂點。

第五次，也是張最驚險的一次——與林彪集團的鬥爭。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策劃，陳伯達主持，葉吳李丘等發難，形成了對張的圍攻，要求「揪出」「反革命分子」張春橋。由於許多中央幹部也對張不滿，紛紛加入到抨擊行列中。張在小組會上「臉色灰白，冷汗直流」。又是毛澤東的表態拯救了張，他寫出「我的一點意見」後，張轉守為攻，林彪集團則進入策劃政變的秘密狀態。在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裏，首當其衝打擊的就是「筆桿子」張春橋。林立果等還具體策劃了攻打釣魚台幹掉張的軍事行動。最後，卻讓張記上了粉碎林彪集團的首功。

第六次，只能說是一個插曲。即張、姚反對周恩來的批「左」。這是個帶理論色彩的爭論，奠定了張後期的「文革」理論基礎。

（2）張是毛澤東「文革」理論的最好闡述和發揮者，是「文革」的第一筆桿子。

早在1958年大躍進中，張春橋寫出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文章就得到毛澤東青睞，親自加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從1964年張策

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中央許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其筆或經過其作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評「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連膾炙人口的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也由張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論的中共九大報告，原先由陳伯達起草，後毛決定交給張、姚起草。中共十大報告也是張主持寫成。

在理論方面，張春橋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發揮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理論，雖然「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沒有被毛認可，但還是形成了理論基礎，在11月被表述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完整理論。他還提出了教育戰線「兩個基本估計」和「全面專政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文革」代表理論。因此1976年上海「四人幫」黨羽提出「張春橋思想」是「第四個里程碑」(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為前三)，是有所本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從未見到毛澤東比較嚴厲地批評張春橋。即使在1975年批評張的「反經驗主義」文章時，也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表示「自己沒看」，「對不起小張」。這在筆桿子中是罕見的。

(3) 張春橋和戚本禹、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貴不同，有着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資歷，算得上是個延安出來的老幹部，而且歷經上海「左聯」成員，延安陝北公學宣傳部長，《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石家莊市委秘書長，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等職務，從基層提升起來。1917年出生的他，這時五十五歲，年齡又較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等有合適的差距。

以上三種因素，使得毛澤東曾經幾次把張春橋作為接班人考慮過。一次，毛與林彪談到林之後誰接班的問題，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極大疑慮。周恩來逝世後的1976年4月，毛澤東考慮接班人選時，又提出了張春橋，因毛遠新和汪東興的堅決反對而作罷。毛澤東為甚麼最終沒有選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張春橋的歷史問題是一個致命弱點，而且在「文革」後期的支持「文革」派與反，

「文革」派激烈鬥爭中成為一個隱秘焦點，至今仍然是個沒有完全解開的謎。

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裏，林彪集團已經明明白白地寫道：「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雖然中央發文時加了個註腳：「這是林彪一夥對張春橋同志的造謠污衊和陷害。」但並沒有明確說明根據，反而等於把張的「叛徒」問題昭示天下。因此，當時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這樣印發，但毛澤東不知出於甚麼考慮，執意要這樣做。

1973年4月9日，剛復出的鄧小平、卓琳夫婦來到北京西郊頤和園西面的玉泉山麓，看望身患沉屙的周恩來。這是時隔七年之後兩家人的第一次會面。周恩來首先對鄧小平說的話，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着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29]根據已有資料，這是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第一次被正式提到中央領導人的面前。

1974年12月23日，病情加重的周恩來剛剛做完大手術不久，就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事籌備情況。周恩來在長沙逗留五天，和毛澤東進行了四次促膝長談，12月26日，趁王洪文不在，在單獨談話中，周恩來又對毛澤東說：懷疑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只表示已經知道了。[30]可能他已經派人調查過，認為不是大問題。

1975年8月，久病纏身、奄奄一息的康生託鄧小平帶話，要王海容、唐聞生來見他，王、唐請示毛澤東後前往。康生對她們說：我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有件心事總放不下，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你們可以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他們可

---

29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75。

30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49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87、688。

以證實江青、張春橋是叛徒。[31]他還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訴了與毛澤東過從密切的章士釗女兒章含之。

1975年12月，病入膏肓的康生自覺人世不久，突然提出要到醫院去看望同樣久病不起的周恩來。救護車開進院子，躺在擔架車上的康生吸着氧氣，輸着液，掙扎着與周恩來單獨在房間密談了一個小時。[32]談論的內容無人知道，只有偶爾進去的醫護人員聽到，他們在談論江青、張春橋歷史上的叛變行為。康生要和周一起聯合寫報告給毛澤東，周恩來拒絕，認為康生作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單獨給毛寫報告。後來，康生果然寫了報告，但是否到了毛澤東手中，不得而知。

1976年4月下旬，江青聽聞已經去世的康生生前有此舉動，找章含之問情況。4月25日章含之給毛澤東寫了關於康生揭發江、張歷史問題的報告，認為「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5月13日，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要章含之和他的丈夫外交部部長喬冠華把所有的情況向中央五人小組匯報。5月17日、喬、章向包括張春橋在內的五人小組當面匯報了康生的揭發情況。江青在喬、章寫的材料上批示破口大罵：「此類事逐漸會揭發出來，我看他們是否高超過林彪？據說，他們的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過之而無不及。」表示自己要「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33]張春橋沒有寫一個字。

7月下旬，江青又要求見毛，說有要緊的事，毛沒有同意見她，只派張玉鳳去聽。江說：釣魚台八樓那個人（指康生）已經好幾次不

31　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內部發行；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6年12月，頁50、51。

32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頁364、365。

33　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6年12月，頁48。

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還整我，說我歷史有問題，是叛徒。這個人不好，他反主席。陳伯達、總理和他的關係也很好。張回來向毛匯報後，毛沒說話，只點點頭。[34]

江、張歷史問題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爆炸。採取行動前夕，華國鋒問汪東興，解決以後如何整理專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經準備好了，一查檔案就可以解決。1976年10月7日，即隔離「四人幫」後的第二天，由汪東興建議，華國鋒給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寫了一張條子，要他去中央組織部調走了屬於絕密材料的「四人幫」全部歷史檔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指出：「根據大量的確鑿的證據，現已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主要依據是：「1933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1935年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偽造入黨歷史」。[35]

這些材料並沒有證實以前的「叛徒」說法——因為張從來沒有被捕過。即使定性「國民黨特務」，也不屬實。本來，這些只是個人歷史問題，但是，在那個依靠專案定性的時代，個人歷史問題就成為一個可以左右接班人決策、改變整個黨和國家歷史的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張的歷史問題進行一番考證。

關於「1933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

1933年春夏之際，濟南高級中學一個叫李樹慈的學生找到張春橋，要和他發起一個文學組織「華蒂社」。粉碎「四人幫」後的1976年11月13日，李樹慈揭發交代：

---

34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35 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1977年3月。

> 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蜂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
>
> 復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共產黨爭奪青年，抵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蒂》刊物，跟學生聯繫交往，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復興社提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模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著《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推銷。[36]

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認，張春橋起初並不知道李樹慈有復興社的背景，一旦知道後就退出了「華蒂社」。1944年和1956年，張曾兩次向上級黨組織交代了這些問題，並且說：「這件事我一直沒有把它當作我的一個甚麼問題。這說明我對這個問題是不夠嚴肅的。」[37]黨組織也確實沒有將其當作問題。因為張當時只是十五歲的中學生。當時受命準備發展張加入復興社的金燦然，[38]1949年後曾任文化出版部門的重要職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時，也未曾給他扣上項「特務」這罪名。

關於「1935年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

1935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以周揚、夏衍等人為主的黨內領導者，認

36　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1977年3月。

37　張春橋：《反省自傳》，1944年11月；張春橋：《自傳》，1956年3月。

38　金燦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馬列學院研究歷史，任范文瀾的助手，參加編寫了著名的《中國通史簡編》。1949年後歷任文化部出版局長、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等，1972年含冤病逝。

識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確實存在着「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於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了新的「中國文藝家協會」。而魯迅對此產生抵制情緒，表示「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甚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39]「也要聯合國民黨，那些先前投敵的分子，是最歡迎的了。」「我確是不容易改變，就算記住敵人的仇恨是一種錯誤罷，也就只好錯誤了。……不念舊惡，甚麼話！」[40]

1936年，爭論已經公開化。6月7日，周揚發表〈關於國防文學〉文章，批評關門主義和宗派情緒。8月15日，馮雪峰替魯迅擬稿，經魯迅修改和增補，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一文，進一步明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並猛烈抨擊「國防文學」。張春橋一開始就堅決地支持代表黨組織的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於1936年3月15日以「狄克」為筆名在《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了一篇批評《八月的鄉村》的文章，題為〈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魯迅於4月16日寫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駁。當時，像這種爭論舉不勝舉，相比來說，張文還不是公開「攻擊魯迅」。因此，胡風譏諷張春橋是以「革命領導者」的架勢寫了這篇文章。魯迅當時也沒有視為敵我之爭，說：「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表現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

顯然，在這場爭論中張春橋的立場是緊跟黨組織行為，他後來到了延安仍然堅持認為這是追隨「黨的方針」。剛粉碎「四人幫」，周揚尚未解放時，《人民日報》的文章這樣說到張春橋和他的關係：

> 就是這個張春橋，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跟周揚等「四條漢子」一起，充當「圍剿」魯迅的急先鋒，充當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的一條叭兒狗。他在反動的《大晚報》上，

39 魯迅：《魯迅全集·書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50。

40 馮雪峰：〈回憶魯迅〉，載《雪峰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四卷，頁129。

化名「狄克」，拋出黑文章，攻擊魯迅「把一個良好的作者送進墳墓裏去」，其目的就是要挾魯迅向他們的「國防文學底路線」屈服，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屈服。[41]

而周揚氣憤地在底下予以否認：「有人寫文章說張春橋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一文是我授意寫的，說文中的「有人」就是我，這不僅是不實事求是，而且可以說是誣害。」[42]

至於張文發表在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也不能說張受其指使，理由無須再論。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

此事最為複雜，也是張一直苦惱向黨組織說不清楚的歷史。1935年10月，他由尤兢（即于伶[43]）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6年4月，張春橋由吳成志（真名宋振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沒有寫自傳和填表，沒有宣誓、沒有預備期，而且一下子成了「支部宣傳委員」。

1938年1月，張春橋到了延安，因為沒有任何組織關係，也沒有人能證明他1936年曾經入過黨。他只好重新入黨。1950年10月，張在填寫簡歷時寫道：「1936年4月在上海經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1938年8月在延安經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39年2月轉正。」[44]1955年11月，張在擔任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書記後，再次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確認他1936年4月起的黨齡。並且提出

41　魯迅研究室大批判組：〈魯迅痛打落水狗張春橋〉，《人民日報》，1976年10月31日。

42　陳漱渝：〈周揚談魯迅和三十年代文藝問題〉，《百年潮》，1998年第2期。

43　于伶，戲劇作家。江蘇宜興人，1931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北方部」，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到上海後，先後擔任「左聯」劇聯總盟組織部長、劇聯黨團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秘書等要職，分管戲劇、教育、語言等左翼文化團體。

44　張春橋填寫的〈華東軍政委人事局制職員簡歷表〉，1950年10月。

了請當時任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廳長的宋振鼎給他寫一個證明材料。但是，調查的結果並不如他願。宋振鼎只是含糊地說：

張春橋入黨時間我已記不清（我記得離抗戰時間不遠），可能是一九三七年，不是一九三六年。那時上海黨對發展黨員很嚴格，一般的只放在黨外工作，但發展手續又很不完全，我只記得張春橋是提到黨組織批准的，由吳仲超通知我同意張入黨，既無明確的介紹人，也沒有填表。[45]

再找當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他說了一番很值得推敲的話：

我和張春橋同志以前沒有見過，所以不認識，解放後到上海才認識起來，關於張春橋同志何時入黨及一九三七年他到濟南後為甚麼沒給他轉關係，我已記憶不起來了。

那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獄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認識，當時都在找黨的關係，我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經張執一同志才與黨取上聯繫，組織綢廠工作委員會，從此又開始黨的活動。宋振鼎同志出獄後在上海曾聯繫了一些脫黨的同志，後來當和黨取上聯繫不久恢復了他的黨籍。[46]

面對調查結果，張春橋自己解釋：

我想了幾天，實在弄不準確了，我記得當時我還穿着夾衣，下着細雨，我一直記得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現在我想可能是我記錯了，正確的日子應當在一九三六年秋，或者一九三七年春，因為

45　宋振鼎給上海市委組織部寫的證明材料，1956年1月。

46　吳仲超給上海市委組織部寫的證明材料，1956年3月。

穿夾衣這一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如果是一九三七年，我為甚麼記成一九三六年呢？我到現在還想不出一個解釋。[47]

粉碎「四人幫」後，不再有顧忌，1976年10月18日，吳仲超寫的材料才指出真相：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這個組織。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48]

1976年12月25日，宋振鼎寫的揭發材料說：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成志）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參加為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49]

原來，張春橋1936年加入的是由一些和黨組織失去聯繫的黨員自行成立的組織。

紅軍長征以後，上海中共黨組織和中央失去了聯繫，直到1936年5月馮雪峰受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周恩來委派，作為

47　張春橋給上海市委審查問題的答覆材料，1956年4月。

48　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1977年3月。

49　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1977年3月。

中央特派員再次回到上海，才開始了重建中共上海黨組織的工作。在此之前，在上海自然存在或自行建立的黨組織，有上海「中國共產黨臨時工作委員會」（「臨委」）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據馮雪峰說：「沒有上級黨領導，也同中央沒有聯繫」，「自動成立的，未經中央批准。」[50]

當時，在上海堅持鬥爭的黨組織有近十個系統，馮雪峰都分別進行了考察和處理，貫徹了中央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方針。還陸續通過王堯山等，聯繫上一部分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叫他們暫時以個人的名義根據中央的政策去從事活動。這種情況一直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劉曉到上海負責籌建中共江蘇省委時為止。

在長期的中共地下鬥爭中，因為客觀條件無法與黨組織取得聯繫，自行組織起來進行活動，這種做法並不少見。雖然這種組織起來的群體仍然不能稱為黨組織，但也不能簡單地稱為編造入黨歷史，「叛徒」更是談不上。所以，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審查後曾做出結論：恢復張春橋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黨前的一段黨籍。由此，也可以知道，康生舉證說吳仲超知道張春橋是叛徒，也不成立。因為吳無論在張任要職時還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堅持說在解放前不認識張。

至於康生所提出的另一個證人王觀瀾，與江青有關，與張春橋無關。

這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張春橋雖然在歷史上有問題，但還不是叛徒和國民黨特務，而且這些問題在「文革」前已經交代過，並有組織結論。

「文革」中，林彪集團要向全國昭示張的「叛徒」歷史，康生以毛批評「四人幫」時的風向來揭發張是「叛徒」，周恩來多次以「叛徒」和「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來阻止毛澤東對張的信用，都是當時特定政

---

50 馮雪峰：〈關於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務及我同文委和「臨委」的關係〉，載《魯迅研究資料》，第四輯。

治環境下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澤東最終沒有把最高權力託付給張春橋。

至於江青的「叛徒」問題，因為江青在「文革」中通過謝富治把她的歷史檔案材料中有關部分幾乎全部銷毀，已經很難查考。1977年中共中央關於「四人幫」的罪證材料上，說「江青是叛徒」，唯一依據就是原農業部人事司司長、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的交代。江青1934年曾在徐領導下從事革命。但是，徐在被釋放後很快寫出更正材料說明，她所揭發的「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那是由專案組人員口述，她被迫執筆寫成的。她不承認能證明「江青是叛徒」的問題。再加上別的考慮，因此1980年審判兩案時特別法庭未對「江青是叛徒」的問題進行審理。

2 鄧小平再度被重用

在一般人印象中，鄧小平是和劉少奇一起作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文革」初期就被毛澤東打倒的。但是，內情並非如此，毛澤東始終對鄧有着不同於劉的評價和關注。

1965年秋天，正是「文革」風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夜，周恩來與王稼祥談話，告訴他，毛主席委託他來打招呼：「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51]

1966年5月5日，在討論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二天，毛澤東就在外地說：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52]

1966年8月「炮打司令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位置非但沒有下降，反而還上升了一位到第六。會後，毛

51　朱仲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頁224。

52　劉志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已實際打倒，目前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鄧，林彪還親自出馬，將鄧的問題說成是敵我矛盾。然而，毛澤東卻希望將鄧能夠劃出來。鄧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53]

10月，鄧小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並作檢討。毛澤東批示：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54]就在中央政治局審查批准發表戚本禹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鄧小平指摘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進行嚴厲批判時，毛澤東卻向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55]

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同王力進行過一次涉及接班人的重要談話。毛澤東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56]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許多人也要求開除鄧。毛澤東卻在開幕式上指出：「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鑑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甚麼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在閉幕會上毛澤東又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57]

---

5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37。

54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34。

5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4。

5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6。

57 劉志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

中共九大前，毛澤東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政治報告，稿子上寫到了「劉鄧路線」，毛澤東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58] 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又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指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59] 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候，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60]

明知道林彪、江青不容鄧小平，毛澤東卻偏偏保留鄧小平。這是為甚麼？把劉、鄧拆開，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大，或者鄧打過仗？「難道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林彪最紅的時候，毛澤東就想到了甚麼，或者已經在準備着甚麼？」[61] 鄧女兒毛毛的發問，使人深思。

鄧小平對毛的態度心知肚明，後來說：「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甚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62] 當然，這並不適合對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

從 1969 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很「懂事」地注意不捲入政治漩渦。1970 年 9 月 13 日，他在江西給汪東興寫了一封請轉交毛澤東和中央的信。信中除了對剛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做例行的表態外，在同日另一封信裏特別強調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廠外，未出院步。每天上工廠，有幹部黃同志跟同。……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只同幾個小孩通信。」

58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 113。

59　劉志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60　劉志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61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62。

6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301。

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看似無意地對在座的軍區司令員們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63]

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得准許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藉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復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甚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繫，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映。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情，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揭發了林彪、陳伯達的罪行，在當時的條件下，也不得不將粉碎林彪集團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他在信中說：

>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分子、托派、

63 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談話（追記稿），1971年9月10日。

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覆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64]

在信中，鄧小平懇切地表示了自己希望出來重新為黨工作的願望，也不得不違心地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強加的「錯誤」做了一些檢查。他說：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

64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甚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65]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66]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但其後，鄧復出的工作一直遲遲沒有進展。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分管審查幹部的汪東興、紀登奎，說：鄧小平同志曾要求作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27日，兩人向周恩來報告鄧小平、譚震林工作安排，建議鄧任副總理。周表示：譚的事可先辦，鄧小平的工作待請示主席後再定。很快，毛澤東批准了安排。

---

65 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185、208、210、235。

6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08。

1973年3月10日，中央發出文件決定鄧小平復出。3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以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重要問題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4月1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國家機關部委負責人會議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說：今天這個會議是毛主席催促要開的，再不傳達就失職了。[67]毫無疑問，鄧的復出是在毛的一再要求下進行的，但在1973年12月前的九個月裏，他並沒有多少實際權力。毛澤東需要對他進行最後一次考察。

11月下旬至12月的「幫周」會議中間，毛澤東認為會議水平不高，江青發言有些生拉硬拽，決定調兵遣將，讓鄧小平中途參加。他問前來匯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了解鄧小平的態度。鄧小平剛恢復工作，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以後，到了最後一兩天，他發了一個言。發言的一開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了周恩來。他指出，周的性質不是像江青說的那樣「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而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68]寥寥數語後，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講怎樣看待國際戰略的問題。他認為，對複雜的國際關係，不能憑一次談判和一句話來進行判斷，關鍵要看大形勢。他認為，目前來看，要講打仗，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但如果真打起來也並不可怕。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會議批周的主旨。

當王、唐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代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因此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69]這一事情說明，毛在對鄧進行着關鍵性的觀察，將要決定委任鄧以重任。

6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50、1653。

68　採訪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

69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87－289。

從上述「文革」中的毛、鄧關係，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文革」前，就把鄧和林彪一起作為接班人來考慮了。即使在鄧被打倒時，鄧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也和劉少奇截然不同。通過汪東興，鄧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着間接的聯繫，這當然是毛澤東的意圖，他在那裏埋下了一個可以起用制約、替代林彪的接班人棋子。

對於鄧的復出，有著作[70]說，這是毛利用鄧來遏制、進而取代周，因此鄧復出後與周有着很深矛盾。理由是：歷史上周、鄧關係不深，鄧復出不是周提議的。

這種說法有一定根據，但只看到了當時的政治現象，而沒有分析「文革」的特殊環境。周、鄧從留學法國勤工儉學就建立了情誼，不能說是關係不深。1920－1930年代在上海中央機關從事地下工作，周和鄧穎超就和鄧小平在一起。鄧小平和第一位夫人張錫媛的婚事，就是周和鄧穎超操辦的。在以後的長期政治生涯中，周、鄧之間沒有發生過實質上的大衝突。

那麼，鄧復出確實不是周提議的，也沒有見到周對落難的鄧有甚麼特殊照顧。鄧起用為總參謀長，也是葉劍英提議的。是否說明周對鄧懷有戒心呢？答案是否定的。周在知道自己身患絕症，又遭到毛澤東的疑慮時，肯定不會再主動攬權，而要想到毛選擇誰當接班人的利弊。張春橋、王洪文、鄧小平中間，他的傾向自不待說。但是，周深刻了解毛的剛愎自用性格，在接班人這樣的大問題上，毛是不容他人置喙的。因此周在想達到某些目的時，只能不動聲色地利用事態影響毛，由毛做出決斷。例如1970年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是十分符合周緩和國際局勢意圖的。但他卻最終在報告上同意不邀請。而當毛做出這一大逆轉後，周立即雷厲風行執行。毛在「文革」中對鄧的種種照顧周應該是知道的，但如果周也屢屢關照鄧，積極提議鄧復出，只能適得其反。從毛在「幫周」會議上急切地關注鄧有沒有發言「批周」，也證實毛對周、鄧的多年關係是有疑慮的，擔心鄧不肯表態批周，繼而在復出後與周聯手，否定「文革」。

---

7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69－471。

因此，周、鄧在當時對兩人的關係冷處理，是最好的辦法。「此時無聲勝有聲」，「心有靈犀一點通」。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鄧是與周站在一起的。

3 「劉盆子」王洪文後來居上

毛澤東最早是從張春橋口中知道有個王洪文的。1967年7月，發生了「七二〇」事件，毛澤東從武漢匆匆飛到上海，住了一個多月。他在電視裏饒有興趣地觀看了王洪文指揮三十多萬工人砸掉反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上海柴油機廠群眾組織「聯司」；又觀看了王洪文主持全市批鬥大會的轉播實況，聽到了王的講話。張春橋還向毛介紹了王的情況。

1968年10月1日國慶節，王洪文帶領上海工人宣傳隊代表團到北京參加慶祝活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和王洪文進行了單獨談話。毛問王洪文的籍貫和家裏情況。王回答說：自己是吉林省長春市人，1935年出生。貧農家庭，從小沒有讀完書，就給人放牛、放豬，也種一點田。十六歲參加解放軍二十七軍，轉為志願軍，入了黨。1956年復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全工，1964年調到保衛科當幹事。毛問：你現在是在工廠裏還是在「工總司」工作？王回答：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也兼着「工總司」的工作，廠裏每個禮拜都去勞動。毛點頭叮囑：永遠不要脫離勞動、脫離群眾。王洪文集工、農、兵一體的經歷，給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指定參加隨後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在10月31日的全會閉幕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大學脫離實際時說：無論你派多少工人宣傳隊，大學總沒有做工，總沒有種地呀。由此忽然想起了王洪文，說：哎，你站起來給人家看看，人家都不認識你呀！此人叫王洪文，只有三十幾呀？三十四。他是上海工總司的負責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他就是這個「一月革命」之前11月搞了安亭事件。所以我們這一次會有這麼年輕的同志參加，也是好事呀！可惜太少。有了毛的提示，回到上海，王成為上海市第三把手、中共九大上海籌備小組負責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王率上海市代表團參加，並被指定為華東組組長。4月13日下午的組長會議上，毛澤東做了較長的講話，幾次與王洪文一問一答。在講黨內歷史時毛說：王洪文同志，你就沒有經歷過幾個時期。王回答：很多事我就不懂。在講到仍然要說服群眾選一批老帥為中央委員時，毛問：王洪文，你們說服得了不？王回答：很難。毛又說：許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還是站在你們一邊的。王表態：主席講的傳達了，可以。4月14日，王洪文由毛澤東確定並親自宣布，在人民大會堂全體大會上代表工人階級講話，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央委員會裏的一顆「文革」新星。

1970年9月的廬山會議上，多數中央委員不明真相地要求設國家主席。王洪文自然堅決地站在張春橋一邊，立下了功勞。江青對他說：「知道吧，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這當然是指毛澤東的希望。不久，毛澤東又在黨內批發了王的學習報告。[71]

1971年9月，毛澤東南巡中忽然離開杭州，經過上海時，他在列車上兩次單獨接見了王洪文，向他和許世友交了林彪問題的底牌。林彪事件發生，王立即奉命進京，接受任務，回到上海指揮抓捕林彪黨羽王維國和陳勵耘。關鍵時刻的表現，進一步奠定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信任。

1972年7月，毛澤東正式考慮接班人問題，他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麼辦？我的意見就是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到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年、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72]因為毛澤東對王洪文已經有了深刻印象，因此與其說王洪文是符合這個標準，不如說這個標準就是為王洪文制定的。

1972年9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王洪文留北京參加中央工作。同時被調的還有吳德和華國鋒。9月初，張春橋將這一通

---

71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283。

72 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等人談話記錄，1972年7月20日。

知告訴王洪文。開始時，沒有讓他擔任中央的重要職務，而是委託周恩來培養他，考察他；同時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毛澤東要求，凡是周恩來參加的會議，王都要參加，而且要發言。

但是，中共歷史上工人出身擔任最高領導人的成功例子，並沒有過。例如1930年代的總書記向忠發，作風和能力都很差，後來叛變。王洪文會不會成為向忠發第二呢？毛澤東還要繼續考察，他通過讀書向王發出了暗示。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同時為召開黨的十大作準備。一到市委康平路辦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王洪文說，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很深奧，他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毛澤東對《後漢書》、《三國志》讀過許多遍，稱得上滾瓜爛熟。先後叮囑他的秘書等人，要讀《後漢書》、《三國志》中的〈黨錮傳〉、〈曹操傳〉、〈郭嘉傳〉等，獨獨沒有提要讀〈劉盆子傳〉。這次，是毛澤東單獨向王洪文做出的讀書指示。

劉盆子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景王劉章的後代，算是劉氏宗室。不過，西漢末年劉家已經破落，劉只是個放牛娃。赤眉農民起義軍領袖樊崇進攻長安，有人給他出主意說：你的威望不夠，可以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以便師出有名，號令天下。年紀最小的劉盆子在抽籤中摸到了那塊寫有「上將軍」字樣的木片。於是，僥倖當上了皇帝，將領都向他膜拜稱臣。這個放牛娃當時只有十五歲，當了皇帝以後，依舊故我，經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戲，最後身敗名裂。

王洪文的經歷，和劉盆子有相似之處，從小放過牛、養過豬，有工人階級、貧農、解放軍的「高貴血統」。毛澤東特意從《後漢書》中挑出了放牛娃劉盆子的傳記，讓他閱讀，無非是提醒他，按照劉盆子的資歷、能力和社會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劉氏宗室這一條，「摸彩」摸得了一個皇帝的寶座；你王洪文資歷很淺，只是依靠「文革」中造反起家。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少長進，結果也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務正業，整天和一幫牧兒嬉戲，最後將以失敗而告終。

王洪文政治嗅覺很靈，聽了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講解的〈劉盆子傳〉，還自己捧着《後漢書》看了許久。聽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聲不吭。[73]

毛澤東還派王洪文到新疆、浙江等地去處理「文革」遺留下來的棘手問題。由於王在造反奪權初期廣泛參加這類活動，較老幹部有豐富經驗，與地方造反勢力關係密切，有一定威信，因此處理起來比較得心應手。出於自己的前途考慮，他也能夠比較公正，甚至下令處理了幾個民憤很大的壞頭頭。所以，這些地區的局勢都有所好轉。

消息傳來，毛澤東甚為欣慰。他對張春橋說：「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了。」[74] 這意味着，毛澤東將要把王洪文放到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春橋之上，擔任接班人。張春橋起初向毛澤東舉薦王，是為了說明自己在上海是緊緊依靠工人階級的。但是，王的青雲直上，竟然超越了他，是張沒有想到的。然而，他也明白自己的出身和歷史問題，無法和王相比，在中央領導層中又積怨甚深，只好接受。

王洪文在北京整天忙於開會、讀書，與在上海同造反派兄弟一起呼風喚雨、頤指氣使的日子相比，感到苦不堪言。他給馬天水打電話說自己很寂寞。但是，他只能忍受，努力表現出一副謙虛好學的面孔。

三　中共十大形成暫時平衡格局

1 唯一一次在執政時期秘密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應當每隔五年召開一次。但是，從1956年中共八大以後，到1969年中共九大，竟然相隔，

73 〈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74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頁287。

了十三年。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尖銳矛盾鬥爭，又使這種非正常迅速滑向了另一個極端——被迫不到五年提前召開。林彪事件後，中央高層領導結構已經嚴重殘缺不全，九大確定的黨的路線、方針、理論和黨章，也因為林彪夾雜其中造成混亂而必須清理。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內容主要是為了籌備召開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部門負責人246人。5月20日，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宣布會議的三項任務：一是籌備召開黨的十大；二是討論批林整風問題；三是討論本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經濟工作的指示：一是項目多了，計劃工作至今沒有走上軌道；二是搞計劃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區為主；三是要把協作區搞起來，一旦有事好辦；四是只注意生產，不注意上層建築、路線不對。會議討論了〈中央關於黨的十大代表產生的決定〉，它規定代表的條件，仍然是以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作為劃線標準，這就為造反派繼續掌握權力開了綠燈。同時提出「也包括一部分犯了嚴重錯誤，作了檢討，願意改正，並取得群眾諒解的」幹部。確定代表總名額為1240人，其中工農兵及其他勞動人民中黨員代表佔絕大多數。〈決定〉還規定十大代表產生的方法，是通過充分協商由省、市、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選舉產生。會議分為九個大組討論了周恩來講話及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1973年計劃會議討論的問題和今後三五年經濟發展設想的報告〉等文件。

工作會議討論了黨章修改的原則和方法，一致同意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央政治局關於修改黨章問題的請示〉中的規定。確定黨章修改問題的重點是總綱部分，要堅決貫徹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如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贊成「三個里程碑」的提法；如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訓，在黨章中不再寫人名等。決定由王洪文負責中央黨章修改小組在政治局領導下進行黨章修改工作。

5月25日，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他提出，要重視上層建築，抓路線問題，抓意識形態，要學一點歷史和批判孔子。關

於批林整風，毛澤東要求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以「九一三」為限，犯錯誤的允許改正，暫時未認識到的可以等待，要正確評價幹部的歷史功過。[75]

會議宣布解放譚震林（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原國務院副總理）、李井泉（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烏蘭夫（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原國務院副總理）、李葆華（原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原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原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原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王稼祥（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秦基偉（原昆明軍區司令員兼雲南省委書記）、李成芳（原昆明軍區第二政委兼雲南省委書記）、方強（原六機部部長）、陶魯笳（原中央華北局書記）、曾希聖（原中央西南局書記，已死）等十三名老幹部。經毛澤東提議，會議正式宣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王洪文從上海調中央工作，與華國鋒、吳德兩人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

根據毛澤東7月29日的意見，由王洪文為主，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為副，負責中央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的工作。8月13日，毛澤東又批准了周恩來的建議，由王洪文擔任中央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

6月起，根據工作會議決定的產生十大代表的方法，各地黨組織陸續選舉（實際是各地黨委提名，中共中央批准，各地代表大會再投票認可）產生了1249名十大代表。台灣省在全國各地台灣籍黨員中選出的代表第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

從社會結構上看，幹部有286人，佔22.9%，遠少於八大的84.4%，但畢竟高於九大的15.7%，說明幹部仍然在緩慢的解放中；軍隊有197人，由九大的28.1%急劇下降到只佔15.8%，反映了林彪事件後軍隊幹部的失寵；工人農民有683人，佔54.7%，是中共建黨以來從未有過的大比例，不僅遠高於八大的3.1%，甚至也高於九大的51.3%，體現了毛澤東要從工人農民中大批選拔幹部的設想；知識分子有6.6%，

7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95。

與八大的2.3%、九大的4.9%相比，變化不大，仍然是無足輕重的成分；婦女則有259人，佔20.7%，比例上升到歷屆中共代表大會的最高峰，意味著江青在戰勝林彪後作為「文革」形象的巨大潛在影響；少數民族有8.3%，比八大的5.2%、九大的5%略有提高，一定程度上是恢復和落實民族政策的結果。

從年齡結構上看，30歲以下的佔12.4%，比九大的20.1%有明顯下降，說明「文革」初期產生的大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而31－40歲的佔31.9%，只略低於九大的36.8%，說明工人農民中的青年造反派代表依然有重要地位；40歲以下的在整體上雖然不像九大那樣超過一半，但仍然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二個年輕化時期；41－50歲和51－60歲分別佔23.7%和22.2%，比九大的21.6%和17.9%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61歲以上的由九大的3.6%迅速上升到9.8%，說明1930年代的老革命正在逐步恢復政治待遇。

8月20日，中央召開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當天通過的決議，批准中央專案組7月10日上報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報告〉說：林彪是長期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林彪反黨集團是一個叛黨叛國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早在九大前後，林彪就夥同他的老婆葉群，勾結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結成以林彪首領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反黨集團向黨發動突然襲擊，是有預謀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反黨集團立即秘密進行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準備。〈報告〉認為林彪反黨集團的出現是國內外激烈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同時鑑於林彪反黨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叛黨叛國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專案組建議黨中央：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的黨籍；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黨籍；永遠開除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特務、叛徒、賣國賊葉群的黨籍；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

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76]的黨籍，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對參與林彪反革命政變的其他骨幹分子，由有關部門負責審查，按照黨的政策，區別情況，提出處理意見，報中央審批。

周恩來還宣布：選舉準備委員會即日成立，由104名委員組成。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王洪文任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宣布完畢，周恩來立即從主持人位置上退下來，請王洪文主持會議。全體與會者都立即明白了一個重大信息——王洪文已經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了。

但是，王洪文的青雲直上，在中央政治局裏也引起了原來就對造反派有積怨的一些老幹部的抵觸情緒。8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十大主席團領導人（按照毛澤東所定，十大主席團領導人即十屆中央領導人人選），當議到副主席有周、王、康、葉四人時，在華東一直與造反派有衝突的許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個副主席（引者註：指周恩來）就行了！」後來又認為有三個就夠了（引者註：指周、康、葉）。為了打通思想，十大開幕前一天的8月23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會議，說明了自1971年後毛澤東多次要培養王洪文做中央領導工作的意願，宣布昨天由毛提名的安排：王洪文任十屆主席團副主席，位置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不料，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一聲不響，會場陷入沉默。許世友嘟囔着說王洪文太年輕，是兒童團。張春橋指摘許世友「反對主席的意見」，許當眾大聲訓斥張：「你有甚麼了不起！」[77]輪到王洪文講話時，許多老幹部都沒有鼓掌。最後，周恩來批評說，應該重視選拔青年幹部，不要看不起兒童團。葉劍英也表態說，我們這些人當軍長、師長時，有的還不到二十歲，現在王洪文同志已經三十八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78]會議通過了十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領導人名單。毛澤

76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指出，〈報告〉把李雪峰認定為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是不符合事實的，宣布撤消這個認定，決定恢復他的黨籍。

77 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會議記錄，1973年8月23日。

7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頁289。

東又提出，老中青三結合，應當有一個中年的同志作副主席候選人。他建議在軍隊裏面選。周恩來提議李德生，毛澤東表示同意。[79]周恩來在講到增加了一些老同志時還說：鄧小平說有的老同志身體不好，可以當顧問。毛主席很重視他的意見，提出組織顧問委員會，毛主席當主席。我和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毛主席表示只好鞠躬盡瘁。[80]

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秘密開幕。從8月12日至19日各地代表先分散在各地以辦學習班為名義分為三十四個組秘密舉行預備會議，到集中在北京，整個會議都是在極端保密狀態下進行的。代表們沒有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而是通過修建不久的北京地下鐵道，由地下通道魚貫潛入。在大廳中召開全體會議時，周恩來告知代表們不要高呼口號，因為上面的第三層宴會廳正在舉行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酒會。上面各國來賓歡歌暢舞，全然不知道下面正在舉行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唯一的一次秘密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最後總結稱讚這次大會保密工作做得好說，我們這個黨還是守紀律的，比較滿意這件事。

大會議程是；1、周恩來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2、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並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3、選舉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24日，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大會選出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主席團副主席，張春橋為主席團秘書長。毛澤東主持了這次大會的開幕式。開幕式結束後，毛澤東宣布散會，代表們鼓掌歡送領導人，但毛澤東卻因腿部的運動神經元病站立不起來了，只好說：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最後由周恩來宣布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場。

開幕式上，全體代表聽取了周恩來向大會作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審閱。在討論十大報告由誰來作的

79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455。

8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15。

時候，張春橋曾經提議，由王洪文來作。但是毛澤東最終仍然決定周恩來作。

報告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九大路線」，首先肯定說：「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為了證實這一點，報告說明了起草九大報告時林彪與毛澤東在抓革命還是抓生產問題上的分歧：

> 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31]

第二部分是「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勝利」，報告指出林彪的實質是「背叛」九大路線的極右：

>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黨是一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他們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他們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罪惡目的，就是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徹底背叛九大路線，從根本上改變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法西斯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在國內，他們要把毛主席領導下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再扶植起來，實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

31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3年8月30日。

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華反共反革命。

為了解釋九大把林彪樹為接班人為甚麼組織路線仍然是正確，報告勉強地說：

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經營了幾十年，他有一個發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對他們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第三部分是「關於形勢和任務」。根據毛澤東在起草報告時的意見「現在仍處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時代，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所處的時代相同，要引用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說過的話為證」[82]，報告改變了過去「世界進入了毛澤東時代」的提法，指出：

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正是列寧分析過的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現。緩和是暫時的、表面的現象，大亂還將繼續下去。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喚醒了人民，鍛煉了人民，推動國際形勢進一步朝着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

當周恩來唸到「時代沒有變，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變，仍然是我們今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時，毛澤東點頭插話說：「哎，不錯。」

報告提出了今後的任務：(1)「要繼續搞好批林整風」；(2)「全黨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

8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00。

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改造世界觀」；（3）「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4）「要貫徹執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抓革命，促生產；（5）「要繼續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和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6）「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7）「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各級黨組織都要把這項百年大計經常列入議程。」根據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中共十大報告寫進了實際是針對周恩來的批評：「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

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他說，條文部分改得不多，刪去了總綱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一段話。新的黨章草案增寫了六點內容：（1）關於文化大革命，明確寫上「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2）把毛澤東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則寫進黨章；（3）寫進了「反潮流」的原則；（4）要在群眾鬥爭中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5）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發揚黨的優良作風；（6）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新黨章取消了八大黨章黨員的十條義務，代之以毛澤東論述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還取消了黨員權利的條文。

關於「反潮流」，王洪文在報告中說：

> 要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
>
> 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83]

83 王洪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人民日報》，1973年9月2日。

25日至27日，代表們分組討論和學習了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和王洪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中國共產黨黨章〉。28日，大會一致通過了這兩個報告和新黨章；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去掉了他親屬王海容、毛遠新的候選資格。周恩來宣布：毛主席委託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選舉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在全場的關注和熱烈鼓掌中，身穿新軍裝的王洪文捧着毛澤東的選票投進票箱。這實際上是毛澤東投給了他有力一票。最後，大會通過公報後宣布閉幕。

十大的籌備和召開是十分倉促和草率的，也不符合中共的民主原則。從籌備到召開只有三個月，所有代表實際是各地黨委擴大會議協商產生的，而不是按照黨章選舉產生的。在大會召開前，連九屆三中全會都沒有召開，大會也不設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是事先名單內定的。選票上不必標明贊成對象，只須在反對者後畫叉，所以，實際上絕大部分代表都沒有必要動筆。

選舉前，由於王洪文認為上海代表沒有合適的中央委員候選人、不能體現優秀工人進入中央委員會的特點，於是又連夜打電話要上海從代表以外挑選出一批工人造反派骨幹如上鋼一廠車工周宏寶、上海5703廠工人祝家耀、江南造船工人張國權等，報送十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這些人不是已經確定的十大代表，當然沒有參加十大，結果鬧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聞是：不是代表大會代表的一些人在大會上竟然當選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而本人仍然不知道，在睡夢中被叫起，連夜從上海坐飛機到北京去，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參加中央委員會全會。更離奇的是，他們還把河北省一個還未入黨的造反派頭頭封為十大代表，理由是他「在組織上雖未入黨，但在思想上卻早已入黨」。

由於江青集團把持了這次大會從籌備到召開的主要權力，大會充滿了壓抑黨內民主的氣氛。由張春橋起草、經十大通過的新黨，

章，只講黨員的義務，不講黨員的權利。修改草案出來後，王洪文的秘書蕭木等人去徵求陳雲、鄧穎超的意見，兩人都提出，黨員不能只盡義務，沒有權利啊！卻遭到蕭木的訓斥。一些人在分組討論中上對極左錯誤提出批評意見，立即受到壓制。四川組一個老幹部對「文革」中戴高帽、揪鬥等做法提出批評。張春橋等馬上編輯成「情況反映」印發，警告說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否則「還會犯錯誤」。海軍組、江蘇組有代表認為不應當在軍隊中開展「四大」，不同意把「四大」寫進黨章；青海組有代表建議把「紅衛兵」、「紅小兵」從黨章中刪去；四機部代表認為黨章中說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張春橋十分惱怒，立即以中央黨章修改小組名義發「通報」，對「幾個值得注意的意見」施加壓力。

8月30日，中國共產黨十屆一中全會召開，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選舉結果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女）、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女）、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8月30日，新華社公開播發了中共十大召開和閉幕的消息。林彪被公開點名批判，王洪文、李德生成為中央副主席，是國際上廣泛報導的熱點。

2 兩軍決戰前的暫時平靜

在197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已經提出：現在要「安定團結」、要「穩定」。[84]8月20日召開的中央選舉準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又傳達了毛澤東最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指示：「希望這一次十大真正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希望我們這次大會，大家團結起來，不搞陰謀詭計。我們要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對外反對帝、修、反，對內反對劉少奇、林彪反黨集團中至死不改悔的一些死黨。我們要堅持原則。當然，不排除必要的靈活性。在任何一級黨組織，大多數決定了，少數就應該服從大多數。」[85]

然而，事實證明，這只是毛澤東的一廂情願。既然他一方面強調團結、守紀律，想維持黨、國家、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又鼓動少數人反對多數人的「反潮流」，以此堅持對文化大革命繼續革命理論的肯定。兩者之間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要爆發。這個「反潮流」口號，是「文革」前期「造反有理」口號的翻版，成為「文革」後期一度低沉的造反派重新發動批林批孔、反經驗主義等以下犯上造反奪權活動的一桿旗幟。在更長遠的意義上，十大政治報告還提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歸根到柢，毛澤東希望的只能是一場明知不可為而為的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以中共十大為標誌，中國政局的政治力量發生了大改組，其主要標誌，是由1971年以前的周恩來為代表的國務院務實派、林彪為代表的軍隊集團派、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激進派的三足鼎立，變化為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抵制、糾正「文革」一軍與江青集團為代表的堅持「文革」一軍的兩軍對壘。

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被提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的實際接班人。這樣，在中央政治局內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8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54。

85　周恩來在中央選舉準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3年8月20日。

結成了一個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實現個人野心的政治幫派，即「四人幫」。一些造反起家的幫派分子如王秀珍、徐景賢、于會泳、金祖敏、周宏寶、祝家耀、唐岐山、夏邦銀等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中共十大將已經查清的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從中央委員會清除出去，重新選進了一批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排擠的老幹部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李葆華、廖承志、秦基偉、楊勇、王諍等人，也增強了同江青集團鬥爭、糾正「左」傾方針的力量。

江青雖然只是一個政治局委員，但憑藉着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餘威，地位遠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之上，頤指氣使，不可一世，是江青集團的核心。張春橋老奸巨猾，工於心計，眼光獨到，擅長黨內鬥爭，是江青集團中理論定調人物。王洪文作為毛澤東的內定接班人，代表着造反派的利益，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形象，在周恩來生病時主持中央工作和政治局會議，常常被授命出面衝鋒陷陣。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的筆桿子和金棍子，執掌輿論工具，專司理論發難和搖旗吶喊。

除此之外，在中央還有一批文化大革命中提升上來的老幹部和英雄模範人物，如李德生、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等，他們游離於兩個陣營之間，一方面忠於毛澤東，也即忠於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一方面又接受周恩來的具體領導，起到一些穩定局勢的作用。

周恩來在十大以後逐漸減少了領導責任，除了1973年底「幫周會議」的打擊外，身患癌症是一個重要原因。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小便常規檢查中，發現了四個紅細胞。三天後增加到八個。保健醫生張佐良與專家們會診後初步確定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向中央提出了盡早治療的報告。毛澤東沒有同意專家們的建議，並要求不要告訴周恩來和鄧穎超。據泌尿科權威專家吳階平和汪東興的回憶，理由是「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他解釋說：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

死了嗎？[86]11月，周恩來病情日益嚴重，毛澤東在醫務人員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毛澤東自然不是醫生，而且對醫生有偏見，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個人的看法卻被奉為治療周恩來的準則，使病情延誤。

1973年1月13日，周恩來「因膀胱癌突然出現血尿，病情持續惡化兩個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進行最必要的治療」。10月腫瘤復發。年底對周恩來領導外交工作的批判，更使他病情發展，十分痛苦。直到1974年3月12日，才進行第二次膀胱鏡檢查與電灼術治療，結果不理想。5月上旬，周恩來病情發現惡性腫瘤轉移，醫療組對「拖着不解決問題」，「心裏已經是憤憤然了，再次請求」負責周恩來治療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接見，直接聽取醫療組的口頭匯報」。5月9日，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聽取了吳階平等的匯報。張春橋以周外事工作繁忙為由，要求5月底以後才考慮怎麼辦的問題，並示意可以修改病歷。保健醫生張佐良極其憤慨，當場表示不理解「用總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去接待外國貴賓的做法」。[87]到6月1日，周恩來才住進305醫院，當日做了膀胱癌切除手術，再未能回到中南海。兩個月後出現癌細胞轉移，8月10日做了第二次手術。

周恩來住院後，中央的分工是，王洪文負責黨務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鄧小平負責國務院和外事，張春橋負責意識形態。

中共十大後，毛澤東對鄧小平寄予了厚望。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就說：「我和劍英同志請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1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升鄧的地位，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

86　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18。

87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頁321、323、327。

參謀長吧。15日，毛澤東在同政治局成員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指鄧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88]

22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任；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毛澤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擔任過中央軍委要職的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說明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是十分信任的，也意味着鄧小平有了接班人之一的資格。

在毛澤東設計的這種權力框架下，中國政局出現了暫時的平衡，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在表象之下，堅持肯定還是抵制糾正文化大革命路線的鬥爭仍然尖銳、複雜，一次總爆發是不可避免地遲早要到來的了。

---

88 逄東林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4927。不少著作將「柔中有剛，綿裏藏針」稱為毛澤東誇獎鄧的特點。其實，結合上下文，可以明顯看出，這是毛對鄧提的要求，批評他不會「柔中有剛，綿裏藏針」。

第四章

「抓革命、促生產」模式下中國經濟的跌宕起伏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試圖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但是，「革命」和「生產」始終產生尖銳對立的矛盾，像一個走不出的怪圈，困擾着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結束的經濟領域，引發了一系列被稱之為「路線鬥爭」的重大事件。政治與業務的矛盾，精神與物質的矛盾，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的矛盾，文化大革命與經濟建設的矛盾，「批林批孔」、「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與「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矛盾，「儒家抓生產，法家抓革命」的矛盾，「安定團結」與「不是不要階級鬥爭」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都可以用「革命」與「生產」的矛盾予以囊括，幾乎所有的兩方面口號，都是毛澤東在不同時期作為不同重點曾經提倡過的。但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把兩者協調起來，更不要說使「革命」大大促進生產。他始終處在不能解脫的矛盾之中，使得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經濟狀況，出現一個「三落兩起」的 VVV 形狀動盪走向。[1]

1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嚴格地說應該是十一年。如果考量經濟，1966年尚未受到「文革」衝擊，應當從 1967 年算起，為十年。

1967、1968年兩年全面內戰使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倒退，是謂一落。1969年至1973年，經過抓戰備和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的經濟調整，出現了恢復勢頭，是謂一起。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把各地經濟再度推向混亂，是謂二落。1975年鄧小平抓整頓，經濟形勢明顯好轉，是謂二起。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及唐山大地震，經濟再度跌入低谷，是謂三落。其中，1967、1968年只能說是在無政府主義狀態下的勉強維持，1969年至1976年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經濟模式的一些試驗，首先開始的就是1969年高潮中以「鬥批改」為名的全國經濟管理體制大變動。

一　全國經濟管理體制大變革與「三五」計劃的勉強完成

1　毛澤東的「大躍進」情結和經濟管理體制大變革

從1969年到1972年，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發生了一場大變革，主要反映在精簡國家機構、下放企業和管理權；下放財政、物資、基建投資權力；調整勞動工資制度，簡化稅收、信貸等三方面。複雜的歷史根源和現實的政治需要，推動了這場大變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起，經濟模式就實行的是向蘇聯學來的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國家計委成立之初，曾經仿效蘇聯的結構，與國務院平起平坐。只是在1954年國家計委主任高崗失足後，才被降格為國務院下屬。1956年蘇共二十大暴露了蘇聯經濟的嚴重問題後，本來就不屑於師從蘇聯的毛澤東，一直想在經濟管理上走出自己的新路。

在1950年代末期的「大躍進」中，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一場以下放企業和管理權力為主要內容的第一次試驗，但由於

「大躍進」和自然災害帶來嚴重困難，很快失敗。在其後的調整中，不得不更多地強調集中統一，收回下放的企業和權力。原有體制中高度集權的現象又重趨嚴重。1957年國務院各部所屬企事業單位共計9300多個，工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39.7%；1958年下放後，減少到1200多個，工業產值所佔比例降低為13.8%。1965年國務院各部直屬企事業單位又達到10533個，超過了1957年的數目。[2]

毛澤東晚年的一個情結，就是「大躍進」。他一直不肯相信當時實行的種種實驗是錯誤的，並且努力想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證明。因此，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許多所謂新生事物，實際上都是「大躍進」中流產胎兒的復活。如「五七指示」中提倡的工、農、商、學、兵大學校，就是「大躍進」的最初城鄉人民公社構想；如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其實是「大躍進」中誕生的。經濟管理大下放，也在這時被再度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信中說：「一切統一於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3]20日，他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說：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虛，只管政策方針，不管實，或少管點實。他批評中央部門收上來的企業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上去，連人帶馬都出去。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這一部署暫時被中止。

1969年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經濟體制大變革被推上了前台。除了想解決老問題外，戰備是一個新的促進因素。由於做出了新的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的估計，因而需要各地盡快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地方國防工業體系，各自為戰。1970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提出，把全國劃為十個大協作區，各自建立工業體系，自己武裝自己。

經濟體制大變革的第一項內容，是下放企業、精簡機構。

---

2 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頁365。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9－20。

1969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提出，企業要以地方管理為主，中央直屬企業可以分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雙重管理三種形式。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突然叫來李富春問鞍鋼下放了沒有，並親自決定，把全國最大的企業——鞍山鋼鐵公司下放遼寧省鞍山市管理。鞍鋼都可以下放，遑論其他？以此為開端，全國掀起了下放企業高潮。1970年3月5日，國務院擬定〈關於國務院工業交通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各部把直屬企事業單位的絕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以地方為主，少數由中央和地方雙重領導；極少數大型或骨幹企業，實行以中央為主的雙重領導。正在施工的直屬基建項目同樣下放地方。〈通知〉還規定：下放工作要在本年內完成。

到1970年9月底，中央工交口9個部全部3082個企事業單位已下放2237個，佔總數的73%。其中完全下放給地方的有1412個；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814個；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的11個。幾個月時間裏，包括鞍山、武漢、包頭、太原鋼鐵公司，大慶油田，長春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湖北十堰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開灤煤礦，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第一、第二重型機牀廠，洛陽拖拉機廠等中國「航空母艦」型的大型企業被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有的還進一步下放到縣和省屬市。中央各部所屬企業只留下七百個左右，其中鐵道部三百四十多個，水電部一百九十多個，其他部門所留企業很少，一機部竟然連一個直屬企業也沒有了。[4]

這種一窩蜂式的盲目性下放企業行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必然造成管理的混亂狀態。一些重點大型企業下放後，地方無法解決生產計劃、原材料和設備供應等問題，名義上是多頭領導，實際上是上無人統，下無人接。如北京市的化纖配套產品，上面由冶金、一機、水電、燃化、一輕等九個部來分管，人稱「九龍治水」，結果誰也不管，基層譏諷為「上面有政府，無主義(主意)，下面有主義(主意)，

4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89。

無政府」。[5]下放過快、過深又打亂了原有的協作關係，使經濟效益進一步下降。

國務院各直屬部委機構的精簡、歸併、撤消，也與大下放同時進行。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國務院報告，將各部委由八十多個精簡為二十七個。人員編制僅佔原來的百分之十八。其中有關經濟管理的部委變動情況是：

國家計委、經委、國務院工交辦、國家物委、物資部、地質部、勞動部、統計局、中央安置辦公室合成國家計委（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

國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合成國家建委；

一機部、八機部合成一機部；

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合成燃料化工部；

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的郵政部分合成交通部；

紡織部、一輕部、二輕部合成輕工部；

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合成財政部；

商業部、糧食部、供銷合作總社、中央工商局合成商業部；

外貿部、國際貿易促進會合成外貿部；

農業部、林業部、農墾部、水產部、國務院農林辦、中央農林政治部合成農林部。

在此之前，根據林彪的意見，為適應戰備需要，把郵電部的電信、國家測繪總局、氣象局、民航總局等已劃入軍隊的總參、空軍編制。

經濟體制大變革的第二項內容，是下放財政收支、物資分配、基建投資權力，實行地方大包乾。

1971年3月1日，財政部發出〈關於實行財政收支包乾的通知〉，決定自1971年起，實行「定收定支，收支包乾，保證上繳（或差額補貼），結餘留用，一年一定」的財政收支體制，簡稱財政收支包乾。主要內容是：一、隨着中央企業、事業單位的下放，相應地擴大地方

5 國家計委關於體制問題座談會情況簡報，1972年1月24日。

財政收支範圍。國家的財政收入和支出，除了中央部門直接管理的企業收入，關稅收入和中央部門直接管理的基本建設、文教行政、國防戰備、對外援助和國家物資儲備等支出以外，其餘都劃歸地方財政，由地方負責管理。二、地方預算的收支指標，由省、市、自治區提出建議數，經中央綜合平衡，核定下達。中央核定的省、市、自治區預算收支指標，收入大於支出的，包乾上繳中央財政（按絕對數包乾上繳，不再按比例計算）；支出大於收入的，由中央財政按差額包乾給予補助。三、上繳和補助數額確定之後，一般不作調整，地方要保證完成上繳任務，中央要按確定的數字給予補助。四、在預算執行過程中，地方收支超收或支出結餘，都歸地方支配使用，如果發生短收或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遇有重大特殊問題可以作適當調整。這一措施擴大了地方的財政收支範圍，調動了地方增收節支的積極性，使地方的機動財政可以隨着超收節支增加。但在實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有的地區超收很多，有的地區出現短收，造成各地區之間的機動財力苦樂不均；對短收的地區中央不補貼過不去，就增加了中央財政平衡困難；有些地區把財政包乾指標層層包到地、縣，地方機動財力過於分散，造成重複建設或經濟效果差的基本建設。1972年3月31日，財政部又擬定了〈關於改進財政收支包乾辦法的通知〉，決定地方超收一億元以下的，全歸地方；超收一億元以上的部分，一半留給地方，一半上繳中央。並規定各省、市、自治區對地、市、縣不能搞層層包乾，可以採取收入分成辦法或其他辦法。但是仍沒有解決問題，當年國家虧空29.8億元。1973年再次做出修改後，華北、東北地區和江蘇省試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的辦法。然而在執行中收支脫鉤，又把地方的壓力轉嫁到中央政府。

1971年4月19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出〈關於改革物資管理體制意見的報告〉，要求二三年內在全國實行物資分配大包乾，把國家計委目前統一管理的物資改為分級管理。仍由國家計委分配管理的物資48種；由國務院各部委分配管理的物資169種；由各省、市、自治區分配管理的物資91種；地方企業超產的由國家計委和部管的物資，地方可按百分之五十分成；重點廠礦企業的超產部分，按百分之

三十分成。對「五小」企業的產品，一律不納入國家統一分配。在保證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各省、市、自治區之間，可以組織生產協作，帶料加工。改革訂貨辦法，逐步做到物資就地平衡，就地供應。實際上，當時物資緊缺，層層下放物資分配權難以實行。如原建材部下放給河北的唐山水泥廠，下放前每年給1000多噸維修鋼材，下放後只給130噸，其餘要地方自己解決。因物資調配困難，影響了重點企業和項目的建設，1973年以後不得不逐步恢復原狀。

1970年在擬訂「四五」計劃的同時，還提出了基建投資大包乾。即按國家規定的項目，由地方負責包乾建設，投資、設備、材料由地方統籌安排，結餘歸地方。基本折舊資金也下放用於地方的設備更新、技術改革等。

這些財政大包乾的辦法，確實調動了地方積極性，促進地方工業又掀起一次大發展。但是，這些辦法基本上是為解決當時下放問題的臨時過渡措施，缺乏整體規劃和統一監督，因而助長了地方分散資金、盲目建設的現象。

經濟體制大變革的第三項內容，是調整勞動工資體制，簡化稅收、信貸。

1971年11月30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工資的通知〉。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給部分人提升工資，[6]實際上帶有反駁林彪集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攻擊「國富民窮」、「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的政治考慮。這次提升的範圍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中1957年底以前參加工作的三級工，1960年底以前參加工作的二級工，1966年底以前參加工作的一級工和低於一級工的工人，以及與上述工人工作年限相同，工資等級相似的職工。調資面為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年約增加工資基數十一億元。

6 1975年計劃會議原計劃1976年再給職工提升一次工資，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而推遲。

同時，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制度的通知〉。長期以來，臨時工、合同工享受不到正式工的工資、福利、醫療、勞動保護、退休等待遇，在工人中形成了嚴重歧視和尖銳矛盾。1967年1月，一部分臨時工、合同工曾經組成全國性的造反組織「紅旗軍」等，強烈要求廢除臨時工、合同工制度，但是被當作「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鎮壓下去。到1971年，全國共有臨時工、輪換工九百多萬人，其中從事常年性生產的約六百五十萬人，從事臨時性、季節性生產的約二百五十萬人，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通知〉指出：常年性的生產、工作崗位，應該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臨時工。現在在這種崗位上使用的臨時工，凡是企業、事業單位生產、工作確實需要，本人政治歷史清楚，在「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中表現較好，年齡和健康狀況又適合於繼續工作的，經群眾評議，領導批准，可以改為固定工。改為固定工後，工資一般暫不變動。

此外，還將企業綜合獎改為附加工資，取消了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度。

1972年3月30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稅條例（草案）〉，進行工商稅制改革。1957年以前，中國實行與多種經濟成份適應的多種稅、多次徵的複稅制。1958年「大躍進」中曾加以簡化。文化大革命初期，私營經濟嚴重萎縮，集體經濟也有一部分被強行過渡。1970年又提出改變國營企業的工商稅收制度，一個行業一般按一個稅率徵收。這次改革的內容是：(1)把工商統一稅及附加、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鹽稅、屠宰稅合併為工商稅（鹽稅暫按原辦法徵收），合併以後，對國營企業只徵收工商稅；對集體企業只徵收工商稅和所得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和屠宰稅，只對個人和外僑等繼續徵收。（2）稅目由過去的108個，減為44個；稅率由過去的141個減為82個，實際上不相同的稅率只有16個，多數企業可以簡化到只用一個稅率徵收。（3）地方有權對當地的新型工業、「五小」企業、社隊企業、綜合利用、協作生產等確定徵稅或者減免稅，(4)降低農機、農藥、化肥、水泥的稅率，適當提高印染、

縫紉機的稅率。按新的稅制收稅，國家的工商稅收入比原稅制的徵收額減少0.5%，多數地區稅收沒有增加或者略有減少。

調整工資讓部分人民有所受益，但取消獎金和計件工資，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不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稅制改革由於稅種、稅目、稅率過於簡化，難以適應各地區各行業的不同情況，削弱了稅收、利率等經濟槓桿的調節作用。稅收管理權一再下放也造成混亂。

這場經濟體制大變革的目的在於改變原有經濟體制中的弊病，也確實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有利於發展地方工業。因此也可以說是一次改革。但是，由於違反經濟規律和缺乏穩定的政治環境，也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後果。原有的弊病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改善，反而又增加了亂與散的新問題，仍然沒有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一些措施在1972年以後的調整中恢復原狀，有的則一直沿用下去。有些著作把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的弊病歸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這並不符合事實。在當時混亂的政治背景下，如果有一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比無政府主義經濟狀態要好些。

毛澤東肯定了以下放為主的這場大變動。1970年12月，他在與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中說：「中央的積極性和地方的積極性，就是要有這兩個積極性，讓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辦」。「講了十幾年了，就是不聽，有甚麼辦法，現在聽了。」[7]

周恩來在下放高潮之初就持懷疑態度，強調了可能帶來的弊病。1970年10月23日，他對羅馬尼亞外賓說：四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就是把絕大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體制到底如何搞？從十月革命到現在五十多年了，還沒有摸索出一個定型的東西。[8]他還說：廠礦不能像1958年那樣統統下放；物資調配不要一下就放；大包乾，要有個過渡辦法。廠子下放後，要幫助一段時間，不能推開不管；十個經濟協作區不能一下子拿出來，還要試點，逐步建

---

7 毛澤東與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1970年12月18日。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03。

立。協作要按經濟法則，要按計劃，計劃還是全國一盤棋。[9]然而，他的意見在當時國務院權力被嚴重削弱的情況下，很難產生作用。

2 「三五」計劃（1966－1970）在高投入下勉強完成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前，毛澤東認為，經過三年文化大革命，以「大亂」改變原有社會政治狀況的目的已初步達到，現在應該走向「大治」。為了證實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必須改變兩年來經濟停滯、倒退的狀況。因此，他在中共九大期間強調「團結起來」，在各個領域都要落實政策。儘管這種落實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帶有肯定「大亂」的強烈色彩，但較之以前公開號召「造反」、「奪權」，畢竟使國家有了一定的秩序。經過三年的動亂，人民普遍受到衝擊，政治和經濟上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他們也渴望早日恢復安定，進行正常的經濟建設。於是，中國政治局勢稍趨穩定，經濟有了緩慢的復蘇。

1970年是「三五」計劃的最後一年，為了盡快扭轉文化大革命前三年造成的計劃進度滯後狀況，從本年初起，經濟建設掀起了一場躍進。3月29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宣布：「工業生產的新高潮，正在全國蓬勃興起」，中國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將有一個新的增長」和「以更大的規模展開」。

在高投資和突擊式的「躍進」促動下，本年工農業生產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長，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大部完成或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和「三五」計劃。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69年增長25.7%。其中工業總產值比1969年增長30.7%（按可比價格）。新增主要產品能力：煤炭開採6806萬噸，發電機組存量860.4萬千瓦，石油開採2777萬噸，煉鋼652.7萬噸，鐵礦開採3590.1萬噸，合成氨244.4萬噸，化肥204.16萬噸，水泥1533萬噸，塑料18.7萬噸，棉紡錠322萬噸，化學纖維1.23萬噸，新建鐵路交付營業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

---

9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303。

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萬噸。包括：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寧至格爾木段）、陽安、京原、焦枝、枝柳鐵路，湖北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秦嶺火力發電廠，烏江渡水電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漢油田、陝甘寧地區長慶油田、河南油田，湖北十堰第二汽車廠，四川西昌航天發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產基地，江西直升機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業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業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動力工業基地，雲南昆明魚雷基地，等等。因文化大革命干擾而未能完成的一批以國防工業和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業新建工程為主計劃項目，多數都是在1970年前後建成或開工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難條件下，「三五」計劃仍然能夠得到完成，有人稱之為「奇跡」。在肯定廣大建設者的艱難奮鬥前提下，也應當看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計劃指標本身是偏低的。

1965年周恩來、余秋里根據毛澤東意見主持制定的抓戰備「三五」計劃指標是：到1970年底要實現：糧食4400－4800億斤，鋼產量1600萬噸，原煤2.8－2.9億噸；工農業總產值2700－2750億元，每年平均遞增7%；農業遞增4%－5%，工業遞增8%。五年基本建設投資850億元。按照這個指標，1970年達到的情況是：糧食完成下限的110.4%，棉花完成下限的90.5%，鋼完成110.9%，原煤完成上限的117%，貨運量完成95.1%。工農業總產值完成114.1%－116.2%；工業總產值完成121.1%，年均增長速度11.7%、大大超過計劃上限要求的8%；農業完成計劃下限的102.3%，年均增長速度沒有達到要求。五年實際基本建設投資超過計劃850億元的14.8%。

如果僅從數字看，除棉花產量外，計劃指標都得到了比較輕鬆的完成。但是，考慮到1967、1968年兩年因為文化大革命動亂，經濟出現了負增長，這些計劃指標實際上是在1966、1969、1970年三年時間裏完成的，原計劃顯然是偏低的。早在1966年4月，國家計委就提出報告，預計很多的1970年指標可以在1968年完成，也說明了這一點——「三五」計劃實際上是個「三年計劃」。儘管計劃指標偏低比過高對計劃的衝擊要小，使應對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留有了餘地，可以說是不幸中之萬幸，但從編制計劃的角度看，「三五」計劃並不夠符合實際，它的完成帶有一定水分。

當然，計劃指標編制較低，並不是預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是經過1959－1961年三年嚴重經濟困難，非正常死亡率大為上升，使決策者認識到高指標的危害性，制定計劃時比較謹慎，注意到要保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留有餘地。鄧小平、李富春的抓「吃穿用」是如此・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也是接受了教訓。從這一點上說，指標定得比較低的出發點還是值得肯定的。

同時，「三五」計劃完成的1970年已經暴露出許多嚴重問題：基建規模過大，使積累率過高，由上年的23.2%急劇上升到32.9%，實際投資總額312.55億元，比上年增加55.6%，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調。建設項目上馬雖多，但投產率卻從上年的18.1%下降到16.7%。原材料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職工人數增加較快，給國家財政支出和市場供應造成很大壓力。這一時期開始的急劇下放企業和經濟權力的經濟管理體制大變動，也為地方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設項目打開了閘門。農業方面並不理想，周恩來指出：1970年農業除糧、棉外，其他經濟作物完成不夠好，糧食雖然增產，但還趕不上1957年按人口平均的數字。[10]

第三個五年計劃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表

項目	計算單位	第三個五年計劃				
		1965年實際	1970年			1970年實際比1965年實際增長%
			「三五」計劃規定	實際	實際為計劃%	
工農業總產值						
工農業總產值	億元	1,984	2,700－2,750	3,137	116.2－114.1	58.1
工業總產值	億元	1,394	2,000	2,421	121.1	73.7
農業總產值	億元	590	700－750	716	102.3－95.5	21.4

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36。

續上表

農業主要產品產量						
糧食	億斤	3,890	4,400 — 4,800	4,858	110.4 — 101.2	24.9
棉花	萬擔	4,195	4,400 — 4,800	4,554	90.4 — 99.5	8.6
豬	億頭	1.67	2 — 2.2	2.06	103.0 — 93.6	23.4
水產品	萬噸	298		318		6.7
工業主要產品產量						
鋼	萬噸	1,223	1,600	1,774	110.9	45.1
生鐵	萬噸	1,077		1,710		58.8
鐵礦石	萬噸	3,149		6,422		103.9
十種有色金屬	萬噸	43.33		70.1		61.8
其中：銅	萬噸	9.37	15.5	13.3	85.8	41.9
鋁	萬噸	12.82	22	23.21	105.5	81.0
原煤	億噸	2.32	2.8 — 2.9	3.4	121.4 — 117.2	46.6
原油	萬噸	1,132	1,850	3,065	165.7	170.8
天然氣	億立方米			20		
發電量	億度	676	1,100	1,159	105.4	71.4
木材	萬立方米	3,978	3,700	3,484	94.2	−12.5
水泥	萬噸	1,634	2,000	2,575	128.8	57.6
其中：大中型企業	萬噸			1,517		
硫酸	萬噸	234	370	291	97.9	24.4
濃硝酸	萬噸	11.65		22.7		94.8
純鹼	萬噸	88.2	110	107.7	97.9	22.1
燒鹼	萬噸	55.6	80	89.2	111.5	60.4
合成氨	萬噸	148.4	370	244.5	66.1	64.8
化肥	萬噸	876.6	1,800	1,231	68.4	40.4
其中：氮肥	萬噸	493.9	1,150	725	63.0	46.8
磷肥	萬噸	382.2	650	504	77.5	31.9
農藥	萬噸	19.27	36	32.1	89.2	66.6
七大類醫藥	萬噸	1.05		2.1		100.0
輪胎	萬套	231.5		425		83.6
塑料	萬噸	11.6	20	17.6	88.0	51.7

續上表

橡膠	萬噸	3.19		7.17		124.8
其中：天然橡膠	萬噸	1.6		4.63		189.4
合成橡膠	萬噸	1.59		2.54		59.7
冶金設備	萬噸	1.74		7.3		319.5
發電設備	萬瓩	67.7	240－270	185	77.1－68.5	173.3
機牀	萬台	3.96	6.5	13.9	213.8	251.0
汽車	萬輛	4.05	8－9	8.7	108.8－96.7	114.8
拖拉機	萬台	0.96	2.36	3.3	139.8	243.8
手扶拖拉機	萬台	1.94		5.14		164.7
內燃機	萬馬力	278.5	569	733	128.8	163.2
手推膠輪車	萬輪	196		395		101.5
機車	台	134		591		341.0
貨車	輛	2,900		13,956		381.2
化學纖維	萬噸	5.01	10.52	10.1	96.0	101.6
棉紗	萬件	716.4	900	1131	125.7	57.9
棉布	億米	62.8	75	91.5	122.0	45.7
機製紙及紙版	萬噸	173.1	230	241.5	105.0	39.5
糖	萬噸	146.1	220	135	61.4	−7.6
原鹽	萬噸	1,147	1,150	1,108.9	96.4	−3.3
捲煙	萬箱	478.4	550	783.2	142.4	63.7
自行車	萬輛	183.8		386.8		110.4
縫紉機	萬架	123.8		235.2		90.0
手錶	萬隻	100.8		348		245.2
鐵路貨運量	億噸	4.8	7.0	6.66	95.1	38.8
財政						
財政收入	億元	473.3	五年合計2,850	五年合計2,529	88.7	
財政支出	億元		五年合計2,850	五年合計2,519	88.4	
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	億元	154.37	五年合計850	五年合計810	95.3	

註：根據國家計委檔案：《第三個五年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主要指標》製成。

二 「三個突破」的出現和周恩來主持經濟調整

1 「四五」計劃（1971－1975）的編制和國民經濟「三個突破」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國計劃會議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比較規範的全國計劃會議，由十一個大軍區的軍隊幹部帶隊參加會議，表現出當時的特色。儘管有嚴格的路線鬥爭標準，一些管理幹部仍舊因此得以復出。[11]會議擬訂了〈1970年計劃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簡稱〈「四五」綱要（草案）〉），提出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是：

> 狠抓備戰，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強大的戰略後方，改善布局；大力發展農業、加速農業機械化的進程；狠抓鋼鐵、軍工、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加強協作，大搞綜合利用，積極發展輕紡工業；建立經濟協作區和各有特點、不同水平的經濟體系，做到各自為戰、大力協同；大力發展新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促進國民經濟新飛躍。[12]

與「三五」計劃相比，〈「四五」綱要（草案）〉的安排表現出以下三個新特點：

首先，靠高投資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標。

〈「四五」綱要（草案）〉規定的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2.8%，提出的各項經濟指標是：1975年工業總產值達到3800－4000億元，鋼3500－3800萬噸，原煤4－4.3億噸，鐵路貨運量9－10億噸，糧食6000－6500億斤，棉花6500－7000萬擔；五年合計基建投資

11 各省參加會議的幹部代表都要註明家庭出身和文革中的政治表現，須先上報。

12 〈1970年計劃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1970年3月18日。

1200－1300億元，大大超過「三五」計劃的850億元規模。〈「四五」綱要（草案）〉還提出，在「四五」期間內，各省、市、區要在最短時間內，力爭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的要求；按農業人口平衡每人一畝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田，做到糧食、油料自給有餘；耕作機械化程度達到40%－50%。要大力發展地方「五小」工業，要在全國形成大中小相結合、星羅棋布、各自為戰的鋼鐵工業布局；力爭在一二年內，把每個縣的農機修造廠建起來。一般輕紡產品逐步做到自給、力爭在1972年扭轉北煤南運的局面。

這個起點過高的計劃指標下達到各地區、部門，又被層層加碼，比賽翻番。1970年4月，全國煤炭工業會議提出：大幹三年，扭轉北煤南運，實現江南九省煤炭基本自給，力爭1975年煤炭產量超過美國、蘇聯，躍居世界第一。5月召開的全國重點企業座談會也要求：1975年鋼產量達到4000萬噸，生產能力達到5000萬噸。電力部門也提出：1975年發電能力超過英國和聯邦德國。輕工部門提出：主要輕工產品在五年中翻一番。

當時1969年全國鋼鐵產量只有1330萬噸，要達到「四五」計劃指標，短短五年要翻兩番左右。其他部門的指標也同樣難以達到。毛澤東指出：「鋼鐵工業這幾年總在1000萬噸至1800萬噸之間徘徊，徘徊了十年還是上不去。現在許多人覺悟了，今後有可能上去。」但他又提出：「但不要太急了，急了會吃虧的。現在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13] 1971年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這些指示，然而在政治壓力下，並未改變總體「躍進」的指導方針。

周恩來在編制「四五」計劃之初曾經比較樂觀。1970年2月20日，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講話說：今年計劃不算高，計劃要一盤棋。今年要有所前進。在經濟戰線、生產技術領域，照舊框框不行，要打破常規。3月17日他再次接見全國計劃會議代表時談到計劃指標還說：內

13 毛澤東與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1970年12月18日。

部鼓幹勁，指標經努力可以實現，對外宣傳不要過分。[14] 直到1973年1月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雖然準備壓低指標，但根據中央領導人提出的 1973 年國民經濟發展能否快一點的指示，仍然在修改中繼續提高 1973 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要求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 7.2%，其中工業總產值和農業總產值分別增長7.7%和6.1%。糧食5200億斤，預計增長8.1%；棉花4500 — 4800萬擔，增長15.1% — 22.7%；鋼2500萬噸，增長7.1%；原煤3.9 — 3.96億噸，增長1.4% — 3%；原油5200萬噸；發電量1600億度；化肥2100 — 2200萬噸；棉紗1050萬件；鐵路貨運量8.2 — 8.3億噸。[15]

其次，戰備壓倒一切，試圖用軍事工業帶動國家工業化。

1970年全國計劃會議要求「堅決貫徹林副主席的指示，以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其實，陳伯達早就提出了一套獨創的「軍事工業帶動國民經濟」的理論，1967 年 9 月 18 日他視察軍工企業後作了一個指示說：「現在我們的工業還是有毛病的。要搞技術革命，首先要在工業部門搞，軍事工業要帶頭，軍事工業可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軍事工業比較成套。軍事工業這一套改了，別的也就可以改了。」林彪和陳伯達的這些觀點，成為當時抓戰備促工業化的指導思想，要求狠抓國防軍工和三線建設所需設備的生產，狠抓配套產品和零件、配件的生產，力爭1972年基本上建成戰略基地的機械工業體系。要打破行業界線，專門生產為軍工配套產品的民用工廠，可以考慮劃歸有關軍工部門領導。

備戰需要是壓倒一切的。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不得不提出軍工第一、三線第一的口號，又用心良苦地在其後增加了配套第一、質量第一的要求，力求綜合平衡，防止片面地、泛濫地發展軍事工業。1971年8月31日，他在起草第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稿第二部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今後任務」中，再度提出

14 《周恩來年譜（1949 — 1976）》，下卷，頁 350、354。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 — 1985》，頁 333。

了「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目標，並在「四五計劃」的設想中具體寫為「要求一個適應戰備的合理布局」，「一個穩固的農業基礎」，「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業」，「一個比較發達的交通網」，「一個城鄉交通、內外交流的商業網」，「一個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理論」。[16]

最後，暴露出地區布局的嚴重不平衡矛盾。

〈「四五」綱要（草案）〉提出，在全國劃分西南、西北、中原、華南、華東、華北、東北、山東、閩贛、新疆十個經濟協作區，盡快地建立各有特點、不同水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的經濟體系，各省、市、自治區要在最短時間內，做到糧食、油料自給有餘，一般輕紡產品逐步自給。這種基本從戰爭需要而不是區域經濟和行政區劃出發的考慮，加劇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相對封閉、片面強調自給、缺乏協作配套的狀態。與「三五」計劃時的三線地區劃分相比，一個明顯的差別是：由於中蘇兩國發生武裝衝突，中國面臨着對美國、蘇聯兩條戰線作戰的局面，其中抵禦蘇聯的軍事威脅又成為重點，能夠建設的三線地區實際上縮小了，臨戰的一線地區擴大了，除原來的沿海一線地區外，出現了針對蘇聯的「三北地區」（東北、華北、西北地區）一線概念。這些地區的建設項目也需要向更靠內的地區遷移，戰備氣氛更加濃厚。

〈「四五」綱要（草案）〉雖然也指出必須充分發揮沿海和反修前沿地區的生產潛力，但這仍然是在一二線為三線和戰備服務的前提下的勉強提法，隱藏在背後的是日益嚴重的發展不平衡矛盾。經過「三五」計劃的戰備建設，三線地區的戰線鋪開過快，一方面出現了嚴重的產品不配套和設備、原材料供應不足現象，使得新建企業建成後遲遲不能投產，產品不能交付使用；另一方面，過急過大的遷移，也影響了一二線企業的發展，生產力出現萎縮，不能提供更多的資金積累。但是，這個矛盾既然是由於對國際形勢總體判斷過於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78。

嚴重造成軍事工業畸形發展帶來的，因此，在這個總體判斷沒有得到改變的情況下，〈「四五」綱要（草案）〉只能是一個繼續激化矛盾的混合物。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周恩來在開幕式上宣布議程之一，是討論批准這個〈「四五」綱要（草案）〉。但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突然作了關於「天才」的講話，引發了設國家主席之爭的軒然大波，會議不得不用大部分時間批判陳伯達來解決問題。根據毛澤東「關於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不要花多少時間討論了」的意見，會議結束前，中共中央將部分修改的〈「四五」綱要（草案）〉作為參考文件，在會議上印發。由於〈「四五」綱要（草案）〉未能得到充分討論和批准，在以後的一年中，仍然維持草案狀態。1971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余秋里起草、周恩來批准的〈1971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和作為附件的「四五」計劃指標。[17]

〈「四五」綱要（草案）〉執行的第一年1971年，主要經濟指標部得到完成。工農業總產值3520億元（均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為計劃的105%，比上年增長12%。其中，農業增長3%、工業增長14.9%。糧食產量5003億斤，為計劃的104%－98%；棉花4210萬擔，只完成計劃的86.7%－84.2%。鋼2132萬噸，原煤3.9億噸，原油3941萬噸，發電量1384億度，均超額完成計劃。鐵路貨運量比上年增加12%。

但是，盲目追求高指標使國民經濟結構比例失調的問題，不僅在這一年暴露出來，而且進一步惡化，導致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後果，即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1970年和1971年，原計劃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增加了983萬人，超出計劃兩倍以上。1971年全國工資總額按計劃應控制在296億元內，實際達到了302億元。1971年糧食銷售量計劃為794億斤，實際達到855億斤。周恩來在1972年初已經注意到了

17 〈1971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黨的文獻》，2000年第2期，頁11。

「三個突破」的問題，在全國計劃會議期間要求注意解決。但在當時剛剛粉碎林彪集團的情況下，不可能扭轉。當年「三個突破」仍在繼續。年底，職工人數又超計劃招收183萬人；職工工資總額比上年又增加38億元；糧食銷售量達到927.2億斤。

「三個突破」造成了多方面不良影響。增加的983萬職工中，約有600萬人是直接從農村招進城市的，過多過快地減少了農業勞動力，不利農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短時間內大量增加吃商品糧人口，也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緊張。1972年全國糧食統購量只有792.7億斤，出現了134.5億斤的缺口，不得不動用庫存和進口。隨着工資總額的增長，貨幣發行量必然要增加，1971、1972年兩年共增發貨幣27.6億元，超計劃12.6億元，到了最大警戒線，出現了「第四個突破」，給市場帶來很大壓力。1971年社會商品購買力比上年增加12.2%，而零售商品貨源只增加5%。市場商品供不應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國民經濟比例出現了嚴重的失調，主要是積累率過高，農輕重比例進一步不合理。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為23.2%，1970年為32.9%，1971年為34.1%。而農業投資愈來愈少，1971年只佔總投資額的10%，還有一部分被地方基建挪用，工業投資卻達65.2%，相差懸殊超過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在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僅佔5.8%，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除1963年外最低的。基本建設規模急劇擴大，一些重點基建項目紛紛盲目上馬。1969年，包括工業在內的基建投資額為186億元，1970年猛增到295億元，增長幅度高達58.6%。1971年又增加26億元。這種依靠高投資，實現高積累，以保證工業增長高速度的做法，影響了人民生活的提高，給以後的經濟建設造成嚴重的欠賬。

同時，各種經濟效益指標卻不斷降低。由於基建規模過大，降低了投資效果。1971年計劃建成投產的356個項目，實際只建成115個；39種主要產品新增生產能力，有36種沒有完成計劃。1972年計劃投產的大中型項目260個，實際上完成120個。計劃投產的單項工程700多個，實際上只完成370多個。41種產品的新增生產能力，

完成計劃的只有2種。[18]由於忽視科研和技術培訓，排斥科學管理，從農村招收的大批新工人素質較差，導致了勞動生產率下降。1971年比1970年降低0.8%，1972年又比1971年降低5.4%。由於一味求快，生產中浪費現象嚴重。冶金部重點企業1970年的每一單位焦比、機車煤耗、發電煤耗，都比1966年有大幅度增高。由於盲目求多，產品質量日趨下降。國防工業為援助越南戰爭裝配的一批40架「殲6」殲擊機，經檢查就有7架不合格，無法交付，佔全數的17.5%。[19]中國最大的長春汽車製造廠，竟然出現了生產的汽車剛出廠輪胎就掉下來的奇聞。在毛澤東生日1970年12月26日作為獻禮呈報他批准的長江葛洲壩工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建設工程，由於排斥老工人和技術人員，調動大批沒有技術訓練的軍隊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儘管工程總指揮宣稱「完不成任務把我的頭掛在天安門上」，卻不到兩年大壩就出現了裂縫。

2 周恩來主持經濟調整與降低「四五」計劃高指標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經濟建設領導權又重新回到了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等國務院領導人手中。針對前一個時期因文化大革命動亂和過分強調戰爭威脅造成的問題，進行了兩年經濟調整。

調整的第一項措施，是抓批判極左思潮，恢復制訂計劃管理規章制度，加強國家的宏觀控制。

1971年12月5日，周恩來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明確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批判林彪必須聯繫經濟戰線的實際，清除林彪一夥干擾破壞造成的惡果。在其後召開的一系列全國性專業經濟會議上，他多次強調，要批判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影響而造成的不敢抓生產、抓業務的傾向，要求業務幹部大膽站出來。1972年

18 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講話，1973年2月21日。

19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463。

11月，周恩來聽到葛洲壩工程中出現嚴重問題的匯報，痛心疾首地予以嚴厲批評，當即要求停工整頓，指定有經驗的業務幹部出任負責人。1973年2月，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計劃工作時作了總結性的重要談話，嚴厲批判極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揮」、「三個突破」等現象說：「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漸暴露出來了。應該把九大以來林彪一夥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歷數了兩年來經濟領域的種種混亂現象：國民經濟發展不講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為政等等，憤怒地說：「去年我講了（「三個突破」）這個問題，但沒有抓。確實沒有王法了。」[20]

在周恩來指示下，1972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通過會議紀要，制訂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強國家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各項政策，反對無政府主義等。還具體規定：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經濟核算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制度、設備管理和維修制度、安全生產等七項重要規章制度。「紀要」尖銳地批判極左思潮說：「有些人還在那裏擠農業、擠輕工業」，他們「忘記了無論建設也好，打仗也好，人民和軍隊首先得有吃，有衣穿」。「有些好的幹部還沒有解放出來，有些還沒有適當使用。有一部分技術人員沒有用到技術崗位上去。不少熟練工人沒有作為生產骨幹」。「要建設社會主義，不把生產搞上去是不行的」。「我們要反對政治工作脫離實際，搞形式主義的傾向」。「要建設社會主義，不懂得業務是不行的」。「哪裏企業管理混亂，那裏不是壞人當道，就是無政府主義泛濫，歪風邪氣佔上風」。[21]但是，這個文件卻被張春橋藉口文件長了不好發，不准上報中央。

1972年4月至6月，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先後發出關於嚴格控制增加職工和加強工資基金管理的兩個文件，規定未經國務院批准，新增職工人數不得超過計劃。凡未經批准超計劃招收的職工及違反政策增

---

20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463。

21 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草稿），1972年2月。

加工資的，銀行有權拒絕支付，並向上反映。同時，國家還動員了一部分1970年超招的職工返回農村。

在周恩來支持下，1973年2月國家計委又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提出十條原則：加強統一計劃領導，搞好綜合平衡，反對各行其是；嚴格控制基建規模，不許亂上項目；中央集中控制職工總數、工資總額、物價等，各地無權自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業不能再層層下放；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廣泛推行計時工資加獎勵、計件工資等。文件草稿在討論中得到了二十八個省、市、區代表的贊成，只有張春橋說這是「拿多數壓我們，我堅決反對！」迫使文件草稿承認「對遵照主席的路線辦企業講得少，對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講得少，對制度和辦法強調得多，不是綱舉目張」，[22] 最終還是被收回，這個文件和1972年計劃會議紀要雖然沒有下達，但在經濟領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廣大經濟管理幹部統一了認識。

調整的第二項措施，是修改「四五」計劃以戰備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和高指標，對嚴重不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進行多次調整。

1972年11月13日，國家計委召開研究1973年國民經濟計劃會議，認為近幾年來，特別是1969年以來經濟建設中存在着大量問題，1973年要對各項比例關係進行必要的調整，建設步子不能邁得太快，要為「四五」後兩年能有較快的發展創造條件。會議提出：增加農業投資比例，各行各業都要真正做到支援農業。壓縮國防軍工和援外開支，適當增加一、二線的投資，軍工應更多地為民用生產服務。提高用於設備維修等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投資比例。多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特別是化纖生產設備。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一是大力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國家用於農業的財政撥款和支農工業的投資，比上年增加19%；用於農業和農業機械化方面的鋼材，比

22 全國計劃會議簡報，1973年3月31日。

上年增加30%；地方掌握的鋼材要拿出30%到40%用於農業，使農業有較大幅度增長，做到1973年糧食收支平衡；然後再用兩年補上糧食入不敷出的「窟窿」，使國家的糧食儲備達到800億斤以上；二是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確定1973年大中型建設項目1280個，比1972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減少280個；三是壓縮國防費和行政費佔財政支出的比重，由25.2%降到24%，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投資佔預算內總投資的比重，由9.6%減到8.5%。

1973年5月20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轉達了毛澤東會前的指示：項目多了，計劃工作至今還沒有走上正軌。周恩來指出，首先中央應該壓項目，然後才有權利說服地方，要本着這一精神討論、修改計劃。[23]7月1日，國家計委根據中央工作會議對修訂「四五」計劃提出的輪廓，對高指標進行第二次調整，擬訂了〈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修正草案）〉（簡稱〈綱要（修正草案）〉），採取的措施主要有：加強統一計劃管理。提出國家的經濟大權必須集中到中央，三線建設重點地區必須統一規劃、統一領導。將經濟協作區由十個又按行政區改為六個（西南、西北、中南、華東、華北、東北）。對「四五」計劃的部分高指標進行了降低。工業總產值由4000億元下降到3300億元；鋼產量由原來的3500萬噸至4000萬噸壓低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由原來的6000億斤至6500億斤下降到5600億斤。原來規定的「四五」計劃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12.8%下調到7.7%。

1973年6月20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的報告〉的修改稿，提出了八項必須採取的措施。特別強調，本年內要把大中型項目從1500多個壓縮到1200個左右，今後建設要把更多的投資用到技術改造方面來；指出那種軍民分割，各成獨立體系的做法，不符合全國一盤棋的精神，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建議三年內把軍政費用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從1972年的25.2%降到20%左右。

---

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94。

經過兩年的調整，經濟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國民經濟各部門失調的比例關係得到調整，龐大的基建規模被壓縮。1972年工業基建投資已比1971年降低了21.24億元，減少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投資11.37億元，1973年再次減少。工業投資的比重由1971年的61.5%，降低為53.8%。在工業內部，輕工業投資由3.7%提高到6%左右。同時，1973年對農業的財政投資和支農工業投資比上年增長19%。

從歷史趨勢看，國家基礎工業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1962—1965年三年調整時期是18.5%，「三五」計劃時期上升到23.2%，「四五」計劃時期前兩年達25%以上，1973、1974年被壓到平均每年23.9%。軍工支出（包括國防工業、國防科研等，不包括民用工業中直接為軍工生產服務的工業）佔財政支出的比例，「一五」計劃時期3%，「二五」計劃時期4.4%，「三五」計劃時期上升到6.9%，「四五」計劃前兩年竟達7%—8%，後三年壓到平均6.2%。國防戰備佔財政支出的比例，「三五」計劃時期為21.8%，「四五」計劃第一年高達23.1%，第二年仍佔21.2%。經過1973、1974年的下降，「四五」計劃時期平均為19.8%。[24]

1973年國民經濟計劃完成較好，安排也大體符合實際，是「一五」計劃以來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年。工農業總產值達3967億元，完成計劃102.8%；其中工業總產值2789億元，完成計劃102.3%，比上年增長9.5%；農業總產值1179億元，完成計劃103.9%，比上年增長8.4%。經濟效益也有了提高，全民工業勞動生產率在連續兩年下降後，比上年提高3.3%，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也比上年提高13%。工業產品質量嚴重下降的情況有了改變。同時，1973年全民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分別只比上年增長2.6%和4.1%，大大低於前兩年的平均數8.5%和11.2%。由於農業豐收，1973年國家糧食庫存比上年增加93.5億斤。「三個突破」基本得到控制。

24 國家計委《經濟簡報》，1975年4月1日。

3 「文革」衝擊下部門經濟和地方經濟的不平衡發展

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較快的，首推戰備需要的國防科技和軍事工業，其次是地方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電子工業。

(1)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軍事工業畸形發展。

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對地導彈發射成功。12月28日，氫彈原理爆炸試驗取得成功，標誌着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1967年6月17日，中國採用轟6型飛機投擲方式，進行了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爆炸威力為330萬噸TNT當量，取得了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製造技術的國家，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實現了一個質的飛躍。

早在1968年2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就着手準備發射人造地球衛星。但由於運載火箭研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未能按期完成，本來可以在1968年底進行的發射計劃被迫拖延。1970年1月火箭飛行試驗成功。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在酒泉基地發射成功，在重量和一些技術方面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中國航天空間技術進入了一個重要里程碑階段。

1970年4月，研製核潛艇的工作取得突破，動力裝置的關鍵設備——陸上模式反應堆建成，7月進行提升功率試驗成功，證明核動力裝置可以裝艇。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系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證明性能良好，準備交付海軍使用。

發射返回式衛星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後的新目標。科技人員集中力量先後攻克了五大技術難關。當時世界上只有蘇聯和美國掌握了這項高難度回收技術。1975年11月26日，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由「長征二號」火箭運載，在甘肅酒泉發射場成功發射，準確入軌，繞地球運行四十七圈後，於28日安全降落在四川預定地區。中國衛星發射技術實現了第二個飛躍。

在國防科技事業連續取得重要突破的同時，由於過分強調戰備和林彪集團的瞎指揮，軍事工業也出現了畸形發展。

1969年12月，林彪在他控制的中央軍委辦事組之下，設置了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下設航空、電子、兵器、造船四個小組，分別由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兼任組長，實際上將原來由國務院領導的國防科技工業領導權掌握到他們手中，也相應分割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業務組對其他部門經濟建設領導權。他們直接插手國務院部委工作，大肆發布戰爭迫在眉睫的指示，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計劃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此外，由於原有的基層經濟管理幹部大多被打倒和排斥，大批軍隊幹部被推到各個經濟部門主管地位。他們雖然與林彪集團沒有聯繫，但也慣於服從來自軍隊系統的命令，客觀上造成了林彪集團權力擴大，使軍事工業作為壓倒一切的主要任務衝擊了其他經濟領域，軍事工業自身也因為打亂原有計劃、盲目上馬而成為被衝擊的主要對象，造成了惡劣的後果。

首先是盲目擴大軍事工業生產，亂上重點項目，使得國民經濟體系更加混亂。

1969年6月，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主持的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開座談會，邱會作等人先後提出，要搞「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要比洋人還要洋」，聲稱「甚麼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0月17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在蘇州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次日，總參謀長黃永勝以此正式下達「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號令）」，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其中第四項是「迅速抓緊部署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無後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同日還下達了給各總部、各兵種、國防工辦、國防科委的指示（第四個號令），要求抓緊軍工生產。[25]這成為軍事工業更加盲目擴大的直接動力。

---

25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526。

1970年編制「四五」計劃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提出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國防建設高指標，要求投資210億元新建軍工廠700多個。這相當於建國二十年來國防軍工建設投資累計總數的140%，在當時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還提出甚麼都要「大搞」：「大搞運輸機，大搞直升飛機」、「大搞空降兵」、「大搞火箭炮」。以「戰備動員」和「專案」任務為名，肆意改變原來的建設部署。

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的林彪兒子林立果和黃永勝僅僅看見西方資料中提到垂直起落飛機和無殼槍彈，就要求定為研製項目。吳法憲、李作鵬還提出要搞遠程轟炸機和航空母艦。致使三、四、五、六機部的科研項目1971年就多達1200項，列入重點的有200多項，結果搞成的只有幾項。三機部1970年航空工業計劃建設的114個項目，絕大部分沒有竣工投產。1971年計劃建成投產項目29個，只能完成6個。重點掃尾項目12個，只能完成兩個。

李作鵬在海軍科研生產中部署1971年安排生產戰鬥艦艇17種，其中有10種是研製產品。要求大型導彈快艇追求1970年代水平，將原來快艇上70%的定型設備棄而不用，重新設計新的。結果致使新的產品出不來，老的產品也不能大批生產。上海承擔實驗180米長、20米寬的大型導彈艇，從1969年開始到1971年設計方案還沒有產生，李作鵬又要求安上一個「能夠取得氣象範圍內的各種資料」的綜合氣象設備和13種雷達。其中一種雷達按他提出的性能要求，就需要寬3000多米、高30米的長方形天線，這種艇上根本裝不下，成為笑柄。

其次，軍事工業嚴重佔用資金、設備和人力，使民用工業受到擠壓，生產下降。

1969年11月，黃、吳、李、邱主持召開會議，甩開國家計委和主管部門，決定把一大批民用工業轉向軍工生產，或者遷移甚至拆毀，打亂了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

江西景德鎮瓷器在國際市場上享有盛譽，產品一直供不應求。為了增加陶瓷出口，國家用了2700萬元，在景德鎮建成了一個全國最大的現代化陶瓷廠，設計規模為年產2000萬件。1969年，吳法憲等人

大搞直升飛機，看中了這個廠的廠房，不理睬國家有關部門，就佔用了這個剛剛投產的陶瓷廠，把設備分掉，還把花了500萬元建起來的隧道窰和錦窰全部炸掉。致使以後中國在國際市場瓷器貿易總額3億美元中，只佔2200萬美元，相當日本的五分之一。而1970年宣布建成的這個景德鎮的直升機廠，至1971年仍然沒有生產出一架飛機。吳法憲等就把東北老廠生產的零部件拉到這裏總裝、試飛，說成是當年設計、當年基建、當年投產的典型。1973年2月26日，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氣憤地說：「1969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窰也給炸了。林彪一夥一直破壞到『九一三』，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26]

林彪集團鼓吹「要用大計劃保小計劃」，硬壓軍工任務，強佔民用生產能力和材料。1971年一機部系統就有146個廠承擔了「戰備動員」產品總裝任務，其中生產礦山、冶金等機械設備的骨幹廠就有76個。僅1971年7月一次會議，就壓了一機部各種機械產品5528000台（件），要一機部一表態，二認賬，三落實，否則不散會。瀋陽一百二十多個機械廠中，只有兩個沒有戰備生產任務。天津手錶廠承擔高炮引信生產任務，結果全年少生產16萬隻手錶，還使精密設備因生產一般產品受到嚴重磨損。全國兩千多個縣農機廠也大部分承擔了常規武器的戰備生產任務。1969年全國軍工部門向冶金部要去的鋼材，佔全國可分配的13%，1970年增加到16.4%，1971年又增加到16.7%。其中，高速工具鋼中國年產量一萬噸，相當於美國的產量，但中國的高速鋼還要進口。原因是機牀量只佔全國20%的軍工企業佔用高速鋼竟達全國的70%。

第三，以戰備需要廢除計劃管理制度，不講經濟效益，造成嚴重浪費。

吳法憲派到成都雷達廠的心腹公開提出了「六不要」：一不要計劃。他們說：要甚麼計劃？林副主席指示就是計劃。我要甚麼，你就

26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463、464。

生產甚麼，能幹多少，就算多少。計劃就是計劃，把它丟在一邊。二不要設計。他們說：要甚麼設計？在地上劃一劃就行了，這才是正規，過去那個做法最不正規。三不要配套。他們說：搞甚麼配套？你生產越多越好，搞個磚頭也好，到時候一拼就是產品，允許不配套生產。就是生產一汽車螺釘、螺母也可以，你生產出來，我照樣給錢。四不要檢驗。他們說：檢驗這一套是修正主義的，我不感興趣。解放軍用了就是鑑定。搞那些檢驗，不是束縛自己？五不要質量要求。他們說：講這個質量、那個質量，威力大了就是質量，給部隊使用了就是質量。有就比沒有好。沒有皮鞋穿草鞋，總比打赤腳好。就是一堆廢鐵我也要。六不要管理制度。他們說：你們專搞管卡壓，領東西還要料單幹甚麼？生產管理跟不上，乾脆交給工人管，準備出點毛病。過去幾年出不了一個產品，有人說亂，我看這個亂很好，還亂得不夠，這才是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他們對確實需要的進口項目卻大肆批判為「崇洋媚外」。某科研單位需要從蘇聯進口一種設備，報到外貿部，被主管軍代表批上「打倒蘇修」退回。

第四，國防和軍費開支大大增加，成為國民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林彪事件後，1972年財政部王丙乾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發言指出，現在軍費和軍事工業建設費用花錢多浪費大。林彪說：「打仗就是比例」，「必須把現有的財政力量，從各方面節約，以便集中到這方面來。」近幾年來，軍費和軍工建設費直線上升，「二五」計劃期間支出375億，佔國家預算支出16.5%；「三五」計劃期間支出707億，佔國家預算支出28.1%。其中1969年一年就支出158億，佔預算支出30.2%；1970年繼續膨脹，當年計劃支出198億，佔預算支出30.6%；1971年計劃支出237億，佔預算支出33.6%。此外民用工業部門的基建投資和事業費中，還有一部分是用在軍工方面的，未計算在內。「三五」計劃期間支出的300億基建投資中，為軍工服務的就佔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把直接和間接的國防、軍工費用開支加在一起，軍費則佔國家預算總支出的40%左右。與同時期的蘇聯公布的軍費佔國家預算支出的12%左右、美國大約佔25%到26%相比，也過高。

(2) 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窰、小水泥工業）再度興起。在「大躍進」特別是大煉鋼鐵的浪潮中，地方「五小」工業一度遍地開花，但是「大躍進」過後，中央全力收縮建設規模，解決吃飯問題，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地方「五小」工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壓制。毛澤東很不滿意這種狀況，1966年3月他提出了到1980年「用二十五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還說：「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類，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製造權。所謂一部分機械製造權，就是大超額分成權，小超額不在內。」[27]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以後，重提實現毛澤東的「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也為了適應地方各自為戰需要，國家對地方「五小」工業進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強調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業，形成為農業服務的小而全工業體系。從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政府安排了80億元扶植地方「五小」工業，並制訂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中央財政預算之外的投資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萬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億元。正在進行的企業下放運動，使地方獲得了較多的自主權，提高了地方建設的積極性，下放到地方的機關幹部、科研人員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給農村地區帶來了一些科技文化知識和經濟信息。於是，地方「五小」工業蓬勃發展起來。僅1970年全國就有近三百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90%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二十多個省、市、區建起手扶拖拉機廠、動力機械廠和農機具製造廠。與上年相比，地方小鋼鐵工業的煉鋼能力增長1.5倍，生鐵產量增長1.8倍，小化肥廠生產的氮肥、合成氨增長60%－70%，小水泥廠、小化肥廠的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40%，以小煤窰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產量增長70%。

到1975年，地方「五小」工業已經成為地方經濟中的重要力量，改善了中國農業生產條件，提高了機械、技術水平。全國農業機械總

2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9－20。

動力達一億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長了近十倍。其中農業用大中型拖拉機、農用排灌動力機械、農用載重汽車、畜力膠輪大車、手推(拉)膠輪車、漁用機動船等的擁有量，比1964年分別增長了4－7倍；手扶拖拉機和機動脫粒機增長最快，分別增長了45倍和23倍；過去沒有的機動水稻插秧機、機動收割機、飼料粉碎機、牧草收割機和機剪羊毛機等擁有量分別達3.2萬部，17萬台、94萬部、6644部和1095部。農村小型水電站達8萬個左右，發電能力200萬千瓦，分別比1964年增長近10倍和8倍。農村用電量(不包括農村的全民所有制單位用電)也從1964年的35億度左右上升到220億度左右，增長5倍多。全國小化肥廠已發展到約1300多個，生產合成氨達354.4萬噸，比1964年增長18倍，佔當年全國合成氨產量的58%。農業化肥施用量也從1964年的150萬噸左右上升到800多萬噸，增長4倍多。[28]

但是，「五小」工業上得過猛、過多，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其一，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確定項目和選址沒有進行論證，缺乏規劃，一哄而起。許多小工業原料沒有來源，產品沒有銷路。其二，片面強調「群眾路線」的土法上馬、因陋就簡，排斥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用「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大批判」開路，結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質量差。其三，採取「人海」戰術，使新增職工過多。1970年、1971年僅縣辦工業新增職工就佔全國新增數的40.7%。1973年2月，周恩來指出了這些問題，要求進行整頓。他說：「搞五小工業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設備的保證。沒有原料也搞，同大廠爭原料，變成自由發展了。整頓的方針要寫清楚。發展五小工業要有個範圍，要對農業有利，破壞計劃的無論如何不能搞。」[29]

(3)煤炭工業盲目進行江南地區大會戰，得不償失。中國的主要產煤區都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形成了「北煤南運」的格局，這是自然

---

28 《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冊，頁190。

29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464。

資源分布決定的。文化大革命中，為了解決交通運輸能力的嚴重不足，保障戰備需要，在主觀願望的指導下，開展了建設江南煤礦的大會戰。從「三五」計劃起，煤炭工業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調集大批隊伍南下，開發建設江南煤礦。1969年全國計劃會議決定「重點安排江南九省區的煤炭建設，充分發動群眾，大搞小煤礦，力爭奮戰三五年，改變北煤南運的局面」。到1970年制訂「四五」計劃時，又提前到力爭1972年江南煤炭自給。全國煤炭地質勘探隊伍的百分之四十都調到江南，還宣傳推廣了「四邊三當年」（即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和當年設計、當年施工、當年投產）經驗。1970年12月毛澤東肯定這場會戰說：「再一個就是（解決）北煤南運」，「讓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辦，你自己去找嘛！結果到處去找，每個公社去找，每個縣去找，每個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來了，找出煤和石油了。」[30]

經過十年建設，國家在江南投資建成礦井295處，形成生產能力3936萬噸。有貴州的六枝、盤縣、水城，四川的渡口、芙蓉、松藻、華鎣山，雲南的田壩等，還有一大批小煤礦。江南煤炭產量由1965年的3071萬噸提高到1985年的8105萬噸，使江西、湖南兩省基本做到了自給。但是，這次會戰代價也是巨大的。由於客觀上江南煤炭資源少而分散，地質構造複雜，江南九省區到1971年經過幾年的勘探，探明儲量僅佔全國的1.4%。當時卻脫離實際情況，僅憑長官意志而套用北方煤田開發模式進行這次會戰。如江蘇本是煤炭資源缺乏的地區，地方黨政領導人「偏不信這個邪」，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親自率領工農兵找礦隊伍，走到某個山頭上，一跺腳說：「這裏肯定有！」就投入建設。正如陳雲所說：「『文化大革命』中的軍管時期，將軍們管經濟，有些人經驗少，膽子大……說搞甚麼就搞甚麼。」[31]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建成的一些礦井有的因資源不多而很快枯竭報廢；有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81。

31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252。

的挖掘出的煤炭質量很差，甚至只有煤矸石，根本不能使用；還有一些投產後始終達不到設計能力，造成巨大的浪費。如湖南漣邵觀山礦井，花費721萬元，投產八年共生產煤炭9.2萬噸，每噸煤成本高達103元。「四五」計劃期間，國家在江南煤礦投資96.69億元，佔全國投資的41.5%，但效果卻很不理想。從1973年起，國家決定從西南和江南調回一部分隊伍，回師北上建設北方重點基地。

（4）石油工業異軍突起，成為發展最快的工業部門。1960年代起，中國陸續勘探和開發出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發展勢頭很好。文化大革命初期，動亂嚴重干擾了繼續建設的進程。由於戰備，國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產，在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領導人的堅持和支持下，石油工業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1970年，大慶油田進行了開發調整，重新進入軌道，到1973年，原油產量比1970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又開始加強對勝利、大港等油田的開發。勝利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投入開發的134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1946萬噸，成為全國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開發了八個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萬噸，提高到1978年的300萬噸，增長25倍以上。從1966年到1978年，勝利、大港、克拉瑪依、吉林四個油田的年產量從276.1萬噸提高到2783.67萬噸，增長了9倍多。

這一時期，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石油工業部先後在四川、江漢、陝甘寧組織了三個大石油勘探會戰，此後，又開展了遼河和任丘油田的會戰，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會戰是1965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斷，1971年起恢復勘探，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氣田和輸氣管道建設。從1966年到1978年，共獲得氣田三十個、油田兩個，天然氣產量由1965年的8.9億立方米增長到1978年的60.8億立方米。1969年，周恩來確定康世恩負責籌劃湖北江漢石油會戰，到1972年，共發現六個油田、一個氣田和一批含油構造，建成了100萬噸的原油年產能力和配套的荊門煉油廠。到1978年，已建成八個油田、原油產量達到105.6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11萬立方米。1970年，國務院批准由蘭州軍區組成指揮部，開展陝甘寧石油勘探會戰，到1975年形成長慶油田，轉入開發建設，到1978年年產原油能力達到122萬噸。同

年，石油工業部抽調隊伍進行遼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十一個油田，其中九個投入開發，原油年產量達355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5億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開始石油會戰，到1978年原油產量達到1224萬噸，成為1970年代中國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在河南，還建成了中原、南陽油田。

從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一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成為世界產油國家第八位。這一時期通過「四三方案」大規模引進國外化工成套設備，使全國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五倍多。直到進入21世紀，中國石油工業的主要支柱，還是這一時期開發建設的。另一方面，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左傾思潮、長官意志的影響，也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如四川的「川氣出川」工程勘探不明、提出過早，到1976年被迫停止，造成較大浪費。[32]

(5) 備戰使電子工業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初期，電子工業和其他工業一樣受到嚴重挫折，1967和1968年產值連續下降，片面強調戰備打亂了協作體系。促使電子工業再度得到發展的因素，是其戰略和高科技地位愈來愈在世界上顯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領導層的注目。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多次強調要發展電子工業。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他專門給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文革小組寫信，要求加快發展電子工業。同年9月，他又做出關於雷達研究的指示，一方面提出「軍事工業可以幫助國民經濟發展」的理論，一方面強調要把電子工業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電子化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要下決心搞」。雖然陳伯達在1970年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被批判，隨後又批判了陳伯達的「電子工業中心論」，但由於正是戰備高潮時期，軍事裝備嚴重缺乏電子技術和設備，電子工業繼續被高度重視。在1970年制定「四五」計劃總體方針時，專門寫進了「加快發展

32 以上數字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電子工業」的內容，要求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大抓以電子為中心的新技術，大搞單晶硅；要大力發展電子器件，特別是要發展半導體器件、集成電路、激光器件、微型器件和大功率超高頻電真空器件等。隨着三線建設的恢復，地方電子工業得到第二次大發展，全國地方企業由1969年的一千六百多個增加到1970年的五千二百多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電子工業，建成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內地後方基地，四川綿陽、貴州都匀等一批新興「電子城」崛起。衛星通信設備和技術的研製開發獲得進展，建立了多個衛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機、錄音機等基本實現半導體化，使中國電子產品基本過渡到半導體化的技術階段。

上述地方經濟和部門經濟的發展，無論取得成就還是遭到挫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政治環境下主觀決策的產物，有着忽略經濟效益的共同特點。

三　三線建設掀起第二次高潮

1　三線建設的由來和中共中央領導層的分歧

從1964年到1980年，中國內地的十幾個省、自治區開展了一場以戰備為中心、以工業交通、國防科技工業為基礎的大規模基本建設，稱為三線建設。所謂三線，是由中國的國境線向內劃出三條線的地區，一線地區指東部沿海和邊疆，是預想敵人入侵方向的臨戰地區。三線地區指四川、貴州、陝西、甘肅、湖南、湖北等內地，是安全地區，大致範圍是京廣線以西，廣東韶關以北，甘肅烏鞘嶺以南，青海省（含）以東。其中西南、西北地區（川、貴、雲、陝、甘）俗稱為大三線。二線地區指介於一、三線之間的中部，其腹地俗稱小三線。三線建設主要是指三線和二線地區的建設，也包括一線工業的內遷。它歷經三個五年計劃，共投入兩千零五十二餘億元資金和幾百萬人力，安排了幾千個建設項目。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動員之廣，行

動之快，在中國建設史上是空前的，對以後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線建設的決策是在1964年制定「三五」計劃時提出的。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層曾經對此有過較大分歧。

最初，陳雲在1962年為克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時，就提出「三五」計劃要「抓吃穿用」問題，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毛澤東當時已經退居二線，領導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同意陳雲的意見，中央已形成了抓「吃穿用」的共識。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簡稱「初步設想」），規定基本任務是：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三、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用簡單的一句話說，就是一農業，二國防，三基礎工業。農業投資提高到總投資額的20%，大大高於前兩個五年計劃的7.1%和11.3%。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這個計劃設想。

但是，5月10、11日，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毛澤東表示了不滿，提出：「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認為「兩個拳頭——一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33] 5月27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找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羅瑞卿等人，從存在着戰爭嚴重威脅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他特別強調應該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鋼鐵生產基地。[34] 他還激動地說：大家如果不贊成，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59、560。

34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4年5月27日。

來。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後來經過提醒，注意了，最近這幾年又忽視屁股和後方了。會議決定把毛澤東的意見和「初步設想」結合起來，在逐步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同時，加強三線建設。鄧小平說：「這次計劃按農輕重、解決吃穿用和兩個拳頭、一個屁股進行安排，是建設的完整方針。」[35]

但是，毛澤東仍然感到不滿意。6月6日，他更明確地提出三線建設的主張說：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他嚴厲地批評了國家計委和制定計劃的方法，認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後才是農業。

8月2日，美國海軍在北部灣與北越海軍發生激戰，美國空軍開始大規模轟炸北越。8月1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於是，調整後的「吃穿用」加「三線」的指導思想又發生一邊倒變化，三線建設決策終於成為中心。

1964年12月27日，毛澤東又嚴厲指摘：「北京就有兩個獨立王國，我不說，你們去研究！」[36]後來在小範圍點明：一個是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委。國家計委進行了改組，李富春離開了崗位，由毛澤東點名的余秋里接任。原來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制定「三五」計劃的中央分工，也改為毛澤東通過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直到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的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信中檢查自己文化大革命前的「錯誤」時，還不得不說：「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37]

---

35 本節資料未註明出處者，均轉引自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

36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477。

37 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

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稿）〉（簡稱「匯報提綱」）。指出：

> 加快三線建設是主席在1964年提出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是關係着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全局、關係國家安危、關係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的一個大問題，也是解決長遠和當前戰略任務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一定要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採取堅定的態度，那末，就會犯方針性的錯誤。……第三個五年計劃實質上是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劃，必須爭取時間，把國防和三線的主要東西搞起來。[38]

與「吃穿用」計劃相比，「匯報提綱」安排投資順序由農輕重轉變為重農輕。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按部門分，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比例佔74%；農業由原來的20%下降為14%；輕工業佔4.4%。按地區分，三線建設地區總投資佔42%。原來「初步設想」裏沒有重點安排的大項目如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和成昆、湘黔鐵路，在「匯報提綱」中都成為重點項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國防工業體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目標被留置到「四五」計劃考慮。由於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來，沒有來得及形成正式計劃，也沒有付諸全國人大批准。但以後國民經濟年度計劃都是據其方針安排的。

抓「吃穿用」還是抓「三線建設」孰是孰非？兩者都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急需解決問題，是孰先孰後的問題。抓「吃穿用」是當時經濟的需要，抓三線建設是當時政治的需要。一個大國，不安排好「吃穿用」，社會就無法穩定；而沒有可靠的後方基地，安危就無法保證。因此，毛澤東做出先抓三線建設的決策後，其他中央領導人最終也給予了支持，人民為此也付出了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犧牲。

---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61、364。

三線建設初期的主要項目有：四川、雲南交界的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鐵路，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重慶至萬縣為中心的造船工業基地，陝西的航空工業、兵器工業基地，甘肅的航空工業基地、酒泉鋼鐵廠等。從1964年到1966年，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三線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西北、西南三線部署的新建、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到三百餘項。其中鋼鐵工業14項，有色金屬工業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工業10項，森林工業11項，建材工業10項，紡織工業12項，輕工業8項，鐵道工程26項，交通工程11項，民航工程2項，水利工程2項。1966年4月17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提出匯報提綱說：經過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原設想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兩年實現。就建設來說，大小三線的許多重大項目，現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兩年建成。攀枝花鐵礦、貴州六盤水三大煤礦區、劉家峽水電站、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成昆鐵路等，都可以大大提前完成進度。為此，國家計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計劃草案的補充設想：一個是大幅度增加鋼鐵、煤炭、有色金屬、電力、石油、鐵路的生產建設指標；另一個是大抓農業，解決南糧北調和吃進口糧問題，把農業機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體經濟的積累來源，扶持社隊工業，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如果按這個趨勢發展，將出現解決吃穿用和戰略後方兩大任務的雙贏局面。但是，一個月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建設發展的形勢。

1967年，「全面內戰」使形勢急劇惡化，動亂蔓延到全國各個領域，三線建設受到了嚴重衝擊。從中央到地方負責三線建設的各級領導班子中，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薄一波等中央領導人遭到打倒，李井泉、劉瀾濤、彭德懷等地區三線負責人被揪鬥，少數僅存未被打倒的幹部也因「奪權」而「靠邊站」。造反武鬥浪潮更使地方三線建設工程陷於混亂之中。陝西、四川、廣西造反分子搶奪三線軍工企業生產的槍支彈藥，甚至動用坦克，投入武鬥，使國家資產和生產設施遭到嚴重破壞。一些受到軍事保護仍在進行的三線國防尖端項目如核武器、導彈、衛星的研製工作也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被延遲。許

多科技人員在「批判反動權威」、「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遭到傷害，致使重要科研攻關項目停滯不前。林彪、江青等人的直接干擾和他們煽起的極左思潮，也使三線科研、建設工作嚴重偏離正常軌道。從1967年到1969年初的兩年多裏，不少三線建設項目工地發生武鬥，各級指揮機構的領導權癱瘓，施工人員大量外流，施工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其餘的也在艱難維持之中。如成昆鐵路建設工期因此而延誤了兩年，損失資金7.3億元。[39]

2 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和歷史評價

1968年8月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佔領，1969年3月蘇軍對中國珍寶島地區的入侵，使中國直接感受到戰爭的威脅。以強制手段結束國內部分地區的混亂狀態，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三線建設重新在全國大規模鋪開，掀起了第二次建設高潮。

首先是，發布各種通令，整頓生產秩序，恢復和加強全國各地區的經濟計劃領導班子，對仍然發生動亂的地區進行強力整頓。

1969年5月30日，國家建委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成立地區三線建設委員會的報告。報告說，三線建委的主要任務是：1、協助各省制定三線地區的發展規劃，進行地區基本建設的綜合平衡和協作配合。2、組織各省執行經中共中央批准的三線建設計劃。對三線地區的施工力量、設備材料和物資運輸等各項工作，統一指揮，統一調度。3、根據「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審批重點建設項目的選廠定點。4、抓典型，樹樣板，以點帶面，推動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工作。這實際上是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中癱瘓的地方計劃部門，而採取了各大軍區領導的新形式。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針對山西的嚴重武鬥發出布告，要求各方立即無條件地停止武鬥，解散武鬥組織，上交武器，拆除

39 《當代中國的四川》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四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56。

據點，實行歸口大聯合。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軍民立即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堅守崗位，制止武鬥，執行命令，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這兩個布告和命令不容置疑地強調了在戰備要求下加強團結和恢復生產秩序，為三線建設的恢復發展提供了保證。

其次是，針對一批被停頓的三線建設重點工程，連續批發文件，召開相關會議，組織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

1969年5月12日，周恩來指示：「非常時期，成昆鐵路建設由鐵道兵實行軍管，統一指揮，加速施工。」隨即，西南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即520指揮部成立，鐵道兵副司令員何輝燕出任總指揮。年底，中共中央又發出「成昆鐵路務必於1970年7月1日通車」的命令。被中斷近兩年的成昆鐵路工程重新快速全面上馬。6月26日，國務院批准石油工業部提出的〈關於在湖北省江漢地區組織石油勘探會戰的報告〉。8月1日，江漢石油勘探會戰指揮部正式成立，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任指揮長，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康世恩、武漢軍區副參謀長張顯揚任副指揮長。10月28日，國務院批轉一機部軍管會〈關於加速第二汽車廠建設的報告〉。第二汽車製造廠是毛澤東指示批准的戰備工程，廠址由周恩來親自審核批准，由於文化大革命，建設一度中斷。報告指出，這是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各方面要大力協同，緊密配合，保證在1972年按期完成成批生產軍用越野汽車的任務。11月14日，國務院指示冶金部主持召開聯席會議，聽取關於攀枝花工業區的建設報告。16日，冶金部向國務院提出了〈關於加快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問題的報告〉，匯報了加快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準備工作。1970年3月1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鐵道兵〈關於修建襄渝、京原、成昆線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李先念、余秋里召集四川、陝西、湖北三省及中央有關部門召開會議，決定成立鐵路修建指揮部，鐵道兵全線投入8個師、兩個獨立團增加到13萬人，本年計劃上民兵45萬人，明年秋後上到70萬人。8月25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湘黔、枝柳鐵路建設會議紀要〉。8月7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兩條鐵路建設會議，建議成立湘黔、枝柳鐵路會戰總指揮部，由廣州軍區陳海涵任總指揮、昆明軍區徐其孝、交通部

蘇杰、國家計委劉炳華、商業部賈一民任副指揮。湖南、貴州、廣西分別成立鐵路會戰指揮部。會議結束後，兩條鐵路都於11月開工。

採取這些有力措施使一批被文化大革命耽擱的三線建設重點項目重新得到上馬，雖然這是以戰備的非正常形態取代了無政府主義的非正常形態，但畢竟使全國經濟建設能夠相對有序地進行。

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組織批判了林彪的極左思潮，另一方面打開中美關係的局面也使國際形勢出現緩和。三線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逐步得到了調整。

1972年8月19日，國家計委向中央報送〈關於當前國民經濟中幾個問題的報告〉，改變了以往把戰備放在國民經濟首位的提法，提出要把農業放在首位，並把支援三線作為一、二線「主要任務」的提法改為「重要任務」。1973年5月2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今後三線建設一般不再上新的項目，集中精力搞好續建工作，增強經濟效益和配套。7月1日，國家計委根據5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擬訂了〈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修正草案）〉（簡稱〈綱要（修正草案）〉），正式改變了以備戰和三線建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指導思想，標誌着三線建設開始走向收尾。在目標和任務的確定上，放棄了以「臨戰的姿態」「狠抓備戰」的提法，把沿海支援內地由「主要任務」改變為「重要任務」，把從備戰角度強調發展農業改變為從農輕重比例角度發展農業。重新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要把發展農業放在第一位。要求把效益、品種、質量、配套放在第一位。由於前期投資過於集中在三線地區，造成大量施工隊伍和物資積壓，配套設備跟不上，許多建成的企業長期不能開工或開工不足。〈綱要（修正草案）〉要求把一部分精力轉向企業的配套和生產組織上來，盡快發揮效益。重視沿海地區的發展。前一時期，沿海地區企業由於資金、設備、技術力量不足而生產難以擴大，經濟優勢下降。〈綱要（修正草案）〉適當壓低了對三線地區的要求，提出在重點建設內地戰略後方的同時，必須「充分發揮沿海工業基地的生產潛力，並且適當發展」。1973年用於沿海地區和三線地區的投資比重已經大致持平，1974、1975年用於沿海地區的投資則大大超過三線地

區。三線建設的收尾工作，一直持續到1983年經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決定進入調整改造、發揮作用的階段。

整個三線建設，從1964年到1980年歷時16年，跨越三個五年計劃、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1）建立了中國強大的西部國防工業基地，為國家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從二十世紀的歷史看，現代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而且是綜合國力的比拚。所以，有無可靠的強大軍事基地和經濟後方支持，是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由於自然地理的原因，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內，中國未來潛在的軍事威脅，主要仍在東部沿海。一旦戰爭爆發，東部經濟發達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南京及港澳包括機場、港口、電站、基地等將可能受到分裂勢力及敵對國家的空襲。同時，敵對國家將再次試圖對中國實施海上經濟封鎖，扼殺中國的東部經濟發展。三線建設在西部建設起了近千個國防工業企業和研究機構，戰時能夠迅速擴大軍事生產或從民品生產轉入軍品生產研製，滿足前方的武器需要，填補了中國歷史上沒有後方軍事基地的空白，這個重要意義對於近現代歷史上曾經從東部沿海遭受七次大的入侵戰爭、國家幾乎被瓜分的中國來說，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算過分。另一方面，三線建設形成了幅員遼闊的經濟後方。中國的西部後方擁有豐富的石油、鐵礦和鈾、鎢、銻、錫等稀有金屬戰略礦產品及電力資源，在三線建設中得到開發後，一旦東部遭遇戰事，將通過西氣東送、西電東輸等給予前方充分的支持。「東方不亮西方亮」，這是國土廣大的中國的優勢。

從「一五」計劃開始，國家就在西部進行了相關建設，但到1964年以前，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仍然薄弱，只能生產一般的輕兵器、電子元器件、雷達通訊導航設備和小批量生產型號單一的殲擊機等。

以三線建設為中心的「三五」、「四五」計劃時期，國防科技工業在西部地區初步建成了常規兵器與高科技尖端武器共同發展、原料工業與製造工業相配套、國防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一大批軍事工業基地，形成了可靠的戰備大後方，迅速完成了軍隊裝備從引進、仿製到自行研製生產的過渡，並在核武器、空間武器等尖端技術領域進入世

界先進國家行列。1964年至1980年，國家用於三線地區國防工業和科研基本建設投資累計近二百億元。

常規兵器工業方面，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和豫西、湘西、鄂西生產基地，形成了內地常規兵器工業體系，在湖北、四川、陝西、山西建成了軍用汽車、坦克廠，加上各地小三線建設起的一批常規兵器工廠，不僅能夠大批量生產各種型號槍支彈藥輕武器和防空武器，而且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坦克、裝甲越野車輛、火炮、戰術導彈等先進重武器和裝備，到1980年三線地區常規武器生產能力已佔全國的一半多。在各省區也建成了小三線常規武器生產基地，能夠生產自己需要的槍炮彈藥。

國防電子工業方面，在四川、貴州、陝西建立起了大規模的軍用電子工業基地，形成了軟硬件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用兼有的生產體系，研製成功當時國防急需的億次銀河電子計算機，經過技術更新和改造，能夠適應從微波導航、低空警戒、潛艇攻擊、雷達預警、大中型炮瞄、電子指揮系統、導彈制導、衛星跟蹤到電子對抗戰、信息戰等高科技現代戰爭需要。

核武器方面，生產、科研、試驗設施大部分都在三線地區。繼在西北甘肅、陝西建立的核武器研製、試驗基地得到加強之後，在西南四川又建立起更高水平的中國第二個戰略核武器科研生產基地，擁有從鈾礦開採、水冶、提取、元件製造到核動力、核武器研製的核工業系統和試驗基地，成功地進行了多次地上地下核試驗和高能物理試驗。

航空工業方面，在貴州、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建成了航空工業生產基地，新建和擴建了125個項目，到1975年佔全國生產能力的三分之二，能夠定型生產和開發研製高級殲擊機、運輸機、教練機、直升飛機、水上飛機等現代化軍用飛機，並在西南四川建立了包括亞洲領先的大型風洞實驗裝置在內的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成為中國航空、航天研究與試驗的主要基地。

戰略導彈和火箭方面，中國第一個導彈發射基地甘肅酒泉發射場建成兩個新的發射工位，發射能力得到大大提高；四川西昌又建立起包括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建設的衛星地面實驗站、在中國導彈研製中，

發揮巨大作用的西昌衛星導彈發射基地，共建有九十六個項目，加上陝西太原的第三個導彈發射基地，形成了布局合理、比較完整的中國戰術導彈和中遠程運載工具研製基地，多次成功地發射了包括洲際導彈在內的各種導彈和長征系列戰略火箭及軍用衛星。

船舶工業方面，在重慶至萬縣沿長江中上游地區和湖北宜昌、江西九江、雲南昆明建立起內地四大軍用船舶工業和科研基地，能夠生產研製常規潛艇、核潛艇、驅逐艦、魚雷等水下兵器及軍用船舶的新一代發動機和部件，填補了中國國防科研和工業的空白，為1974年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研製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交通電訊方面，建立起了連接各國防基地、戰略要地的鐵路線、國防公路網及戰備物資倉庫，建成了北京、西南、西北之間的微波通信幹線、分布各地衛星地面通訊系統及獨立的地面戰備通訊杆路，保證了國家在戰時的指揮信息和情報流通，加強了軍用物資運輸和部隊快速反應作戰能力。

到1975年，國防科技工業在三線地區的固定資產原值、淨值，主要產品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已相當或超過一、二線地區。到1980年底，三線地區建成了868個企業和研究機構，比1964年增長3.64倍；職工143.6萬人，比1964年增長2.15倍；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7.93萬人，比1964年增長2.42倍；生產能力約佔全國的一半；形成固定資產原值231億元，比1964年增長3.15倍；總產值比1964年增長了3.29倍。大大改變了國防工業的布局狀況。而且，與「一五」計劃時期中國主要在東北、華北建成的軍事工業基地相比，三線地區的軍事工業基地當時具有技術先進的優勢。按照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的指示，1960年代三線建設起步時在技術方面就要求較高，力爭把國內最好的設備和最尖端的研製任務放在那裏；1970年代從西方進口一批代表當時世界較先進水平的成套技術設備，一部分也配置在三線地區。在三線建設基本完成的80年代，三線地區國防工業許多企業的產品能夠代表1970年代的世界水平，與世界差距較小。

（2）通過大規模的三線建設，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與東部地區的差別得到縮小，初步改變了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

在交通運輸方面，西部地區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幹線和支線。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十條幹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佔全國同期新增里數的55%，使三線地區的鐵路佔全國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貨物周轉量增長四倍多，佔全國的三分之一。這一時期，公路建設也得到很快發展，新增里數22.78萬公里，佔全國同期的55%。這些鐵路公路的建設，較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不僅在當時適應戰備的需要，而且對以後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礎工業方面，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重點企業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線地區建成的機械工業大中項目共124個。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四川汽車製造廠等骨幹企業的汽車年產量已佔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重點企業，形成了內地電機工業的主要體系。12個重型機器、礦山、起重、壓延機械廠使三線地區具有了較強的重型機器設備製造能力。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到1979年，機械產品生產能力已相當於1965年的全國水平。能源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點部門。主要有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地區和陝西渭北地區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壩水電站、甘肅的劉家峽、八盤峽水電站，貴州的烏江渡水電站，四川石油天然氣開發、陝西秦嶺火電站等。到1975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1964年的8367萬噸增加到21200萬噸，佔全國同期增長總額的47.9%；年發電量已從1964年的149億度增加到635億度。到1984年，貴州六盤水煤炭還可以支援外省300萬噸，初步改變了江南無煤炭調出省的狀況。原材料工業方面，鋼鐵工業是三線工業投資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幹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銅、鋁工業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蘭州等地，其中西南鋁加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可以生產大型軍用鋁鍛件的企業。這一時期共建成鋼鐵企業984個，工業總產值比1964年增長4.5倍；建

成有色金屬企業945個，佔全國總數的41%，十種有色金屬產量佔全國的50%。

從1965年到1980年，國家對三線地區累計投資達2052.68億元，相當於1953年至1964年投資總和的3倍。從1966至1980年的三個五年計劃，三線地區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1145億元，佔全國同期新增的33.58%，相當於三線地區1953年至1965年新增總和的2.22倍。三線地區工業固定資產原值由1964年的286.81億元增長到1980年的1435.98億元，增長了4倍；佔全國比例由29.12%增長到38.5%。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增長2.46倍；其中工程技術人員由14.21萬增加到33.95萬，增長1.38倍。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3.92倍。1980年與1964年相比，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原煤增長2.6倍，發電量增長6.5倍，生鐵增長5.6倍，鋼材增長6.4倍，鋼增長5倍，十種有色金屬增長5.4倍，磷礦石增長16.4倍，化肥增長15倍，發電設備增長60多倍，機牀增長5.48倍，汽車增長4.1倍。

這十六年，三線地區獲得投資的比例是空前的。「三五」計劃時期國家對三線地區投資比例最高，佔全國的將近一半，年均投資額相當於1953年國家有五年計劃開始到1964年時期年均的1.7倍；「四五」計劃時期雖然三線佔全國比例下降到近40%，但年均投資額更上升到相當於1953年至1964年年均的2.5倍。整個「三五」、「四五」時期，國家共在三線地區投資1186.35億元，佔全國比例43.4%，年均投資額相當於1953年至1964年三線地區年均的1.74倍。在地區年均投資量上，三線地區的十一個省區三線建設時期比1953－1964年時期年均增長125.62%，相當翻了一番，其中四川、貴州、寧夏、湖北增長接近或超過兩倍；增長較小的山西、河南等省是因為只有部分地區納入三線地區，甘肅因為後來中蘇關係惡化而有部分地區劃入二線，就這些省份內的三線地區看，獲得投資幅度仍然沒有減少。在比重方面，三線地區佔全國的比例由1953年至1964年的年均33.5%上升到三線建設時期的39.01%，最高的「三五」計劃時期達到49.43%，幾近全國的一半。

在計劃經濟時期，高投資就意味着促進經濟發展。三線地區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在三個五年計劃的十五年中達到1145億元，相

當於1953－1965年總和 2.22倍，其中四川、貴州、寧夏、湖北、湖南都接近或超過三倍。三線地區佔全國的比例也從29.92%上升到33.58%，最高的「三五」計劃時期達到36.48%。因而，在評價三線建設歷史時，受益多的西部地區與沒有受益的東部地區褒貶不一，甚至大相逕庭，是可以理解的。

各個時期三線地區與全國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比較表

單位：億元

	1953－1965年合計（年均）	三線建設時期				三線建設時期比1953－1965年時期年均增長%
		「三五」計劃時期	「四五」計劃時期	「五五」計劃時期	十五年合計（年均）	
全國總計	1721.79（132.45）	580.13	1082.34	1747.31	3409.78（227.31）	71.62
三線地區合計	515.09（39.62）	211.62	383.72	549.66	1145（76.33）	92.66
三線地區佔全國%	29.92	36.48	35.45	31.46	33.58	
四川	74.14（5.7）	47.04	68.86	95.33	211.23（14.08）	147.05
貴州	26.1（2.01）	17.65	22.8	30.55	71（4.73）	135.49
雲南	39.63（3.05）	16.35	27.11	42.95	86.41（5.76）	88.87
陝西	51.79（3.98）	17.82	49.84	46.07	113.73（7.58）	90.5
甘肅	53.93（4.15）	20.17	31.61	30.38	82.16（5.48）	31.98
寧夏	6.36（0.49）	4.2	7.43	10.95	22.58（1.51）	207.21
青海	15.91（1.22）	7.19	10.9	17.08	35.17（2.34）	92.19
湖北	64.61（4.97）	22.47	56.27	116.07	194.81（12.99）	161.31
湖南	42.3（3.25）	20.05	37.21	44.78	102.04（6.8）	109.31
山西	63.74（4.9）	17.46	29.55	53.39	100.4（6.69）	36.6
河南	76.58（5.89）	21.22	42.14	62.11	125.47（8.36）	42.01

註：本表根據國家統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司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鑑（1950－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頁176《各個計劃時期各地區的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表計算。

從西部工業總產值在全國的地位看，1952年只佔9.61%，重工業佔9.56%，到三線建設進行了一年多後的1965年提高到11.92%，重工業佔13.50%；經過全面三線建設，到1978年西部工業已經佔全國13.26%，重工業佔14.76%。如果從中西部地區看，變化更為明顯。1952年工業佔全國的30.92%，重工業佔32.91%；到1965年工業已佔全國的39.21%，重工業佔45.91%，到1978年中西部地區工業佔全國的40.28%，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比例，重工業仍然保持在43.48%的水平。[40]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工業、重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已經從1952年的約7：3，變為1978年的約6：4，其中西部重工業總產值在三線建設第一個高潮的1965年已經接近東部水平。可以說，三線建設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工業布局的不平衡狀況。

1963年與1980年西部七省區工業總產值指數比較表

（以1952年為100）

	1963年	1980年	增長倍數
全國	299.4	1972.3	5.59
四川	286.7	2173.8	6.58
貴州	221.9	1683.8	6.59
雲南	374.8	1770.3	3.72
陝西	385.0	3059.4	6.95
青海	570.4	4903.1	7.60
甘肅	509.21	3623.22	6.11
寧夏	680.1	7604.9	10.18

註：本表根據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鄭州：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頁9、697、728、758、804、836、865、892各表計算。指數按可比價格計算，以1952年為100。

40 引自魏後凱主編：《21世紀中西部工業發展戰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51，表2－5。

三線建設的另一個成就是在...建成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帶動了西部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初步繁榮，給內地以後的建設提供了發展機遇。三線企業的選址原則是「靠山、分散、隱蔽」，決定了布點遠離原有的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這雖然不是合理的企業經濟行為，卻是有益均衡的社會行為。隨着大批資金、科技人員和工業設施的投入，鐵路、公路、郵電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西部荒蕪的落後地區帶來了幾百年難逢發展機遇，使內地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各種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長。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在邊疆內地的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西昌過去都是山溝野嶺，現在成為世界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航天城。幾十個古老落後的縣、鄉、城鎮被注入了新鮮血液，成為現代化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四川的綿陽擁有中國人均密度最高的科學院、工程院兩院院士，現在被稱為東方電子城；德陽擁有中國最大的重型機械製造基地，現在被稱為動力城；瀘州擁有中國產量最高的化肥廠，被稱為化工城。其他如四川的自貢、樂山、廣元，貴州的遵義、都勻、凱里、安順，雲南的曲靖，陝西的寶雞、漢中、銅川，甘肅的天水，河南的平頂山、南陽，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馬，青海的格爾木等等，也都是中國中小城市的新星。

用經濟學的資源配置觀點來考察，「三五」、「四五」計劃的這一戰略實際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生產力布局從沿海到內地的一次戰略性的大轉移和大調整。對於改善中國生產力布局畸重沿海、工業布局與資源布局嚴重脫節的狀況；對於改變西部地區的貧窮落後的面貌，增強全國各民族的團結，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和作用。如果沒有三線建設時對西部地區的經濟開發，注入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多的西部地區至今將還是一片荒蕪的貧瘠之地，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將會更大，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國家在20世紀末期進行西部大開發、解決東西部經濟差距的戰略任務將會更艱巨。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的發展，若沒有三線建設形成的西部經濟實力如電、燃氣、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撐，也難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由於對戰爭形勢估計過於嚴峻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三線建設中也存在着嚴重問題。

（1）在決策方面，片面強調戰備的要求，建設規模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進程過快，造成了嚴重的浪費與遺留問題。總起來說就是三個「過」字。

三線建設的規劃高潮有兩個時期。客觀地說，1964、1965年進行的三線建設，在規劃、規模、進程上雖然已經出現了「過」字的趨向，但還是控制在一定範圍，沒有造成全局性後果。而1969年至1971年時期，在中蘇武裝衝突事件影響下，林彪集團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通過中央軍委辦事組控制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的領導權，搞了一個龐大的軍工建設計劃，規模急劇膨脹，進度火速加快，大大超過了國家的承受能力，新建和內遷的大中項目達一千多個、資金、設備、原料都難以到位。按照這個計劃，「四五」計劃時期三線地區國防科技工業的投資每年達25億元，比「三五」計劃時期又增加48%；全國新建軍工廠700多個，投資210億，相當於建國二十年來國防軍工建設投資累計總數的140%。林彪集團還要求搞「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三年之內全國要按「六大片、四小片」布局實現配套的「大軍工計劃」。新建、改建、擴建工程同時上馬，造成一方面資金、物資極度緊張，一方面質量低劣、浪費嚴重。

在吳法憲的控制下，1969年到1971年時期，航空工業新開工的46個項目中，沒有資料和設計的就多達36個，航空工業在三線地區投資「四五」計劃時期經過調整仍然佔83.2%。[41]許多企業選址不當，缺乏科學論證，盲目開工建設，長期不能投產，生產出的產品長期不能定型，造成了嚴重浪費。

在李作鵬大搞「獨立完整的造船工業體系」的指示下，六機部列入大三線「三五」計劃開工的三個造船廠、一批造機廠還在建設，他們又下令在九江、宜昌地區新開兩個大船廠、兩個大造機廠和一批配套

41 設于俊主編：《當代中國的航空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73。

廠。1969年造船基建項目只有 4個，1970年猛增加到109個，1971年又增加到125個。但建成投產的項目很少，1971年計劃收尾項目24個，結果只完成了兩三個。由於分散力量，六機部1965年開始建設的一套船廠，年年是重點，建設了六七年，至1972年只完成50%。

進程過快過急集中表現在：許多項目未進行資源、環境、產品的調查和論證定型，就匆忙動工，提倡「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的「三邊」經驗，造成了嚴重後果，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馬，還有些則長期不能投產，帶來了經濟損失。有數字表明，從1966－1978年，基本建設中損失、浪費及不能及時發揮經濟效益的資金達三百多億元，佔同期國家用於三線建設投資的18%以上。[42]又有數字表明，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七年百元基本建設新增國民收入的水平計算，1967－1978年因基本建設效益下降減少國民收入533.43億元。[43]

(2) 在布局方面，過分強調「靠山、分散、隱蔽（進洞）」戰備需要，忽視現代化和長期生產要求，留下嚴重損失和後患。

其中，影響最大，也是後來爭議最大的是「靠山、分散、隱蔽」原則。「文革」結束後一段時間，不少人將這個六字選址原則作為林彪的極左破壞大加批判。從事實看，這個原則最早是周恩來提出的。1964年1月31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為了國防安全，應該盡快地調整我國核工業的戰略布局，根據「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建設後方基地。當時，還只是對核工業的要求。「文革」開始後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林彪的講話中，把「靠山、分散、隱蔽」直接改為「靠山、分散、進洞」，並從此見諸於中央文件，許多項目盲目地要求「進洞」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和不便。

在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上，成都軍區參謀長茹夫一揭露說：

---

42 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黨史研究》，1987年第4期。

43 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93、194。

黃、吳、李、邱在國防建設上獨斷專行，飛揚跋扈，為所欲為，令人難以容忍。在四川江油修建的高空模擬台，主體工程本已定點，並開始施工，擬於1972年建成。可是，去年7月間吳法憲竄到這裏，只聽了半個多小時的匯報，坐在望江樓上隔江一望，伸手一指，脫口就是一道命令：全部進洞！按照他的指令，要開鑿一個長2882米、高21米、寬20米的大山洞，面積21335平方米，需開挖土石方30萬立方米，並且限定半年內建成。為了這個洞，工地增加施工人員3800人，施工設備400台。到今年11月底，僅挖了17800多土石方，約佔總工程量的6%，預計要到1975年才能建成。

按「靠山、分散、進洞」的原則，許多現代化工業企業遠離城市分散建設在山溝和洞穴裏，造成交通運輸、生產管理、配套協作十分不便。如陝西漢中012基地，下屬二十八個單位分布在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兩個地區七個縣，其中一個企業的生活區分散在六個自然村中。整個陝西省三線建設中的428個項目，有368個分散建設在48個縣裏。許多產品生產系統的主機廠在一個地區，科研實驗機構、動力和材料供應、總裝配在其他地區，長途倒運，停工待料，致使成本高昂。如潛艇廠建設在長江三峽上游，每年有三分之二時間不能下水，入海試航還要通過三峽的急流彎道，長途運輸到東部沿海，十分困難。[44]形勢緩和以後，這些企事業由於遠離當地的經濟中心地區孤立存在，雖然也給當地的社會經濟帶來了新的面貌，但不能起到在更大經濟區域拉動一片、輻射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少甚至得不到相關經濟條件（如原料、能源、人力資源、信息、市場）的支持，自身難以存在。

以電力工業為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三線建設中，在全國選了三十二個火力發電廠，總裝機容量543.4萬千瓦，按照「進洞」要求建設。結果造成了數億元的損失，普遍推遲了機組投產時間，加劇了缺電局面，並且留下了許多複雜的技術問題和生產運行上長期的困

44 程望主編：《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91。

難。有的工程地質條件惡劣，洞內潮濕，設備腐蝕嚴重；有的變電站設備擁擠在一個大坑內，發生事故全部被燒燬；有的片面強調分散，造成重複建設，增大投資和負荷。如貴州給每個分散的廠礦都要建一個變電站，共計有二十六個35千伏變電站建在交通不便的山溝、岩洞內。[45]

(3)在經濟效益方面，忽視經濟規律和科學管理，片面強調戰備需要和軍事化管理，使得經濟效益和配套水平、綜合能力低下。

經濟效益的低下，首先是三線地區國民經濟結構安排的不合理導致的。即過分注重軍事工業和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和農業。1965年至1975年，三線地區投資比例中，包括軍事工業、機械工業、冶金工業的重工業佔90%以上，輕工業極少。在重工業中，比例也失調，新建項目加工製造工業前期佔絕大部分，採掘和原料工業考慮較少。這個不合理比例由於長期被忽視，到1970年代後期，使得整個市場和資金供求矛盾突出。一方面人民生活急需其產品又能向國家上繳利潤的輕工業企業長期得不到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另一方面國家花巨大投資的重工業企業長期不能收回成本甚至需要繼續投資維持。

配套建設和綜合能力差，是經濟效益低下的另一個原因。由於片面強調戰爭需要和總體布局和產品缺乏統一、長期安排，許多生產線和產品只為軍工服務，應用方向狹隘，企業適應能力差，在國際形勢緩和軍品需求劇減之後，不能及時轉向民品生產，陷入能力閒置浪費和資金緊缺的困境。

經濟效益差的一個表現，是基本建設中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極低。在國家對三線地區集中了空前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情況下，全國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卻是歷史上最低的。「三五」計劃時期為46.7%，低於一半，甚至比「大躍進」時期的62.2%下降四分之一。「四五」計劃時期略有好轉，仍然低於「大躍進」時期不少。三線地區各省份又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國家投資最多的四川，「三五」時期只有35.5%，略高於三分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和各地區最低

45 張彬主編：《當代中國的電力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59。

的。這不能完全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干擾來解釋，因為同樣在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東部地區比全國水平只下降了2.9%，而三線地區卻下降了21.4%。顯然，應該歸咎於三線建設自身存在的種種經濟決策問題。因此，當「四五」計劃時期採取縮短三線建設戰線、壓縮大批新建項目措施後，全國交付使用率便有了顯著提高。

各個計劃時期三線地區與全國基本建設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表

單位：%

範圍＼時期	1953－1957	1958－1962	1963－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全國	83.6	71.5	87.2	59.4	61.4	74.6	73.8
東部地區	81.6	73.7	86.6	57.7	58.1	68.9	69.2
三線地區	77.1	62.2	72.3	46.7	55.8	67.6	72.4
四川	62.4	55.8	57.3	35.5	50.5	76.1	77.3
貴州	79.2	54	82.6	43.6	46.6	74.7	82.1
雲南	86.3	62.8	69.3	39.6	58.5	77.7	78
陝西	70.9	68.4	104.8	44.4	57.5	60.5	80
甘肅	72.6	57.8	57.5	45.9	58.2	63	68.1
青海	70.3	57.9	35	59.1	63.7	51.8	63.2
寧夏	84.1	58.5	53.4	39.8	60.5	61.7	66.5
湖北	84.2	69.3	81.4	41.3	54.2	75.7	82.2
湖南	95.6	59	67.2	56.4	56.4	66.2	66
河南	73.8	69.7	93.6	54.6	56.2	64.5	74.5
山西	69.2	71.9	93.7	53.9	51.7	71.6	58.4

注：本表根據國家統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司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鑑（1950－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頁178、179《各個計劃時期各地區的基本建設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表計算。東部地區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遼寧、河北、山東、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十個省市。

（4）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影響下，不惜代價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標，用「革命加拚命」取代科學態度，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嚴重事故傷亡，生活安排留下嚴重欠賬。

成昆鐵路通車之際，聳立起一座成昆鐵路烈士紀念碑，227個墳頭朝着山下的鐵路，基座上刻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師 一九七零年七月建」。這僅僅是第八師。全長一千一百多公里的鐵路沿線像這樣的墳塋，共有一千多座。1968年一個四千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進半個排。1970年5月26日，大涼山鹽井溝的鐵二局414、408工程隊駐地被洪水吞沒，幾百人和工棚區被席捲一空，拋到山下，七十多人死亡，斷腿缺臂的屍體遍布沿岸。7月1日，當掛着毛主席像的彩車按時通過孫水河三號隧道時，所有的在場施工人員和家屬都哭成一片。[46]陝西陽（平關）安（康）鐵路，是中國的第二條電氣化鐵路，全長358公里，修建中就有1512人受重傷，384人犧牲，平均每公里犧牲一人以上，代價巨大。[47]

三線建設中，由於過分強調「先生產後生活」，宿舍很多都採用「乾打壘」的簡易土坯房，還有不少企業建在山洞中，陰暗潮濕，嚴重影響產品質量和職工健康。學校、醫院、商店等匱乏，造成職工生活十分困難，人心不穩定。三線建設的「三五」、「四五」計劃時期，非生產性投資比「一五」計劃時期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企業投產以後，特別是1970年代開始注意解決生活欠賬，又被地理環境所迫，各個企業為了解決生活需要，都必須拿出資金建設「小而全」的商店、醫院、學校等封閉社會設施，造成重複浪費。

儘管如此，三線建設仍然為中國提供了奠定保障基礎的功用，雖然在1980年代國內對三線建設的評價曾經出現過否定的主張，但最後中共中央仍然予以了高度肯定。1991年4月22日，江澤民視察三線建設重點項目攀枝花鋼鐵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西南物理研究院後說：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特別是海灣戰爭之後，我們對三線建設的重要性應當有進一步的認識。總的講，毛主席做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48]1991年

46 王春才主編：《中國大三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242。

47 何金銘等主編：《當代陝西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187、203。

48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

1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三線工作會議上也指出：三線建設總的部署、布局和原則是正確的，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從當前來看，特別是從海灣戰爭爆發後來看，都證明我們過去建設三線是對的，不能後悔。

四 「農業學大寨」壓迫下的1970年代前期農村經濟

1 周恩來調整農業政策與「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強行推廣

文化大革命時期，牢固佔據中國農村的指導思想，是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生產大隊，自然條件很差，被稱為窮山惡水，災害不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依靠集體的力量，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劈山造田改造自然面貌，農業生產得到了發展。大寨自力更生發展農業生產的經驗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充分肯定，予以廣泛宣傳，成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極左思潮影響下，大寨由一個自力更生抓生產的典型，變成了一個緊跟政治需要的農業戰線政治典型。其基本經驗主要是：在政治上狠抓階級鬥爭，大批「資本主義」，大促社會主義；不斷地拔高生產關係，搞「窮過渡」；鼓吹平均主義，取消按勞分配。大寨原有的基本經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等反而成為第二位了。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1967年至1969年中國農業生產出現了下降和停滯的局面。全國農業總產值三年平均為642.5億元，比1966年的640.9億元基本上沒有增長。其中1968年還下降為634.5億元。全國糧食總產量1968年減為20906萬噸，比1966年21400萬噸下降2.3%；1969年雖然略有上升達到21097萬噸，但仍低

於1966年的水平。全國棉花總產量1967年和1968年兩年產量徘徊不前，1969年比1966年減產11%。[49]

1969年中共九大後，全國形勢漸趨穩定，中斷了兩年的全國計劃會議召開，要求大力加強和發展農業。1970年8月下旬至10月初，國務院在大寨和北京召開了北方地區農業會議，這實際上是一次全國農業會議。會議第一階段在大寨、昔陽參觀學習。9月1日會議轉移到北京繼續舉行第二階段，主要是開展「革命大批判」，總結和交流各地「農業學大寨」的經驗。9月14日，會議進入第三階段，着重分組討論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措施和各項農村經濟政策問題。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下發了〈國務院關於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

會議提出，「四五」計劃農業發展的奮鬥目標是，盡快扭轉南糧北調的局面，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的各項指標。會議重申〈農業六十條〉中關於人民公社現階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適用，必須繼續貫徹執行；農村人民公社現有「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及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變動。會議重申了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上概括的三句話，即學習大寨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指出決不能照抄照搬大寨一些具體的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上的經驗，對當時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地區搞「窮過渡」的錯誤做法起了抑制作用。會議還討論形成了〈第四個五年農業發展規劃的設想〉，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各地在貫徹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精神中採取了一些措施：適當劃小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的規模，禁止一平二調；恢復勞動定額管理和評工記分制度、小包工制度；在抓緊糧食生產的同時，開展農、林、牧、副、漁業多種經營；剎住沒收自留地之風；採取措施鼓勵社員的家庭養豬等等。

1971年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當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由紀登奎起草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

---

49 朱荣等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268。

對當時農村存在的「分光吃盡」，集體增產個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現、及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現象，強調指出：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增加積累，公共積累不要一下子增加過多，要使農民在增加生產基礎上增加個人收入；口糧分配要做到有利於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積極性；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學習大寨的勞動管理方法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生搬硬套。還提出：要注意農業的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年，中共中央決定適當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收購價格，發出〈關於繼續實行糧食徵購任務一定五年的通知〉，糾正一些地區購過頭糧的錯誤，對鼓勵農民增產糧食和多種經營起了積極作用。1972年起，《人民日報》發表了多篇落實農村政策的社論和文章。

周恩來一直在努力樹立大寨這面農業戰線紅旗，但對大寨狠抓階級鬥爭來搞生產，他是有保留的，曾多次說：「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1970年2月13日他在全國棉花會議上說：「大寨經驗在山西適用，不一定在河北、江蘇適用。」[50] 1971年5月，他又說，學大寨經驗，首先學毛澤東思想，要實事求是；第二是學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是學先公後私的精神。1974年3月，周恩來在與外國客人談話時指出，人民公社成立十五年了，在一些地方還有極左現象，如取消自留地，不准社員家裏養豬、養雞，使農民的積極性受到影響。此外，學大寨也要注意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現在大寨是二級所有，如全國都來學就很不利。[51]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有關部門也採取了一些糾正極左錯誤的措施。1972年8月農林部提交〈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落實情況的調查報告〉，指出有些地方仍存在一平二調、瞎指揮現象，勞動計酬中的平均主義現象還比較普遍，對社員家庭副業干涉過多的事情仍不斷發

5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49。

5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57。

生，有的地方窮過渡、沒收自留地問題仍沒有解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總的錯誤路線控制下，周恩來的這些努力是無力改變農村極左趨勢的。

1970年全國北方農業會議就暴露了這兩種指導思想的衝突。會議推廣農業學大寨經驗時又提出：要學習昔陽建設大寨縣的經驗，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開展路線鬥爭，首先解決社隊領導班子問題。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農業學大寨〉指出：「只有抓住階級鬥爭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廣大寨經驗的要點。」此後，全國農村再次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熱潮，重點是推廣建設昔陽式的「大寨縣」。1973年5月至8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相繼發表了〈發展農業的根本問題在路線〉、〈種田人離不開基本路線〉等文章，要求繼續狠抓「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一些省、地、縣領導機關紛紛派出工作隊到重點社隊開展「黨的基本路線教育」。1974年3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大寨黨支部文章〈大寨之路就是鬥爭之路〉，影射攻擊周恩來1972年組織的批判極「左」活動是「一股復辟倒退歪風」，說大寨「頂住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思想」。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了昔陽縣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頌揚「大寨不是一個生產典型，而是所有制變革以後，農村如何繼續革命的一面旗幟」。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深刻的變革——大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革命〉的文章，說：由於大寨善於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識別能力高，鬥爭精神強，經常有個新套套」。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級省、地、縣領導部門繼續派遣工作隊，到「重點社隊」幫助開展「基本路線教育」和「農業學大寨」運動，繼續搞「以階級鬥爭為綱」。通過「學大寨」運動，對農業、農村、農民採取了一系列平均主義的極左政策。

(1) 大搞「窮過渡」，衝擊農村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昔陽縣普遍實行大寨大隊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的做法，成為全國「學大寨」的一項重要內容，部分地區颳起了社併隊的「窮過渡」風。

據北京、山西、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等11個省、自治區、市的統計，1970年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的由1962年的5%上升到14%，山西省大多數生產隊已經合併為大隊所有制，浙江有四分之一的社隊已經過渡。這種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做法，將原來由於生產條件、經濟發展不平衡形成的窮隊、富隊，在分配上拉平，實際是窮隊「共」了富隊的「產」，既損害了富隊的利益，挫傷了社員幹部的積極性，也沒有調動窮隊的積極性，結果是「共同貧窮」。

（2）大搞平均主義，批判「工分掛帥」、「物質刺激」，破壞「按勞分配」政策。農業部下發的〈學習大寨勞動管理經驗現場會紀要〉要求徹底批判「工分掛帥」、「物質刺激」，推廣大寨按「政治思想」評工分，按「工分不懸殊」原則縮小社員之間因勞力、勞動態度、技術、貢獻大小不同的工分差別的經驗。有的地方，白天辛苦幹一天的農民，還不如晚上動嘴巴搞搞批判的人記工分高。這一時期，山西、上海、天津、山東等地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生產隊，廣東、廣西、河北、陝西、黑龍江等地已經有半數以上生產隊實行了這種管理經驗，被社員稱之為「大概工」，造成平均主義思想嚴重，「出人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的現象普遍泛濫，挫傷了社員的勞動和學習技術積極性。

（3）大搞「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取消自留地和農村集市貿易，甚至消滅社員家庭副業。一些地區提出「多一分自留地就多一分私心」、「自留地種得好就是私心重」的批判口號，解決「三自留」（自留地、自留時間、自留人）和「三爭」（自留地和集體地爭季節、肥料、勞力）的問題，大砍自留地，有些地區甚至乾脆取消了社員的全部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這種做法侵害了社員的利益，給他們種植家庭生活用菜和經濟作物造成了極大不便。農民到集市出售自己生產的雞蛋、蔬菜，都被扣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罪名，大批農村集市貿易被勒令取消，自發進行交易者遭到批判和沒收。按牌價計算，1976年農村集市貿易農副產品成交額佔農民出售農副產總值的比重，由1962年的21.4%下降到10.8%。與此相對，毛遠新在遼寧還發明了一個哈爾套「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通過人為地做假，樹立了

一個集體交換，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的虛假典型。一些地區採取命令手段，強行規定社員飼養家禽、家畜隻數，甚至提出「雞頭不許超過人頭」。如廣東東莞縣黃山大隊，有一千三百多人，集體養了一千六百多隻鵝，被殺得只剩四百多隻。還有的地區採取抄家辦法，沒收家庭副業財產，稱之為「割資本主義尾巴」，「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出社會主義的步」。江蘇省在1962年對農副產品有250種獎售，到1970年只剩下4種。[52]農村副業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1971年由1966年的6.1%下降到2.7%。[53]家庭副業的嚴重萎縮，不僅影響了社員的生活，而且使城市人民生活和出口貿易都受到嚴重影響。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在極左的主體思路控制全局的時候，仍然存在着一股悄然生長的「逆流」——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暗中努力突破現有的農村政治經濟管理體制，求得生存發展。這種「逆流」得以頑強地植根於農民中，根本原因是國家的計劃經濟沒有給予農民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安排，他們只能依靠自己來解決溫飽。文化大革命對計劃體制和管理制度的破壞，也為這種思路提供了客觀的生長夾縫。

1970年8月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反映，各地農村都有一些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如陝西省就有十一種，包括：棄農經商、副業單幹，自由種植、開荒，擴大自留地，組織地下包工隊等。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在強調落實農業政策的過程中，這種思路開始抬頭。一些地方利用抓按勞分配、生產定額管理，搞起了「三包」、「四固定」、「五統一」，有的發展成了包產到戶。例如，1973年，江蘇省的建明、大豐、東台、射陽、阜寧五個縣，廣東省海南島的七個縣，貴州省被調查的十五個縣中的十三個縣（該省有些生產隊秘密分田到戶，已有五年到十三年的歷史），都發現有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其中廣東海南島七個縣中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佔2.9%。甘肅省康樂縣、福建省晉江縣、四川涪陵縣、浙江省平陽縣也都存在分田單幹現

52 全國計劃會議簡報，1972年1月26日。

53 鄭有貴：〈「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業生產波動及其動因探析〉，《當代農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象。除此之外，不少地方搞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這些現象在江蘇、廣東等省也都存在。[54]

大寨精神的推廣，在一定範圍也確曾產生過積極影響，最重要的是1970年代初期掀起的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農村基本建設高潮。

作為實現「四五」計劃農業發展規劃的主要措施之一，1970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提出了「下苦工夫，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口號。全國農村開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運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興修水庫，引水治河，改善農田條件方面：長江中下游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績，興建了荊江漢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五百多座大中型水庫；全面治理黃河取得重要進展，扭轉了黃河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的險惡局面；治理淮河共開挖11條大河道，建成三十多座大水庫、兩千多座中小水庫，灌溉面積相當於1949年的五倍以上；根治海河治理了子牙河等五大河系，排洪能力比1963年提高五倍；大規模治理遼河建成水庫220座，灌溉面積由63萬畝增加到1100萬畝。在打井抗旱、興建水電站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1977年全國農田灌溉面積達70000萬畝，比1965年的49582萬畝增長41%，平均年增長2.9%；1977年全國機電排灌面積達43167萬畝，各種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達4289千瓦，分別比1965年的12140萬畝、667萬千瓦增長355.58%和643%，平均每年增長11.15%和16.8%；1975年全國機井數達181.75萬眼，比1965年的19.42萬眼增長935.89%，平均每年增長25%。[55]

農田水利和排灌機械的發展，增強了中國的農田灌溉和防澇抗旱能力，為農業持續豐收提供了保證。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較，成災面積佔受災面積的比例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其中水災由50.3%下降到31.7%，旱災由59.5%下降到28.6%。[56]這些農田灌溉和排澇條件的較大改善，

54 張神根：〈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發展農業三種思路的變動軌跡〉，《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5期，

55 水利電力部編：《中國農田水利》（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頁25－43。

56 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84，頁74。

為1980年代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個體經營方式抗禦旱澇災害的侵襲，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尤其是1980年代國家對農田水利的投資相對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1970年代的投資在發揮效益。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環境下，這次農田基本建設高潮也帶有嚴重偏差。首先，把大寨劈山造梯田，單一發展農業，在農業中又單一發展糧食生產的基本生產方式，被作為唯一效法的典範，而不顧幅員遼闊的中國南方和北方、平原和山地、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種植特點和自然條件的差異，盲目開展「移山造田」、「填湖填海造田」、「菜農種糧」、「經濟作物上山」等大規模活動，使原本正確的生產經驗也走向反面。其次，不顧各地經濟實力，開展「大會戰」和人海戰術，不講經濟效益和科學技術，長官意志橫行，使得一些地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社員疲憊不堪，收效卻甚微。再次，有些地區，違反保持生態平衡的自然規律，帶來了不良後果。如湖北原有千畝以上的湖泊1066個，總面積83.3萬公頃，由於圍墾造田及築壩建閘使水位降低，到1977年只剩下326個，總面積20.26萬公頃，減少了76%。各地著名的大湖泊如洪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滇池、烏梁素海等在這一時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57]這成為中國1990年代長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頻繁發生洪澇災害的一個重要因素。

1970年代前期，中國農村進入了由動亂向相對有序過渡的階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落實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些經濟政策，但並沒有走出「左」的陰影，要求各地農村照搬大寨的「政治經驗」和具體做法。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在動盪中仍然取得了發展。

1971年雖然遇到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全國農田受災面積達3105萬公頃，成災面積達745萬公頃，但是農業生產仍然獲得持續增長。與1970年相比，全國農業總產值達1051.3億元（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增長3.2%。糧食總產量達25014萬噸，增長4.2%，登上

57 錢作興：〈從圍湖造田到退耕還漁〉，《當代農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了5000億斤的新台階。經濟作物中，油料總產量增長9%，茶葉總產量增長12.1%，烤煙總產量增長14.8%。但棉花、黃紅蔴、糖料和蠶繭都不同程度地減產。生豬飼養量（全年出欄和年末存欄數）達39833萬頭，增長20%；水產品總產量增長9.8%。1972年由於遭受了1962年以來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046萬公頃，與1971年相比，全國糧食總產量減少3.9%，但仍比豐收的1970年略有增長；經濟作物中的油料、黃紅蔴、蠶繭、茶葉、糖料、烤煙、水果等的總產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棉花繼續減產，總產量下降7%；大牲畜和生豬的年末存欄頭數分別增長0.4%和5.3%；水產品總產量增長9.9%。1973年，國家增加了對農業的投入。國家財政支援農業資金比1972年增長30.8%，達到85.17億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由8.5%上升到10.5%。農業生產條件進一步改善，與1972年相比，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1126.5億元，增長8.3%；糧食總產量達26494萬噸，增長10.2%；棉花總產量達256.2萬噸，增長30.8%；油料、黃紅蔴、糖料、烤煙、蠶繭、茶葉等經濟作物獲得不同程度的增產；水產品總產量增長2.3%。1974年，中國的農、林、牧、副、漁業生產持續增長。與1973年相比，全國農業總產值達1165.8億元，增長3.5%。主要農產品中，糧食總產量達27527萬噸，增長3.9%；油料總產量達441.4萬噸，增長5.4%；而棉花、糖料、烤煙的總產量分別下降4%、4.7%和3.9%。生豬存欄頭數略有上升。[58]

2 農村社隊工業在夾縫中悄然興起

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的〈農村工作六十條〉根據當時農村大辦工業、大煉鋼鐵造成的嚴重浪費後果，及國家糧食極度缺乏的狀況，規定農村社隊一般不搞工業。這個規定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一直在嚴格遵循。但是，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中已經提出了要求農村「以農

58 《當代中國的農業》，頁278－287。

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的說法，雖然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經濟動盪在農村未能實行，但理論上已經給「狡猾」的農民出現了可乘之機。

1970年代初期，農村的環境出現了需要而又允許社隊工業（主要指農村公社以下的集體工業）發展的環境。首先是農村人口的持續增長，人民公社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使一些農村地區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農業勞動力出現多餘，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多餘的人口急需尋找出路。其次是國家號召實現農業機械化，但又拿不出較多的資金予以扶植，只能允許一些農村地區企業自己擴大生產解決。再次是城市國有大中型企業由於文化大革命動亂效益始終不高，不能滿足城市和農村的產品需要，市場出現了較大的缺口。最後，從1964年、1969年開始的三線建設和下放企業運動，使得大批工礦企業或者遷移到偏遠農村地區，或者下放給地、縣一級來管理，增加了農村地區的資金和設備使用權力。隨着開展這些建設和運動及興辦「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批科學、文化、技術人才流向農村地區，帶來了興辦企業的知識力量和市場信息。

最根本的一條，當然是農民自身利益的驅動，他們從長期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中，從沒有國家計劃供給工業產品和生活用品造成的困苦中，看到了發展企業可能帶來的巨大好處，而逐漸試圖掙脫幾千年種地搞飯吃的束縛。於是，從1970年代起，因地制宜，不需國家投資的社隊集體工業以毛澤東1966年提出的「五七指示」中「亦工亦農」的設想為理論依據，在夾縫中艱難地走出了一條路。

1970年全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提出，為了實現農業機械化，要求大辦地方農機廠、農具廠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其他企業。這一指導方針給被捆綁在單一農業上的各地農村提供了「紅頭文件」。江蘇、浙江、廣東等歷史上有傳統手工業的省份首先行動起來，紛紛創辦各種規模的農具、糧油加工、建材、編織、服裝等社隊工業。以江蘇省為例，社隊工業總產值1975年已達22.44億元，比1970年的6.96億元增長2.22倍，平均每年增長20%以上。社隊工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所

佔比重，由3.3%上升到9.3%。[59]這些社隊工業的特點是：圍繞農業辦工業，工業為農業服務；為城市工業加工服務；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適應了當時農村較低的生產力狀況，因而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許多城市工業紛紛「停產鬧革命」，多數社隊工業仍能堅持發展生產。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發展社隊工業也被指摘為「搞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牆角」。「一打三反」運動將其視為「鑽國家計劃的空子」，「投機倒把」。一些社隊工業因此而夭折，但在廣大農村社員幹部的抵制下，多數仍頑強地生存下來，並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1970年代中期，部分了解農民疾苦的中央領導人對社隊企業的認識開始有了大的轉變。1974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華國鋒看到湖南省社隊企業局的兩個材料，寫信指出：「社隊企業有如爛漫的山花，到處開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要求加強黨的領導，依靠群眾，全面規劃，「社隊企業就會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級到高級的不斷向前發展」。[60]《河南日報》1974年12月15日登載了一篇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的報導。浙江省永康縣人民銀行幹部周長庚等人受此鼓舞，1975年9月5日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改變1962年中央關於公社工作「六十條」中社隊「一般不辦企業」的規定，積極發展農村工業，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尋找出路。9月27日，毛澤東看了周長庚等人的信後，批示給鄧小平：「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導）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全國縣、團級黨委「參照執行」。[61]10月11日，《人民日報》以〈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為題，發表了河南省鞏縣回郭鎮公社發展社隊企業的調查，並在編者述評中號召各地要「滿腔熱情地支持和辦好社隊工業」，指出其發展方向主要是為農業和人民生活服務，有條件時

59 莫遠人主編：《江蘇鄉鎮工業發展史》（南京：南京工學院出版社，1987），頁140。
60 馬傑三主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55。
6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470。

也要為大工業、出口服務。要求各級領導採取積極措施，加以扶植。此後，社隊工業得到了更快的發展。

1965年至1976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全國社辦工業產值由5.3億元增長到123.9億元，在全國工業產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62]全國社隊企業到1976年底，已發展到111.5萬個，工業總產值243.5億元，其中社辦工業產值比1971年增長216.8%。社隊工業的發展為農業機械化、農田水利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還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使農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更長遠地看，客觀上還為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準備了一定條件。社會經濟學家費孝通調查後說：

> 十年動亂，全國遭劫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村，在一定意義下卻可以說因禍得福。社隊工業正在這時狹處逢生，發展了起來，所以有人說社隊工業是「亂世出英雄」。對此我起初頗覺意外，後來聽了一些社隊工廠的開辦發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裏動刀動槍地打派仗，幹部、知識青年下放插隊這兩件使城裏人或許到現在還要做惡夢的事情，從另一面來看，卻成了農村小型工業興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63]

文化大革命中興起的這些地方和社隊工業，不少成為改革開放時期鄉鎮企業的優秀典範。河南新鄉東街五隊的道路是一個實例。

1972年，女青年劉志華接任河南新鄉縣小冀鎮東街五隊隊長之職，當時該隊共有72戶，360餘人，集體家當只有250畝耕地，人均僅0.7畝地，固定資產是三間草房、四頭牛、一輛馬車，卻欠有8000元債務，全隊溫飽問題遠未解決，生活極為貧困。但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就有經營企業副業和小商業的傳統，於是劉志華帶領村民走出了一條新路。第一個階段以農為主，兼營副業。最早的副業是打草繩，1974年用兩年時間就解決了溫飽，奠定了辦工業的基礎。第二個階段以工業

---

62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頁214、215。

63 費孝通：《行行重行行》（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頁24。

為主，農業為副。五年內着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到1979年便實現脫貧致富。隊裏擁有三十台打草機器，集體積累流動資金五萬餘元，又創辦了石棉瓦廠、玩具廠、被面廠、腐竹廠。最後以腐竹廠為龍頭，建立罐頭廠、豆漿晶廠、紙箱廠等十餘個廠。到1990年代，該村已經成為馳名河南的農工商聯合企業。

然而，在1970年代社隊工業像這樣能夠較快地得到發展的例子並不普遍，其他地方為甚麼未能發展起來？學者曹錦清經過調查後得出的結論是：首先缺少一個好的帶頭人，肯為集體致富而犧牲個人的更大發展。這些典型，是現代型科層組織和以傳統倫理相維繫的集體組織，只有在中國傳統文化內才能釋放其真實的含義與力量。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在當時的人民公社集體經營體制和「學大寨」的模式控制下，農民個人經商或辦企業的可能性等於零，並不能用農民需要「『別人』來替他們認識並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64]完全解釋。所謂好的帶頭人，實際也就是黨支部能否突破極左的觀念和當時的政治束縛。總起來看，當時中國農村的主體思路是依靠「學大寨」解決農業問題，在政策上並沒有大加提倡社隊發展企業，默許多於號召。因此，1970年代這樣的帶頭人肯定是鳳毛麟角，而且要冒極大政治風險。當時多數社隊企業只能在強制和自發的兩種縮小城鄉經濟差別認識的夾縫中掙扎，終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五　擴大引進和擴大援助的兩個對外經濟熱潮

1 向西方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

1960年代初期，蘇聯單方面撤走專家、中斷經濟援助，中國和蘇聯東歐的經濟貿易交往急劇下降。其後，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

64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447。

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他對法國議員代表團說：「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甚麼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65]他甚至提出：我考慮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66]但是，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持續緊張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這個設想一直未能實施。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中國對外貿易在批判「崇洋媚外」棍子的打擊下，瀕臨閉關自守狀況。

早在1970年，周恩來就曾着手部分清除外貿領域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極左錯誤，為恢復正常外貿工作創造條件。3月17日，他批評說：「你們提，對進口的東西要『一批、二用、三改』，這不對。買就是要用，不用，你進口幹甚麼？要調過來，改成『一用、二批、三改』。如果進口的目的是為了批，那有多少東西要進口啊！」[67]10月12日，他又嚴厲批評那種在外貿中搞極左宣傳、要求外國商人承認中國政治立場的做法說：「貿易就是貿易，商人就是商人，資本家怎麼能把我們的『精神』拿去變『物質』呢？」他還耐心解釋說：「現在讓這些人鑽進來做買賣，他們賺了錢，但我們國家強起來了，得到了好處。」[68]由於林彪、江青集團當時還控制着很大權力，周恩來的這些努力未能收到明顯成效。

至1970年代初，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着新的一輪經濟危機，蘇聯、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活動遭到愈來愈多國家的抵制，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大經濟體系逐漸趨向解體，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往來。1973年，長達二十八年的以美元為中心國際貨幣體系崩潰，即是其標誌之一。另一方面，隨着中美關係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

6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20。

66 毛澤東聽取工交會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1964年1月7日。

67 周恩來接見全國計劃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70年3月17日。

68 周恩來在審查外貿部核心小組報告時的指示，1970年10月12日。

大批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打破了美國陣營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封鎖。中國國內在林彪事件以後，開始批判和糾正部分「左」傾錯誤，為中國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1972年2月，毛澤東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他抓住這個契機，準備開拓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面，藉這次談話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對外貿易領域閉關自守的錯誤做法。他對尼克松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69] 在中美上海公報中，雙方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1972年春季，中國首次邀請了四十二名美國商人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於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與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開始試圖打開對外經濟工作局面。當時，國內因文化大革命動亂影響生產，加之棉花歉收，棉布供應持續緊張；化肥生產也長期跟不上農業發展需要，有較大缺口。1971年毛澤東巡視南方時，聽到服務員說為買混紡褲子排了很長時間隊，曾說為甚麼我們自己不想辦法多搞一點。這看似無意的一句話被周恩來抓住，作為對外引進突破口。1972年1月，李先念聽取了余秋里根據周恩來指示召集國家計委及輕工、燃化、商業、外貿等部委負責人研究後的匯報，決定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急於尋找出口市場、商品價格較低的有利時機，針對國內需要，進口一批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中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四套、化肥設備二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四億美元。他們同時指出，進口這些在國外技術較新的設備也是「根據國外經驗，必須大力發展石油化工，把化纖、化肥工業搞上去」的需要。這些設備投產後，一年可以生產化纖24萬噸（相當於500萬擔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織品高幾倍），化肥400萬噸。所需的石油氣、油田氣、石油原

69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95。

料，在國內也有保障。[70]2月5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圈閱批准了這個報告。

隨後，周恩來等人以此為突破口，將對外引進交流規模進一步擴大。5月5日，冶金部繼申請從國外進口1.7米大型鋼板冷軋機後，又建議同時進口配套的熱軋機。這是國內鋼鐵工業長期以來急需的設備，在1965年的「三五」計劃中就已經作為引進項目，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團藉口「自力更生」拒絕進口，要上海自己研製，卻遲遲製造不出來，造成鋼鐵工業軋鋼能力不足，鋼材品種不配套，嚴重影響了經濟建設的發展。8月6日，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估價約4億美元。8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准。11月7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6億美元的23套化工設備。周恩來圈閱批准這個報告的同時，又要求將總額33億美元的另一進口方案送他合併考慮。他不僅看到眼前的急需，而且在為將來的發展打算，準備採取一個大規模的一攬子引進方案。

在1972年引進一系列項目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上，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後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中國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報告還建議，由國家計委及各部委組成「進口設備領導小組」，「像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抓156項進口設備那樣，紮紮實實地把建設任務抓緊抓好，盡早投產見效」。[71]

---

70 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1972年1月22日。

71 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1973年1月5日。

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是繼1950年代從蘇聯引進156項工程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貿易領域「閉關自守」局面的一個重大步驟。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200億元。到1982年，26個項目全部投產。其中投資額在10億元以上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一期工程、遼陽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油化工總廠等。

「四三方案」的批准實施，帶動了對外引進工作的全面發展。在國務院領導人的積極努力下，又果斷地進行了開拓整個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部署。從1972年起，中國的外貿、金融及與之有關的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建國以來對外引進技術設備、開展經濟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項目外，重要的引進項目還有：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技術項目；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力量等。1972年9月，國家計委成立了進口技術設備領導小組，負責審查進口設備和綜合平衡及長期計劃銜接工作，還組織有關部委派出多個考察小組，到國外考察檢查進口設備。同時，在國內恢復舉辦先進科技國家的技術貿易展覽會，學習吸取國外先進技術。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資的戰略指導思想方面，周恩來等人頂住江青集團的壓力，進行了艱苦的工作。這一時期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開始注意台灣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的做法。

在中國大陸陷入「文革」混亂之時，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四小龍」開始了經濟起飛。周恩來注意到了這一情況。1972年4月他接見廣交會代表時，詢問了台灣產品加工出口情況，感慨地說：為甚麼台灣能搞，我們搞不了？我們這樣偉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灣多十億，值不得驕傲。1973年6月29日他接見美國銀行家洛克菲勒時，頗具意味地說：通過兩國銀行來推動兩國貿易的發展，這是一個有效的渠

道。我們過去不會運用銀行。……我很直率地說，這一點我們還趕不上台灣的嚴家淦。……他對做生意、搞貿易有那麼一套。……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後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台灣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樣，台灣的貿易額就大了。……原來我很奇怪，它的貿易額為甚麼這麼高？一調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資，這部分外資當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灣的勞動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還便宜。[72] 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會談時，又重提說：蔣介石在台灣省有一個高雄港是自由港，沒有稅，吸引外資帶着原料去建廠，利用台灣的廉價勞動力、勞務費，然後把商品回銷外國。這樣吸引很多外資到台灣去投資。[73]

顯然，周恩來已經在心中比較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勞動力、資源，得出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來料加工的做法如果在大陸實行，將會吸引到更多的外資、賺取更多的利潤的結論。由於極左路線當時佔據統治地位，「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成為鐵定的「大好形勢」標準，借貸形式已經被否定，更不要說直接引進外國資金了。當時，周恩來的這一設想只能存於心中，不可能實踐，甚至在口頭上也不能提倡。

1973年和1974年協助周恩來研究指導外貿工作的陳雲發揮了重要作用。1973年6月，陳雲在與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了「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現在我們外貿主要面向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因此，「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的位置」。[74] 針對「文化大革命」對研究機構和制度的破壞，他提出：要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認真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資料，並親自擬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645、646。

7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30。

74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18。

定了了解世界經濟狀況的十個重要問題。根據他的這一思想和周恩來的多次指示，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許多調查研究，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1973年籌措到外匯資金十億多元，支持了對外引進的需要。

在利用和借鑑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陳雲大膽地指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他說：「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場所，但也是一種大宗商品的成交場所」。「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迴避。」[75] 根據這一思想，外貿部門在購買國內需要物資如砂糖時，不是像往常那樣購入現貨，而是先購入期貨，再購入部分現貨，待到砂糖價格大幅度上漲後，再將期貨拋出。這樣，既完成了購買任務，又為國家賺取了外匯。這是中國進入國際期貨市場的開端。

在恢復建立國內出口生產基地、擴大出口貿易方面，按照周恩來制定的「外貿要立足於國內，要把生產、使用和科研結合起來，推動國內生產的發展」的方針，李先念等人進行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嚴重破壞的出口生產恢復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關會議上指出：把出口工藝美術品說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生產，不採購，使出口額顯著下降，這種狀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針對有人攻擊外貿工作「崇洋媚外」，認為出口商品提價是「幫助外國商人剝削各國人民」的謬論，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嚴厲批評說：這麼說的人，硬是想要我們吃大虧，外國資本家賺大錢。在他和周恩來部署下，工藝美術品、農產品等出口生產基地得到了較快恢復。1972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在北京開幕，歷時四個多月。為了擴大加工出口，外貿部門利用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較低，而國內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較強的時機，進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後出口，既解決了國內的棉布緊缺，又賺取了外匯，同時還使國內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卻認為，這樣做是依靠外

75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22。

國，不是「自力更生」。陳雲經過調查研究後明確地指出：「我們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同時，他還考慮到在整個外貿進出口安排上，都應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如進口化肥和設備，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肉類，「要長期搞，這樣搞是合理的。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76] 1975年鄧小平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採取補償貿易的「大政策」，如引進外國的技術設備開採煤礦，用煤炭償付。好處一是增加出口，二是帶動煤炭工業技術改造，三是容納勞動力。[77]

江青集團對這次對外引進工作竭力反對，設置重重障礙。1974年2月，江青到四機部講話，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的蝸牛禮品是「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還說引進這條生產線是「屈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崇洋媚外」。當初曾在引進這條生產線報告上批示同意的王洪文立即倒打一耙，附和江青。6月，王洪文又在幾封來信上批示，污衊向國外買船是「迷信外國資產階級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義路線」。在他們的破壞下，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項目被迫中斷。

周恩來等人對「四人幫」的破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周恩來指示外事部門查清所謂「蝸牛事件」不過是正常的禮節往來後，主持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收回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挫敗了江青集團製造的一起陰謀。陳雲針對江青集團揮舞的「洋奴哲學」棍子和極左清規戒律，堅決表示：在外貿工作中，「要把一些界線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與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他毫不退讓地回答：「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78] 鄧小平頂住「四人幫」通過製造所謂「風慶輪事件」施加的壓力、在1975年

76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23、224。

77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9。

78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19、224。

又提出，要把「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擴大進出口」列為加快工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要多爭取出口一些東西，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回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79]

在周恩來、李先念、陳雲等人的領導和鬥爭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5年，中國對外經濟工作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1973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09.76億美元，是1970年45.8億的2.4倍；1974年更達到145.7億美元，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58.2億美元，是1970年22.6億美元的2.58倍；1974年更達到69.5億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80]一方面，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國內基礎工業，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為中國1980年代經濟建設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外貿出口創匯也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國外成套設備的引進。

1970年代前期的開拓對外經濟引進和交流新局面，是中國外交戰略實行重大轉變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中國打破長期被封鎖狀態和重新組合對外戰略，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使中國與西方國家建立了比較正常的經濟關係，大致上形成了新的對外格局。正如陳雲所指出：「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百分之二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百分之二十五對蘇聯、東歐。」「這個趨勢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81]這次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開拓，是在國內遭受文化大革命錯誤嚴重破壞的背景下進行的，起到了糾正閉關自守極左錯誤的作用，還對在1960年代的一些片面做法進行了調整。如在發展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上，由於對戰爭的估計過於嚴重，從1964年開

79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9。

80 陳東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國第二次對外引進高潮〉，《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2期。

81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17。

始國家把投資和引進的先進設備集中放到三線地區，忽視沿海工業經濟效益，造成了較大的浪費。到1970年代開拓對外經濟新局面時，國務院領導人果斷地提出了進口的設備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內地的原則。

從更遠的考量來說，這次開拓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為1980年代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物質準備。由於對外引進的決策是毛澤東批准的，因此在結束文化大革命後，對外開放順理成章地首先起步，比改革受到的阻礙要小得多，成為中央的一致共識；「四三方案」引進的二十六個大型工業項目，在1982年全部投產，多數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對中國解決農業化肥和日用化纖的短缺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增添了重要的生力軍；1970年代曾經實踐的一些對外引進政策和產生的一些思想認識，為1978年以後制定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借鑑。正如鄧小平1987年回顧：「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82]

1972年至1978年二十七個成套設備引進建設規模表

項目	投資額（億元）	設計能力	引進國家
赤水天然氣化肥廠	2.73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四川化工廠	2.61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日本
瀘州天然氣化工廠	2.40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雲南天然氣化工廠	2.77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宜昌湖北化肥廠	2.45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湖南洞庭化工廠	2.50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廣州石油化工總廠	3.14	合成氨30萬噸，尿素52萬噸	法國
南京樓霞山化肥廠	2.98	合成氨30萬噸，尿素52萬噸	法國
安慶石油化工廠	3.01	合成氨30萬噸，尿素52萬噸	法國
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	2.47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日本

8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55。

續上表

河北滄州化工廠	2.39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遼寧遼河化肥廠	3.48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黑龍江大慶石油化工廠	2.43	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	美國、荷蘭
吉林化學工業公司	2.09	乙醇10萬噸、乙烯11.5萬噸、合成橡膠8萬噸	西德、日本
北京石油化工總廠	23.70	乙烯30萬噸、高壓聚乙烯18萬噸、聚丙烯8萬噸	日本、西德、美國
北京化工二廠	1.39	氯乙烯8萬噸、聚氯乙烯2.5～7.5萬噸	西德
上海石油化工總廠	20.79	化纖原料10.8萬噸、化學纖維5.2萬噸	日本、西德
天津石油化纖廠	10.37	化纖原料8.1萬噸、化纖5.2萬噸	日本、西德
遼寧遼陽石油化纖廠	24.15	化纖原料13萬噸、化纖萬噸位	法國、意大利、西德
長壽維尼綸廠	7.2	化纖4.5萬噸	法國、日本
遼寧元寶山電廠	3.92	發電機組30萬千瓦	法國、瑞士
河北唐山陡河電廠	5.30	發電機組75萬千瓦	日本
天津大港電廠	4.50	發電機組32千瓦	意大利
遼寧清河電廠	6.44	發電機組110萬千瓦	蘇聯
武鋼1.7米軋機工程	38.9	熱軋鋼板300萬噸、冷軋鋼板100萬噸，硅鋼片7萬噸	日本、西德
江蘇南京烷基苯廠	2.21	烷基苯5萬噸	意大利
江蘇南鋼氣化球團工程	1.00	球團礦30萬噸	日本

註：投資額截止到1978年計算。

2 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熱潮和降溫

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外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國對外援助的急劇增加。其中額度最大的是支援越南的抗美戰爭。根據中越雙方達成的多次協議，在越南抗美戰爭期間，中國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資金和生活物資。其中包括：165架飛機、810輛坦克和裝甲車、3萬餘門火炮、177萬餘各種槍枝和1660萬發炮彈、10.4億發子

彈；現匯63462億美元；各種汽車35035輛，各種船舶686艘，各種拖拉機4730台，鐵路機車127台，鐵路客貨車廂3290節，自行車85.7萬輛，各種築路機械5373台；糧食539.66萬噸、棉布26960萬米、化肥61.06萬噸、鋼材60.11萬噸、煤炭191萬噸、動力油料189.55萬噸、紙張9.03萬噸；此外還有大量棉花、棉紗、棉毯、服裝甚至到牙膏等日用生活品。在成套項目援助方面，主要是幫助越南搶修、恢復遭敵機轟炸破壞的工廠和交通設施，建設直接為戰爭服務的軍工項目、電站、油庫、油罐、輸油管等工程。[83]在當時中國經濟還很困難的情況下，許多物資是中國人民和軍隊極缺乏的。到1978年止，按當時國際價格計算，中國援越總值達200億美元左右。這些援助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絕大部分是無償的。此外，對非洲、朝鮮、阿爾巴尼亞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也在中國的援助計劃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是中國對非洲援助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項目，也是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獨立後，為了衝破南非種族主義的封鎖，迫切希望修建這條鐵路為贊比亞解決可靠的出海口。1967年6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毛澤東對坦贊兩國修建坦贊鐵路的願望表示讚賞和支持。周恩來表示，只要坦贊兩國領導人下決心，中國願意援建這條鐵路。9月5日，中坦贊三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修建坦贊鐵路的協定，由中國提供無息貸款。1968年5月起中國派遣勘測隊赴坦、贊進行勘測設計，1970年10月正式動工興建。到1976年5月，鐵路全部建成，7月移交坦贊兩國政府並正式投入運營。鐵路正線長1860.5公里，其中坦境段975.9公里，贊境段884.6公里，多數地段位於人煙稀少、野生動物群居的千里莽原和高山峽谷中。鐵路工程浩大，門類繁多，技術複雜。全線共有車站93個、橋樑320座、隧道和明洞26座、涵洞2225座；還各建有一座設備齊全、能承擔機車車輛大修並製造部分零配件的機車車輛修理廠。全部房屋建築面積共37.64萬平方米。建築這條鐵路所完成的土石方量達

83 石林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58。

8887萬立方米，如築成高寬各一米的長堤，可繞地球赤道兩周多。修建坦贊鐵路，中國累計投資9億多元，[84]共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出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峰時有1.6萬人在現場施工。先後共為坦贊兩國培訓了1.2萬多名技術工人，其中有600多名後來成為坦贊鐵路局的技術骨幹。坦贊兩國把鐵路稱譽為「生命線」、「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85]

類似項目，還有從1972年7月開始分三期施工、1978年9月通車使用的朝鮮平壤地下鐵道，這是中國在停止自己續建地下鐵道工程而援助的。共建成線路23.69公里，車站15個，車輛段1個。中國共提供了3.6萬噸設備材料，包括電動機車、客車112輛，自動扶梯50台，電力、通風、給排水、通訊信號、車輛段等主要設備8000台件，鋼軌1.02萬噸，各種電纜1300公里；先後派出200餘名工程技術人員赴朝工作。[86]

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在與中國建交的同時，也要求中國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從1971年至1978年的八年間，中國政府除繼續向原來的30個受援國提供援助外，又增加了對赤道幾內亞、伊拉克、埃塞俄比亞36個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使接受中國大陸援助的國家達到66個。從1971年至1978年，中國共幫助37個國家建成470個項目，超過前十六年（1955－1970年）建成項目的總和；成套項目援助支出比前十六年的總和增加109%。在此期間，中國對外經濟援助的支出為前二十一年（1950－1970年）支出總和的159%。[87]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援助是有必要的，起到了爭取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權利，支援第三世界，牽制美國、蘇聯的作用。但是，

---

84 〈贊比亞新觀察：互惠互利　共同發展〉，《人民日報》，2004年2月11日。

85 《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頁135、530。

86 《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頁198。

87 《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頁60、61。

由於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援外工作中也存在着較大的偏差。如單純認為經濟援助就是支援世界革命，越多、越不講條件就越革命。甚至對馬耳他這樣生活水平比中國高得多的歐洲國家，中國也花巨資為其修建港口。在中國經濟狀況十分困難和人民生活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加大了中國國內的困難。這也養成了一些受援國乘機大肆討要的依賴思想，阿爾巴尼亞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從糧食、生活用品、工業設備、原材料、科學技術到軍事裝備，無所不包。據統計，從1954年到1978年，中國共向阿爾巴尼亞提供142項成套項目援助，已完成91個，其他的也是在建中；幫助興建了鋼鐵、化肥、製鹼、製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使阿爾巴尼亞第一次自己能生產鋼鐵等多種產品；還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紡織、輕工、建築、通訊、廣播等部門項目。這些援助價值達100多億人民幣，相當於阿爾巴尼亞平均每人得到3850元人民幣，而這一時期中國人均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國還先後向阿爾巴尼亞派出了6000名專家，同時在華為阿爾巴尼亞培訓2000名技術骨幹。必須指出的是，援助中的許多物資，是中國自己還很短缺或沒有的。如紅土礦為原料的冶金工藝和設備，中國自己沒有，進口又買不到，中國花費了一億多人民幣為阿爾巴尼亞專門試製，建成了二十個車間。與此相反，阿爾巴尼亞一方面獅子大開口，再三索要，一方面對援助物資浪費嚴重。中國用外匯進口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高級鋼管他們用不完，竟當作電線杆；援助的化肥亂七八糟堆在地裏，任憑日曬雨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總書記霍查毫不掩飾地對中國領導人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他們甚至提出，要中國為他們的每個農業社都提供電視機，而當時中國的大城市裏黑白電視機還是如同鳳毛麟角。李先念問謝胡：「你們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甚麼時候還？」謝竟回答：「我們根本沒考慮還。」再三來中國討要援助的阿爾巴尼亞副總理凱萊齊覺得這樣做不近情理，又不敢違抗命令，十分苦惱。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終於忍無可忍，向中央寫信反映：援阿爾巴尼亞過多助長了他們的懶惰，必

須重新考慮。李先念看到信說：「耿飆，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由於毛澤東表態：「耿飆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耿才沒有被扣上「破壞中阿友誼」的帽子。[88]

周恩來對這種盲目援外熱潮曾經表示過憂慮。1972年，中國對外援助實際支出51.5億元人民幣，佔國家財政支出比例高達6.7%。其中援助越南金額共26.6億元，全部為無息貸款。周恩來批評說：對外援助「手太鬆了」。[89]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支出更高達58億元人民幣，佔國家財政支出的7.1%。當年援越經濟、軍事總金額佔中國援外的48%，外匯、糧食都佔首位。越南戰爭停火後，周恩來準備逐步採取措施糾正這些弊端，從減輕國家負擔考慮減少對外援助。1973年5月他在外事會議上說：國家現在力量有限，我們是力不從心。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今後只能是有重點地適當地進行對外援助。[90] 6月7日，周恩來就1974年援越計劃事給毛澤東等人寫信說：這次越方提了一個81億元人民幣的大計劃，太大了，也不切實際；不僅我們做不到，也不合他們急需。我們從越南實際出發，告以恢復和發展經濟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幾年時間計算。故現在先定一金額為25億元（包括外匯1.3億美元在內）援助計劃，然後再分類計算。[91] 毛澤東批准了修改後的援助越南計劃。

從1974年起，中國開始減少不適當的援外項目。即使這樣，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7年9月，過去對外答應尚待支付的援款仍有174億元人民幣。中共中央不得不決定，今後幾年援外以履行已承擔的義務為主，每年新承擔的不超過10億元人民幣，總金額控制在財政總支出的4%以內。[92]

---

88 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43－247。

8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大事輯要：1949－1985》，頁330。

9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91。

9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98。

92 《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頁307。

第五章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與批林批孔運動

中共十大通過對林彪集團的專案審查，將林彪集團成員開除出黨，似乎劃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然而，毛澤東心中的疑雲並未消散——林彪集團控制軍隊多年，軍隊將領與其還有哪些秘密牽連，似乎還沒有水落石出。林彪事件前後，軍隊高級將領先後發生了三起令人震驚的他殺自殺疑案。在清查林彪專案過程中，又發現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大軍區司令員對林彪有過「效忠」表示，並對江青等「文革」派有不滿。這種情況在林彪事件後仍然因為他們長期通過軍區控制地方而得不到「揭發」。由此，毛澤東派人暗中將林彪專案審查報告包括主持人紀登奎重新審查一遍；1973年底又進行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隨即在原軍區開展了揭發和批判前任的活動，最後導致軍隊將領狼狽地退出「文革」時期政治權力頂峰。另一方面，毛澤東從「文革」開始，就提出要批判孔子及其思想，但一直讓位於更激烈地造走資派的反的運動，無暇進行。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時期，傳達了毛澤東的要批判孔子的指示，卻未得到重視。周恩來表示要消化一段時間，不要寫進十大報告。這也使毛澤東聯想到，對林彪有必要發動一場新的思想批判運動——批林批孔運動。這一武一文的聯繫，把林彪與幾千年前的孔子捆綁起來，表面上毫不相干，背後則有更深的含義——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挽回因批林造成崩潰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信任。

一 一批高級將領被捲入漩渦

1 中共建國以來第一個被刺殺的黨政軍大員——譚甫仁中將之死

譚甫仁，1910年生，廣東省仁化縣人。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紅軍幹事、連政委、團政委、軍委總政治部科長、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一一五師三四三旅政委，八路軍第二縱隊新編第三旅政委，一一五師教導第七旅政委，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副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五兵團軍政委，廣西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委，武漢軍區副政委、第二政委，解放軍工程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從簡歷可以看出，他出身於林彪系的紅四軍、紅一軍團、八路軍一一五師、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紅極一時。1968年5月起被重用任命為昆明軍區政委、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1969年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集雲南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1970年12月17日晨5時許，譚甫仁所住昆明軍區大院三十二號院，突然響起了槍聲。譚和夫人王里岩被刺。譚身中兩彈，一彈擊中腹部，一彈打在頭上，入院即死亡。王眉間中一彈，當場身亡。兇手去向不明。譚甫仁是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被刺殺的第一位黨政軍大員。雖然在他之前的「文革」頭三年，已經有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上將和海軍副司令員陶勇上將的死亡疑團，但閻、陶當時正被作為走資派衝擊，無論是自殺還是他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屬於非正常中的「正常」。

而譚甫仁，則死於受重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任上，又是被刺殺，因此轟動一時，至今死亡原因仍然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秘聞。

昆明軍區副政委、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周興及昆明警備區司令員郭新等趕到現場，即向北京周恩來報告。周指示：「1、要組織搶救；2、案子很可能是內部人幹的，要抓緊時間破案，重點是軍區機關內部；3、成立專案組，由你直接負責，公安部派人協助。」隨即成立「譚甫仁、王里岩被害案偵破小組」，簡稱「017專案組」。周興任組長、昆明軍區副政委蔡順禮、第一副司令員王必成任副組長。此後發生的林彪事件，更給案件披上了神秘色彩。

不脛而走的傳說是：1970年12月，林彪武裝政變力量「聯合艦隊」成立三個月後，譚在昆明接到林彪集團密電，要他擊落某日從緬甸途徑雲南的一架民航飛機。譚不敢妄動，只出動戰鬥機將民航飛機迫降。下來的是周恩來。譚目瞪口呆，把電報交給周。周要走了電報，回到北京正在追查時譚被刺殺滅口。還有一種說法是被台灣特務刺殺，源於台灣報紙後來刊登消息，說「雲南匪首譚甫仁最近被反共主義戰士王自正擊斃」。第三種說法說刺殺者是譚的衛士長，後台是軍區保衛部長，兩人均自殺。

此案一直久久未得出最後結論，偵破時間長達八年半，專案組先後兩次改組，株連和傷害了一批無辜者。起初，專案組多數人認為是一起階級報復案，屬於個人作案，可以結案了。但是也有的領導認為是「集團作案」，要追查「幕後指使人」。軍區保衛部首當其衝，部長景儒林在巨大政治壓力下自縊身亡。1973年初，中共中央點名調曾任西南局公安部副部長的趙蕾璧組成破案指導小組。周恩來指示要對眾多疑點逐一查清，事事有著落，件件有交代，不能含糊不清。最後查清定案的事實是：

兇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內黃縣人，富農出身，時任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部保衛科副科長。「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王自正家鄉的群眾揭發他有當年參與殺害村武委會人員的罪行。1970年4月下旬，揭發信幾經轉折送到了譚甫仁手中，於5月23日簽批了同意對王自正進行隔離審查的報告。

王自正是從保衛部保密員的職位上提升為保衛科副科長的，對軍區首長接觸機會較多，對其住處及周圍情況比較熟悉。當軍區專案組，

突然決定對他進行隔離審查時，自知難逃嚴厲的懲罰，便產生了強烈的報復心理。王自正自殺後在留下的三本筆記本中發現寫道：「不是死刑，也要勞改終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到牽連。我一輩子完了！」「我不能這樣死；我要死，也要殺幾個人。」起初要殺的是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魯瑞林、田維揚等人。後來又寫道：「不如殺譚甫仁，影響更大，發泄心頭之恨。」「但沒有槍，要設法搞到槍。」「拿到槍半勝，見到人全勝。」王自正在筆記中還詳細設計了逃出俘管所的具體辦法。

1970年12月17日凌晨1時，王自正利用空崗間隙翻越俘管所圍牆，跑到軍區保衛部辦公樓，利用當初當過保密員、副科長的便利條件，經過調試密碼，打開保險櫃，盜得兩支「五九」式手槍，然後潛入譚宅，先到二樓臥室槍殺了王里岩，隨後又從臥室追至樓下槍殺了逃跑中的譚甫仁。作案後又迅速潛回了俘管所。

專案組發現兇手是王自正後，卻又在12月31日提審王時，被王摸出手槍開槍拒捕，打傷兩個專案組成員，然後自殺，線索中斷。直至1978年7月專案組撤消，仍然維持了1971年案發當初所做出的定性和結論——譚甫仁夫婦被害屬於階級異己分子王自正的忌恨和階級報復的動機所為。[1]

譚甫仁被刺案，表面上是個人行為，實際上是當時文化大革命社會矛盾極端尖銳化的產物。譚甫仁1968年主政雲南後，積極推行極左路線，開展了各種政治運動，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譚甫仁剛上任不久的1968年8月，就按照林彪、黃永勝指示，在雲南開展了「以人劃線，層層站隊」（簡稱「劃線站隊」）的清查運動。當時雲南群眾組織分裂為「八派」、「炮派」兩大派。軍區和革命委員會支持八派，先後召開七次省革命委員會動員布置，對炮派進行揭發審查和殘酷批判鬥爭、大搞逼供信。同時期製造的其他著名冤假錯案有：1968年開始的趙健民（原雲南省委書記）「國民黨雲南特務組

1 王濱沂：〈譚甫仁被害案偵破始末〉，《人民公安》，2003年12期。

計劃」案，迫害致死14000人，打傷致殘38500餘人。1968年開始的「滇西挺進縱隊」案，僅案發的大理州就有700多人被迫害致死，2000多人被打傷致殘。1968年底開始的「滇東北游擊軍」案，僅曲靖和昭通兩地區就有60萬軍內外幹部和群眾被審查。其中曲靖地區有2萬多人被批鬥，300多人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打傷打殘。

此外，譚甫仁還在雲南民族地區主持進行了「政治邊防」、「二次土改」等運動。1970年3月昆明軍區上報中央的報告就稱一年內批鬥民族上層人士8115人。在劃階級運動中，僅保山等六個地區，就有30620戶幹部群眾劃為地主富農被抄家。1969年，譚甫仁又主持進行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查混進革命隊伍中的「九種人」，全省被立案審查的達1387367人，劃為「九種人」的達257828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統計，雲南省十年製造冤假錯案15175件，打死逼死17268人（包括中央和省委幹部88人），加上兩派武鬥死亡5000多人，共計全省非正常死亡22000多人，被打傷致殘61776人。[2] 大部分產生於譚甫仁執政時期。

在這樣殘酷的政治環境下，連被視為最可靠的軍區保衛部也不能倖免，人人自危，於是出了保衛幹部鋌而走險刺殺首長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2 捲入中央內部鬥爭而自殺的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少將之死

如果說譚甫仁之死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激化的程度，那麼王良恩之死則反映了當時中央內部鬥爭的尖銳程度。

王良恩，1918年生，山東省濰縣人，1938年參加抗日游擊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山東縱隊連指導員、營教導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團、師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浙江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軍政治部主任，

2　當代雲南編輯部：《當代雲南簡史》，未刊稿，2003。

華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

「文革」發動後，中央一批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紛紛被打倒，急需補充幹部，便從軍隊抽調了一批將領任職。王良恩由許世友推薦給周恩來，1966年8月被中央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部主任，1969年11月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表面上看，王由一個少將被任命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平級調動，但來到能夠直接接觸中央最高領導人、處理中央絕密文件、安排中央領導人生活的「大內副總管」位置，可以說是一步登天，也可以說捲進了通往地獄的漩渦。作為許世友的下級，他感情上是站在軍隊幹部一邊的。比如，九大選舉中央委員時，江青讓康生清查誰投了江青的反對票，想整一些軍隊將領，任九大主席團副秘書長的王良恩以黨紀為理由拒絕了。

1973年1月26日上午，中央辦公廳接到王家屬電話，說王良恩在宿舍衛生間內上吊自殺。中辦人員到場搶救無效。經公安部法醫鑑定為自縊身亡。王留下的遺書說：

東興、耀祠同志並報

毛主席、黨中央：

我負責地向黨申明，九屆二中全會我是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對黨和人民有罪。但屬於受騙上當範圍，絕沒有和他們死黨有串通。

王良恩

一月二十六日

王良恩之死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參照王自己的檢討，歸納起來有幾個主要方面：

（1）在1970年8月廬山會議期間，表態支持設國家主席，又急忙批發刊載有陳伯達、汪東興發言的「6號簡報」，而未給當事人看，在全會引起軒然大波。事後又極力掩飾。

(2) 將廬山會議期間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幾個大軍區司令員當時給毛澤東、林彪的信（要求免除張春橋職務下放），轉到林彪處，致使被扣押，未給江青等人看。

(3) 將1967年江青催促發表《人民日報》「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信件轉周恩來後保存。

(4) 通過葉群安排自己的兩個孩子當兵。

關於「6號簡報」

1970年8月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講話後，各組進行討論。華北組的陳伯達、汪東興發言不點名地把攻擊矛頭對準了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的張春橋。8月25日，華北組組長李雪峰、副組長解學恭、吳德簽發了有陳、汪發言的該組2號簡報，即全會的6號簡報。由於陳伯達中央常委的地位，更由於汪東興在毛澤東身邊的身份，很多人以為這是代表毛澤東的意圖，各組紛紛發言激烈地批判張春橋，引起了全會要求揪出「反革命」的軒然大波。毛澤東寫出〈我的一點意見〉，稱「6號簡報」是「反革命的簡報」，局勢被扭轉，陳伯達遭到批判。汪東興也做了深刻檢查，但被毛澤東保護下來。

中央辦公廳印發簡報是職能所在，只要有組長、副組長簽署，即可辦理，這不構成王的大錯。王良恩雖然也在東北組發言表態支持設國家主席，但在當時的眾多相同輿論中並不突出。因此，他在廬山會議後仍然被委以重任，不僅一度取代了因犯錯誤而被反省的汪東興的中央辦公廳工作，而且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參加林彪專案組工作。

所謂「東窗事發」是在汪東興重新執掌中央辦公廳大權以後。1972年，隨着中央辦公廳批判林彪運動的開展，一些與王有關的事情被人提起。1973年1月3日至8日，連續召開中央辦公廳臨時黨委擴大會議，主持人汪東興提出：王良恩曾經打電話要求「6號簡報」「快印、快發」，「這個電話是誰授意打的」？事後王又「始終採取了捂蓋子的做法」。並且說：「6號簡報」刊登汪的發言，王事前違背應

給發言人看的規定，沒有給汪看，「進行封鎖」。[3]王良恩做了檢查，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是路線覺悟低，組織紀律薄弱。這時候，雖然有人批判王「是給林賊搞情報的」等等，但會議對王仍然稱同志。[4]顯然，王的死因並不在此，而是汪發言中提到的另一件事——處理許世友等人信件。

關於許世友等三位上將寫信一事

在廬山會議上，出了「6號簡報」風波以後，毛澤東告訴許世友：陳伯達是壞人。許世友便準備給毛澤東、林彪寫封表態信，表示一致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的英明決定。後面提出四條建議：一是「犯錯誤的人」必須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討請罪；二是「犯錯誤的人」不能參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層，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三是這些人也不能參加人大常委；四是對錯誤思想要進行批判。秘書把信寫好，許世友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住地聊天，韓先楚看過之後，也寫了一封類似的表態信。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住在韓先楚隔壁，看了韓的信也「照貓畫虎」地寫信向毛澤東、林彪表態。

信中寫「犯錯誤的人」指誰？許世友很清楚，毛澤東講了「陳伯達是壞人」。但是韓先楚和楊得志並不清楚，以為還是指許世友的老對頭張春橋。所幸的是，這幾封信並未能到毛澤東手中，而是到了林彪處被扣壓下來。

林彪事件後，在林彪北戴河住所清理出了近萬件檔案材料，其中就有這幾封信。從信件呈閱簽字看出，是當時經王良恩呈周恩來，並由周恩來轉呈林彪和毛澤東，被林扣押的。有關人員又把這幾封信交給了林彪專案辦公室王良恩。王又將這幾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來，周

---

3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頁310－312。

4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頁310－312。

恩來慎重地審查後，在專案辦公室呈自己的信件上批示：「此件是在傳閱中被葉群扣壓的。退。周恩來。」於是王良恩就將信退回林彪案件辦公室存檔。

1972年初，江青參加了中央對山東有關問題的處理，獲得了一條重要的消息：在廬山會議期間，省領導向中央寫信，建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江青馬上找到了那幾封信。涉及到周恩來、王良恩、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等人。江青批示：這幾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態信！同時向毛澤東匯報說，自己是林彪專案組成員，但情況不告訴我，材料不報給我，還在背後搞黑材料。接着，年底她又給中辦寫信：要求一定要徹查這幾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裏去的！

王良恩有口難辯。為甚麼當初林彪會把信扣壓下來，他確實不清楚。而第二次呈報是周恩來囑咐退存的，也沒有自己責任。這時，另一件事火上加油，給了他最後一擊。

關於私自保存江青關於「揪軍內一小撮」「黑材料」

1973年1月9日，中央專案組全體人員，包括郭玉峰、吳忠、李麓、于桑、吳德等人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辦公廳臨時黨委擴大會議。江青一開口便說：「我要控訴，王良恩迫害我！」講到王良恩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原來，在繼續清查林彪的罪證中，中央專案組又從毛家灣查出了一封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等人起草的「揪軍內一小撮」社論清樣上附的一封信：「林總：江青同志囑速送你批示，以便盡快發表！」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使全國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運動，後來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王、關以「反黨亂軍」的罪名被打倒。

這封信被發現後，送給了負責專案組的王良恩。王良恩即將這些材料轉給周恩來，後存「五一六專案組」。這封信暴露了江青當時策

5　赤男：〈林彪事件後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黨史博覽》，2005年第4期。

劃支持「揪軍內一小撮」的態度，因此她氣急敗壞，對王良恩絕不肯放過。會議結束，江青下結論說：「王良恩是野心家、陰謀家、大反革命、定時炸彈！」當天，江青在中辦〈批林整風簡報〉上又作批示：王良恩危害黨中央毛主席！

參加會議的人開始揭發、批判王良恩的「罪行」，有人很快寫出「揭發王良恩反革命罪行」材料，但多數是工作細節。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康生秘書李鑫發言提出的問題最多。他還寫信給江青，報告康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甚麼陰謀」。這時候，周恩來做出指示：邊檢查邊工作。但這並不能改變王的命運。王幾次檢查，都不能過關。最後一次批判會上，有人又揭發了新材料：「你曾給我們講：江青同志作風霸道，經常干擾中央工作。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你說這話是何居心？你還講：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這是惡毒攻擊中央領導！」這話引出許多人附和，他們紛紛揭發王良恩還「惡毒攻擊」康生、毛遠新等人。[6]

於是，王良恩除了一死，別無選擇。在那個年代，他的死，立即被定性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敵我矛盾。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7年，中央辦公廳臨時黨委仍然做出〈關於反黨分子王良恩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決定〉，將王開除黨籍。[7]1979年11月1日，在胡耀邦主持下，經過覆查，中共中央辦公廳黨委才在一定範圍內為王良恩做出了平反的決定。[8]

王良恩之死，是當時中央內部鬥爭的一個縮影。林彪當時扣壓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的信件，實際上是不想讓此事擴大使自己受更多牽連，也帶有保護幾位將軍的意思。周恩來批示將信件退存，也是這個目的。王的死，使自己成為了犧牲品和替罪羊，客觀上也保護了周恩來。

---

6 赤男：〈林彪事件後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黨史博覽》，2005年第4期。

7 丁凱文編：《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頁864。

8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稱王良恩是林彪的人，後她在《北京青年報》更正並表示歉意。見《北京青年報》，2000年11月9日。

3 先說是他殺後說是自殺的公安部長——李震少將之死

李震，1914年生，河北省槁城縣人。1936年在北平從事學生運動，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派往山西國民革命軍軍官教導團，任連指導員，後任八路軍團政治處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第六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第六縱隊十八旅政委，縱隊政治部主任、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重慶市總工會主席，解放軍軍副政委，志願軍軍政委，兵團政治部主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

李震與譚、王不同，是個知識分子出身幹部，與王良恩相同的是於幾乎同時的1966年夏季調到北京，被謝富治選中，9月3日經中央任命為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在「砸爛公檢法」的浪潮中，他負責公安部全面工作，協助謝做了不少推行極左路線的工作。1967年底任公安部黨領導小組組長，1970年6月任公安部革命委員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由於謝富治1970年起即患癌症休養，所以李實際上就是部長。[9]

林彪事件發生後，1972年在公安部「批林整風」運動中，副部長于桑、劉復之針對「砸爛公檢法」、下放「五七幹校」、社會治安破案率低、製造「偽黨」[10]假案等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問題，向李震提出不少指摘。李震做了檢查。周恩來也批評了李震肅清極左思潮不力並繼續排斥老幹部的傾向。但是紀登奎又代表中央批評了于、劉，認為公安部發生了「算舊賬」的苗頭。一部分人又開始反擊于、劉。公安部分裂為「算舊賬」和反「算舊賬」兩派力量，長時期成為矛盾鬥爭的焦點。李震身陷其中，無法平衡，十分苦惱，多次想回部隊。

周恩來催促公安部盡快統一思想，向國務院寫出報告。但部領導在如何對待「算舊帳」問題上有很大分歧。李震要在報告中寫「算舊

9　李為正部級，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於部長。但「文革」後的著述，有的按照謝富治仍然是名義部長，也稱李震是副部長。

10　1968年，由軍隊調來任公安部副部長的趙登程逼供科學院周慈放，製造出「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株連朱德等中共高級領導人。

賬」有損於文化大革命，有損於毛主席。于桑不同意。1973年10月20日晚上，公安部核心小組討論起草多日不能完成的這一報告，部領導之間卻又發生了激烈爭吵，甚至拍了桌子。李震心情沉重地離開會議。據說，李震當晚還去找過謝富治的夫人劉湘屏。這時中央正追查陳伯達揭發林彪的一份交代材料，直接牽涉到李震，他鑑於王良恩之死，感到自己也很難過關。

10月22日早，部機關發現李震昨夜一直沒有回家，出動眾人尋找。最後在公安部大院東南角的地下熱力管道裏發現李震的屍體，半跪半躺，脖子上用繩子吊在管道上。當晚，周恩來指示：「李震絕大可能是被害」[11]，指定組成華國鋒為組長，中組部部長郭玉峰、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為成員的破案組。先後逮捕了李的秘書，及認為李是自殺的「復舊派」副部長于桑和劉復之。消息傳出，北京氣氛十分緊張。各種傳說中，有說李震是林彪死黨，曾與林彪黨羽劉豐串聯；甚至有傳說是蘇聯特務的暗殺。

10月26日，中央召開公安部核心領導參加的會議，幾乎全體政治局委員出席。周恩來分析認為：李震「沒有自殺因素」，公安部長被害，中共建國以來是沒有的，比譚甫仁案子還嚴重。李震死在十大後、四屆人大前，你們要想得深一點、遠一點。還說李震死後，于、劉表現不好。江青說：于、劉跳到前台來了，向黨進攻。會後，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報告，認為「他殺」的可能性大。[12]

此後，儘管李的秘書在關押審訊中提出了十一條李震可能自殺的理由，但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中央領導人的主觀判斷壓力之下，都不予置信，反而對他進行批駁。公安部仍然一直將他殺作為李震之死的攻破方向。周恩來指示：破案組要發動群眾，至少要動員千人以上來揭發。公安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發展到對抗、殺人奪權的地步。11月，中央決定調參加中央讀書班的候補中央委員

---

11 陳楓主編：《血與火的歷練——施義之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59－67。

12 周恩來關於李震之死給毛澤東的報告，1973年10月27日。

楊貴（組織修建紅旗渠的河南林縣縣委書記）、中央委員祝家耀（上海市造反派頭目、5703廠工人）等來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加強破案工作。破案組在向中央匯報的簡報中，提出是「復辟奪權」、「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推論。有一百多人被立案追查。

由於實在沒有支持他殺的證據，破案工作無法進行下去。12月，華國鋒傳達了毛澤東在聽了周恩來匯報後的質問意見：為甚麼要殺人呢？要調查研究。毛還舉了明代三大疑案為例子。這時，破案指導思想才向自殺轉變。[13]

楊貴帶着專家到現場觀察和分析案情，判斷係服用大量安眠藥後上吊身亡，向華國鋒作了匯報。但祝家耀堅決不同意，提出了一個個所謂疑點：李震是在被殺後，有人揹進地道裏的。李震口袋內的安眠藥是死後有人故意裝進去的。李震辦公室窗簾上的尼龍繩被剪斷一截，但上吊的繩子和窗簾繩的顏色不一樣，是有人做了手腳。李震房間玻璃門上有個小洞，正好對着于桑衛生間的窗戶，是有人槍殺不成才把他勒死的。

楊貴帶領破案組一個疑點一個疑點突破：地下管道口小，一個人進去都費勁，根本無法將死人揹進去。經醫科院和血型研究所取樣鑑定，李震上衣口袋裏的安眠藥上沾有他的唾液，是死者從口中吐出一部分裝進口袋裏的。化驗結果顯示：上吊用的繩子就是從窗簾繩子上剪下來的。顏色不一樣是因為窗簾繩子下半段經常拉動而染的污垢。楊貴和技偵專家又察看了李震房間玻璃門上的小洞，周圍沒有放射狀裂紋。為了驗證圓孔的成因，破案組做了一扇同樣的玻璃門，楊貴親自持槍，按照于桑房間與李震房間等距離進行射擊，一槍打去，玻璃被打得粉碎……經過反覆論證，自殺的結論無可置疑。但祝家耀等人硬說李震雖不是于桑、劉復之謀害的，也是被他們逼死的！[14]

1974年1月初，破案組宣布，李震是自殺。還宣布，于桑與李震之死無關，解除關押審查。但于桑的錯誤是嚴重的，回部要接受群眾

13　《血與火的歷練——施義之紀念文集》，頁59－67。

14　郝建生：〈總理提名楊貴調公安部，使死因大白天下〉，《中國老年報》，2005年5月31日。

批判。李震一案遂告結束。而劉復之一直到1974年底才解除關押審查，但不恢復工作。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的第十七次全國公安會議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向出席會議的負責人通報了李震畏罪自殺的有關情況。1992年由公安部部長王芳主編的《當代中國的公安工作》稱：「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李震因追隨謝富治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陰謀活動，在林彪問題敗露後，有幾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公安部的黨羽卻蓄意羅織罪名，製造偽證，誣陷副部長于桑、劉復之謀害李震，致使于桑、劉復之無辜遭到關押審查。他們並以『偵察破案』為名，在公安部機關大搞逼供信和白色恐怖，打擊迫害了一批老幹部和工作人員。」[15]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的說法是：「據事後查證，李震確有自殺取死之因。他1970年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與林彪黨羽劉豐曾秘密串聯，進行反黨活動。劉豐被捕審查後，他又篡改了劉豐的供詞，掩蓋自己的罪行。在這之前，他還參與陳伯達、吳法憲製造『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冤案，誣陷許多中央領導人和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幹部。1973年9月，他去山東省查破一個與該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對冤案製造者處理很嚴，因而畏罪思想壓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陳伯達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為這份材料被壓在自己的手裏感到很害怕。由於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殺不足為奇。」[16]

李震之死，反映的實際是公安部堅持與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兩派鬥爭的爆發，也是當時中央鬥爭的一個縮影。李震雖然追隨謝富治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但在當時環境下，他個人並無法完全負責。作為一個被批評為「政治上軟」的知識分子幹部，在不能解脫巨大政治壓力情況下走上了絕路。周恩來主張是「他殺」，除了分析有誤

15 王芳主編：《當代中國的公安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506。

16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頁343、344。

外，也應考慮到1973年底他的處境——在「幫周」會議上正連續遭到批判。如何對待公安部「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他只能向「左」傾。

4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和繼續清查與林彪有關聯的軍隊將領

王良恩死後，一批將領給林彪寫信並攻擊「犯錯誤的人」一事不但沒有平息，反而更加擴大。清查中，又發現在中共十大上剛剛當上中央副主席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也曾經對林彪有過與許世友類似的所謂「效忠」言論。毛澤東開始懷疑，究竟這些將領還有多少與林彪之間的瓜葛沒有被查出來？他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除這些將領對當地軍隊的絕對控制權，才能發動當地揭發真相。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他就採用過先派葉劍英控制北京地區軍隊、然後再對彭真發難的辦法。

1973年12月實施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是毛澤東的第一着棋。在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一個人在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17] 他要大家一起唱國際歌，一切行動聽指揮。

在任命鄧小平為政治局和軍委委員的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命令〉說，「為了加強軍隊建設和反侵略戰爭的準備，使軍區主要領導幹部交流經驗，熟悉更多地區的情況，經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北京與瀋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個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任命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為瀋陽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為南京軍區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672。

司令員曾思玉為濟南軍區司令員；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為福州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為蘭州軍區司令員。新疆、成都、昆明軍區司令員剛上任不久，沒有調動。

對於這次對調，很多著作沒有道出真正的意義。

其一，是解決軍隊地方權力過大的問題。從「文革」之初軍隊介入地方「文革」進行「三支兩軍」，就實際上全部控制了地方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成立革命委員會和地方黨委時，幾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和黨委書記，都由大軍區司令員、省軍區司令員兼任。地方權力高度集中在軍隊集團中，出現了清代總督（幾省最高軍事長官，相當於大軍區司令員）、巡撫（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相當於省市區黨委書記）同城，而巡撫只是擺設的現象。有鑑於林彪事件教訓，毛澤東想用和平的手段改變這種狀況。通過對調，各大軍區司令員到新的省會城市，都不再兼任該省的省委第一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改由地方幹部擔任。這個辦法確實是一招妙棋。與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做法相比，可稱為「一歌釋政權」。

其二，是化解因「文革」而產生的地方內部矛盾。「文革」前期，軍隊支左捲入並造成了嚴重的派性，引起了革命委員會中的繼續分裂和內鬥，軍隊幹部利用政治運動壓制打擊了各地造反派。毛澤東指出：「有些同志專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墳呢！動不動就說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從一個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貼大字報。」通過調動第一把手，而且司令員調任不帶任何親信幹部，只帶十人以內的警衛等工作人員，將原來地方幹部、軍隊幹部、造反派之間的歷史矛盾及形成的盤根錯節複雜關係網在一定程度上解脫開來。毛澤東還要求各地要歡迎：「各省都要做工作，分兩派的地方要打一點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員，要歡迎呢。」[18]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為了繼續清查各大軍區與林彪的關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後，北京、南京、福州、廣州、濟南等軍

18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72－1675。

區分別召開多次黨委擴大會議，揭發同林彪集團有關的人和事，原來的司令員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成為主要對象。

還是在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會上，毛澤東幾次觸目驚心地說到：

> 我還可以打幾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
>
> 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
>
> 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
>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19]

這時剛剛開完「幫周」會議，所以毛澤東說誰「希望自己做皇帝」、「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也不僅僅是氣話。「內戰外戰一起來」的火藥味中，還隱含着對將軍們的不放心——擔心有人擁兵自重，尤其是在他死後。

1974年5月，由王洪文主持，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具體負責，在釣魚台成立了兩個小組，從大軍區會議簡報、大字報彙編、各種揭發材料、林彪死黨筆記本和交代材料、九屆二中全會記錄及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等，分頭整理選編材料，主要內容是林彪集團從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到「九一三」事件這一段時間裏，到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及蘇州活動的情況。材料涉及到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劉興元、丁盛、任思忠、杜平等。7月，王洪文把這些材料報送給毛澤東，並分發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認為這些人問題嚴重，並要人向毛澤東報告。

這些材料的內容，除了前述的被王良恩「扣押」的三位上將給毛澤東、林彪寫的信之外，還有不少是對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派發泄的不滿。

19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7、8。

例如：在清理吳法憲專案材料中，發現一些許世友當年說過的言論：「甚麼張春橋不張春橋，他不要動我一兵一卒。秀才要把軍隊搞垮。」「你們當代理論家狗屁……」「中央軍委要我管華東，我就要抓起來，不幹甚麼張春橋。」1973年9月中共十大結束後不久，許世友請客吃飯，席間說：「十大後，要鞏固大好形勢。不要太天真，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路線鬥爭也是長期的，還會發生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今後的野心家紅旗舉得更高，隱藏得更深。反正我們聽毛主席的，其他的都要考慮。」話音剛落，許的女兒立即小聲對來賓說：「洪文當副主席你們有甚麼看法？」來賓說：「我們學習時，大家都預計張春橋同志可能當副主席。」許女兒說：「這樣不是更能蒙蔽人嗎？」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之後，許世友在傳達毛澤東講話中關於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時解釋說：「這個話是有所指的……。前面走了虎，後面來了狼，虎也吃人，狼也吃人，咱們騎毛驢看唱本，走着瞧。」他還極端蔑視地把上海的張、姚說成「戴眼鏡，夾皮包，會總結，會提高。沒有東西，再提高也沒用」。「不要上海放屁也是香的。」

再如：在林彪、葉群專案材料中查出，韓先楚1967年5月曾經給林彪打電話，對「文革」的混亂和中央文革小組專橫跋扈不滿，說：「統帥、副統帥說了不算，究竟誰說了算呢？」「中央文革成員亂批文件，也應該檢查，我們到底執行不執行正副統帥的指示？」「我們要貫徹中央、國務院指示，他們反而說我們有罪。」在九大會上，韓先楚說：「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也要把簡歷發給大家，讓大家審查。」暗指張春橋有歷史問題。還交代說：「找幾個人說一說」，「張春橋也不能讓他得全票，讓他知道有人反對他，不投他的票。」「上海就有人反對張春橋，替陳毅講話的。」全會後，韓還說：「選舉中央政治局，我把張春橋的名字劃掉了。」

這些材料中的言論，反映了「文革」以來軍隊對江青一夥的不滿，但是因為和林彪牽扯在一起，此時成為清查罪證。

8月，毛澤東對王洪文指示，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各地大字報揭發的都是老賬。這些人有錯誤，揭一揭也好。分別找他們個別談談就行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要把各大

軍區司令員、政委召集到北京來開會，解決問題。他說：我看找他們來，不要一個一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都來，一道談一下。每個同志發言時不要插話，發言後都要鼓掌歡迎。他回顧南巡的作用說：你說在廣州做準備，為甚麼後來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為我打了招呼，他們聽了我的話，開了四千人的幹部大會把我的話透出去了。毛澤東重申了劃分林彪死黨的一條重要的時間界限：還是我周遊歷國的時候說了的，以那時候為界。也就是說，在毛澤東南巡打招呼以後，還跟着林彪跑的，才是死黨。他說，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嘛。要給人家機會。對有的同志要看幾年。[20]

然而，王洪文並沒有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這些指示。會議開得十分緊張。將政治局成員和各軍區負責人編成幾個組，每個組批判一個人。

起初，許世友認為自己心裏沒鬼，事情很簡單，弄清楚就準備回南京。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代表又找他和秘書談話，對調查情況並不滿意。許世友犯了心絞痛，血壓陡升，還發高燒。周恩來知道後，因為調查的問題也涉及到他，不好插手。就指示301醫院院長劉軒亭動員許世友住院。許世友在醫院對秘書繼續回憶：「我跟林彪的事沒甚麼說不清楚的。我看過林禿子幾次，和他照過一次相，要警衛員打野雞、野兔送過他。」他氣呼呼地說：「我不怕！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有毛主席健在，軍區、省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都在，容易搞清楚。」「你們不用怕，你們寫的信沒有關係，有問題我一人承擔，要檢討我也只向毛主席檢討！」

與此同時，中央代表同韓先楚、楊得志等人的談話仍在繼續：「你們有責任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據了解，為寫信碰過頭的大軍區領導還有好幾個，中央對此事清楚，主要看你們的態度！」韓先楚與許世友不同，韓從延安隨林彪到平型關、東北，一直到海南島，都是林彪的部下。名義上查廬山會議上的表態信，實際上是要逼他交代與林

20　匡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頁15、16。

彪的「黑關係」。他說：「我與林彪有甚麼黑關係？從打仗到部隊建設，哪一條不是工作關係。我同林彪照過一張相，林彪和多少人照過相？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我，是毛主席保的我！」[21] 當然，他也不得不檢討，他寫信的第一條是擁護林彪講話，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信中說「犯錯誤的人」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鱔魚眼」張春橋。楊得志更是有口難言。他從紅軍之初就在林彪麾下的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

李德生的問題最為複雜。他除了參加小組接受批判外，還要接受政治局委員全體會議的批判。本來，李德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直比較順風。他帶領十二軍到安徽支左，穩定了局勢。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認識他就稱讚說：「安徽的事情辦得不錯啊！」1969年，李德生以一個少將軍長進入中央政治局，任候補委員。毛澤東是把他作為中央軍委負責人來培養的。1970年廬山會議上，當林彪集團敗露後，李德生受命匆匆下山去控制中央軍委，周恩來在機場向他交了林彪出事的底。此後李作為毛澤東掺的沙子進入林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任改組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掌管京畿軍事大權，毛澤東南巡迴到北京豐台首先通過他部署北京防衛。還是在南巡中，毛澤東幾次談到接班人時就說：「要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我說我們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60歲以下、30歲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紀登奎同志等。」「要培養年輕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那樣的，光是老將不行。」[22] 他始終把李放在第一位，那時對王洪文則還在了解。「九一三」事件之際，李和紀登奎成為毛澤東、周恩來處理非常局勢的左右手，他坐鎮空軍，直接處理林彪座機外逃的突變。在清查林彪集團中，李繼續受到重用，進入林陳中央專案組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先後負責林彪事件重災區空軍、新疆軍區等地的清查林彪餘黨工作，為穩定局勢立下了汗馬功勞。

---

21 亦男：〈林彪事件後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黨史博覽》，2005年第4期。

22 毛澤東同劉豐、劉建勳、王新等談話記錄，1971年8月16日；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談話記錄，1971年9月10日。

所以，李德生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一躍成為中央副主席，既偶然也不偶然。

但是，李是被周恩來提升上來的，受到周的重用，也不可避免地親近周，在處理許多事務上觸犯了江青集團。尤其是他升任中央副主席之後，矛盾開始激化。在1973年底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中，李被調往瀋陽軍區，在中共執政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中央副主席被任命為地方職務的。毛澤東又用一句話讓他的總政治部主任「不要兼了吧」。這是個不祥的預兆，使他這個中央副主席實際上失去了在北京參與中央工作的權利。

在一次座談會上，江青說李德生是個「大惡霸」。1974年第4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和周恩來審閱的重頭文章〈孔丘其人〉，作者「梁效」把孔子說成「兇狠殘暴的大惡霸」。遲群的秘書說：「寫得真妙，孔丘參加政變那段，正好合上李德生。」該文主筆也承認：「影射李德生，這是實情。」[23] 在8月的揭發批判軍隊將領會議上，王洪文多次說，毛主席說「幾位軍區司令員或多或少有點問題」，指的就是李德生。會上，李被王洪文、毛遠新提出十幾個問題，「逐個追查、進行批判。每追問一個問題，毛遠新都竭盡無限上綱之能事」。這十幾個問題主要有：參與林彪的第一個號令，銷毀黃、吳、李、邱黑材料，林彪「519」接見後李的表態，紀念軍委擴大會議10周年，廬山會議安徽組簡報，《解放軍報》準備刊登林照片，1971年幹部工作會議，總政匯報林立果講用報告，「北兵南調」，空軍看管周宇馳直升飛機，「九一三」事件後「捂蓋子」，「插手」總政治部。[24] 江青集團抓住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見總政高級幹部後，李德生作了吹捧林的講話一事，攻擊李德生是「推行林彪路線」、「上了林彪賊船」，要他反覆交代與林的關係。李被迫做了檢討，承認了

23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頁50－51，55。

24　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黨中央副主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393－400。

自己的「罪行」。江青於是公然到處點名宣稱李是「大軍閥」，毛遠新將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批李內容在瀋陽軍區擴散到軍一級。李的兒子被從部隊秘密押解到北京關押，李的夫人也在總政被批鬥。其他將軍也一樣，在軍區無人敢理，門可羅雀。

1974年3月，在海軍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大將被認為在批林整風中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批判。海軍機關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矛頭指向一批「搞復辟倒退」的領導幹部。蕭勁光還因為1967、1968年給林彪寫過信，在中共九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又沒有投張春橋、姚文元的票，而被指摘為受李作鵬指使，上了林的賊船。儘管蕭一再說明自己也沒有投葉群、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的票，而且投了江青的票，還是不能過關。江青說：「你就是沒有投我的票，你以為沒有人知道，我們把票查出來了。」蕭被批判達半年，直到毛澤東表態：蕭勁光還要當海軍司令，海軍司令不要易人。蕭才在承認「上了林的賊船」之後得到解脫。[25]

看到將領們無法收場，1974年9月4日，鄧小平利用陪同多哥共和國總統埃亞德馬在武漢會見毛澤東的機會，向毛匯報了軍隊高級幹部會議的情況。毛澤東說，都是一些老問題了，在會上講也可以，寫出來印發也可以，不寫也可以。不要那麼挖苦，不要強迫人家作檢討，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傳達範圍也不要太大，檢討不要發下去。9月8日，他在李德生的檢討上批示：「已閱，改了就好。」於是，在軍隊將領們紛紛檢討認錯以後，9月10日，會議宣告結束。這樣一來，李連徒有虛名的中央副主席也無法保留了。他向中央提出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職務。中央派人與他談話，只同意他辭去常委和副主席。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拖到1975年1月4日，毛澤東終於批示，還是那句老話：「同意你的意見。至於錯誤，改了就好。」[26]於是，李成為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任職最短——

25 〈蕭勁光回憶錄〉，轉引自昌隆：《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頁114、115。

26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479。

僅僅一年零四個月——的中央副主席，昙花一現後在瀋陽任地方官。這在當時中央領導人只有被打倒才能下台的規律中也是個異數。

毛澤東並不認為這些將領們有「與林彪勾結」的多麼大問題，他不能容忍的是這些將領一直對文化大革命不滿，與「文革」派對抗。所以他表示「揭一揭也好」，可以打擊一下這些將領在地方的威風，從而削弱林彪事件以前軍隊在地方的過大權力。將軍們後來也悟出了這個道理。韓先楚在看到1974年9號中央文件指摘韓先楚在批林批孔中捂蓋子、鎮壓群眾時，一下就明白了：「不調開你，那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蓋子能揭開砸爛嗎？」他不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心思，但他敢說肯定有人就是這麼謀劃算計的。[27]

江青集團本想利用這一機會打倒一批將領，換上他們自己的人控制軍權。王洪文在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就在中央讀書班上講話說：「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地方上的阻力還小些，軍隊阻力大些，我就主張找一個三十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28]但是毛澤東對高級將領的寬容，使他們不僅這一目的沒有達到，反而與軍隊結下了不共戴天的深怨，掘下了自己的墳墓。這也從反面為在以後的粉碎「四人幫」中，軍隊採取同仇敵愾的態度奠定了基礎。

二　貌似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運動

1 毛澤東為甚麼把批判林彪與孔子聯繫起來

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受的是封建教育，讀四書五經，比較相信孔子。在長沙求學時，雖然明確了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方向，

27　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

28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但仍很推崇孔子及儒家，推崇國學——這與當時猛烈的批孔運動形成了鮮明對比。1920年以後，毛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對孔子一分為二，認為孔子是代表封建階級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是為維護現存制度服務的，還有輕視勞動的缺點。他高度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堅決反對「尊孔讀經」的復古主義，但並沒有全盤否定孔子及儒家思想，仍主張孔子是中國封建時代的聖人，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到延安成為中共領導人以後，他對待孔子仍然是公平的。

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強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29]以後，針對劉少奇關於孔孟之道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的觀點，毛澤東又反對說：「剝削階級當它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30]毛澤東還曾說過，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即唯心論），從認識的全體來說，是不正確的。「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擁護。」[31]

1960年7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馮友蘭的〈論孔子〉。在1962年孔子學術討論會上，關鋒的〈關於孔子討論中的階級分析的幾個問題〉對馮文進行了點名批判，認為是背離階級鬥爭觀點的。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1964年毛澤東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孔夫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甚麼人？所有的人？沒有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愛剝削者的一部分。」這是一個轉折點，與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重視幾乎同步。

---

2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534。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84。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60、161。

到了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內心始終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厭惡孔子情結迸發出來。1966年12月，毛澤東同波蘭共產黨左派談話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務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響。」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剛剛通過將劉少奇開除出黨的決議不久，毛澤東又談起了孔子，觀點與當年他反駁劉少奇的恰好相反：

> 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我跟郭老在這一點上不那麼對。你那個「十批判」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贊成。

毛澤東還對學術界的反孔、尊孔兩派以此標準進行了一番評點說：廣東的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看過他的書；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都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我就對這兩位的書都注意看。此外北大還有一個教授叫任繼愈，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沫若）老，范（文瀾）老基本上也是有點崇孔，因為你那個書（指《中國通史》——引者註。）上有孔夫子的像。馮友蘭也是擁護孔夫子的。

毛澤東還談到了儒家和法家。肯定了范文瀾的書上包括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子，對法家給予了地位。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激烈的全面內戰時期，所以毛澤東的評價沒有超越學術範圍，表示不要求大家回去研究這些古董，而要搞好當前的鬥批改。

第二年，有高度政治嗅覺的張春橋，已經組織《紅旗》雜誌上海組在撰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動〉文章。1969年10月19日，他對寫作者說：「孔夫子要批，不能開一兩槍就算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一種代表，同他的交鋒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書遲早是要批的。范老的《中國通史》也是尊孔的。你們可以按順序寫下去，在碰到他們的時

候，也不必迴避。」這篇文章寫了十七稿，張認為「現實性不強」，擱置起來。[32]

孔子評價被當作完全政治化的靶子，根據江青的筆記，是在1973年春天。江青在毛澤東住處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書》的大字本。顯然，這是專為毛澤東而排印的。毛澤東給了江青一本，並說：「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他順口唸了一首詩：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33]

稍有詩詞常識的人一望而知，這詩幾乎沒有一句是合律的，只能說是順口溜。問題在於，毛澤東高度評價柳宗元的〈封建論〉的同時，已經把孔子和郭沫若的尊孔態度完全放到共產黨的對立面了。

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5月25日晚上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指示，毛澤東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當然也包括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在內，都要認真看書學習，要懂得歷史，學點哲學，看點小說。他說，郭（沫若）老的《十批判書》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過小，他在中國歷史的分期上，為殷紂王、曹操翻案，為李白作考證，是有貢獻的。對中國的歷史要進行研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要有知識。

---

3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468。

33 關於這順口溜是不是毛澤東的？有不同說法。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一書中引用了該詩，並說明是自己在場親聞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唸的。1月27日，江青在新華總社學習班上講話說毛澤東在1973年春天和8月5日，兩次給她唸了此詩。而張耀祠則說：他當面問毛，毛說：「我沒有寫這樣的詩。不知道是從何而來。郭老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也不至於此。」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頁140。筆者分析，江青在大庭廣眾之下假傳聖旨，偽造毛澤東詩作，似乎不合情理。事實上沒有發現她在「文革」中有這類行為。合理的解釋是，毛澤東並不想讓這首粗俗的作品流傳出去，也覺得對郭有些言重，因此否認有此說。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對張春橋、姚文元講到關於對孔子的評價時說：「郭老（指郭沫若）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重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8月5日，毛澤東與江青談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說《十批判書》以前看過，這次集中看了五遍，下決心批判。他給江青唸了他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的詩。全文是：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34]

唸完後毛澤東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制、郡縣制，明目張膽地，你犯了法就要判罪，在歷史上一般地說是向前進的，他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滿口是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郭老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的態度和林賊一樣。毛澤東還說：楊榮國教授說孔子是為奴隸主服務的，這樣我才看了楊榮國的文章。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賞上海、廣州的學者。現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華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結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與孔孟之道》這個材料，立了大功。對《紅樓夢》，毛澤東說：「到現在還沒有寫出馬列主義的評價文章，這是不對的。」[35]

中共十大閉幕後，毛澤東召見毛遠新，給他〈讀《封建論》——呈郭老〉的詩和柳宗元、章太炎的文章。毛澤東為毛遠新講解了詩，並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61。

35　江青在新華總社學習班上的講話，1974年1月27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說：「人家打着批極左的旗號主張回到劉少奇、反攻倒算呢！要批孔，反對倒退。」還說：「要貫徹十大通過的路線，批判唯生產力論。」[36]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他談到秦始皇說：秦始皇是中國有名的，就是第一個皇帝，一世。最近，林彪還罵我叫「秦始皇」。中國人歷來分兩派，講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講秦始皇壞的是一派。我是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林彪雖然上過黃埔軍校，本質上仍是一介武夫，讀古書不多。據林彪事件後參與清查林彪毛家灣住宅的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回憶，發現林讀過的古籍中，《資治通鑑》最多，其中又專讀有關宮廷政變權術，如對司馬懿政變前麻痺曹爽、隋煬帝登基前騙取父皇信任兩段，密加圈點。[37]其實用態度可見一斑。

那麼，毛澤東為甚麼晚年對孔子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又為甚麼與林彪聯繫起來批判？

前一個問題，可以說既有毛澤東個人性格的原因，也有政治鬥爭的需要。毛澤東是個桀傲不訓的梟雄，從小受孔孟教育，卻喜歡看《水滸》等造反典籍，嚮往佔山為王，替天行道。正像他「文革」之初寫給江青的信中所說：「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他喜歡讀書，但是沒有上過大學，青年時代曾經為此而心中有些自卑。到北大之後，他很想與胡適、傅斯年等名流學者交談，但正像他在延安對斯諾的自述所說：人家都無暇聽一個小小的圖書管理員的高談闊論。參加革命以後，曾經受到陳獨秀、王明、張聞天包括周恩來等吃過洋麵包的高級知識分子出身中央領導人的排擠，但事實最終證明了他的正確。因此，他開始輕視知識分子，最終鄙視知識分子的鼻祖孔子。即使他喜歡結交高級知識分子作朋友，內心也隱含着讓他們聆聽教誨的快意。這種感情和他晚年的階級鬥爭思想結合起來，就把孔子在政治上當作了反動階級和錯誤路線的代表，在實踐上當成了無用的空頭思想家。

---

36 毛遠新交代材料，1982年7月。

37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頁72、73。

後一個問題，直接原因是林彪集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咒罵他是「當代的秦始皇」而引發的條件反射。毛澤東早年對秦始皇並不那麼推崇，在《沁園春．雪》中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執政以後，特別是個人權威達到頂峰以後，地位的變化使他感情上對秦始皇有了理解。1958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我跟民主人士辯論過，你們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他們說得不夠，往往還要我們加以補充。1964年6月，毛澤東又說：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全黨都不理解的無法無天行為，眾叛親離，使晚年毛澤東備感孤寂。尤其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林彪也成了政變殺手。白居易《放言》：「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身真偽復誰知？」是他在林彪事件後反覆誦讀的詩句。因此，他稱頌敢作敢為的秦始皇，貶斥孔子嘴上「溫良恭儉讓」實則「一肚子男盜女娼」，也是自然的傾向。

把批林與批孔聯繫起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毛澤東感到林彪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時期裏，從中央到地方，借助批林，都出現了一股懷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愈來愈洶湧。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着手批判極左思潮、落實各項政策的工作；各地的地方老幹部也紛紛復出，改變了一度被軍人和造反派獨霸權力的狀況，糾正了一些極左錯誤。最初，出於穩定局勢需要，毛澤東對此還不得不予以容忍，自己也做出一定程度的檢查。但是，到了一年多後的1972年底，他已經不能容忍這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趨向，開始反擊。他斷然把林彪說成是極右，粉碎林彪集團的鬥爭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然而，林彪完全是弄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上來的，他的實質為甚麼是極右？林彪的主要手法和行為，都是與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一致的，又如何把批林與文化大革命剝離開來去批極右？毛澤東再次想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祭起的法寶——從《海瑞罷官》等歷史人物和事件入手，發

動群眾製造大批判浪潮；被現實批判的中央領導人，當初是彭真、劉少奇，現在是林彪；提倡的口號，當初是「造反有理」，現在是「反潮流」。於是，孔子就成為如同海瑞一樣的靶子，再度被舉起來了。事實上，毛澤東1973年夏季這些言論和詩作就已經在為發動一場政治運動作準備，而他身邊的一些小人，則乘機製造事端來迎合他。

1973年8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將毛澤東的上述評價儒家法家談話內容寫入中共十大政治報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時間」，不必馬上公布為好。但是，負責輿論宣傳的姚文元，按照江青的指示，已經在報刊上進行了一系列批孔部署。

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文章是毛澤東指示發表的，分兩部分：孔子的政治立場；孔子的思想——「仁」。「文革」前，楊在學術界就是反孔派，此文的觀點並無新奇，重要的是最後一段把批孔與當前政治鬥爭聯繫起來，指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分析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看在當時歷史的發展條件下，他是站在進步階級方面，主張革新呢，還是站在反動階級方面，主張保守。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推動歷史不斷向前發展。我們要肯定的，只是在歷史上起進步作用的東西，對反動的、保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決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動思想，對參加現實的階級鬥爭，特別是對抓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是會有幫助的。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當然不是學術探討，實際上揭開了批林批孔運動的序幕。

8月24日，根據江青的意見，遲群要求國務院科教組用電話通知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吉林、江蘇、山東、湖北、廣東、陝西、甘肅、四川各教育部門轉告高等院校說：根據今年5月毛主席關於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及要學一點歷史等指示精神，在深入批林整風過程中組織力量開展對孔子的批判。

9月4日，《北京日報》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撰寫的題為〈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的文章。文章說：「一切反動派無不利用儒家思想作為鎮壓人民、反對革命的精神武器。」「孔子成了

封建社會的第一號聖人——『至聖先師』，孟子則成了第二號聖人——『亞聖』；『孔孟之道』也就成了封建主義的同義語。」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在文化上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文化和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的封建文化。而「鑽進黨內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大肆宣揚「孔孟之道」。

9月8日至11日，國務院科教組在北京召開教育戰線批判孔子問題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及有關高等學校負責人共九十八人。楊榮國在會上作了〈儒法兩家的鬥爭和孔子反動思想的影響〉的報告。會上還交流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單位開展批孔的經驗。遲群在會上講話要求把批孔作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風的一件大事來抓，不光文科院校、不光是大學要批孔，各類學校都要開展批孔，要把批孔與深入開展教育革命結合起來。他還說，哪些地方不重視批孔，哪些地方就屬於「針插不進，水潑不進」。10月初，周恩來批評了這種說法。針對周恩來的批評，遲群辯解說：「科教組開的那個批孔會是正確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科教組沒有降調，誰降調誰負責」，「反對批孔，就是復辟」。

9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唐曉文」（諧音「黨校文」，即康生控制的「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該文認為：

> 古今中外沒有也不可能有甚麼超階級的、全民的教育。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孔子的教育活動都是為復辟西周奴隸制度的反動政治服務的，孔子本人是個地地道道奴隸主貴族的忠實奴才。所謂「全民教育家」不過是一些人給孔子披上的一張畫皮。

最後指出：

> 劉少奇、林彪之流所以熱衷於把孔子吹捧為「全民教育家」，宣揚「有教無類」的濫調，就是要為其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製造理，

論根據，妄圖抹煞無產階級的教育性質，把我們的學校變成資產階級接班人的場所，以便使地主資產階級繼續壟斷文化教育，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10月24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發出〈關於在部隊中批判孔子的意見〉說：「各級黨委、政治機關要認真學習5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傳達的毛主席關於批孔的重要教導。注意中央報刊發表的文章，充分認識批孔的重要意義。」「當前，要認真學習十大文件，繼續把批林整風放在首位。在深入批林中聯繫批孔。」〈意見〉要求，「批孔的口徑」「批甚麼問題，批到甚麼程度，一定要以中央報刊為標準，不要亂批，不要亂提口號，不要亂點名」。

無論從哪一點看，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都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 「梁效」等御用班子的影射史學

到此為止，林彪與孔子還是風馬牛不相及。如何把批林與批孔聯繫起來？雖然毛澤東說了「尊孔反法」「林彪也是啊！」但還需要證據。於是，1973年秋天，毛澤東對謝靜宜說，聽說林彪家裏有尊孔的條幅，你們去看看。謝帶了清華大學幾人找到一些林的零星言論。毛澤東看後說，你們應該找北大文科教師一起查找、整理，光靠清華的教師不夠。10月，謝靜宜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調集了一批專家學者，組成「批林批孔材料小組」，前往林彪住地北京西皇城根北街的毛家灣，[38]尋找林彪尊孔的罪證。小組的一位成員回憶說：

大致參觀之後，我們開始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首先抄錄了一些掛在牆上的條幅，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等，然後與其他同志一起抄下了菜群房內張貼的「四書集句」。十月中旬，我

38 現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在地。

們第二次去林宅查找，發現了大瓷缸裏林彪書寫的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

我們認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無遺。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克己復禮」，要害就在於「復禮」。根據楊榮國的說法，孔子的「復禮」就是恢復周禮，也就是復辟。因此，這句話變成為我們日後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的中心。[39]

在毛家灣，還查到了林彪和葉群在筆記本上抄錄、書上批註的一些孔孟警句。根據這些支離破碎的東西，小組編輯成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八個部分：

一、 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二、 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論，陰謀篡黨奪權。

三、 宣揚「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惡毒污衊勞動人民。

四、 宣揚「德」、「仁義」、「忠恕」，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五、 販賣「中庸之道」，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

六、 用孔孟反動的處事哲學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

七、 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攻擊「五七道路」。

八、 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1974年1月，《林彪與孔孟之道》編出後，謝靜宜對江青說，我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與孔孟之道》。江青立即要了一份，1月12日與王洪文一起寫信呈交毛澤東。信中說：「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覺得它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請求把這份材料轉發全國。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由此，批林批孔進入全國範圍。其實，在江青之前，毛澤東已經預有安排。據謝靜宜「文革」後回憶說，毛看到找到的林彪材料，「很高興並要我們把林彪的言論與孔孟言論兩相對照編出一份材料。《林彪

39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頁11－13。

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編好之後送給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細審閱並指示我通過北京市委組織系統報到中央」。[40]

1974年1月24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幹部會議；1月25日又召開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機關大會。這兩次萬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是江青組織的，都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

周恩來在1月25日會前才得知趕到，並主持了大會。他作自我批評說：關於批林批孔，中央發了通知，「但是發得晚了一些，開始時耽擱了一下。我有責任。這是一件大事，本來還可以更早一點」。[41]他還親自宣讀了江青、王洪文1月12日給毛澤東的信，及江青送材料的六封信，即：（1）1月13日給二十軍防化連的信，（2）1月13日給空軍馬寧的信，（3）1月13日給國務院文化組吳德的信，（4）1月24日給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的信，（5）1月22日給海軍蘇振華的信，（6）1月22日給外交部的信。江青在給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的信中說：

> 相當長時間了，從許多材料看來，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整風運動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體系與孔老二的關係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搞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是可以幫助全體同志們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特請謝靜宜和遲群二同志向全軍指戰員宣讀中央的通知。他們已下過連隊取得經驗，可能對全軍有所幫助。批林批孔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這是使國內外帝修反驚恐的事。全國黨、政、軍、民、學，通過這個學習，可以取得更大的團結和勝利。現送上《林彪與孔孟之道》《名詞解釋》各二百份和《五四運動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二十本，《魯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論摘錄》和《反動階級的「聖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們參考。[42]

---

40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頁40。

41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2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江青、遲群、謝靜宜在會上做了輪番講話。謝靜宜介紹了毛澤東、江青指示他們收集、編輯林彪尊孔「罪證」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這樣的，就是當我們向毛主席匯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問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論或者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就是讓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遲群同志就召集幾個同志議了一下，整理了一個初稿，這個稿子只有兩三頁，送給了主席，也送給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後，立即找我們去了，就是說，給我們提了意見了，感到東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我們要到毛家灣去，找資料，所以這樣一來，東西就多了，……材料這樣就豐富了。後來，就編了一本，送給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細，連封皮標題，就是封面哪個標題，前言、內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別是在內容方面。

遲群特別講到當前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他舉了幾個事例：

我們有的人就在那裏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幹校執行主席的這樣一個指示，他說要還給我青春。這樣的人不該聯繫嗎？

教育戰線上出現的那些復辟的現象，譬如說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們出去，同時叫我們順路完成一個任務，就是河南的南陽地區唐河鎮馬振扶公社一個中學所發生的事情，逼死了一個小女孩，十五歲，完全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逼死的，每天幾乎是一次考試，考得那個學生簡直是昏頭脹腦。

還有那個走後門問題，批林批孔不要聯繫嗎？那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對毛主席思想的背叛。至於走後門問題，不只是這一個問題了，現在還有的單位，問題比較嚴重。譬如說，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檢查。

現在有些單位，有一種不正之風，風氣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風是甚麼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夠。

謝靜宜還指摘10月24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發出的〈關於在部隊中批判孔子的意見〉「實際上他沒有按十大精神辦」，因為文件規定批孔「批甚麼問題，批到甚麼程度，一定要以中央報刊為標準，不要亂批，不要亂提口號，不要亂點名」。江青馬上插話說：「屁話！就是主席講的屁話！」

謝靜宜總結說：

不鬥則修。就要敢於同階級敵人鬥，敢於同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鬥爭，要敢於同一切不正之風作鬥爭，譬如說走後門、特殊化的歪風邪氣作鬥爭。這個走後門等不正之風啊，是資產階級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階級的特權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後門實際上就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江青在會上唸了毛澤東去年的兩首批孔詩和1958年關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一段話，解釋時提到在場的郭沫若說：「郭老的功勳是很大的，這點應該同志們知道。他這個《十批判》是不對的，聽說，郭老今天來了。」[43] 大會結束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參加整理《林彪與孔孟之道》「梁效」寫作班子人員。

這個「梁效」班子，是毛澤東通過遲群、謝靜宜直接掌握，而又被江青插手控制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大批判組。他們撰寫的文章，在當時左右着輿論界的風向標，以致社會上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流傳說法。

「梁效」成立於1973年10月，其前身是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材料小組。「梁效」的筆名是1974年初姚文元提出要用筆名的意見，由范達人建議用「兩校」諧音，經遲

43 某些著作說郭被叫起來罰站，不確。應該是郭自己誠惶誠恐自動站了起來。

群等同意採用的。此外還有柏青、高路、景華、安杰、秦懷文、施鈞、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幾個筆名。「梁效」的主要領導者是遲群、謝靜宜。其下三個負責人：原8341部隊文書科副科長、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李家寬任黨支部書記，北京大學教師、校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宋柏年任黨支部副書記，清華大學哲學教師王世敏也是副書記。「梁效」起初分兩個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任材料組組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范達人任寫作組組長。後來「梁效」發展到三十多人，增加到九個寫作小組及註釋組、辦公室。辦公地點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北招待所，原為專家招待所，伙食相當不錯。「梁效」內部紀律甚為嚴格，互相之間不能討論撰寫的文章，更不能向外人泄露。「梁效」成員中不乏當時和後來的著名學者：

清華大學國際共運史教員王朝文，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田餘慶，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吳同寶（吳小如），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何芳川，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一良，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范達人，

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張世英，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楊克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林庚，

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鍾哲民，

北京大學原副校長、中文系教授魏建功。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馮友蘭（顧問）。[44]

「梁效」最著名的文章，是1974年4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的〈孔丘其人〉。文章用畫像的手法，含沙射影地描繪了一個「言必稱仁義，口不離中庸」的孔子形象，最經典的一段是：

44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頁19－33。

在孔老二的心目中，周朝奴隸制的一切，從井田到法律，從音樂到酒杯，都是盡善盡美、神聖不可侵犯的。對於新興地主階級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任何一項革新，對於在這場大變革中湧現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卻瘋狂地跳出來反對。學生要求去幫助革新，促進封建生產關係發展，他就惡狠狠地要門徒「鳴鼓而攻之」；晉國鑄了刑鼎，破壞了奴隸制的貴賤秩序，他詛咒人家要「亡國」；甚至在他七十一歲重病在牀的時候，聽說齊國新興地主階級殺了奴隸主頭子齊簡公，奪取了政權，還拚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再三請求討伐。

今天看來，這篇文章的內容在學術上自然是無稽之談。但是，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首先，文章是誰授意寫的？據「梁效」頭目李家寬布置寫作任務時說：「這個題目有來頭，氣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題目。」[45]在修改過程中，遲群、謝靜宜看了初稿，第二天說「根本不行」、「差得遠呢」。後來遲又對新稿提出兩點具體修改意見。眾所周知，遲、謝二人都沒有上過正規大學，遲是8341部隊宣傳科副科長；謝是中專文化程度，經過軍委機要學校學習後當上毛澤東機要員。他們是不可能對這種學術性很強的文章提出甚麼修改意見來的。即使是自稱「我要你們寫篇孔子其人的文章」的江青，也是難以駕馭的（江在組織《海瑞罷官》文章時完全依靠的是張、姚）。只有文史造詣極深、對批孔問題又有長期思考的毛澤東，才能提出一針見血的需要和見解。謝「文革」後承認，「是江青建議寫的」，「主席同意寫」。因此，很有可能是毛通過遲、謝指導着文章寫作。

其次，文章是影射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公認的說法，「七十一歲，重病在牀」的魯國「代理宰相」孔丘的形象是影射攻擊周恩來。當時此文一出，以史喻今、曲為比附的文章紛紛出籠，極力把孔子與

45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頁48。

中國歷史上的「宰相」、「大儒」等聯繫起來。如5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的「梁效」另一署名「柏青」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在描繪孔子見國君的一段文字中，加上「端起胳膊」。文章執筆人事後承認「這是借批孔之名，對總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擊」。[46]然而，時隔三十年，主要寫作者又都矢口否認，理由是：在「梁效」寫作組中，從來沒有人這樣授意或者暗示過影射周恩來，相反「梁效」多數成員對周十分尊敬；周恩來當時也不是「七十一歲，重病在牀」，而是七十六歲，尚在工作；文章發表後，遲群秘書和主要執筆者范達人都承認，是影射李德生。至於「端起胳膊」是否影射一個手臂有傷的周恩來，周一良回憶當時翻譯過程說：

> 篇中講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態，有一句「趨進，翼如也」，描寫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幾個人反覆推敲捉摸，想不出恰當譯法。魏建功老教授靈機一動，說「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張開兩臂，形如鳥之雙翼。但直譯「如鳥張翅」不太雅馴，不如說「端着兩個胳膊向前急走」，更為傳神。魏老說着站了起來，端起雙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幾步。大家連忙一致贊成他的說法，就這樣定了稿。[47]

以上所說，孰是孰非，可自行判斷。不過，據謝靜宜「文革」後回憶：〈孔丘其人〉一文發表前，毛澤東、周恩來都曾審閱。由此可見，文章影射周恩來可能性不大。但是，影射懷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廣大老幹部，是毫無疑義的。

據統計，到1976年10月，「梁效」發表的文章共181篇。比較著名的還有：〈略論秦始皇的暴力〉、〈林彪再三揮舞「克己復禮」的破旗居心何在〉、〈讀《鹽鐵論》——西漢中期儒法兩家的一場大論戰〉、〈論商鞅〉、〈評林彪賣國哲學〉、〈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46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頁420。

47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76。

培養接班人——批判神童詩〉、〈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與叛徒林彪〉、〈投降主義的讚歌——評《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評「三項指示為綱」〉、〈黨內確有資產階級——天安門事件剖析〉、〈在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中佔領和改造上層建築〉、〈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和孔孟之道〉、〈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起初，是借古諷今的文史學術形式文章為多，後期則是直接進行上綱上線的大批判的政論文章。

名聲僅次於「梁效」的，當數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羅思鼎」。1964年5月，上海市委成立了兩個寫作班子，辦公地點在中共華東局辦的《內刊》編輯部，位於上海西區丁香花園，這裏清末是李鴻章的別墅，成立之初，正值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發表，號召全國學習雷鋒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於是，兩個班子一個筆名為「丁學雷」，意即「丁香花園學雷鋒」；一個筆名為「羅思鼎」，即「螺絲釘」的諧音。前者主要寫文藝評論文章，黨支部書記是徐景賢；後者主要寫歷史研究文章，成員有朱永嘉、王知常。當時，也有人出於自己一貫的政治敏感，認為「思鼎」兩個字會被誤解為有「思想界一隻鼎」甚至「問鼎天下」的野心，但多數人仍然堅持這樣叫。姚文元是《內刊》編委，也在丁香花園辦公，與「丁學雷」、「羅思鼎」並肩作戰。1965年3月，石西民調到北京負責文化部工作。於是，張春橋接任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直接領導《內刊》和兩個寫作組。書生們開始起草一篇震驚天下的「大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羅思鼎」一直在張、姚控制下。

從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上海市委寫作組及其下屬各組以羅思鼎、康立、石侖、翟青、方海、齊永紅、梁凌益、戚承樓、靳戈、史尚輝、史鋒、曹思峰、方岩梁、石一歌、任犢、景池等八十多個筆名，寫文章156篇之多。重要文章有：〈論尊儒反法〉、〈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證的社會基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評朱熹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騙子〉、〈評《呂氏春

秋》〉、〈李鴻章出洋〉、〈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儒法鬥爭是「狗咬狗」嗎？〉、〈尊孔讀經與崇洋賣國〉、〈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評《韓非子》〉、〈論北宋時期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鬥爭〉、〈法家路線和黃老思想——讀帛書《經法》〉、〈學一點中國哲學史〉、〈地轉寶為新地兆——讀洪秀全的《地震詔》〉等。

除了這兩家，當時比較著名的御用寫作班子，還有康生控制的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國務院文化組大批判組「初瀾」、北京市委寫作組「洪廣思」。「唐曉文」的主要成員有趙紀彬等，康生死後被江青接管，還用過湯嘯、辛風、學澤、唐拓、湯新、范秀文、史建文、宋明等筆名。重要文章有：〈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甚麼？〉、〈柳下跖痛罵孔老二〉、〈孔丘的教育思想與「克己復禮」〉、〈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儒法鬥爭史〉等。

這些寫作組在當時文化黯條的情況下，含沙射影，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旁敲側擊，頗為熱鬧，形成了一道扭曲的風景線。

當時，知識分子中對批林批孔運動不滿的大有人在，但敢於公開表示的鳳毛麟角。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大會上點名批判梁漱溟說：「現在還反對我們，反對我們批孔。他是尊孔。」2月22日、25日，梁漱溟參加在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工商聯成員的學習組學習，在這兩天的學習會上，他作了長篇發言，題目為〈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他指出：「我現在認識到的孔子，有功和有過兩個方面」，「我的文章，我的觀點，確實是對時下流行的批孔意見不同意的」。「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響着他之後的中國文化的」。「他本人是承前啟後的」。他還反對把林彪和孔子聯繫起來，說：「至於林彪寫『克己復禮』這張條幅，……究竟他為甚麼這麼做，他的『己』和『禮』又何所指？我看除了問他自己，別人難以解釋。」梁漱溟發言完後，學習組迫於形勢，不得不對他進行了批判。在追問他對「批林批孔」運動態度時，梁漱溟說：「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林彪就是一個鬼，他夠不上做一個人，沒有人格」，「劉少奇的主張很多，都是公開的，彭德懷也有公

開信給毛主席」，「他們都是為國家、民族前途設想而提出的主張」。[48]梁漱溟的態度被匯報到有關部門後，對他的批判逐步升級，多達一二百人，一直批判到年底。梁漱溟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3 「儒法鬥爭」和「反潮流」鬧劇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全國出現了一系列光怪陸離的鬧劇。大致上可分為開展「儒法鬥爭」、批判「復辟回潮」、鼓吹「反潮流」新生事物三類。

開展「批儒評法」的「儒法鬥爭」

1974年6月12日，江青一夥召集「梁效」、「唐曉文」等座談會，江青提出「儒法鬥爭持續到現在」，並授意寫作班子把儒法鬥爭一直弄下來。當有人問到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算不算法家時，江青說：「蔣介石是不是資產階級？但他就是一個大儒」。當「唐曉文」的一個成員談到儒法鬥爭一直貫穿到近代時，江青插話：「到現在也是這樣。我這觀點準備挨批判。為甚麼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個批判繼承的問題。復辟和反復辟，前進和倒退的鬥爭，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社會，都貫穿這個。現在還有人要復辟，不能說沒有。要復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們要革命，對歷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繼承。」在隨後一段時間裏，江青一夥頻繁召集「梁效」、「唐曉文」等寫作班子成員開會，還跑到天津的一些工廠、農村和部隊，借宣講「儒法鬥爭史」，繼續散布「儒法鬥爭持續到現在」，煽動要「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特別說明是「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的「現代的儒」。

---

48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增訂本（長沙：湖南出版社，1988），頁177－185。

根據江青提出的研究「儒法鬥爭史」的主張，高等院校的批林批孔運動轉入搞「評法批儒」和「儒法鬥爭史」，註釋法家著作，用「儒法鬥爭史」改造文史哲各科教材體系等。在理工農醫科開展了研究儒法鬥爭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對中國醫藥學發展的影響等。《教育革命通訊》從第六期起開闢「教育史上的儒法鬥爭」專欄，發表評介教育史上儒法鬥爭的文章。《北京日報》專門刊登了署名「北京大學谷滋」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列舉了先秦時期的少正卯、李悝、吳起、商鞅、荀況和韓非等人的簡歷、主要政績和著述。當天，江青以「特急件」送《人民日報》，要求次日「馬上轉載」。《人民日報》又刊登了署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二)〉，列舉了秦始皇嬴政、李斯、漢高祖劉邦、漢文帝劉恆和景帝劉啟、賈誼、晁錯等人的情況。

江青還帶「梁效」、「唐曉文」兩個寫作班子的成員到天津，參加中共天津市委召開的「天津市儒法鬥爭史報告會」。會後，江青帶領一批人到寶坻縣城和小靳莊活動，並給接待她的小靳莊婦委會主任改名叫「周克周」，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在江青一夥的授意下，1974年下半年，新聞界對小靳莊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辦「政治夜校」、詩歌創作、發動男女老少大唱「樣板戲」等所謂政治思想工作經驗作了廣泛報導，小靳莊由此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

7月5日至8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國家出版局在北京召開法家著作註釋出版規劃座談會，參加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吉林、廣東、湖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陝西等十二個省、市主管理論工作的負責人和高等學校的有關人員，工農理論隊伍的代表和特邀老專家等共五十二人，列席代表十六人。遲群在會議上說：「大家都在研究法家，目的是甚麼？研究法家，是為了指導今天的鬥爭。否則，談不到古為今用。」姚文元在會議期間召見「羅思鼎」寫作班子的頭目時也說：「要把會議開好，意義不僅是註釋法家著作」。根據姚文元的意見，會議擬定了〈法家著作註釋出版規劃（草案）〉由國務院科教組、國家出版局下發，集中一批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人力進行法家著作的註釋工作。

批判「復辟回潮」

批判電影《中國》事件。1972年，意大利左派電影藝術家米凱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應邀來到中國拍攝記錄影片。他自稱是「一個帶着攝影機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帶任何教育意義的紀錄片。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寫道：「我計劃關注人的關係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我意識到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49]他在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林縣進行了拍攝。然而影片完成在各國放映後，1973年12月11、17日，中央廣播局國際聯絡部祝誠兩次給江青和姚文元寫信，說電影《中國》是「完全站在帝國主義立場觀點上，極惡毒攻擊地污衊我國的反動影片」。信中還說：「攝影組是外交部和廣播局合簽批准來中國的」，「楊振寧給周總理來信，反映此片很壞」。江姚立即批示，要求徹底追查，並在「周總理」一句下劃了線。元旦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謝靜宜在釣魚台調看電影《中國》，江青邊看邊罵：「中國人裏也有漢奸，只有漢奸才讓外國人拍這種片子！」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調看了此片後，江青又說：「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1974年1月25日，遲群在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

> 他們盡拍了一些歪曲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鏡頭，我們有些個很好的一些個建築，一些個場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專門突然地給你出來一個鏡頭，個別的我們有一個女同志和他們拉了一個車子，在那個胡同裏頭，他專門給你放大，一個特寫鏡頭，他給搞你這個形象，所以像這樣的片子，實際上就是一個間諜加漢奸搞出來的，難道不需要聯繫嗎？

---

49 〈安東尼奧尼70年代來華拍攝紀錄片《中國》回顧〉，《新京報》，2005年1月28日。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社論指出：「在他拍攝的長達三個半小時的影片中，根本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氣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過惡意歪曲了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攻擊我國領導人，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誹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國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國人，看了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極大憤慨。如果容忍這樣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搖撞騙，那就等於承認任意侮辱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是正當的行為，那就是向國際反動派的反華挑釁投降。我們要徹底揭露和批判這部影片的反革命實質，回答國際反動派對中國人民的挑戰。這是當前值得人們十分重視的思想和政治戰線上的一場嚴重鬥爭。」此後，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大批批判文章，僅1974年2月和3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二百頁的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版）。

江青還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往周恩來身上潑髒水。1973年5月17日周恩來會見楊振寧時，楊提出國外有的左傾小報說這個電影是「惡毒攻擊中國」，比如電影結束時有一群小孩和木偶戲鏡頭，「他的意思是說，中國的小孩都變成木偶了」。楊還說「我自己沒看過這個電影，不知道具體是怎樣」。周恩來當時比較謹慎，只告訴參加談話者查查。1974年1月1日，周恩來又在反映這部電影的材料上批示「不識此人，不知此事」。但是，江青仍然說：「這幾年放進來這麼多壞人、特務、間諜，太危險了！當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線上出了大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出了投降主義！壞人自然都進來了！」江青還授意調查此事的中聯部負責人郭玉峰和國務院文化組吳德把這件事和「幫周」會議聯繫起來，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線取得很大勝利，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聯合時易右，決裂時易左」，「前段轉尼克松來這個彎，現又出來右傾投降主義」。最後寫出的報告說：「所以犯這樣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是喪失階級警惕性，是不抓路線、不抓大事的必然結果。」整個報告，有六處提出外交工作存在

「右傾投降主義」。中國駐意大利大使沈平等一批官員被調回國辦「學習班」，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彭華等被點名批判。[50]

馬振扶中學事件。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二（一）班進行英語考試，學生張玉勤交了白卷，並在試卷背面寫道，「我是中國的人，何必要學外文，不學ABCD，也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為此張受到班主任楊天成的批評，並要她做出檢查。12日，學校負責人羅天奇在初中班學生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她，要求各班對此事討論批判。由於老師批評方式失當，加上其他原因，張玉勤當日稱病請假離校後即投河自殺，14日才在水庫中找到她的屍體。事情發生後，公社、縣有關部門和學校都已做了調查並妥善處理。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內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後，借題發揮，派遲群和謝靜宜帶人到馬振扶公社中學重新進行所謂調查。他們召開了兩個半天的座談會，於1月26日寫出〈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把馬振扶公社中學誣為「法西斯專政」、是「復辟」、「回潮」的典型，說「張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迫害所造成的」，說中學負責人和班主任老師是殺人「兇手」。1月31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並提出：「請河南省委認真覆核，嚴肅處理這一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復辟的嚴重惡果，並迅速將處理結果上報。各地也應注意，檢查有無類似情況。」江青在2月的一次會議上又說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叫嚷「要向全國控訴」。王洪文也指示要給該校老師和負責人「判重刑」。遲群把江青、王洪文這些話用電話通知了中共南陽地委，迫使當地政府對這一事件重新作了處理。馬振扶公社中學被奪權，羅天奇、楊天成被批鬥並被判刑二

---

50 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外交部（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認為影片「有一些醜化我群眾的鏡頭和控告的解說詞」，而「四人幫」「借題發揮，捏造罪名，無限上綱」。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北京電影學院舉辦了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學術觀摩展，重新放映《中國》。

年。唐河縣層層辦學習班，揪「羅、楊式人物」，共批鬥了280餘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也按文件精神檢查、「揭露」修正主義路線「回潮」和「復辟」等等。[51]

批判晉劇《三上桃峰》事件。1974年初，國務院文化組決定在北京舉行華北地區文藝調演。山西挑選了晉劇《三上桃峰》參加演出。該劇取材於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報》關於河北撫寧縣的通訊。主要劇情是：桃峰大隊因買了一匹病馬而蒙受損失，賣馬單位的女主人公主動送去一匹馬支援春耕，雙方都發揚了共產主義精神。1月23日，由國務院文化組舉辦的華北地區文藝調演在北京開始。次日，《人民日報》在報導包括山西省晉劇院上演的《三上桃峰》等六台節目的演出情況時說，這六台節目「受到了廣大觀眾的歡迎」，「首都的工農兵觀眾」在演出過程中，「不時地為精彩的表演報以熱烈的掌聲」。然而，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初瀾」寫的文章〈評晉劇《三上桃峰》〉，採用望風捕影的手法，硬把這個劇說成是歌頌曾經在撫寧大隊桃園大隊搞「四清」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送給一匹紅馬的事跡。認為是「為劉少奇翻案」，「歌功頌德」。該文由姚文元修改十一處，江青、張春橋定稿。不到兩個月裏，各種各樣的批判文章如潮襲來，先後有五百多篇。上海人民出版社選編輯、出版了印數達十萬冊題為《批判晉劇〈三上桃峰〉》的小冊子。全國各大中城市普遍召開批判會，到處抓「回潮派」、「復辟派」和「翻案派」。還株連到其他與馬有關的文藝作品，以致「談馬色變」。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長、《三上桃峰》劇作者賈克被撤職、批鬥。山西一個文藝工作者趙文龍曾經寫文章，認為江青關於社會主義文藝根本任務的提法「欠妥當」，也被江青的親信、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于會泳指稱是「《三上桃峰》的理

51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批示指出，這是一個大冤案，決定撤消對羅長奇、楊天成的刑事處分，恢復他們的職務，為受迫害的幹部和教師平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黨組的建議，決定撤消1974年1月31日中央轉發的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指出，「這一事件是『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需要，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炮製的」。

論基礎，是右傾翻案的奇談怪論」。趙被迫害致死。3月30日，在中央直屬文藝單位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上，于會泳又點名指摘一批文藝作品是「毒草」，主要有：哈爾濱話劇院演出話劇《松濤曲》、山東省話劇團演出《不平靜的海濱》、中國話劇團演出《友誼的春天》和《要有這樣一座橋》，短篇小說《牧笛》。此後，這些作品都受到了圍攻批判。

批判《三上桃峰》也反映了中央上層的鬥爭。1974年3月18日，王洪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召開山西省委常委赴京匯報會，周恩來、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鄧小平、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等十四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會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山西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遭到了猛烈圍攻。江青率先發難質問：你為劉少奇翻案的事，是誰指使你幹的，要交代清楚！會議中，江青見鄧小平一言不發，便看着鄧對謝說：我看你謝振華也未必有這個膽量為劉少奇翻案，背後是有人支持你這樣幹的。你如果把後台交代出來，就算你立功，我保證對你從寬處理。[52]然而，三個多小時的批判，並沒有揭發出甚麼有價值的東西。謝振華一再回答：這個劇是根據文化組核心小組的意見調到北京匯演的，根本沒有甚麼後台。王洪文只好指示陳永貴，回到山西由你主持繼續批判謝振華。由於陳永貴與謝在「文革」初期分別在山西支持不同的派別，因此他十分積極，召開全省縣以上幹部和兩大派群眾頭目參加的省委擴大會議，進行了兩個多月的批判。5月31日，謝振華給毛澤東寫信，報告此事原委。毛澤東批示：「到此為止。」對謝的批判才停止，但謝仍然被調離山西，到北京參加讀書班。[53]

批判「無標題」音樂事件。1973年11月，周恩來曾經批復同意對外友協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訪華演出的報告，要外交部具體辦

---

52 歐陽青：〈謝振華深情回憶鄧小平〉，《黨史博覽》，2004年第8期。

53 1977年底，謝振華復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78年9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根據中央文件，宣布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

理。江青卻批示：「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11月19日，周恩來不得不再次批示：「今後應盡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但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仍然繼續指摘這是宣揚「無標題音樂、無社會內容」，並在上海、天津等地發起「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活動，攻擊周恩來等人是「開門揖盜」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邀請土耳其音樂家一事被取消。1974年2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初瀾」文章〈抓住實質　深入批判——再談應當重視關於標題音樂、無標題音樂問題的討論〉，指出：「當前，一場群眾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鬥爭正在深入發展。關於標題音樂和無標題音樂的討論，對於宣揚資產階級古典音樂作品『沒有甚麼深刻的社會內容』的修正主義觀點的批判，也正在逐步深入。這是文藝領域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尖銳鬥爭。鬥爭的實踐證明：對這個問題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把這一批判納入批林批孔的鬥爭之中，進行到底！」

「黑畫」展覽。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有關部門組織創作了一批國畫，用於裝飾賓館和供外貿出口。對周恩來的意見，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時也點頭同意，但事隔不久，他們就出爾反爾，說出口樣本《中國畫》是「黑山黑水」、「復辟逆流」，「是迎合西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貨色」，下令要進行批判，並布置搜集所謂「黑線回潮」的美術作品。1974年初，于會泳、劉慶棠按照江青集團的指令，指使一些人到北京飯店、北京畫院、國際俱樂部、榮寶齋、中央美術學院等單位，以「借用」為名收集「黑畫」，於2月15日在中國美術館和人民大會堂正式舉辦所謂「黑畫」展覽，共有18名畫家的215幅作品被展出。于會泳等人特意在「黑畫展」前言中提示說，這些畫的產生，「是得到某些人公開鼓勵和支持的」，「特別值得我們深思」。被展出的所謂「黑畫」，其實都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任意歪曲。如李可染畫的〈祖國有此好河山〉，被說成「黑山黑水」；他在畫上用的一顆閒章「可貴者膽」，被引申為「反黨的膽」。黃胄

畫的〈駱駝〉上的題字「任重道遠」，被扣上「影射攻擊國民經濟停滯不前、否定文化大革命」。李苦禪畫的八朵〈荷花〉，被誣為「攻擊八個樣板戲」。彥涵畫的七個橋洞的一座橋上走著五個人，被引申為「攻擊五七道路」。黃永玉畫贈朋友的一幅〈貓頭鷹〉，被扣上「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所謂「黑畫展」至4月15日結束，期間有數萬人被組織前去參觀批判。

批判湘劇《園丁之歌》。1972年11月，湖南省專業文藝調演中，湘劇《園丁之歌》受到好評。故事情節是，青年女教師俞英耐心教育引導小學生陶利克服缺點，使他變成了愛學習，守紀律的學生。青年教師方覺從中受到教育，認識到自己對學生的態度是錯誤的，樹立起正確的教育思想。1973年，在當時已調國務院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的安排下，湘劇《園丁之歌》由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同年7月28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審查這部影片時，認為這個戲有問題，「學生受教師擺布」，是反攻倒算。1974年6月，江青提出：「《園丁之歌》的電影應上演，上演的同時發表批判文章。」同年7月，國務院文化組發出〈關於批判《園丁之歌》的通知〉。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初瀾」的文章〈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評湘劇《園丁之歌》〉。文章開篇即為湘劇《園丁之歌》戴上大帽子，「是一齣名為反映『教育革命』，實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的壞戲。它所歌頌的路線和人物都是錯誤的，其要害就是否定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園丁之歌》就是「要復『師道尊嚴』、『智育第一』之『禮』，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之『禮』，復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之『禮』」。「初瀾」文章的發表，在全國掀起了批判《園丁之歌》的狂瀾，短時間內，各種報刊接連發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1974年11月，毛澤東到湖南，觀看了《園丁之歌》後，鼓掌說：「我看是齣好戲。」[54]這一消息迅速傳出，但江青一夥卻作為謠言追查，仍不准上演此劇，甚至還要追查

5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411。

中共湖南省委主要領導人的責任。圍繞湘劇《園丁之歌》的鬥爭一直延續到1975年、1976年。

北京永樂中學事件。1971年，北京市石景山區永樂中學一個學生因躲避家長的責打而跳樓受傷。此事與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毫不相干。在「批林批孔」的浪潮中，永樂中學一教師舊事重提，寫信說是「修正主義路線使一個學生被逼跳樓」。1974年3月12日，江青在來信上批道：「建議立即對此事進行調查研究，嚴肅處理」。「北京市已有幾個學校實行法西斯主義，讓壞人專了學生的政」。「建議北京市委抓緊批林批孔這個綱，抓住典型」。江青還要求對「這種殘害青年的敗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55]13日，遲群指使國務院科教組把「永樂中學事件」和江青的批語通報全國教育部門，要求深入批判「師道尊嚴」，批判舊勢力的回潮復辟。此後，永樂中學的黨支部被改組，主要幹部被停職檢查，遭受批鬥、直至調離學校。更為嚴重的是，許多中小學隨之出現一片混亂，無政府主義泛濫，辱罵教師、破壞學校財產的現象遍布全國各地。

毛遠新在遼寧也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他聽說鞍山市委領導中有人說：「『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戰線，紅線是主流。」並且開始撤出駐學校的工人宣傳隊。毛遠新覺得這是違背了毛澤東的判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便親自到鞍山，組織一批工人宣傳隊隊員到市委常委會上去「吹氧」，指摘市委屁股不坐在工人階級一邊，而去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話。毛遠新還抓住鞍山出現的一個教師因批評學生過於嚴厲而導致學生自殺的事件，要求鞍山市委對那個教師判刑，使鞍山教育領域出現了很大混亂。

鼓吹「反潮流」新生事物

鍾志民退學事件。1974年1月24日，新華社以「熱烈支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為題報導了鍾志民退學申請事件，指出這「是向資產

55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420。

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展開新的進攻的一份宣戰書，是向廣大革命幹部和幹部子女進行反修防修教育的一份好教材」。鍾志民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祖父1928年在江西瑞金葉坪任村蘇維埃主席時被白軍殺害。父親鍾學林也是參加了長征的福州軍區政治部領導幹部。鍾志民1968年在南昌二中初中畢業，去江西老區瑞金沙洲壩農村插隊勞動，但在農村只勞動了三個月，於1969年初佔用一個社員的徵兵指標參了軍。1972年4月未經群眾推薦、招生選拔等程序由父親給軍區幹部科打電話指名調選到南京大學政治系讀書。1973年9月，他認識到自己走後門的錯誤，不顧父親反對，決定退學，回到部隊。本來南京大學和省委都不同意。但江青集團插手在《人民日報》報導後，校黨委連續召開常委會和擴大會，聽取了鍾志民的思想匯報，批准了他的退學申請報告，並在全校發起了大討論。「走後門」是完全錯誤的，在當時背景下，江青集團是利用這一事件打擊軍隊幹部。遲群在1月25日大會上稱讚了這種「反潮流」行動。南京召開大會歡送他回部隊。然而，毛澤東很快批評反「走後門」是「三箭齊發」，鍾不能再作為「反潮流」典型宣傳，被改塑為「決心徹底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自我批判」的思想革命戰士，從大學退到部隊，又從部隊退到農村，一路退到底，最後退到農民身份為止。與此類似的，還有柴春澤事件。

白啟嫻嫁農民事件。1974年2月7日，《人民日報》轉發知識青年白啟嫻給《河北日報》的信。白啟嫻是一位女大學生，1943年出生在一工人家庭。在北京讀小學和中學，1963年考入河北師範大學。1968年12月到河北省滄縣閻村公社相國莊大隊插隊落戶，一年後與當地一農民結婚。1973年11月，已經調到公社中學任教的白與一教師因分乾草發生爭執，爭吵中對方挖苦白的婚事，白盛怒中給《河北日報》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因口角受侮的過程，從「反修、防修」和「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的角度，對「看不起農民，輕視農業勞動的腐朽思想」進行了批判，並與孔老二大罵向他請教種田種菜的學生樊遲是「小人」相聯繫，提出如果用這樣的舊思想教育學生，「會把教育革命引向何方？」1974年1月27日，

《河北日報》發表白來信並加發編者按，稱白的這封信「是一篇生動的批林、批孔和進行路線教育的好教材」，號召人們「積極投入這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希望湧現出更多的敢於與地主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觀念決裂，敢於反潮流的人物」。白啟嫻的信和《河北日報》的編者按在《人民日報》轉載後，白被樹成敢於同舊思想、舊觀念決裂的典型，由中共滄州地委書記作介紹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繼而增補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並從農村中學教師迅速升遷至河北省知青辦副主任、黨組成員、滄州地區文教衛生辦公室副主任、閻村公社黨委副書記。[56]

趙兵用政治理論答理工考卷。1974年1月3日，大連海運學院一年級工農兵學員趙兵，在化學課期末考試中，交了一份學習體會或小結形式的答卷，題為〈在本學期化學學習中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體會〉。《紅旗》雜誌編者發表這篇考卷時說明認為，「這份答卷是在改革了舊的考試制度，由學生自選題目寫學習體會或學習小結以後出現的。它是教育戰線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成果之一，也是對那些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大學教學質量『今不如昔』的論調的有力回擊」。5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趙兵的答卷和《紅旗》雜誌的編者說明，並發表署名「新華社通訊員、新華社記者」的通訊：〈難以用分數來評定——記大連海運學院工農兵大學生趙兵和他的一份答卷〉。通訊高度評價了趙兵及其所作所為，讚揚趙兵和他的很多同學的答卷「內容豐富，生動活潑，充滿戰鬥氣息」。通訊以趙兵和他的同學最近貼出的大字報上的話結尾：「不粉碎復辟倒退的修正主義思潮，就不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同舊事物的頑抗進行堅韌的鬥爭，新生事物就無法贏得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此後，在高等院校甚至在中小學，由學生以政治評論作為理工科考試答卷的「新生事物」紛紛出現。

56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根據白啟嫻的意願，有關部門將其調到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工作。1982年，白啟嫻因煤氣中毒死亡。

大唱「革命兒歌」，批判「三字經」。6月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北京西四北大街小學通過編寫「革命兒歌」、講「革命故事」等形式開展批林批孔。這是江青下令「加以推廣」的。該校編寫的兒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彙編成紅小兵詩歌集《我寫兒歌來參戰》出版。此後，許多小學以至幼兒園，紛紛採取編「革命兒歌」、講「革命故事」、演唱「新兒歌」等方式「批林批孔」。10月21日，《人民日報》以〈我寫兒歌上戰場〉為題，再次對該校用兒歌形式「批林批孔」進行報導，介紹了兒歌在「批林批孔」中「愈來愈大的作用」。7月12日，《北京日報》一個內部刊物上登載了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學孫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況的一封信。江青看到以後，寫了一段批語：「中學，甚至小學的批林批孔都應抓緊些。要抓典型，以點帶面。如不及時抓緊，對青少年、兒童不利。《三字經》之類的東西，就是針對少年、兒童編的。我們對這個問題不重視，不能使一個人從兒童、少年就粗知一點馬克思主義，敢於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國務院科教組於20日將這個批語用電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教育行政部門。並根據江青的批語在《教育革命通訊》第八期，發表題為〈奪取中小學批林批孔的新勝利〉的評論。此後，在各級學校以至幼兒園又開展了批判《三字經》、《閨訓千字文》、《弟子規》、《改良女兒經》、《神童詩》、《名賢集》等活動。

大字報〈要當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事件。1973年2月，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提出「三年改變港口面貌」的要求，並提出推廣廣東黃埔港計件工資制經驗的意見。197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這篇大字報，是馬天水、徐景賢等人炮製的，1月7日以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部分工人」的名義出台，目的是向周恩來發難。大字報指摘說，上港五區的「領導不是把工人當作碼頭的主人，而是視為噸位的奴隸」，認為「這是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在我區的反映」，五區的領導「不是靠做政治思想工作去發動群眾」，「抓了『噸位』，忘了首位；抓了開幾條線，忘了走甚麼路線」。大字報還提出，「我們管碼頭，不僅要管生產，管多裝快卸，更要管路線」。《人民日報》編者按認為，大字報「抓住了當前企業管理中的

要害問題，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提出「黨委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東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現，社會主義企業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義路上去！」《人民日報》配發的《解放日報》、《文匯報》記者「調查附記」說，五區黨委表示接受工人的批評，決心「狠批唯生產力論」，「迅速改變面貌」。大字報在《人民日報》轉載後，上港五區的幹部不敢再抓裝卸噸位指標，堅持生產的工人被說成是「安於奴隸的地位」，結果造成生產連續下降，外輪停港待卸時間不斷延長，外商索賠金額猛增。[57]

小靳莊十件新事。1974年8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報導〈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十件新事〉。文章詳細報導了小靳莊層出不窮的「新氣象、新事務」中的十件：辦政治夜校、培養貧下中農的理論隊伍、貧下中農登台講歷史、大唱革命樣板戲、業餘文藝宣傳隊、群眾性的詩歌創作、開辦圖書室、講革命故事、群眾性體育活動、移風易俗破舊立新。這篇報導是在江青一夥的授意下發表的，內容與事實也有很大出入。如詩歌創作，實際是讓一批社員脫產，由專人輔導、加工甚至捉刀寫出來的。在批林批孔的特殊背景下，出現「十件新事」的小靳莊成了全國競相仿效的樣板，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開門辦學。1974年9月29日，國務院科教組、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開門辦學的通知〉。〈通知〉說：開門辦學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開門辦學中要始終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以工農兵為師。要堅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徹底改革舊的教育體系。開門辦學要以廠（社）校掛鈎為主，多種形式辦學，並在本地區就近安排，相對穩定。要注意到中小工廠和農村中去。由於實行開門辦學，學生頻繁地下鄉下廠勞動，學工、學農，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勞動為中心，再加上批「智育第一」、「師道尊嚴」，造成了「讀書無用」的不良風氣，使普通中小學教育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給青少年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內傷」。

57　陳沂主編：《當代中國的上海》，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272。

朝陽農學院經驗。1974年12月21日至28日，國務院科教組、農林部和中共遼寧省委聯合召開學習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經驗現場會。參加現場會的有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農林部門的負責人，國務院各有關部委和各高等農林院校等單位的代表共180人，遼寧省各類學校代表和市、地文教、農林部門負責人140人。朝陽地區貧下中農代表和朝陽農學院畢業生及在校生代表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揚朝陽農學院的經驗是：堅持在農村辦學，分散辦學；辦學方式實行「三上三下」（「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生產隊參加生產實踐）；教學內容根據當地農業生產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干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學生社來社去，畢業當農民，掙工分等。會議認為不僅農林院校，而且各類學校、各級教育部門的領導機關都應當學習、研究「朝農經驗」。會議提出：農業大學必須搬到農村去辦，實行「社來社去」；「學大寨」應當是農業大學學生的必修課、基本課，工業大學要把「學大慶」作為基本課、必修課；要「使學校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會上，遲群、毛遠新竭力鼓吹「朝農經驗」具有「戰略意義」。遲群說：「文化大革命」前「培養出來的學生，基本上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破壞作用」。毛遠新則提出：朝陽農學院的學生「光懂得農村兩條路線鬥爭不行，還得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並提出「大學就是大家來學」。會後，全國掀起了宣傳、學習「朝農經驗」的浪潮，報刊、電台發了大量的通訊報導，各地組織了大批人員去朝陽農學院參觀學習。

三　毛澤東批評江青，批林批孔運動收場

1　各地重新掀起造反浪潮迫使中央發出控制運動文件

批林批孔運動的第一個惡果，是鼓起地方動亂。從中共九大以來一度被打擊壓制的各地的造反派，在「反潮流」和批判地方幹部和軍

隊將領的運動中，又活躍起來，掀起了新的造反浪潮，他們大多利用成立批林批孔（簡稱「雙批」）領導小組、民兵組織及工會組織進行奪權活動。

各地的造反活動，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積累矛盾的爆發，也與中央的鬥爭有著密切聯繫。1974年1月14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做了一個重要報告，題目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報告說：

> 給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觸一些情況，有些省老大難解決不了，主要是路線沒有搞對頭，有些地方嘛，除少數壞人外，多數是領導人的路線沒有搞對頭，主要是沒有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沒有正確對待群眾，沒有正確對待運動。
>
> 問題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一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有的說，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
> （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有一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如新疆的龍書金、四川的梁陳、河南的幹部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轉移批林鬥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
>
> 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問題應當解決了。要能解決問題，首先要把原因找對頭，這樣才能對症下藥。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有一些單位的壞事歸罪於文化大革命，或者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這是錯誤的；這本來是修正主義的後遺症，怎麼能說成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這些問題恰恰說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哪些地方路線不對頭，哪些地方就不能團結；廣大的幹部和群眾把壞人挖出來。有的是批林批孔搞不起來。[58]

58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這個報告被參加讀書班的造反派帶回各地後，成為當地批林批孔運動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重新動亂的根子。

浙江是各省中「文革」矛盾最集中的地區，也是王洪文直接抓的點，因此是全國最有代表性的地區。

「文革」初期，浙江就形成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聯總」，頭目為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張永生等）和「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頭目為方劍文等）兩大派群眾造反組織。浙江支左的解放軍也分裂為南京軍區支持的省軍區（政委龍潛）和野戰軍二十軍（政委南萍、軍長熊應堂）、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等駐浙部隊兩大派，各支持一派群眾組織。1968年3月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南萍任主任，陳勵耘任第一副主任。駐浙部隊佔了上風，省軍區被指摘為執行錯誤路線。但是，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後，陳勵耘、南萍、熊應堂都被定為林彪死黨隔離審查。1972年4月，中央任命譚啟龍、鐵瑛主持浙江工作，平反冤假錯案，部分老幹部復出，造反派被壓制。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後，在「反潮流」口號的號召下，被壓制的「省聯總」造反派頭目張永生、翁森鶴（杭州絲聯廠工人）、賀賢春（杭州通用機器廠技術員）等又以辦學習班為名，聚集群眾佔領了杭州屏風山省委招待所，攻擊省委領導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搞復辟」。

1974年1月13日，江青看到解放軍報《內參》報導駐浙江二十軍防化連在批孔問題上遇到困難，便親筆寫支持信並派遲群、謝靜宜送去批林批孔小冊子。江青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二十軍的對立面是許世友任司令員的南京軍區，就是要從這裏打開突破口。

江青的信使造反派得到鼓舞，紛紛東山再起，組織遊行集會。浙江和杭州的領導幹部也開始分裂，省委副書記賴可可、杭州市委書記王子達站出來支持造反派。2月11日，在杭州市委支持下，造反派搶先成立杭州市民兵指揮部。次日，又由杭州市委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這兩個組織成為造反派鼓動奪權的中樞機構。另一派「紅暴」派不服氣，強佔了浙江日報等機構。聯總派在民兵指揮部調動下，出動幾千民兵進行攻打，造成大規模武鬥。此後，溫州也成立民兵指揮部，衝擊軍分區和武裝部，甚至關押駐軍政委、副團長，設立監獄關

押大批反對派。張永生還兩次給江青、王洪文寫信，控訴省委負責人譚啟龍、鐵瑛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儒家回潮復辟，是孔老二。隨後，在省委成立的批林批孔領導小組時，兩派又進行了激烈鬥爭。翁森鶴對「反潮流戰士」明確說：「為啥要成立批林批孔小組，主要給大家找個合法地位，否則你們回到本單位沒有理由抓這場運動。如果我們不抓運動的領導權，搞得不好他們又要摸我們的頭頸。批林整風時的教訓不要忘記。」[59] 於是，浙江又面臨着「文革」前期的奪權風暴。

翁森鶴在杭絲聯廠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一個多月裏，突擊發展黨員97人，提幹116人。22個支部書記換掉20個。還組織了10萬人到廠參觀，推廣經驗。他們還給杭州市委書記王子達寫信，說「茲送上敢於反潮流工人代表60名，要求你們迅速研究，並請三天內落實解決」。提出名單要委任市委常委九人、副書記二人、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一人等各級幹部。杭州市委討論基本予以通過，分別委派到市政工組、生產組、公安局等任職。翁森鶴高興地說：「阿卯（指歷史傳說中被孔子殺害的少正卯）唱新歌。我們這些阿卯哥經過文化大革命和反潮流的考驗，在思想上早已具備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了。」他要在座不是黨員的舉手，當場填表入黨。7月4日，中央組織部來電話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對領導成員增補，暫緩辦理，運動後期再考慮。但是，雙突風潮仍然在繼續。杭州全市突擊入黨七千多人，突擊提幹三千多人。

在王洪文的指示下，為解決浙江問題，從3月起，浙江省召開省委、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黨委全會（「三全會」），一直開了133天。實際上由王洪文遙控，省委副書記柴啟琨和張永生、翁森鶴出面操縱。會議集中批判省委書記鐵瑛、省軍區副政委夏琦、省委副書記陳偉達等，點名批判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鐵瑛、夏琦等被造反派拉走批鬥，指摘他們是「復辟勢力代表人物」。會議期間，王洪文打來

59　杭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浙江文革紀事》（杭州：《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內部刊印本，頁204。

多次電話，指示涉及軍區上級領導的人也可以揭發，要翁森鶴列席省委常委會。張永生給江青寫信說：關鍵時刻王副主席代表中央及時給我作了許多重要指示，給我以極大的鼓舞。為我們衝破阻力，勝利前進，指明了方向。

浙江的混亂一直發展到冬季。另一派造反派不甘示弱，也組織幾百人佔領了省委大樓。11月10日起，中共中央決定省委領導人譚啟龍、鐵瑛、賴可可等和兩派頭頭張永生、翁森鶴、方劍文等及杭州市委領導人王子達、王醒等先後到北京辦學習班，解決浙江問題。中央領導人對兩派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批評「省聯總」派，指出杭州市委書記王子達有嚴重問題。倪志福批評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等人說，你們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目無組織，目無中央，甚麼人的話都聽不進去。同時，王洪文也批評譚啟龍、鐵瑛沒有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糾纏歷史舊賬，批了文化大革命，使一派受壓。兩人被迫做了多次檢查。期間，浙江省委多次發出通告，要求停止提幹、武鬥，釋放被關押人員，收繳被搶奪槍支，解散民兵指揮部和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其後，浙江形勢開始好轉。在1975年整頓中，中央派王洪文、紀登奎、陳野萍等帶領工作組前往處理，繼續採取措施，隔離審查張永生、翁森鶴等造反派頭頭，重新任命省委和杭州市委領導班子，將二十軍調往河南等，形勢基本恢復穩定。但是，好景不長，年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又將浙江重新推入新的混亂。

湖南省的情況與浙江僅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不是清查林彪事件中被壓的造反派起來奪權，而是造反派以批判林彪死黨為名攻擊省軍區和省委領導人，進行奪權。

林彪事件後，主持工作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省軍區第二政委卜占亞，因為他過去一段時間裏曾經有吹噓林彪、執行極左錯誤的活動，也因為他是由廣州軍區調來而被說成是林彪、黃永勝「賊船」上的人，被定為林彪集團「在湖南的代理人」，遭到批判。[60]

---

[60] 1982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根據中央指示對卜占亞進行覆查，撤消1973年對他的錯誤處理文件。

這種批判株連到省軍區，造成了軍民、軍政關係的緊張。1973年3月，中央發出文件指出，卜占亞所犯錯誤是嚴重的，經過批判教育態度有所轉變，中央表示歡迎。將他調出湖南，另調張平化任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主持工作。在省委班子裏，第一書記華國鋒調中央工作，其他人還有老幹部、新幹部，軍隊幹部，造反派幹部。他們之間的鬥爭，反映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以十大中央委員、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造反派工人唐忠富為代表的各級造反派，急於恢復和擴大權勢；以「文革」前的湖南省委候補書記、副省長章伯森為代表的支持造反、犯有錯誤的少數領導幹部，試圖東山再起；湖南「文革」以來歷次政治運動造成數以十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下放幹部、疏散城市人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形成的問題，在群眾中積累了嚴重的不滿情緒，尋找機會爆發。批林批孔運動便成為導火索。

1974年1月28日，省委召開的九萬人「深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剛結束。造反派和群眾在長沙就貼滿了大字報，並且出動宣傳車，鋪天蓋地地提出「批林要批卜」、「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促進派」等口號，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初期的洶湧場面。省委鑑於「文革」初期的壓制群眾教訓，指示《湖南日報》發表社論，提出「批林批孔」中「凡是束縛群眾手腳、妨礙鬥爭深入發展的清規戒律，統統都要破除」。唐忠富以在中央讀書班上帶回來的王洪文鼓吹「反潮流」報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為武器，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三篇〈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文章，逼迫省委表態支持。3月，省委批准了犯錯誤的章伯森、張厚、胡勇等幹部列席省委常委會議，還批准長沙、邵陽等地提拔一批造反派頭目任副書記或常委。3月至8月，全省突擊提幹有一千人左右、突擊入黨有三千人左右。他們通過各地的「運動辦公室」、「大批判組」、「宣講團」等控制了運動。唐忠富、張厚、胡勇還密謀制定了當省委書記、常委的計劃，託毛澤東早年同學周世釗乘進京之便，向毛澤東遞交名單。但是，毛澤東沒有接受，還批評了周。

湖南批林批孔的聯繫實際，首先重新批判卜占亞，進一步開展對現任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楊大易及長沙警備區政委、市委第一書

記景林的揭發批判。4月7日，中央指示肯定了這種做法，同時也認為楊、景與卜有區別。4月22日，湖南省委批轉了胡勇等如「文革」初期「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汽電經驗」。5月中旬，湖南省委召開長達五十多天的省委、省革委、省軍區的常委會議，對楊進行批判鬥爭，「揭開省委內部階級鬥爭的蓋子」。各級地方也同樣把軍隊幹部當作鬥爭對象。軍民關係更加緊張。指戰員氣憤地說：以後再調司令員和政委來，先要說清楚是哪個司令部派來的，免得我們受牽連。

其次，是把各級領導機關和幹部說成是「夫子廟」、「儒家子弟」、「復辟派」等，衝擊黨委和政府部門，甚至搶奪公章、摘機關牌子、封閉檔案室和辦公室、靜坐上訪、爆發武鬥。如5月21日，邵陽市委會議被造反派控制的總工會派三百多人衝入會場打散。

在混亂狀況下，7月9日，張平化等到北京向華國鋒和中央匯報工作。8月上旬，中央又找來唐忠富、張厚、章伯森，王洪文、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與他們座談，形成了談話記錄要點下發，主要內容是：1、湖南運動形勢是好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存在問題，對章伯森等的錯誤言行遷就，鬥爭不力。2、揭批楊、景是完全必要的，但應同卜有區別。3、要維護團結，報紙不能亂提口號。4、各級革委會、工會、民兵，都要在黨委領導下，不能遷就要權的人。5、解放軍三支兩軍大方向是正確的，要增強軍民團結。6、湖南歷次運動大方向是正確的，對於出現的問題要落實政策。7、增產或減產是檢驗批林批孔運動成績的標誌之一，要回到生產崗位上去。8、黨要領導一切，「大批判組」、「運動辦」要堅決撤消。9、章伯森要做認真的檢查。

這個談話要點是折衷的產物，在肯定運動的前提下，也指出湖南運動偏離了中央指示，有積極意義。傳達以後，全省大亂的局面基本結束。10月1日，被批判的靶子楊大易在國慶活動中露面，次年調往瀋陽任省軍區司令員。

批林批孔運動造成的各地新造反浪潮，層出不窮，大同小異。如1974年2月，黑龍江幫派骨幹分子牛成山、陳造反等寫出第一張「反復辟」、「反回潮」、反省委的大字報。隨後，指名道姓攻擊誣衊省

委領導人的大標語、大字報接踵而至，「打倒黑龍江省的孔老二！」「黑龍江省的孔老二大搞復辟回潮沒有好下場！」。3月21日，在牛成山、陳造反等指揮下，哈爾濱第一機器廠等單位的幫派分子八十多人，進佔中共黑龍江省委會議室，圍攻省委領導人，強迫省委交出他們向中共中央誣告省委的信和江青等人的批語。4月1日他們又到省委要求將該信件及批語轉發全省，強迫省委承認「犯了方向錯誤」，連續鬧了六天五夜。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汪家道被迫承認1973年10月中共黑龍江省委召開的三屆五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是「錯誤的」(因會議曾提出要解決牛成山等幫派骨幹分子的問題)，進一步煽起反對省委的活動。[61] 再如4月29日至30日，安徽省淮南市一些造反派公然衝進中共淮南市委機關、公安機關和法院，焚燒、毀壞和搶走了大量機密材料和一萬多件法院訴訟檔案材料，捆綁公安人員，劫去槍枝子彈，致使一段時間裏，中共淮南市委陷於半癱瘓狀態。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部分群眾要求落實「文革」以來造成的歷史問題和冤假錯案，也以這種參加方式推動了運動。如1974年4月28日至30日，南京市近萬名下放工人上街遊行，包圍機關，攔截汽車，強乘火車，要求赴京上訪，造成火車晚點十多個小時。29、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兩次電示中共江蘇省委負責做工作，勸阻工人來京，下放工作中的問題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批林批孔運動的另一個災區，是軍隊機關。批林批孔之初，江青集團就處心積慮地插手軍隊，採取了一邊拉一邊打的手段。江青背着毛澤東、中共中央，以個人名義直接給軍隊的一些單位寫信、送材料，派出幫派骨幹到軍委總部、空軍、海軍煽風點火，選派記者到各軍區機關和部隊，搜集領導動向和運動情況，江青還親自抓了三十八軍和中央警衛一師兩個試點，這在一些軍隊機關中確實起到了效用。1974年1月13日江青給空軍司令員馬寧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據說

61．中共黑龍江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黑龍江黨史大事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461。

空軍機關對批孔有些困難，特請蘇元勳[62]同志送上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及《名詞解釋》100份，可能有助於批林、批孔。請指定一個連隊，由蘇元勳同志去宣講。」[63]空軍對這封信進行了座談和傳達。1月24日召開軍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時，江青又派遲群、謝靜宜宣讀了她給海軍政委蘇振華的信，並贈送200本《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大會後，蘇振華將江青給他的親筆信和海軍黨委給江青的致敬信廣為印發，造成批林批孔的聲勢。1月28日，江青又給廣州軍區許世友、趙紫陽寫信送材料說：「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洶湧澎拜，雖不能與同志們一塊持槍戰鬥，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進行着一場大鬥爭。這場鬥爭是大是大非，是路線鬥爭，是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一場持久的鬥爭——批林批孔運動正向縱深發展，勢若燎原。」

但是，江青等的活動在解放軍中並未得到像她期待的勢若燎原的響應，反而遭到一定的抵制，因此江青、王洪文、張春橋一再指摘軍隊領導機關的「批林批孔」搞得很「不得力」、「不堅決」、「不深入」。3月5日，江青、張春橋召集于會泳、陳亞丁（總政治部原副部長，當時係無職務待分配幹部）等人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八一電影製片廠的人。一開始，江青就點名攻擊曾經分管軍隊文化工作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聲稱「八一廠是遭了孽，倒了霉啦！軍閥在管你們」。「要整一整軍隊」，鼓吹在軍隊「放火燒荒」，奪取軍隊文化工作的領導權。江青說：「軍隊執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藝路線，他們不許普及樣板戲，有壞作品批評不得，我們的話根本不聽。」「放火燒荒，你們去三個人，去放火嘛。」3月12日，陳亞丁按照江青的要求，召集駐京部隊文藝團體一些負責人開會，傳達江青「放火燒荒」的講話，並布置他們回去「放火」、「奪權」。「放火燒荒」之風由

62 蘇元勳是謝靜宜的丈夫，在空軍機要部門工作，曾經受林彪一夥壓制，還被關進了監獄。

63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此吹到了很多地方。大字報鋪天蓋地，李德生等總政負責人被點名批判，要求把他從瀋陽揪回北京批鬥。

江青集團還製造了一個《解放軍報》變相停刊事件。1973年底，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派工作組到《解放軍報》，在廣泛聽取群眾對領導班子意見的基礎上，總政黨委提出了報社領導班子的名單，經軍委討論批准。周恩來和政治局的多數也都同意。但這個班子不合江青等人的意，於是，江青等人不斷地對《解放軍報》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1974年1月17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既要講批評又要講諒解〉的部隊來稿，介紹空軍某部航修廠學習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搞好黨委一班人團結的體會。這篇短文是根據周恩來在空軍黨委一次會議上講話的精神寫的。江青等人對短文極為不滿，指使心腹布置人寫文章「批評」。很快，一篇由四個幹部戰士署名實際是記者捉刀代筆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內部的《情況彙編》上。2月15日，《解放軍報》被迫刊登以部隊幹部戰士名義寫的文章〈這樣介紹「體會」對嗎？〉和公開作自我批評的編者按。此後，江青等人又抓住《解放軍報》2月27日題為〈不為個人謀特權，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通訊大動干戈，並指使人到報社張貼大字報，聲討《解放軍報》「個別人」干擾「批林批孔」大方向。張春橋、王洪文召集《解放軍報》領導和群眾代表，聽取關於「批林批孔」情況匯報。張、王二人在會上利用插話的形式，態度鮮明地支持報社的造反派，訓斥不合他們胃口的群眾代表，對報社領導打棍子。在聽取匯報中，張春橋插話說：「我們幾個人商量過，可不可以採取你們自己的稿子不用，完全用新華社的怎麼樣？」於是，《解放軍報》被迫從3月12日起，停發自己稿件178天。

批林批孔運動的第三個惡果，是嚴重衝擊了生產建設領域，從1972年以來稍有好轉的經濟形勢又瀕臨動亂的邊緣。首先，是鐵路和港口運輸受到嚴重影響。鐵路運輸方面，由於派性鬥爭造成很多路段運輸阻塞，所通過的列車比正常情況少三分之一左右。鐵路貨運量1至5月欠運2100萬噸，比上年同期下降2.5%。全國二十個鐵路局有十三個未完成計劃；徐州、長沙、包頭、貴陽等重要區段經常阻塞，

致使津浦、京廣、京包、貴昆四條重要幹線的列車不能暢通，嚴重影響了全國的貨物運輸。山西、河南的煤炭和其他物資不能及時外運，導致一些大中城市、工業基地和市場用煤告急。港口運輸方面，外輪和中國遠洋輪船停港待裝待卸時間不斷延長，壓船經常保持在二百五十艘左右，其中等待裝卸超過一個月的船有四十多艘，最長的甚至超過一百天。外商索賠金額大量增加，外貿租船租金損失數額巨大。其次，交通運輸的嚴峻形勢，使許多企業原料、燃料供應告急，煤炭庫存下降，多數工業產品沒有完成季度計劃。國家計委預計第一季度欠產情況是：鋼83萬噸，原煤245萬噸，洗煤93萬噸，化肥83萬噸，鐵路貨運量800萬噸。

6月18日，國家計委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當前工農業生產趨於惡化的情況中指出：工業方面，1974年上半年工業生產不少地區和部門沒完成國家計劃。「主要問題是煤炭和鐵路運輸情況不好，鋼鐵、化肥等產品和一些軍工產品也欠賬較多，對整個國民經濟和戰備影響較大」。1至5月累計，全國重點煤礦欠產835萬噸，煤炭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鋼欠產188萬噸，比上年同期下降9.4%；二十五個重點鋼鐵企業中，武鋼、包鋼、太鋼等十二個企業欠產較多。化肥欠產185萬噸，比上年同期下降3.7%。煤炭減產，影響了整個工業生產和市場供應，造成不少企業停產和半停產。財政收支方面，1至5月全國財政收支與上年同期相比，收入減少5億元，支出增加25億元。國家計委匯報認為：後幾個月如不積極地把煤炭，把整個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抓上去，勢必會影響抓農業，影響基本建設和戰備，影響財政收入平衡和市場供應。

如果說批林批孔運動在中央折射出的鬥爭，還是人物在各種詭秘事件之間旁敲側擊的話，那麼在地方，已經赤裸裸地表現出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積累尖銳矛盾的一個爆發。1969年以後，地方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等鞏固秩序的政治運動中，遭到排斥和打擊，軍隊幹部獨掌大權。1971年林彪事件後，在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活動中，一批有問題的軍隊幹部倒台，一批地方幹部復出，和與林彪集團無關係的軍隊幹部聯合掌權，造反派繼續受到壓

制。待到批林批孔運動，風向大變，開始批判極右實質，堅持文化大革命一派對抵制文化大革命一派發起反擊，即所謂「反復辟」、「反回潮」，軍隊和地方幹部又處於下風。批極右—糾左—再批極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就是這樣搖搖擺擺地在惡性循環軌道上滾動。與其說是堅持「繼續革命」，不如說是欲罷不能的走馬燈。

所幸的是，毛澤東已經沒有了發動「文革」時的萬丈雄心，也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部分錯誤有所警戒。中央領導層也再不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組一手遮天狀況。毛澤東只想把運動限制在意識形態領域。在他的同意下，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多次召開會議，發出一系列的文件，採取了各種措施對混亂局面加以控制。主要有四個方面：不准成立群眾組織進行串聯造反，解散造反派控制的「雙批」領導小組、民兵、工會等機構；要求堅守生產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努力組織力量維持經濟運行機制；禁止突擊入黨和提幹，召集動亂地區領導幹部和群眾組織頭目到北京辦學習班，調整地區領導班子。貌似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僅僅進行了不到一年，就匆匆收場。

1974年4月4日，國務院、中央軍委轉發交通部、外貿部〈關於扭轉當前港口嚴重壓船情況的請示報告〉，決定組織突擊裝卸和疏運，建議將在港外輪和遠洋輪壓縮到170艘以下。遵照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支援地方港口緊急疏運的指示，解放軍出動了大量人力，如海軍北海艦隊曾出動2.8萬多人次，到青島港口裝卸鋼材、化肥等物資6062噸。經過突擊，6月末在港船舶減少到180餘艘。但這種略有好轉的局面只是暫時的，一段時間後，壓船又逐漸增多。

4月10日，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通知〉對批林批孔運動的政策作了具體的規定，主要內容是：(1)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對已經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一類組織，各級黨委應做好工作，勸他們回本單位參加批林批孔；(2)已經回部隊的三支兩軍人員，不再回

支左單位參加運動。如果對他們有批評意見，可以送到所在部隊的領導機關。部隊各級黨委和被批評的同志對人民群眾的批評應當表示歡迎，認真妥善地處理；(3)要歡迎群眾聯繫本地區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實際所提出的批評。有極少數領導幹部，不批林，不批孔，捂蓋子，怕群眾，甚至採取惡劣手段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煽動經濟主義，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完全錯誤的。對階級敵人的破壞，要提高警惕。中央希望各級黨委認真加強領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使運動進一步開展起來。

這個文件規定運動在黨委領導下進行，不許成立群眾組織和串聯，使運動不擴大為1966至1969年的「踢開黨委鬧革命」和全面內戰，對限制批林批孔運動造成的混亂局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4月5日至15日，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國家計委在北京召開十五省、市「抓革命、促生產」座談會，生產形勢較好的省、市以及國務院十個部委的負責人參加。針對煤炭欠產、交通運輸不暢、沿海港口壓船以及由此影響到多數工業產品完不成計劃的局面，會議研究了將煤炭、鋼鐵、運輸抓上去的措施。

李先念、華國鋒在座談會講話解釋了剛發出的中央文件精神，在肯定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他們指出：有的地方鬧經濟主義總是不行吧。正確的不堅持，錯誤的去迎合，這不叫領導。有個工廠有些人要求增加工資，去找黨委書記，黨委書記就帶着他們去造勞資科的反。這怎麼算黨的領導？武漢有個銀行，還是個很小的銀行，他們對鬧經濟主義的就是不給開支，頂得好。中央打電話支持這個銀行。你不合理，鬧經濟主義，就是不該發嘛！有極少數幹部挑動群眾鬥群眾，不批林，不批孔，又不聯繫實際，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煽動經濟主義，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個縣委書記就是這種人，跑了四個月，每月拿工資，煽動經濟主義妖風，北京就有他的聯絡站。還有一種情況，運動來了，幹部病號特別多，有的運動一來就擱擔子。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行嗎？要表揚好的同志，好的幹部是多數。棗莊有個魏莊煤礦領導幹部一直堅持指揮生產，像這樣的班子和幹部要表揚，要提拔。對少數極端惡劣的要執行紀律。各級領導幹部要站在運動前

列，大膽領導運動，如果壓群眾，捂蓋子，就會犯錯誤。如果跟在群眾後面跑，有人鬧經濟主義，人家一說增加工資，你說行，就領他們到勞資科那裏去，你非犯錯誤不可。

5月18日，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主要內容是：(1) 幾個月來的運動，衝破了種種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擾，群眾已經發動起來，正在深入發展。當前，要注意掌握黨的政策，注意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利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2) 在運動中，廣大群眾揭發批判了許多同林彪反黨集團有關的人和事，這是完全必要的。繼續把這方面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領導上必須注意清查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中央希望在林彪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是已經交代了問題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將功補過。也希望那些隱瞞了某些問題的同志，把問題講清楚。凡屬好人犯錯誤，都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各級黨組織應當為這些同志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改正錯誤的機會。(3) 確定陸、海、空軍的軍（省軍區、警備區、科研單位、軍事院校不含，野戰軍含）以下領導機關和部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一律堅持正面教育。這樣做，有利於集中力量把軍以上單位的運動較快地搞好。

這個〈通知〉明確了揭發批判同林彪反黨集團有關的人和事，必須是1971年毛澤東南巡以後的，避免了對「文革」前期老賬的無休止糾纏；又規定軍以下不搞「四大」運動，保持了軍隊的穩定。

從5月開始，中央責成李先念、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錫聯等人負責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已經出現的「老大難」地區和單位的問題。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從中央國家機關抽調了十幾人，組成解決「老大難」問題聯絡組，任務主要是解決「批林批孔」亂套了的一些地區和單位的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把省裏的領導幹部、各派的頭頭以及「老大難」單位的各方代表集中到北京辦學習班，由中央領導人出面，直接解決問題。

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國家計委6月18日匯報工農業生產情況後，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通知〉指出，當前國家經濟中突出的薄弱環節，一個是煤，一個是鐵路運輸。實際情況是：1至5月，全國重點煤礦共欠產煤炭835萬噸。山東、安徽、江蘇的部分煤礦出現大範圍停產，造成華東地區供煤緊張。上海的存煤不足，嚴重威脅着這個全國最大城市的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由於鐵路系統出現了違反中央規定、跨地區跨行業的「聯絡站」一類的組織，一些人不上班、拉山頭、打派仗，圍攻批鬥堅持領導生產的幹部，使得全國鐵路在前5個月欠運貨物2100萬噸。〈通知〉指出目前嚴重的問題是：運動一來，有少數領導幹部又不是積極的站在運動的前面，領導好批林批孔，糾正錯誤，落實政策。許多人有錯不認錯，使矛盾激化。有少數領導害怕群眾，不打自倒，一轟就跑；擅離職守，放棄領導；甚至躺倒不幹，有少數領導幹部，不堅持原則，違反黨的政策，隨意表態，造成了思想混亂，影響了群眾的團結。還有少數的領導幹部，捂蓋子，保自己；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煽動經濟主義，以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

〈通知〉規定：(1)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要作認真的自我批評，承擔責任，取得群眾諒解。同時也教育群眾和幹部，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不准抓人打人。(2)凡是擅離職守的領導幹部，半個月內必須返回工作崗位。逾期不歸的，停發工資。情節嚴重的，要經過群眾討論，給予必要的紀律處分，直至撤消他們的職務。其他擅自離開生產和工作崗位的人員，要動員他們迅速回到本單位，經過說服教育仍然不回來的，也要按照曠工處理。(3)對於群眾中提出的有關勞動工資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放到運動的後期，經過調查研究，具體分析後，統籌解決。(4)那種不作階級分析，籠統地講甚麼「只要造領導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說法，是錯誤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勞動，繼續搞跨地區、跨行業的串連，拉山頭，打內戰，還把這種行為說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動，這是對反潮流的嚴重歪曲。還有人散布甚麼「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謬論，公然煽動停工、停產，對於這些錯誤言

論，必須給予批駁。對於幕後操縱者，要發動群眾揭發批判。(5)堅決打擊破壞批林批孔、破壞工農業生產、破壞交通運輸的階級敵人，盜竊欺詐犯、殺人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貪污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6)要就地鬧革命，嚴格遵守勞動紀律。各地的黨組織和各地的報紙、刊物和廣播，都要表揚這些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促進了生產的模範人物。(7)認真檢查一次國家經濟各項計劃的執行情況，發動廣大幹部和群眾，訂出增產節約的有效實施計劃。

這個〈通知〉用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強硬的口氣和措施，直接否定了在「反潮流」口號下掀起的新造反活動，強調對違反紀律反潮流的人要堅決處理。說明各地失控的混亂形勢，已經引起了除了江青集團之外從毛澤東到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極大擔憂。由這個文件發出起，批林批孔運動開始逐漸回收，江青集團利用這一運動重登權力頂峰的活動開始走下坡路。

1974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後來，毛澤東又說：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這些話語裏，除了再次重申從九大以來的安定團結願望外，也流露出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厭倦和疲憊。

2 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

批林批孔運動之所以沒有最後發展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起了變化，是個重要原因。從文化大革命發動開始，江青和毛澤東已經不住在一起。據張玉鳳回憶，1972年以前，特別是林彪事件期間，毛澤東與江青的來往見面比較經常，談話時間也比較長。從1972年起，毛澤東開始對江青發了幾次脾氣，規定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隨便到他的住處來，來了工作人員要阻擋。從這以後，江青來見毛澤東的次數減少了，出來後笑容滿面的樣子也沒有了，往

往低着頭匆匆離開。到了1973年，江青見毛澤東的機會就更少了，幾次打電話要見，毛總是推託。江青只好通過信件或者遲群、謝靜宜、王海容、唐聞生轉告。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變化？我們在後面說到「紅都女皇」之謎時再分析。先敘述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江青多次提出的批評。

江青召開的1974年1月24、25日中央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據張玉鳳回憶，確實事先沒有報告毛澤東。遲群、謝靜宜的會上講話，毛澤東也不知道。會後，王海容、唐聞生對毛澤東說起了這兩次大會的情況，毛澤東很不滿意，指示大會的講話錄音不要放。張玉鳳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說，有的省已經發了，不過我馬上通知他們不放錄音，沒發的就不發了。毛澤東還讓把大會的錄音要一套來聽，但錄音帶要來以後，他始終沒有聽。此後毛澤東很久不見謝靜宜。謝託王海容、唐聞生捎話給毛澤東說，她有錯誤可以批評她，不見她，她有些難過。王海容、唐聞生建議毛澤東見見謝，毛澤東卻堅持過一段時間再說。[64]

2月6日，江青把遲群等反映批林批孔的材料轉送毛澤東，請求見面，毛澤東批示：「除少數外大都未看。近日體溫升高兩度，是一場大病！一切人不見，現在恢復中。你有事應找政治局。」[65]

毛澤東為何如此生氣？這與江青等人擅自召開大會亂講話和遲、謝不聽他指揮投靠江有關。歸納起來，這兩次大會上，主題是批林批孔，但這是抽象的。孔子是幾千年前的古人，林也死了，究竟他們的思想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聯繫哪些實際。江青、謝靜宜、遲群等人講話四面出擊，矛頭十分混亂。大致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1、批走後門的不正之風。這是針對葉劍英和一批軍隊幹部讓子女當兵及上大學、進入外交部門等。江青在大會上公開點了葉劍英的名字，說要他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的女兒「響應號召，到下面去勞

64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65 毛澤東1974年2月9日給江青的回信。

動改造」。[66]葉端坐台上，一聲不響。不久，葉的女兒葉文珊被送到福建一個農場勞動。

2、批軍隊中的壓制批林批孔。主要針對李德生主管的總政治部。

3、批不抓大事。前面已經說過，這是去年針對周恩來的，現在只能算是餘波。

4、批教育戰線的「復辟回潮」。如馬振扶中學事件、考教授事件等。

5、批外事交往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如電影《中國》事件、「黑畫」事件、「無標題音樂」事件等。

批「走後門」是江青集團的重點。1月30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聯繫實際批林批孔，再次點名指摘葉劍英「走後門」，送子女當兵。當天晚上，葉劍英向毛澤東寫出檢查信，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感謝江青同志的提醒和督促，請放心」。

然而，毛澤東卻不這樣認為。2月15日，他對葉信做出批示：

> 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67]

毛澤東還把這種情況說成是「三箭齊發」，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他反對批「走後門」是兩個理由。第一，走後門來的也有好人。以後毛澤東對王海容、唐聞生說：走後門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得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毛澤東說的那幾個女孩子，指的是浙江文工團的幾個演員，毛澤東在

66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425。

6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77。

杭州休養時，要她們去工廠當工人。她們當了五年工人後，向毛提出上大學。1973年，毛通過謝靜宜把她們送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成了工農兵學員。同樣的還有廬山賓館的女服務員，到了哲學系。嚴格地說，這些人與毛非親非故，在當時入學取消考試、完全靠選拔推薦的時代，完全可以說成是工作需要。毛澤東的真正擔憂，是怕江青一夥離開他的部署亂搞一套，「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

2月16日下午，周恩來約遲群、謝靜宜談話，明確指出：毛主席講的「形而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之後，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批示。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出通知，提出：

>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少單位提出了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討論了這個問題。中央認為，對來自群眾的批評，領導幹部首先應當表示歡迎。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當前，批林批孔剛剛展開，又夾着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認為，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68]

張春橋諷刺地說：葉劍英「用檢討辦法來告狀，這也是一大發明」。[69]

如前所述，毛澤東對批林聯繫批孔早有安排。江青是直到謝、遲編出第一份林彪尊孔材料，為討好江青也送給她時，才插手進來。毛澤東與江青的批林批孔目的，是有着區別的。他的本意，是想通過遲群、謝靜宜直接控制領導這場運動，恢復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擁戴，

68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9 范碩等：《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頁623。

同時一澆長期被尊孔的傳統知識分子看不起、被林彪集團〈「五七一工程」紀要〉罵為秦始皇的心中塊壘，順帶也清查一下軍隊中與林彪有牽連的將領的真實情況。搞哪些人，搞到甚麼程度，他是有考慮的。毛澤東雖然在1973年冬季通過外交領域對周恩來進行了批評，但他並不想打倒周恩來，並不想全國再度出現「文革」頭三年的大亂。何況經過所謂「幫周會議」，周恩來已經筋疲力竭、重病纏身，無須再搞一場針對他的群眾運動。不料江青到處出風頭，搶先給各地送信和材料，準備利用這場運動，打擊周恩來和以鄧小平為首的復出老幹部，改變九大以後江青集團逐漸失去實際權力的狀況。他們的目標，就是攻擊軍隊將領和老幹部，影射周恩來，讓地方造反派重新掌權。這種破壞平衡結構的後果，是毛澤東不願看到的。

江青為此2月18日向毛澤東寫出檢查，說「我做蠢事，對不起主席！」「今後當努力學習，克服形而上學、片面性。」[70]此後，她又不斷提出要見毛澤東。3月20日，毛澤東寫信給她說：

> 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禮該。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6月，江青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她在天津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毛澤東看過後，24日冷漠地批示，要她在基層「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群眾生活了」。[71]

與毛澤東的態度變化相呼應，中央的風向也開始轉變，最重要的標誌是毛澤東批評江青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四人幫」小宗派活動。

70　江青1974年2月18日給毛澤東的信。

71　毛澤東1974年6月24日給江青的信。

7月中旬，毛澤東要到南方去住一段時間，考慮走前給中央政治局一個交代。7月17日下午3時，毛澤東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到中南海他的住地游泳池開會，剛做完手術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會上，毛澤東批評了江青擅自召開中央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和到處送材料，要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對江：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兩個工廠不要了吧。

江笑着回答：不要了。鋼鐵工廠送給小平同志吧。

毛：當眾說的！

江：說了算！

毛：孔老二講的，言必信，行必果。（又對眾人）聽到沒有？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江：不大好就改。

毛：你也是難改呢。

江：我現在鋼鐵工廠不開了。

毛：不要就好。

江：帽子店，就是有一個電影叫《中國》，太壞了，但是漢奸帽子還沒有戴，因為還弄不清楚是誰搞的。我一定特別注意，主席放心。[72]

聽着兩人的對話，政治局委員們都不作聲。毛澤東說：「他們都不吭聲呢。」周恩來於是替江青辯解說：「有些也是我們搞出來的。1月25日的大會上，我把江青同志的信都唸了，當然大家就比較注意

72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了。」毛指着江說：「此人一觸即跳。」江卻往周身上一推：「沒有跳。我本來不想去，後來總理說大家都要去，我沒有辦法，才去的。」毛澤東說：「我講你的脾氣。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指着紀登奎：「現在登奎也搬進來了。」她指的是紀搬進釣魚台住。毛澤東再次說：「你那裏當心，不要變成五人了。」

當晚，毛澤東乘坐專列前往武漢。

這次談話後來被公認為著名的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但無論從語氣還是內容，都說不上嚴厲。顯然，毛澤東這時候還並不認為四人小宗派是多大的事，也沒有根本否定江青到處送材料的做法，只說她不代表我，「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但是，這一系列對江青的批評，畢竟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對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漸生厭惡。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們見到的毛澤東批評江青，僅有1967年1月的一次，批評她「眼高手低」、「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引者註：指江青策劃讓陳伯達打倒陶鑄）」。當時的批評雖然言辭激烈，但實際上卻默認了江青的做法，而且很快矛頭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去針對「二月逆流」了。

1972年後毛澤東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感情變化？顯然不是因為江青的政治態度和行為。因為正是在這以後，他還認可了江青批判周恩來和批林批孔的做法。那麼，只能從江青個人方面去找原因。雖然至今我們沒有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明，但「紅都女皇」事件也許是一個解釋。

3 「紅都女皇」之謎

1972年7月19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女教師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應中國對外友協邀請來到中國，要了解中國婦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她們的貢獻。

據維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73]一書中說，是中國駐外機構建議她「為甚麼不考慮研究年輕的婦女同志，特別是那些近幾年提拔到中央委員會的女同志？還問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給北京寫一封信，說我請求訪問中國，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後來她接到電話說：「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政府處理與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事務的機構）已經邀請我在夏天方便的時候，以個人的名義訪問中國，它將承擔我在中國期間的所有費用。」

在北京，維特克順利地採訪到了鄧穎超、康克清等人。對外友協將報告呈送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74]

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受了維特克的採訪。陪同江青的還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張穎女士等人。江青十分興奮地說了很多關於自己個人歷史的內容，表現出希望維特克為她寫傳的強烈慾望：

> 關於我個人的歷史，我的革命鬥爭史，我都可以對你談。唔，還有不少羅曼蒂克的意思呢。
>
> 我們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給你說，你來寫，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國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他在30年代寫過毛澤東，寫中國共產黨，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很年輕，很有才華。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

維特克受寵若驚，立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江青還宴請維氏並到北京護國寺人民劇場觀看樣板戲《紅燈記》。當天一直談到晚上11時。江青還與維特克約定，在廣州繼續進行採訪。

---

73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20.

74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20。

陪同江青接待採訪的張穎等人認為江青所談內容嚴重出格，時間也過長，向外交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無可奈何。周恩來也十分傷腦筋，8月17、19、24日，連續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維特克人員開會、商議對策。針對江青要談解放戰爭歷史的打算，周恩來對張穎說：「不要談甚麼戰爭。你到廣州以後把我的意見立即轉告江青同志，只談文藝。再見一次就夠了。」還表示要維特克按期在28日回美國，不要再延期了。周恩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來阻止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聽勸告，執意要談，8月25日派專機把維特克接到廣州。在總計長達六十多小時的六次採訪中，江青幾乎毫無保留地向維特克講述了自己的歷史，吹噓自己在陝北和毛澤東一起指揮解放戰爭，並且把抗美援朝戰爭等軍事地圖和中央有關部門的內部文件提供給維特克使用、要翻譯和接待人員把全部錄音整理成文字送給維特克寫傳用。

江青在談話中還津津有味地說起了毛澤東與賀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風波，刻薄地挖苦抨擊賀：

> 我聽說你看過關於我和毛主席結婚的事，那是假的，說甚麼中央有個決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當時是有人反對的，項英就反對，他甚至打了個電報。……毛主席回電說，「我學孫中山」。
>
> 實際上賀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兩歲，是她要求離婚的，我不願和你講這個。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後毛主席給她寫了一封信勸她回來。其實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比如我們打下一個城市，她馬上就要進去，毛主席不願意。……你書裏不要寫這些。她甚麼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讓她給他剪報都不幹。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後她不要，給老百姓，現在我們有她生的一個女兒。是我把她從農民家裏揀回來的。她要求去蘇聯，讓她去了，那正是衛國戰爭時期，非常艱苦。她打孩子，蘇聯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為她瘋了，把她關起來了。她本來有個男孩，毛主席很喜歡，她也丟了。毛主席說，她

連一個孩子都不給我留。（維特克：賀子珍的女兒叫李敏嗎？）是的，她隨我的姓。

說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還細聲細氣地哼起了上海小調：「我呀我的小妹妹哩，捨呀捨不得離……咿呵呀呵唉……哈哈，哈哈。」江青嬌笑著說：「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數出名字來，他們還使用各種手段哩。以後都成了知名人士，現在又被打倒了。哈哈，還是不說他們吧。有趣的一次，是你們美國人，是一個水兵，也許是喝醉酒了，搖搖擺擺在上海外灘走著，向我迎面走來，他站在我面前，擋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個軍禮：兩腳一並，咔嚓一聲。我回頭想走開，那傢伙嬉皮笑臉向我走近來，雙手也伸過來了，哼，想佔便宜！我抬手就給他一巴掌。他還是笑嘻，又是咔嚓一聲，敬了個軍禮，還說對不起呢。你們美國人，還是懂禮貌的……[75]

整理談話記錄的張穎覺得江青的話實在不堪入耳，就刪去了有關賀子珍的一些內容。江青發現後大發脾氣，後一想這些話由自己口中說出確實有損形象，竟然要張穎寫成是張在延安聽說的，被張拒絕。

十幾萬字談話記錄整理好後，分送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審閱。張、姚一字未改，退給江青。周恩來閱改後認為問題太多，不宜外送，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周在電話中對江說：「關於你個人歷史部分，已經送給維特克女士了。最近送來這些，過於龐雜，涉及面很廣，一時也難予核對，是否可以不給或少給呢？」江青說：「這怎麼可以，這裏要講個國際信譽嘛。」年底，周恩來召集有關接待人

75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頁22、23、54、55、56。

員會議，宣布：已經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記錄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76]

此事到此已經基本結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寫了一本《紅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陸後，社會上傳說就是維特克利用採訪寫的，引起了軒然大波。實際上，維特克寫的書1977年才出版，名為《江青同志》。這時候江青已經入獄。

王年一文章認為，《紅都女皇》這本書出版和林彪軍人集團有極大的關係。

1969年5月17日，江青把黃、吳、李、邱和姚文元、李德生找來，談了一個上午，攻擊周恩來，大吹毛澤東在延安如何追求她。說甚麼未婚以前，毛澤東每天下午都騎着馬去找她，一同趟過延河水閒遊。黃、吳、李、邱聽後十分反感，回來報告林彪，林要他們立即報告毛澤東。但毛聽後並無反應，卻要他們保密。隨後黃、吳、李、邱又報告了周恩來。[77]

王年一文章認為，這是第一次涉及毛澤東婚姻家庭這個敏感問題，而且又是江青與維特克談話之前的惟一次洩露。這次洩露得知內情的只有林彪和周恩來。周絕對不會借此向江青發難，這不符合周恩來一生的政治風格。因而，結論應是，黃、吳、李、邱遭拘捕後，軍隊有知情人將江青的歷史洩露出去，進行報復。[78]

《紅都女皇》事件當時在社會上不脛而走，沸沸揚揚。但中央是否有處理，始終是個謎。

研究「文革」的權威專家、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教授范碩少將在他的著作《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中記載說：後來中央決定，讓一位外交人員不惜用巨金買下版權，把這本書送回國內。毛澤東看了後非常氣憤，揮筆寫道：「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撤出政治局，分道揚

76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頁163。

77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753－756。

78　王年一、吳潤生：〈《紅都女皇》究竟洩了甚麼密〉，《老年教育》，2002年7期。

鏢。」范書還說，周恩來看到毛澤東不過是在氣頭上，並沒有下定處理江青的決心，只好「暫緩執行」。[79]這一批示後來被其他一些著作轉引，范氏堅持自己曾經看到過毛的批示。但是《周恩來年譜》等書中並無隻字。

此事在中國引起了大風波，是毫無疑問的。有以下的幾段記載：

張穎1973年到加拿大任政務參贊，年底聽國內來的代表團有人說，「現在國內正鬧着《紅都女皇》，為這江青還挨了批評。又說美國有個女記者採訪江青後寫了這本書，現在全國都在追查謠言甚麼的。」張告訴他，「據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可能是一個女華人寫的，吹捧江青，說江青將要成為一個女皇了。但這與維特克採訪江青完全是兩回事。」1974年秋末，張穎回國，了解到「全國追查謠言的事還沒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確實是維特克與江青的談話內容」。她從外交部有關人聽到一種說法：不知道是誰把江青與維談話中有關《紅樓夢》部分傳抄出去，恰恰《紅都女皇》也傳開了。可能是江青怕把兩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尤其令我吃驚的是，我們當時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記錄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這時候，張去看望葉劍英，葉忽然轉變話題問：「江青和維特克那次事情怎樣結束的？」張告訴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記錄材料都搬走，而且燒燬了。葉只自語說：「這事有蹊蹺。」[80]由此看來，這時在中央還沒有就江青見維特克一事做出正式處理，至少在政治局範圍沒有，因為連葉也不知道詳情。據筆者所知，許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文革」後也表示不知道毛澤東對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記載認為當時中央確實有強烈反應。朱德的孫子在回憶錄中說：

---

79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頁562。

80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頁164、165、167。

有一天，爺爺的秘書送來一封給爺爺的信，打開一看，是反映江青問題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經接見過一位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談了一個星期，吹噓自己，於是，就有了根據維特克這次採訪出版的書《紅都女皇》，在世界上影響很不好。

爺爺看了信，感到問題性質嚴重，江青胡亂說話，影響竟然跑到國外去了。因為她是主席夫人，頤指氣使，誰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問題反映到這裏來。爺爺覺得不能把問題壓下來，就劃了圈，寫了：此事重大，須慎重處理，並報送主席。

據說，毛澤東看了《紅都女皇》，氣憤難抑，寫了對江青的批示「分道揚鑣，攆出政治局……」[81]

此說雖然把《紅都女皇》與維特克採訪混為一談，但確也說明中央領導人中當時有人反映此事。購買維特克版權一事，也有雪泥鴻爪可尋。

粉碎「四人幫」一周後的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葉劍英等接見上海馬天水等人時，華國鋒在講話中歷數江青罪狀曾說：

江青和美國女作家維特克談話，談了六次，貶低主席，內容下流。「四人幫」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說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張穎又受到葉劍英召見，要她把當時的記錄與情況整理出來。外交部領導成立張穎負責的材料小組，宣布「現

81　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257。

在部裏有責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審查江青一夥的組織，把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經過情況整理出來」。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見了張穎等人。據張穎回憶，以後還有一些傳言：周恩來為避免維特克書出版的不良影響，令中國駐聯合國有關人員，用高價收買維特克版權，使之不能流傳，[82]張認為「據我當時所知絕無此事」。更為離奇的是，1992年張接到美國友人陳香梅寄來的美國中文《時報周刊》，刊載文章稱通過採訪維特克，了解到內幕是：周恩來利用江青好出風頭的特點，刻意安排了維採訪江青，並讓親信張穎陪同，據此寫成《紅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後周轉呈毛澤東，激怒了他，從而使毛、江疏遠……。[83]這種說法當然是荒誕至極的，為人謹慎的周決不會出此下策。

綜上所述，我們雖然不能完全解開《紅都女皇》之謎，但也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維特克採訪時說了很多極不得體的話，特別是有關毛澤東在延安的私生活，影響很壞。但當時因為記錄稿沒有傳出去，並沒有立即產生風波。而1973年以後香港《紅都女皇》的出版，成為導火索，中央有人聯繫起來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至於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批示，為甚麼沒有在粉碎「四人幫」時作為最有力的尚方寶劍公布？仍然是個謎。

儘管如此，可以想見，當毛看到江青的信口開河、肆無忌憚談話記錄，並聯繫起《紅都女皇》的惡劣影響，心中肯定怒火中燒。毛澤東過去就對江青的作風和為人頗多不滿，只是由於晚年發動「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用支持江青和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後期，這種需要逐漸淡化，僅僅成為維護一種形象了。因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圖騰，無法割裂。這也許能夠成為從1972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與之疏遠，但又不能下決心予以處置的一個解釋。

---

82 事實上，《江青同志》這部很有趣味的書，最近在境外才有中文版。余汝信：《維特克訪華與《江青同志》》一文對此提出惋惜。

83 張穎：《江青與「紅都女皇」事件》，鳳凰衛視「口述歷史」，2005年9月12日。

第六章
圍繞四屆全國人大的鬥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憲法規定每隔五年召開一屆。從1954年第一屆到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都按時召開。然而，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風暴鋪天蓋地而來。7月7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改期召開。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從此就不再舉行。幾年中，各級政府被奪權，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污衊打倒，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被誣陷打擊，國家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周恩來勉力撐持和領導的國務院，實際上起到了維持和代行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部分政務活動的作用。

中共九大以後，毛澤東準備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狀態。1970年3月7日，他向中央建議，準備修改憲法，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同時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然而，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第四屆全國人大，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環境下，從1970年到1975年，竟然歷經四次提出，三次夭折，歷經三場風波和五年艱辛，才得以召開。圍繞第四屆全國人大的鬥爭，成為「文革」後期政治鬥爭的一條主線。

一 組閣之爭與「總理還是總理」

1 三次夭折的四屆人大與新的權力再分配鬥爭

1970年3月7日，毛澤東在武漢提出籌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的意見，周恩來深知，這是一個使國家走向正軌的時機，立即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緊張的組織和籌劃工作去。3月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商定：由他為首的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工作；他和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稿；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負責修改憲法工作。3月13日，他主持擬定的關於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的決定、名額分配的兩個方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的工作也在準備中。

但是，修改憲法工作卻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文革」前期沆瀣一氣的林彪、江青兩個野心家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逐漸激化，焦點在於是否設國家主席，是否寫進林彪首創的幾段個人崇拜語言（即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所寫的「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等）。四屆人大，被他們認為是一個國家權力再分配的機會。從4月到8月，這場爭鬥愈演愈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陳伯達掀起了一場風波，造成了分裂黨的局勢，毛澤東不得不寫出〈我的一點意見〉予以痛斥，鬥爭的中心由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爭權奪利轉向挫敗林彪集團分裂陰謀、維護黨和國家穩定。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中央工作重心轉為「批陳整風」，實際上針對林彪集團進行批判。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工作暫時被擱置起來。這是第一次提出和夭折。

將近一年之後，1971年8月12日，毛澤東又向周恩來提出國慶節後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設想。籌備工作重新提上議程。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張春橋和不屬於林彪江青集團、協助周恩來工作的李德生、紀登奎組成籌備小組。8月31日，周恩來在起草的政

府工作報告稿第二部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今後任務」中，再度提出了「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目標，並在「四五計劃」的設想中具體寫為「要求一個適應戰備的合理布局」，「一個穩固的農業基礎」，「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業」，「一個比較發達的交通網」，「一個城鄉交通、內外交流的商業網」，「一個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理論」。[1]9月10日，周恩來寫信告訴在南方的毛澤東說，政府工作報告「已寫出初稿」，再用十天可改好送審。

然而，林彪集團獲悉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點名批評林彪，認為四屆人大將要解決他們的問題，十分驚恐，決心鋌而走險，發動武裝政變。9月12日晚10時，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修改在全國人大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稿，突然接到電話，報告林彪一夥準備出逃。以後，得到了林彪一夥機毀人亡的報告。林彪事件的發生，使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相當多的地方領導人被審查和清除。在召開新的中共代表大會、大幅度調整中央和地方領導結構之前，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工作又再次被擱置起來。這是第二次提出和夭折。

將近兩年之後，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中宣布：「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四屆全國人大工作第三次提到日程上來。

9月12日，周恩來與新提拔到毛澤東接班人位置的王洪文向毛澤東匯報了籌備四屆人大的情況。當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商定：發出中央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選擇幾個重點單位進行修改憲法草案工作；成立以王洪文為首的組織工作小組，康生、張春橋為首的憲法修改小組，周恩來為首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三個小組的工作，均需在10月5日前完成。1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說：「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五六天就能解決問題。」[2]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78。

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21。

然而，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進行的一系列糾「左」努力，引起了江青集團的驚恐。他們極力阻撓破壞，又利用各種機會向毛澤東歪曲匯報。從11月起，中央政治局舉行「幫周會議」，對周恩來進行批評和批判。12月上旬，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講話，再次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工作。他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在這樣的形勢下，雖然周恩來主持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已基本通過，籌備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工作幾近完成，但也不可能繼續下去了。而江青集團不僅因為沒有能力，更因為他們的野心不斷暴露，缺少人望，也根本不可能取代周恩來進行這項工作。這是第三次提出和夭折。

四屆人大的三次被迫延遲召開，固然是林彪、江青集團破壞的惡果，但從另一方面說，也賦予了周恩來等人糾正「左」傾錯誤、調整人事安排的時間。

1970年3月，籌備四屆人大工作剛剛提到議程，為了抓住時機解放一批被打倒和衝擊的幹部及民主人士，周恩來特地致信毛澤東，提出：代表中非黨員不應少於百分之四十，愛國人士不應少於一百人，張聞天、王稼祥等均需安排。獲得毛澤東的同意。1971年9月6日，他在主持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稿時，專門談到了恢復已被「文革」破壞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他指出：統一戰線其實最廣泛，黨與非黨，黨外幫助整黨，不是沒有話可說。黨與非黨是最大的統一戰線，然後再說與其他階級的。[3]1973年冬，在準備參加四屆人大的黨外人士名單時，由於許多民主人士受到「文革」衝擊，原來的統戰幹部又大多被打倒，負責此事的中央統戰部軍代表不熟悉民主人士，因此只能提出十幾人來。周恩來特地指定要老幹部李金德和作過統戰工作、一度被「文革」打倒的童小鵬參加這項工作，並在會上點名要他們敢於發表意見。他們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根據毛澤東提出侯寶林、榮毅仁的意見，從文藝界、工商界反覆找出許多人，一一報周恩來、毛澤東批

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54、479。

准，終於從十幾個人增加到120多人，最後達到237人。雖然比第三屆人大還少了150人，但在當時環境下，已是十分不易。通過這種方式，使一些民主人士恢復了應有的地位。[4]1974年12月，在各類代表分配方案產生後，周恩來又寫信給中央政治局，提議增加老幹部和青年幹部、外事和體育方面的名額。

如果在1971年林彪集團徹底暴露之前就召開了四屆人大，大批老幹部仍然被排斥其外，這屆人大必然缺乏應有的權威，而且以後隨着林彪集團的被粉碎，其產生的機構勢必再度打亂。通過粉碎林彪集團的鬥爭，周恩來逐步掌握了糾「左」的主動權，進行了更大程度的落實政策努力。儘管江青集團還擁有較大權力，但是鄧小平等得以復出，大大增強了在籌備四屆人大過程中糾正部分「左」傾錯誤的黨和國家領導力量。

另一方面，江青集團也在努力培養扶植自己的新生力量進入中央和國家權力機構。王洪文主持的中央讀書班就是主要渠道。這個讀書班，是毛澤東在十大後提議成立的，原意是選調一批老幹部和「文革」中湧現的工農兵新幹部到北京，參加理論學習，提高領導水平。在王洪文把持下，經過中組部部長郭玉峰[5]的配合，讀書班成了批判老幹部、扶植安插江青集團親信的基地。由於長期被王洪文獨家控制，又涉及人事組織系統，因此中央讀書班在當時頗有些神秘感。

王洪文開始認真抓中央讀書班，是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1974年1月14日，由郭玉峰主持，王洪文在第二期中央讀書班做了一個「反右傾回潮」報告，要求對班裏「思想回潮」的人進行揭發批判。王洪文點名說：福州軍區兩個副司令員，像陳再道那樣的能不批嘛，他翻案；王建安對選拔青年幹部有意見，說是坐着火箭上來的；

4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38。

5　郭玉峰，1918年生，河北海興縣人，1938年加入中共，「文革」前為64軍政委。1967年到中組部任負責人。1975年任中組部部長。1977年12月被中央免職，1980年被隔離審查，開除黨籍。

雲南省委副書記郭超支持了右傾翻案風。這些人在讀書班中要聯繫思想檢查，不怕他跳起來。於是，讀書班組織了對他們的批判，還派金祖敏、孫玉國等帶隊去總政治部、總參謀部一些部門煽風點火，製造「反潮流」活動。

年中，四屆人大進入準備工作的前夕，王洪文開始大抓培養提拔新幹部。5月，根據他的要求，郭玉峰提出了一個擬調中央工作的二十五人名單。9月，又向王洪文提出一個擬任中央、國務院部委領導職務的四十二人年輕幹部名單。其中大部分是被江青集團看中認為可以重用的，如：

金祖敏：原為上海工人，時任十屆中央委員、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總工會副主任，擬任中國工會九大籌備組組長（正部級）；

謝靜宜：原為中央辦公廳機要員，時任十屆中央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團委第一書記，擬任全國共青團十大籌備組組長（正部級）；

孫健：原為天津工人，時任十屆候補中央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擬任中組部核心小組副組長（副部級）；

萬桂紅：原為上海工人，時任上海市團委書記，擬任中組部核心小組副組長（副部級）；

張世忠：原為北京工人，時任十屆候補中央委員、北京市總工會副主任，擬任中國工會九大籌備組副組長（副部級）；

李素文：原為瀋陽售貨員，時任十屆中央委員、遼寧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團委書記，擬任中國婦女四大籌備組副組長或組長（副或正部級）；

祝家耀：原為上海工人，時任十屆中央委員、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人，擬任公安部副部長（副部級）；

魏秉奎：原為鞍山工人，時任十屆中央委員，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總工會主任，鞍山市委書記，擬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副部級）；

姚連蔚：原為西安工人，時任十屆候補中央委員，陝西省總工會副主任，擬任五機部副部長（副部級）；

莊則棟：原為運動員，時任十屆中央委員，國家体委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擬任國家体委主任（部級）；

張維民：原為遼寧幹部，時任十屆中央委員，盤錦地委第二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擬任農林部副部長（副部級）；

周宏寶：原為上海工人，時任十屆中央委員、上海市民兵指揮小組成員，擬任衛生部副部長（副部級）。

……

在四十二人名單裏，工人佔一半以上，上海和遼寧的佔了三分之一，三十五歲以下的佔了百分之四十三。[6]王洪文親自把讀書班各組長找來說：「你們這些人來學習以後，不一定都回去了，要留在中央工作，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9月中旬，在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郭玉峰介紹了選調這些人的情況，鄧小平當即指出：這些人上來合適嗎？應慎重考慮考慮。把王洪文的計劃頂了回去。於是，王洪文又準備在籌備四屆全國人大時再安排。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出了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並要王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王洪文親筆寫下電話記錄：「誰當第一副總理？鄧。」[7]

在此之前，國務院副總理中是沒有第一副總理頭銜的。這是在醫院養病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並得到毛同意後才設立的，暗示着鄧成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地位。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再度囂張的江青集團，以為周恩來重病纏身，王洪文已經主持中央工作，召開四屆人大是他們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最好時機。但是，毛澤東提出要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使他們倍感意外和威脅。王洪文接到電話，搶先報告給江青，兩天後才告訴周恩

6　到粉碎「四人幫」為止，上述人中已經有二十一人調到中央和國家機關擔任了副部級以上領導職務，孫健、李素文、姚連蔚還任職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文革」後遭批人均被免除職務，多數被開除黨籍。

7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441。

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6日，周恩來約鄧小平談話交底。同日，江青即到醫院向周恩來提出了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想逼迫周恩來認可。周恩來以極大的耐心與她周旋了兩個小時，堅持不予表態。江青氣呼呼地向王洪文說：「我保留我提名的權利。」[8]

因為第一副總理已經毛澤東指定，爭論的焦點便是誰當總參謀長。本來，在中國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中，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固然地位重要，但在黨指揮槍原則下，也不是可以改變國家大局平衡的最主要支點。自1937年以來，譚勁光、滕代遠、葉劍英曾先後任軍委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屆總參謀長有：徐向前、聶榮臻、粟裕、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代）、黃永勝。由相當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軍方人物出任。

但是，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控制國務院、林彪控制軍隊、江青控制意識形態的三足鼎立狀態被打破，總參謀長一職一直空缺。周派和江派誰能控制總參謀長，誰就佔有上風。因此，文官體系的江青集團特別要拚命爭奪。

江青向周恩來提出的總參謀長人選是誰？過去是個謎。經過查考，出乎意料，既不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與江青有所接近的海軍政委蘇振華，也不是曾在東北與毛遠新關係密切的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而是被解放不久的楊成武。

江青為甚麼要提名楊？沒有可靠的資料能夠說明，這裏只進行一些分析推測。

其一，是本着只要鄧小平當不上、其他人都可以的原則來壓制鄧小平。事實上，長期被關押的楊成武1974年7月31日剛剛以參加建軍節紀念活動方式公開露面，距此時才兩個多月，即使他重新出山，總參謀長的權威自然要比鄧小平來擔任低得多，江青集團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

---

8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328。

其二，是為了平撫和拉攏被她迫害打倒的楊成武。1968年3月，正是林彪和江青集團聯手製造了「楊余傅事件」，打倒了當時炙手可熱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不僅使他飽受牢獄之苦，女兒還被迫害致死。江青也許是想用這個辦法來化解她與楊的關係。當然，這些只是江的一廂情願。楊在粉碎「四人幫」的關鍵時刻，是堅定站在華國鋒、葉劍英一邊的。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指出：「中央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根據國內外的大好形勢，中央認為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適宜的。」籌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第四次被提上議程。江青集團的組閣活動也加緊進行，製造了「風慶輪」事件發難。

2 「風慶輪事件」與王洪文長沙告狀

風慶輪是1973年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一艘遠洋貨輪，由上海江南造船廠為交通部上海遠洋運輸分公司承造。隨後，在上海遠洋運輸分公司的參與下，前後進行了輕載和重載試航。1974年5月4日奉命出航，把一萬多斤大米運送到羅馬尼亞，9月30日，風慶輪順利返回上海港。10月12日，《文匯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紅燈指航向，踏破萬層浪——歡呼「風慶號」萬噸輪遠航歸來〉，《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乘風破浪，勝利前進——從「風慶」輪首航遠洋歸來讚自力更生方針的偉大勝利〉。

歡呼的背後，醞釀着一場陰謀。1970年，周恩來曾指示要力爭在1975年基本改變租用外輪的局面。國家計委據此制定了1972至1974年利用外匯貸款買船、加快發展遠洋船隊的計劃，得到國務院批准。1974年3月8日，李先念曾經對船舶工業做出指示，在肯定自力更生方針的同時，指出「並不排除在有利條件下從國外適當購買一些船隻。因為我們現在的船舶太不夠了，每年花費的運費就要三億多美

元，數目太大。為了加強我國海上運輸的能力，適當購買一些船隻還是必要的。」[9]6月，王洪文就在一個報告上批示，說買船是「假洋鬼子」。8月，張春橋得知風慶輪已經到達羅馬尼亞，就嚴厲指摘《人民日報》為甚麼只把消息登在報縫裏，要求風慶輪「回來後要開排炮」，「進行大宣傳」，「因為這是路線問題」。

9月30日，風慶輪一到岸，被馬天水等派到船上擔任政委監視交通部派來幹部副政委李國堂、三副顧文廣的朱棟，就向《解放日報》記者遞交了材料，說：「請趕快轉交市委，是很重要的問題。」[10]《解放日報》立即發出簡報〈發生在風慶輪遠航途中的尖銳鬥爭：群眾來信揭發副政委李國堂的錯誤言行〉。馬天水等立即報送北京，姚文元看後批交新華社刊登在10月13日《國內動態清樣》上。

10月14日，江青批示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質問：「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國內動態清樣》有關風慶輪的報導後，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批示同意江青意見，張春橋還提出，「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進行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號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並「建議國務院抓住這個事件，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進行政治思想路線教育」。姚文元批示說：「根本問題是路線問題，李國堂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康生也批示說：「我長期以來感到交通部有問題，應該通過查處李國堂的問題，對交通部進行徹底檢查整頓。」

周恩來僅批示：「已閱。」毛澤東和鄧小平也只劃了圈。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例會。江青在會議快結束時，又提出風慶輪問題說：「李國堂是國務院交通部的一個副處長，你們別

---

9 蘇採青：〈圍繞「風慶輪問題」的一場鬥爭〉，未刊稿。

10 交通部遠洋局向全國交通戰線工業學大慶會議提交材料，1976年5月。

看他官不大，來頭可大呀。他有後台，我有證據，李國堂的後台就在國務院。」見鄧小平一言不發，江青質問說：「小平同志，總理住院後，國務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對這個問題是甚麼態度？」鄧小平仍然沉默。江青進一步發問：「你不講話不行，這件事，你是支持，還是反對，你要表明態度。你要向政治局講清楚。」

鄧小平回答：「我已經圈閱了。我還要調查，要調查。」江青又追問鄧小平對「洋奴哲學」抱甚麼態度？鄧小平忍無可忍地厲聲回答：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嘛，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對人呀！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

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公開頂撞江青。江青於是大吵大鬧。鄧小平站起來說：問題還沒有了解清楚，就戴這麼大的帽子，這會怎麼開！經李先念勸阻，鄧拂袖而去。張春橋望着鄧的背影說：「早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11]姚文元則在日記中誇張地寫道：「鄧在昨天會議結束時，跳起來罵江，激動得連臉也扭曲了。」[12]

當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釣魚台密謀，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行前，王洪文先給毛澤東寫好信說：「最近在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在籌備四屆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內部有爭論，這些爭論也未公開化，但在別的問題上已經表現出來，矛盾已經表面化。[13]信後附了江青的三份材料。顯然，「四人幫」一開始就打算把矛頭指向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風慶輪只是個引子。

當日上午，王洪文飛赴長沙見毛澤東，簡單問候毛的健康後，就說：我這次來，是冒着風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1970年廬山會議的味道。他拿出給毛的信和江青的材料，問毛看了風慶輪的材料沒有。毛

11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頁444、445。

12　姚文元日記，1974年10月18日。

13　王洪文給毛澤東的信，1974年10月18日。

回答沒看。王就長時間地匯報，然後說：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這件事，江青同小平同志發生了爭吵。吵得很厲害。看來鄧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鄧有這樣大的情緒，是同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一事有關。

王特別提到：總理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着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志。並說，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王還把江、張、姚吹噓了一番，建議把他的秘書蕭木調到毛身邊工作。毛沒做聲，只讓王在這裏住幾天，出去跑跑看看。王說他今天就要回去，他們幾個人還等着主席的意見呢。

毛澤東說：那好。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訕訕地表示：好，一定按主席指示辦。當天即回北京了。[14]

王洪文赴長沙後，江青仍然不放心，得知王海容、唐聞生要隨鄧小平陪同外賓去長沙見毛澤東後，10月19日一天兩次召見王、唐，說鄧小平和她爭吵，揚長而去，使政治局會議開不下去。還說國務院領導經常搞串聯，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是在養病，總理是後台。王、唐又去見了周恩來，周說：經過他的了解，事情並不像江青說的那樣，而是江青他們四個人事先就計劃好要整鄧小平。他們已經多次這樣搞過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了很久了。[15]

這兩年中，毛澤東雙目幾近失明，深居簡出，政局信息反饋完全依靠他人口頭匯報，而能夠經常自由面見他的，只有王海容、唐聞生、遲群、謝靜宜、章含之等原來的身邊翻譯和工作人員，寥寥幾人，因此，出現了江青和周恩來這兩軍對壘的主帥，都要向這些小人

14 王洪文對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青時作的證詞，1980年11月26日；張玉鳳對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提供的證言，1980年7月18日。

1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21。

物傾訴自己訴求的極為不正常狀況。王、唐和江青有矛盾，又善於揣摸毛澤東的心思，知道毛澤東這時在鄧小平身上寄予了很大希望，於是按照自己的判斷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聽了王、唐的匯報，要他們向中央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他還說：「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他的意見辦，戰時有事，平時無事，掛個名。楊成武可以做個副總長。陳（引者註：指陳錫聯）可以做一個副總理。王洪文來的時候沒有這麼明確，再明確一下。委員長一、二（引者註：指第一、二副委員長）再考慮。」「總的方針要團結、要安定。」他還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且已經在解決，江青還這麼鬧，這樣搞很不對頭嘛！要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16]

王、唐回京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後，風向大變。周恩來十分欣慰，向紀登奎說：告狀沒告下來，給了三個職務。指的是：周恩來的總理、鄧小平的第一副總理和總參謀長。本來周恩來從6月因病住院後，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就由王洪文主持，這下又變成周恩來與王洪文一起商量，而且明確了周繼續擔任總理，也就是擁有組閣的權力。

一個多月裏，江青繼續受到毛的冷面孔告誡。10月20日，他給江青回信說：「務望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11月6日，李先念陪同外賓見毛澤東，毛又說起江青：「王母娘娘就不聽呢！」「非跟好多人鬧翻不可，她是目中無人。」「我三年來只請她吃了一頓飯，現在又是四年了，一頓飯都沒有請吃。總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幫，她要搞。」[17]

江青仍然不死心，11月19日又給毛寫信，抱怨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沒有分配我甚麼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線鬥爭

16　毛澤東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傳達記錄，1974年10月20日。

17　毛澤東同李先念談話記錄，1974年11月6日。

起伏時我主動的做過一些工作。」「當然，需要鬥爭需要犧牲時，我要有精神準備。」江青說的確實是實情。「文革」前三年，她只有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職務，就把政局攪得天翻地覆。而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到1969年9月結束日常工作，12月是江青最後一次用這個名義接見外賓，公開露面。以後，江青除了政治局委員的頭銜，沒有任何黨內和政府職務。這是毛澤東的刻意安排。他深知，江青是一個能亂天下而不能收拾局面的女人，這個精力旺盛的女人確實是只能藉助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來現身說法。在「文革」初期可以用她衝衝殺殺，打開僵局；到四屆人大這樣需要大治時，必須約束她，否則將一事無成。所以毛第二天就在信上批示：「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18]

周恩來有了組閣的尚方寶劍，勉支病體，振作精神。11月6日，他寫信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工作說：「人事名單估計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幾個比較滿意人選，呈主席選擇批准，關鍵在於中青幹部。」「我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便於楊成武同志學習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據洪文、春橋、小平同志估計，代表名單，憲法草案和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他還表示，自己的身體雖然弱，但「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19]

11月12日，鄧小平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對他的工作大加稱讚，一見面就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鄧：「主席也知道了。」毛：「好！」鄧：「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我贊成你！」鄧：「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用手指王、唐）都不高興。」鄧：「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講了一下，鋼鐵公司

18 毛澤東對江青來信的批示，1974年11月20日。

1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82。

對鋼鐵公司。」毛：「這個好。」鄧：「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甚麼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羅。」

毛澤東還提出，由鄧主持起草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考慮到周的身體狀況，毛澤東要求報告不要太長，三五千字即可。鄧小平當即應諾。12月20日，周恩來審閱了鄧主持起草的報告草稿，表示同意。這樣，在周恩來、鄧小平的共同努力下，四屆人大的基調終於確立。

3 毛澤東、周恩來長沙會談

剩下的事就是人事安排。實際上，毛澤東已經確定了一批職位。他託人轉告周恩來：人大常委會的主要領導人是朱德、董必武，之後要安排宋慶齡。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可以擔任副總理，其他人由周恩來主持商定。

毛澤東的意見當然無人反對。甚至還出了一個笑話：全國人大常委會產生後，任大會秘書長的吳德提出工作太忙，不能繼續擔任，是不是找一位懂外交的人。江青問是誰？吳德忽然冒叫一句：聽說毛主席考慮讓姬鵬飛任秘書長。其實他「文革」後承認根本沒聽毛主席這樣說過。雖然大家都說不知道毛有這個意見，但也不敢反對。於是，姬鵬飛就弄假成真地當上了四屆全國人大秘書長。

從10月起，周恩來就為四屆人大的組閣分批找人談話，每批三四人。與江青、張春橋談時，他們提出要吳德擔任文化部長。但是，任國務院文化組長時吳德與江青打交道已經吃夠了苦頭，堅決不幹，建議由文化界著名人士擔任，提名毛澤東常與談詩論文的老朋友劉大杰。[20] 江青不同意，提名樣板戲的班子出任：作曲的于會泳任部長、

20　劉大杰，1904年生，湖南岳陽人。時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主編有《中國文學批評史》。「文革」中被毛澤東點名予以保護。

跳芭蕾舞的劉慶棠和唱京劇的錢浩梁（被江青改名為浩亮）任副部長。當時，江青集團目標集中在鐵道部、教育部、文化部上，提名遲群任教育部長，另一名造反派幹部任鐵道部長。而李先念提名萬里任鐵道部長，周恩來提名周榮鑫任教育部長。相持不下之時，周恩來和鄧小平、李先念多次研究，認為教育部關係重大，而文化部、體委則可作些妥協，便對江青一夥讓步，同意了于會泳任文化部長。根據周恩來關於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要有工人和婦女的意見，各地又提名瀋陽女售貨員出身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李素文、西安造反派工人頭目姚連蔚、河北女農民勞動模範呂玉蘭、青島女工人勞動模範楊坡蘭。周恩來還提名謝靜宜當副委員長。[21]

11月12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提議謝靜宜當副委員長，喬冠華任副總理，遲群任教育部長，毛遠新、遲群、謝靜宜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作為接班人培養。[22]然而，毛澤東卻對她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江青知道毛對全國人大第一、二副委員長仍然在考慮中，又託人向毛轉達她提名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毛澤東對王海容、唐聞生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23]毛澤東為甚麼說讓王洪文做委員長就是江青自己要做黨的主席，不得而知。

12月20日，周恩來終於擬定委員長、副委員長、副總理、部長名單。12月23日，他與王洪文帶着名單，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這時，醫務人員發現周便中潛血，必須立即治療。但是，周恩來深知此行關係組閣成敗，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24]在人攙扶下仍然登上飛機。

---

21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103－107。

2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25。

23 中共中央關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24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493。

當天，毛澤東在長沙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他搖着手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王洪文漲紅着臉，點頭說：「以後不搞了。」談到鄧小平時，毛澤東說：「他政治思想強，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強，他沒有鄧小平強。」「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人材難……」毛指指腦袋，說着在紙上寫了「人材難」三個字，寫到此處，周恩來馬上說出來：「人材難得。」毛就把筆放下了。他還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周、王不做聲。毛沉默片刻後說：「我看是有。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我對她做了工作。搞亂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後門，又不告訴我。」[25]

五天中，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進行了三次談話，確定了四屆人大實際上也是國家今後的重要人事安排。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他還從副委員長、副總理名單中劃掉了謝靜宜、喬冠華、方毅。

根據周恩來的傳達，12月23、24、25、27日毛澤東的談話內容有：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關於江青，毛澤東說：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是在批劉批林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毛澤東說，他自己也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組閣）。關於副總理名單，毛澤東在聽到周恩來唸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時，又加了一個陳錫聯，唸為鄧、張、李、陳，並說張春橋有才幹，李先念較軟弱。[26]

25　毛澤東在長沙的談話，根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唐聞生、王海容的記錄稿。參見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26　周恩來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要點。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午夜時分，他約周恩來進行了長達四個小時的徹夜長談，直到次日凌晨4時。這也是兩人共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後一次深談。這次談話的內容，周恩來沒有傳達，至今無人知曉。只知道，周恩來對毛澤東說，康生懷疑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27]也說「康生歷來極左，他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28]

曾經有這樣的說法：如果在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四人幫」利用四屆人大「組閣」陰謀之時，周恩來能夠利用這一時機和他的重要地位，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態度和果斷措施，而不僅僅是限制他們的權力，「文革」豈不破產更快，黨和國家不是少受損失嗎？[29]這種說法對「文革」的困難環境和毛澤東的複雜心態顯然認識得不夠。

毛澤東的心情十分矛盾。他雖然反覆批評江青，甚至當面對謝靜宜罵江青是個大女流氓，[30]但內心卻難以割捨。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自視保證國家不變顏色的根本大計，為之傾注了最後全部心力，決不允許否定。而江青，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都是他發動和推行「文革」的主要力量。否定她，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對「文革」的否定。所以，儘管毛澤東看到了江青的個人野心、惡劣品質、缺乏人望和能力，出於「愛屋及烏」，還是一再容忍，甚至保護。中共十大結束後不久，毛澤東就找新進入中央政治局的吳德等人談話，要他們扶助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毛澤東指著中南海游泳池房子外菜地一些碧綠的蔬菜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31]後來，他雖然對江

---

27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頁493。

28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44。

29 見李海文主編：《周恩來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82。

30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196。

31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110、111、224。

青厭惡日增，仍然肯定她批劉批林的功勞。對王洪文，毛已經有些失望，也並未放棄。至於張春橋，則一直是毛十分欣賞的。儘管周恩來在長沙向毛報告了張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毛仍不為所動，反而特別提出張春橋「有才幹」，要他兼任總政治部主任，與鄧小平兼任的總參謀長搞一下平衡。

1975年1月1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有關人事安排。根據毛澤東一再提出的要安定團結的指示，會議確定了「基本不動，個別調整」的原則，討論通過了鄧小平起草的關於國務院的部、委設置和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人選的報告。討論中，將原報告擬定的交通、燃化、商業三個部的機構設置又作了調整，並決定仍設立文化、教育兩部，以「避免國內外不必要的議論」。由此，國務院系統共計設置二十九個工作部門。4日，周恩來和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會議情況，並送去討論通過的人事安排方案。[32]

為了補充對鄧小平的任命，1月8日至10日，原來沒有準備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大的準備工作，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全會還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會議閉幕時，周恩來講話說：二中全會閉幕前，請示毛主席有甚麼話要說，主席講了八個字「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至此，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工作全部完成。

3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89。

二 充滿矛盾的四屆全國人大

1 周恩來重申「四個現代化」宏圖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歷經坎坷磨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終於在人民大會堂開幕。這時，距三屆人大召開已經整整十年，距1970年開始籌備四屆人大也將近五年了。在籌備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全國各地各部門共推選出代表2885名。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2864人。他們當中有產業工人、農民、其他勞動人民、人民解放軍、幹部、知識分子、愛國人士、歸國華僑的代表。工農兵代表佔72%，婦女佔22%以上。五十四個少數民族都有代表參加。參加大會的還有12名台灣省籍同胞的代表。根據毛澤東會前的意見，他沒有當全國人大代表，也沒有參加四屆全國人大。大會正式開幕前，從1月5日至11日舉行了預備會。

與其前和其後的幾屆全國人大相比，此屆人大代表的構成有以下幾個特點：

(1) 沒有進行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由於地方各級人大一直沒有恢復活動，此屆人大代表完全是地方黨委根據中央下發文件規定的政治標準和各界比例醞釀推選的，沒有像以前各屆那樣進行逐級選舉。可以說是剝奪了人民選舉權利的不正常現象。

(2) 中共黨員佔有空前高的比例。四屆人大代表中，中共黨員有2217人，佔全體代表的76.8%，超過3/4。這不僅是一屆至今各屆人大中最高的，而且比1965年三屆全國人大的佔54.83%高出近22個百分點，這反映了當時國家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和一黨化。

(3) 沒有正式代表民主黨派的代表。由於文化大革命以來，各個民主黨派的組織都停止活動，這次代表中只指定了原來民主黨派的一些知名人士作為代表，沒有規定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應佔比例，致使至今這一實際比例仍然無法統計。相反，無黨派人士的比例相當高，佔23.16%，僅次於六屆人大的佔26.57%。這當然不說明對無黨派人士

的重視，而是因為地方的民主黨派長期沒有發展成員，許多人以真空狀態的無黨派人士身份出現。

（4）工、農、兵佔有空前的高比例。四屆人大代表中，工人813人，佔28.2%；農民662人，佔22.9%；解放軍486人，佔16.85%（如果包括擁有軍隊職務的幹部，比例應該更高）。工農兵比例均是歷屆最高的，分別比三屆人大的佔5.75%、6.87%、3.95%，分別高出22.45、16.03、12.9個百分點。相差極為懸殊。

（5）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一樣，沒有專門的人數定額和比例。這不僅僅是因為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輕視，也因為在「文革」中畢業的大中學校學生，很多沒有完成學業就被分配去上山下鄉或從事體力勞動，其優秀者很難說仍然是代表知識分子，而且他們自己也不願意仍然被視為被改造的知識分子，極力宣稱自己是工農兵一員。

（6）婦女代表佔有空前高的比例。四屆人大代表中，婦女有653人，佔22.63%，是歷屆最高的。比一屆的11.99%將近翻了一番。而且經過這一次的提高，以後各屆比例都保持在20%以上的這一高度上。這可以說是一個起點。[33]

如同中共十大一樣，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是在極為秘密的狀況下進行的。代表們秘密進京報到，不准離開駐地一步，也不准與外界有任何聯繫；總共舉行了兩次大會，全體代表都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民大會堂。會議召開的消息，閉幕後才見諸報端，全國人民才知道發生了他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

1月13日舉行開幕式，朱德委員長宣布大會開幕。大會的議程是：一、修改憲法；二、聽取〈政府工作報告〉；三、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工作人員。全體代表討論了會議的主要文件和其他準備工作。會上，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從1月14日起，全體代表討論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提請大會討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和上

33　〈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構成統計表〉，《人民日報》，1999年9月15日。

述兩個報告。1月17日，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批准了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大會根據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候選人名單，經過討論，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任命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

1月13日的開幕式上，周恩來雖然身體十分虛弱，仍然強支病體，宣讀了〈政府工作報告〉開頭和結尾的兩段。經過他與鄧小平的商議，報告把「四個現代化」作為核心思想。鄧小平在起草報告時對起草小組明確指出：「整個文章最後歸結到團結起來，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要落到這個上頭。」[34]對於1974年12月毛澤東提出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理論，周恩來在傳達會議上說明：現在還不可能把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一下子放入四屆人大報告中去，就像十大時不能突然把批孔的內容放入報告中去一樣，還需要有一個過程。[35]

〈報告〉重申了周恩來於1965年代表黨和國家、人民意願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兩步設想」，即：

> 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
> 我們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1980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後的10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

34 《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頁105。

3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94。

關鍵的10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

〈報告〉在闡述中國的對外政策時，繼續堅持了毛澤東關於「天下大亂」的說法，同時也表現出對戰爭即將爆發的原有估計的一些調整，認為也可能「革命制止戰爭」。指出：

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仍然是天下大亂，而且是愈來愈亂了。

目前，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不論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國際形勢總是朝着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世界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們要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着眼於人民，寄希望於人民，把對外工作做得更好。我們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

我們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和人民反對超級大國控制、威脅和欺負的鬥爭。

中美兩國之間存在着根本分歧。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三年來兩國關係有所改進，兩國人民的往來有了發展。只要中美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能夠認真執行，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得到改善。蘇聯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同他們的原則爭論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我們歷來認為，這種爭論不應妨礙中蘇兩國正常的國家關係。[36]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報告〉也肯定了革命委員會、樣板戲、赤腳醫生、五七道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理論隊伍等所謂

36　《人民日報》，1975年1月19日。

「新生事物」及堅持在上層建築領域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等「左」的理論與實踐。

周恩來的報告贏得了全場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還選舉和任命了國家領導人：選舉朱德為全國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女）、康生、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女）、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連蔚等22人為副委員長。

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千比、馬成杰、馬純古、馬學禮、馬恆昌、王世泰、王世惠、王觀瀾、王克強、王秀珍（女）、王作山、王治秋、王茂全、王淦昌、王景升、王道義、王耀花（女）、鄧初民、鄧穎超（女）、區棠亮（女）、貝時璋、牛發和、毛迪秋、巴桑（女）、甘祖昌、龍梅（女）、史良（女）、白壽彝、白迪・海山、朴春子（女）、呂玉蘭（女）、呂正操、呂美英（女）、劉大年、劉文輝、劉斐、江禮銀、朱克家、朱良才、伍修權、許存貴、華羅庚、莊希泉、孫玉國、嚴濟慈、克尤木・買提尼牙孜、楊東莼、楊坡蘭（女）、楊佩蓮（女）、楊榮國、蕭勁光、吳從樹、吳玉英（女）、吳先鋒、吳有訓、吳冷西、吳承清、吳德峰、吳耀宗、沙千里、沙馬力汗（女）、陳玉娘（女）、陳此生、陳阿大、陳奇涵、陳逸松、陳望道、陳淑清（女）、李鳳蘭（女）、李世榮、李慶霖、李延祿、李金榮、李順達、李聚奎、張文裕、張世忠、張達志、張延成、張國清（女）、張洪池、張桂珍（女）、張鐵生、張福財、武新宇、茅以升、林巧稚（女）、林麗韞（女）、岩帥、羅叔章（女）、季方、金秀清、金祖敏、周世釗、周叔弢、周錫林、周慧芬（女）、賈日勒岱（女）、趙忠堯、趙俊禎（女）、榮毅仁、胡子昂、胡繩、胡愈之、侯雋（女）、俞鐘峰（女）、姚士昌、晉桂香（女）、夏菊花（女）、殷誠忠、郭宏杰、郭映福、唐克碧（女）、唐岐山、浩亮、諸惠芬（女）、陶峙岳、姬鵬飛、黃作勤、曹軼歐（女）、崔海龍、康克清（女）、梁必業、梁吉泉、彭紹輝、董天禎、董加耕、董其武、粟裕、傅玉芳（女）、傅秋濤、童第周、

曾生、曾志(女)、謝靜宜(女)、錯其(女)、解力夫、蔡樹梅(女)、廖承志、樊德玲、薛濟泉、薛喜梅（女）、魏秉奎。

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還任命了國務院領導成員。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孫健等十二人為國務院副總理。

1月20日，朱德主持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會議任命江華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命姬鵬飛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檢察長的職務隨着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撤消而取消。

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和四個現代化目標的重提，標誌着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代表黨內正確力量糾正「文革」錯誤的鬥爭，取得了一個有轉折意義的勝利。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四屆人大文獻中還帶有濃厚的「文革」色彩，大會確立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在當時也是根本無法實現的。1965年三屆全國人大提出的「第一步」是要用十五年時間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目標看來並不算難度很大，因為從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起，中國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就是獨立的，甚至與世界各國相比是孤立的；「比較完整的」方面也沒有絕對的標準可以衡量。中國當時已經擁有了國防尖端技術的核工業和航天工業、電子工業等，雖然規模很小，但畢竟已經擁有，填補了空白。但是，「第二步」實現「四個現代化」則不同，它包括與世界的同步對比，包括質的轉變和量的大幅度增加。在中國進行「文革」的時期，正是世界進入全球化和信息化高技術革命的階段。現代化不僅意味着工業、農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社會保障的大幅度提高，意味着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這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沒有解決兩億五千萬人口溫飽問題的中國，難以望其項背的，是完全無法按期實現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改了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就說明了這一點。

儘管如此，四個現代化目標的重提，其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中共九大、十大不斷提出「繼續革命」口號以後，第一次把發展生產作為

國家的目標。它使久經「文革」苦難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堅定了鬥爭的信心，增強了對黨的正確領導的信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四屆人大是從亂到治的一個轉折」。[37]

2 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國務院

四屆全國人大以後，周恩來和鄧小平之間完成了權力交接。

在四屆人大召開期間，周恩來忍着癌症晚期的病痛，來到天津代表團參加小組討論。他坦然而又鄭重地說：我已得了癌症，工作時間不會太長了，這是自然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現在我正在醫院裏同疾病做鬥爭，在可能的情況下，我還要繼續和大家一起奮鬥，共同實現我們宏偉的目標。

四屆人大結束不久，周恩來又抓緊時機，在醫院中落實大會確立的國家領導結構，主要是全力支持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1月30日，周恩來在醫院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副總理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人告訴鄧小平把國務院分工列出，並說：「他不好講，由我講。」[38]當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十三人的常務會議，葉劍英、郭沫若列席。會議審定國務院各副總理的分工如下：

一、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

張春橋：主管文化、教育；

李先念：常務，主管財政貿易；

陳錫聯：主管國防工業和體育；

紀登奎：常務，主管勞動工資和幹部調配；

華國鋒：常務，主管政法和科學；

---

37 《鄧小平》，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頁105。

3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93。

陳永貴：主管農業；

吳桂賢：主管衛生和輕工業；

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銷；

余秋里：主管計劃和工業；

谷牧：主管建設和工業；

孫健：主管工業生產。

二、上述常務副總理（李、紀、華）三人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39]

同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出席的會議。他說：四屆人大以後的國務院工作，「今天是開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今後「以小平同志為首」，「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40]

這一天，成為周恩來退出國務院領導崗位，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國務院履新之日。

分析一下四屆人大產生的國家機關領導人，不難看出，周恩來、鄧小平領導的國務院派——即反對和抵制「文革」錯誤的老幹部派，取得了壓倒的勝利，而江青集團的「文革」新貴派，只控制了很少的無關緊要的職位。

十三名國務院副總理中，張春橋雖然排名第二，卻還不是常務副總理，只分管文化、教育，沒有超出他在黨內的分管的意識形態範圍。

除此而外，還有兩位乘「文革」東風上來的副總理吳桂賢和孫健。

吳桂賢十分令人注目，因為她還擁有另一個含金量更高的職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她生於1938年，河南鞏縣人。十三歲進西北國棉一廠做紡織女工，是著名的勞動模範趙夢桃小組成員和繼任組長。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雖然不是造反積極分子，但因為勞動模範的光環而青雲直上，歷任陝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委副

39　周恩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向毛澤東的請示報告：1975年2月2日。

4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94。

書記，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的陝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瑞山曾經得意地說：陝西出了「三副」，即指吳桂賢的副總理、姚連蔚的副委員長、胡煒的副總參謀長。吳的文化程度和領導才幹都很有限，「文革」後曾經流傳一個笑話：吳接見日本衛生界代表團時，聽到對方稱讚中國李時珍的醫學造詣，就問李時珍現在在哪裏？這雖然不是事實，但雖不中亦不遠矣。吳的身份決定了她不可能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甚麼作用。因此，在粉碎「四人幫」的當晚，吳聽到在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這一消息，十分吃驚。即使如此，也沒有人把她看做「四人幫」黨羽。「文革」後，吳仍然當選為十一屆中央委員，回陝西原廠工作，歷任廠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1988年後任深圳外貿集團公司副董事長。[41]

最後一名副總理孫健的經歷與吳比較相似。1936年出生於河北定興。十五歲進天津內燃機廠當翻砂工，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生產組長、班長、車間主任、團委書記、黨委書記。「文革」中，當選為天津市一輕工業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生產指揮部副主任，中共十屆候補中央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革」後因犯有嚴重錯誤被免去職務回天津機械廠工作。1990年任中國機械供銷總公司華北地區公司總經濟師。[42]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二名副委員長中間，只有第三副委員長的康生和排倒數第一、二的李素文、姚連蔚算得上是可能與江青集團和文化大革命有共同既得利益的人。但是，康生已經因揭發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而翻臉，加上重病在身，苟延殘喘，不起甚麼作用了。

李素文「文革」前本是瀋陽市一家商店的售貨員。1933年生，河北樂亭人，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因為熱心為人民服務和學習毛

41 劉賢俊等編著：《歷屆總理副總理傳略》（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頁511－513。

42 沈學明、郭建英主編：《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55、256。

著，1964年當選為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6年被樹立為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文革」中，成為遼寧一大派群眾組織的頭頭。1968年後歷任瀋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團省委書記。從本質上說，她只能算是被江青集團利用者，才幹也極為有限，即使在1976年一度取代李先念分管財貿口，也沒有甚麼作為。「文革」後，李素文因在「文革」中犯有的嚴重錯誤，被撤消黨內外職務，1978年回瀋陽工作，後任市糖果廠副廠長、市輕工業供銷總公司副總經理。

姚連蔚可算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物。1934年生，陝西長安人。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原是西安一家兵工廠的工人和班組長。「文革」初期帶頭起來造反，組織武鬥。歷任陝西省工代會負責人，中共九屆、十屆候補中央委員，陝西省總工會副主任。他雖然是「文革」的弄潮兒，但因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當上副委員長後，分管國防工業，經常因批審文件苦不堪言，後來只好按照秘書的意見依樣畫圈。「文革」結束後，被隔離審查，因查明組織武鬥打死人，被開除黨紀並判刑。

四屆全國人大根據中共中央提議任命的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共二十九人：

外交部部長喬冠華，

國防部部長葉劍英，

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

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

公安部部長華國鋒，

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

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

農林部部長沙風，

冶金工業部部長陳紹昆，

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李水清，

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劉西堯，

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李際泰，

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王諍，
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李成芳，
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邊疆，
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汪洋，
煤炭工業部部長徐今強，
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康世恩，
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女），
輕工業部部長錢之光，
鐵道部部長萬里，
交通部部長葉飛，
郵電部部長鍾夫翔，
財政部部長張勁夫，
商業部部長范子瑜，
文化部部長于會泳，
教育部部長周榮鑫，
衛生部部長劉湘屏（女），
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

其中，絕大部分是老幹部和軍管時期的部委軍代表。被稱為與江青集團有密切關係的，按照「文革」結束的清洗情況看，只有四人——冶金工業部部長陳紹昆、文化部部長于會泳、衛生部部長劉湘屏、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于會泳是「四人幫」死黨，「文革」後被隔離審查，1977年8月28日自殺身亡。陳紹昆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向「四人幫」表示效忠，「文革」後被免除職務。劉湘萍是謝富治夫人，「文革」後審查謝富治問題時，她因「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被撤消職務，開除黨籍。莊則棟是著名的乒乓球世界冠軍，「文革」後被隔離審查，開除黨籍，到山西臨汾和北京市少年宮任青少年乒乓球教練。

相對而言，當時的部長掌握直接的實權，比名大於實的副委員長，甚至比副總理還重要。比如吳桂賢副總理分管衛生，可是衛生部長劉湘屏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裏。當時的權力中樞在於政治局，而不在

於國務院。而政治局又要聽命於毛澤東的每一句話。在毛澤東久病不能離開庭院一步，能夠經常見到毛澤東的「近臣」，就可以代傳「聖旨」，「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關係，與清代的內閣——軍機大臣——南書房的權力結構頗為相似。這就是儘管國務院中「四人幫」黨羽僅佔極少數，而毛澤東聽信一次匯報，就可以改變整個政局的原因。

3 「繼續革命」的新憲法

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對1954年憲法進行了很大的修改，實際上這個修憲進程從1970年春季就開始了，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負責。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基本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簡稱「1970年草案」）。

在1970年草案中，充滿了把個人凌駕於國家和黨之上的濃厚個人崇拜氣息。不到五千字的篇幅，九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三次提到林彪的名字。

在「序言」中規定：

> 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
>
> 領導我們勝利前進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
> 我國各族人民要在毛澤東主席為首、林彪副主席為副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在「總綱」第二條中規定：

> 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

荒唐的是，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規定：

第二十六條　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是，擁護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43]

1970年草案基本通過剛剛一年，就發生了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被擱置起來，但並未作廢，1974年又拿出來重新修訂，由張春橋負責，對序言、總綱做了較大改寫。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1975年憲法，仍舊是四章三十條。保留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存在嚴重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基本路線闡述，保留了1970年草案「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的首創發明。重要變化有：

全文除了三次提到毛澤東思想外，參考十大修改黨章時毛澤東關於黨章裏不要出現個人名字的指示，刪去了林彪的名字，也不再提到毛澤東個人的名字。

把第二條「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改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

把第十條「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刪去。

把第十一條「一切國家機關和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林彪語言，改為「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把「它的領導機構，都必須實行軍、幹、群和老、中、青的革命三結合」中的「軍、幹、群」刪去。

---

43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文件。

把第十四條「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政治權利」中，「反革命分子」刪去。

把第十八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改為「由委員長，副委員長若干人」。

把第二十六條「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擁護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刪去。

二十七條增加「公民對於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

其他一仍其舊。可以說，1970年草案是1975年憲法的雛形，1975年憲法是1970年草案的修訂本。雖然刪去了個人崇拜語言，但極左的核心思想仍然被繼承下來。

1975年1月13日，張春橋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公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繼1954年憲法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1975年憲法除序言外，有總綱，國家機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國旗、國徽、首都共四章三十條。

張春橋在報告中指出了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有重要修改的地方：

> 總結我們的新經驗，鞏固我們的新勝利，反映我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共同願望，就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主要任務。
>
>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

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也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

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幾點：

（一）……由於不設國家主席，草案對1954年憲法關於國家機構的規定，作了相應的修改。這些規定，必將有利於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領導，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

（二）……在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中湧現的政社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和實行革命三結合的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也分別寫進了修改草案。

（三）……修改草案規定了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又規定了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其中特別規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婦女的權利。修改草案還規定了人民群眾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同時，根據毛主席的建議，草案第二十八條增加了公民有罷工自由的內容。

（四）……規定我國現階段主要有兩種所有制，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修改草案對於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對於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也作了規定。

（五）……我們將「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寫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們國家今天不稱霸，永遠不稱霸。[44]

1975年憲法在確定有關國家與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方面繼承了1954年憲法。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

44 《人民日報》，1975年1月19日。

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等。在經濟制度方面，1954年憲法制定時還沒有完成三大改造，只能說是準社會主義憲法。1956年國家已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包含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主要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1975年憲法反映了這一事實，同時又作了相應的修改。對於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對於人民公社社員規定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因此，1975年憲法是1954年憲法後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但是，由於這部憲法是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制定出來的，因此，它的指導思想和一些具體規定上存在着嚴重錯誤：

一、在指導思想上，1975年憲法把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寫進了憲法的〈序言〉，這樣就用國家的根本法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不僅把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合法化，而且以根本法形式賦予了不止一次地繼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依據。在總綱中還規定「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把矛頭對着人民內部，從而導致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踐踏了社會主義民主。

二、1975年憲法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所謂「四大民主」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並認為運用這種形式會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按照「文革」初期的造反實際情況，增加了「罷工自由」的規定。事實說明，這些規定同社會主義民主毫無共同之處，只能破壞民主集中制，製造動亂踐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

三、與1954年憲法的106條比較，1975年憲法僅有30條，不僅條文過少，內容簡單，而且規範疏漏，對國家機構體系和制度做出了一系列不正確、不完備的修改：

（1）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建制，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家主席結合起來行使國家元首職權的制度，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會共同行使。黨政不分，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受到削弱。

（2）把地方革命委員會規定為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同時又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違反了國家機關的合理分工，加劇了本已經極大的中央集權程度。

（3）對於實行民主與法治至關重要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在憲法中只有一條，而且取消了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和審判公開、辯護等制度；作為「砸爛公檢法」的流毒，取消了國家不可缺少的檢察機關，只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一句，從而取消了公、檢、法三機關應有的制約關係。

（4）在總綱中刪去了1954年憲法肯定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總原則，只保留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這幾個字；1954年憲法規定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自治權的具體內容都予刪去，只寫了「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自治權」一句，這樣就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施的可操作性大為減少。

（5）取消了國防委員會的建制和關於戰爭緊急對抗措施的規定，改為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不僅是黨政不分，而且未明文確定由誰來宣布戰爭狀態、決定戰爭和和平問題、動員問題。到1982年憲法才規定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使國家機構和體制得到完善。

（6）取消鄉的建置，代之以人民公社；只確認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雖然允許非農業個體勞動者從事法律允許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但強調「同時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因而在事實上是壓制農民個體經營活動。

四、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這部憲法的重要原則語言，特別是序言和總綱部分的一些內容，都照搬了中共十大的黨章和報告。有些存在着邏輯上的錯誤。比如，1975年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最高」之上還有「領導」，顯然會造成政黨和國家關係的表述混亂。1982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新憲法草案中糾正了這一提法。憲法工作小組成員張友漁說明：「黨對國家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是組織上的領導。」[45]

五、減少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於「文革」之初就批判了彭真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部憲法也取消了1954年憲法記載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條文，這就從根本上離開了現代憲法民主的法制原則。這部憲法還一反通常的做法，先規定公民的義務，然後才提出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對公民的基本權利規定，1954年憲法用了十四條，1975年憲法只用了兩條，大大減少。憲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可以特邀若干愛國人士參加」，減少了公民的選舉和被選舉權利，在選舉制度上也是個倒退。

總之，1975年憲法是中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路線的嚴重干擾，把「文革」中的許多錯誤理論和做法加以法律化、制度化，使之成為國家生活的最高準則，在修憲史上是一個倒退。但是，1975年憲法肯定和保留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因而仍不失為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不能說是「四人幫」的作品而予以徹底否定。其產生嚴重錯誤的責任，主要應當歸咎於佔中國共產黨統治地位的錯誤指導思想，而不是「四人幫」的活動，更不是四屆人大和人民代表。

事實上，這個憲法和制訂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只是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不僅人大會議（包括人大常委會）仍然不能正常召開，連必要的程序都被免去了。如1976年4月撤消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就根本沒有經過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而是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事後也沒有補行手續。

45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聯絡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有關資料彙編》（內部發行），頁239。

第七章

動盪中的社會、文化與思潮

1972年至1976年，是「文革」進入到後期的階段。中國社會與思潮出現了巨變前夜的動盪不安，孕育着變革風暴的來臨。一方面，社會仍處於矛盾尖銳的狀態，極左勢力控制着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收緊了意識形態包括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上層建築的韁繩，創造出一些以「文革」路線為包裝的傳統階級鬥爭的「新生事物」模式，人們的公開思想比「文革」前期的個人崇拜加無政府主義狀態更加僵硬和格式化。另一方面，人們已經厭倦了永無休止的政治爭鬥，上山下鄉的無出路，社會生活的單調困苦，對「文革」的疑惑，對中國前途的擔憂，促使各個階層特別是青年人都在潛動着洶湧的思想暗流。有的以血探索思考，有的以頹廢抗爭，有的不問世事躲進小圈子自成一家……所有這些思潮和社會動向，都混合成了改革開放時期的種種思潮前奏。

一　畸形發展的教育文化衛生事業

1 對舊教育的「兩個基本估計」與新教育的「上、管、改」

毛澤東在196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出，教育領域必須進行改革，改變考試方法、教材、學制等。但是「文革」前並沒有真正付諸行動。，

1967－1969年的「文革」頭三年，在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把持下，教育領域進行了一場各自為戰的改革，稱之為「教育革命」運動。主要指導思想是兩個，一是毛澤東1966年5月7日信裏明確指出的「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破舊」，被稱為「五七指示」。二是1968年7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從上海機牀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公布的毛澤東批示：

>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牀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是「立新」，被稱為「七二一指示」。這兩個指示是當時全國「教育革命」的根本指導思想。

但是，當時的大學幾乎都被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把持着，像毛澤東所說，不搞鬥、批、改，鬥是鬥，只搞武鬥。要進行教育改革，必須先解決領導權即「管」的問題。8月，姚文元文章傳達了毛澤東指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吹響了工農兵管理大學的進軍號。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首都部分高校。其後，中央發出普遍向城市大中小學校派遣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通知。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在學校實際上遠遠不局限於宣傳，而是掌握學校一切權力，成為凌駕於學校黨委和革命委員會之上的新工作組。在農村，則根據毛澤東「最新指示」「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及8月31日毛澤東對姚文元送交的遼寧省營口縣水源公社調查報告〈農村的教育革命必須依靠貧下中農〉的批示，提出「實行由貧下中農為主，結合學校師生管理學校。」[1]從此，全國各地農村中小學校都由貧下中農管理。

---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46。

領導權解決以後，對過去的教育形勢做出結論，確立新的教育方針，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前者，就是著名的「兩個基本估計」的結論。它的醞釀提出是在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有關部委，各省、市、自治區，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主管教育的負責人和198所高等院校的有關人員共631人參加了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是：研究高等院校的布局和專業設置；搞好校辦工廠、廠（社）校掛鈎、工廠辦學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工農兵學員的選拔、培養和分配；教材改革和交流；關於中、小學的領導體制、民辦公助、師資培養、學制和教材等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重建教育方針、制度的有重大意義的會議。

圍繞對「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評價，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激進派與以周恩來為代表務實派進行了角力。作為既得利益的「文革」新貴，「文革」派當然要拚命否定「文革」前的一切。1970年12月下旬，張春橋在上海市黨代會代表學習班上已經斷言：「至於十七年，我們哪裏佔領過？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們也未佔領。」「不要說『徹頭徹尾』，說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2]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前夕的3月，上海有人提出：如何估價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這一段教育戰線的成績問題，上海曾有過爭論，有人認為這一段是紅線，是毛主席的路線領導的，要翻案。張春橋說：「統治就是專了我們的政」，「還有甚麼爭論的」。現在的教師隊伍「要大換一批。對這些人我很惱火，可都槍斃也不行啊！」[3]

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一開始，上海代表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戰線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把持領導權」，「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會議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控制下，形成了對「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和知識分子只許否定、不許肯定的局面。凡是不反映

2　〈「兩個估計」是怎麼炮製出來的？〉，《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3　〈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十七年「資產階級專政」的典型材料的發言，會議簡報就不予刊載。對此，許多代表表示了反對，提出黨中央和毛澤東歷來對教育工作的方針路線是肯定的。7月6日，周恩來接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指出：「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張春橋卻在會議領導小組會上說：十七年教育戰線「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落實」，「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4]

這兩種意見的分歧，反映了毛澤東對過去教育形勢的混亂認識。「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對過去十七年教育的徹底否定。但就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的1971年6月，毛澤東和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談到教育形勢時，又說：

> 現在在這裏試驗，對舊的資產階級教授也還得利用，不然我們沒有啊。……這就要時間，慢慢來，已經21年了。過去也有一些進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講完全不對。但是呢，就是教育從根本上來一個革命，在最近幾年才開始。[5]

毛在這裏對過去又有一些肯定。

1971年7月27日，經遲群主持起草，由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的〈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上報中共中央。8月13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指出：「中央同意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現發給你們，望各級黨委認真討論執行。」[6]由張春橋、姚文元主持制訂的這個〈紀要〉共分三個部分。

---

4 〈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5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715。

6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的報告，宣布撤消中發（1971）44號文件轉發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

第一部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及以後五年教育戰線的形勢，認為：「22年的鬥爭充分說明，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教育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生死鬥爭的一條重要戰線」，「資產階級在這方面還比較有力量，他們就竭力使學校成為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成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第二部分提出了當前要抓好的問題：(1)鞏固工人階級在教育陣地的領導權，工宣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去。(2)堅持辦好五七幹校和七二一大學。(3)要批判資產階級，開展批修整風。(4)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要廣泛吸收工農兵參加教學，抓緊對原有教師隊伍的再教育。(5)教材要徹底改革，適當選編一些反面教材，供批判用。(6)高等院校調整和管理體制問題，要繼續試行原有高等院校調整、下放方案。(7)中小學教育革命要抓好教師隊伍的改造和建設，清除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爭取在「四五」計劃期間，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8)認真辦好中專和技工學校。(9)軍隊院校教育革命結合具體情況貫徹執行。〈紀要〉還提出了要批判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八大精神支柱」：「全民教育」、「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讀書做官」、「讀書無用」。

〈紀要〉的第一個核心思想，是正式提出了「兩個基本估計」——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原有教師隊伍中，「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根據毛澤東「在教育方面不能講完全不對」的意見，〈紀要〉給原本徹底否定的「兩個估計」又加上了「基本」的前置詞，變得緩和一些。後來，國內徹底否定「文革」時一般都稱其為「兩個估計」，認為是徹底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教育成就，這樣說並不全面。應該說，對教師隊伍，與1967－1968年紅衛兵運動時期的肆意批判鬥爭和徹底否定為「臭老九」相比，〈紀要〉還是有相當的程度予以了肯定。

當年夏季，毛澤東還就〈紀要〉的一些提法對遲群做出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價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數知識分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還是認得的，就是愛面子，當人的面不認，背地還是認的，只不過有資產階級思想，過後還是要認的。（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沒有一點對的地方嘛，錯誤的要批，批它錯誤的東西。毛澤東還說：人家是教師，還要尊重他嘛。一講不對就批評，那能都講對呀，講不對沒關係，講錯了沒關係，大家共同研究，怎麼能一下子都講對，不可能嘛。[7]

〈紀要〉的另一個核心思想，就是提出今後的教育方針——「上、管、改」——「工農兵學員是教育革命的主力軍，要充分發揮他們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的作用，堅決改革舊的教學方法，實行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制度」。它實際上改變了學校的師生主體，由前期紅衛兵「自己教育自己」的「教育革命」，轉變為工農兵「佔領意識形態陣地」。不久，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等人組織撰寫的《人民日報》文章〈努力學會領導學校工作〉[8]，根據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的指示，進一步闡述「上、管、改」說：原有的教師隊伍中「世界觀基本

---

7 見〈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首先發現毛澤東有這些指示的是審查「四人幫」在教育部的餘黨骨幹分子薛玉山的專案組組長孫長江，他發現薛的筆記本上有記錄不全的毛澤東指示，教育部黨組隨即請示中央審查辦，請求查看遲群、謝靜宜的筆記本。由孫長江負責審閱核對他們筆記本中關於毛澤東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對教育工作指示的紀錄，整理後請示胡喬木同意，決定寫進稿中。但是，由於在中辦和中央檔案館都沒有查到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原文，所以在發表時稱為「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見吉偉青：〈《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發表的前前後後——推翻「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親歷記〉，《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頁74。

8 〈人民日報〉，1971年9月4日。

上是資產階級的」，「要繼續抓緊對知識分子的再教育，正確處理使用與改造的關係。要創造條件，讓原有教師分期分批到工廠、農村、部隊」。文章強調：「宣傳隊要長期留下去」，「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8月至11月各省、市、自治區先後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對〈紀要〉進行傳達貫徹，開始了教育改革。

首先是解決「上」的問題。在1970年，中共中央已經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的請示報告，全國部分院校開始從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和幹部中招收學員，招生辦法採取推薦和審核相結合，學生畢業後一般回到原單位去。這些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由於當時主要看政治標準，農村學生的文化素養十分低下，入學後難以繼續，因此後來各大學到農村招收學生時，實際上多是招收城鎮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其次是調整學校體制。由於戰備、內地建設和下放幹部的需要，對部分大學進行了裁減和合併。早在1971年1月21日至22日由國務院科教組主持，在北京已經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調整座談會。會議根據毛澤東過去的一系列指示，如：把農業大學辦到農村去、文科應該以社會為學校等，討論了高等院校的調整原則，提出工科大學一般擬予以保留；農科、醫科、師範院校多數擬保留，少數擬改為中等專業學校或合併；綜合大學一般擬先保留下來；財經、政法、民族院校擬多撤消一些。根據調整原則，國家計委、國務院科教組彙總了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高等院校調整的方案，4月將〈關於高等院校調整問題的報告〉提交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確定將全國原有的417所高等院校，保留309所，合併43所，撤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華僑大學、中南民族學院等45所院校；改為中等專業學校的17所，改為工廠的3所；另增設7所。關於高等學校管理體制，確定是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實行以「塊塊為主」，即多數院校由地方領導，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門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少數院校由中央部門直接領導。確定專業設置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

行。8月13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時，也批准了這個報告。

再次是確定辦學方向。1968年毛澤東在七二一指示中已經提出了理工科大學的方向——「走上海機牀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難辦的是文科。1971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駐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撰寫的文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文章分五部分闡述了文科大學的方向：一、以社會為工廠是文科的一場大革命；二、以社會為工廠，才能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三、以社會為工廠，才能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四、以社會為工廠，才能做到理論和實際的統一；五、以社會為工廠，才能改造和建設教師隊伍。文章指出：「『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結了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對文科教育革命做出的英明指示，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在文科教育中的光輝體現，是文科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由之路。」當前，高等學校文科「教育革命的方向」是「以社會為工廠」，批判「封、資、修的反動思想體系」。這種所謂「以社會為工廠」的辦學方針，實際上是取消了文科各個專業的教學。

最後是改革教材和教學方法。1972年10月17日至18日，國務院科教組在北京召開教材工作座談會，華東、中南、華北十七個省市教育局的有關人員參加。主要議題是如何推動大、中、小學教材改革和建設。會議確定，由國務院科教組分大區交流編寫教材的經驗，組織協作編寫，然後採取分科設點、擇優推薦、集體修訂、分工出版的辦法，出版一批質量較高的教材，供各地參考使用。並計劃在此基礎上，制定教材改革和建設規劃，逐步建立教材編審、出版的新工作體制。11月2日，《文匯報》發表華東師大物理系教師的文章〈怎樣編好基礎課教材〉。隨後，該報又發表文章對其進行批判。這是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幫派人物特意為批判編寫教材中的「復舊」而製造的「靶子」。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學校大量採用「三機一泵」（電動機、發電機、柴油機、水泵）等實用教材，採用「開門辦學」的教學方法。

1974年9月29日，國務院科教組、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開門辦學的通知〉說：開門辦學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開門辦學中要始終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以工農兵為師。要堅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徹底改革舊的教育體系。開門辦學要以廠（社）校掛鈎為主，多種形式辦學，並在本地區就近安排，相對穩定。要注意到中小工廠和農村中去。

由於學生頻繁地下鄉下廠勞動，學工、學農，以階級鬥爭為主課，以勞動為中心，再加上批「智育第一」、「師道尊嚴」，造成了「讀書無用」的不良風氣，使普通中小學教育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給青少年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內傷」。

外語教學由於毛澤東在和美國來賓談話中的一次不經意建議，得到了比其他方面稍好的待遇。中國向美國派出了一批「根正苗紅」的小學「紅小兵」，到美國家庭中居住，學習外語。1972年10月2日，由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人民廣播電台聯合舉辦的業餘英語廣播講座在北京開始播出。此後，全國各地也都陸續開辦外語廣播講座。1974年12月28日，國務院科教組決定繼續開辦外國語學校，現有十所外國語學校繼續辦下去，從小學高年級辦起，招收三年肄業期滿的學生。外國語學校應辦成帶有專業性的普通中小學。分別開設英、俄、法、西班牙、德、日、阿拉伯七個語種，學制十年，學生中學畢業後，仍要上山下鄉，其辦法是在城市郊區定點集體插隊（場）。

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是學校，因此學校也就成為政治龍捲風的風眼。在如何對待教育改革的問題上，兩種力量進行了持久而激烈的鬥爭，最終擴展到政治領域的最高權力更迭。起初，這種鬥爭主要集中在如何對待大學的招生和分配上。

大學招收學生究竟要不要重視文化水平？這個在全世界都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卻使中國從1970年大學恢復招生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起，就一直受到困擾——工農兵學員素質過於低下。北京市革委會的報告反映：北京市十一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初中以上的只佔20%，初中程度的佔60%，相當於小學程度

的佔20%。這種大學實際上只相當於初中水平。因此，北京市要求各大學按照學員的實際文化程度和專業的不同要求，有重點地為學員補習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不計入學制之內。考慮到北京市所反映的情況在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校中也普遍存在，1972年5月8日國務院教科組轉發〈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指出：各高等學校對於實際文化程度沒有達到要求的學員，可根據各類專業的不同要求，有重點地補習必要的文化基礎知識。

1973年4月3日，國務院又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意見〉，提出要重視文化程度的考查，除強調一般政治、身體條件外，提出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保證入學學生有相當於初中畢業生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考查的內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區可根據本地具體情況和專業的不同要求進行試驗」。其後，這種「文化考查」的辦法，實際上就是考試，因為擔心受到復辟指摘而叫做考察。同年，全國高等院校共「考察」招收工農兵學員十五萬人。

周恩來顯然對直接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做法不以為然。1972年10月14日，他會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著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時說：我們小學和中學的學制究竟是十年還是十二年，還沒有確定。學校學生應「以學為主」。「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二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當然這總是少數，大多數人要參加勞動，不一定升學。至少在70年代和80年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進大學，國家沒有這個力量。中學畢業後馬上進大學的總是少數，大量的要在生產實踐中提高。勞動幾年後，有升學機會的當然還可以深造。[9]他並告訴李政道：我們準備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國學

9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474。

習、深造。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國務院科教組發出文件，要求北京外國語學院招生時選拔少量應屆高中畢業生。

但是，這種重視文化考察的做法儘管還沒有提到入學考試錄取的高度，已經備受極左力量的責難。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隨着周恩來在中央的遭受衝擊，1974年6月15日，遲群控制國務院科教組發出〈關於1974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指出，由於1973年高校招生工作中強調「要重視文化考查」，「不少地區曾不同程度地沿襲舊高考的辦法」，在文化考查上突出反映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表現和影響。針對1974年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報告〉提出：選拔學生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把政治表現、路線覺悟放在首位，注意選拔批林批孔的積極分子。堅持選拔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文化考查可採用調查訪問，座談討論等多種形式進行試驗，反對「智育第一」，反對「用對待敵人的辦法考學生」。

在大學畢業生分配方面，重要的發明是毛遠新抓的「社來社去」的「朝農經驗」——從農村招收農民入大學，大學畢業後回農村當農民。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農大畢業當農民好——遼寧朝陽農學院實行「社來社去」的調查〉，並加發〈編者按〉說，遼寧朝陽農學院實行學生「社來社去」，「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教育戰線出現的又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12月底，國務院科教組、農林部和中共遼寧省委聯合召開學習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經驗現場會。會上宣揚朝陽農學院的經驗是：堅持在農村辦學，分散辦學；辦學方式實行「三上三下」(「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生產隊參加生產實踐)；教學內容根據當地農業生產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干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學生社來社去，畢業當農民、掙工分等。會議認為不僅農林院校，而且各類學校、各級教育部門的領導機關都應當學習、研究「朝農經驗」。會議提出：「學大寨」應當是農業大學學生的必修課、基本課。遲群說：文化大革命前「培養出來的學生，基本上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破壞作用」。毛遠新則提出：朝陽農學院的學生

「光懂得農村兩條路線鬥爭不行，還得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並提出「大學就是大家來學」。1975年4月，國務院批轉教育部請示報告提出：今年高等學校招生，農業院校學生一般實行「社來社去」，林、醫、師範院校部分試行「社來社去」，其他各類院校可進行「社來社去」試點。

農業大學結合農村的需要辦學，農村來的及農學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後到農村去服務，當然是一個值得提倡的方向。但朝陽農學院「經驗」實際上是把已經搬遷到農村的農林院校，進一步肢解分散到各地農村。這對教育質量已經嚴重下降的農林院校，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分專業地要求大學畢業生都到農村去當農民掙工分，也嚴重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況且，毛遠新等人宣傳「朝農經驗」，其核心思想是「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教育路線對着幹」的政治需要。這種做法引起了老幹部的抵制。1975年7月，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談到國內教育工作情況時說：「農學院都學『朝陽』，我不那麼贊成。」教育部長周榮鑫向新華社記者轉述了這個意見。此後，教育部和報刊曾一度停止宣傳「朝農經驗」。

圍繞教育改革的明爭暗鬥，一直持續到1975年鄧小平整頓，最後成為中央政治鬥爭的集中總爆發。

1971年至1975年，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成就，是開始制定和實施農村普及教育戰略目標。1971年7月6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普及小學教育「這是一個大政」。根據他的這一意見，8月13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時要求：爭取在「四五」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8月19日，國家計委、國務院科教組、財政部聯合發出通知，為了解決當前教育經費緊張和生產隊負擔過重的問題，決定追加本年教育經費3.5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農村中、小學教育經費不足問題。1972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普及小學教育是農村教育的重點〉，指出當前農村普及教育的重點應當放在普及小學五年教育上，首先要滿足廣大貧下中農子女上小學的要求，在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各地還要特別注意發動和組織女孩子入學。4月20日，《人民日

報》再次發表短評：〈堅持多種形式辦學〉。提出在廣大農村要盡快普及小學五年教育，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除了國家辦學以外，必須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辦學形式要多種多樣，適應貧下中農的實際需要。各地應當在抓好全日制學校的同時，認真抓好半日班，早、午、晚班，巡迴教學等學校。11月至12月，國家計委又召開研究1973年國民經濟計劃會議，提出1973年要提高教育經費中用於普及小學教育的投資。1975年4月10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普及小學五年教育問題的請示報告〉，指出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是關係到我國億萬農民文化翻身、鞏固工農聯盟，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大政。各地、各部門要切實解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普及教育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力爭盡早實現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報告〉提出：要克服重內地輕邊疆、重城市輕農牧區、重公辦學校輕民辦學校的錯誤觀點，重視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境沿線普及小學教育的工作。加速培養少數民族師資，把教育規劃納入邊防建設或各該地區的建設計劃，並同貫徹執行民族政策結合起來。

由此，全國開始大抓學齡期少年兒童入學問題，人數佔全國大多數、失學率也較高的農村地區小學普及教育成為重點。到1975年「四五」計劃完成之後幾年，全國中小學教育各項指標出現了一個最高峰。其中1975、1976年全國小學在校學生數，1977年全國高中、初中在校學生數，1978年的各級學校在校學生佔全國人口比例、1978年全國平均每萬人中中學生比例（相當於1965年的3.5倍），都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21世紀初最高的。到「四五」計劃結束，普及農村小學教育的目標雖然沒有完成，但畢竟為2000年中國基本上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打下了一個基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雖然農村學校的教育水平很低，使用的教材也過於政治化，比如學習《毛主席語錄》等，但是畢竟使廣大農村孩子有了識字的可能。

另一方面，由於「文革」動亂和極左思潮的影響，除了教育質量低下的弊病，這種大抓普及教育的發展在結構上也是很不平衡的，甚

至是以犧牲高等教育的代價換來的，1978年大學生佔全國學生總數僅0.4%，只相當於1949年的水平，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低的。[10]

2 官方創作理論體系控制下的極端政治化文化

「文革」頭三年，包括文學、電影、繪畫、詩歌等等舊文化幾乎都被砸爛，代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組織的群眾運動文化，我們將其稱為紅衛兵文化。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特別是1971年各地基層黨組織恢復之後，紅衛兵文化退出歷史舞台，官方文化重新控制輿論陣地。其指導思想，主要是有組織地批判舊的十七年的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路線，宣傳、歌頌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新生事物。與前期紅衛兵文化不同的是，特別強調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的階級路線，紅衛兵等知識分子已經淪落為被教育的對象，失去了話語權。

這一時期的「文革」官方創作理論體系，主要是由創作「革命樣板戲」衍生出來的三種理論。首先是「根本任務論」，這是當時文藝指導理論的核心，即：「塑造工農兵英雄人物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最早出現在〈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紀要〉中。塑造工農兵英雄人物，是「文革」前就已經提倡的。問題在於「文革」中將這一理論極端化、簡單化、模式化，並成為打擊其他文藝形式的棍子。文藝創作只許描寫工農兵英雄人物，全部是「(崇)高、(偉)大、全(面)」，[11]沒有缺點和個人感情、家庭生活。相聲、風景畫、抒情歌曲等藝術品種，由於不能直接反映根本任務，都被打入冷宮。其次是「三突出原則」，這是由「根本任務論」出發制定的創作模式，即：「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最早由于會泳撰文提出，後經姚文元加工定型，以「革命樣板戲劇組」名義推廣。

---

10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9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頁727。

11 以浩然創作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裏英雄人物高大泉為諧音的諷刺說法，

在「以甚麼樣的人物為主要人物，就標誌着甚麼階級成為舞台的主人」的指導思想下，創作的僵化、八股化、臉譜化達到了極致。主要英雄人物的一舉一動，都成為京劇式樣的亮相，燈光、色彩都集中其身，甚至連身高也要壓倒其他人。在文學創作中，「假、大、空」的豪言壯語充斥其口，並且是先知先覺。第三是「主題先行論」，即：文藝創作可以先有主題，然後再到生活中選擇人物，尋找故事，以表現既定的主題。以後，又出現了變種「從路線出發」。這種理論為極左思潮配合當前政治鬥爭需要編造文藝作品大開方便之門，為了達到政治鬥爭的「主題」目的，可以肆意修改事實和創作依據。

1974年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初瀾」（國務院文化組寫作組筆名）的文章〈京劇革命十年〉，對江青一夥鼓吹的文藝理論系統總結說，十年前，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專了我們的政，「整個文藝界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惡濁空氣」。「第一批八個革命樣板戲的誕生」宣告了「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新紀元已經到來」。「過去的十年，可以說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創業期」。文章還吹捧江青說，江青1964年7月發表的〈談京劇革命〉，「充滿着馬克思主義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宣戰的檄文。十年來，它一直鼓舞着革命文藝戰士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的勝利進軍。」

在這種文化方針指導下，各個領域的狀況是：

(1) 電影方面，首當其衝的是樣板戲的普及推廣與改編。最初確立的樣板戲有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交響樂《沙家浜》，一共八個。到1972年，《紅旗》雜誌陸續發表了各個樣板戲的演出本，即中央認可的「欽定」本，又根據這些樣板派生出鋼琴伴唱《紅燈記》、現代京劇《紅色娘子軍》、交響樂《黃河》等，創做出新的樣板現代京劇《龍江頌》、《杜鵑山》、《平原作戰》。到1975年，樣板戲有十八個，其中京劇十一個。這些樣板戲被廣泛地移植為電影，形成了「文革」前期電影的主幹。1967—1972年共拍攝十七部影片，除三部動畫、剪紙、木偶片外，其他都是樣板戲電影。

除此而外，人們只能反覆地看「三戰」（即《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兩列」（即蘇聯斯大林時代故事片《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甚至這些電影中的台詞都能倒背如流，其中如「高，實在是高，高家莊」、「不是我們無能，實在是共軍太狡猾」、「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讓列寧同志先走」等等已經成為社會流行比喻語言。稍後，開始反覆放映幾個「戰友」國家的少量故事片。群眾中流傳着十分形象的一句話：「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賣花姑娘》、《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等，專門展示舊社會的悲慘及新社會的甜蜜），越南電影真槍真炮（均為反映越戰的記實片），阿爾巴尼亞電影摟摟抱抱（《海岸風雷》、《廣闊的地平線》中有中國已絕跡的接吻鏡頭），中國電影《新聞簡報》。」既辛辣又無奈地勾畫了那個時代電影生活的貧乏。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72年10月，國務院文化組召集北京、長春、上海、八一電影製片廠有關創作人員總結拍攝革命樣板戲的經驗。此後，各製片廠即按照樣板戲經驗拍攝故事片。長影拍攝《豔陽天》、《青松嶺》、《戰洪圖》，北影重拍《南征北戰》，上影拍攝《火紅的年代》、重拍《年青的一代》，珠影拍攝粵劇《沙家浜》，西影計劃拍攝《漁島怒潮》等。從1974年春節起，《火紅的年代》、《偵察兵》等四部新故事片開始在全國各地陸續上映。這是「文革」以來，首次上映新國產故事片。以後又陸續上映了《向陽院的故事》、《鋼鐵巨人》等。這些影片絕大部分是按照階級鬥爭模式，安排出正確路線代表（一般為女性黨支部書記）、錯誤路線代表（一般為抓生產的男領導幹部）、階級敵人（隱藏的地主、資產階級或者舊知識分子）三個典型人物。千篇一律，觀眾看來十分乏味。改編的電影更是失敗，遠不如原來的受歡迎。

「文革」後期，又出現了一批與走資派作鬥爭的影片（「文革」後被定性為「陰謀電影」），專指「四人幫」利用手中的文藝工具，以批判走資派、攻擊老幹部為目的而拍攝的影片，大多拍攝於1976年3月以後，即「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進入公開批判鄧小平階段。《決裂》、《反擊》、《春苗》、《歡騰的小涼河》、《盛大的節日》、

《千秋業》等通常都被列入其類。1975年5月，第一部「寫走資派」的電影《春苗》攝製完成。該電影原劇本內容是反映農村合作醫療站為農民熱情送醫送藥的。由於張春橋的插手，將主人公塑造成了造「走資派」反的「英雄」。北影攝製的《決裂》曾轟動一時，表現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裏以黨委書記兼校長為代表的一方，和以副校長、教務主任為代表的另一方的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些影片沒有來得及放映就因粉碎「四人幫」而死亡。

《閃閃的紅星》是「文革」時期受到政治鬥爭各方及觀眾一致叫好的文本。1973年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獲得好評，被稱為「學習革命樣板戲的成功典範」。實際上1974年10月1日公映後江青才首次調看，提出了三十四條修改意見，後又準備批判，要求一個鏡頭也不能改動。[12]影片表現了1930年代紅軍中央根據地人民的鬥爭，塑造了小英雄潘冬子的形象。最精彩的藝術片斷，是潘冬子乘竹筏順江而下。清澈的江水、時疾時緩的竹排、不斷掠過的青山、翱翔高空的雄鷹，組成一幅優美的立體畫卷。配以李雙江演唱的〈紅星照我去戰鬥〉，充滿詩情畫意。不僅「文革」期間，而且在中國電影史上也是難得的優美段落，歌曲被長期流傳。

（2）文學方面，「文革」頭三年曾經湧現了大量的紅衛兵文藝作品。隨着革命委員會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再次控制各個單位，這些自發作品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官方御用寫作班子指導下的工農兵文學。

1971年林彪事件後，文藝書刊的出版得到有限度的恢復。《北京新文藝》（原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率先復刊，到1973年夏季《廣西文藝》、《廣東文藝》和《革命文藝》（內蒙）等全國大部分省市文聯（或作協）的機關刊物都已復刊。1975年7月毛澤東做出了有關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人民文學》、《詩刊》等六家文學雜誌在不久後得以復刊。除了1973年出齊魯迅作品單行本24本、1974年出版

12　崔斌箴：〈電影《閃閃的紅星》拍攝前後〉，《百年潮》，2006年第4期。

20卷《魯迅全集》外，1975年《三國演義》、《儒林外史》、《水滸傳》等古典作品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文藝書籍荒蕪的現象略有改善。「文革」前期一度被迫停止寫作的少數詩人有了寫作可能。如李學鰲、李瑛、臧克家、嚴陣、顧工、阮章競、劉章、紀宇、沙白，以及1950－1960年代的一批工人作者，都發表過一些主流作品。葉辛、張抗抗、王小鷹、賈平凹等一些知識青年開始在各地文藝刊物上以個人署名發表作品。這些作品儘管還不能擺脫政治的控制，但畢竟帶有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也遭受到當時政治形勢的衝擊。如1976年《人民文學》復刊第一期發表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描寫了老幹部為企業整頓所做的努力，就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批判。

這一時期，佔主流的還是極左政治勢力控制的反映現實鬥爭的著作和刊物。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小說《虹南作戰史》是上海市委寫作組領導下，由土記者和農村幹部三結合的「上海縣《虹南作戰史》寫作組」創作的。雖然是歷史題材，但情節設置、人物刻畫、結構和語言，都緊緊為當時兩條路線鬥爭主題服務，因此不僅政治上僵化、而且藝術上也是完全失敗的。在上海，還創辦了由市委寫作組直接控制的《朝霞》等一些以文藝刊物為形式、進行政治批判的刊物，其作品從文藝角度看基本沒有價值。

總體上說，「文革」主流文藝作品把文學推向極端政治化和僵化，建立起排他性極強的規範；創作題材只能局限在表現工農兵的生活，或反映革命派同走資派兩條路線的鬥爭上；作家必須遵循「主題先行」的原則，從既定的政治路線和方針出發，而不是從具體的生活感受出發進行創作；創作必須向樣板戲學習，把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形象作為根本任務，在人物塑造中，必須嚴格遵循樣板戲的「三突出原則」；在藝術技巧上，只能向樣板戲使用過的傳統文化吸取一些營養；在藝術風格上，規定只能用歌頌和揭露的語式來表現，不准表現現實生活的複雜、人物心理的矛盾。因此，這一時期「文革」主流文藝作品雖然產量並不算太少，但多為藝術平庸之作。

當時最有代表性的小說、詩歌、文學理論作品是：

浩然著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浩然，1932年出生，河北賈坻縣人。1946年參加革命，194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曾任《紅旗》雜誌編輯、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文聯和作協副主席、《北京文學》主編等。他的長篇小說《豔陽天》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別於1964年、1966年出版，描寫了北京郊區東山塢農業社圍繞「土地分紅」和糧食問題所發生的衝突，着力塑造了農業社黨支部書記、社主任蕭長春這一新時代的高大農民英雄形象。同時也塑造了農業社副主任、老黨員馬之悅、反動地主馬小辮等對立人物和一些動搖於「兩條道路」之間的「中間狀態人物」。小說出版後，即被評論為「對農村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的描寫有着明顯的特點」，「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領頭人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浩然在「文革」中並沒有受到其他作家那樣的被衝擊遭遇，反而得到青睞，能夠享受獨自在承德避暑山莊煙雨樓寫作的特殊待遇，於1971年出版了《豔陽天》第三部《金光大道》，成為「文革」時期絕無僅有的巨幅作品。

這部小說的階級鬥爭模式表現得更加清晰，同一階層內左、中、右各色人等的區分也更加細緻。蕭長春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和以階級異己分子、農業社副主任馬之悅（即走資派的前身）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的劃分，竟然用了一條街道。代表資本主義勢力的一方住在溝北，代表社會主義力量的一方住在溝南。雙方在土地分紅、鬧糧、倒賣糧食、搶糧庫、退社等一系列問題上反覆展開了尖銳、激烈的鬥爭，從而揭示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在發展中所經歷的曲折過程，宣揚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理念。此外，小說還通過地主馬小辮在北京讀書並往回寫陰謀信件的小兒子，把東山塢與外界聯繫起來，放到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中去，從而達到作者把這個小村同當時國際上的反共高潮和國內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這些形勢聯繫在一起的目的。另一方面，由於作家長期深入農村體驗生活，作品語言敘述有鄉土特色、濃郁的時代生活氣息和人物的時代精神風貌，使得《豔陽天》在「文革」時期模式作品，

之中，超出了一般機械的簡單教條圖解生活的方式。在當時文學百花凋零的情況下，還是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

張永枚著詩報告〈西沙之戰〉。張永枚，1932年出生，軍旅詩人，兼創作小說等。原名張實若，生於四川萬縣。長期在廣州軍區政治部作專業創作員，著有著名歌詞〈騎馬挎槍走天下〉，詩集《新春》、《海邊的樹》、《雪白的哈達》等。他於1973年率先提出「新詩也要學習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並具體列出了學習要點：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正確地貫徹執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千方百計地塑造工農兵的高大英雄形象；把敘事和革命抒情完美地結合起來；精諶語言藝術；千錘百煉、一絲不苟的創作態度等。[13]

詩報告〈西沙之戰〉是「文革」時期唯一的著名長詩。1974年1月17日中國海軍和南越海軍交火的西沙群島自衛反擊作戰打響後，第二天張永枚即趕往前線採訪，回來後寫成詩報告〈西沙之戰〉，在《人民日報》上刊載，電視台並反覆朗誦。當時被稱作是「新詩創作中學習革命樣板戲創作經驗的成功範例」。張由此成為「文革」走紅作家。以文學標準看，這不過是一部當時國際政治鬥爭需要的產物，並沒有他以前作品的風格和神氣。詩報告把「詩」和「報告」這兩種文體結合起來，以隱喻的手法吹捧說：西沙之戰勝利的「力量的源泉」來自於江青拍的那張廬山仙人洞照片和她說過的那句「把敵人從西沙趕跑」的話，成了奪取勝利的「無聲的命令」和「精神原子彈」。再加上張赴西沙前線是江青點名派去的；當年又與浩然一起被江青寫信指為代表，向葉劍英、鄧小平等人送批林批孔材料；並派去改編樣板戲、指導「革命兒歌」創作等活動，捲入了政治漩渦。「文革」後他被審查四年，最後結論與江青是「工作關係」而得到解脫。

郭沫若著《李白與杜甫》。1971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作者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寫的篇幅最大的學術著作，也是最後

13 《人民日報》，1973年3月25日。

一部學術專著，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出版的僅有幾部學術著作之一。[14]作者顯然是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傾向，改變了自己過去從關心勞動人民立場出發的推崇杜甫、抑壓李白的態度。他在書中用主要篇幅，貶抑杜甫、尊揚李白，比較了唐代詩人李白與杜甫的生活道路、政治態度、宗教信仰和創作情況。書中還提出了一些在學術上值得重視的見解，首次提出李白「出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的觀點，[15]駁斥了蘇聯學者宣稱的「中國疆土歷來在長城以南」的言論。書中對杜甫與宗教的關係，也有值得注意的價值。雖然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主觀色彩較濃厚，但總的來說，該書還是一部政治與學術結合得較好的作品。

(3) 美術方面：「文革」初期，除了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等繼續得到宣傳外，湧現了一批以領袖為創作主題的作品，多數是宣傳畫。其中皎皎者如署名「北京院校同學集體創作劉春華等執筆」的大型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吳冠中的國畫〈炮打司令部〉，鄭騰天、周瑞文、徐君萱的油畫〈人間正道是滄桑——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等。〈毛主席去安源〉把「紅、光、亮，高、大、全」這些「紅色現代主義」美學原則，在油畫上充分表現。構圖上，毛澤東處於最突出的位置；動態處理上，毛澤東稍稍揚起的頭，緊握的左手，都含着深意；半舊的藍布衫和舊雨傘，天上的風雲，近景草木，遠景群山，也無不具有象徵意義。採用油畫造型的手法，又吸收了中國重彩畫細緻的長處，形成了新的藝術特色。[16]「文革」後期，開始出現隨着政治運動的需要而以工農兵為主體的美術作品。1972年5月開始，舉辦了「文革」以來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晚會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以後又舉辦了全國連環畫、中國畫展覽（1973年10月），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

14　其他還有章士釗：《柳文指要》，得到毛澤東的特許出版。

15　近年有人提出，郭的這一見解，是利用當時特殊政治地位「借鑑」了其他不能發表作品的學者的成果。

16　王明賢：〈紅衛兵美術運動〉，收入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357－370。

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1974年10月），全國年畫、少年兒童美術作品展覽（1975年10月）。此外還先後舉辦了戶縣農民畫展、上海陽泉旅大工人畫展，並且舉辦巡迴展覽和出版，在報刊上廣泛宣傳。這些作品大部在國務院文化組領導、策劃下，由青年美術工作者和業餘作者挑頭、實力畫家參加和捉刀的各種創作組完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改畫組」。由於作品多數是政治需要的產物，如油畫「魯迅」、工農兵形象及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儒家、法家歷史鬥爭畫展覽等，因此題材單調，有人形容是：「補不完的衣裳，挑不完的水，扎不完的針灸，摸不完的被。」[17]只作為一種特殊形式而受到後世收藏家的青睞。

值得一提的是陝西戶縣農民畫的崛起。

戶縣有着悠久的剪紙、刺繡等民間藝術傳統。「大躍進」時期，戶縣展開大規模的壁畫宣傳活動，培養出首批農民美術作者三十餘人，當時美術宣傳活動搞得好的村子有397個，佔全縣80%以上。此後、省、市、地的群眾藝術專家也常來戶縣指導群眾美術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部分農民作者曾搞過「群醜圖」、「批黑畫」等活動。1970年起，戶縣文化館先後在寶雞峽水利工地和0702戰備公路工地為民工舉辦了多期美訓班。1972年，國務院文化組在北京召開全國美術展覽，戶縣劉志德、李蘭鳳兩人出席，戶縣農民畫家第一次進北京。〈喜摘新棉〉等七幅戶縣農民畫參加了本屆全國展覽。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戶縣農民畫選集》，選登了四十餘幅優秀作品。1973年10月，國務院文化組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戶縣農民畫展覽」，展出作品318件，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都分別作了報導。《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中寫道：「……作為一個縣的農民畫到首都來展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也是世界美術史上的第一次創舉……」當年12月至1974年

17 魯虹：〈1972年至1975年的四次全國美展〉，《世界藝術史研究·文革美術》，http://cn.cl2000.com/history/wenge/articles/research/005.shtml。

7月，在北京展出的140件戶縣農民畫作品巡迴全國，先後在哈爾濱、合肥、上海、南寧、昆明、烏魯木齊、太原、西安等八個大城市展出，參觀觀眾達三十七萬餘人次。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古元以及中國美術界名流教授都先後來戶縣講課和指導，西安美院也下到戶縣蹲點辦學，對戶縣農民畫的發展提高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國家郵電部還發行了「戶縣農民畫紀念郵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製了《戶縣農民繪新天》專題新聞片。粉碎「四人幫」後，戶縣農民畫一度被指摘為「四人幫極左路線的產物」，不久繼續得到肯定。

戶縣農民畫的表現手法有明顯地域特色，以大紅大紫的色彩、誇張化的描述、簡潔明快的風格為藝術特點，適合群眾運動的宣傳需要，因而在「大躍進」運動中應運而生。「文革」對工農兵創作者和主題的特殊照顧，更使其得到了蓬勃發展。雖然受到時代一定影響，但總體上有較高藝術價值。

(4) 歌曲方面：這一時期，官方認可和提倡的歌曲都集中收入《戰地新歌》歌曲集。由國務院文化組革命歌曲徵集小組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72年至1976年先後出版五集。這是「文革」期間除樣板戲以外宣傳和流行最廣的文藝作品。其中前期幾集主要收錄為《毛主席語錄》、毛澤東「最新指示」和毛澤東詩詞譜曲的歌曲，及歌頌領袖、「文革」和紅衛兵造反歌曲；後期也包括許多「文革」時期創作的優秀民族和地方、行業歌曲，如蒙族民歌風格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北京頌歌〉、〈我愛這藍色的海洋〉、〈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阿佤人民唱新歌〉等；還有〈我愛北京天安門〉、〈一分錢〉、〈火車向着韶山跑〉等兒童歌曲。

在當時肅殺的文化社會，人們只能反覆唱和聽這些歌曲，久而生情。一些曲調優美的抒情歌曲如張越男演唱的〈北京頌歌〉，傳遍全國，流韻至今。

歌曲政治化的代表之作，當數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戰地新歌》第三集、作者署名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文藝學習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該歌曲本誕生於批林批孔運動，1976年批鄧反擊，

右傾翻案風時成為主題歌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覆廣播，群眾演唱會上必須高唱。1976年夏季全國各地舉辦的群眾歌詠大會即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定名，一時間「就是好！就是好！」的狂飆響徹大地。

(5) 畸形發展的官辦群眾文化活動。在這一時期，為政治鬥爭服務的群眾文化發展到了頂點。最有代表性的是位於天津市寶坻縣的小靳莊，1974年6月，江青帶一些人到天津尋找農村「批林批孔」的典型，知道了小靳莊辦「政治夜校」和開展文藝活動的情況，便宣布：「這就是我的點了！」通過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發表小靳莊經驗，推廣全國。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重要報導〈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十件新事〉，所說的十件新事是：一、辦起了一所深受群眾歡迎的政治夜校；二、培養貧下中農的理論隊伍；三、貧下中農登台講歷史；四、大唱革命樣板戲；五、成立了文藝宣傳隊；六、開展群眾性的詩歌創作活動；七、開辦圖書室；八、講革命故事；九、群眾性體育活動蓬勃發展；十、移風易俗、破舊立新。隨後，全國掀起了學習小靳莊的浪潮。

小靳莊新文化生活發端於1971年開辦的政治夜校，起初以學政治理論為主，結合學文化、農業科學技術。佔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男女整半勞力有一百多人參加了夜校學習。辦學形式也較活潑，課前課後或休息時，常有人唱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或本地人朗誦自己詩作，場面熱烈、氣氛歡快，受到農民歡迎。村中還不時組織籃球等體育比賽。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農民文化生活，有一定積極意義。但自從江青抓後，便成了反映高層政治鬥爭的工具。江青幾次親自到場煽動，甚至蠻橫地給社員周福蘭改名「周克周」，解釋說「用我們的周去克他那個周」。還宣傳「女人掌權」論說：「到了共產主義也有女皇。」

小靳莊農民素有寫詩傳統。熱潮最早出現於19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時。1970年代初，人們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工地上常自發編些順口溜，出現了賽詩對詩會。這是緊張勞動之餘的一種精神調劑，作品富有鄉土氣息。如：「榆木把，『勝利』胎，八號輻條真吃載，一車

推它千八百，打夯的同志要加快！」「姐妹們，加油幹，哪怕汗水流滿面。頂涼風，冒嚴寒，抬泥萬擔不換肩。裝大車，掄大夯，推車勝過男子漢。時代不同今勝昔，婦女能頂半邊天。」1974年6月，江青第一次到小靳莊後第二天，《天津日報》就發表了四首被「修改」的小靳莊農民詩歌。由此，小靳莊農民詩歌開始「變調」，內容緊跟政治鬥爭需要，並為江青歌功頌德。1975年初，《小靳莊農民詩歌選》出版，被稱之為「革命的戰歌、時代的畫卷」。1976年6月，又出版《十二級颱風颳不倒》和《小靳莊農民詩歌選》第二集，配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小靳莊詩歌從質樸「農家詩」變質為「御用詩」。

寶坻縣是評劇發源地之一，素來有京、評、梆等戲劇的群眾基礎。「文革」中，社員人人都會唱上幾段樣板戲，晚飯後在街口交替演唱，形成一個樣板戲小晚會。江青抓後，自發活動發展為強制性的。要求不管年歲大小，人人都要會唱。還佔用勞動時間安排專人教唱，調來大批解放軍戰士和機關幹部去替他們生產。有人嘲諷說，小靳莊是「社員唱戲，請人種地」。[18]

在江青等輿論導向下，全國掀起了學習小靳莊的浪潮，各地的城鎮、農村紛紛辦起政治夜校，成為群眾進行政治批判和宣傳的主要陣地。還出現了「社會主義向陽大院」等複製品。被稱為：全國處處小靳莊。粉碎「四人幫」後，「小靳莊經驗」遭到了批判。

在這一時期，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對文化事業中的極左思潮進行了盡量的抵制和糾偏。

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來審查北京軍區、海軍、空軍和總政治部宣傳隊表演的文藝節目時指出：現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對立的統一，要有張有弛，有激有抒。你們的節目只有「革命激情」四個字，這是濫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時洶湧澎湃，但有時也很平靜。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種偏

18　以上資料據《小靳莊「典型」始末》（徵求意見稿），未刊稿。

向。革命友情、戰鬥豪情、官兵之情、軍民之情為甚麼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勁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後不能再搞那些標語口號似的東西，這些傾向都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極左思潮不肅清，文藝就不能發展。以後，周恩來還委託工作人員向表演該節目的演員傳達他的意見：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強越好，節奏越快越好；〈游擊隊之歌〉唱得太快了，沒有意境，過去不是這樣唱的。沒有革命的抒情，就沒有革命的激情。[19]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出版會議，原計劃召開兩周，但因面臨許多複雜問題，延長四個多月才結束。會議代表交流、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極左思潮泛濫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尤其關心大批封存圖書如何解禁、如何解決當時出版隊伍不適應出版工作的需要等問題。周恩來於4月12日和6月24日兩次接見會議代表，在講話中嚴肅地批評了出版工作中形而上學、割斷歷史、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極左思潮。他說：「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歷史書。」「現在書店裏中國和外國的歷史書都沒有。不出歷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或受唯心史觀限制的學說發展來的。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麼行呢？」「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周恩來還嚴厲批評了有的地方把封存圖書都燒掉的錯誤做法，他氣憤地說：「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魯迅全集》封起來幹甚麼？這不是滑稽得很嗎！」「一面說青年沒書讀，一面又不給他們書讀，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斷。無怪現在沒有書讀了，這完全是思想壟斷，不是社會主義民主。」[20]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同意出版口領導小組關於〈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和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插手，會議報告提出了關於出版戰線的「兩個估

1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77、599。

20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470、471。

計」：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出版工作是「反革命專政」；「出版隊伍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要求編輯隊伍要「摻沙子」，吸收工農兵參加。

1973年1月1日周恩來、江青、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電影、戲劇、音樂等文藝工作者代表，要求把電影抓上去。周恩來指出，過去幫助關心不夠，抓遲了。群眾提意見，說電影太少，這是對的。不僅電影，出版也是這樣，這是我們的大缺陷。他要求「經過三年努力，把這個空白填上，群眾要求很迫切」。他還說：「總結七年來（指「文革」開始以來）這方面的工作，還是薄弱的，文化組要把電影工作大抓一下」。[21]

江青集團對周恩來的意見進行了封鎖、抵制和攻擊。

1972年1月，當國家出版機關把根據周恩來出版魯迅著作指示制定的規劃報告送上時，姚文元卻批示「待研究」，把一系列的有關魯迅著作註釋出版的計劃扣壓下來。出版機關選編註釋了魯迅的雜文、書信合本，姚文元就以「雜文同書信分開」、「收信人有問題」為名，把書信砍去。對編選註釋的魯迅雜文、書信和文學創作等各種選註本，姚文元也「以省註釋之繁」扣壓了樣稿。1972年9月，姚文元在批示中說，魯迅的著作，「用今天的眼光看，可刪之處尚有不少」，最後下批語：「我的意見，不必再選了。」迫使已上機待印的選本下馬，只准重印舊版。

1973年底，隨着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遭到毛澤東嚴厲批評，江青集團轉守為攻。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初瀾」（即國務院文化組寫作組）文章〈要重視文化藝術領域的階級鬥爭〉，提出：「無產階級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要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是不肯輕易的放棄他們的思想文化陣地，在某些角落，他們還在負隅頑抗。」「我們必須以黨的基本路線為綱，重視思想文化藝術領域中這一階級鬥爭的

21　文化部藝術研究院研究室編：《文藝大事記》，內部未刊稿，1979年編。

動向。要清醒地看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切不可掉以輕心。」

早在1973年元旦周恩來批評「文革」以來七年電影太少時，江青當場就反駁說：「不是七年，是解放以來，二十幾年電影成績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經驗太少，很糟。」張春橋也說：「說少的絕大多數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些。當然也不排除少數別有用心的人。」[22]

1974年1月1日，「初瀾」再次發表文章〈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談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針對周恩來批評文化大革命以來文藝作品少、不能滿足群眾需要的正確意見，文章明確挑明：「最近又有一種論調，就是攻擊我們的作品少」，「這是階級敵人放出來的陰風」，「正是階級鬥爭在文藝問題上的反映」。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毒草「簡直多得充斥市場，泛濫成災」，「對於這種『多』」，「要嚴加批判，把它們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裏去」。此文發表以後，報刊上連續刊登出所謂討論文化大革命前後文藝作品「多」與「少」的文章。

3 毀譽參半的醫療衛生「新生事物」

1949年以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條件極為落後，巫師神漢等封建迷信風行，也有一些走鄉郎中起着簡單的醫護、接生作用。1958年「大躍進」過程中，許多公社建起了合作醫療制度和衛生站，取締了非法行醫。但這些基層集體醫療組織由於缺乏經濟保障，難以持續和發展，於是農村醫療衛生出現了一段時期的專業人員空白，這也是遇到嚴重經濟困難局面時發生農村非正常死亡人口劇增的一個重要原因。

1965年，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同時，他還嚴厲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當時一些城市醫療衛生管理部門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確實存在着不夠重視的現象。

---

22 《文藝大事記》。

毛澤東嚴厲批評後，許多城市醫療衛生人員，包括著名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內科專家張孝騫、小兒科專家周華康、外科專家曾憲九、婦科專家林巧雅等都響應號召，參加巡迴醫療隊，跋山涉水來到農村，長期奮鬥在艱苦的環境中，為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培訓基本的農村醫療衛生人員做出了貢獻。「文革」開始後，這種「為農民服務」的主旨被轉移到貫徹「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批判「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兩條道路鬥爭」的軌道上來，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一度癱瘓。

隨着衛生領域「鬥批改」運動和大批下放醫療衛生人員開展的同時，1968年9月3日，姚文元給毛澤東寫信說：「衛生系統的革命也是一大問題」，並附上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告在對江鎮公社衛生院兩位年齡差不多而經歷不同的醫生進行對比後指出：「這個鮮明的對比，暴露了舊醫學教育制度嚴重脫離政治、脫離實踐的弊病，顯示出赤腳醫生這支新型醫療衛生隊伍發展的巨大生命力。」毛澤東同意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發表，批示：「對這些人應當進行教育，使他們逐步獲得改造。」[23]

11月30日，姚文元又給毛澤東寫報告：推薦湖北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制度的報導。經毛澤東批准，《人民日報》發表了長陽調查報告〈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黃村、良鄉公社對樂園公社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貧下中農、農村基層幹部、公社醫務人員座談會紀要〉，《紅旗》雜誌發表了〈楊屋大隊實行合作醫療的調查報告〉。此後，這兩種醫療制度被在農村廣泛加以宣傳、推廣。

所謂「赤腳醫生」，就是從農民中挑選出來，經過簡單培訓，不脫離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村衛生人員，採取巡迴下鄉、田頭出診的方式；所謂「合作醫療制度」，就是由公社、大隊集體和農民個人共同集資，分擔農民部分醫療費用的辦法。這些在1950年代已經出現的形式，被稱為是文化大革命中和舊醫療衛生制度鬥爭後湧現的新生事物。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58。

「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的出現，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落後的衛生事業狀況。到1975年，全國已有「赤腳醫生」一百三十多萬，衛生員、接生員三百六十多萬，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制度。[24] 1974年5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二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代表團介紹了中國進行農村衛生建設的情況，包括「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以及如何組織城市醫藥衛生人員下農村等，引起了國際衛生組織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很大興趣。即使在「文革」結束以後，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年報中還特別給予高度評價說，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但是，中國農村落後的衛生狀況是長期複雜的歷史原因造成的，在生產力不能迅速提高，農村經濟、文化、教育、交通等條件不能大幅度改善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改變醫療衛生制度，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1973年4月20日，毛澤東會見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時也說：赤腳醫生也是個窮辦法，沒有別的辦法了，只好用這種辦法了。學那麼幾個月就去當醫生，在治病過程中學習，不然，哪有那麼多上過大學的醫生呢！

當時，許多貧困農村地區首先是要解決溫飽問題，集體和個體農民根本拿不出很多餘錢來買藥治病。同時，平均分攤費用的辦法也助長了平均主義傾向。而「文革」時期推廣這一辦法中，把城市和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把普及和提高醫療水平對立起來，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更阻礙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提高和發展。如在電影《春苗》中，將醫學院教授研究「馬尾巴功能」的基礎理論研究，批判成「走資派」支持的「右傾翻案風」，嚴厲打擊。許多在尖端研究中有突破的著名專家學者被迫下放農村，從事簡單的常見病治療。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曾經一度被作為「文革」遺產遭到否定。許多農村地區的合作醫療制度名存實

24 華國鋒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75年6月26日。

亡，樹立的樣板多數解體，只有少數堅持下來。經過改革開放，東部沿海許多率先實現小康的農村地區建設起了鄉村醫院、實行醫療費用由集體負擔的制度，基本解決了農村的醫療衛生問題。但是，中西部農村地區仍然存在缺醫少藥狀況，甚至更加嚴重，「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再度得到肯定和關注。

這一時期醫療衛生的一個歷史性起步，是「四五」計劃第一次把人口增長指標納入國家計劃，計劃生育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在此之前，國家只有物質生產計劃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計劃，而沒有人口計劃，計劃生育只由衛生部作為一項技術工作負責，不視為計劃管理內容。1963年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長的指標，但是仍然沒有全國的人口計劃。「三五」計劃也只提出了計劃期末總人口要達到的規模。從「四五」計劃開始，才提出了計劃期末人口自然增長率要達到的水平。

1969年3月，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說：「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訂『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訂『三五』計劃的時候。……總之，八億人口快要到了，節育工作一定要抓緊。」1970年6月26日，周恩來接見衛生部軍管會全體人員時又指出：「不能把計劃生育和愛國衛生運動放在一起。計劃生育屬於國家計劃範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了，還搞甚麼國家計劃！」1971年國務院51號文件提出了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的人口控制指標，要求在「四五」期間，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原來城鄉綜合增長率就低的，則不應回升。1973年6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第一次把這些指標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此後，歷次國家計劃均包括有人口指標，使計劃生育真正做到名實相符。同年12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根據當時的人口發展目標要求，參照有些地區的實際做法，提出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晚：男25周歲、女23周歲以後結婚；稀：兩胎間隔四年左右；少：一對夫婦不超過兩個孩子），使國家的人口計劃和家庭的生育計劃緊密聯結，產生了很好的效益。

1974年12月29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25]在此前後，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谷牧向毛澤東匯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也指示：國民經濟要抓上去，人口非控制不可。毛澤東這個批示成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基本指導原則。197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這個報告時又指出：「計劃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遵照黨中央指示，各級黨委都要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指定一位負責同志分工抓好這項工作。」[26]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河北省關於開展計劃生育和晚婚晚育工作的兩個報告，要求各地要認真總結和推廣先進單位的經驗，把計劃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上海市、河北省的計劃生育和晚婚晚育工作，成績比較顯著。1973年同1965年相比，上海市人口出生率由17‰下降為10.25‰，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1.3‰降為4.78‰，1974年上半年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低於上年同期。河北省的晚婚率達到了85%以上，節育率達到80%以上。

應該說，和一般想像不同，「文革」後期的計劃生育是一個重要開端。到1975年，全國計劃生育已取得顯著成效，這一年總人口增長率為1.7%。從1974年到1985年十二年間人口共增加15321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33%，較前一階段大大降低。[27]

二　激化的社會矛盾和孕育中的異端思潮

1　上山下鄉成為社會火藥桶

長期以來，毛澤東一直對機關幹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脫離群眾和體力勞動的現象擔憂，認為這是出「修正主義」的溫牀。為此，

25　常崇煊主編：《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19。

26　《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頁19、360。

27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2。

他在「五七指示」中曾設想出一種將各行各業融合一體、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的新社會結構。由於城市工業的不發達，就業問題嚴重，按照越艱苦越能鍛煉人的認識，條件最差的農村便成為廣闊的低成本投放實驗室，在「文革」期間實施了一個有悖常理、違反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律的決策——將大規模城鎮人口驅向農村。毛澤東十分堅持這個方式，直到1975年，他還對越南外賓稱讚柬埔寨紅色高棉把金邊市民通通趕到鄉下去的做法。

本來，隨着工業化和非農產業的發展，應該是愈來愈多的人口脫離傳統的農業和落後的農村，轉入現代產業和城鎮。「文革」期間大規模的人口逆向流動，雖然也有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的「救急」考慮，但主要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不僅對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將過去「大有作為」口號改成「接受再教育」，而且對已經就業的知識分子、幹部等也下放到農村或「五七幹校」從事農業勞動。結果不僅是當時人力和資本投入與產出相比，得不償失，而且還影響了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毛澤東的實驗是從「鬥批改」運動的精簡機構、下放幹部開始的。

1968年3月，中共中央轉發河北省革委會的一個情況報告，提出把三分之二的幹部下放，同「舊政權機構」嚴格區分開。7月11日，《人民日報》介紹了河南省靈寶縣革委會「精兵簡政」的經驗。將原來縣機關「八組二室」的近一百人，精簡到四組三十人。精簡下來的幹部送到哪裏去呢？9月3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總編室編印的「文革」《情況彙編》〈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上給姚文元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28]《情況彙編》介紹說：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縣柳河舉辦「五七幹校」，耕種土地三千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接近了貧下中農，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個經驗。編者按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73。

語中公布了毛澤東的指示。此後，與精兵簡政相配合，全國掀起了下放幹部的高潮。大批幹部被送往在農村興辦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在江西、遼寧、江蘇等地還推廣了幹部插隊落戶的經驗。

在「五七幹校」中，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從事體力勞動，經受了鍛煉，對農村社會和下層人民的疾苦增加了了解，有一定好處。但是，這種下放幹部運動是配合「清理階級隊伍」、對知識分子「再教育」運動進行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政治懲罰性質。被送往幹校的，往往是被認定存在問題多的單位的幹部，或是「有政治問題」的人，或者被造反派不滿意的人。在幹校按照軍事編制的連、排、班管理，實行嚴格的思想壓制和人身控制，要求互相揭發批判政治和歷史問題，進行「思想鬥爭」，不准隨便外出和回城探親，違反規定者就要受到從事重體力勞動甚至批判鬥爭的懲罰，嚴重地摧殘了知識分子的身心，有些人自殺或是因病得不到及時治療死亡。以下放為機，又裁撤了大批文化、科研單位，使有管理經驗的幹部和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長時期脫離專業和文化、科研事業，從事簡單的放牛養豬、鋤草耕地、挖土運肥等農業勞動，給國家造成很大的知識和人才浪費。而且，這些幹校根本不能自給自足，國家每年都要拿出大筆經費來彌補「五七幹校」造成的經濟損失。

對於農民來說，當地的「五七幹校」也沒有給他們帶來甚麼實質好處。由於機關幹部有眾多人口要消耗糧食和副食，辦幹校的地方不能自然條件太差，而幹校經常要與城裏機關聯繫，交通也不能太閉塞。因此，幹校多設在中部的長江南北和鐵路線附近，如河南的信陽、湖北的襄樊、江西的新余等。這些地區的農村本來就是人多地少，一下子增加了大批爭奪土地的人口，實際上是減少了農村和農民的單位糧食產量和經濟收入。這些幹部多數帶有原工資，因為生活艱苦，經常要偷偷地到集市貿易上去購買商品糧和肉蛋副食「改善伙食」，也造成當地供應緊張，物價上漲。農民嘲諷機關幹部務農這種不講經濟效益的現象說：「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

周恩來認為「五七幹校」這種做法是權宜之計。1971年1月15日他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就精簡機構和下放幹部等問題說：從前在

城市裏工作的有能力的幹部，在經過「五七」幹校的再教育後，已經或將要到各地去加強地方的領導工作，加強從前屬於中央政府現在下放給地方機構的工礦交通運輸部門的領導，這些單位需要很多幹部。

但是，作為一種「文革」的新生事物，肯定與否定「五七幹校」直接關係到對「文革」的態度，各級當局又不得不極力維持它。197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五七幹校」會議在北京召開。總結說，近兩年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先後創辦了一百多所「五七幹校」，近九萬名幹部參加。會議介紹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外文局、中共中央黨校的辦校經驗，要求各機關對在職幹部下放勞動做出計劃，形成制度，堅持下去。不僅如此，會議在討論「五七幹校」今後的任務時，還變本加厲地指出「五七幹校」要分期分批地組織學員到農村插隊，接受再教育，參加勞動，當好「參謀」，搞好革命和生產。「五七幹校」的形式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終止。中國還幫助老撾開辦了各種「五七幹校」。

如果說機關幹部由於帶有工資，生活有統一管理，還不至於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那麼強制性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路在這一時期越走越窄，已經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火藥桶。

1950年代中期，為了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問題和改造農村落後面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就提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的號召。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萬城鎮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受到廣泛宣傳，家喻戶曉。「文革」發動後，「停課鬧革命」和大學停止招生造成應屆大中學生積壓，不能畢業和升學。其中1966、1967、1968屆初、高中學生（通稱「老三屆」）有1100萬，其中城鎮學生佔400萬。經濟的停滯不前使城市就業問題空前嚴重，根本無法容納如此巨大的就業人口。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青年學生又被當作接受「再教育」的對象，於是上山下鄉成為主要出路。

「文革」初期，已經有一些學生主動來到農村。北京長辛店鐵路高中二年級學生蔡立堅，第一個帶頭到串連時經過的山西榆次杜家山插隊。1967年10月，北京幾所中學的曲折等十名學生前往內蒙古自

治區白音寶力格公社集體落戶，成為「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的發端。《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此後，陸續有幾批學生奔赴東北、雲南等地。1968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分別發出分配中學生的通知，把上山下鄉作為主要方向，上山下鄉開始掀起了一個高潮。到10月，16個省、市、自治區已有70萬城鎮中學生到農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29]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達到了頂點。各級革命委員會敲鑼打鼓，動員和歡送學生上山下鄉。全國城鎮初中、高中各屆畢業生，大部分甚至整個班、整個年級地被安排到農村去。僅1969年1、2月份，全國就有155.6萬人下鄉，到年底，全國共有267.38萬人下鄉。加上1967、1968年人數，達467萬人，包括了積壓的絕大多數「老三屆」學生。大學的應屆畢業生也多數被安排到農場去接受鍛煉。從此，這種上山下鄉方式成為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一種固定做法，延續多年，各地都設置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管理機構。上山下鄉的具體途徑有：

插隊：即個人到生產隊安家落戶，或集體設立「知青隊」、「知青點」。

軍墾：到邊疆生產建設兵團。

農場：到內地的地方農場等。

還有一些子女隨父母去了「五七幹校」。山西、陝西、安徽等省農村和黑龍江、內蒙古、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是接受知識青年最多的地方。

廣大知識青年來到農村、邊疆，用自己的寶貴青春為改造祖國的農村做出了貢獻，在艱苦的環境中經受了鍛煉，在一些不發達地區起到了傳播文化、普及科學知識的作用，湧現出一批英雄模範人物和事跡。上海知識青年金訓華在黑龍江遜克縣插隊，為搶救國家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616。

財產，奮戰山洪，英勇犧牲。在內蒙古草原插隊的天津女知識青年張勇，為搶救落水羊隻不幸犧牲。到陝西延安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孫立哲通過勤學苦練，當上「赤腳醫生」，十年中為農民做大小手術三千多例，治療病人八萬多人次。江西上饒知識青年嚴洪華來到安徽肥東縣插隊，組織農業科研小組，歷盡艱辛，試製成功「920」農藥和仿生物農藥「殺蟲雙」。河南鄭州知識青年薛喜梅在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帶領社員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開荒栽樹，把荒灘變成果園。北京女知識青年辛溫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科研小組，種植「金雞納」樹，精心培育，使種子出苗率大大提高，還寫出專著，填補了中國在培育金雞納幼苗方面的空白。河南女知識青年耿景洪在大別山區任民辦教師，和大家通過勞動自建校舍，上山打柴湊集經費，翻山越嶺走訪家長，使這個偏僻山區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6.5%。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五師四十三團的知識青年為撲滅大火被困在山溝裏，有69人在烈火中犧牲。他們的奮鬥精神，值得後人欽佩。胡耀邦在1979年曾經說：他們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國的歷史上，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寫上一筆，用來教育我們的後代。

但是，在「文革」的動盪環境中，上山下鄉運動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批的知識青年失去了繼續升學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造成了國家各行各業的人才斷層，使「文革」時期中國少培養了一百多萬大專畢業生和二百萬以上的中專畢業生。

由於對上山下鄉缺乏系統、具體的安排，一味施加「接受再教育」的政治壓力，知識青年在農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有的農村地方原本人多地少，經濟不發達，缺少接受知識青年的經濟環境，致使知識青年長年勞動後仍然生活困難，甚至不能解決基本口糧。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反而欠下生產隊的口糧錢，不得不向城裏家長求助，這種現象十分普遍。社隊和農場也虧損嚴重，加重了知識青年和當地農民的負擔，國家不得不拿出大批資金來補貼。如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位於沙漠地帶，並不適於大批人口墾殖，只是出於政治和戰備需要而把知識青年集中在一起，以致長年虧損，改造自然的勞動也，

見效甚小，「文革」後不得不予以解散。據統計，不包括木材、建房等物資及各企業提供資金，1962年至1979年國家共撥付知識青年經費多達75.4億元，大多數用於「文革」時期，平均每人450元以上。

上山下鄉造成的社會問題更為嚴重。廣大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勞動，發現一切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浪漫和理想，政治上受到歧視，加上國家對上山下鄉的前途始終沒有拿出個遠景方案，插隊要多久？將來如何安置？都是無底洞，致使知識青年感覺極度悲觀。許多地方因受極左思潮影響，對知識青年無人照顧管理，甚至因壞人掌權，發生打擊迫害知識青年、強姦女知青的情況。不少知識青年衣食無着，回家無路費，被迫流落鄉鎮街頭，打架鬥毆，盜竊資財，走上流氓犯罪的道路。還有些知識青年聚眾圍攻當地政府機構，要求解決種種政治或生活問題，被當局當作破壞上山下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而予以嚴厲鎮壓。而知識青年家長為了讓孩子能夠回城或者參軍、招工，到處託人拉關係，辦理「病退」、「困退」，請客送禮，甚至做假證明材料。掌握權力的地方幹部則趁機受賄，甚至要求女知識青年以出賣肉體作交換條件。可以說，「文革」時期社會風氣的敗壞，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很大程度上是上山下鄉導致的。

矛盾的激化使中央高層不得不予以關注。1972年9月5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召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座談會的通知〉，11月召開第一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座談會。主要內容是：着重交流加強領導、落實黨的有關政策的經驗，以及做好動員、安置、再教育工作和下鄉青年大有作為的經驗。並且研究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協商安排「四五」計劃期間知識青年跨省、區上山下鄉的規劃。修訂〈關於安置經費的開支標準和管理辦法〉。

但是，上山下鄉問題得到比較重視，是李慶霖給毛澤東上書以後。

李慶霖是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員。1972年12月20日，他寫信給毛澤東的親戚王海容，請她將信轉呈毛澤東。信中反映他在莆田縣萩蘆公社水濟大隊插隊的孩子生活上遇到困難，勞動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加上又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因此生活困難，請求國家

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信中還反映了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招生、招工、招幹工作中存在的拉關係、走後門等情況。全信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户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漂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漂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置）新的；病，

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

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30]

毛澤東收到信後，沒有想到他極力提倡的上山下鄉運動，竟然在群眾中造成如此的痛苦和憤恨。他讀了多遍，流了眼淚，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於1973年4月25日覆信，在信中寫道：

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統籌解決。[31]

30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72－175。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49。

他將覆信交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囑他從自己稿費中取出300元連同信一起從郵局寄走。毛澤東還問：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有入黨要求，可吸收為黨員，參加十大；如果沒有入黨要求，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

在當時對上山下鄉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下，李慶霖寫信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風險的。但是他的信有幸送到了毛澤東手裏，並且得到了回信。因此李慶霖受到了青睞，平步青雲，從小學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直至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副組長和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也捲入了「反潮流」等政治風波。[32]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覆信為促進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的嚴重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文革」後，他被成千上萬老知識青年和家長評價為「一個改變知青命運的小人物」。

毛澤東覆信後的4月2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會議，研究落實毛澤東覆信精神。周恩來提出：我們一定要把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主席操心了。會上聽取了國家計委勞動局的匯報，研究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存在的安置經費、口糧、疾病醫療、婚姻、歸僑安置、成份、布局、表彰先進事跡、學習教育、打擊壞人等十個問題。6月1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覆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開黨委擴大會議用一天時間宣讀，對5月中央工作會議〈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和中共福建省委〈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的通知〉進行討論，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派人來中央匯報和統籌解決這些問題。

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及有關部門的幹部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學習了毛澤東給李慶霖來信的覆信，研

32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李慶霖被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後減為有期徒刑十年，1994年3月出獄，2004年2月去世。

究了「統籌解決」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六條措施：（1）各地黨委要加強領導。縣以上黨委都要建立負責知青工作的領導小組和得力的辦事機構，由一名書記主管，組織各方面力量做好這項工作。（2）切實解決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住房、醫療等各方面的實際困難。生活困難的，國家要給以必要的補助。安置費今後要適當增加。（3）加強對下鄉知識青年的培養教育。（4）堅決刹住「走後門」的不正之風。（5）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犯罪活動進行堅決鬥爭。（6）要求有關部門對今後上山下鄉工作做出長遠的全面的規劃。會議起草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初步規劃（草案）〉。8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

會議期間，新華社《情況反映》引起中央領導人的震動：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二十餘人；一師某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五十多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被姦污的女知青達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二百零九人。周恩來怒不可遏，要求公安部速派人去，不要手軟！李先念氣憤地說：這些人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至少是國民黨行為，不知為甚麼得不到糾正？省委和軍區難道說也不知道嗎？此後，各地對殘害知識青年的幹部大開殺戒，以上罪犯被處以死刑。

1976年2月12日，毛澤東又針對吳桂賢反映的陝西知識青年來信問題批示說：

> 知識青年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33]

但是，由於政治環境的動盪，國家經濟狀況未能改善，上山下鄉的根本問題在「文革」時期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路越走越窄。到

3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520。

1979年，雖然還有一些知識青年在堅持「紮根」，但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90%以上，已經通過學校招生、參軍、招工、照顧疾病困難等途徑離開了農村。從1967年到1979年，共有1647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佔1962年以來人數的92.7%。[34]

2 暗流潛動的地下異端思潮

1971年後，特別是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後，前期那種無政府主義狀況被壓制下去，洶湧澎湃的公開社會活動驟然而止。另一方面，上山下鄉和走向社會，也使得紅衛兵和知識分子離開學校和組織的控制，化整為零，提供了獨立思考的條件。他們試圖接觸解答剛剛脫離「文革」階級鬥爭厮殺現場的一系列不容迴避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甚麼性質的運動？

它的理論起源、目的和後果究竟是怎樣的？

是紅衛兵犯有錯誤還是毛澤東改變了他的初衷而拋棄紅衛兵？

林彪事件證明了「文革」的勝利還是失敗？

毛澤東是否犯有斯大林那樣的晚年錯誤？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着哪些弊病？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出路在哪裏？

中國將向何處去？

西方社會和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是不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蘇聯是不是修正主義？

……

（1）地下讀書活動

所謂地下，就是離開官方控制的民間秘密自發行為。所謂讀書，實際上是讀西方民主、人權等哲學啟蒙理論著作，披露歷史真相的內部讀

34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頁301。

物等禁書，及與現實較遠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始著作。然後進行討論，發表見解，從理論中尋找解答現實問題的精神支柱。許多不甘寂寞的各階層人物，以思想最活躍、正處於心理反叛期的知識青年[35]為核心開始在地下反思過去、串聯活動、傳播文章，形成了一股比「文革」前期更加深刻的異端思潮。

當時地下讀的書，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文革」前和「文革」後期內部出版、發行的一些外國政治理論和歷史讀物，通常被稱為「黃皮書」和「灰皮書」。「文革」前的 1960 年代，為了在中蘇大論戰中加強理論了解，揭露蘇聯變成「修正主義」的過程和面目，有關部門曾經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反映蘇聯現實和蘇聯領導人思想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派思潮的外國著作。在「文革」後期，隨着中蘇對立、中美關係的緩和，特別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以後，為了了解美國，上海、北京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組等機構，也曾經組織如上海新聞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組等，翻譯、出版了一批蘇聯和西方社會的理論思潮代表作。

這些內部讀物，在「文革」前控制十分嚴格，一般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指定內部出版，十三級以上幹部即高幹才能憑藉專門內部購書證，在指定的內部書店購買。因此流入社會較少，沒有引起注目。「文革」後，隨着中國的不斷開放，內部讀物走向名存實亡，少人問津。唯獨在「文革」時期，由於社會動盪，高級幹部被抄家或者下放，書籍流散；再加上「文革」後期的掌權造反派新貴成份複雜，社會接觸面廣，不易控制，也使得內部讀物不脛而走，在讀者中形成了一種巨大的精神衝擊力量。

據〈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 — 1989）〉統計，三十七年裏共出版內部讀物18301種，其中屬於社會科學的有9766種。社會科學中，

35　當時所指知識青年，一般是上山下鄉的中學、大學畢業生。本處所指，是包括全社會各個階層的青年知識分子。之所以不直接稱為青年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當時的身份和從業大多是農民、工人和士兵。

1976年前出版的大約4000種，除去大量的馬列、毛澤東著作，屬於西方理論和文學的，「文革」前出版有1041種，「文革」中出版有約1000種。[36]

宋永毅根據各種當事人的回憶、訪談，列舉了對這一代人的思想歷程發生過極大的影響的四十本內部讀物，主要有：

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1963）

密洛凡·吉拉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

特加·古納瓦達納：《赫魯曉夫主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威廉·L·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

沙夫：《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63）

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73）

F·A·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愛倫堡：《解凍》（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索爾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讓·保爾·薩特：《魔惡及其它》（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1965）

亞爾培·加謬：《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

薩謬爾森·貝克特：《等待戈多》（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5）

---

36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灣），第20期。

杰羅姆·大衛·塞林格：《麥田守望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71)

伊凡·扎米亞金：《多雪的冬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弗·阿·柯切托夫：《你到底要甚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謝苗·巴巴耶夫斯基：《人世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亨利·基辛格：《選擇的必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上海直屬機關五七幹校編譯組編：《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這些著作者中，很多是所謂「共產主義」的叛徒，至少是中國「文革」理論的對立面。他們的理論、思想，在「文革」一代青年人除了「文革」理論和宣傳口號之外幾乎是一片空白的頭腦裏，引起了極大震撼。他們吃驚地看到，原來世界上還有那麼豐富的另類異端學說。當他們面對「文革」打擊的現實問題不能自拔、迫切需要精神支柱的時候，便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開始受到這些作者的思維方式或者觀點的影響。筆者至今記憶猶新，當年用幾張電影票，向鄰居小孩子交換借閱他下放幹校父親留下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時代》。第一次閱讀，被作者的大膽抨擊斯大林掩卷震驚，不敢卒讀，甚至憤怒地寫下了毛澤東反修語錄以警惕自己要「消毒」(其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位左派)。但第二遍、第三遍讀，仍然震驚，卻是為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手段之殘酷了。

幾乎所有人多年的傳統觀念，都被這些內部讀物撕開了缺口。一位在河北白洋淀插隊的原北大異端思潮「共產青年社」讀書圈子成員潘婧回憶道：

> 那時，我們狂熱地搜尋「文革」前出版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我的一個初中同學的父親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藝部門的領導，我在她的家裏發現了數量頗豐的一批黃皮書，記得當時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書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

經歷了一個全面的苦難，我們的精神陷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衝破十幾年的教育灌輸給我們的思想模式，得益於兩本灰皮書的點撥，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托氏的書無疑是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至此，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我們終於擺脫了夢魘般的桎梏和愚昧。[37]

「文革」中因為讀書會被打成上海「第一反革命案」復旦大學胡守均小集團的頭頭周谷聲說：「對於正處在覺醒中的我們來說，看了這樣的書還不從國家體制上去懷疑，去思考問題，已經不可能了。」[38]

二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雖然「文革」之初各種舊圖書就被禁止出借，但由於「文革」的進一步動亂，一些圖書館失去控制，學校又不上課，使得學生可以盡情地去閱讀以往沒有時間閱讀的名著。筆者在「文革」之初，曾經蒙圖書館老師的私下允許，把門從外面鎖上，關在裏面，不吃飯不上廁所，一看就是一天。學校大亂，索性與同組織的紅衛兵一起撬開被封閉的圖書館窗戶，進去盜竊了大量精神食糧。後來，上山下鄉的同學經常在回城聚會時，謝絕饋贈錢財而要求大家為他們捐舊書。

宋永毅統計，在公開發表的幾百種紅衛兵和知識青年回憶錄中，被廣泛提及的名著和人物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裏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羅亭》裏的羅亭、《貴族之家》裏的拉夫列斯基、《前夜》裏的英沙羅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的保爾康斯基，狄更斯《雙城記》裏的卡爾登，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裏的克利斯朵夫，司湯達《紅與黑》中的于連，齊瓦尼約利《斯巴達克思》裏的斯巴達克思……。這些書給苦悶中的知識青年在草原荒山裏帶來

37 徐曉主編：《民間書信（1966－1977）》（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頁72。

38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20期。

了「雪夜圍爐讀禁書」的古人精神境界。肯定個人主義奮鬥、弘揚人道主義和人性、人文關懷的精神，使他們對當前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產生了對比和揭露。許多人自發地進行了討論：焦點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例如：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思是否應當與奴隸主的遺孀范萊麗姬有那種卿卿我我的愛情？通過推心置腹的討論，大多數人拋棄了他們被灌輸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理論，告別了簡單的思維方式和鬥爭哲學。[39]

三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早期的原著。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有感於全會前期大多數中央委員被林彪、陳伯達找出的革命領袖論天才語錄迷惑而跟着跑，號召大家「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馬列著作，「要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1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建議全黨組織讀六本書：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恩格斯《反杜林論》，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國家與革命》，及毛澤東「文革」前的五本書。此後，全國開展了學習馬克思主義活動，配合也出版了一些西方早期科學著作。如被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肯定的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達爾文《物種的起源》（舊譯《天演論》）等等。

知識青年再次開始閱讀馬列主義著作。與「文革」前期不同的，是系統地讀，而不是像林彪宣揚的那樣只讀語錄和警句。特別有趣的是，讀的過程中，對引用的被批判內容及內容豐富的原著《資本論》等的註釋，往往讀得更認真，了解到了思想史上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觀點——即「修正主義」，能夠對比和分析，而不是盲目崇拜地學習。丁東回憶說：

> 當時趕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規定的六本書和《列寧選集》我也看了，總覺不如德熱拉斯的書更有思想衝擊力。一個是禮制

39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20期。

的理論來源，一個是體制的叛逆。當時並不自覺，但因為年青，所以更嚮往新的思想。[40]

現實和理想，讀書和思考，驅使着知識青年迸發新思潮。在他們中間，出現了被稱為「思想村落」的沙龍和傳播圈。

(2)「思想村落」和異端思潮

所謂「思想村落」，來源於朱學勤回憶中的比喻：

……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願組成了一個集體户，在那裏開闢了一個邊勞動邊讀書的生活氛圍。1972年進工廠，這群人和另外一個更富思想氣息的集體户攏在一起，一鍋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一個縣城，於是在那裏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精神小氣候，用我後來的體悟，是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一群中學生在下班之後，過着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一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41]

出現這種「思想村落」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說的政治形勢的驅使和讀書思考之外，環境的變化很重要。「文革」前期，無論學生們組成甚麼樣的群眾組織，都在單位群體活動之中。來自中央報刊文件、工人和軍隊宣傳隊、學校革委會、街道居委會、其他群眾組織的社會壓力和告密者，在每個人周圍形成了一種「金剛罩」般的無形約束網，思想和行動的越軌十分困難。而他們插隊落戶之後，被分散拋棄

40 丁東：《精神的流浪》（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頁37。

41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10月號。

到了農村被遺忘的偏僻角落，農民和社隊幹部因為沒有文化，往往對他們的言行不加干涉。即使回到城市，也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況。於是，他們自成一個小社會，思想和精神不再受到羈縻，得以奔放出來。相對而言，生產建設兵團及農場，由於集中活動，「思想村落」則難以存在和發展。

據印紅標的研究，[42]「思想村落」萌芽於1968年一批失意的老紅衛兵[43]和北京激進的「四三派」。[44]前者把「文革」視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後者則認為是特權階層與人民之間的矛盾爆發。上山下鄉之後，派性的隔閡逐漸消弭，開始以自然居住環境、個人喜好等形成了新的「思想村落」，比較著名的有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北京任公偉「二流社」及以徐浩淵、趙一凡為首的北京讀書沙龍，上海「小東樓」，貴州安順師專等小圈子。這些「思想村落」不定期地聚會，交換圖書，討論問題，傳閱學習筆記和思想日記。討論的問題起初是「文革」的形勢與未來，後來逐漸分化為政治、哲學、文學、歷史、經濟等專業知識方面。無論哪一方面，在當時的環境下，都難以完全獨立超然於政治之外。因此，也常常遭到當局政治打擊，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就是一個悲劇典型。

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是由十三名大學和中學畢業生，於1969年11月在銀川自發成立的自學小組，年齡最大的二十六歲，最小的二十二歲。成員分布在寧夏的六個縣市及湖南，有工人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他們模仿毛澤東青年時代成立的自學組織「湖南自修大學」，制定「共大守則」說：要「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正的而不是形式

42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北京大學博士論文，未刊稿，2005，頁98－101。

43　指1966年9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前成立的紅衛兵，多由幹部子女組成。

44　1967年北京中學群眾組織因為對待中央文革成員4月3日和4月4日講話的不同態度，分裂為「四三」和「四四」兩大派。「四三派」態度較為激進，反對軍訓，鼓吹自我解放，多出身於知識分子和「黑五類」家庭。「四四派」態度較為保守，擁護軍訓，主張大聯合，多出身於一般平民家庭。在全國的群眾組織中，也大多出現了這種分化。

地、踏實地而不是虛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有政治遠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探索並了解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誓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堅強的革命戰士」。學習是以油印的《學刊》「刊物為中心，通過自修與交流相結合的方式」。顯然，這是一些在馬列主義框架下追求新思想的有志青年。但是1970年3月卻慘遭鎮壓。

該組織被定為「打着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進行旨在推翻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反革命組織」，「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策略、有言論、有行動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是一個十足的帝、修、反的別動隊」。8月，為首的魯志立、吳述森、吳述樟三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通明被判處無期徒刑，三人被判處徒刑，其餘六人被關押或者在本單位批鬥，其中二十二歲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自殺。[45]

類似遭遇的還有轟動北京的所謂「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北京女知識青年徐曉通過自己讀書圈子裏的朋友介紹認識了趙一凡等一些朋友，互相傳閱圖書，交流讀書心得。「由於環境壓抑，雙方只能寫信。徐曉和他們通信，都是十幾頁紙」。1975年1月28日，徐和趙等被捕，扣上的罪名有「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等。幾十個參加通訊的人被捕，株連上百人。關押兩年後徐、趙被釋放。1978年獲得平反。[46]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思想追求者用血的代價換來了更多人的思考。

張木生是當時深入思考並實踐探索改革的典型代表。

他是1964年北京的初中畢業生，受到毛澤東1964年關於教育革命談話的影響，決心離開僵化的學校教育體制，到農村去成就一番改

45 1978年8月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和革命委員會在銀川召開大會，宣布為死難者平反昭雪。

46 徐曉：〈無題往事〉，載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頁153－176。

造世界大活動。1965年主動報名到內蒙古臨河縣插隊落戶，同行的還有陳小農、[47]李秋夢等一批幹部子女。來到農村，他們起先拚命艱苦奮鬥，「一天只睡五個小時，苦幹十四個鐘頭，真是脫胎換骨」。但是看到農民卻「出工是搖，幹活是聊，收工是逃」。拚命幹了一年，因為增加了人口，大隊的工分日值反而更低了，他們只好把自己的所有的財物都捐獻出去，仍然無濟於事。第二年，他們仿照毛澤東當年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了「半農半讀毛澤東思想講習班」。折騰大半年，一無所成。而李秋夢退出講習班去自薦當生產隊長，領導農民搞承包和副業，卻取得了增產糧食十幾萬斤、工分值提高的效果，使他們認識到，「老百姓不是不能幹，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這麼好」。

「文革」爆發後，張木生開始閱讀大量「灰皮書」、「黃皮書」，並與插隊朋友駱小海[48]等交流思想。1968年秋天，他寫出了三萬字文章〈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探討了斯大林時期蘇聯體制及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學大寨、機械化、包產到戶等問題。文章在北京、上海等地開始流傳，並出現油印本。在以後的討論中，張木生進一步認為，蘇聯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好農村體制問題；赫魯曉夫不是野心家，他是在進行改革的試探；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存在問題，學大寨難以推行；劉少奇、彭德懷對農村問題的主張是有道理的；解決體制問題才能發展生產力，解決幹群問題；1957年右派提出了制度問題，是高明的地方；「文革」是在進行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張木生的離經叛道觀點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震動，其中任何一個說法都可以將他置於死地。一些知識青年在公開的報刊上寫文章對他進行了批判，一些傳抄者也被追查。據說，他的文章和觀點還被刊登在向中央領導人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上，匯報到周恩來、陳伯達那裏。1972年，張木生被招工到呼和

47　陳伯達之子。

48　清華附中高中畢業生，是中國第一支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起人之一。

浩特市，在那裏被捕，但關押到1973年即出獄。也許是他的高幹子女身份和周恩來的保護起了作用。據說周恩來讀了他的材料後，批示說，知識青年自己探討一些問題，不要簡單地當作反革命來對待。[49]

出獄後，張木生見到了尚未恢復工作的胡耀邦，胡說看過他的文章，認為講得有道理，並且支持他回北京搞農業問題研究。[50]張木生在實踐中對中國農村乃至社會主義國家農村問題的思想探索，不僅是對左的政策和體制的衝擊，在當時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而且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思想先行者。

張木生等代表了幹部子女圈子對體制問題改革的政治精英意識，而與之相對的是以出身於平民家庭的知識青年對體制問題批判的思想活動，其代表是「理論通訊事件」。

1972年，內蒙古、陝西、北京的一些知識青年在通信中探討社會主義體制問題，提出「幹部是一個階級」的觀點，被公安部門發現，作為「反動思潮」進行批判。這些青年人原是北京一個重點中學的初中畢業生，離開學校後有的當了工人，有的在農村插隊落戶。由於都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他們在學校都感受到了以幹部子女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的歧視和打擊，還有人的父母在運動中被迫害致死，因此他們離開學校後，開始認真閱讀政治理論書籍，本能地對幹部階層和體制提出了質疑，一直保持着通訊聯繫，交流看法。

1972年6月，有人在通訊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一個「新階級——幹部階級」，立即引起了參加通訊同學的興趣，圍繞這一觀點進行了半年的討論。有人寫道：

> 在今天，在所有的真假社會主義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存在着這個階級。這個階級遠遠地高於和脫離於社會的其他成員，處於一種

---

49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頁106－110。

50 文革結束後，張木生由萬里調到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1989年後任中國税務報社長，其後又得到胡錦濤支持，到西藏林芝地區擔任專員，進行改革實驗。

極其特殊的地位，也有它特殊的利益和權力。她儼然成為社會的主人了。[51]

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蘇聯和中國不僅有特權階層，而且已經成為一個獨特財產佔有方式、獨特經濟、政治地位的新階級。這說明，「社會主義的發展有明顯的階級分化」，產生分化的原因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計劃經濟本身」，是基本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外部的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和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現行的所有制「並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國家所有制」。生產資料不是屬於人民的，而是屬於掌握國家權力的幹部的。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在生產關係中處於被剝削和壓榨的地位。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實際是社會主義發展成熟的表現，只要中國不改變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蘇聯的方向發展。

出於這種認識，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和晚年毛澤東抱有複雜的態度，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發展不成熟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次不成熟的革命。舊社會遺留的地主與農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國民黨與人民群眾還普遍存在。同時新的矛盾，即幹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已經產生。新舊矛盾交織，人民與走資派的鬥爭實際上是幹部階級矛盾的表現，但是偏偏被說成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

這種思潮在當時有較廣泛的市場。在黑龍江農場的北京知識青年楊瑞1973年回家對早年即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父母說：

我同意毛主席說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依然存在，但這不是地主和貧農或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官僚主義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鬥爭。從上到下的幹部都專橫跋扈，濫用職權，不管是腐敗透頂的，還是尚不太腐敗的。

51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頁115。

楊的父親在私下對她表示贊同，說：那天女兒說的話，父親有一半都多有同感，黨內鬥爭向來殘酷無情。如果說，種種問題在取得全國政權時，還只是潛伏在體內的癌細胞的話，現在則早已四處擴散了。[52]

隨着毛澤東發動自下而上的群眾「文革」，號召把幾乎所有幹部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運動的重點進行揭露打擊，人民愈來愈聯想到幹部是一個整體特權階層，聯想到體制帶來的必然性弊病。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魏光奇回憶說：

> 吉拉斯的這種觀點同當時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有某些合拍之處，對於「文革」中受到血統論排斥和迫害的非「紅五類」學生來說，以及對於感受到了與幹部子弟之間存在巨大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那些工農子弟來說，有着極大的吸引力。當時，我和我周圍的同學都曾經因接觸到這種理論而十分興奮，覺得頓開茅塞，覺得自己一年多來反覆思考的「文革」起源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53]

因此，在「文革」後期進行這樣的反思也是必然的了。相對張木生等幹部子女出於改革和補台動機注重政策和機制層面的思想探索，以「思想通訊」為代表的「形左實右」探索更為深刻，對制度的批判更加一針見血。他們成為「文革」後1980年代周揚等人提出「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異化論」的輿論基礎，其中一部分則轉化為以「文革」反對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新左派思潮的發源地。

追求人性解放和理想的代表作首推書信體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作者靳凡是劉青峰的筆名；寫於1970年代初。小說主要人物老

---

52 印紅標對楊瑞的訪問。據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頁116。

53 魏光奇：〈「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頁160－164。

久、真真及老嘎、老邪門等以北京大學「文革」時期大學生為原型，用四十三篇書信通訊的文學形式，充滿激情地記述了這一群被打散在農村的大學生們在1970年的通訊往來、地下讀書和思考活動：為南斯拉夫經濟問題激烈爭吵；擠在一間小房子裏一連幾天不下樓苦讀，對政局惶惑不解，對真理苦苦探索，對未來美好憧憬，對愛情、人性大膽灼熱追求……生動地展示了那一代青年人在火與血洗禮中開始的求索蛻變。這篇小說在當時已經以手稿和打印稿在一部分青年中流傳。「文革」結束後，1980年《十月》雜誌公開發表並出版多種版本單行本，成為新時期文學初潮的重要衝擊波，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認為作品鼓舞了他們「前進的勇氣」，「像一道理想的閃電撥亮了心靈中將要熄滅的火焰」。書信中這樣寫道：

> 我們讀着、吃着。困了，就睡一會兒，起來又是學習和討論，可以一連幾天不下樓。我們都厭倦無休止的派性鬥爭，也不願在武鬥中無謂地流血。我們深深苦惱的是為甚麼年輕人的思想這麼混亂，似乎理論的危機已使很多人從根本上對未來喪失了信心。但我們努力探索着，希望我們的工作成為茫茫大海中的一盞燈，給年輕的朋友們指明方向。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不讓奮鬥精神喪失，不讓熱情的火花熄滅。我們決心走一條和許多年輕人不同的道路——在理論上進行探索的道路。我們希望我們的思考成果能成為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風暴多麼猛，浪濤多麼大，那些被颶風吹散的船隻能靠到這裏拴住它們的纜繩。
>
> 從立志學科學，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現實，又由現實思考到理論、探索到哲學、最後又回到科學，我們走過了一條多麼痛苦的、思想鬥爭的路呵。一旦取得了明確的認識，我們發現許多人在運動中表現出的盲目性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都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生活的時代，歸根結柢，他們還是被宗教般的狂熱所左右。[54]

54　〈第七封信：老久致真真〉，載靳凡編著：《公開的情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總之，「文革」後期，在巨大壓力下形成的思想萬馬齊喑表面現象之下，正湧動着一股比「文革」前期大膽、深刻、理性的思想探索暗流。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許多流行的崛起的新思想，大多可以在「文革」後期的「思想村落」中找到其胚胎或者閃光。這些思想者和思想火花，在改革開放時期有力地推動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實踐。

最後，還應說到「文革」後期社會流行的「流氓」思潮。

由於學校停課、幹部下放或者父母因政治問題被關押，許多家庭的青少年失去成人監護，無法讀書、就業，流散在社會上；大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回城期間也無所事事，他們已經不像「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那樣對政治感興趣，而是走上了自暴自棄的頹廢道路；再加上「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動打亂了人們的法制觀念，公檢法機構被砸爛，沒有得到恢復和健全。於是「流氓」思潮在城市社會中流行開來。

以反差最為明顯的北京為例，在服裝時尚上，雖然綠軍裝仍然是被崇拜的時裝，也開始流行着與「文革」初期正統觀念略有不同的服飾，如呢子大衣再度興起，更奇特的是軍裝裏面套上黑呢子制服，顯示自己過去革命而又有錢的家庭地位。最普遍流行服裝是藍色軍便服，戴白口罩，足登黑制服呢面鬆緊口布鞋（俗稱「懶漢鞋」），有條件的騎上當時需要票證供應的鋼轉鈴自行車，成群呼嘯，招搖過市，引來一片羨慕眼光。女流氓的時尚則是穿男軍便服、踏將校靴（軍用皮靴），梳馬尾刷式髮型。許多流氓黑話在社會上流行開來，比如稱警察為「雷子」，女流氓為「圈子」，上街勾引女流氓為「拍婆子」等等。

這些「流氓」時尚青年基本上由「老紅衛兵」即幹部家庭子女和市井百姓家庭孩子兩大流派組成，領頭人物還有綽號，比如北京比較著名的有「七奶奶」，三里河國家計委宿舍的幹部家庭女孩趙××，以狂放、色情出名。更出名的是「小混蛋」，本名周長貴，「文革」初期是初中學生，出身於城市貧民，長期受到幹部子女的歧視，對社會懷有仇恨，以打架鬥毆敢拚命著稱，成為新街口一帶土著地痞頭

目，他組織有「菜刀隊」，專門和「老紅衛兵」毆鬥甚至兇殺。一次他單身走在北京動物園前的一條街裏，被追蹤已久的百萬莊某幹部住宅區「老紅衛兵」流氓團夥扎死。死後，團夥兄弟為他秘密發喪，給他穿上了解放軍將軍才能穿的綠呢子軍大衣和軍服，反映出這些人眼中的等級制度權力慾望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叛逆心理。北京什剎海滑冰場、首都電影院、王府井商業街等當時是兩大流氓團夥聚會和打架鬥毆活動最多的場所。尤其是在知識青年大批返家的冬季，當局不得不出動肩揹刺刀槍的解放軍來巡邏維持秩序。

這些流氓團夥基本不參與政治鬥爭，甚至也不太在乎經濟利益，之間常常為瑣碎小事例如「犯照」（兩群人在街上互不服氣地直視）引發群毆，爭奪的卻是虛名。比如，當時搶劫錢財的案例不多，但是搶奪代表時尚的羊剪絨帽子甚至綠軍帽的事情卻很普遍。

這些「流氓」思潮和時尚，其實多數並非「文革」後的真正流氓團夥和黑社會性質，而是類似西方同一時期出現的嬉皮士一類憤世嫉俗、對傳統社會和現行秩序強烈不滿的青年，在他們中傳唱的「精神病者之歌」：「世上人，譏笑我，精神病患者……」，道出了他們這一代空虛、憤怒、無奈的心情。劉燁、孫儷主演，但未能公映的三十二集電視連續劇《血色浪漫》，以鍾躍民、周曉白等人物活動逼真地再現了那個時代的思潮。

3　「文革」後期的地下文學

憤怒出詩人，苦悶也出詩人。「文革」後期，由於沉重的政治壓力、尖銳的社會矛盾和動盪的生活，在以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為主的知識分子中間，地下文學悄然生長起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空前絕後的秘密文化景觀。所謂地下文學，主要是指：內容迎合下層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多與當時的主流「文革」文化相背離；作者為業餘創作，沒有從事文化工作的身份；不能公開發表，只在社會上口頭或秘密流傳。以其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1）知青文學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的一批年輕的文學愛好者，自發地創作了許多「並非為了發表」、卻廣為流傳的詩歌、小說等作品。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被稱為「知青之歌」的流派，在陝西、山西、河北等省農村，在新疆、內蒙、東北、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流行的知青歌曲後來見諸文章、報刊和收入盒式錄音帶的已不下數十首：〈四季歌〉、〈75天〉、〈地角天邊〉、〈雨聲傳情〉、〈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松花江〉、〈瘋狂的世界〉、〈我的眼淚〉、〈姑娘八唱〉、〈請你忘記我〉、〈傷心的淚〉、〈小小油燈〉、〈鈔票〉等。[55]這些歌曲忠實生動地記錄了知青當時的思鄉、苦悶、彷徨、戀愛之情，及他們勞動、生活、離別的情景。它保留了真誠的動機，也保留了歷史和環境在他們心靈深處刻下的傷痕。

各地都有代表自己群體的作品，有些是依據當地民謠風格的新創作，有些是依託老歌的曲填寫新詞，在流傳中不斷被修改、再創作。最富於悲劇浪漫色彩的是任毅創作的〈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鄉〉，又名〈南京知青之歌〉：

藍藍的天空白雲在飛翔
美麗的揚子江畔响，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
啊……雄偉的大橋橫跨長江威武雄壯
巍峨的鍾山虎踞在我的家鄉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我的家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呀就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復返
啊……未來的生活多麼艱難多麼漫長
生活的道路就奪去了我的理想

55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115。

跟着太陽出伴隨着月亮歸
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那終身的職責我的命運哪
啊……心上的人哪告別了你，奔向遠方
愛情的花朵就永遠不能開放，不能開放……

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1966屆高中畢業生，從小愛好藝術。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他們坐着卡車，來到江浦縣插隊落戶。任毅所在的生產隊正好是公社所在地，全公社的知青都經常跑到他們這裏來聚會，大家情緒低落，感到前途渺茫，邊彈吉它邊唱過去的歌〈流浪人歸來〉：「流浪人歸來，愛人已失去。內心無比淒涼，我活着為甚麼？應該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願想，前途在哪裏？」

1969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知青又聚在小茅屋裏，把那些歌輪番唱了一遍。一個朋友忽然對任毅說：「工人有工人的歌，農民有農民的歌，任毅，你就寫一首我們知青的歌吧。」任毅當晚就抱着吉它，以1964年志願去新疆戈壁灘的知青創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為雛形，譜寫了〈我的家鄉〉。歌譜上寫的演唱要求：「深沉、緩慢、思念家鄉的」。

這首歌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當年夏收之後，任毅在回南京的輪船上聽到有人唱，就問：「你們唱的是甚麼？」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樣兒倒像是個知青，怎麼連這個歌都不知道，這叫《知青之歌》！」

很快，不幸降臨。1969年8月，有人秘密聽到了莫斯科廣播電台在播放任毅寫的歌，稱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用男聲小合唱配上小樂隊伴奏，效果很不錯。任毅聽呆了。他意識到被「敵台」演唱這首歌，他的罪名已經脫不掉了。1970年2月19日，根據張春橋的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任毅被抄家後逮捕。審訊者在任毅面前拿出了從全國各地搜查來的幾十個版本的「知青之歌」作為罪證，有油印、打字、複寫和手抄的。他經歷了三十多場批鬥會，知青們對他懷有很大的同情。一次開完批判會後，有人示意他到廁所去，他們

擋住了看管人員視線，往他的上衣口袋裏塞了80元錢和50斤糧票。8月3日，任毅在全省公判大會上被宣布判處十年徒刑，押到勞改農場去服刑。僅僅因為一首歌，任毅被關押了九年，直到1979年才被釋放。[56]

在全國各地，幾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青歌曲，永恒的主題是背井離鄉：

〈廣州知青歌〉：

低頭無言是那岸邊的榕樹，
奔騰嗚咽是那咆哮的珠江，
我倆穿行在鐵路上，
多少話兒留在心上沒有講。

再見吧，親愛的廣州，
再見吧，可愛的姑娘，
明天就像江水一樣，奔向遠方，
還要回來還要回來，回到故鄉。

〈山西知青離鄉歌〉，在北京到山西插隊落戶知青及山西知青中流傳：

我要到那遙遠的山西去把農民當，
離別了我可愛的北京和家長。
親友含淚來相送，
聲聲囑咐我記心上。
父母啊，您別難過，莫悲傷，
待等明年春節時，
重返家鄉來探望。

56 辛雨：〈30年前轟動全國的《知青之歌》誕生奇聞〉，《街道》，1998年7月號。

我要到那遙遠的山西去把鋤頭扛，
離別了我親愛的戰友痛斷腸，
緊緊擁抱心潮湧，
淚水相流就落肩上。
戰友啊，你別流淚，莫失望，
廣闊天地你我就向前闖。
待等明年秋過後，
重返家鄉來探望。

〈巫山知青歌〉：

坐上蓬蓬船，
告別了爹和娘，
含着眼淚別故鄉，
兒把那往事想。
十七年的教和養，
到如今收回在淚水一場。
爹娘呵，
爹娘呵，
到如今收回在淚水一場。[57]

有人對知青詩歌做出這樣的評論：這些青年人在失去的同時也有獲得，在悲苦中也有他們的歡樂和激情。他們在漫長年月的失落中也有意想不到的擁有，這就是他們因「放逐」而親近了中國廣袤的土地和土地上勞苦的民眾。他們在勞動中獲得了切實的生產和生活知識，他們於是對中國最廣大的與土地保持最親密聯繫的勞苦人群的生產方式和情感方式有了更深的認知。對於中國農村的歷史、文化、習俗甚

57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頁 130 － 132。

至語言，有了真切的了解。得到別處難以得到的可貴的人生經驗和生命啟悟。[58]

(2) 現代主義文學

「文革」後期，在上山下鄉知青中湧現出來一批現代主義詩人，影響最大的當推詩人食指（郭路生），還有「白洋淀詩群」。這些現代主義手法創作的詩，當時僅以秘密手抄形式流傳，但在青年中引起很大的共鳴，表達了他們對荒謬的政治、扭曲的人際關係等的認識。

郭路生，1948年生，原北京市五十六中1968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12月赴山西汾縣杏花村插隊。[59]主要作品有〈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魚兒三部曲〉、〈命運〉、〈相信未來〉、〈憤怒〉等。在充滿了失望、頹廢、憤怒的年代，他的詩有的堅信美好和純真的人性，給人以精神上的安慰，起到了傷口鎮痛的強心劑作用，如〈相信未來〉；有的也起到了宣泄作用，如〈瘋狗〉。他被稱為「文革」中新詩歌的第一人，為現代主義詩歌開拓了道路。有人評價他「相當於惠特曼在美國詩歌中的地位。在他之前和之後的一段時間，平民出身的子弟是沒有資格做現代詩人的。」[60]在〈相信未來〉中他寫道：

當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着貧窮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58　赫海彥主編：《中國知青詩抄》，序一（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頁2－3。

59　郭1971年離開農村參軍，1972年患神經分裂症退伍，1974年入北京光電技術研究所，因病長期休養。

60　《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頁53。

我要用手指那滾向天邊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陽的大海，
搖曳着曙光那支溫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61]

「白洋淀詩群」，主要作者有姜世偉（筆名芒克）、岳重（筆名根子）、栗士征（筆名多多）等，原是北京三中初一學生，1969年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隊。1971年夏季，芒克開始把他的第一首詩作和大家交流，引起了震動和共鳴。1972年春節，根子寫出了〈三月與末日〉：

既然
大地是由於遼闊才這樣薄弱，既然他
是因為蒼老才如此放浪形骸
既然他毫不吝惜
每次私奔後的絞刑，既然
他從不奮力鍛造一個，大地應有的
樸素壯麗的靈魂
既然他浩蕩的血早就沉澱
既然他，沒有智慧
沒有驕傲
更沒有一顆
莊嚴的心
那麼，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卻已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燒成了升騰的煙
我用我的無羽的翅膀——冷漠

61　戈小麗：〈郭路生在杏花村〉，載《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頁64－65。

飛離即將撒呼的大地，沒有
第一次拚死抓住大地——這漂向火海的木船，沒有
想拉回它……[62]

之後，他又做出〈白洋淀〉、〈橘紅色的霧〉和〈深淵上的橋〉等八首。

多多在1972年底拿出第一冊詩集，先後創作有〈回憶與思考〉、〈蜜周〉、〈萬象〉、〈致太陽〉、〈手藝〉、〈教誨——頹廢的紀念〉、〈同居〉，以及長詩〈感情的時間〉。

虛無，從接過吻的唇上
溜出来了，帶有一股
不曾覺察的清醒，在我瘋狂地追逐過女人的那條街上
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
正在鎮靜地噴射殺蟲劑

——〈青春〉1973年

太陽已像拳師一樣逾牆而走
留下少年
面對着憂鬱的向日葵

——〈夏〉1975年[63]

芒克的代表作有：〈致漁家兄弟〉、〈城市〉、〈天空〉、〈凍土帶〉、〈白房子的炊煙〉、〈路上的月亮〉、〈太陽落了〉、〈十月的獻詩〉、〈給〉、〈街〉、〈我是風〉等。楊健描述說：芒克正是白洋淀這個大自然的孩子，玩耍、種莊稼地，還有打架和流浪。他詩中的「我」是從不穿衣服的，赤裸軀體散發出泥土和湖水的氣味：

62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頁105－106。
63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頁107。

莊稼
秋天悄悄來到我的臉上
我成熟了

土地
我全部的情感
都被太陽曬過

——〈十月的獻詩〉[64]

1973年以後沙龍中寫詩的人就多了。有史保嘉、馬佳、楊樺、魯燕生、彭剛、魯雙芹等。在「文革」中運用現代主義手法進行詩歌探索和試寫的詩人還有：田曉青（筆名：小青），北京人，「文革」期間曾經入伍，1973年復員後回城當工人。嚴力，北京人，1974年開始寫詩。楊煉，生於瑞士伯爾尼，北京人，1974年到北京昌平縣插隊，開始寫詩。林莽，原名張建中，1969年在白洋淀開始詩歌創作。

1973年夏天，社會上傳抄岳重的詩被送到了公安局。公安人員將詩拿到中國文學研究所進行鑑定審查，確定此詩無大害才算了事。岳重就此擱筆。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發動，政治壓力驟然增大。到1975年底又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尤其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對地下文壇進行查抄、清剿。較有規模的地下詩歌活動已告結束，大的沙龍開始解體，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局限於最密切的朋友之間。[65]

這些青年詩人和詩作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新時期詩歌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他們作為「先鋒派」的主力嶄露頭角，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

64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頁108－109。

65　多多：〈被埋葬的中國詩人（1972－1978）〉，載《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頁195－202。

(3) 民間流傳手抄本小說

與知青文學的抒情、現代主義文學的追求風格不同，「文革」後期的1970年到1976年開始地下流行一些打破樣板文學的固定模式、情節豐富的手抄本小說。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人物傳奇和愛情經歷，如張揚《第二次握手》；二是驚險甚至恐怖離奇的歷史故事，如況浩文《一隻繡花鞋》，張寶瑞《醉鬼張三》、《葉飛三下江南》；三是描寫性生活，當時被稱為黃色小說，如《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這些作品多以手抄、口傳的方式秘密流傳於社會底層，都不署作者姓名，隨着傳抄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衍生出了多種版本。可以說手抄本是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文學創作。據研究者統計，流傳有三百多種手抄本，有名的起碼有二三十種。有人回憶傳抄情況說：

> 有的是，上邊上着課，下邊卻在課桌底下猛抄，忙的連課間也顧不上休息；有的是，不佔白天工夫，專門等夜深人靜的時候貓在被窩裏，就點着手電「開夜車」，一抄就是一宿。這些手抄本小說只能偷偷地抄，而且因為要看、要抄的人多，時間往往特別緊，有時就只能借到一天。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那時的人們對於抄手抄本這件事似乎是格外有癮。每抄完一本都特有成就感，然後就開始翻來覆去地閱讀自己辛苦抄來的作品，或講給人聽、或借給人抄，真是樂在其中。[66]

《第二次握手》原名《歸來》，作者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張揚。他於1965年9月從湖南省長沙市到瀏陽縣中岳公社南岳大隊書塘生產隊插隊落戶。從1963年起開始撰寫短篇小說《浪花》，後擴展為中篇小說《香山葉更紅》，1970年改名為《歸來》。小說以著名核物理科學

---

66 〈「文革」中的手抄本小說《一隻繡花鞋》浮出水面〉，《北京晚報》，2000年12月5日。

家何澤慧（錢三強夫人）、王承書（張文裕夫人）等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愛國女科學家丁潔瓊的形象，通過描寫她與蘇冠蘭、葉玉菡的悲歡離合和愛情生活，歌頌了海外華人科學家對事業的不懈追求和毅然回國為祖國核物理事業做出貢獻的崇高精神，作品中還出現了周恩來的形象。

1970年張揚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蒙冤被捕，流亡中仍然秘密改稿，手稿開始流傳到社會。林彪事件後他獲得釋放，繼續修改書稿。1974年這部書稿在全國廣泛秘密傳抄，在傳抄過程中被改名為《第二次握手》。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看到北京日報社《內部參考》第960期反映這一小說情況，給報社打電話說：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如郭老、吳有訓等。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這不是一般的壞書，也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是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以請公安部門幫助查。

1975年1月7日，張揚在插隊地點被逮捕。此後，《第二次握手》被定為全國六部「反動作品」之一，進行廣泛追查，株連多人。作者張揚被扣上「歌頌叛徒、特務、走資派」、「要資本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惡毒攻擊張春橋」等罪名，長期關押，殘酷批判鬥爭。其間有關部門一度曾考慮判他死刑。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包括一些法院工作人員在內的許多主持正義的人士奔走呼籲，為張揚和他的小說平反。1978年7月，湖南省文聯在作家康濯支持下做出小說不是毒草、是愛國的鑑定。但由於某些仍然控制權力的人和部門的阻撓，張揚仍然被以其他罪名繼續關押，不予平反。1978年12月，《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記者、編輯從作家賀敬之、馮牧處得到傳抄稿和肯定的評價，在報社、出版社的支持下，決定列入計劃出版，開始尋找作者。他們衝破層層阻力，來到湖南，探望了監獄中的張揚。1979年1月9日，《中國青年報》《青運情況》以〈《歸來》是本好小說，作者張揚應平反釋放出獄〉為題，反映了這一冤案。胡耀邦看到後，立即提出要給予平反的意見。1月20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讀者來信並加編者按，為張揚和小說平反，張揚始獲

得釋放。3月，《中國青年報》連載《第二次握手》部分章節，吉林四平話劇團將該書改編為話劇演出。7月，小說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各種版本前後共發行430萬冊。1981年，小說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改編攝製為電影《握手》，謝芳、康泰主演，在全國放映。張揚後任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67]

《一隻繡花鞋》講述的是：1948年國民黨政府在崩潰前，曾秘密成立梅花黨，旨在打入中共內部。中共特工龍飛設法與梅花黨黨魁的女兒白薇邂逅，潛入梅花黨黨部盜取有梅花黨人名單的梅花圖，卻告失敗。從此，梅花圖杳無蹤跡，圖上梅花黨人名單成為懸秘。十年後，核潛艇設計圖外泄、老虎灘出現偽裝女士、火葬場鬧鬼，銷聲匿跡十幾年的梅花黨又開始行動。作者況浩文，1951年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時在西南公安部五處任幹事，參加重慶3・13逮捕行動逮捕一個女人看到一雙繡花鞋，給他留下強烈印象。1957年他據此創作了小說《在茫茫的夜色後面》。1964年初改寫成電影劇本，油印了七十多份，幾易其名，從《一雙繡花鞋》、《靜廬兇殺案》直到《霧都茫茫》。「文革」開始，電影停拍，但故事情節卻被人們傳開去，添油加醋。甚至扯上了1965年歸國的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稱其為梅花黨成員，高跟鞋裏藏有發報機。

張贇瑞是「文革」時期手抄本小說的主流創作人物，一人寫了二十多部。其中《醉鬼張三》最受歡迎，流傳最廣。講的是英俊飄逸、性情耿直、身懷絕技的張三隻身闖蕩京城，歷經波折終成一代武術宗師的傳奇故事。劇中既重墨描寫了張三等人的英雄俠義，又勾勒出貪官與悍匪相互勾結、相互傾軋的醜態。

總的來講，這些手抄本作品思想性、藝術性雖然不高，但是通俗近人，適應了當時市民渴望文藝生活多樣化的需求。其創作經歷與傳播過程，都是那個動盪時代的寫真。

---

67 陳東林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02），1975年1月7日條。

在「文革」地下文學中，還應包括一些身處逆境的中老年專業作家，寫給自己看的秘密創作。如豐子愷白天受批鬥，凌晨偷偷起來寫作，寫出了幾十篇散文。後來結集成《緣緣堂續筆》。再如，老詩人曾卓寫的〈懸崖邊的樹〉、牛漢寫的〈半棵樹〉等，都是在重壓之下的呻吟、領悟人生的哲理。郭小川在五七幹校寫的長篇政治抒情詩〈團泊窪的秋天〉、楊絳的《幹校六紀》為幹校文學代表，與知青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知道是甚麼奇異的風
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
平原的盡頭
臨近深谷的懸崖上

它傾聽遠處森林的喧嘩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獨地站在那裏
顯得寂寞而又頑強

它的彎曲的身體
留下了風的形狀
它似乎即將跌進深谷裏
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

——曾卓：〈懸崖邊的樹〉

也許中老年作家有着較豐富的運動閱歷，又有比知青相對固定一點的經濟生活條件，同時卻沒有發表言論的較自由圈子，所以他們的作品多是準政治化和春秋筆法的隱晦，表現了「文革」時代知識分子的矛盾心態和痛苦體驗，在浪漫和突破方面比知青文學略遜一籌，多數也沒有傳播到社會上。

第八章

不摸脈的鄧小平 1975 年整頓

毛澤東設計的四屆全國人大以後的國家政治格局，接受林彪事件教訓，是一個集體的天平。一端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貴派，負責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或者說抓革命；另一端是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國務院元老派，負責經濟基礎或者說抓生產。毛澤東自己就是那天平的支點，他向左或者右的移動，將引起天平兩端起落即政局的變化。此外，他用來調整天平左右兩端高低的還有一批砝碼：華國鋒、紀登奎、吳德、陳永貴、陳錫聯及後來的毛遠新等「文革」中被提拔上來的地方新人。

毛澤東的這種結構設計，顯然是一種暫時的矛盾平衡，在他去世後馬上將分崩離析。但是，令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還在他剛剛完成設計方案、喘息未定之時，鄧小平即以不妥協的行動——整頓——開始顛覆這個「文革」政治結構。

鄧小平究竟是沒有摸準毛澤東的脈搏，以為得到了毛無條件的信任，可以大刀闊斧地整頓？還是根本不想去摸毛澤東肯定「文革」的脈搏，認為局勢已經危急，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由於核心資料的缺乏，也許永遠是個謎。我們這裏，只能一語雙關地寫成——不摸脈的整頓。

一 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四人幫」反「經驗主義」

1 毛澤東提出「三項指示」

所謂「三項指示」，是指：一、「安定團結」；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本來是毛澤東在1974年下半年幾次談話中分別針對不同問題做的指示，後來由鄧小平歸納為「三項指示」。

關於「安定團結」，這一時期毛澤東說過四次。

1974年8月，毛澤東在武漢針對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會議，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個指示，明顯把文化大革命與安定、團結對立起來，如果出於他人之口，將被追究貶低「文革」的動機。而毛澤東在此之後，又連續三次提出了類似的指示，表現了他對「文革」無休止動亂的厭倦。

10月20日，他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之後，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說：「總的方針要團結、要安定。」並且批評了江青集團。12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幾次會談四屆人大「組閣」情況，再次強調「團結起來」，又批評「江青有野心」。並且要求制止一些地方的武鬥，「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還要求四屆人大以後，把「文革」以來關押的幹部，解放出來；施行特赦，把在押的國民黨戰犯釋放出來。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閉幕前，周恩來請示毛澤東有甚麼話要說，毛澤東又講了八個字：「還是安定團結為好。」[1]

關於「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一時期毛澤東講過兩次。

1974年11月，李先念、汪東興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憂心忡忡地談到：1974年全年統計數字雖然還沒有出

---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90－691。

來，但總的趨勢不好，大部分計劃指標完成不了，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事實。1975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如果不採取得力措施，「四五」計劃指標難以完成。毛澤東聽後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2]另據王震 1975 年 3 月 28 日在全國鐵路工作會議上講話說，在李先念匯報的前後，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谷牧向毛澤東匯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也指示：國民經濟要抓上去，人口非控制不可。[3]

1972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批轉全國計劃會議擬定的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引用毛澤東原話向全黨全國傳達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還是安定團結好」兩項指示，而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作為一般內容提到。通知指出：「當前要特別學好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要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這一重大理論問題。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當前特別要把交通運輸和煤炭、鋼鐵生產抓上去。」[4]由此可知，「革命第一，生產第二」的次序仍然在起決定作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朝代，「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都是治國的起碼要求。因此，毛澤東的「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指示，在理論上並沒有甚麼特殊意義。

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則是毛澤東這一時期最為上心和思考最多的問題。他比較集中的論述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4年10月20日，他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對哈特林說：

> 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410。

3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44。中央文件發出時，寫為「人口非控制不行」。

4　中共中央批轉 1975 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及附件，1975 年 2 月 10 日。

這番話顯然讓不了解中國內部政治鬥爭和經濟制度的丹麥首相一頭霧水。毛澤東喜歡在接見外賓時把他沒有成熟或者不便在黨內公開講的一些看法對外國領導人講，重要的不是對方是否理解，而是先看看陪同接見的其他中國領導人的反應。

12月26日，毛澤東在長沙同周恩來談話時，詳細地論述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列寧為甚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5]

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會見柬埔寨共產黨中央主席波爾布特，對他說：

我們現在正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

---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413－414。

一個社會主義，一個資本主義，我們現在還是兩種可能。中國將來可能也會變修正主義，但是最後還會回到馬克思、列寧的道路。

這時候，柬埔寨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已經佔領了金邊，統一了柬埔寨。作為執政黨最高領導人的波爾布特，正在準備治國方略，對毛澤東這些話很感興趣，給予極高頌揚。在一邊陪同接見的鄧小平，則沒有發表有關意見。

毛澤東這些談話內容，後來被稱為「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主題詞，是「資產階級法權」。又可以分解為兩個關鍵詞：「商品制度」，「工資制度」。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源泉。這並不是他晚年才有的觀念。「文革」結束後，許多文章批判、否定晚年毛澤東和張春橋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理論，但都是就1974年理論指示談理論，沒有弄清楚其來龍去脈。其實早在1958年大躍進時代，毛澤東就對「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產生過濃厚興趣。無獨有偶，當時寫文章發揮他思想的正是張春橋。因此，有必要於此多花些篇幅追溯一下當年歷史。

1958年，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看到河南七里營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覺得是個值得注意的動向，馬上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去那裏看看，並關照說：有甚麼新東西要總結一下。張春橋看到那裏正在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認為這是一個新發明。於是回上海向柯慶施做了匯報。柯要他搞出了一份材料，親自送呈毛澤東。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興奮地說：「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他還說：

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着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我們過了二十二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

……我們的軍事共產主義，是生活平等，搞供給制，軍民一致，官兵一致。我們就靠這個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但

是，進城後，我們對資產階級法權觀點不自覺，把薪水制說得神乎其神。於是，按等級發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有等級，辦公桌也有等級。這樣一來，脫離了群眾，戰士不喜歡軍官，農民不喜歡區鄉幹部，城市裏的工人也不喜歡我們。

我就不相信實行供給制人就變懶了，發明創造就少了，積極性就低了。過去二十二年，實行供給制，大家都過「共產主義」生活，我就沒有見過幾個懶漢！軍隊一個「花」（軍銜標誌）都沒有。

等級制度，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這是資產階級法權。「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

9月初，柯慶施回到上海，立即把張春橋召來，詳細介紹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特別提到：主席很重視「吃飯不要錢」，說「可以搞供給制」。張春橋連夜趕寫出了一篇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柯慶施看過後，十分稱許，批准發表在9月16日出版的上海市委理論雜誌《解放》第六期上，並送呈毛澤東。

文章立即引起了在熱氣騰騰中巡視大江南北，於9月29日回到北京的毛澤東的注目，指示《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轉載，並親自起草了一個編者按。然而，吳冷西給毛澤東寫信委婉地提出，有不少同志對張春橋文章有不同意見，請毛澤東考慮在編者按中是否說得活一些，先不要過於肯定。10月11日上午，毛澤東給吳冷西回信說：

信收到。既然有那麼多意見，發表時，序言應略為改一點文字，如下：

人民日報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

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6]

信後，毛澤東還囑咐「請你拿此給陳伯達同志一閱，問他意見如何；並將你們討論的詳情給他談一下」。陳伯達看後，也非常讚賞，只改了一個標點。10月13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張春橋的文章。文章說：

在全國解放以後，這種以「供給制」為特點的一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還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給制」，如同說到老革命、說到艱苦奮鬥等等一樣，人們認為是光榮的。一些革命青年剛剛參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給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樣，是真心實意地來革命的。原來過慣了供給制生活的同志，也並不羨慕甚麼薪金制，人們喜愛這種表現一種平等的相互關係的生活制度。但是，沒有多久，這種生活制度受到了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攻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堅持這種思想的人們看來，供給制的一套，實在毫無可取。他們輕蔑地說它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總之，共產主義的供給制，保證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供給制，被某些人攻擊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處死刑不可。……

在「供給制」的情況下，千千萬萬的人進行了幾十年的武裝鬥爭，爬雪山，過草地，兩萬五千里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難道也是靠工資刺激出來的嗎？聽到這種議論，每一個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種侮辱，還能說甚麼呢？……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如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正確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447。

面，都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不平等，還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還不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馬克思的這段話，有沒有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根本不能破壞，反而應當把它制度化、系統化、更加向前發展呢？是不是只應當片面地強調「物質利益」原則，而不應當從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呢？……請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公社所採取的革命措施，難道不恰恰是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等級制度、並不講究甚麼物質利益原則嗎？

經過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對「供給制」、對「農村作風」、「游擊習氣」的攻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保護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推行他們這一套的結果，我們黨的幹部中，原來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狀況改變了，有些早已對艱苦樸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學會了紳士派頭、高等華人派頭、趙太爺派頭來了。……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風氣發展起來，幹部同勞動人民的相互關係變化了，領導幹部的「三風」、「五氣」有了發展。

……一切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志們，一定能夠站在運動的前頭，把我們黨的這種光榮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徹底恢復和發揚起來，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同群眾建立起平等的相互關係，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工作，一致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這難道有甚麼懷疑嗎？[7]

張春橋並不懂經濟，因此他在文章中，只是大大地提高調門來重複毛澤東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語句，而沒有甚麼經濟理論上的論證，充其量只是篇雜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場不算小的爭論。

---

7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不同意恢復供給制的有：劉藝的〈工資制在解放後勢在必行〉，吳毅的〈不要否定工資制的歷史意義〉等。[8]最尖銳的反對意見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寫的〈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幾個問題〉、〈怎樣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制度〉等文章，認為張文「完全混淆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形而上學的典型」。

贊成恢復供給制的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王茂湘、蕭灼基[9]等人的〈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討論——供給制改工資制是一種倒退〉等文章。[10]

10月13日，毛澤東從北京出發，再次外出視察。他想調查一下下面反映的材料是否真實。10月16日，他在天津召集彭真、陳伯達、林鐵、萬曉塘開會，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張春橋也參加了。

此前的9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河南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的簡章。規定：一鄉一社，過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全部公有財產和自留地都上繳公社，社員實行工資制和免費吃飯。對此，毛澤東有些懷疑，10月19日，他寫信給陳伯達，要他帶張春橋去那裏調查「向共產主義過渡」情況。毛澤東特地要他們每人帶上一本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白天調查，晚上閱讀。並囑咐他要親自聽匯報，在四省第一書記會議上討論。

他們走後，毛澤東仍然感到不放心。10月26日，又找來吳冷西、田家英，要他們到修武縣和新鄉七里營公社去調查。毛澤東頗有些不安地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為災難。你們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後的情況。北戴河會議時我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現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11]

8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7日。

9　蕭灼基，1933年出生，1980年代後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首先提出「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的觀點，成為著名市場經濟、股份制和金融證券專家。

10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8日。

11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102－111。

陳伯達、張春橋從遂平回來，不知道毛澤東心中起了疑慮，仍然起勁地鼓吹「供給制」和「進入共產主義」，陳伯達還建議取消商品交換，實行產品調撥，並據此為鄭州會議起草了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的若干決定。結果遭到毛澤東譏諷說：「我們有些同志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但臨到實際問題，馬列主義就不知道哪裏去了。」

吳冷西、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說：七里營人民公社只能說是平均主義，不能說是按勞分配，更不能說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了。毛澤東沉思了一會兒說：「延安時期的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制了。」

這時候的毛澤東，處在極端的矛盾之中。他熱切嚮往着通過群眾運動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希望在基層真的發現這樣一個實例，出身農民家庭的他又深知這種想法的虛幻。後來到了武漢，他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但是，在他將要離開人世的前兩年，他又提起了這個念念不忘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理論。與當年大躍進中強調用平等激發人的積極性、實現經濟建設高速度的着眼點不同，他這時候強調的是防止林彪一類上台、消滅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源。由此可見，毛澤東內心對他發動並進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反修防修效果，是很缺乏自信心的。基於這種變化，也因為大躍進帶來嚴重災難的教訓，毛澤東這時候雖然重提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但並沒有想採取甚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體破除措施，而是說：「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就在接見波爾布特的談話中，他還說到：「還要多少年，還是這樣，然後才能到共產主義。」

但是，毛澤東既然表示極大讚賞，既然「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要春橋寫這類文章」。就必然會給當時的政治鬥爭漩渦投下一塊打破平衡的石頭。

2 「四人幫」借力發動反「經驗主義」活動

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正式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組織學習這一理論的通知，附錄了張春橋、姚文元受毛澤東委託選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語錄。其後，毛澤東指示：列寧語錄要補充，改為論無產階級專政。並要姚文元也寫文章。[12] 22 日，《人民日報》發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十三條語錄，並在編者按中公布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一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隨即在全國開展起來。

一開始，對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文革」激進派和國務院穩健派都在謹慎地琢磨其真正含義。控制輿論工具的「文革」派進行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宣傳攻勢，但是，突破口應當選在哪裏，張春橋、姚文元還在斟酌。江青還認為這將會使批林批孔運動半途而廢，頗有怨言。2 月 5 日，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部負責人說：「我有一個總的印象，主席關於理論問題指示，問題集中在資產階級法權上。甚麼是資產階級法權，為甚麼要加以限制，如何限制，這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有甚麼關係，還不很清楚。」很快，他就憑着政治鬥爭的敏感和需要，拋開理論本身，把重點引向了歷史和現實的路線之爭：

> 58 年春橋寫文章，當時主席寫了按語，《紅旗》不登，《人民日報》登了。本來討論要引導到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限制，但結果是反攻倒算，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廬山會議彭德懷跳出來。可以把那些材料找出來看看。案子沒有了結。
>
> 商品問題不忙寫文章，作資產階級法權的一部分來考慮。
>
> 產生資產階級作風的，可以大膽寫。

12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5 年 2 月 21 日。

不去扯分配、工資的問題，圍繞着主席提的，看集中在甚麼問題上。不要離運動太遠。[13]

「四人幫」統一了認識，決定把靶子定為「經驗主義」。依據是，毛澤東1959年寫過一段批判彭德懷的話：「在這裏印出了《哲學小辭典》中的一部分，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學的興趣。」「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在批陳整風、批林整風中，毛澤東又建議讀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哲學小辭典》。

所謂「經驗主義」，張、姚認為，就是指那些有長期革命經歷、又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以國務院為首的老幹部階層。顯然，對張、姚來說，他們這些負責意識形態工作、專門以理論、語錄、指示來發號施令的「文革」發跡幹部，對號入座就是「教條主義」。

就在3月1日這天，姚文元和張春橋分別從公開和內部兩個渠道，正式提出了反「經驗主義」的問題。姚文元公開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的重頭文章，這是應毛澤東要求寫的，也是姚從1968年以後唯一以本人署名發表的文章。文章論證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強調必須批評、限制、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文章特別閃爍其辭地提出，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1959年「反右傾」時說過的意見：「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

同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更明確地對反經驗主義作出了說明：

據我看，主席的話現在仍然有效。……廬山會議以後，七零年又學了一陣。九一三以後，又學了。但已經變成了全黨，特別

13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年2月5日。

是高級幹部。……我覺得，學習問題，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主要是領導幹部不是抓得很緊。現在，我們要以主席的指示當作綱，聯繫我們部隊存在的這些問題來學習。

我唸主席的這幾段話的意思，是為了說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來的，而是多年來主席一直是這樣教導我們的。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講的。

他還更聯繫實際地影射周恩來、鄧小平說，1972年批極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我個人還有個意見。四屆人大提出了一個很宏偉的目標，在本世紀內，也就是本世紀末，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很強大，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無非就是搞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是，如果我們把理論問題搞不清楚，就會重複斯大林的錯誤。當時他們有幾千萬噸鋼，糧食沒有我們這麼多，他們是衛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幟落地。[14]

在3月寫的一個文件稿中，張春橋又說，「這些年來，我們學習馬列的狀況，有所進步，但是，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點並沒有根本改變」。[15]4月1日，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這就是毛澤東要他寫的文章，也是「文革」發動以來他唯一的重頭文章。和姚文不同，張文沒有提出反經驗主義的語言，而是更加具體化地圍繞專政做文章。

張文的第一個觀點，就是論證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不鞏固、資本主義復辟無時無刻不在的現狀。文章在引述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

14　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1975 年 3 月 1 日。

15　中發〔1976〕24 號文件，頁 30。

示後，又提出了一系列調查數字：1973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佔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97%，工業人數的63%，工業總產值的86%。集體所有制工業佔固定資產的3%，人數的36.2%，總產值的14%。此外，還有人數佔在農業生產資料中，耕地、排灌機械的90%左右，拖拉機、大牲畜的80%左右是集體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國的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90%以上是集體經濟生產的。國營農場所佔比重很小。此外，還保留着少量的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國營商業佔商品零售總額的92.5%，集體所有制商業佔7.3%，此外，在農村還保留着相當數量的集市貿易。

按照這個統計，全國工業人數中只有0.8%的個體手工業者，商品零售總額中個體商販只佔0.2%。公有化程度顯然已經高到令人吃驚的程度。然而，張春橋卻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不鞏固的現狀，因為，他根據毛澤東的存在商品交換和八級工資制理由，把集體經濟實際上納入到非公有制的小生產範圍內了。這顯然是十分荒誕的，也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劃分原則的。其目的就是危言聳聽地製造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不穩固、小生產每日每時都在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局面，為「文革」的繼續革命提供依據。

張文的第二個觀點，就是把資產階級和對資產階級專政的範圍，極大地擴展到各個階層、領域和時期，提出一個「全面專政」口號：「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其理由是，即使實現了百分之百的公有制，還有一個企業「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的問題。另外，由於「新資產階級分子一批又一批地產生」，「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資產階級都死光了，這種階級鬥爭也決不會停止，林彪一類人物上台，資產階級的復辟，仍然可能發生」。他引用中共在保安時期的歷史，將消滅資產階級比喻為打「土圍子」：「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就是將來被消滅得只剩一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不到，它也不會自己跑掉。」

根據張文的這第二個觀點，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階級，並不是隨着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消滅而消滅，還要看領導權是不是在代表無產

階級的領導者手中，如果這些領導幹部有「資產階級思想」，這些企業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即使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化之後，只要有包括經濟領域之外的哪個領域還有一個「土圍子」存在，資本主義就有可能死灰復燃。這個理論一是推翻了列寧關於階級的產生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定義，使資產階級成為「不死鳥」，階級鬥爭也就成為永恆的動力，專政在各個領域都成為必要。二是推翻了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定義，把資產階級說成享有特權、地位、利益的階層乃至代表「資產階級」的思想、路線，實際上是影射「文革」前的領導幹部官僚階層，即「走資派」。

嚴格地說，這並不是一個新發明，而是發源於南斯拉夫前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的著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提出的「幹部是一個階級」的思潮。「文革」前夕，毛澤東又提出了「新階級鬥爭」思維，認為黨內確實出現了資產階級，這是今後階級鬥爭的重點。1965 年 1 月，他在一個報告中批示說：

>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16]

這種理論是否有其合理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論不休，本書這裏不予討論。需要指出的是，依照這個理論，「四人幫」就可以給「文革」前擁有各種特權地位、經濟待遇較高的老幹部，包括反對「文革」路線的老幹部，扣上「新資產階級」的帽子。由於「文革」把「文革」前的等級制秩序破壞打亂，「文革」中新生的工農兵幹部階層，擁有的特權是大大減少了，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當時由工農兵提拔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吳桂賢，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 266。

姚連蔚，到中央後工資仍然是「文革」前當工人、農民的幾十元數額，每月還要當地送到北京來（包括糧票）；他們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每喝一杯茶都要支付0.20元人民幣，吃夜宵要付0.50元，以至於吳感覺難以負擔，只好要服務員給她上白開水。

這種新舊幹部的差別，也成為當時「文革」派在學習理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中能夠有力批判老幹部是「新生資產階級」而自身有恃無恐的一個原因。當然，「文革」後批判「四人幫」時揭露出「四人幫」成員江青、王洪文也有種種腐化墮落生活情況，這應當視為個人濫用職權的性質，而不是要被限制的「資產階級法權」。[17]

相對張、姚，江青則沒有甚麼新理論建樹，只是用她的特殊身份煽風點火。4月4日她通過遲群給北京新華印刷廠電話指示，說：「我講了春橋同志關於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文章的重點。我還要補充另一個重點，就是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這個問題進城以後就屢次提出過，在全黨沒有提起應有的警惕。現在我們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性，擦亮眼睛，要認識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18]4月5日又對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的人重複了這個論點。[19]江青、王洪文還分別找政治局一些成員談「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分送上海機牀廠反對經驗主義的十條經驗等材料。談話中，江青指摘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於業務，要求改變領導；同時又翻出歷史老賬，大講王明路線的危害，影射周恩來當年曾和王明站在一起。4月中旬，江青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說政治局應該討論，而且要交鋒。[20]

---

17 這主要是指江青、王洪文在生活消費方面的腐化。根據「文革」後的揭發，張春橋、姚文元除了吃過幾次宴席外，沒有其他經濟方面的把柄。

18 遲群傳達的江青的電話指示，1975年4月4日。

19 中發〔1976〕24號文件，頁31。

20 根據鄧小平在周恩來1975年5月21日給政治局委員的信中所加註。又見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159。

根據張、姚確定的方向，輿論工具開始連篇累牘地發表更加露骨的文章。3 月 21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在引用毛澤東 1959 年廬山會議時寫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句話後說：「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義路線走。」4 月 7 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說：「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於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而不肯聽取別人的意見。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明目張膽地影射抗戰時期與王明同在中央長江局的周恩來。

鄧小平對「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用心，洞若觀火。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討論反經驗主義問題，並一語道破她私下找人談話目的說：這很明顯，是在政治局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4 月 18 日，鄧小平在北京陪同毛澤東會見朝鮮金日成後，又就張春橋 3 月 1 日在總政治部座談會上強調經驗主義危險的講話當面向毛澤東請教，同時還提到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這個問題的情況。[21]

恰好在這時候，「四人幫」也認為攤牌時機已到，4 月 20 日姚文元指使新華社寫了一份〈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由他轉呈毛澤東。提出「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22]

於是，毛澤東不得不表態。他雖然主張批判經驗主義，但並沒有想針對此發動一場運動把四屆人大剛剛確立的政治格局搞亂的想法。4 月 23 日，他批示：

>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

21　據周恩來 1975 年 5 月 21 日給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引鄧的話和鄧本人所加註。

2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26。

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第二段話說有人「不大懂」馬列，「動不動就訓人」，明顯是批評「四人幫」的。於是，風向大變。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討論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唸了毛澤東的批示後，除「四人幫」外，大家都要求將這一批示下發。但張春橋反對，認為在其他文件上順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吳德發言說：不下發，反經驗主義的風就刹不住。不經過政治局，不請示毛主席，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不符合原則。反經驗主義是反對老幹部的，你們幾個人這樣是搞宗派主義。葉劍英接着說：主席講你們是「四人幫」，要你們停止活動，你們是停止活動了，還是照樣活動？其他人也發言要求把毛澤東批示下發。江青被迫作了檢討。會後，鄧小平對吳德說：你今天鼓了很大勇氣吧？[23]

會後，王洪文、江青分別要求見毛澤東。王洪文在給毛澤東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的信中，誣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兇的謠言，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繫在一起。從會上的情況看，攻得最兇的是葉，還有鄧。但估計，葉是給人當槍使的。並說，鄧出來後沒有像樣的講過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12月會議的案。[24]江青要毛的秘書張玉鳳轉告毛，4月27日會上幾個人跳出來圍攻他們，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毛澤東表示：要見請大家一起來。

23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161。

2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703。

3 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一一握手簡短敘談後，他首先批評江青等人的「反經驗主義」，及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來，搞「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用個人名義送材料、搞宗派主義等錯誤說：

> 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對不起春橋。還有上海機牀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
> 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
>
>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
>
>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
>
> 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甚麼材料的。

毛澤東還要陳永貴、吳桂賢「不要住在釣魚台」（「四人幫」的住地）。他批評「四人幫」搞宗派主義說：

>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甚麼照樣搞呀？為甚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同時，毛澤東重提經驗主義配合王明教條主義統治黨的那段歷史，指着40年代在延安整風中被他批判為「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周恩來說：

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你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我講恩來、朱德不夠，沒有林彪、彭德懷還沒有力量。

很顯然，毛澤東對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採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要求給時間改正：「無論甚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對經驗主義，他說：

有經驗主義的人多，無非是不認識幾個字，馬列也不能看，他們只好憑經驗辦事。歷來對經驗主義是沒有辦法，我是沒有辦法，慢慢來，還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觀念達不起來。

對江青的錯誤，他說：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唯一獲得稱讚的是鄧小平，毛澤東指着他說：

反對鄧、毛、謝、古。鄧是你，毛是毛澤東，謝是謝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25]

25 毛澤東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年5月3日。

在反經驗主義這場風波中，周恩來雖在醫院，卻對外界動向一清二楚，不斷和鄧小平、葉劍英等人交換意見，商量對策，並和王海容、唐聞生長談。這次會後，5 月 3 日、7 日，他連續兩晚從醫院出來，到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在政治局範圍內貫徹落實的問題。他首先和鄧小平交換了意見，提議先在政治局常委小範圍內談一下，同時花了兩天時間起草了一份學習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續問題的意見稿。周恩來按照毛澤東談話精神，指出：

> 強調反修正主義的一項經驗主義，放過另一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都不提了，這不能不是一個錯誤。報紙全國轉載，清樣有時轉至各地，軍隊報告發至下層，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區、部隊和一部分機關、學校弄得爭論不休，或者年老幹部又不敢負責工作。因為有文章上說，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搞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的人，對於教育他們不利。[26]

意見稿還針對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自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的問題，對政治局的工作手續問題作了若干規定。然而，毛澤東在會後又把他 4 月 23 日對新華社報告的批示壓了下來，決定不公開發表，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傳達這一意見。這給了「四人幫」一個錯覺，以為可以蒙混過關，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時間，遲遲不向政治局成員通知準備開會的事情。毛澤東催問後大為惱火，傳話批評王洪文，不讓他再主持批評江青的會議，提出批江的會議改由鄧小平來主持。

由於毛在談話中張冠李戴，把姚文元文章中提出批經驗主義說成是張春橋的文章，張春橋就借此逃避檢查。5 月 21 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針對張春橋企圖鑽空子不認錯的問題，指出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在信的末尾提議：「將此報告轉呈主席一閱。」[27]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1172。

27　周恩來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的信，1975 年 5 月 21 日。

關於弄清當時沒有聽清楚問題，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不在春橋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兩篇社論，也是根據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春橋同志在總政三月一日召開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的三、四月份電報中可以看出。當時，春橋同志說，在批林整風時，他就認為從一九五九年後批經驗主義不夠，所以與我商量又將主席批印的《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小辭典》選輯重印一批發出。

張春橋對周恩來把他的老底包括毛澤東沒有提到的問題揭穿，恨得癢癢的，但又無可奈何，只好表示：「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不再改了。」[28]

5月27日和6月3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對江青等人進行批評。

5月27日，鄧小平在會上發言。他回擊了「四人幫」關於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批評「過頭」，是「突然襲擊，圍攻」的說法，集中地嚴厲批評了「四人幫」三件事，甚至憤怒地拍了桌子。他說：

（毛）四月二十三日批示。（政治局）二十七日討論。到會同志都講了話。有同志說，這次會上的講話過了頭。有的同志說突然襲擊，圍攻。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突然襲擊，過頭。無非是講了歷史上路線鬥爭，有的來自經驗、有的來自教條，我沒有講得主席那麼清楚。歷史都提

28 周恩來就傳達毛澤東4月23日批示問題給政治局委員的信，1975年5月21日。及張春橋批語。

反修，是否改變九、十大的提法？這沒有甚麼過。對照主席的話，看得太淺。

倒是要提一個問題：三件事：（1973年12月）批周、葉，批是完全應該的，當時鑽出一個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不是主席的，後來是主席糾正了。（1974年）批林批孔，又鑽出個走後門。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面點很多人的名。（1975年）學理論，是防修，反修，又鑽出一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件事雷厲風行。（送）機牀廠（十條經驗）。如果搞下去，這個面對幾千萬，比走後門大十倍。

主席提三個問題，鑽出三件事。倒是問一問，為甚麼！[29]

李先念發言認為，4月27日會議沒有過分。沒有越軌。吳德、陳錫聯也發言重複了毛澤東的講話內容，希望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有問題，講清楚。但是，多數政治局成員對毛澤東究竟想批評「四人幫」到甚麼程度沒有底，因此，6月3日的會開始一度沉默。還是葉劍英打破僵局，他先針對「四人幫」的反經驗主義活動發言批評說：「3月1日出現反經驗主義。全國報紙跟着來了，用反經（驗主義）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個，放過另一個。」隨後又針對「四人幫」的宗派活動說：

團結。不要分裂。（4月27日會議）不同於廬山。……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對付林彪，是對的。……過去可以交頭接耳，現在如果不變，就不利。團結的方法：一手是批評，一手是團結。過

29　中央政治局批評「四人幫」的兩次會議記錄，1975年5月27日；1975年6月3日。該記錄為張春橋在筆記本上記錄的要點，有些地方省略了相關話語、不甚明白。為保留原貌，此處仍引用原文，只在括號內酌加幾字提示。有些著作引用時作了改寫，可參見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470－473；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頁330；余世誠：《鄧小平與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頁290。

去一個時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團結。歷來小組織存在，分裂。

請示報告，嚴守紀律。幾乎重大的問題，基（指基辛格訪華），批（周、葉），完全對的。（江青提出）十一次路線，事先未請示。批走後門，也是事先未請示。批經驗主義，又是主席糾正。為甚麼不請示？使主席有感覺？不要干擾主席，最大的干擾。背叛。村村點火，處處冒煙。[30]

迫於形勢，王洪文在會上從三個方面作檢查說：「一年多來，總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發生的問題，主要由我來負責。包括不抓大事，（搞）四人幫。反走後門，我是贊成的。兩次（批林批孔）大會，我參加了。事先沒有報告主席。」搞「四人幫」問題：「對我來說，只聽一方意見，沒聽小平意見，……對爭論看法，有片面性。報告了主席。主席批評，錯誤主要是我。」反經驗主義問題：「雖然沒發表文章、講話，社論、新華社報告，我都看了。……我沒有認識到問題在哪裏，也沒有引起重視。直到主席批示。」「以後，一定按主席安定、團結，三要三不要辦事。」「另外。（對4月）27日會的看法，我認為多數同志的發言是好的，對我的批評，難得。」同時，王洪文又提出有兩個保留意見：不同意說他們搞得「形勢一塌糊塗。確實，有干擾。但形勢總的是好的。」「決不能因批江，而否定（1973年批周的）11月會議。會議大方向沒有錯。」[31]紀登奎等幾人又追問：你背着周總理、政治局飛長沙見毛主席，你談了甚麼？王始終不吭聲。[32]

張春橋在檢討中說：「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要堅決照辦，並盡可能地做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

30 中央政治局批評「四人幫」的兩次會議記錄，1975年5月27日；1975年6月3日。參見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頁474；實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頁330；余世誠：《鄧小平與毛澤東》，頁290。

31 中央政治局批評「四人幫」的兩次會議記錄，1975年5月27日；1975年6月3日。

3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165。

第一次批評會剛完，江青就去向毛澤東訴苦說鄧「突然襲擊」、「反攻倒算」。毛澤東沒有鬆口，堅持讓江青寫出書面檢查。江青只好在第二次會上表示：我得消化一下，還得看一點東西，再作進一步檢討。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適可而止，表示講多少算多少。會後，鄧小平與其他人商議，現在工作繁忙，這個批評會先停一下，問題先掛起來。經鄧請示毛得到同意。[33] 6月28日，江青交出書面檢查，說：「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她檢查自己一年多來所犯的錯誤：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齊發」，「個人自作主張送材料」，以及講「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等等。她還寫道：「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甚麼主席從去年說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負主要責任，連累了他們三位同志受批評，是很對不起他們。」[34] 周恩來在批語中委婉地規勸說：「今後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繫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志好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35]

於是，一場圍繞反經驗主義的風波到此平息。

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會議批評江青，既講清問題，又把握分寸，是滿意的。6月，他同鄧小平進行了一次談話。鄧小平匯報了政治局會議情況，毛點頭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鄧說：「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毛說：「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就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反葉帥，反陳錫聯。要告訴莊則棟，有事要找陳錫聯，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陳錫聯不好辦

33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165。

3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713。

3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713。

事。」毛澤東還說：「風向快要轉了，在政治局。」鄧又說：「政治局的同志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散了。」毛澤東稱讚說：「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他威望不高。」

鄧又說：「他最後的發言，政治局許多同志感到不真實。」毛說：「江青也不喜歡他，專門在我這裏告他的狀。他應該好好工作。」

在談話中，毛澤東對鄧小平寄予了很大期望，說：「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鄧回答：「這方面我還有決心就是了。」「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毛澤東笑着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鄧又說：「開始工作時，主席給我這個工作崗位，我說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澤東說：「這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36]

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四屆全國人大結束後，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則由王洪文主持。但從4月27日鄧小平代替王洪文主持批評江青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開始，毛澤東逐漸傾向於由鄧全面接掌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6月下旬，王洪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要到浙江、上海工作一段時間。王離開前向毛澤東報告，提議他回到北京前，中央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7月1日，葉劍英致信毛澤東，稱自己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鄧小平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當天即圈閱同意。7月2日起，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37]

這一局勢，為鄧小平在各個領域開展1975年整頓，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

36 毛澤東同鄧小平關於批評「四人幫」的一次談話（節錄），1975年6月。參見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頁474。

37 實際上，王洪文到1975年11月中旬才返回北京，毛澤東也沒有再讓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

二　鄧小平在各個領域的整頓

1 從鐵路開始的工業整頓

毛澤東提出的「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個要解決的是政治問題，即結束「文革」以來的危機四伏、混亂動盪狀況；一個要解決的是經濟問題，即改變批林批孔運動以來經濟持續嚴重下滑現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針對國家政局和經濟出現的嚴重問題所採取的重大解決方式，一般有四種表達話語，都包含着不同的含義。

「治理」：這是指問題不太大，是局部的，原來的方針政策基本是對的，但需要加大力度、強化執行；如1989－1991年的經濟領域治理整頓，又稱宏觀調控。

「整頓」：這是指方針政策存在全局性問題，需要進行較大幅度調整，但對整體指導方針還是基本肯定的；如1962－1964年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調整。

「改革」：帶有全面改變以前方針政策的性質，但要用不觸動根本制度的置換和創新辦法來進行；如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的改革開放。

「革命」：徹底否定過去的方針路線和制度，帶有改朝換代性質；如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和1981年的最後糾正華國鋒「抓綱治國」路線。

鄧小平採取的是哪種手段？從後來的發展看，他很想採取革命加改革的辦法徹底否定「文革」路線。但當時的條件和局勢實在過於嚴峻，既然毛澤東要在整體上還繼續肯定「文革」路線，鄧就只能採取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整頓，就是當時他力所能及的一個戰略手段。對象，就是根本方針路線之外的部分政策。有的研究著作把鄧小平的1975年整頓稱之為改革，值得商榷，且不說當時毛澤東和「文革」派能否允許對「文革」路線進行改革，就以鄧小平採取的種種措施，也

沒有超越「文革」前的性質。這並不是要貶低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意義，實在是，在「文革」路線佔統治地位的當時，能夠做到用整頓使國家的經濟建設有章可循，走上比較穩定的軌道，已經殊為不易，遑論改變過去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進行創新。

1973年7、8月，國家計委同有關部門一起研究，已經提出了1974年國民經濟計劃設想，10月作了調整和修改。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衝擊，全國計劃會議遲遲不能召開。國家計委只好遵照國務院指示，先安排了1974年第一季度生產建設和第二季度工業生產。1974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關於1974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

1974年，是「四五」計劃期間國民經濟計劃遭受干擾破壞極為嚴重的一年。國家政治形勢再度出現的動亂，使林彪事件後因周恩來主持兩年調整得到好轉的國民經濟，再度走向動盪。許多企業處於半癱瘓狀態，交通堵塞，國家計劃大部分指標未能完成，一部分主要產品產量比上年還有下降。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為4024.3億元，完成計劃的95.6%，僅比上年增長1.4%。其中工業總產值2796.3億元，完成計劃的93.2%，僅比上年增長0.3%；大部分重工業和輕工業產品都沒有完成計劃，甚至比上年還有下降。主要指標完成情況是：鋼2112萬噸，為計劃的78.2%、比上年減少16.3%；原煤4.13億噸，為計劃的96%，比上年減少400萬噸；原油6485萬噸，為計劃的101%，比上年增長21%；發電量1688億度，為計劃的96.4%，比上年增加20億度；棉紗994萬件，為計劃的86.4%，比上年減少8.4%；鐵路貨運量7.87億噸，為計劃的92%左右，比上年減少5.3%；農業總產值1228億元，完成計劃的101.5%，比上年增長4.2%；糧食5505億斤，為計劃的102%，比上年增長3.9%。由於糧食緊張和自然災害等原因，棉花比上年減少202萬擔，達到4922萬擔；其他主要經濟作物除黃紅蔴外均未完成計劃。[38]

---

38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編輯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355。

經濟嚴重下滑的癥結在哪裏？鄧小平主持制定、由中央下發的執行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裏已經點明：「特別要把交通運輸和煤炭、鋼鐵生產搞上去。」於是鐵路就成為整頓的主攻方向。

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破壞，1974年鐵路的主要問題是貨運量下降。1974年全國鐵路貨運量為7.87萬噸，只完成計劃的92%，比上年減少4321萬噸，下降了5.3%。[39]尤其嚴重的是，這種滑坡勢頭1975年頭兩個月仍然在發展。全國二十個鐵路局中，有十五個沒有完成運輸計劃。1月份全國鐵路日裝車量為45835輛，僅為計劃的91.7%，2月份又下降為42945輛，只相當於當時日裝車能力55000輛的80%。[40]

計劃不能完成的原因，首先是徐州、南京、鄭州等鐵路局被造反分子、野心分子把持，猖獗地煽動動亂。京廣、湘桂兩條幹線一度全部癱瘓。1974年底到1975年2月，徐州鐵路樞紐發生堵塞、武鬥，京滬、隴海幹線面臨堵死危險。更令人震驚的是，2月3日，毛澤東的專列從長沙前往杭州，要途經金華地區，兩派群眾正在動用輕重武器進行武鬥，毛澤東被堵在南昌停留。直到浙江省委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兩派不准開槍，並派出大批軍隊沿途護送，毛澤東專列才於2月8日到達杭州。[41]

其次是規章制度被破壞，普遍不遵守勞動紀律，造成1974年全鐵路發生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起，比上年增長48%，是1964年的8倍以上。[42]鐵路運輸長期陷於堵塞，嚴重影響了工業生產。大慶、克拉瑪依等油田被迫關井減產，南方幾省的氮肥減產三分之一，華東電網因缺煤減少發電量三分之一，江蘇、湖南等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工廠停產、減產。[43]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355。

40　轉引自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52。

41　杭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浙江文革紀事》（杭州：《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內部刊印本，頁232。

4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5。

43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鐵道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0），頁74。

1975年1月28日和2月6日，四屆全國人大上被任命為鐵道部長的萬里上任不到二十天，鄧小平就兩次召見談話，萬里匯報認為，問題的要害是派性嚴重，體制問題也起了決定作用。他提出，用半年時間解決。鄧小平表示，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求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並要鐵道部代中央起草一個解決鐵路問題的文件，他親自口述了文件的主要內容。

根據鄧小平部署，1975年2月1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國主管工業的黨委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的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二十五個部委主要負責工業交通的書記。紀登奎、華國鋒、王震、余秋里、谷牧、吳桂賢、孫健等七位國務院副總理出席。這實際上是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工作會議。會議的重點是解決鐵路運輸問題。鐵道部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作為會議文件下發討論。與會者紛紛表示，鐵路拖了國民經濟的後腿，現在中央採取這樣堅決有力的措施，這個決心下得好。

3月5日，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澤東圈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作為中央9號文件正式發出。會議閉幕前，鄧小平到會發表重要講話。他沒有按照慣例和大家握手，說：不拉手了。現在工業情況還不好，等你們工業搞上去了，再拉手。

他在講話中嚴厲地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礙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是大錯特錯的。解決鐵路問題的辦法是要加強集中統一，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和紀律，對少數鬧派性的壞頭頭，要堅決予以處理。「徐州那個鬧事的頭頭本事可大啦，實際上是他在那個地方專政。對這種人不及時處理，等到哪一年呀？」[44] 他要求，把9號文件宣傳到群眾中去，家喻戶曉。主管交通的副總理王震當即向中央立下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效！

---

44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6。

會後的3月9日，鐵道部長萬里親自帶領工作組，前往問題特別嚴重的徐州鐵路分局。3月10日即雷厲風行地召開萬人群眾大會，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央9號文件，調整領導班子，逮捕了顧炳華（徐州市物資局技術員）等一批造反派壞頭目。江蘇省革委會發布〈通告〉，3月11日、13日、15日又接連召開徐州地區黨員幹部大會、徐州分局機務段確保鐵路暢通誓師大會及濟南、上海、鄭州三個鐵路局領導幹部會議，進行動員。奮戰十二晝夜，使徐州鐵路分局面貌很快得到改觀，結束了連續二十一個月完不成任務的局面。3月中旬，徐州鐵路分局每天通過列車由以前的三十八對增加到七十二對，日均裝車由七百多輛增加到一千四百多輛，4月份更是提前三天完成計劃。

鄧小平聽了萬里匯報後，3月25日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肯定了徐州經驗。會議指出，中央9號文件不僅適用於鐵路，也適用於各行各業。4月至6月，萬里率領工作組又前往太原、鄭州、南昌、長沙、昆明等地路局（其中鄭州去了三次），向全國鐵路推廣徐州經驗，由中央支持和地方採取果斷措施：調整領導班子，撤職或者調離了一批派性嚴重、不貫徹中央9號文件的地方領導幹部；批鬥了近萬名鬧派性嚴重而又堅持不改的人，逮捕了兩千多名違法犯罪分子，還處決了其中的一百多名罪大惡極者。

鐵路整頓立即收到了明顯效果。4月份，全國鐵路二十個局除了南昌外有十九個完成了計劃，而連續十七個月沒有完成計劃的南昌鐵路局在5、6月份也都超額完成計劃。第二季度全國鐵路貨運量比第一季度增長19.8%；上半年完成41607萬噸，為全年的49%，比上年同期增長8.6%，創造了歷史最高記錄。從4月起，煤炭日裝車量五十八個月來、卸車量五十七個月來第一次完成了計劃。津浦、京廣、隴海、浙贛等主要鐵路幹線保持了暢通。[45] 群眾高興地說：火車正點萬里行！

鄧小平聽了萬里匯報後，高興地說，鐵路上來了，現在要看各個部門的了。於是，其他工業部門的整頓也進入了高潮。

45　轉引自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頁81、82。

鋼鐵工業是鐵路之外的另一個「老、大、難」的行業。本來，經過周恩來的調整措施，1973年全國鋼產量已經達到2531.9萬噸，但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一來，當年又下降到2111.9萬噸，比計劃減少488萬噸。[46] 1975年1、2月份全國鋼產量288萬噸、鐵產量304萬噸，分別比計劃欠產鋼95萬噸、鐵86萬噸。其中佔全國鋼產量50%、鐵產量65%的八大鋼鐵公司（即鞍山、武漢、包頭、太原、本溪、首都、攀枝花、馬鞍山八大鋼鐵公司）分別欠產為63.6萬噸和85.6萬噸。由於紀律鬆弛，事故頻出不窮，武漢鋼鐵公司甚至發生了一天跑兩次鋼水的惡性事件。

早在3月25日國務院會議上，鄧小平就已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決鋼的問題。」[47] 在此之前的1975年2月18日至3月11日，由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主持，冶金工業部召開了八大鋼鐵公司座談會，強調「三月份趕上來，二季度要大上」。由於沒有採取堅決措施，會後八大鋼鐵公司生產雖有一定進展，但整個鋼鐵工業仍然沒有改變欠產狀況，其中鞍山、武漢、包頭、太原等大鋼鐵企業最為嚴重。1至4月，全國鋼鐵產量比計劃少195萬噸。

與鐵路整頓一樣，5月8日起，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鋼鐵工業座談會。12個省、市、自治區管工業的書記、十大鋼鐵公司和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谷牧主持會議並講話。5月29日，鄧小平在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強調說，第一、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克服軟、懶、散狀況，不稱職的立即撤換；第二、必須和派性、鬧派性的人進行堅決鬥爭；第三、要認真落實政策，調動群眾特別是老工人、老勞模的積極性；第四、必須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嚴肅執行，寧可嚴一些。鄧小平氣憤地說：「有的人把黨的事業鬧得烏天黑地，你還等他覺悟，你能等得及嗎？要敢字當頭。對堅持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鬥

46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107。

47 〈鄧小平在萬里向國務院匯報徐州鐵路局情況時的插話〉，《黨的文獻》，1999年第6期。

的就鬥！」他要求，「拿中央文件跟群眾直接見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戶曉，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廣大群眾同派性鬥爭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48]

鋼鐵工業座談會後，冶金部向中央提出了〈關於迅速把鋼鐵工業搞上去的報告〉，建議下大力量抓好關係全局的鞍山、武漢、包頭、太原等十二個大鋼廠和邯邢、海南兩個鐵礦，整頓領導班子，堅決調離派性嚴重的領導幹部和頭頭。6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個報告，並作出「中央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批示」，以中央13號文件發出。中央批示指出：如果說過去鋼鐵上不去是受了煤炭、運輸的影響，那麼現在外部條件已大為改觀，再拿這些作理由，就更加說不過去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必須加強對鋼鐵工業的領導，對照檢查「思想政治路線是不是端正了」、「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不是建立起來了」、「資產階級派性是不是克服了」、「黨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實了」等「七個是不是」。並限定各地、各企業把完成計劃的具體措施於6月中旬上報中央。鞍山、武漢、包頭等鋼鐵公司都向中央提交了〈保證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報告〉。國務院成立鋼鐵工業領導小組，副總理谷牧任組長，陳紹昆、呂東、袁寶華任副組長。國家計委、建委、冶金部、煤炭部、鐵道部等十個單位派出負責人組成「保鋼小組」，領導和監督全年鋼鐵計劃任務的完成。

鋼鐵整頓也收到了成效。6月，全國鋼日均產量已經突破了徘徊許久的7萬噸以下，達到7.24萬噸，超過全年計劃水平。7月仍保持了歷史同期最高水平。由於上半年欠產過多，1975年全國鋼產量2390.3萬噸，沒有達到2600萬噸的計劃，但仍比上年增長了280萬噸。[49]

繼鐵路、鋼鐵之後，工業戰線的整頓全面鋪開。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按照他的指示，工交系

4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9、10。

49　《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頁109。

統的冶金、煤炭、石油、化肥、電力、機械、森林工業、水產、建材、紡織、交通、鐵道、郵電等十三個部門，確定了需要調整領導班子的379個單位，到7月底，鐵道、煤炭、冶金三個重點部門已調整了133個，佔工交系統已調整數的54%。總的說來，從3月鐵路整頓開始，全國交通運輸和工業生產一個月比一個月好。石油工業、森林採伐和海上運輸，一直穩產高產，持續上升。到6月底，原油、木材等實現了時間過半、任務完成過半。煤炭工業和鐵路運輸一年多來一直上不去，電力、化工、機械、建材、輕工等行業年初生產一度下降，貫徹9號文件後，都很快趕了上來，都接近完成或超過全年計劃的一半。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板、鐵路運輸量等，5、6月份創造了歷史上月產最高水平。全國工業總產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的47.4%，財政收入完成全年收入的43%，收支平衡，略有積餘。[50]

2 其他領域和地方的整頓

由於王洪文去浙江、上海，從7月初起中央工作由鄧小平主持。於是，整頓工作加快了步伐。到9月底，在工交、軍隊、科技、地方領域已經見效，教育、文藝領域也揭開序幕，農業領域的整頓工作也在準備之中。

（1）軍隊整頓

1975年1月25日，新上任的總參謀長鄧小平在總參團以上幹部會上講話，重新打出了林彪事件之前毛澤東指示「軍隊要整頓」的旗幟。他分析軍隊的狀況說：從1959年林彪主管軍隊工作起，特別是在林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好多優良的傳統丟掉了，軍隊臃腫不堪。軍隊的人數增加很多，軍費開支佔國家預算的比重增大，把

50 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1975年7月17日。

很多錢花費在人員的穿衣吃飯上面。更主要的是，軍隊膨脹起來，不精幹，打起仗來就不行。這些年來，軍隊出現了一個新的大問題，就是鬧派性，這個問題主要在幹部。再一個問題是軍隊的紀律很差。「所以，軍隊的整頓，一個是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一個是要加強紀律性。」

2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作為處理軍隊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為中央軍委常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

這樣，軍隊整頓在指導思想和組織上都已經具備了條件。正式的整頓從6月24日至7月15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發端。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及各軍、兵種主要負責人七十多人參加。會議從兩個方面集中討論了整頓問題，一是精簡整編，研究解決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安排超編幹部和調整領導班子；二是加強部隊思想建設，增強黨性，反對派性，糾正不正之風，恢復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加強軍事訓練。

7月14日，鄧小平發表〈軍隊整頓的任務〉重要講話，他用尖刻辛辣的批評語調，表現出對寄予期望很高的軍隊現狀的嚴重不滿。他說，軍隊的問題主要是：

> 一是有點腫。這次會議研究精簡整編，就是解決腫的問題。不能說每一個師的部隊都是腫的，但整個軍隊確實有點腫。
>
> 二是有點散。主要表現在有派性和組織紀律性差這兩個方面。……這是軍隊在支左當中出現的新問題。軍隊支左，許多人也捲到派性裏面去了。一些人捲到這一派裏，另一些人捲到那一派裏。軍隊的權力大得很，變成了派的後台，以後把派性帶回到軍隊，在軍隊內部不少單位也分成了兩派。
>
> 三是有點驕，……現在，軍隊的團結，軍政、軍民的團結，都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部隊內部相互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張。軍政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也相當緊張，過去軍隊同志坐公共汽車，

向來是給老人、帶娃娃的婦女讓座位的。現在有的不讓了，有個戰士坐車，一位婦女抱着娃娃，他不讓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邊有位老人說，雷鋒叔叔不在了。

四是有點奢。上面講到有的人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有的鬧享受，鬧待遇，一切都向高級發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沒有甚麼界限了。

五是有點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機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級幹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個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節。有的人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官僚主義，工作不努力，不踏實，不深入基層，不親自動手，不動腦筋，靠秘書辦事，講五分鐘話都要人家寫成稿子照着唸，有時還唸錯了。這是思想懶惰。[51]

7月15日，葉劍英作了會議總結講話，針對江青前一階段的活動，強調：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樣做！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52]針對「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操縱民兵組織製造動亂，會議明確：民兵工作由省軍區、軍分區、人民武裝部來領導。所有的民兵指揮部、民兵小分隊要一律撤消。會議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陸續批准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提出的一系列整頓軍隊、解決「腫、散、驕、奢、惰」問題的文件。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以及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確定三年內軍隊總定額減少160萬人。8月7日，中央軍委轉發總政治部〈關於安排超編幹部的方案〉，指出：根據1974年底統計，解放軍幹部共有152.6萬人，超編46.7萬人，壓縮定額、調整

---

5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16－19。

52 范碩等：《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頁628。

編制體制後，還要多出幹部10萬人，預計超編幹部可能達到60萬人。同時，各級領導班子人員普遍很多，大軍區正副司令員、政委、政治部主任平均36人，最多的44人；省軍區平均38人，最多的58人；陸軍軍、師、團也達到20至40人，幹部年齡偏大，陸軍師師長、政治委員平均49歲，團長、政委45歲。針對這些情況，〈方案〉提出了安排超編幹部的意見，對各級各類幹部的安排原則、方法以及工作和生活待遇等問題作出了規定。

8月30日，中共中央、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軍委發出調整配備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主官的〈通知〉，10月1日再發通知進行了個別調整，最後確定名單如下：

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空軍司令員馬寧，政治委員張廷發，第二政治委員余立金；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第一政治委員蘇振華，第二政治委員王宏坤；炮兵司令員張達志，政治委員張池明；第二炮兵司令員向守志，政治委員陳鶴橋；裝甲兵司令員黃新廷，政治委員莫文驊；工程兵司令員譚善和，政治委員王六生；鐵道兵司令員吳克華，政治委員呂正操；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政治委員陶魯笳；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第一政治委員粟裕，第二政治委員蕭華；軍政大學校長蕭克，政治委員唐亮；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張春橋兼任第一政治委員，彭沖兼任第二政治委員，廖漢生任政治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政治委員曾紹山，毛遠新兼任政治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韋國清兼任第一政治委員，趙紫陽、張平化兼任政治委員，孔石泉任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王平，劉建勳、趙辛初兼任政治委員；成都軍區司令員劉興元，趙紫陽兼任第一政治委員，李大章兼任第二政治委員，陳先瑞、嚴政任政治委員；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周興兼任第一政治委員，劉志堅任政治委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白如冰兼任第一政治委員，蕭望東任政治委員；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政治委員李志民，廖志高、江渭清兼任政治委員；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洗恒漢、李瑞山兼任政治委員；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賽福鼎兼任第一政治委員，郭林祥任政治委員，司馬義·艾買提

兼任政治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第一政治委員紀登奎，第二政治委員秦基偉。

9月7日，中央軍委批轉總參謀部〈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方案〉。規定全軍總人數精簡26.2%。其中，陸軍步兵部隊精簡27.3%，工程兵、鐵道兵精簡佔陸軍兵種部隊精簡總人數的92.1%；海軍精簡17%；空軍精簡16.4%；各大軍區及其直屬單位精簡38%；各總部及其直屬單位精簡16.6%。這次精簡整編從1975年第四季度開始實施，但受「反擊右傾翻案風」干擾而停止。至1976年底，全軍總人數比1975年減少了13%。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及採取的整頓措施，對穩定軍隊，保證毛澤東去世後軍隊的領導權仍然掌握在以葉劍英等抵制「文革」派的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事實證明，除了張春橋、毛遠新等控制了軍隊個別文職主官外，直接指揮軍隊的主官都是跟隨葉、鄧多年的將領，「四人幫」根本無法調動哪怕一個連。

（2）科技整頓

科技整頓首先是從國防科技戰線開始的。由於戰備需要，國防科技在「文革」時期成為必須保證的工作重點，取得了氫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等實驗的重大突破，但是也受到了嚴重干擾。尤其是發射火箭運載返回式衛星的工作，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衝擊，發射失敗，陷於停滯不前。其原因，是承擔這項主要工作的七機部裏，「915」、「916」兩派鬥爭嚴重，局勢基本被造反派控制，為首的造反派頭目舒龍山是王洪文的把兄弟，得到毛澤東的肯定，還擔任了十大代表和部機關黨委書記職務。

1975年3月，研製、發射第一顆赤道同步衛星工程列入國家計劃，張愛萍被葉劍英點將，重新擔任國防科委主任。七機部的整頓成為能否完成工程的關鍵。他首先抓了關鍵單位230廠，召開大會批判派性，要求領導幹部進行檢討。但是遭到了造反派的激烈反抗和驅趕。5月19日，鄧小平、葉劍英、聶榮臻等中央軍委領導人聽取七機部整頓匯報，鄧小平對張愛萍說：「只要你們大膽工作，錯了我們負

實，……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你還在七機部吧？沒有被攆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辮子。」[53] 他還嚴厲批評七機部兩派：還在那裏鬧，而且還說有理。把七機部鬧成這個樣子，不要說社會主義，連愛國主義都沒有。[54] 他限定一個月內解決問題。

其後，張愛萍採取了果斷措施，發動七機部群眾大張旗鼓批判派性，爭作「七一派」[55]，準備把舒龍山調離七機部。這個「老、大、難」單位，很快建立了科研生產秩序，重點項目取得突飛猛進，下半年連續發射成功三顆人造衛星：7月、12月兩次用風暴一號運載火箭成功地發射技術試驗衛星；11月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發射返回式遙感人造衛星成功，使中國成為美國、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衛星回收和航天遙感技術的國家。三次發射成功被譽為「三星高照」。

隨之開展的是中國科學院整頓。在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時期，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國務院批發了會議紀要，中國科學院的混亂狀況有所好轉。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會議紀要又被當作「復辟回潮」批判，江青還直接給科學院感光化學研究所一些人寫信，鼓動他們把武衡等副院長當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孫」來批判，科學院再次陷於混亂中。

1975年7月，胡耀邦接受鄧小平關於整頓中國科學院的指示，上任主持工作。胡和一同派去的李昌、王光偉，先後採取的整頓措施是：召開一系列會議，研究制定科技十年發展規劃；調整院、所兩級領導班子，把懂業務的幹部選拔上來，把鬧派性的人調離；落實知識分子和幹部政策，把散失在工廠、農村、幹校的專家學者找回來，先後給八百多人落實了政策；提出要「五子登科」解決科技人員房子、票子（工資）、孩子（入託、上學）、妻子（兩地分居）、爐子（煤氣爐）的生活困難。

在思想整頓方面，胡耀邦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為口號，提出科研是科學院的中心任務。說「搞業務的颱風要颳起來」，「颳八級

53　東方鶴：《張愛萍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913－914。

54　謝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97。

55　即「黨性派」。

不行，得罷十二級」。[56]經過鄧小平指導，胡耀邦組織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文件指出：把知識分子當做專政對象，使廣大科技人員不敢鑽研業務，是不正常的；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發展；不能把理論研究說成是「脫離實踐」，要鼓勵學術上的不同意見爭鳴，改變用粗暴手段處理學術問題的作法。在「匯報提綱」中，還提出了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輪廓。

鄧小平多次聽取胡喬木主持的修改匯報，稱讚了這個文件，提出要解決科技人員的生活困難，為他們創造科研條件；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在科學院的領導班子裏。他鼓勵領導幹部要大膽地站出來整頓，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3) 教育整頓

四屆全國人大以後，教育部恢復，任命周榮鑫為部長。教育工作是「四人幫」長期控制的領域，也是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分管的，要迅速扭轉教育戰線的混亂局面，難度很大，必須先在輿論上糾正「兩個基本估計」和江青、張春橋散布的錯誤思想、觀念。周榮鑫一上任，先沒有採取具體措施，而是多次召開幹部、教師座談會、匯報會，聽取意見，了解情況，發動群眾進行思考，進行輿論準備。

從5月7日起，他對教育部理論研究組和其他教育部門負責人先後提出一些理論問題，讓大家討論：「到底在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怎麼專法？專對了沒有？為甚麼提出這個問題？」「教育與經濟基礎，哪些相適應，哪些不相適應？現在一講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不能一提知識分子就罵一通，這樣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針？」「毛主席當時講的500萬，是指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國有2500萬知識分子，……是否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只能回去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我們現在學校有沒有培養幹部的任務？不培養幹

56 轉引自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頁369。

部辦大學幹甚麼？」「根本不要文化，就講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行嗎？」「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貧下中農為革命種田，工人為革命做工，學校為甚麼就不能提為革命讀書呢？」「有知識的是私有，沒有知識的就公有？那不要學校好了！」「我們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的傾向很嚴重，非出問題不行。」「總理的講話（指加強基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引者註）他們為甚麼不貫徹？」

周榮鑫提出的問題在教育界廣大知識分子中引起了震聾發聵的反響。他又根據周恩來、鄧小平的指示，開始積極着手整頓教育輿論工作，親自抓教育部主辦的《教育革命通訊》，6月至10月連續發表了〈全面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正確道路〉、〈研究基礎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搞好基礎理論研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評論。文章肯定了「堅持以學為主的原則，努力學習社會主義文化科學知識，重視基礎理論課教學，保證教學時間和質量」的做法，批駁了「四人幫」認為這樣「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頭路」的說法。

8月23日至30日，教育部召開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四省、市中小學教育座談會。周榮鑫在會上着重指出：「毛主席從來沒有講過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化的文化。現在一談起文化，就談虎色變，怕得要死，趕忙出來說話，甚麼『回潮』啊，『又是72年的風』啊！毛主席指示過的，也可以不管，這樣不成！」「幾百萬教師在培養學生，還天天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我的有些話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學的人，他們有些不滿。」「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講的那樣不怕被打倒的人。」[57] 講話在教育界引起了強烈

57　以上各處資料據：周榮鑫和教育部理論組的談話，1975年5月7日；周榮鑫在教育部計劃司下半年工作意見座談會上的發言，1975年7月10日；周榮鑫在教育部計劃司的講話，1975年7月22日；周榮鑫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1975年7月24日；周榮鑫在北京鋼鐵學院第一、二次教育革命匯報會上的講話，1975年8月9日、8月13日；周榮鑫在四省市城市中小學教育座談會結束會上的講話，1975年8月30日。

的反響。9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又在江蘇省無錫市召開湖南、湖北、山東、江蘇四省城市中小學教育革命座談會，傳達討論了周榮鑫的講話。

教育整頓的正式起步是在9月26日，這天鄧小平在聽取〈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時對教育整頓作了重要指示：

> 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大學究竟起甚麼作用？培養甚麼人？有些大學只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科學院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不照顧幹部子弟。這樣做要是犯錯誤，我首先檢討。這不是復舊！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甚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們提高工廠自動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員，這就要靠教育。
>
> 要解決教師地位問題。幾百萬教員，只是挨罵，怎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毛主席講消極因素還要轉化為積極因素嘛！教育戰線也要調動人的積極性。[58]

早在7月間，周榮鑫就在醞釀起草一個報告，旨在推翻〈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作出的「兩個基本估計」。後來，他受到胡耀邦等搞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啟發，也想搞一個關於教育工作的匯報提綱。鄧小平這次講話，不僅直接否定了遲群、毛遠新等人提出的「上管改」和「社來社去」新生事物，而且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走上海機牀廠道路」的「七二一指示」，使周榮鑫得到很大鼓舞，他立即成立一個起草小組，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着手起草教育部向國務院的匯報提綱。

起草小組經過幾次討論，確定〈教育工作匯報提綱〉以毛澤東1957年提出的「我們要在十年內培養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龐大的技術隊伍；百年樹人，應該改為十年樹人。沒有這一條，社會主義建設不成」

5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3－34。

為綱，把立論的基點放在「新的形勢重新把『十年樹人』的歷史任務提到我們面前」上。幾經修改，到 11 月 10 日，〈教育工作匯報提綱〉形成第三稿，提出：「為了貫徹落實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整頓教育工作，我們初步討論了當前教育戰線的形勢、任務以及有關路線、方針、政策和整頓領導班子等重要問題。」〈匯報提綱〉分六個部分：（1）教育革命取得很大成績；（2）新的形勢重新把「十年樹人」的歷史任務提到我們面前；（3）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進一步搞好教育革命；（4）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5）堅持兩條腿走路，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6）整頓領導班子。[59] 但是，當起草小組把這一稿送給周榮鑫審改時，「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開始，這個匯報提綱終於未能成稿，剛剛起步的教育整頓於是夭折。

（4）整黨和整頓地方

7 月 4 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的講話中，實際已經提出了整黨的必要性：「毛澤東同志講軍隊要整頓，整個黨也有這個問題，特別是在黨的領導和黨的作風方面。」[60] 整黨的重點是解決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地方「雙突」問題。一批新造反派（當時叫「反潮流戰士」）在不少地區和單位被突擊入黨、突擊提幹，成為地方動亂的根源。

整黨先從問題最嚴重的浙江開始。浙江是「四人幫」直接插手的地方。在批林批孔中，王洪文出面，指定造反派頭頭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列席省委常委會，控制了批林批孔的領導權。全省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突擊發展黨員三萬六千多人，突擊提幹約九千人。

協助鄧小平進行整黨的是中央分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紀登奎。6 月 24 日，他接見中組部有關領導說：「中央解決一些老大難單

59　方玄初：〈《教育工作匯報提綱》出台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輯，頁 49 － 50。

6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12。

位問題，就是要解決資產階級派性，整頓領導班子。最近要解決的，一個省是浙江省；一個部是七機部。……有的突擊發展黨員，實際是資產階級派性：一平反、二補台、三納新、四提幹。」[61] 6月底，紀登奎對中組部赴浙江調查組袁木等人說：現在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你們工作可以更放手一些。7月初，經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准，中央決定派王洪文、紀登奎率領工作組前往浙江進行整黨試點。臨行前，周恩來在醫院對紀登奎感慨地說：浙江歷來是魚米之鄉，現在沒有魚吃，連鹽也吃不上了。毛主席已批准你去，你就一定要把浙江問題解決好。7月初，鄧小平在上海約紀登奎談話，問浙江問題如何解決，紀登奎回答：第一，不可把中央內部的矛盾暴露在社會上；第二，要保譚啟龍，不然又會層層揪領導幹部。重點要解決浙江幾個派頭頭問題。他還提出：如果王洪文不合作，那就照過去中央解決各省問題的慣例，把浙江各方面的代表都拉到北京，由中央直接解決。鄧小平表示同意。解決方針確定後，7月初王洪文、紀登奎一起到浙江，召開了省委常委會、省委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撤消了幫派勢力活動的三台山據點，對嚴重違法亂紀的幫派骨幹給予了嚴肅的處理。接着，中央工作組會同浙江省委起草了〈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7月15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將浙江省文件轉發全黨。次日毛澤東批准，作為中央16號文件下發。鄧小平在中央批語中加了一句極為醒目的話：「對黨組織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一次整頓是十分必要的」。由此揭開了全國整黨的序幕。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主要內容是：一、以譚啟龍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黨委，中央是信任的。二、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組是正確的。三、鐵瑛、夏琦是人民內部矛盾。四、任何削弱、破壞和分裂軍政、軍民、軍隊內部關係的言行都是錯誤的，甚至是反黨反革命的。五、

61 王英、孫中範：〈一九七五年黨組織整頓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1年第8期。

任何組織、個人，都不得以任何藉口，組織派別活動。六、堅決鎮壓一切破壞生產、製造交通事故、挑起武鬥、干擾運動，進行反革命宣傳、暴動和殺人、放火、放毒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陰謀篡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七、盡快恢復生產，工資糾紛必須通過學習和協商逐步解決，學生不要參加社會派性鬥爭。浙江問題的解決，為全國整黨和地方整頓樹立了榜樣。

8月初，由李先念建議、中央同意，紀登奎趕赴河南，處理鄭州鐵路局動亂。他與河南省委商定，點名批判了幾十名無理取鬧、橫行霸道、違法亂紀、貪污腐化的派頭頭，撤職下放勞動。紀登奎從河南回京後，鄧小平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了浙江、河南解決「雙突」問題的匯報。他指出：「各方面都要整頓，但整黨是整頓的核心。而整黨首先就是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浙江、河南已經取得整黨的初步經驗，建議代中央起草一個整黨的決定。」

根據鄧小平意見，中組部在9月中旬召開了雲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省委組織部負責人會議，並到貴州、吉林、寧夏進行調查研究，開始起草〈關於整黨問題的匯報提綱〉和〈整黨問題參閱材料〉，着手起草整黨工作指示。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一、消除派性，增強黨性是思想整頓的重點。二、在組織上徹底糾正違反黨章規定的「雙突」。三、調整領導班子，選拔黨性強，敢抓工作的領導幹部進班子。

9月27日、10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了整黨的任務：

> 整頓的核心是整黨，只要抓住整黨這個中心環節，各方面的整頓就不難。整黨怎麼搞？辦法肯定應當不同於過去。請各省根據自己的特點，搞出個規劃來。整黨主要放在整頓各級領導班子上，……要在整黨的基礎上挑選幹部。[62]

6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5。

但是，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展後，浙江、河南幾個整黨試點單位又亂了起來，全國整黨工作流產。儘管還未來得及在全國普遍推開，1975年整黨仍是鄧小平整頓部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糾正「文革」造成的惡果，削弱幫派勢力，起到了積極作用。

（5）文藝政策調整

文藝界是江青抓樣板戲起家的皇家禁地，四屆全國人大以後，又由她親自栽培的于會泳、劉慶棠、錢浩梁分任文化部正、副部長，張春橋、姚文元代表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分管，因此，這裏的整頓是難上加難。鄧小平採取的辦法，一是採取調查研究，收集材料，上報毛澤東，藉助毛澤東的指示來調整文藝政策，用毛的手來打擊「四人幫」。二是利用主持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工作的工作權力，在能夠插手過問的一些重要文藝事件和決策過程中，與江青等進行直接反駁和鬥爭。因此，文藝界並不能稱之為整頓，只能說文藝政策調整。

7月初，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對文藝界狀況深表不滿地說：

> 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63]

7月14日，毛澤東又當着江青的面說了一番批評文藝界的話：

> 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
>
> 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

---

63 中發〔1977〕37號文件，頁113。

魯迅那時被攻擊，有胡適、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國民黨。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鬧起來。脫離群眾。

已經有了《紅樓夢》、《水滸》，發行了。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們怕甚麼？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進攻，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話登在報上，最後還是被我們打退了。

以前的《萬水千山》沒有二、四方面軍，這不好。現在聽說改好了。

文藝問題是思想問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

《反杜林論》，柏林大學撤了杜林的職，恩格斯不高興了，爭論是爭論嘛，為甚麼撤職？杜林這個人活了八十多歲，名譽不好。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鬧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64]

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對正找不到整頓文藝界突破點的鄧小平，是一個大好消息。他立即布置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調查毛澤東所說的文藝情況。胡喬木、鄧力群等經過一番調查和組織、發動，很快就以文藝工作者向上反映情況的形式，向毛澤東轉呈了一批材料，反映了「四人幫」的一批罪狀：

首先是扼殺電影《創業》。這是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反映大慶艱苦創業的故事片，上映後群眾反響熱烈。江青卻很不滿意，因為這既不是她抓的，又歌頌了「文革」前國務院和石油部的老幹部。當時她就在蓄謀批判，批示質問「黨中央用飛機送《矛盾論》、《實踐論》，調查一下，是怎麼回事？」「為甚麼從解放前寫起來？」[65]羅織十大罪狀，結果導致電影停演。賀龍女兒賀捷生等人在胡喬木授意下，寫出

64　中發〔1977〕37號文件，頁113。

6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講話，1975年2月21日。

了反映江青扼殺《創業》的材料，改由編劇張天民寫信給毛澤東、鄧小平。7月25日，毛澤東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鄧小平看到後，當場就表示：「文化部處理問題太粗暴，連《創業》這樣的好影片也不許放映，還有甚麼百花齊放！」[66] 毛澤東支持《創業》、批評「四人幫」的批示迅速傳開，文藝工作者奔走相告、熱烈擁護，引起了一系列向中央、毛澤東、鄧小平寫信或寫大字報揭發、批判文化部的連鎖反應。

7月下旬，電影《海霞》編導謝鐵驪、錢江通過給毛澤東寫信，申訴影片受到江青壓制。該片1975年初攝製完後，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都看了，認為很好。可是文化部長于會泳得到江青支持，卻說有片子有嚴重路線問題，修改後仍不准通過，並且查封。謝鐵驪等人於是通過鄧力群轉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7月29日，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鄧小平立即組織八位政治局委員審看，決定按照作者修改過的影片上映。

在討論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的過程中，8月8日，中央音樂學院一位青年教師李春光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尖銳地批判文化部壓制打擊文藝作品、「是文藝界危害最大的行幫」。鄧力群姪兒看到後抄送底稿給鄧力群，然後通過胡喬木、鄧小平送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退給了鄧小平。[67]

這一時期，受到毛澤東對調整文藝政策指示和《創業》批示的鼓舞，先後有多人輾轉給毛澤東上書寫信，反映文藝界問題。冼星海夫人錢韻玲給毛澤東寫信，請求舉辦紀念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聶耳逝世四十周年音樂會；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老作家姚雪垠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支持他完成長篇小說《李自成》寫作計劃；魯迅兒子周海嬰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魯迅著作出版和研究方面遇到的困難。這些問題

---

66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36。

67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頁53。

反映後，在毛澤東或鄧小平過問下，都得到了一定解決：話劇《萬水千山》、歌舞《長征組歌》得以重新公演，聶耳、冼星海紀念音樂會得以舉行，《魯迅書信集》得以出版，姚雪垠的長篇小說《李自成》得以繼續寫作和出版。繼電影《創業》、《海霞》解除禁令之後，鄧小平又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作為「毒草」而遭禁錮的電影。

當然，這些上達天聽活動的背後，多數都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胡喬木等人的策劃和組織，包括鄧小平的指示和代轉。鄧小平試圖以這種推動毛澤東的方式，對江青等人獨霸的文藝界進行有力的衝擊和整頓。

(6) 農業整頓的準備

農業整頓是最晚開始的。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會上講話說：四個現代化，比較起來更加費勁的是農業現代化。如果農業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們國家的後腿。鄧小平講到農業問題的嚴重性時說：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在場的江青立即插話：不能那麼說，那只是個別的。鄧小平馬上答道：就是個別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這種狀況，能夠滿意嗎？針對「文革」前期農村的平均主義做法，他指出，對現行的農業政策要調整，要研究，關鍵是領導，要配備好各級領導班子，搞機械化，每個地方都要有自己的特點。

由於分管農業領導人的不得力，農業整頓實際上沒有開展起來。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等人提出了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要早一點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的建議，實際上違反了毛澤東1960年代制訂的基本核算單位二十年不變的要求，搞「窮過渡」。毛澤東當然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這種公有化的理想實現，但是他懾於大躍進後的災難性後果，又比較謹慎，只要求政治局討論。學大寨會議期間，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以譚啟龍、趙紫陽等為首的大多數地方負責人反對「窮過渡」的意見，會議決定原來的所有制仍然不變，保持農村政策的穩定。

9月底至10月初，鄧小平正式提出了全面整頓的任務：

當前，各方面都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農業要整頓，工業要整頓，文藝政策要調整，調整其實也是整頓。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解決各方面的問題。我在政治局講了幾個方面的整頓，向毛澤東同志報告了，毛澤東同志贊成。[68]

他把全面整頓的啟動時間定在了1975年冬至1976年春。

3 鄧小平整頓的指導思想與綱領

「三項指示為綱」和後來被批判的所謂「三株大毒草」，是鄧小平整頓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

毛澤東的矛盾心理狀態，使「文革」後期政治局面出現錯綜複雜的態勢。中央鬥爭的一個特點，就是堅持和糾正「文革」路線的兩方，都在全力爭取毛澤東的一字一句的首肯指示，哪怕是只劃一個圈。毛澤東關於「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對整頓工作是個極為有利的支持。但同一時期，他又作出了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談話，這成為「四人幫」想竭力作文章的題目。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後，立即巧妙地將這些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指示組合在一起，作為保障整頓工作的綱領。

5月29日，鄧小平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第一次提出：毛主席最近關於理論問題、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的綱。7月4日，他在中央讀書班講話中全面地提出了「三項指示為綱」：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

6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5。

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鄧小平雖然強調這三項指示是個整體，實際上，他所堅持的根本所在，是實現「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對「學習理論」不甚感興趣。因為「學習理論」的指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是有利於「四人幫」的活動而不利於鄧小平的整頓。之所以將其放在首位，與另兩項指示連成一體，為的是讓「四人幫」難以公開反對。在當時的局勢下，不突出第一項指示，後兩項指示也無從堅持。而且「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內容過於單薄，缺乏理論指導意義和高度。因此，有人提出，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質上對第一項作了淡化、修正。[69]這一點，「四人幫」也很清楚。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攻擊鄧小平時就說：「一講就是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

毛澤東起初對「三項指示為綱」是同意的，張玉鳳給他讀準備下發的文件，讀到「三項指示為綱」的一段時，他讓停下來再唸一遍，然後點頭說：「好。」圈閱下發。[70]

為了使整頓在理論上既符合毛澤東的指示，做到名正言順，又能給各個領域的整頓工作提供理論支持，鄧小平考慮成立一個在他直接領導下的參謀機構和理論寫作班子，像過去「釣魚台的班子」那樣寫一批重頭文章，題目有研究三個世界的劃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等。經他提議，中共中央、毛澤東批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於7月5日設立。負責人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于光遠、鄧力群，都是「文革」前中央的秘書和秀才。

69　張化：〈也談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1975年整頓〉，《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5期。

70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鄧小平認為，前一段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都是一個一個地解決，光這樣不行，要通盤地研究。[71]還要政治研究室把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管起來。為了系統地建立指導各行各業整頓的理論和制度，從整體上清理被「文革」搞亂了的思想，政治研究室與有關部門組織起草了三個重要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即〈工業二十條〉）。

6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持續近兩個月的計劃工作務虛會，研究整個經濟工作整頓問題。會議認為，當前經濟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是散和亂，必須狠抓整頓，強調集中。為此，會議對計劃體制、企業管理體制、物資管理體制、財政體制的整頓以及整頓領導班子、加強職工訓練、建立各項生產管理制度等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會議責成國家計委負責，認真總結鐵路、鋼鐵整頓的經驗，搞出一個指導工業整頓的文件，對整個工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若干切實解決辦法，作出若干條可操作的規定。會後，在李先念領導下，國家計委房維中等開始起草文件。7月25日拿出了初稿。

8月18日，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對文件草案〈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進行討論。鄧小平在會上談話認為，這個文件應是工業問題的章程，總的精神是加快速度。他強調企業要整頓，要考慮11月、12月集中兩個月整頓企業管理秩序。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和流行的錯誤觀點，他就加快發展工業的幾個關鍵問題發表了指導性意見，提出：要確立農業為基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要擴大進出口，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要加強企業的科學研究工作；要抓好產品質量；要恢復和健全規章制度，建立崗位責任制；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鄧小平還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等人參與起草國家計委正在搞的這個文件。

---

71 《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頁42。

到11月3日，經過四稿修改，形成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在修改過程中，先後徵求了二十個企業負責人和在京開會的十二個省委書記的意見。稿子從最初的十四條增加為二十條，簡稱〈工業二十條〉。文件規定：要堅決整頓企業領導班子，調整那些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復舊」「倒退」帽子的「勇敢分子」，「要特別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決不能把搞好生產當做「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掛帥」批判；「生產管理和規章制度，甚麼時候都需要」；堅持獨立自主，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外國好的東西。

這個條例，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的繼續和發展，集中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一系列講話的精神，概括了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討論的成果和工交戰線初步整頓的經驗，批判了「四人幫」散布的一些謬論，提出了整頓企業、加快發展工業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它是解決文化大革命經濟領域混亂的綱領性文件。這個條例雖然起初因為張春橋以文件未引用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語錄而反對，未能提交全國計劃會議討論，後來又因為政治風雲突變而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下發，但它在起草中把主要精神向下宣傳，得到幹部、科技人員、工人群眾的擁護，開始在整頓中得到貫徹執行，對工業整頓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第二個文件是〈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

胡耀邦、李昌等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後，經過二十多天調查研究，在鄧小平、華國鋒指導下，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胡喬木等參與修改，起草了一個〈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的文件稿。8月26日，鄧小平聽取了匯報，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此後，胡喬木也參加了起草修改工作。

9月3日，鄧小平看了文件稿後表示：這文件很重要，不單管科學，而且可以適用於文化教育各部門。[72]9月26日，鄧小平主持國務

72　《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頁61。

院會議討論〈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在聽取胡耀邦匯報過程中，他插話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強調科研工作必須走在國民經濟的前面，不能拖整個國家建設的後腿。他引用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點說，「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針對「四人幫」動不動就用「白專」的帽子來壓抑知識分子科研的積極性，鄧小平駁斥道：「說甚麼『白專』，只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鬧派性、拉後腿的人好得多。」[73] 他還提出，要解決科技人員的生活困難，為他們創造科研條件；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在科學院的領導班子裏。領導幹部要大膽地站出來整頓，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匯報提綱〉共分三個部分：一、「中國科學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務」。明確提出了中國科學院今後十年科學研究工作的三項基本任務：（1）積極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若干綜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務，（2）開闢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3）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二、「堅決地、全面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以引用毛澤東語錄的形式，從十個方面闡述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具體路線、方針和政策，辯證地分析了政治與業務、群眾路線與專業隊伍、理論與實際、對知識分子的教育與使用、哲學與自然科學等五個關係。三、「關於科學院的整頓問題」。提出了六項整頓內容：加強學習、落實政策、批判派性、調整健全班子、整頓機構、整頓科技出版工作等。文件指出：把知識分子當做專政對象，使廣大科技人員不敢鑽研業務，是不正常的；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發展；不能把理論研究說成是「脫離實踐」，要鼓勵學術上的不同意見爭鳴，改變用粗暴手段處理學術問題的作法。9月28日，第五稿修改

7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2－34。「四人幫」印發的「批鄧」材料上寫為：「白專，只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只佔茅坑不拉屎的好，比搞派性的好。」據鄧力群回憶，鄧小平原話是：紅不了，只專，像陳景潤這樣的，也好啊。白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貢獻啊！見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內部刊印，2005），頁36、37。

好，送毛澤東審閱。但毛澤東對其中一些提法表示異議。其後，政治風雲突變，文件流產未能下發。

第三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以後，9月10日，又指出：要全面宣傳毛澤東思想。現在的宣傳有很大的片面性，對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澤東思想都割裂了。他為甚麼這樣說？因為當時控制輿論宣傳的「四人幫」只宣傳「文革」以來的毛澤東指示，而不提「百花齊放」等毛澤東在「文革」前的指示。因此，鄧小平必須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大力宣傳包括「文革」前的毛澤東指示的毛澤東思想。

9月19日，胡喬木向鄧小平匯報，提出現在宣傳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文章太少，要寫一篇全面宣傳毛澤東「三項指示」的重要文章，由鄧力群負責。鄧小平聽了後很贊成，說：文章很重要，要抓緊寫出來。如果寫得好，我可以約幾位副總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審閱，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74]

10月7日，由鄧力群主持、胡績偉等四人參加，寫出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的初稿。文稿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學習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為出發點，以批判林彪一類「政治騙子」「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為靶子，實際上把矛頭指向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幫」及其黨羽和他們在「文革」中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中製造動亂：

> 把我們一些同志、一些群眾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黨組織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群眾隊伍，他們打着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着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74　《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頁63、75。

文稿甚至鋒芒畢露地要求把「文革」中被奉為神明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造反」、「反潮流」都用階級觀點來進行分析，實際上予以否定說：對「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個階級的反，是在代表哪一個階級在造反。必須把「他們篡奪了的領導權奪回來」。

文稿第二部分以宣傳「安定團結」為中心，用批判「林彪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來影射「文革」的殘酷鬥爭說：「挑動群眾鬥群眾，支持和縱容武鬥，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都當作敵我矛盾，並且採取對敵鬥爭也不容許的方法，對革命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文稿提出，要徹底揭露和堅決打擊六種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腐化墮落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安定團結。

文稿第三部分以宣傳「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中心，批判了以革命壓倒生產的觀點，尖銳地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束縛生產力還是解放生產力，這是區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以及幹部工作好壞成績大小的標準。那種認為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着花氣力去抓生產的看法，只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裏的人才會相信。要堅決抵制「只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的作法，「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文稿把學習理論成績的「檢驗的唯一標誌」，落實到「就看我們在應用中，是否有利於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是否有利於促進安定團結的局面，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更快地發展」。

文稿第四部分指出，三項重要指示是互相聯繫的不能割裂的統一整體；要用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整頓各方面的工作；在各方面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是重點，要加強各級黨委的領導班子，要在全黨範圍內整頓黨的作風。[75]

---

75 《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頁117－141。

10月9日，胡喬木閱後，批評稿子不行，太尖銳了，要正面宣傳。[76]以後又陸續起草和修改出幾稿，由於政治風向大變，沒有拿出來。

這三個重要文件，其中〈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是按照鄧小平的指示起草的，鄧小平審閱了文稿，並主持聽取匯報和討論，幾次發表了重要意見，可以說是代表了鄧小平的思想。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鄧小平只是聞知後表示同意撰寫，沒有提供撰寫思路，成稿後也沒有審閱和提出意見。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找王震、鄧力群談話時說：「〈論總綱〉我確實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77]但是，〈論總綱〉在起草中，是參考鄧小平關於鐵路、鋼鐵、國防、學大寨等會議上關於整頓的講話精神，這一時期中央有關部門整頓的文件，以及〈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文稿等進行的，有的甚至整段引用，因此也可以說代表了鄧小平的思想。說這三個文件集中闡述了鄧小平的整頓思想，是1975年整頓的產物，也是準備指導將要到來的全面整頓的理論綱領，當不為過。

就其內容來看，〈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是關於工業和經濟管理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是關於科研、文化、教育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關於總的政治路線和方針的。三個文稿正好比較完全地代表了當時進行整頓的三大方面。有人說〈論總綱〉是主體，另兩個文稿是兩翼，有一定道理。就思想性來說，無疑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最為突出，直接反映了堅持還是糾正「文革」路線的鬥爭焦點。據主持起草者鄧力群自述，雖然當時還沒有想到用毛澤東「文革」前的語錄來反對毛「文革」中的語錄，但確實是對毛「文革」前的思想理論有感情。就其影響來看，前兩個文稿因為在會議上下反覆討論，並報送中央和毛澤東，影響較大；而

76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頁39。

77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頁48。

〈論總綱〉只在內部討論，沒有外傳和提交，影響較小。總的來說，當時報刊和輿論工具被「四人幫」控制較嚴，連鄧小平多次關於整頓的重要講話，都只是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一定範圍，不廣為人知，報刊上主要宣傳的是「四人幫」組織的學習理論文章，使人感覺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像三個文件這樣的內容，自然不會在報刊上得到反映。

然而，「四人幫」卻起到了鄧小平們起不到的作用。1976年7月，為了集中批判鄧小平，「四人幫」把三個文件的未刊稿放在一起，作為「三株大毒草」，加上批判文章，內部刊印了幾千萬冊，幾乎每個工人、幹部、解放軍都人手一冊，進行批判。批判的效果，卻反而為三個文件做了義務宣傳。讓人民知道了反對「文革」路線的正確聲音。筆者當時所在的工廠，工人們讀了「大毒草」以後，都疑惑地說：說得都對啊，批甚麼呢？

三 「四五」計劃的完成與制定十年遠景規劃

1 三次降低指標才勉強完成的「四五」計劃

1975年是第四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簡稱「四五」計劃）（1971－1975）的最後一年，主要由於整頓的作用，才使「四五」計劃的多數指標基本上得到完成。

與上年相比，成就是很大的，1975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1.9%，其中農業增長4.2%，工業增長15.1%。主要產品產量，糧食達到5690億斤，增長13%；原煤48200萬噸，增長16.7%；原油7706萬噸，增長18.8%；發電量1958億度，增長16%；棉紗1162萬件，增長16.9%；鐵路貨運量86746萬噸，增長12.7%。社會商品零售額1271億元，增長9%。[78]

---

78 朱鎔基等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87。

「四五」計劃期間，施工的大中型建設項目有2579個，全部建成投產的有700多個，還取得了一批科學技術成果。其中包括：工業交通方面，株洲至貴陽的湘黔鐵路、焦作至枝城的焦枝鐵路通車，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工程完成，大港油田和任丘油田投入建設和生產，當時全國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建成。科技方面，科學實驗衛星的成功發射和返回，洲際火箭的首次發射成功，高產量的籼型雜交水稻的實驗成功和在南方十三省的推廣，都是在我國經濟建設史和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成就。

「四五」計劃是在繼續「文革」的歷史環境下進行的，因此，「四五」計劃的完成，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說明了繼續堅持「文革」錯誤路線給經濟建設造成的持續損失，一方面反映出從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糾「左」，解決「三個突破」經濟困難，到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工作期間，大刀闊斧進行整頓所經歷的艱辛努力。

與「四五」計劃預定指標相比，情況則比較複雜。因為「四五」計劃始終是一個草案，其經濟指標，從制定到1975年完成，已經經過了三次調整改變。

第一次是 1970 年起草的〈「四五」計劃綱要（草案）〉，規定的1975年要實現的各項經濟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4900億元，工業總產值達到 3800 億－4000 億元，年均增長速度高達 12.8%。鋼 3500 萬－3800萬噸，原煤4億－4.3億噸，鐵路貨運量9億－10億噸，糧食6000億－6500億斤，棉花6500萬－7000萬擔；五年合計基建投資1400億元，大大超過「三五」計劃的 850 億元規模。這是一個高指標、高投入的計劃。

按這個高指標相比，這個計劃顯然沒有完成。1975年工農業總產值只完成 91%（按 1970 年不變價格）；農業因為定得很低而得到完成。四十一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79]，只有十二種完成，另外有三種達到了浮動指標的下限。其中，原煤、原油、木材、水泥等主要是靠採

79　有四種缺乏數據或因統計口徑變化未作比較。

掘自然資源，機牀、拖拉機、內燃機等主要是靠為實現「農業機械化」和戰備需要大力投資的製造業。其餘鋼鐵、發電量、糧食、棉花等主要指標等不僅沒有完成，而且相差甚遠。而實際基建投資則達到1764億元，超出計劃26%。

第二次是1973年降低的〈「四五」計劃綱要（修正草案）〉指標。規定1975年工農業總產值為4430億元，工業總產值由4000億元下降到3300億元，年均增長速度由12.8%下調到7.7%，農業總產值因原定過低調高到1230億元；鋼壓低到3000萬噸；糧食下降到5600億斤。其餘指標，多數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基建投資規定的下限下降了50億元，上限仍維持原定的1400億元，投入仍然很高。

按照〈修正草案〉規定的1975年指標要求來檢查計劃執行的結果是：工農業總產值完成計劃的101.7%，其中農業完成104.5%，工業完成100.6%。表一主要工業產品有十八種如原煤、原油、發電量、木材、水泥等完成和超額完成，三種如鐵路貨運量、合成氨、棉紗等接近完成，二十種如鋼鐵、鐵礦石等沒有完成。四種主要農產品中，糧食完成103.5%，豬、水產品分別完成103.7%、100.2%，棉花在1973年曾經提前完成「四五」計劃指標，1975年因災完成95.2%。

第三次是1975年2月鄧小平主持制定、中共中央批准的1975年年度計劃指標。工農業總產值、工業總產值均規定了低於1973年指標的下限，工業產品產量指標多數都再次下調，農業總產值和農產品產量指標都得到提高。

如果和1975年度計劃指標相比，可以說完成較好。其中工農業總產值完成下限的101.3%，工業總產值完成下限的99.2%，農業總產值完成106.6%（均按當年價格），四十三種主要產品，有二十七種完成或較大超額完成，有十種基本完成（完成90%以上），只有六種未完成。

由上可以看出，1970年編制的「四五」計劃指標是過高的，不可能得到完成。1973年修改降低的「四五」計劃指標仍然偏高，雖然基本完成，但並不理想。1975年年度計劃擬定的各項指標比較貼近實際可行性，完成較好，但這畢竟只是一年的情況，考慮到這個計劃批准

時距離年底只剩下十個多月時間，因此只能說明完成了當年計劃，而不能說明「四五」計劃的完成。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首先是「文革」政治動亂的干擾破壞；其次是戰備為中心的影響；再次是一定時期的頭腦發熱，包括想把「文革」前三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奪回來的良好願望。

1970年編制「四五」計劃之初，周恩來就發現了盲目熱情可能帶來的危險，多次發出警告。6月2日他看到包鋼提出今年產量突破一百萬噸大關和武鋼「四五」計劃時期產量翻一番的情況，便批註說：「在充分發動群眾，鼓足幹勁，挖掘潛力的基礎上，能增產多少就提多少，一般地不籠統提翻番。這樣有利於保護群眾的積極性。」[80] 1971年2月15日，周恩來接見全國計劃會議代表時說：大中型項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過1000項。「大躍進」時搞高指標，結果影響了工業的發展。「三五」期間平均每年上800多個項目，今後每年上的項目最多不要超過1100項，否則，搞很多，反不如搞少點更快。所以，訂計劃、定指標，要實事求是，看是否合乎實際，是否能做到。[81]

可是，在當時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他的警告未能產生效用。於是出現了國民經濟「三個突破」的經濟危機。經過1972、1973兩年的調整、放慢速度，才使局勢得到控制。然而，已經對「四五」計劃的完成造成了嚴重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使「四五」計劃時期的國民經濟結構繼續比例嚴重失調。

（1）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

積累和消費是國民經濟發展中有重大影響的一對矛盾，集中反映了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比例關係。在1960年代初的經濟調整時期，因為「大躍進」的教訓，已經對積累率過高導致的危害有了初步認識，提出了「抓吃穿用」的思路。但

8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70。

8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36。

是，「三五」、「四五」計劃時期，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這一認識被扭轉到以戰備為中心上來，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片面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導致積累率居高不下。「一五」計劃時期，國家處於建立工業基礎階段，積累率平均為24.2%，比較合適。「大躍進」的「二五」計劃時期，積累率上升為30.8%。三年調整時期，大批工業項目下馬，積累率下降到年均為22.7%。「三五」計劃時期又上升為年均26.3%，「四五」計劃更高達年均33%，其中1971年高達34.1%。在「文革」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國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這個高積累率作用更被放大，使人民正常生活消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

積累內部的生產性積累和非生產性積累比例也嚴重失調。「一五」計劃時期，中國開展大規模建設，生產性積累率達到59.8%，「大躍進」的「二五」計劃時期更增長到不正常的87.1%，三年經濟調整時期下降到65.5%，而「三五」、「四五」計劃時期，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提出「革命加拚命」、「先生產後生活」口號，生產積累率又上升到75.4%和77.4%，1976年竟高達83.2%。這個畸形的比例，使社會功能嚴重不完整。在生產建設中，許多職工宿舍都採用「乾打壘」的簡易土坯房，還有不少建在山洞中，陰暗潮濕，嚴重影響職工健康。學校、醫院、商店等匱乏，造成職工生活十分困難，人心不穩定。1970年代開始注意解決生活欠賬，又被地理環境所迫，各個企業為了解決生活需要，都必須拿出資金建設「小而全」的商店、醫院、學校等封閉社會設施，造成重複浪費。以至在1980年代還必須償還以前留下的大量生活欠賬。

積累率過高的集中表現，是基本建設投資大大增加，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的可能。「一五」計劃時期，國家基本建設支出佔財政支出的37.6%，這種比較高的比例在有大量蘇聯援助的工業奠基時期是合適的。「二五」計劃時期提高到46%，導致災難性後果。接受這個教訓，「三五」計劃之初，毛澤東曾經提醒注意不要把攤子鋪得過大，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將一千多億的投資計劃壓縮為850億。再加上「文革」頭三年工農業生產停滯不前，許多投資

無法安排，也客觀上減少了基建投資的需求。從1969、1970年開始，又出現了大幅度增加基建投資的「躍進」和「三個突破」，使整個「三五」計劃基建投資仍然超過了原計劃總額，國家基本建設支出佔財政支出的38.7%。「四五」計劃時期更增長到40.2%的高比例。這時國家國民收入減少，又片面強調「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外貿萎縮，缺少外援，援越抗美等對外援助支出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高的。一方面入不敷出，一方面還要增加投資，勢必難以為繼，影響了國家財政、信貸和外匯收支的平衡，造成國家物資供應的緊張狀態。

(2) 農、輕、重比例失調

從「三五」計劃開始，以戰備為中心的方針使一切讓位於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嚴重擠壓了農業和輕工業。即使在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一五」計劃時期，重工業在基本建設投資中也只佔36.1%。而「三五」、「四五」兩個五年計劃中，重工業在基建投資中的比例分別達到51.1%和49.6%，大大超過了「一五」時期，輕工業在基建投資中比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低的。在工農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總產值由1966年的32.7%上升到1976年的38.9%，而農業總產值由35.9%下降到30.4%，輕工業總產值由31.4%下降到30.7%。這種後果，一方面使得市場上人民生活用品短缺，另一方面國家依靠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積累資金和出口換匯的能力大大下降。在重工業內部，比例也不平衡，過分強調鋼鐵和機械製造等加工工業，忽略礦山採掘等原材料工業。在農業內部，片面強調學大寨不吃返銷糧，「以糧為綱」，1976年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種植業產值佔69.3%，林牧副漁業佔30.7%；糧食產值佔30%，其他經濟作物只有30%。經濟結構仍然不合理。

(3) 地區投資和布局比例失調

「三五」、「四五」時期，中西部地區是投資和建設重點，這是當時的國際環境決定的，是必要的。「四五」時期是三線建設的後一時

期，其重點增加了「三西」地區，即豫西、鄂西、湘西。這一時期，由於國際局勢緩和，三線地區投資的相對數額降低了。據統計，這一時期內地建設投資是898.67億元，佔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53.5%，其中的三線投資為690.98億元，佔基建投資總額的41.1%。

但是，中國東西部地區差異是長久的自然地理和歷史原因造成的，改變這種狀況並非一朝一夕，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三線建設的集中投資戰略，產生的負面效應是：首先，在過於嚴重地估計戰爭威脅的情況下，內地戰線鋪得過大，項目上得過多，時間要求過急，超過了國家的承受能力，造成了基建失控和生產資料的嚴重短缺。第二、為了片面戰備的需求，只強調各經濟協作區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忽略了優勢互補的原則。第三，片面強調內地的經濟發展，而忽視沿海地區的發展，以犧牲沿海地區的內涵再生產為代價盲目追求內地的外延再生產，使得國家缺少了東部再生資金來源，對西部的支持也難以為繼。第四，由於片面地使用計劃調撥的輸血式投資，西部地區並沒有形成真正的經濟活力，一旦外部資金支持減少，仍然不能實現可持續增長，反而成為需要國家長期填補的窟窿。

（4）經濟效益嚴重下降

第一，全社會綜合經濟效益指標下降。人均國民收入由「一五」時期的年均增長6.6%，下降到「四五」計劃時期的3.2%。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由「一五」時期的35元下降到「四五」計劃時期的16元。與此相反，成本和浪費卻增加了。社會總產值中的物資消耗比重上升，由「一五」計劃時期的44.3%上升到「四五」計劃時期的51.8%。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也下降。按全社會勞動者計算的人均創造國民收入，「一五」計劃時期為年均增長6.3%，1962年至1964年三年經濟調整時期為11.4%，「四五」計劃時期下降為3.2%。[82]

---

82 柳隨年、吳群敢：《「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頁105。

第二，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效益下降。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產值由 1966 年的 110.4 元下降到 1975 年的 105.2 元，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由 1966 年的 34.5 元下降到 1975 年的 24 元，每百元資金利潤率由 1966 年的 24.2% 下降到 1975 年的 14.1%，每百元資金利稅率由 1966 年的 34.5% 下降到 1975 年的 22.7%，每百元產值利稅率由 1966 年的 31.3% 下降到 1975 年的 22.8%。

第三，基本建設經濟效益下降。大中型項目的建設周期，「一五」時期是 6.5 年，「四五」時期則延長到 10.7 年。大中型項目建成投產率由「一五」計劃時期的 15.5% 下降為「四五」計劃時期的 9.4%。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由「一五」計劃時期的 83.7% 下降為「四五」時期的 61.4%。每億元新增加的生產能力下降，如煤炭開採能力，「一五」計劃時期為 179.5 萬噸，「四五」計劃時期下降到 83.8 萬噸。許多重大項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資、大會戰和多消耗完成的，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以鐵路為例，新建鐵路的每公里造價，「一五」時期為 61 萬元，「二五」時期為 68 萬元，而「三五」和「四五」時期竟達到200萬元以上；平均每百公里的建成投產工期，1950年代為十七個月，1970年代則增加到幾十個月。投資系數和投資回收期增加，每增加一元國民收入所需投資數，由「一五」計劃時期的 1.68 元增加到「四五」計劃時期的 3.76 元。

第四，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從 1965 年至 1975 年，主要農產品的單位日產量基本上沒有變化，除稻穀和玉米的日產量有些微的提高外，黃蔴保持不變，其他幾項都在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有三個原因：人口的急劇增長使得農村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而工業的發展速度又不能將這些剩餘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去；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糧食分配和其他制度，把新增的勞動力牢牢地束縛在農業上；由於農業的報酬遞減規律，國家在資金緊張時不可能把大量資金用於農業，為了改善農業的生產環境必須要以勞動力的投入代替資本的投入。

1965年和1975年每一標準勞動日農產量表

年份	糧食合計	稻穀	小麥	玉米	棉花	油料	黃麻
1965	6.3	6.1	5.4	7.4	0.9	2.7	4.5
1975	6.8	7.3	5.3	7.7	0.7	2.3	4.5

注：引自辛逸：〈試論人民公社的歷史地位〉，《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第五，配套建設和綜合能力差。由於片面強調適應戰爭需要的總體布局，及產品缺乏統一、長期安排。許多新建企業、生產線和產品只為軍工服務，應用方向狹隘，企業適應能力差，在國際形勢緩和軍品需求劇減之後，不能及時轉向民品生產，陷入能力閒置浪費和資金緊缺的困境。即使是軍工企業，許多企業只上馬主機生產廠，配套廠沒有安排；許多廠只強調生產主機或部件，不管整機配套，於是出現了產值上升而產品大批積壓的現象，最終不能形成使用價值。還有許多產品生產系統的主機廠在一個地區，科研實驗機構、動力和材料供應、總裝配在其他地區，長途倒運，停工待料，致使成本高昂。在交通運輸方面，過分強調各自為戰、形成幾大板塊區域，內部溝通，甚至特別要求對外封閉，以便抵禦外侵。許多鐵路修建以後，沒有相應的樞紐和出口；許多航運水道疏通後，沒有建設相應的對外吞吐港口。因此就整個結構和布局看，難以改變西部地區與世界交通、信息隔絕的狀況，經濟效益不能相應發揮。

儘管存在着計劃編制不合理、國民經濟結構失調、經濟效益低下等重大問題，但是，還是應當看到，在當時的「文革」困難條件下，「四五」計劃畢竟得到了基本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幹企業、重點項目和基礎設施，國家經濟總量比以往有較大增加，而沒有出現「大躍進」後嚴重倒退的三年經濟困難局面。而且，從中國共產黨創建新中國之後確立的工業化建設總目標和進程看，「四五」計劃具有重要的標誌意義。

1963年2月20日，李富春在關於編制長期計劃工作的講話要點中提出：編制長期計劃，要有二十年的遠景設想、十年的輪廓計劃和第三個五年的具體計劃。二十年的奮鬥目標，就是要基本上實現農業、

工業、國防和科學文化四個現代化。要在二十年內，基本上建立全國統一的、獨立完整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系。這個目標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相比，提出了建立一個「國民經濟體系」，而且加進了「現代化」的要求，實現時間延長到從當時起的二十年。當時顯然對「現代化」的標準理解過於簡單。因此，1964 年 12 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時，又將其分解成兩步：

> 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時已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表述，第一步目標是建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要求是「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完成時間是用三個五年計劃的十五年。第二步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表述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新的「兩步走」戰略以前的十幾年中，沒有變化。

那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這個作為第一步目標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否建立起來了，在甚麼時候建立起來的？一般的研究著作對此都沒有明確的回答，值得進行一番歷史考察。

「三五」計劃即將結束的 1970 年，全國計劃會議宣布：「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70 年中國工業、農業總產值分別為 2117 億元、1021 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例為 67.5%：32.5%，[83] 工業總產值已佔三分之二以上。但是，由於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質量不高，尤其是從事農業人口還大大超過其他行業，從事製造業和第三產業人口很少，根據這些標準說 1970 年「已經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

83　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頁 346。

因此，1974年8月7日國家計委發出的關於擬定十年規劃的通知和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仍然重申了三屆全國人大的提法，繼續將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第一步要完成的目標。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之際發表重要講話，這個講話是經過長期起草後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代表了中共中央對過去三十年歷史的初步總結。講話宣布：

> 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
> 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於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儘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84]

對於這個評價，我們今天實事求是地分析，可以說，由於包括商業、金融、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不發達，農業還很落後，還不能說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則可以說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獨立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最大的特點。由於蘇聯中斷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再加上美國的經濟封鎖，使中國一直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號下艱苦奮鬥，好處是沒有產生東歐對蘇聯和西歐對美國那樣的經濟依賴性，問題是在世界經濟中處於封閉狀態。

「比較完整的」，可以從部門和地區布局看。

作為國家經濟脊柱的重工業部門已經比較齊全，「一五」計劃後已有一定基礎的鋼鐵、煤炭、電力、機械製造工業和鐵路運輸繼續有了較大增長。與1949年相比，1978年中國的鋼產量從世界第26位提

---

84 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升到第5位，煤產量從第9位提升到第3位，發電量從第25位提升到第7位，原油產量從第27位提升到第8位。[85] 鋼產量1973年已經達到2522萬噸，實現了1957年提出的十五年總產量趕上英國的口號。

原來落後的石油、化工、電子工業得到了很大發展。石油工業持續飛躍，陸續開發擴建了大慶、勝利、大港、任丘、江漢、長慶等油田，1966年起中國原油產量年均遞增18.6%，徹底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1972年以後，毛澤東、周恩來批准「四三方案」，國家投資幾十億美元和二百億元人民幣，引進了二十六個大型成套技術設備，建成了北京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遼陽石化總廠等二十六個化肥、化纖大型企業。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

原來基本是空白的航天、核工業也填補了空白。先後建成了酒泉、西昌兩個航天發射中心；1966年第一次含有熱核材料的核試驗和第一枚核導彈發射試驗成功；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1970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和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同年開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30萬千瓦核電站設計工程（即秦山核電站）；1975年第一次回收發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

農業機械工業方面，雖然沒有實現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過高目標，但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使農業生產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1976年與1965年相比，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全國農田灌溉面積1977年比1965年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全國機井數1975年比1965年增長935.89%。[86] 從70年代開始，地方五小工業和農村社隊企業也得到了發展。

工業布局也漸趨完整，在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千一百多個大中型工業交通科研設施和基地，包括攀枝花和酒泉鋼鐵基地、六盤水煤炭基地、葛

85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9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頁901。發電量為1950年數字。

86　水利電力部編：《中國農田水利》（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頁25－43。

洲壩水利樞紐、劉家峽水電站、第二汽車製造廠、成昆、湘黔和青藏(西格段)等十條重要鐵路幹線等，初步改變了中國工業東西部布局不合理狀況，形成了有較大規模、門類齊全、有較高科研和生產能力的戰略後方。

以上數據雖然基本上是1978年的，但作為一個長遠的二十年規劃，「四五」計劃在其中處於承上啟下的最後衝刺關鍵時段，為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我們也應當歷史地予以分析。

第四個五年計劃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表

項目	計算單位	1970年實際[87]	第四個五年計劃					
			1975年					1975年實際比1970年實際增長%
			1970年擬訂的「四五」指標[88]	1973年調整的「四五」指標[89]	1975年年度計劃指標[90]	1975年實際完成[91]	1975年比1973年「四五」指標增長%	
工農業總產值								
工農業總產值	億元	3138	4900	4430	4410－4460	4467（4477）	（1.7）	（42.7）
工業總產值	億元	2080	4000	3200	3150－3200	3124（3219[92]）	（0.6）	（54.8）
農業總產值	億元	1058	900	1230	1260	1343（1285[93]）	（4.5）	（21.5）

87 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

88 國家計委檔案：〈第三個五年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主要指標〉。

89 1973年12月7日調整的「四五」指標，據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的〈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所列。

90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的〈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

91 據《中國統計年鑑（1983）》。

92 據國家統計局1979年8月編《工業交通統計資料（1949－1978）》，頁3。

93 據國家統計局1980年3月編《全國農業統計資料（1949－1979）》，頁35。

續上表

農業主要產品產量								
糧食	億斤	4799	6000	5500	5600	5690	3.5	18.6
棉花	萬擔	4554	6000	5000	5200	4762	−4.8	4.6
豬	億頭	2	3 — 3.5	2.7		2.8	3.7	40
水產品	萬噸	318	500	440	455	441	0.2	38.7
工業主要產品產量								
鋼	萬噸	1779	3500 — 4000	3000	2600	2390	−20.4	34.3
生鐵	萬噸	1706	3500 — 4000	3000	2700	2449	−18.4	43.6
鐵礦石	萬噸	6422	14000 — 16000	11000	10000	9693	−11.9	50.9
十種有色金屬	萬噸	71.23	154			81.14		13.9
其中：銅	萬噸	16.53	35	28	25 — 26	25.77	−8	55.9
鋁	萬噸	23.52	57	32.3	28 — 30	22.13	−31.5	−6
原煤	億噸	3.54	4.2 — 4.5	4.4	4.3	4.82	9.5	36.2
原油	萬噸	3065	7000	7000	7500	7706	10.1	151
天然氣	億立方米	28.7	150	90	75	88.5	−1.7	208.4
發電量	億度	1159	2000 — 2200	1900	1830 — 1900	1958	3.1	68.9
木材	萬立方米	3782	4000 — 4600	4400	4400	4703	6.9	24.4
水泥	萬噸	2575	4000	4000	4020	4626	15.7	79.7
硫酸	萬噸	291.4	500 — 600	500 — 600	500	484.7	−3.1 — 19.2	66.3
濃硝酸	萬噸	22.72	60 — 70			30.23		33.1
純鹼	萬噸	107.7	160 — 170	130 — 140	123	124.3	−144 — −11.2	15.4
燒鹼	萬噸	89.2	150 — 170	130	130	128.9	−0.85	44.5

續上表

合成氨	萬噸	244.5	600－700	630	615－655	607.7	–3.3	148.5
化肥	萬噸		3200－3500	3000	2800－3000			
其中：氮肥	萬噸		1800－2100	1900	1800－1930			
磷肥	萬噸		1400	1100	1000－1070			
農藥	萬噸	32.1	45	45	45.3	42.2	–6.3	31.5
七大類醫藥	萬噸	2.15	4	3	2.8－3	2.73	–9	27
輪胎	萬套	425	613			700		64.7
塑料	萬噸	17.6	45－50	30	30－33	33	10	87.5
天然橡膠	萬噸	4.62	10	6	5	6.86	14.3	48.5
合成橡膠	萬噸	2.54	20.6	6	5－6	5.67	–5.5	123.2
冶金設備	萬噸	7.25	15	12	8.1－9.1	8.21	–31.6	13.2
發電設備	萬瓩	291.8	450－500	550	400－450	496.5	–9.7	70.2
機牀	萬台	13.89	15	12	9－10	17.49	45.74	25.9
汽車	萬輛	8.72	25	15	12.65－13.25	13.98	–6.8	60.3
拖拉機	萬台	3.19	6.5－7.5	6.5	6.75－7.05	7.84	20.6	145.8
手扶拖拉機	萬台	5.14	15	14	14.3	20.94	49.6	307
內燃機	萬馬力	733	1300	1700	1850－1900	2348	38.1	220.3
機車	台	573	900	680	580	526	–22.7	–8.2
貨車	輛	13800	23000	23000	17500	15700	–31.8	13.8
化學纖維	萬噸	10.09	35－40	20	17	15.48	–22.6	53.4

續上表

棉紗	萬件	1131	1300	1200	1150－1200	1161.8	−3.2	2.7
棉布	億米	91.5	100	93	91－95	94	1	2.7
機製紙及紙版	萬噸	241	320－350	320	330	341	6.5	41.5
糖	萬噸	135	200－250	210－230	200	174	−173－−24.4	28.9
原鹽	萬噸	1109	1400	1300－1400	1350	1481	13.9－5.8	33.5
捲煙	萬箱	783	800	850	900	992	16.7	26.7
自行車	萬輛	368.8	600－650	600	610	623.2	3.9	69
縫紉機	萬架	235.2	360－450	360	370	356.7	−1	51.7
手錶	萬隻	347.6	650－750	650	775	782.2	20.3	125
鐵路貨運量	億噸	6.8	9－10	9	8.5	8.9	−1.1	30.9
財政								
財政收入	億元	五年合計2529	五年合計4000	五年合計4000	850	五年合計3919.7	−2	55
財政支出	億元	五年合計2519	五年合計	五年合計		五年合計3919.6		55.6
基本建設投資	億元	五年合計976	五年合計1400	五年合計1350－1400	300	五年合計1763.95	30.7－26	0.7

註：（ ）內為按可比價格計算（1970年不變價格）。

2 無法實施的高指標十年遠景規劃

四屆全國人大提出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以後，鄧小平1975年除了抓整頓之外，還抓了制定長遠規劃工作。

早在1974年1月12日，國家計委已經向國務院提出關於擬定長遠計劃的報告，設想擬定1976－1985年十年遠景規劃，重點放在1976－1980年的五年計劃。8月7日，國家計委發出關於擬定十年規劃的通知，要求當年提出十年規劃的輪廓，包括任務、建設重點、布局、經濟和技術政策，以及工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發展的主要指標；明年再具體化。

1975年3月，國家計委發出制訂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的通知。3月15日至4月25日，國家計委在京召集各部門主管計劃工作的領導人，研究討論了各部門十年規劃和進一步改善經濟管理體制的意見。10月，鄧小平先後主持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國家計委擬訂的〈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要點〉進行了討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1月2日全國計劃會議召開，討論國家計委擬定的〈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要點〉。12月，經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多次討論修改，形成了〈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簡稱〈綱要〉），〈綱要〉的前五年規劃即是「五五」計劃。12月25日、27日中央政治局審議了〈綱要〉，決定略加修改後試行一年，再作進一步修訂。

〈綱要〉的內容按行業大致分為：一、建立比較穩固的農業基礎，二、建立比較強大的基礎工業，三、加強輕工業和石化工業，四、加強國防工業和科研，五、充實和加強三線戰略後方基地，進一步發揮一、二線作用。按照其要點順序，可以看出，雖然還繼續提出「準備打仗」的口號，但三線已經被放到最後的位置，與一、二線並重，而且首要任務是充實，不是擴大。這說明，隨著「四五」計劃的基本完成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戰備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指導思想得到全面調整和結束。

〈綱要〉指出，1976年到1985年的十年，是實現現代化宏圖的關鍵。這十年中的主要目標，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85年，進一步完善全國的經濟體系，基本完成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實現笨重體力勞動機械化。基本建成六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農、輕、重比較協調發展的大區經濟體系。農業方面，要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建

立比較穩固的農業基礎；工業方面，要以鋼為綱，建立比較強大的工業基礎；要發展輕工業和石油化工；要大力加強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準備打仗；要充實和加強三線戰略後方基地，進一步發揮一、二線作用。

〈綱要〉提出的具體指標是：到 1985 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 8800 億一8900億元，比1975年翻一番，平均每年遞增7.1%－7.2%，其中工業為 8%，農業為 4.2%－4.7%。

〈綱要〉對「五五」計劃（1976－1980）提出的要求是：建立起比較穩固的農業基礎，糧食產量比 1975 年增長 16%－25%，棉花產量增長18%－24%；建立起比較豐富多彩、適應國內市場和外貿需要的輕工業，棉紗產量比 1975 年增長 26%；建立起比較發達的重工業，鋼產量比 1975 年增長 58%，煤炭增長 30%，石油增長 95%，發電量增長60%。整個「五五」計劃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 7.5%－8.1%。[94]

〈十年規劃綱要〉反映了國家和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圖的決心和步驟，但是，也存在嚴重的指標過高狀況，比如，提出到1985年工農業總產值要翻一番，這在當時國家所處的「文革」動盪政治環境下，是無法貫徹實現的。實際上，因為隨即開始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1976年的政治動亂，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和唐山大地震，〈綱要〉和「五五」計劃均未能正式下達，〈綱要〉提出的經濟戰略在這一年裏並沒有得到執行。直到粉碎「四人幫」後的 1977 年 12 月，在這個〈綱要〉基礎上經過修訂，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並下達了國家計委關於〈1976－1985 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修訂草案）〉。其後又加進了加快和大量引進外資的內容，1978年3月5日由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予以通過。可以說，1975 年〈十年規劃綱要〉是被稱之為「洋躍進」的 1978 年〈十年規劃綱要〉的前身。

94　國家計委檔案：〈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

第九章
「批鄧」把民眾推向公開造反

文化大革命是以造反開始的。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將要拉上帷幕，才出現了真正的群眾造反。從1975年秋天到1976年秋天，中國經歷了一場夢魘般的政壇走馬燈。以鄧小平倔強的性格，他是不會給風燭殘年的毛澤東留下甚麼希望的，否則也許中國真的不會有那麼多偉大的歷史轉折。無論如何，當我們對領袖人物的被批和興起已經麻木時，卻能驚喜地看到，有成千上萬的民眾真正成為了主角。這些，表面上都是緣起於清華大學幾個小人物給大人物寫了兩封信，狀告另一個科長出身的小人物借酒撒瘋、燒了被子。這些，導致了建國以來民眾第一次與最高當權者的龐大對抗——幾十萬人在廣場上「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而昔日高不可攀的權貴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驚恐地用望遠鏡看着……

一　整頓越界與風雲突變

1 毛澤東同意開展評《水滸》運動

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因白內障眼睛近於失明，「在牀上躺着的時間多，不願意起來，以前在牀上還是坐着多。一天也沒有同幾個人

說話」。[1]7月下旬做過白內障手術後，雖然一隻眼睛又可以看東西了，但平時要看的大量文件、書籍和報刊還是由身邊工作人員讀給他聽，通常由機要秘書張玉鳳來唸。但張文化水平不高，感到吃力。於是，從北京大學挑選來一位女教員蘆荻，為他讀古典文學。

有一次，蘆荻問張玉鳳：「我有幾個問題能不能問？」張說：「看主席高興不高興。」於是，8月13日，趁着毛興致較高，蘆提出了問題。「關於《水滸》一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但到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系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有人說《水滸》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由於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很大。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後來又傳說，主席有個講話，其中提到了《水滸》，蘆問主席是否是真的。毛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蘆荻接着問主席，應該怎樣讀它？」[2]毛澤東回答了蘆荻的問題。第二天，也就是8月14日，蘆荻把毛的談話要點整理出來，給毛讀了，並得到認可。主要內容是：

>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
>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3]

毛澤東還說，魯迅評小說評得好，要好好學習魯迅的思想觀點，要求：「《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

---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738。

2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48。

那段評語印在前面」。在場的張玉鳳問：「64年在武漢我看《水滸》時，主席就對我講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辦事。可他們現在又都說這部書好，到底好在哪？」這時，毛澤東回答說：「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員，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4]

為了出版《水滸》，汪東興立即把毛的談話要點送給負責管出版口的姚文元。在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之後一度低沉、正處於尋找再起時機的姚看了，立即感到有文章可做。三個小時後，姚就給毛寫信，提出把毛的指示也印在書前：「不但對於古典文學研究，對於整個文藝評論和文藝工作，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宋江排斥晁蓋是為了投降的需要」，他建議「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員』的作用」，「為執行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以下幾件事情：1、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組謝靜宜和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報告。2、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志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上魯迅評論的工作。3、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一個規劃」。[5]

本來，毛談《水滸》是就事論事，他的「投降派」看法也是早就有。但是，姚的信提醒了他，對現實的「投降派」確實需要敲打一下。於是，他批示「同意」。不久又批示發表姚文元送審的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樣一來，一場由小人物蘆荻引起的古典文學話題，上升到當前的重大政治鬥爭問題。借題發揮，微言大義，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

---

4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5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得知毛澤東談話，江青又活躍起來。8月下旬即召集文化部的親信于會泳、劉慶棠開會，強調說「批示有現實意義」，「《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中旬，江青又到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評《水滸》「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評《水滸》是有所指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6]一場評《水滸》的運動在「四人幫」操縱的輿論工具煽動之下掀起了。

「投降派」是指誰？1973年年底的批周會議，曾經給周戴上過「右傾投降主義」、「想當兒皇帝」的大帽子。因此，重病中的周恩來特別關注着有關「投降派」的說法。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後，一些服務員希望和他一塊照個像。照完後，周恩來突然冒出一句：「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劃×。」在場的人聽了都愕然，心情沉重。

毛澤東同意開展評《水滸》運動後，周恩來找來幾種版本進行研究，針對「四人幫」說：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份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7]

9月20日，周恩來在進入手術室前，要來1972年6月23日為了說明所謂《伍豪啟事》純係國民黨捏造，自己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周恩來重新審訂一遍，顫抖着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報告日期。在進手術室前，他異常激動，聲音嘶啞地當着眾人的面喊：「小平同志，你這一年多來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

---

6 江青1975年9月12日接見大寨大隊幹部和社員時的講話（記錄稿），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292、293。

7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352、353。

多！」鄧小平表情嚴肅地緊緊地握一下周的手，未說甚麼話。就在進入手術室的剎那間，周恩來突然用力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8]

鄧小平感覺到了評論《水滸》的矛頭所向，想加以淡化。9月5日，他同新西蘭記者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毛關於《水滸》的批示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9月24日，在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江青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時，毛澤東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毛澤東還明確指示華國鋒，江青講話的「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9]

評《水滸》的風波在毛澤東的制止下雖然過去了，但它表明，毛澤東對「投降派」的批判，隨時可能被「四人幫」利用來發難，矛頭不僅僅是指向周恩來，也指向鄧小平和他開展的整頓。正像姚文元後來說到評《水滸》時所說：「我感覺當時主席考慮就要批右傾翻案風了，鄧要引開去。」[10]

2 中央權力支點的悄然轉換

第一個問題，鄧小平的整頓，為甚麼在他以為一帆風順的時候，風雲突變？過去的研究都認為，是「四人幫」對毛澤東進讒言，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其實不然，這是毛與鄧分歧的總爆發。

毛澤東很喜歡用「風起於青萍之末」這句話，他早就對鄧小平打擊「四人幫」、利用整頓否定「文革」做法隱忍地有不滿。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

---

8 高文謙：〈在最後的日子裏——記病重住院期間的周恩來同志〉，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一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頁79。

9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1。

10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談批鄧，1976年2月6日。

毛澤東固然批評了「四人幫」，由此導致了史無前例的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四人幫」。但是，他對「四人幫」的容忍，也溢於言表。

他批評「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作法，卻不說這是性質的錯誤，只說「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同時又把周恩來、朱德的經驗主義歷史錯誤與林彪、彭德懷一起點出來示眾：「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你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一個是做法的錯誤，一個是性質的錯誤，明顯不同。

他批評了反經驗主義的文章，又幾次為張春橋承擔責任，說自己沒看出來，「對不起春橋」。這是罕見的態度，甚至讓張春橋在接受批評時面有得色。

他批評了江青，但只批評她私自送材料的做法，而稱讚她過去反劉少奇、林彪有功。

最重要的是，毛對「四人幫」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的講話，即以後成為華國鋒等粉碎「四人幫」的「聖旨」，前面其實有一句嚴格的限制詞：「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

毛澤東肯定了鄧小平，讓他接過了王洪文手中的一部分權力，但是他也心存疑慮。

早在鄧小平剛復出時，毛澤東就送他一句話「綿裏藏針」。過去的許多著述都把這說成是毛稱讚鄧小平的優點，其實結合上下文，不難看出這是毛批評鄧過去太強硬，要他今後「綿裏藏針」，含蓄一些。

當鄧小平表示自己「有決心」把工作做好，不怕「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毛澤東卻意味深長地笑着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與其說是鼓勵，不如說仍是勸戒他不要太強硬出頭。當他聽到鄧小平說批評「四人幫」的會到此為止不再繼續開時，稱讚說：「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對鄧小平的整頓，我們並沒有看到毛澤東有甚麼明顯的稱讚之語。當11月1日鄧小平攤牌式地問毛澤東過去三個月工作如何時，毛只是敷衍地說了一個字「對」。

他雖然對鄧小平送來的材料加以批示支持，但是態度愈來愈曖昧。起初是批評江青在文藝方面太霸道，「不利於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同時也把解決的時間拉得很長，說「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已經有了《紅樓夢》、《水滸》，發行了。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後來毛索性只批一些「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此件有用，暫存你處」之類不置可否的語言。

對於鄧小平親自抓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幾次上報給毛，他都沒有同意下發。10月14日，鄧小平告訴胡喬木：主席講他沒有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對科學院〈匯報提綱〉有一些不贊成的意見。[11]事實上，經鄧小平回去要胡喬木核對，發現毛確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該說法出於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技規劃時，但列席者的筆記上都沒有這句話。

這並不是簡單的記憶或者記錄問題，而是表明毛澤東根本不同意鄧小平把科學技術，或者包括知識、知識分子當作生產力的說法，也警惕鄧小平用毛「文革」前的話來抵制毛「文革」中錯誤的做法。同樣的事，還發生在鄧小平要求發表毛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幾次滿懷信心地上報給毛澤東，都被毛拒絕。在毛看來，他「文革」前的許多論述，都不像「文革」中的論述那樣表示自己的思想精髓——文化大革命。正如胡喬木在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寫的十四條揭發鄧小平材料中所說：「〈論十大關係〉當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著作，有巨大的現實指導意義，但是無論如何，決不應用它來打亂和代替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指示的學習。他（鄧）的這個陰謀被偉大領袖毛主席識破了，沒有得逞，但是這確是暴露了他（鄧）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政治本質和破壞學習毛主席理論指示的險惡用心。」[12]

---

11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96。

12 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頁359。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分歧，集中在對清華大學劉冰狀告遲群、謝靜宜的問題上爆發，不是偶然的巧合。毛澤東鮮明地支持了遲、謝，因為這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僅存的碩果。

早在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尼稱讚毛澤東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澤東卻不無傷感地回答尼克松說：「我沒有能改變世界，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

毛澤東為甚麼這樣說？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是指哪裏？過去對此都沒有重視研究。尼克松認為這是「毛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對此，基辛格另有看法。他寫道：「毛澤東的談話也不全都是戰略問題。甚至在我們短暫的會見中，他也擺脫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陰影並給他的晚年帶來痛苦的噩夢。」並說，這種「無可奈何地接受事實的態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即使是曾經被毛稱為是朋友、對毛澤東這次講話有特別研究的熊向輝，也不甚了了。熊的研究說：這顯然是曲解，但國內卻有人據此為文貶低毛澤東，胡說毛澤東自己承認，他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13]

其實，基辛格的理解還是比較沾邊的。毛澤東這句話，並不是隨口而出，為了這次會見，毛澤東期待和準備了很久，要說些甚麼，自己反覆思考了很久。儘管他根本不是希望讓美國人了解和理解他甚麼，但他是把與美國總統的見面，當作一個敞開心聲的機會。

據從毛澤東身邊人員了解到的真相，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指的是在當時位於郊區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毛澤東自發動「文革」開始，就滿懷憧憬地要改變中國和世界，依靠和發動群眾，建立一個全新的理想社會。他的這種理想在1967年遭遇全面內戰而不得不退縮，1971年因為林彪事件又不得不再退縮。他不得不同意恢復「文革」前的秩序，成立由國務院和軍隊組成的老幹部隊伍來收拾亂局，不得不重新起用鄧小平。儘管報刊上連篇累牘

13 熊向暉：〈1972年毛澤東同尼克松的談話〉，《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地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但毛澤東心裏清楚，他本義上的文化大革命，整體上是失敗了。

但是，他仍然想證實自己設想的正確，退而求次地把「文革」的實驗局限在教育領域。他派出了身邊的機要秘書謝靜宜和8341警衛部隊宣傳副科長遲群，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控制和改造。那裏所發生的一切，都由兩人向他匯報，他面授機宜，進行部署。可以說，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是作為他堅持「文革」理想的最後一個試驗田，也是他理想寄託的最後一塊「淨土」。所以，他不無悲傷地說：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

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試圖插手處理清華、北大問題，否定遲、謝，實際上就是否定他們背後的毛。必然遭到毛的嚴厲反擊和憤怒。毛說，我只有那幾個地方了，他還要奪走。事實上，毛身邊人也曾經警告鄧小平，不要去動兩校。但鄧小平沒有認識到這個標誌性問題的嚴重性。反而是周恩來，十分清楚毛澤東的根本態度。

1975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剛開完批評江青的會議，周恩來就在305醫院找來會上發言批評江青等人的吳德談話，說：要注意方式，多個別交談，別影響團結。周心情沉重地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正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14]同時，周還把紀登奎等一些政治局委員也找到醫院來，向他們打招呼，要他們適可而止，不要計較江青的態度，注意團結她一道工作。以後，政治局幾次開會對江青進行批評幫助，周恩來都告假不到。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關，但實際上還沒有到臥牀不起的程度，而是周已看出毛無意根本解決「四人幫」問題，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臉，留下一些轉圜餘地。

據知情人說，周恩來當時曾與鄧在小範圍內交換過意見，葉劍英也持同樣的看法，但是鄧小平卻聽不大進去，還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

14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162。

法去幹。對此，葉劍英在後來形勢逆轉後私下評論說：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15]

同樣旁觀者清的還有陳雲。陳不無憂慮地問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的鄧小平，你摸準主席的脈沒有？鄧小平說摸準了。陳雲在「文革」後感慨地說，看來他沒有摸準。

鄧小平自己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颳起之後，才明白了事態的嚴重性。11月10日，鄧小平對胡喬木說：我現受批判，起因是轉送劉冰的信。主席做了很嚴厲的批評，我做了自我批評。中央講了，「三項指示為綱」這個提法不對，只有階級鬥爭才是綱。胡說：轉信的事恐怕不是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對你早就有了不滿。鄧不無悔意地說：過去把形勢看得太簡單了。[16]

當然，若說鄧小平一點都沒有察覺毛澤東的性格，也不可能。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認為，鄧是執意要這樣做的：「父親完全知道，這次復出後，但凡他的作為能夠『隨和』一點兒，毛澤東都會盡量保住他的。但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他怎麼能夠為了保全自己而喪失力挽狂瀾的機會，怎麼能夠為了一己之安危而放棄正義和原則。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一條充滿風險的不歸之路。」[17]

另一個問題，既然毛澤東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倒鄧，是他自己的決策，不是「四人幫」，那麼，「四人幫」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已經不能走出住處的毛澤東的態度？可以分析一下此時毛澤東身邊親信的組成結構。

客觀原因上說，毛澤東身邊的親信人員，已經發生了不利於鄧小平的變化——王海容、唐聞生失寵。在毛澤東一個人的好惡就能決定國家政局變化的極不正常狀態下，在他身邊一些人提供的信息和解釋也能夠影響毛澤東的基本態度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

1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576。

16 《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頁104。

17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424。

「文革」末期，八十多歲高齡的毛澤東身體十分衰弱，視力一度幾乎失明，加上黨內生活的嚴重不正常，使他作出重大決策的依據，多數是從身邊親信得到的極不完整信息。這些親信，基本上包括女秘書和女翻譯兩幫，前者主要有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謝靜宜，後者主要有毛澤東的表姪女、原為翻譯後升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海容和禮賓司司長唐聞生、美大司司長章含之。她們為了爭奪毛澤東的信任，互相之間你爭我鬥，把本來就極不嚴肅的「文革」政治鬥爭和國家事務搞得更加矛盾重重、庸俗不堪。

1972年，毛澤東因為林彪事件和生病，心情很惡劣，有時無緣無故發脾氣。一次，罵了張玉鳳，張無法忍受，賭氣離開。王、唐認為奪權時機已到，向毛匯報了張的一些劣跡。誰知毛已為自己無端發火趕走張而後悔，王、唐沒有得逞，反而遭到毛的嚴厲斥責，毛並很快把張請回來。還特別指示會見外賓時不用王、唐做翻譯。周恩來據此傳達並做了安排。王、唐卻認為是周在添油加醋打擊自己，十分不滿。這釀成了1973年11－12月王、唐起勁組織批判周恩來的動力。

批判周恩來之後，毛澤東開始重用鄧小平，並且容許他進行整頓，批評了「四人幫」。王、唐看到這種形勢，也出於對江的厭惡，便又在鄧和「四人幫」的鬥爭中站在了鄧一邊，有意地在毛澤東面前揭露江青的一些醜聞，如要求政治局討論做她設計的裙子等，使毛澤東批評江青，客觀上起到了支持鄧小平的作用。後來，鄧小平也常常把她們找到家裏來，請她們向毛轉達意見，或者「探詢一下主席的意思」。王、唐在毛、鄧溝通之間「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1975年10月，鄧小平家從北京寬街搬到東交民巷17號，這時已經是火山爆發的前夕，王海容、唐聞生仍然常去鄧家，一談半天，「也感覺到愈來愈不樂觀」。[18]

毛澤東也覺察到王、唐與鄧走得很近，起了疑心。用毛遠新傳達的毛澤東話說，就是「她們是兩隻耗子，看到我們的船快沉了，急急

18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24。

忙忙跳到鄧小平的船上去」。於是，當他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糾正「文革」錯誤、決定批判鄧小平的時候，於11月起用了自己的姪子毛遠新，作為他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隨後，王、唐也難擺脫支持鄧的干係，遭到一定衝擊。

至於章含之，因為與毛見面機會不像張、王、唐那樣多，處於兩方矛盾鬥爭的夾縫裏，十分難堪。由於章的丈夫喬冠華是外交部部長，早就對王、唐在外交部的頤指氣使不滿，於是，在判斷王、唐失勢之際，通過江青向毛澤東報送了一批反映王、唐劣跡的材料。然而毛澤東最終卻又原諒了王、唐，批示批評喬冠華「借刀殺人，借中央之刀殺王唐」。事情更加錯綜複雜。

由此可知，「四人幫」當時已經失寵，不能得到毛澤東的信任，甚至他們攻擊鄧的一些話反而會引起毛的反感。但是，「四人幫」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骨幹力量，否定「四人幫」必然否定「文革」。出於維護「文革」的目的，毛愛屋及烏，也要保護「四人幫」。

鄧小平性格直率，不善於像周恩來那樣注意在毛澤東身邊人的作用、謹慎處理與她們的關係。因此，當攻擊他的一些材料被反映到毛那裏時，沒有人出來解釋和轉圜，反而被毛遠新進行了火上加油的解讀。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姪子，是毛澤東弟弟毛澤民的兒子。1941年2月14日生於新疆。毛澤民1943年在新疆被軍閥殺害，其妻子朱丹華在1949年改嫁江西省副省長方志純，毛遠新也隨母親去了江西南昌。1952年，毛澤東想到毛家的這點骨血，把他招到北京，留在身邊，和李敏、李訥一起生活。所以，毛澤東在下一代親屬中比較喜歡他。毛遠新畢業於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101中學，1960年入清華大學無線電工程系，次年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火箭工程系導彈遙控專業學習，同時參軍。1965年由毛澤東改名為「李寔」，去參加四清運動工作隊，又到部隊鍛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遠新奉毛澤東之命到延邊參加運動，開始他和多數幹部子弟一樣，支持當權派，反對造反，被毛澤東叫到北京訓斥，告訴他為甚麼要搞「文革」，要他和走資派劃清界限，堅決鬥爭。從此毛遠新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參加造反派，嚴厲打擊延邊州委書記朱德海等走資派。1967年到黑龍江，任黑

龍江省革委會常委、周恩來聯絡員。1968年到遼寧省，任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被任命為瀋陽空軍司令部二炮處處長、瀋陽軍區空軍副政委、遼寧省委副書記。1972年任遼寧省委書記。1974年起任瀋陽軍區空軍政委，瀋陽軍區副政委、政委。

1975年9月28日，毛遠新因為他父親犧牲在新疆的緣故，隨中央代表團從北京前往新疆，參加祝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動，10月10日回來路過北京時留在了毛澤東身邊。11月初，毛對王、唐已經不信任，就讓他作為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毛遠新同江青的關係從小並不好，幾次發生尖銳衝突，毛澤東批評了他，要他叫江青媽媽。「文革」中，因為持共同的「文革」立場，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上一致，他和江青開始靠攏，但內心很看不起江青，總想取而代之。由於毛澤東那時不願意見江青，而毛遠新可以經常見到毛澤東，他在許多問題上起了「四人幫」所不能起的作用，成為毛澤東觀察鄧小平整頓的最大挑撥製造者。用姚文元的話說：

> 毛遠新是以毛主席的聯絡員的名義列席政治局會議的，但他又不像是聯絡員，他的每次發言都成了中心調子，每次傳達毛主席指示之後，都有他自己的解釋，而且還說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這就超過了聯絡員的職責，這也說明當時黨內生活極不正常。[19]

3 劉冰上書事件引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常委呂方正四人給毛澤東寫信，就校黨委書記遲群的工作作風和思想意識等問題向毛澤東告狀。首先提議寫信的是柳，得到惠、呂同意，三人都是駐清華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領導人，對遲群的專橫跋扈早就看不慣。

---

19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25日。

最後，他們才告訴劉，請他帶頭。信是出身部隊幹部的呂在北京衛戍區一師招待所秘密起草和商議修改的。先考慮通過胡耀邦轉鄧小平呈毛澤東，胡很支持，但認為他管的科學院與清華大學不是一個系統，不便轉。於是由原是北京衛戍區幹部的惠憲鈞出面，得到衛戍區副參謀長支持，通過鄧小平駐地警衛部隊把信送到鄧的秘書王瑞林手中。[20]

信中說，遲群在清華大學共有五方面問題：一、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二、毫無黨的觀念；三、搞一言堂、家長式的惡劣作風；四、任人唯親，封官許願，違反黨的幹部政策；五、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材料描述遲群因為沒有當上中央委員和教育部長大發牢騷的狀況說：

> 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不工作。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牀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幹，深夜一個人跑到校外馬路上、野地裏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一些教職工四處尋找。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摔碎，把兩張大寫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簾，把工作人員辛勤勞動種的蔬菜統統拔下來扔掉，發泄不滿。罵這個是「混蛋」，那個要「滾蛋」。甚至大罵「四屆人大常委有甚麼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參加」，「別人不提我當四屆人大代表，主席提我」。[21]

毛澤東看過後，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對秘書說：「先放着。」

見第一封信沒有回音，10月13日，劉冰等三人（呂方正已調走，未參加）又寫了第二封信。通過教育部副部長李琦送給胡喬木，再轉

---

20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頁205－213。

21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及附件，1975年11月26日。

鄧小平呈毛。這次不僅又補充反映了遲群的其他問題，而且把謝靜宜也列入被告範圍：

> 她愈來愈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在一次書記會上，因為一個幹部的批准手續問題，她借題發揮，用威脅的口氣說「豈有此理，你們告去吧！」聯想起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跪在遲群面前握着遲群的手講些不合原則的話，當時我們就實在看不下去。[22]

毛澤東看後，要秘書把第一封信找出來，又看了一遍。汪東興提議，不行就讓遲、謝兩人撤回來。他只從處理中南海派出的兩個下級幹部看問題。但是，毛澤東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更為嚴重的是，信是鄧小平轉來的，一次不行又轉第二次，不肯罷休，這說明他們是上下串通的；要打倒的不僅是個別人，而是他派去執行他指示的兩個親信。這等於是向他攤牌。於是，毛澤東很生氣。後來，他對毛遠新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他還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23]

10月19日，毛澤東會見馬里共和國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的夫人瑪麗亞姆·特拉奧雷之後，同李先念、汪東興、王海容等談話說：

> 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一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

---

22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及附件，1975年11月26日。

23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377。

我在北京，寫信為甚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六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24]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遲群暫不調，劉冰調出清華大學。[25]

這是毛澤東自從鄧小平復出以後第一次批評他，口氣還比較緩和。但是參加會見的人都感到，事情不會這麼簡單。李先念也只好表態說，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26]女翻譯立即秘密打電話通風報信，說鄧挨批了。

10月2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討論了毛澤東的談話，決定按照毛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27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向毛澤東寫報告說「一致認為，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問題決不是孤立的，反映了當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說：「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次日毛澤東在「兩條路線鬥爭」一段下劃了線，批道：「對。」11月1日晚上，毛把鄧找去，又批評了他為劉冰轉信。鄧小平詢問毛：這一段時期以來中央工作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毛澤東肯定說：「對。」

引起毛澤東對鄧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毛遠新的匯報得到了他的重視。

---

24 指劉冰等8月13日和10月13日的兩次來信。

25 程振聲：〈毛澤東1975年「兩條路線鬥爭」提法的來由〉，《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

26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頁376、377。徐著說，據王洪文親口告訴他，李先念在國慶節前後也率先向毛反映了鄧「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李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員之一」。此說似不確，查9、10月李先念陪同毛會見外賓，僅有10月19日這一次，其他都是鄧小平陪同。李的表態應是在當天毛批評鄧之後，不是「首先提出」。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遼寧省情況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特別提出：這股風「似乎比72年批極左還兇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覆。」[27]他還說：「75年國務院開的務虛會，遼寧省有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特別是中央75年四號文件[28]發下去以後，群眾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說，形勢剛好，社員積極性也起來了，看了四號文件不理解，有情緒，還問主席知道不知道。」他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義路線還對不對？十大通過的路線還對不對？批林批孔反回潮及倒退還對不對？「文革」以來的新生事物還對不對？

毛遠新這些話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他看來，毛遠新一直在地方工作，和江青一夥沒有搞到一起去，對事情的看法比較客觀（事實上，毛遠新至今也沒有承認在倒鄧之初，和「四人幫」有甚麼勾結）。毛澤東把他講的情況和劉冰上書聯繫起來，對毛遠新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29]毛澤東有意要不找江青等人，怕把事情鬧得不可收拾。

11月2日晚上，毛遠新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同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一起開會。毛遠新說了他在毛澤東那裏說過的看法。鄧小平因為昨晚才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對」，便說：「這個問題還可以再

27 毛遠新筆記，1975年9月至11月。

28 指鄧小平主持制定、毛澤東批准的〈中共中央批轉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

29 毛遠新筆記，1975年11月初。《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4、1755。

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個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他還說：「我是從今年3月9號文件開始抓工作，主持工作是7月。9號文件以後是甚麼路線，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甚麼路線，可以考慮嘛。上我的賬，要從9號文件開始算起。從9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對9號文件以後的評價，遠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30]同時，鄧小平也表示願作自我批評。但是毛遠新咄咄逼人，據他事後向「上海幫」描述的他當時表現：他站起來，左手插腰，右手指着鄧小平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31]

11月3日，碰了釘子的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了鄧的態度。

毛澤東很為難，他既不想就此打倒鄧小平，更不想在肯定還是否定「文革」的問題上讓步。他表態說：「你有理，順着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他要有個轉彎。」「擴大一點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做個決議。文化大革命是幹甚麼的？是階級鬥爭嘛。」毛澤東一方面把鄧小平的問題擴大到政治局，一方面也自己讓了步，主動提出了「文革」有錯誤：「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32]毛澤東又要毛遠新一字一句地唸了一遍鄧等四人報告中「兩條路線鬥爭」那段。本來，毛澤東並沒有把這個事上綱到那樣高度，但他看到鄧等這樣提，也抓住不放地說：「就討論這個問題。當前兩條路線鬥爭。這是他們自己講的，說是完全一致，說是非常重要，又不是孤立的……」[33]

---

3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17。

31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頁375。

32 毛遠新交代材料。

33 程振聲：〈毛澤東1975年「兩條路線鬥爭」提法的來由〉，《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

11月4日，毛遠新又向毛匯報了八個人開會的情況，說「他們對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來意見也很大」。毛澤東仍然對鄧小平強調要幫助，「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他要求會議還要逐步擴大幾個人，但是「不要告訴江青，甚麼也不講」。[34]11月5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稱：「我覺得以後見主要國賓，由我一人出面，過於繁重，故擬請春橋出面如何？」這實際上以退為進地試探毛澤東的支持程度，而毛則明確示意拒絕，批示：「由小平主持會談，春橋可參加迎送及宴會。」毛還特別刪去了鄧信中提出「江青同志會見安排」，並把「由鄧小平或張春橋代表周總理主持」、「請鄧小平或張春橋講話」、「請鄧小平或張春橋祝酒」中的三處「或張春橋」四個字圈掉，表示一切仍由鄧小平主持。

毛澤東想用由鄧小平來主持做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的辦法，既能讓鄧小平下台階，又能保證今後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可謂用心良苦。11月13日，他寫了一個關於打招呼批語：

>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35]

11月15、16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連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劉冰也列席。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清華事件的批示後，以「四人幫」為首對列席者進行了批判。列席者也被迫對寫信、轉信做出交代或檢查。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對鄧小平進行批評。鄧小平做了檢討，但他連稿子都沒有寫，只系統地談了對派性、對工業生產、對

---

34 毛遠新筆記，1975年11月4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6。

3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8－1759。

文教系統、對老中青三結合、對新生事物、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他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36]這實際上是拒絕接受毛澤東為他開出的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診斷書，而作了一個「道不同，不相謀」的聲明。

鄧也認真考慮了毛澤東要他主持做文化大革命決議的方案。據知情人說，他和紀登奎私下商量，結果是認為這個決議自己不能做，否則將來被動。紀還建議他用毛澤東以前說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典故來委婉推辭，表示自己文化大革命大部分時間是處於被整和在野狀態，由他做決議不合適。會後，他附上檢討記錄，請求毛澤東見他一次。

毛澤東非常失望，沒有見鄧小平，決定進一步擴大批評鄧的範圍，要和更多的老幹部「打招呼」。

這樣，鄧小平感到已經無法主持中央工作。21日，他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洪文同志已經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時，經主席批准，由我暫時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洪文同志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開的十七人會議，亦應請洪文同志主持。請主席批示（由東興同志通知）。」但是，毛澤東當天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一會再說。」[37]由鄧小平一邊主持「批鄧」的會議，一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種奇怪的狀況，只能說明，毛還是寄希望於鄧自己做檢查糾正自己的錯誤。

根據毛澤東要擴大打招呼的指示，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報告裏說：「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一個136人的名單，並擬了一個打招呼的談話要點，都是由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了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塊談，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準備把談話要點發給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書記，也給他們打個招呼。此點也請主席批准。」

---

3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32。

3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61。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由鄧小平宣讀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然後，鄧小平講了四個方面問題：一、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對待群眾、對待自己；二、三項指示為綱不對，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三、要正確對待新生事物；四、對青年幹部一棍子打死不對。11月26日，中共中央又把〈講話要點〉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黨委常委。〈講話要點〉說：

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誣衊、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志，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着毛主席的。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會議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全校師生中進行辯論。

二、毛主席指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38]

38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通過打招呼，對鄧小平的批評實際上已經公開化，「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速展開。但〈講話要點〉傳達的毛澤東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指示中刪去了提到鄧小平的話，打招呼的活動仍由鄧小平主持，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留有餘地。而且，毛澤東並沒有重用批判鄧小平最起勁的「四人幫」。12月27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說：「盼望在主席認為方便的時候，讓我去看看你。」毛澤東當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適，以不見為好。」這樣，在「批鄧」的初期，「四人幫」並沒有能介入毛的決策。

當然「四人幫」也不會將這個大好時機閒置，開始在社會上鼓噪。

11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吳德到清華大學傳達毛澤東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意見。由於當時毛要求不要對鄧小平公開點名，因此吳沒有傳達原文，只是含混地傳達了大意。他傳達完後，主持會議的遲群要劉冰把他們的信唸一遍。在劉唸的過程中，遲群布置的人群起而攻之，一片混亂。會後，劉等被限制了行動自由，連續遭到批判鬥爭。清華全校展開了「教育革命」大辯論，批判「右傾翻案風」。

11月8日，張春橋找周榮鑫談話，指摘周榮鑫對教育工作提出的一系列主張，責令周榮鑫作檢查。周榮鑫提出：當前學生不讀書等問題急待解決。張春橋卻說：「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風。」「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甚麼人？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39] 張春橋還說：遲群1968年帶領軍宣隊、工宣隊到清華、北大，路線是正確的。

11月30日，張春橋在向阿爾巴尼亞教育代表團介紹中國「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時，又說：「現在爭論的頭一個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教育怎樣估計。」這十七年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但是，有人說，這十七年很好，那個時候倒是馬列主義的，

39 這就是後來張被定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著名謬論的由來。

相反，文化大革命以來，學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質量降低了，在課堂上課少了。大學生不如以前中學生讀書多。」張春橋還對外賓說：「我們的教育部長也有問題。」12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載有張春橋談話的《外交通報》。

1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梁效」的重頭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指出：

> 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甚麼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潮，分清路線上的大是大非，繼續鞏固和發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
> 現在，教育界的怪論就是企圖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進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教育戰線上的這場爭論，是當前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組成部分。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報告〉敘述了清華大學抓住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給毛澤東的信，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說劉冰等人的信是「誣告」，「矛頭實際上是對着毛主席的」，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報告〉說：今年7、8、9三個月，社會上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長周榮鑫到處講話，製造和散布種種否

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反對毛主席的教育路線，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並且直接插手劉冰等人的誣告信。因此，清華大學這場鬥爭，「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中共中央在轉發〈報告〉的批語中說，這個〈報告〉很好，提供了在黨委領導下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的經驗。要求將〈報告〉下發到大、中、小學校的黨支部。〈報告〉下發後，「教育革命大辯論」推向全國，周榮鑫和教育部負責人李琦等受到追查和批判。

鄧小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自己進行批評。這種主持，已經流於形式，用他自己的話：「也就是開始時說聲『開會』，結束時說一句『散會』。」其餘時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會場裏，一言不發。[40]

二　周恩來去世和華國鋒成為準總理

1　周恩來在寒風凜冽時刻去世

1975年12月31日深夜，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和女婿——另一位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兒子戴維・艾森豪威爾來到中南海游泳池毛的書房，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

交談中，客人提到了剛剛廣播的毛澤東兩首詞，即〈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同時發表的經過毛澤東圈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寫道：發表這兩首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集中反映」。其實，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社論中用一首詞的「到處鶯歌燕舞」來比喻大好形勢，可惜該詞是毛1965年寫的，「鶯歌燕舞」都是說的「文革」前。所以毛對美國客

4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31。

人提及此並不感興趣，只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他關心的是社論還公布了他不久前批評「三項指示為綱」時所講的一段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毛澤東口齒含混不清但神態堅決地對美國客人說：「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吐出：「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同時關注著這兩首詞的，還有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周恩來。鄧穎超來醫院看望他時，帶來了毛澤東剛發表的兩首詞。元旦後的頭兩天，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精神稍微好一點，幾次讓身邊工作人員把這兩首詞唸給他聽。讀到毛澤東罵赫魯曉夫的那句「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周恩來露出了笑容，喃喃自語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41]

從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後，周恩來已無力再干預時局，他很少言語，一個人在牀上望着天花板，心事重重，偶爾發出長長的一聲歎息。在病榻上，他叮囑葉劍英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指「四人幫」）手裏；還要葉劍英去勸鄧小平不要硬頂，「再去找主席談談」。12月8日，王洪文來看望他，周提醒王要記住毛澤東關於「江青有野心」的話。同一天，鄧小平來看望他，周恩來問鄧小平：「態度會不會變？」鄧答：「永遠不會！」周聽了以後，「從內心感到高興」，說：「那我就放心了！」[42] 令人費解的是，周恩來問的是甚麼態度？如果說是堅決與「四人幫」鬥爭的態度，但周一直對此憂心忡忡，恐怕是周在認為大勢已經無法挽回的情況下對鄧小平的最後鼓勵。

周恩來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裏，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工作人員覺得曲調太悲傷壓

41 曹衛東：《紅病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368。

4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30、431。

抑，不想給他放，想換支輕鬆點的曲子給他聽。但一換不同的曲子，臥牀不起的周氏就覺察出來，用微弱的聲音問為甚麼不放？堅持一定要放下去。[43]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的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

1月9日，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訃告，沉痛宣告：

> ……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時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八歲。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早在1975年11月中旬，汪東興和紀登奎已經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小範圍會議，根據中央指示，安排準備周恩來的後事。會後起草了訃告和悼詞初稿。1976年1月8日下午3時，鄧小平主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了事先起草好的訃告。由於悼詞初稿中的簡歷不完全，鄧小平要求等修改好了再討論。

用今天的標準看，訃告的評價顯然遠遠不夠分量，對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領導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偉大貢獻，沒有隻字寫到，反而寫進了「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勝利」、「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一類套話。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屬不易，至少沒有像二十天前去世的康生訃告那樣，還寫到「堅決批判王明、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一類語言。何況，人們關注的並不是文字中的形式，而是心中一個形象的倒下。從新中國成立的

---

43 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座談會記錄，1980年11月26日。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97。

1949年起，他擔任總理職務已經二十七年了，中國人已經習慣於用「總理」來稱呼他。這個位置一旦出現真空，引起的震動不僅僅是因為政治上的缺失，而且是心靈上的失落。消息傳開，城鄉人民都沉浸在默默、凝重的哀痛之中。這是「文革」以來，人們的感情第一次得到機會宣泄。悲痛溢於言表。

毛澤東同樣陷入痛苦。張玉鳳回憶說：

> 1976年1月8日，主席知道總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時而哭，時而要趕人。
>
> 中央擬好了有關周總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併送主席審閱。中央考慮到主席病重，便沒有安排毛主席參加有關周總理逝世後的一切活動。毛主席審閱這個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甚麼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裏，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主席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心裏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傷感中的主席，這時，一隻手舉着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也走不動了。」聽到這裏，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萬狀的毛主席，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淚水……我後悔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44]

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卻有相反的說法：毛澤東在當天晚上讓放炮竹慶祝周恩來之死。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毛讓身邊工作人員放炮竹是在1月30日即除夕的晚上）。令人疑惑的是，曾經擔任過官方周恩來研究工作領導要職的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引用了大量有關周

44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恩來的第一手真實檔案的《晚年周恩來》，為甚麼在描寫周恩來去世後的毛澤東，會引用下面那種不屬實的網絡傳言：

> 毛澤東決定讓悼周的活動降溫，除了他本人拒絕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外，還在下面報送的一份動態反映上批了六個字：「悼念虛，復辟實」。
>
> 從幾年前披露出來的汪東興私藏毛澤東在這期間的談話記錄中，也可以得到印證。這裏僅照錄一則：毛在1976年1月12日說：「為甚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力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過不少於十次，不要勉強，建議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參加。」[45]

上述言論不僅不見於任何檔案和線索，而且不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痛苦心態和身體狀況。

毛澤東這時候的痛苦，首先是因為失去了一個多年的親密合作伙伴。當然，毛對周也有不滿。比如，張玉鳳回憶：「有一次，我問主席，總理這麼好，你怎麼不選總理當接班人？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個砍刀的動作，說：總理雖好，缺少這個。」[46]這段話說明，毛對周的基本認識是「總理雖好」，而且是比較一貫的評價，否則張也不敢以「總理這麼好」為理由而大膽提出不該她提出的接班人疑問。因而像上面那種所謂1月12日的話語，應該是後人模仿毛口氣的編

---

4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602、604；所謂「汪東興私藏毛澤東的談話記錄」原出於香港並非學術雜誌的《爭鳴》1999年第9期。筆者以為，高著中凡有資料出處註釋的內容，都比較可靠，反之則值得懷疑。值得注意的是，其有關周的史料，無不詳註其檔案來源，甚至註明「手稿」，惟獨對這些描寫毛澤東有「反周」態度的地方，無一字註釋。這不能僅僅用高氏只曾任官方周恩來研究專家，不掌握毛澤東有關檔案來解釋。

46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造。無庸諱言，毛、周兩人之間也曾有着尖銳的鬥爭，但從毛澤東一貫主張的「矛盾論」意義上說，這種鬥爭也是互為依存的表現，是組成一對矛盾的必須條件。因此，毛從周逝世此刻應當聯想到的，是一個時代包括他自己時代的結束。所以，他流着淚對張玉鳳說，我的時間也不多了。這是真實的感情表達。當然，毛澤東對周恩來逝世，確實沒有留下甚麼文字的特殊表示，以至張玉鳳也遺憾地認為，僅僅在報告上圈閱，這個圓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確實是弱了，太弱了……這一筆怎麼能表達得了對與自己風雨同舟幾十年的戰友的離別之情呢！」[47]

其次，當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靠人餵，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連接見外賓後站立起來一下都困難，行走更是舉步維艱。張玉鳳回憶說：

> 他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志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只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只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48]

近期得到接見的外賓都有共同的感受，認為毛的時間不長了。這在國際上是無法隱瞞的，但國內的絕大多數人雖然都不知道，但是也看到了電視和《新聞簡報》記錄片中經過修飾的毛澤東——頭完全歪靠在沙發背上，雖然蒼老卻仍然不肯就範，勉力表露一下滯呆的笑容。這種狀況，使毛不願意參加使身心都容易受到很大傷感打擊的故舊追悼會，也是合理的。

---

47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48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從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開始以各種方式沉痛弔唁周恩來。國際反應強烈，聯合國當日下了半旗。[49]消息剛剛廣播，就有不少國家領導人準備動身來參加葬禮，包括阿爾巴尼亞的中央書記謝胡或阿利雅、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等。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仍然按毛澤東批准的方案，一律不請外賓參加。

在討論周恩來喪事過程中，治喪辦公室建議請在外地的四位政治局委員李德生、許世友、韋國清和賽福鼎也來京參加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江青、張春橋厲聲責問：「你們甚麼意思？你們是不是還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也都叫到北京來呀？」當治喪辦公室提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弔唁活動，時間安排五天，人數安排六萬時，「四人幫」又極力反對，硬是把時間壓縮為三天，人數壓縮到四萬。

1月11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送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靈車由王洪文護送，車隊長達五十多輛。首都百萬群眾，包括老人小孩，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東、西長安街兩側，在嚴寒中揮淚送別周恩來的靈車。不少群眾在目送靈車遠去後，又乘坐地下鐵路趕往八寶山公墓外，再次哭送。場面極為悲壯感人。

留下的第一個難題是，誰來在追悼大會上給周恩來致悼詞？按照治喪委員會名單，沒有按姓氏筆畫排列的最前一行是：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前四人是副主席，後兩人是常委。理應由王洪文主持，葉劍英致悼詞。但是，葉劍英提議鄧小平來致悼詞。張春橋反對，但葉劍英堅持，後來也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葉劍英要利用最後的機會，為鄧小平撐一把腰，至少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形象。事實上，這也是鄧在被打倒前最後一次在媒體上公開露面。

---

49 流傳很久的一則消息是：1月8日聯合國決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當有的成員國代表表示反對時，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說：「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總理終身只有一個夫人？有哪個國家的總理終生受人民的愛戴？在國外銀行無一分錢私人存款？」反對的人無言以對。見鄭謙、張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第三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454。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屬實，聯合國下半旗是對所有國家元首的禮儀。終身只有一個夫人和沒有國外存款的也不僅僅是周恩來。

人們關注的追悼大會，於1月15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臂佩黑紗，沉痛而凝重地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了經他修改的悼詞：「今天，我們懷着極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同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衷心地愛戴他，尊敬他。」「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這些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去世人物中最高評價。字數不多的悼詞還特別寫了一件小事：「就是在病情十分嚴重的時候，他還一再聆聽今年元旦發表的毛主席的兩首光輝詩篇。這充分表現了他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這實際上是表示，周恩來的態度至死未變。不給其他居心叵測者利用「遺囑」、「遺言」等流言「做文章」的空隙。

隨後，周恩來的骨灰被安—2型飛機撒在祖國的江河山川上。原計劃由鄧穎超親手撒在周恩來常年工作的北京西郊玉泉山的泉水中，但因為玉泉山已無水流，汪東興與鄧穎超商議後，經過鄧小平報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批准，改為此方案。

2 華國鋒坐收漁利

周恩來去世後，全世界都關注的是由誰來接替國務院總理的職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年以來，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問題。按照國務院副總理分工，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接替理所當然。但是，持續兩個月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使這種選擇已經不太可能。如果按副總理排名的次序，下一個是張春橋。「四人幫」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上海有人迫不及待地貼出了大標語：「堅決要求張春橋當總理！」[50] 卻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

50 該標語立即被人改為「張春橋堅決要求當總理」，成為一樁笑料。

讓毛澤東雪上加霜的是，他晚年大談接班人的重要性，卻沒能在臨終前看到自己手創黨的安定團結局面，而是繼選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之後，又陷入了選擇接班人的困境。這次的難點在於，由於周恩來的威望，國務院總理的地位，在中國實際高於一般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選擇總理，實際上就是有選擇未來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分量。他被迫長時間思考。當然，也不是剛開始思考，畢竟周恩來的病情早已提出了這個問題。

早在1975年1月確定四屆全國人大組閣成員時，毛確立的格局是：王洪文主持黨務工作，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按照這個分工，我們猜測，他的身後安排是：「文革」派的王洪文任中央主席，務實派的鄧小平任國務院總理，起到兩人即兩種政治勢力的平衡作用。後來隨着對王洪文的逐漸失望，他又有所調整。張玉鳳回憶，毛澤東曾多次跟她說：為此事傷透腦筋，林彪是他選的，王洪文是他選的，都不行呵！

毛澤東在一次談到劉盆子的談話中，說：我死了以後，接班人，鄧小平。之後是張春橋，王洪文。大家有意見嗎？鄧小平散會出來卻對李先念等人說：我是掩護過渡，不接班。我只幹五年，五年之後，是紀登奎。他明顯表示了不讓張接班的意圖。當然，紀登奎顯然也沒有得到毛的高度信任。早在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在武昌東湖賓館與河南領導人談話時，特別問道：有人對我說，紀登奎在河南犯了甚麼錯誤。這個人怎麼樣啊？有個河南領導人回答說：紀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現很好。要說犯錯誤的話，就是有一段時間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復舊」，跟山東的王效禹一樣，有「反復舊」那種思想傾向。據稱，毛澤東聽後，當場說道：紀登奎這個人接班，今後還要再看一段。

毛澤東看到，繼續扶鄧還是選張，都會打破他設想的平衡格局，於是把視野擴大到政治局成員。「那些天，主席醒來也不先聽文件了，總是在扳手指頭，考慮問題，還不時問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51]

---

51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在這期間，他還在繼續努力爭取鄧小平承認錯誤。鄧仍暫時留在原來的崗位上，中央和國務院的許多重要事務（包括周恩來的治喪工作等）還是由鄧小平具體負責。

1月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第二次檢討。會後，他給毛澤東寫信，表示「對我批判的會議，還要繼續開，我除了繼續聽批判外，還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面陳述對於自己錯誤的認識，聽取主席的教誨」。[52]並將寫的書面檢討附上。但是，毛澤東仍然沒有見他。1976年1月12日，毛澤東建議印發鄧小平的兩次書面檢查，並指示將這件事「暫時限制在政治局範圍」。[53]隨後，他又批准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1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第三次做檢查。「四人幫」追問他，為甚麼提出要見主席？鄧小平回答，要向主席當面陳述自己對於錯誤的認識，同時提出自己的工作問題。他說，「我覺得這樣的要求是正常的，現在仍有這樣的希望。」他還說，不講階級鬥爭是他的「舊毛病」。「根本立場錯了，具體工作就會錯」。「四人幫」又追問他，他1968年在《我的自述》中的檢討是否認賬。鄧小平回答：仍然認定我檢討的全部內容。他隨即向中央政治局宣布：「我是一個不適應於擔任主要負責工作的人。」

當天夜裏，鄧小平致信毛澤東：

> 我兩次要求面見主席，除了講自己的錯誤和主席的教導外，實在想說說我的工作問題。批判時提我的工作問題是否妥當我自己十分猶豫。提，怕覺得我受不得批評。不提，也有甚麼懲罰之嫌。再三考慮，還是想當面談這個問題好些。再不提出會影響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過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請予以批准。我是一個不適應於擔任重

5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36。

53 毛澤東對七機部舒龍山來信的批語，1976年1月12日。

要工作的人。自己再不提出，實在是於心有愧。至於我自己，一切聽從主席和中央的決定。[54]

1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匯報時表示：「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意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毛遠新心有不甘地說：「還要創造條件，看實踐怎樣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講向主席陳述自己錯誤，聽取教誨外，還想講自己的工作問題。」毛澤東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毛遠新又問：「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毛回答：「對。」[55]

接着，毛遠新問：「上次主席講徵求幾個人的意見，華、紀、陳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回答：「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此後，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這樣，毛澤東終於對總理人選作出了臨時決定——華國鋒。

對此過程，張玉鳳有詳細回憶：

一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他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有甚麼考慮？主席想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然後，主席就又扳着手指數政治局委員的名字，最後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毛遠新點頭說是。就這樣，主席提議華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遠新出來時對我說：幸虧他先去了（指周總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選好了。這是大事。

後來，毛遠新又來向主席匯報說：他把主席的指示向王洪文、張春橋傳達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張春橋則沒有

54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6年1月20日。

55 毛澤東同毛遠新談話記錄，1976年1月21日。

甚麼表示。在政治局傳達時，大家都認為主席看人看得準，選得好。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很高興。後來江青也打電話來，讓我們報告主席說：華國鋒這個人，主席選得好，他兩邊意見都能聽，她對主席的這項決定很滿意。汪東興也特意來見主席說：「主席選華國鋒同志選的實在好，我舉雙手贊成！此項決定，大家都很滿意。你要吃好、睡好，其他事，我們來辦。」主席聽後，非常興奮，說華國鋒不但有地方工作經驗，省委工作的經驗，還有中央工作的經驗。[56]

雖然對立的兩軍對毛澤東的決策都不甚滿意，但至少都鬆了一口氣。毛遠新、王洪文、江青表示支持，是認為至少把鄧小平拿掉了，而且華相對比較好對付。張春橋則明顯是失望。

華國鋒，本名蘇鑄，1921年2月16日生，山西省交城縣人。這時候離滿五十五歲生日還差半個月。他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年才十七歲，是個典型的抗戰幹部。曾任區游擊隊隊隊長、縣抗聯主任、縣委書記，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所以後來被歌頌為華政委。1949年隨南下工作隊到湖南，任湘陰縣委書記。後長期擔任毛澤東的老家湘潭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被毛澤東稱為「父母官」，回湖南總要找他來詢問情況，有了老實人的印象。「文革」前夕，華已經是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受到「文革」衝擊，十分不理解，和造反派對立情緒嚴重。後來得到周恩來的點名，才在乘飛機上北京途中勉強表態，獲得解放，被造反派譏為空中「亮相」。後來，他歷任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省委第一書記。1971年調中央工作，進入國務院業務組。1972年曾經為貫徹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進行經濟調整及對外引進出過大力。1973年進中央政治局，分管公安部和衛生部，都不算要職。

---

56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華為人忠厚，是個埋頭抓業務的幹部，尤其是對農業上心。這點使毛澤東又喜又憂。1969年毛澤東回湖南，華向他長時間匯報農業，毛有點不耐煩地說：你是滿腦子農業，我是滿腦子路線。這時候想到華任代總理，顯然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標準有了改變，感到不能光看能力，如王洪文、鄧小平精明，王輕浮，鄧「調皮」，都不可靠。而華，自認為不聰明，卻是個老實人。他有縣、地、省和中央的工作經驗，也是重要資本，是王洪文甚至張春橋不能比的。更重要的一條，是華韜光養晦，從不出頭，是「文革」派和務實派都能接受的人。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關於華國鋒、陳錫聯任職的通知：

>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57]

事實上，葉這時候並沒有生病，毛的考慮，一是擔心華面對葉的老資格不好工作；二是要迅速培養陳錫聯，成為輔佐華的中央軍委負責人。此事後來也造成一些誤會，使陳錫聯在「文革」後被蒙上「奪權」的指摘。真正不滿的是張春橋，次日，他在日記裏寫道：

>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甚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57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58]

當然，張的矛頭並不是華，而是去年一號文件被任命為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但是，字裏行間也透露出一些對毛安排的失意。2月7日，華國鋒首次以國務院代總理的身份出面接見外國駐華使節。幾天後，針對海外媒體一篇報導中說中國「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的說法，姚文元在日記中不滿地發問：「經濟工作甚麼時候能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領導呢？」[59]

3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全面鋪開

鄧小平停止中央工作，華國鋒上任，標誌着對鄧的批判不再留情，正式升級，而且株連到葉劍英和李先念。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檢查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的報告，報告提出當時鄧小平、葉劍英「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兩個講話是有錯誤的。建議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3月1日，紀登奎召集財政、商業、外經等各部部長會議，宣布經毛澤東批准的中央決定，在李先念養病期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素文負責主管財貿各部委和外經部的工作。

經毛澤東批准，從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打招呼」會議，傳達「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並部署各地各部門的運動。

這是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聽取毛遠新匯報時的多次談話，經過毛遠新整理和毛澤東審閱批准，是毛澤東晚年最重要的理論闡述和總結。3月3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發。主要內容，按照毛遠新整理時的提綱，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

58 張春橋日記，〈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末尾詩為宋人王安石的〈元日〉。

59 姚文元日記，1976年2月16日。

一、階級鬥爭為綱。毛澤東說：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甚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甚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甚麼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麼？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甚麼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甚麼呢？作了大官，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

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麼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這些指示，清晰地反映出毛澤東晚年關於階級鬥爭認識的一個重大變化。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後，他就在苦苦地探尋，當生產資料幾乎全部公有制以後，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階級已經不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矛盾是甚麼？劉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共八大政治決議提出，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是落後的生產力與先進的生產關係的矛盾。毛澤東對此不認同，在八大之後不久就予以推翻，重新提出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矛盾。但是，對於甚麼是資產階級？他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思考，終於確認，就是黨內的帶有資產階級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特權階層，他們的產生根源，是馬克思、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法權和小生產的存在。

由此，他發動「文革」之初就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重點打擊對象。但是，直到「文革」末期，黨內許多人對於階級鬥爭對象是誰仍然感到惶惑。李先念在政治局會議上，檢查自己思想時曾經說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看不清資產階級在哪裏了。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回答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和他在民主革命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把國民黨、地主、富農、資本家、現行反革命分子等當作階級鬥爭主要打擊對象的舊階級鬥爭理論，完全不同的論斷。

應當說，毛澤東的這個論斷朦朧地感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執政的特權階層與下層人民的矛盾將要激化，成為主要矛盾：「作了大

官，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但是，他卻給其戴上了「資產階級」的帽子。

二、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毛澤東說：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摘。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麼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甚麼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只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

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三、當前運動的方針、政策。毛澤東說：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在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麼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

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60]

這些指示，表現出毛澤東晚年對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反思和結論。他承認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否定了早期的紅衛兵造反派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又強調要執行一些政策，如：運動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等等。實際上，毛澤東是對自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最本質的部分——即後人公認的1966年至1969年三年階段，從方式方法、依靠對象、發動範圍、有關政策等方面，予以了否定。他所強調的文化大革命的七分成績，實際上只是後期教育革命和意識形態僅存的一些表面現象罷了。無論從性質還是程度，都不佔七分。要達到這些目的，根本無須發動「文革」初的三年狂飆。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已經悲慘地無可奈何地承認，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失敗了。

60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86－490。

華國鋒主持「打招呼」會議，並發表了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毛澤東審閱的講話，他的講話調子還是比較穩妥的，主要內容是：「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各級領導，要站在運動的前列，特別是在右傾翻案風中，受鄧小平同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犯有錯誤的一些同志，要帶頭揭發、批判」。「以這次會議打招呼為界，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方，應轉好彎子。這次會議後，還不轉過來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歷史舊賬」，「不要糾纏枝節問題」。對犯有錯誤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整個運動要根據毛主席指示，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但是，江青看到火已經點起來，就急不可待地跳了出來。3月2日，她擅自召集了十二個省區負責人領導人會議，大放厥詞：

>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內幕，……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四月底一直鬥我到六月。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人家揭發了，一個就是他那個政治研究室，胡喬木，這是一個壞人。……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他無組織無紀律，不報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襲擊。因為我怕影響團結，我就都擔起來。
>
> 鄧小平欺負主席呀，造謠誣衊主席呀，殘忍啊！法西斯啊！……鄧小平這樣欺負主席，這樣殘忍，我不能說了。（抽泣，哽咽）我們都沒有責任保護主席嗎？……他要是上台，像我這樣的人，那是千百萬人頭落地。……不過我這次也要保護自己一點，不能隨便叫他們殺頭，搞死。向來我身上沒有一點兒錢，現在帶那麼幾十塊。（從皮包中找錢）噢，這次又沒帶。
>
> 鄧小平把咱們的原油，咱們的石油，連煤炭，棉布統統壓價出售。這些都是去年冬天幹的。……所以我說他是買辦資產階

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叫他漢奸，正確不正確？我們的主席還在保着他啊，我說話是我個人的意見。

鄧小平幹我，是有政治陰謀的，是對主席。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目的是誹謗主席嘛。還有比這個還厲害的，我就不能說了。這個事情涉及到主席，你們也不要去擴散。……[61]

除了近於狂亂的這個講話，江青還要求將「風慶輪」問題材料印發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閱，並給華國鋒寫信：「這是對鄧小平同志的一份揭發，是我們和他的一次較大的鬥爭，應讓同志們知道。」早在打招呼會議前夕，張春橋、姚文元就秘密來到京西賓館，和毛遠新一起，找到上海參加會議的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及冶金部的陳紹昆等人，煽風點火，要他們向鄧小平開火。但是，江青的這種胡言亂語講話，讓張春橋也很惱火，不滿地對姚文元說：「你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書記會上去了？……他們還會講出甚麼好話，無非惹些麻煩，讓我們也跟着受牽連。」[62]

果然，當華國鋒不露聲色地把江青講話送到毛澤東那裏後，3月10日，毛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單獨召集十二省講話。」他還要人轉告華國鋒：江青的這個講話是不對的。對江青要求印發「風慶輪」問題材料一事，毛澤東批示：「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63]

---

61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2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25日。

63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但是，當批鄧運動起來以後，毛澤東發現「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沒有正式發言，只有插話，就要毛遠新傳達：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們應該發言嘛。[64]於是，江青找到毛遠新，說政治局會議開得冷冷清清，應該請兩校的人來面對面地批判鄧小平。毛遠新同意，說「要給政治局透點新鮮空氣」。[65]於是，3月26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清華、北大匯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情況，由周家慤等人主講。會前，遲群、謝靜宜做了精心策劃，把原來發言針對第三人的口吻改為對鄧小平的「你是一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讓你們一夥人死了心吧！」[66]

會上，兩校人員和遲、謝一夥輪番上陣，當面斥責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總經理」、「敗家子」、「洋奴買辦」、「是黨內外一切新老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總代表」、「一貫倒騎毛驢向後看，搞復辟倒退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也不斷插話支持鼓動。謝靜宜說：「75年第三季度，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這個時期在八寶山給三十二名在文革中自殺的老幹部開了追悼會，去參加追悼會的人很多，還有不少是坐着大紅旗轎車去的。」謝站起身，指着對面的鄧小平厲聲質問：「你是不是參加了張霖之的追悼會？」

鄧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沒吭聲。

謝更氣急敗壞地叫道：「鄧小平！你為甚麼不回答！」

王洪文接着說：「賀龍的追悼會，周總理也去參加了，本來政治局並沒有安排他去嘛，可總理聽說給賀龍開追悼會，就自己從醫院跑去了。」

江青喊道：「你們這是向黨和群眾示威！是復辟翻案的典型！」

鄧小平始終一言不發，神態自若。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但正像「四人幫」事後不滿地說的「沒怎麼發言」。

---

64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25日。

65 周家慤交代材料，1979年12月3日。

66 清華大學黨委揭發材料，1980年8月20日。

遲群惱羞成怒地責問：「鄧小平，你不吭聲就是頑固對抗！」江青說：「你們是少見多怪呀！政治局每次開批鄧會他都是這個樣子，死豬不怕開水燙嘛！」[67]會後，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當時態度不好」，「一句話也不說，最後連個態度也不表。」[68]

就在這次會議進行途中，負責分管新華社的姚文元被叫了出去，回來後有點神色慌張地和王洪文、張春橋耳語一番，就宣布散會，政治局成員留下研究「重要事情」。

這個重要事情，就是南京發生了悼念周恩來、張貼攻擊「四人幫」標語口號的大規模群眾遊行示威活動。

三　「四五」運動：真正的群眾造反

1　壓制悼念周恩來活動點燃導火索

宿敵周恩來的逝世，是值得「四人幫」一夥暗中高興的事情。但是，正在進行的矛頭指向鄧小平的「教育革命大辯論」，卻有被沖淡的可能性。因此，出於本能，控制新聞輿論工具的張春橋、姚文元必然要降低悼念周恩來帶來的影響。

1月9日，新華社請示有關周恩來逝世報導的事宜，姚文元指示「沒有報導任務」，各國唁電「不能佔版面太多」，「唁電的標題要縮小」，「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字樣」。1月13日，姚又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提出「國內消息、綜合消息，字太大，要縮小。總理不要突出。」「不要登廣場群眾悼念的場面」，「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登些抓革命方面的東西」。[69]「文革」之初

67　周家懋交代材料，1979年12月3日。

68　毛遠新交代材料，1980年8月3日。

69　《人民日報》社黨組揭發魯瑛的材料，1979年8月。

追隨張、姚批判《海瑞罷官》起家的魯瑛，心領神會，在宣傳中縮小周恩來的照片，減少國內外悼念活動報導，1月9日至15日周恩來逝世後的六天裏，只發了兩條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與首都各界代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消息。

1月14日，周恩來追悼大會的前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通欄標題，發表了清華大學〈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本報記者報導，第一句話就是：「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着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結尾又說：「連日來，大批熱情洋溢的信件紛紛寄來。廣大工農兵表示，要以實際行動支持清華的革命鬥爭。」

這種明目張膽與當時廣大人民群眾沉痛悼念周恩來氛圍唱反調的宣傳導向，當即招來了許多群眾的電話斥責：「你們對總理是甚麼感情？！」魯瑛就布置記錄對方的姓名和單位，並且整理成材料〈一些人對十四日《人民日報》報導版面的意見和攻擊〉，編發在《情況彙編（特刊）》上報姚文元，姚覺得太引人注目，把標題改為〈一種值得注意的動向〉。

1月26日，人民日報社新聞研究所編輯了一期悼念周恩來的《報紙動態》專刊，專門介紹周恩來的歷史功績，把清樣上報姚。29日，姚給報社打電話，氣勢洶洶地責問：「你們是翻案嗎？要反革命嗎？」並且要魯瑛進行追查。[70]

對此，姚後來也不得不承認說：〈大辯論帶來大變化〉「這篇文章是我批的。……這一段沒有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重點文章，本來群眾、幹部有抵制，反擊右傾翻案風就搞不下去，如果再拖一段時間，反擊右傾翻案風就更沒有了，不想沖淡、中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導。所以就決定14日登在《人民日報》頭版。我沒有想到會沖淡第二天的追悼會。……我當時對群眾打電話是不滿意的，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覺得他們不能代表廣大群眾。」[71]

---

70 《人民日報》社黨組揭發魯瑛的材料，1979年8月。

71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24日。

比文字報導更能刺激人民感情的，是向周恩來遺體告別時，電視上出現的江青公然不摘帽子，而且左顧右盼的鏡頭，極大地引起了觀眾的憤怒。筆者觀看電視時，周圍人都憤怒地喊：「摘帽子！摘帽子！」江青為甚麼要這樣公然挑釁？這只能用她非正常的女人心態去解釋。

與周恩來逝世同時，人民的抗議「四人幫」活動即已揭開序幕。1月上旬，中國輕工業進出口總公司一位司機寫出〈致北大、清華大批判小組的一封公開信〉，怒斥他們是「一小撮假馬克思主義分子」，「打着紅旗反紅旗」，已經「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2月中旬，中央廣播事業局共產黨員竇守芳在傳單中指出：「張、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艦隊，是陳伯達式的政治騙子，他們欲把大批老同志置於死地而篡黨奪權」，號召：「全國人民緊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向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流進行堅決鬥爭」。2月至3月，在福州、武漢、太原、鄭州、長沙、杭州等城市先後出現批判「四人幫」的傳單和大字報。

最後被點燃的導火索，是3月25日的《文匯報》，被稱為「325《文匯報》事件」。

這天，《文匯報》在第一版發表的〈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文章中，以引用上海市儀錶局黨委副書記戴夢鰲話的形式，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句子。文章刊登後，廣大幹部和群眾憤怒地質問和抗議，認定為是明目張膽地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報社收到的抗議信、電報達四百多件，打去的電話上千次，紛紛指出：「反周總理的人不得人心！」質問《文匯報》「成了誰家的報紙？」要求《文匯報》「向全國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

其實，「文革」後文匯報社查明，編輯加工成該句子的，是一位老編輯，平時對極左做法有所不滿，與「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沒有關係，更沒有接到特別指示。這確實是一起偶然事件。當時馬天水調查後為上海市委喊冤，也是實情。

但是，這種說法確實會給人造成是攻擊周恩來的印象。因為，3月3日，經姚文元精心修改的《人民日報》文章〈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已經把不點名地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定性為鄧小平。那麼，要把鄧扶上台的是指誰呢？不言而喻。何況，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正是「文革」中提倡的手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怪不得群眾。更何況，「四人幫」確實有壓制悼念活動甚至攻擊周恩來的表現。只能說，「325《文匯報》事件」，是偶然中的必然。不在這裏爆發，就在那裏爆發。

另一個導火索，是周恩來去世後不久，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着一個「周恩來總理臨終遺言」，主要內容有：

>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症已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去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匯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其下的兩段，分別是對毛澤東的關心和對朱德、葉劍英的關懷。最關鍵的是對鄧小平的另一段：

>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關於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顯示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志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甚麼困難都會克服的。

以下是周感人肺腑的緬懷英烈和對未來必勝信心的話語。最後，對自己的後事提出請求：將病情告訴全國，追悼會毛不要參加，請鄧小平致悼詞，骨灰撒掉。

3月底，中央以公安部名義發出緊急文件，追查這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但是，在追查中，各地報告說「遺言」繼續在擴散，到4月初，除了西藏、新疆等偏遠省份外，已經在大半個中國都發現有估計總數達百萬份的流傳抄本。僅安徽一省就查出6935份，尚未清理

完又上繳來3028份。十多家外國及香港的廣播電台都播發了「遺言」的消息。5月5日，「遺言」一案終於破獲，編寫者——杭州汽輪機廠的二十三歲工人李君旭被捕。他坦然承認「遺言」是自己於2月初編造的，沒有其他人商量、參與和修改，[72]但是，公安人員不肯相信。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對此事開會專門討論，張春橋對公安部說：「你們現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沉在水底的你們沒有發現。」華國鋒決定，由鐵道部派專列，將李和其父親、同學共七人押解到北京，反覆審問追查後台。但直到「四人幫」被粉碎，仍無結果。[73]

平心而論，這個「遺言」並沒有甚麼秘密的揭示，在人們中廣泛流傳，是因為其借周恩來之口吻，說出了人民對鄧小平工作的高度評價，也就是對當前批鄧的強烈不滿。「遺言」在4月的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風暴中，起到了強烈的催化劑作用。

風暴首先從南京颳起來不是偶然的。在地域上，南京與上海歷來有矛盾。上海工業發達，人均收入較高，但副食品都要靠周圍的江蘇省農村供應。由於1970年代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合理的剪刀差，江蘇人認為受到了上海剝削。兩地人關係一直不好。「文革」中，代表老幹部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代表「文革」新貴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勢同水火，兩地矛盾發展到政治上持續緊張。1967年上海爆發「四一二炮打張春橋」群眾風潮，背後就有許世友的支持，搞得張春橋險些身敗名裂。其後，張春橋又挑動造反派衝擊許世友。弄得許面見毛哭訴。毛澤東出面來調解，讓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政委，把許世友調往廣州軍區，但是南京軍民仍然不把張放在眼裏。

---

72 楊匡滿：《「遺言」製造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頁2－32。1977年11月3日，公安部給李君旭的結論是：「政治影響極壞，並有攻擊偉大領袖的言論，問題性質是嚴重的……」鑒於「有反對『四人幫』的一面，……所以屬於嚴重政治錯誤，解除保護審查，回原單位工作……」。1979年12月7日，公安部再次作出覆查結論：「李君旭是積極反對『四人幫』，製造所謂『總理遺言』，係出於悼念周總理，但其做法是錯誤的。現按中央精神，決定撤消本部1977年11月3日的審查結論。」

73 施義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未刊稿，2002。

1976年3月下旬，南京街頭出現學生和市民自發舉行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集會遊行，人們打出「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的標語。3月28日，南京大學數學系的四百多名師生抬着周恩來遺像和花圈，通過繁華鬧市新街口，前往周恩來當年住過的梅園新村悼念。沿途，不斷有市民加入，遊行隊伍浩浩蕩蕩。3月29日至31日，南京大學學生在街頭公開貼出了「《文匯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不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誓不罷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等標語。他們還把「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等大字標語，用醒目的白漆刷在火車車廂上，傳向四面八方。

南京動向引起了「四人幫」的驚恐。3月27日，姚文元在日記裏憂心忡忡寫道：

> 南京冒出一批針對上海的大字報，還有「揪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反對搶班奪權」一類標語，據說弄了一批學生（大多是高幹子弟）上街。
>
> 這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表現。每次運動發展到一定時候，反動勢力都要跳出來「示威」一番。也好，讓革命群眾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軟弱了。
>
>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清明節將要到，發現南京、北京、太原都有藉此搞「悼念」總理的活動而鬧事的苗頭。[74]

3月30日，王洪文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着中央的」，「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4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

---

74 姚文元日記，1976年3月27日。

（一）據了解，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們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對有關群眾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

（二）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

（三）所謂總理遺言，完全是反革命謠言，必須闢謠，並追查謠言製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衝擊鐵路。[75]

這些「搗亂、破壞」、「別有用心」、「徹底追查」、「反革命謠言」的用語，立即把群眾活動推向了對立面。本來，自從「文革」開始，清明節已經基本變成「四舊」而廢棄，沒有多少人集中去掃墓。但是，周恩來的逝世和「批鄧」，又將這一民俗變成了沸揚民意的機遇，其中不少人是有意要表達自己對當權者做法的藐視才採取行動的。

2 「四五」狂飆席捲中華大地

3月19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朝陽區牛坊小學紅小兵獻上了第一個花圈。3月30日，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曹志杰等二十九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第一張公開署名的悼念周恩來的悼詞，決心繼承周總理遺志，「同野心家、陰謀家血戰到底」。其後，湧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愈來愈多。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放滿了花圈、花籃，松柏上、燈柱上貼着數不清的詩詞、悼文和傳單，遠遠看去白茫茫的一片。還有不少人聚集在那裏，傳抄、討論甚至朗誦詩文。

---

75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使用詩文是一個奇特的方式。在中國歷史上，利用民謠和反詩發動群眾反抗風潮的做法屢見不鮮，最早稱為揭帖。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的「大楚興，陳勝王」，到元代的「石人一隻眼，挑動天下反」，再到晚清洪秀全製作的多首「平清妖」詩。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鮮見再有。包括反右和「文革」的奉旨造反中，都不曾廣泛使用。雖然那時的大字報裏偶爾也可以看到詩詞題材，但更多的是聲討的檄文和口號。

這時候出現普遍的詩詞，首先是因為其含蓄，不直接點名，卻又意味無窮，不至於被觀看者一下子定性為「反動」而追查。第二個原因，是其蘊涵豐富，感情充沛，正適合悼念周恩來時悲憤而複雜的心情。第三個原因，是其精煉、簡短、順口，易於抄寫和傳誦。

於是，在天安門廣場上，時時可以看到，莊嚴肅穆的氣氛中，一堆堆人群抄寫詩詞，小聲議論時政，不時有人站出來激昂朗誦：「他沒有遺產，他沒有嗣息，他沒有墳墓，他也沒有留下骨灰，似乎甚麼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但是他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4月1日，山西一位青年工人王立山在紀念碑上貼出一首鏗鏘有力的詩：「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哀悼之情逐漸向憤怒、抗爭轉化。4月2日，中國科學院109廠職工的遊行隊伍，用四輛卡車開道，抬着獻給周恩來、陳毅、楊開慧的四個大花圈和四幅大詩匾，上面赫然寫道：「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其後的幾天，廣場每天都陸續有幾十萬人聚集。不少外國駐京記者在現場採訪和拍照。

4月4日是清明節，群眾性悼念和抗議活動達到高潮，據有關部門統計，北京和外地來京的群眾到過廣場的達到二百萬人次，花圈總數在兩千個以上。最大的花圈直徑達六米，是北京重型機械廠為了抗議「四人幫」偷毀花圈而用金屬製作的。整個天安門匯成「花山詩海」。一位北京鐵路分局的青年工人，在一塊白綢子上用自己的鮮血寫下：「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將用鮮血和生命誓死保衛您！」他被人

們抬起來，在廣場上遊走，歡呼。人民已經不滿足於用悼念周恩來來同情鄧小平、用懷念楊開慧來貶低江青的含蓄做法，直接寫出了嘲弄「四人幫」甚至點名咒罵的詩詞，把他們比作豺狼、妖魔、鬼怪、慈禧太后、白骨精。如：

翻案圖窮匕首見，攻擊總理罪滔天。青江搖橋（暗指江、張、姚）閃鬼影，反罷河妖紅霞現。

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

還出現了對毛澤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決策不滿的內容。如：七機部寫的一首小詩〈叫人怎麼幹〉說：

自從去年七一後，面貌大改變。領導下基層，抓綱又抓線。……任務明確方向對，群眾心裏好喜歡。加班又加點、衛星上雲天。結果好話沒聽見，壞話一大篇。甚麼「人頭要落地」，卻成了大災難。這樣叫人怎麼幹？！是不是不幹才喜歡？不，他們是想一手來遮天。三人十隻眼，陰謀篡大權，唯恐天下還不亂。同志們，怎麼辦？我們就是要和他們頂着幹，把他們的陰謀來揭穿！

一個青年在朗誦時故意高聲發問：「為甚麼三個人有十隻眼？」大家要擠在人群中的一個警察回答。這位警察不顧一切地大聲說：「三個人中有兩個戴眼鏡的，加起來不就是十隻眼！」激起了一片喝彩聲。

詩詞中最激烈的，是喊出了打破現代個人迷信、捍衛民主的時代強音，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的崇尚秦始皇。有的標語寫着：「我們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們要周總理，不要佛朗哥，[76] 更不要那拉氏。」

76 佛朗哥（1939－1975），西班牙前國家元首，長槍黨首領，法西斯軍人獨裁者。

廣場北面，是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澤東像；廣場南面，卻是無數白花圍繞着的周恩來像。對峙氣氛使人一目了然。一首〈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說：

>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拋頭灑血，我們不惜重上井岡舉義旗！總理遺志我們繼承，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晚10點多，人群依然不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西側的白玉台階上，裏三層外三層地簇擁着一位女兵，在手電筒的照明下，她用激憤的聲音朗誦着所謂「第十一次黨內路線鬥爭大事記」，直接點名斥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奪權」，「最近所謂的反右傾鬥爭，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動」。宣稱：「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國人民大快人心……」[77]她連續唸了五遍，人們一遍又一遍地爆發出歡呼聲：「好啊！」「蓋了帽！」[78]被暗中傳誦的，還有「鄧穎超聲明」等等虛構的消息。事後看，這份傳單決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事件性質的判斷，並下決心鎮壓。

這前後幾天，天津、武漢、西安、太原、青島、杭州、鄭州、福州、重慶、昆明、貴陽和長沙等地都發生了類似情形。

4月2日前，當局對廣場上發生的情況，還算克制。在廣場東南角小樓設立了一個由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衛戍區的「三聯」指揮部，並沒有對廣場群眾採取大規模打擊行動，只派出便衣警察尾隨到遠處，逮捕了少數帶頭演說者；或者用記錄自行車牌號等辦法通知單位

---

77 《人民日報》社運動辦公室：〈「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陰謀活動〉，1976年12月10日。

78 北京方言，即用籃球蓋帽動作來形容好極了。

處理。更嚴密的部署是，要求各單位緊急傳達說清明節是「四舊」，幹部職工一律不准去。姚文元對這種克制甚為不滿，連續兩天在日記裏寫道：「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個方面、部分）卻總是不徹底。為甚麼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畢竟不是繡花。」「無產階級專政總得有一點『專』的樣子啊！太軟了！」[79]

4月4日當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討論連日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態。華說：「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惡毒的，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煽動群眾，打架。」吳德介紹偵察到的情況說：「在紀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個，單位1400多個單位次，有的不寫單位，有的冒充某單位，……花圈大的有6米直徑，一部分寫給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寫給總理。……最多的是七機部、科學院，其次是四機部、鐵道部、外貿部。北京市：廣播器材廠（761）、曙光電機廠，青雲儀器廠。重型電機廠，送了個鋼焊的花圈。送的比較多的單位，都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這次利用清明節跳出來搞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要追查謠言，深入進行批判。」[80]

中央政治局分析了當前北京的情況，卻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認為：

> 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這也是去年以來大量散布反革命謠言，造反革命輿論準備的繼續和發展，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批經驗主義就是揪總理，（上海馬老的揭發）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社會上吹得更兇，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闢謠。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抬出總理作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編造大量

79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3日、4月4日。

80 毛遠新筆記，中央政治局4月4日會議記錄。

所謂「遺囑」、「詩詞」、「談話」等等東西美化鄧小平，於是誰要批鄧，誰就是反總理了。這種手法頗有些煽動性。

階級敵人猖狂跳出來是件好事，他們只能靠謠言、靠死人來煽動不明真相的人，說明他們日子實在不好過，也沒甚麼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這次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因此也要防止萬一，採取一些必要措施。[81]

起初，吳德匯報說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大問題」，建議把花圈多放幾天，做好群眾的工作，再送八寶山燒掉，大家也同意這樣做。但是，姚文元讀了魯瑛剛送來的情報，說紀念碑西角有人演講罵江青。江青等人立即鬧起來，要吳德立即去抓那人。她又要求「現在已經過了12點，現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了，你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這時，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同意了江青的意見，要吳德馬上採取行動。[82]

4月5日凌晨5時，毛遠新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匯報了廣場清理的過程：

從今晚（四號）開始，清理花圈和標語，估計會有人搗亂，已調了三千民兵在廣場周圍，衛戍區一個營在二線準備，（盡量不用部隊出面）。明天開始，布置民兵圍繞紀念碑，勸說阻止群眾去送花圈和集會，不再允許進入這個範圍。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時）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員的包圍下，抓住了當眾宣讀反革命傳單的人及其保錄。把周圍保護那個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來，進行教育，肅清流毒，其中二

81 毛遠新筆記，中央政治局4月4日會議記錄。

82 採訪吳德記錄，1980年5月12日。

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傳單、材料。群眾基本走散，現場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寶山。進行得還順利。[83]

報告還說：「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麼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中共建國以來沒有的。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毛澤東當天圈閱了這個報告。

4月5日早晨，匯集到廣場的人群發現所有的花圈、詩詞、挽聯都不見了，一些自願徹夜守衛花圈的人也被抓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是戒備森嚴的封鎖線。群眾異常氣憤，以為被收走的花圈藏在人民大會堂裏，數萬人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手挽着手高呼着「還我花圈，還我戰友」口號，唱着國際歌，擁向人民大會堂，與一部分民兵、警察和解放軍戰士發生衝突，雙方都有人受傷。有十幾個人被圍打，其中有兩個是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一個是軍人，他們公開說了「周總理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於是被憤怒的群眾打得頭破血流。[84]群眾高呼「人民萬歲」、「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把公安部門的廣播宣傳車和幾輛汽車推翻燒着。下午，有人點燃了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揮部。樓上有北京民兵指揮部的副總指揮馬小六、張世忠及衛戍區兩個副司令員、市公安局兩個副局長，他們從後門跳窗戶跑出來。

這時候，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正在人民大會堂裏緊張地觀察着外面情況。鄧小平也被叫到場。姚文元當晚在日記裏記述說：

三時散會，我先到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外，看見了廣場全景，四大批人擁來擁去，兩堆火還在歷史博物館外燃燒。我即請政治局同

83 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4月4日討論天安門事件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1976年4月5日。

84 《人民日報》《情況彙編清樣》，1976年4月5日。其中「他們公開說了『周總理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一句被姚文元刪去。

志都上來看一看，在江西廳，大家都來了。……政治局同志看到這一切，無不仇恨滿腔，階級鬥爭是這樣尖銳，這已經是武裝暴亂性質了！[85]

張春橋當面罵了鄧小平，後來他在信中記述說：

這個月，我過得相當緊張。從南京到天安門廣場，到處鬧。四月五日，我到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從望遠鏡裏，看得很清楚。當着鄧小平的面，我罵了他是納吉，他態度惡劣，但沒有話講，只能點頭。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86]

3 鎮壓「四五」運動與撤消鄧小平一切職務

廣場上鬧得如火如荼，一街之隔的中南海裏，毛澤東的病情卻更加沉重。張玉鳳回憶道：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前後，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當時，主席對外面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他病重，動不了，由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支撐着他才能走幾步，就得趕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難，連講話的力氣也沒有，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連我們也不知道。江青、毛遠新為了控制當時的真實情況，曾給我們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同志下了條規定：沒事不要到外邊去。毛遠新還讓汪東興通知我們：現在外邊很亂，最好不要到外邊去，也不回家。[87]

---

85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5日。

86 張春橋給兒子張毛弟的信，1976年4月18日。

87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天安門事件採取鎮壓群眾的行動，毛澤東究竟要負多少責任？這時能常到毛澤東那裏去的，就是毛遠新。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都由毛遠新向他匯報。究竟毛遠新匯報了多少實情，毛澤東表態前是否政治局已經採取了行動？值得研究。張玉鳳說：

凡是毛遠新每次要見他，主席總是很快就見。他反映的問題，主席也喜歡聽。

這些天，毛遠新隨時都來。他說，政治局的同志連夜開會，認為天安門前發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的重演，還說「鄧納吉」這類的詞。政治局還決定將天安門前所有的花圈燒掉，還通過吳德同志的那篇講話稿。這一時期的決定都是政治局議定後報告主席的。主席也無力細問，只能點頭，表示知道了。

4月5日下午2時，中央政治局緊急開會，會前，姚文元已經將昨晚紀念碑前聚眾宣讀的那份支持鄧小平的傳單向中央政治局報告，並由毛遠新轉報毛澤東。姚在會上提議：「此事已帶有反革命政變性質，要立即採取措施，開短會，不要多議。」[88]於是，中央政治局當即決定，晚6時由吳德發表講話，指出這是反革命性質事件，號召群眾離開廣場，然後晚8時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其骨幹分子，予以有力打擊。

至此，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性質，決定採取暴力鎮壓。吳德和倪志福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同志商量，吳忠說：廣場上群眾那麼多，民兵去一定會出問題，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將來誰負這個責任？三個人都很怕，吳忠明確提出了要採取拖的辦法。他說：絕對不能8點出動，只有等群眾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動民兵清場，否則肯定會出問題。

88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5日。

姚文元在日記中記錄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大喇叭還不響，我們很急，一再查問。華國鋒要求王洪文、張春橋、我留下處理。我同意。終於，在6時25分，人民廣場的大喇叭響了，吳德同志錄音講話反覆播放。」[89]

據吳德後來回憶，當時廣播時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字，只說了「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提法。[90]後來公開見報時才點名。見報的講話版本說：

>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
>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
>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91]

晚8點，在人民大會堂觀察的華國鋒、陳錫聯不停地打電話催問為甚麼還不出動民兵。吳忠還是堅持說：廣場上有幾萬人，現在不能出動。兩吳商量好幾條不能馬上出動民兵的藉口：第一，工人剛剛下

---

89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5日。

90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13－214。

91 《人民日報》，1976年4月8日。

班，都是從家裏找出來的，集合遲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東西長安街規定不許通過大卡車），民兵沿途受到阻攔，影響了集合時間。第三，先到的都是商業系統的民兵，女民兵多，她們執行這種任務有困難。其實，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好了。晚上10點半，華、陳又打電話催問，吳忠命令把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全部打開，並再次廣播吳德講話，催群眾迅速離開，但廣場上還有幾百人堅持不走。[92]

晚10時40分左右，[93]廣場四面燈光通通打開，「一萬民兵和五個營戰士三千公安人員帶着木棍把鬧事的人全部包圍」，毆打和拘捕在廣場的群眾。[94]「抓了200多人，放了一些之外，還留下100多人，突擊審訊。」[95]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員開會聽取北京市的匯報，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動」，認為「今天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應「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會議提出要將這次事件「盡快通報全國」，並給予公開報導。[96]凌晨3時，毛遠新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捉了最壞的38個人，前三天捉了39個」。[97]4月6日上午11時，毛澤東對報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當天上午8時左右，江青提着一根木棍來到毛澤東住地，當面向他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張玉鳳回憶說：

> 她走到主席牀前，對主席說：「我來這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瀰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以死

9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15－216。

93 毛遠新報告中寫的動手時間是4月5日晚9時30分，以後幾乎所有著作都按照這一時間。實際上，據吳德回憶和採訪多位在場人，應該是在晚10時40分左右才動手。

94 「文革」結束後，中央曾派小組三次調查了醫院、太平間、火葬場和參加清場的很多民兵。結果說明，沒有死一個人。

95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5日。

9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77。

97 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的報告，4月6日3時。

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主席看了看她，沒有說話。……不多時，毛遠新帶着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關於「四五」的決議，讓主席表態。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後，用紅鉛筆在另一張紙上寫了：「同意，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98]

4月7日上午8：05－9：15分，毛澤東再次聽取毛遠新匯報，毛遠新談到原來是準備打不還手，吃了虧，性質變了，應還手了，並配備了木棍。毛澤東問：「誰人建議的？陳錫聯？」毛遠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贊成的，他說戰士只能挨打不行。」

毛遠新匯報到政治局建議將事件通報全國，中央發個文件時，毛澤東說：「公開發表。」「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現場報導。」「並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准。」「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

當毛遠新說到張春橋當面罵鄧小平是納吉時，毛澤東揮了揮手說：「是的。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

毛遠新表示趕快去布置開會，毛又說：「小平不參加，你先約幾個人談一下，不要約蘇振華。」「葉（劍英）不找。」[99]

毛澤東確認了開會名單後，突然又補充一句：「好。華國鋒任總理。」毛遠新有點吃驚地問：「和上面決議也一起登報？」毛肯定地說：「對。」並要毛遠新「快，談完就來。」[100]

中央政治局隨即開會，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根據毛意見起草了兩個決議。朱德戴上花鏡看了一遍，心情沉重地一言不

---

98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江青來的時間，張回憶為4月5日8時左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寫為4月6日下午。

99 據吳德回憶，後來又通知葉、李到會，蘇始終沒有出席。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17。

100 毛遠新筆記，1976年4月7日。

發。毛遠新立即趕去向毛澤東匯報。一會兒，他回來說：「主席還說：決定中要加上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當晚8時廣播，還要譯成外文。」[101]

中央政治局修改通過文件後，又報毛澤東批准。這時候已經是4月7日下午6時40分了。當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公開廣播了令世界震驚的兩個決議：

中共中央關於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
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同時廣播的還有《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採寫的報導〈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以及吳德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報導說：

---

101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7日。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搞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

這篇報導經過姚文元的精心修改加工，歪曲和刪去了一些事實真相，由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審閱通過。鄧小平被加上了「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等詞語，對鄧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幾乎衝擊所有領域，全國範圍開始了大規模的清查活動，各地區舉行了擁護黨中央決議的遊行集會，並開始追查所謂「政治諾言」，逮捕天安門事件和其他類似事件的積極參與者和「幕後策劃者」。至6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搜出的詩文、連同原件達583件，強令群眾交出悼文、照片10.8萬餘件。北京共拘捕群眾388人。以隔離、辦學習班、談話等方式審查的人數以萬計。[102]

但是，人民的反抗沒有被平息。4月8日這一天，廣州半導體材料廠一位青年工人寫信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高呼：「支持鄧小平！打倒張春橋、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4月12日，人民日報社收到一封署名「一名現場工人民兵」的來信，信封正面寫着「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背面寫着「請戈培爾[103]編輯收」。信中裝着4月8日《人民日報》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報導，上面批着：「令人震

10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81。

103 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帝國元帥。

驚！黨報墮落了！」「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江、張、姚！」

「四五」運動和天安門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自發反抗當權者的活動。參加人數之多，場面之大，範圍之廣，是空前的。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說明，文化大革命已經被人民徹底拋棄。誠然，如果沒有「四人幫」操縱中央政治局作出第一次清理廣場花圈、詩文的行動，而使事態激化；如果毛澤東不是重病臥牀，不能視事，也許事情最後能像吳德等人希望的那樣暫時度過清明節。從現在可以查到的毛澤東有關天安門事件檔案看，在4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作出動用武力鎮壓廣場民眾決策之前，沒有看到他對幾次報告有明確文字意見，只是圈閱和批示「退毛遠新」。在4月5日行動之後，他才有具體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及「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

但是，問題的實質，是毛澤東作出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決策，把民眾驅趕到了他的對立面。即使毛澤東能夠像「文革」初期那樣登上天安門，對天安門事件採取緩和手段，也決不可能再看到群眾的一呼百應——這是民眾的真正造反，不在4月就在某月，不在北京就在南京，遲早會要到來。

「四人幫」把這種民眾的造反，說成是少數階級敵人的破壞。姚文元說：「這次事件，我看有三種因素作用：1、黨內走資派（包括要保衛資產階級法權的高幹子弟）；2、社會的渣滓，從刑事犯，到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到反動文人；3、還有特務（國民黨、蘇修）。其中黨內走資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結點。」[104]這種分析完全是虛構。根據事後調查，在被捕的人中間，普通青年市民佔絕大多數。以4月3日至4日抓捕的人為例，其中：職工佔43.2%，學生佔18.9%，團員佔27%，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外地人各佔5.4%。所謂「刑事犯，到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到反動文人」等有歷史問題的人

104 姚文元日記，1976年4月8日。

沒有；「特務（國民黨、蘇修）」更是莫須有。走資派，即領導幹部也沒有發現，高幹子弟倒確實是有人暗中參與，如葉劍英、王震、鄧力群等人都不斷派子女前往天安門廣場打探消息，但他們都知道自己身處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地位，異常謹慎，只能暗中高興，不敢參與。據說葉劍英按捺不住，驅車前往廣場親眼觀看，叫停車，也被身邊工作人員極力勸阻，只減低速度。[105] 5月19日，汪東興在聽取追查「總理遺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有些受衝擊的老同志對發生天安門事件幸災樂禍，楊尚昆買酒慶祝嘛。」[106]

除了普通市民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階層，是中央國家機關和解放軍、公安人員的參與反抗。國務院許多部委都有人以其名義送花圈；第一個送花圈的是上訪的公安人員；在中央決議公開廣播後，北京部隊一位副營長就在營區附近張貼小字報，斥責江青、張春橋等人是假馬列，讚揚「鄧副主席是我們的貼心人」。這在過去的政治反抗活動中，是沒有的。

不過，姚文元說「黨內走資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結點」，也有一定道理。代表人物就是鄧小平，正是對他的批判，激起了民眾的自發反抗。也正是民眾的反抗，使華國鋒、葉劍英等領導人看到人心所向，敢於在毛澤東逝世後一舉粉碎「四人幫」。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6年4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是完全準確的。這一點，靠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毛澤東，也不可能沒有感受到。因此，他對鄧小平採取了寬容甚至可以說是關心的態度，再次拒絕了江青要把鄧小平開除出黨的要求。

---

105 范碩：《葉劍英在1976》，修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頁115。

106 施義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且個人環境比1967年的被打倒，更加險惡。

4月7日下午，江青和張春橋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稱，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四人幫」還說鄧小平曾坐着汽車去天安門廣場親自指揮。華國鋒說，應該去向鄧小平本人問一下。江青指名要汪東興去問。汪立即把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當即指示：不能再衝擊，也不能把人抓走。並問汪有沒有辦法。根據汪的安排，當日下午，鄧小平夫婦被遷至東交民巷一住所住下。汪問鄧，是否去過天安門指揮，鄧回答只有一次去北京飯店理髮。汪回到中央政治局會議匯報，江青等人很不滿意，但也無可奈何。根據毛的指示，汪始終沒有把鄧的轉移去向告訴任何人。

6月10日，鄧小平通過汪東興致信毛澤東，希望與家人團聚。汪東興將此信報知毛澤東。毛澤東口頭指示，「可以同意。」7月19日，鄧小平夫婦從東交民巷搬回寬街住宅。[107]

毛澤東為甚麼要這樣保護和寬容鄧小平，沒有更多的檔案具體說明。一件小事可以反映他此後的心態。

4月13日，毛遠新給他寫報告說，12日晚政治局會議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準備把北京市委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報告轉發全國，「要進一步修改充實，除介紹北京的經驗外，要把這次事件的罪證選擇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國幹部更清楚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在引號內這段文字下面，毛澤東劃了橫線，並寫了兩個批語：「第三條不好。」「此計不妥。」在附錄的以北京市公安局名義搜集整理的〈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反動詩文原件選印〉上，毛澤東批示：「天下已定。此件雜亂無章，近於畫蛇添足，不宜發表。」[108]

---

107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74、477、498。

10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1976年4月13日。

我們只能猜想，毛澤東實在不願意看到，他畢生所依賴的群眾運動，竟然以他所喜愛的詩文形式作為罪證公諸於眾，這事實上是把他和民眾放在對立面上了。也許，他內心已經痛苦地承認，此事將來必定翻案；在天安門事件上，鄧小平是代表人民的。他所說的「以觀後效」，也包括讓歷史和未來，讓人民去選擇。因此他留下了鄧小平這一步活棋。

第十章
「下不為例」的粉碎「四人幫」

人們常用「天崩地裂」來形容巨大的災難。老人們後來都說，1976年是農曆閏八月，「龍抬頭」，必然有大災大難。無論這是迷信還是經驗之談，用在1976年，也再恰當不過了。這一年，發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民眾公開反抗最高當權者運動——天安門事件；發生了二十四萬多人罹難的唐山大地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中共歷史上地位最高的領導人同年去世。大悲之後是大喜。10月6日，華國鋒發動了隔離審查「四人幫」的行動。實際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些，都匯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政治界和自然界的「天崩地裂」。

一　天怒人怨的1976年

1 天象示警

首先是「天崩」。1976年4月21日，新華社從長春發出電訊：〈最近，在我國東北吉林地區降落了一次世界歷史上罕見隕石雨〉。報導說：3月8日下午15時1分59秒，吉林市郊區金珠公社上空發生隕，

星爆炸，以輻射狀向四面散落大量隕石雨，範圍約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收集到的隕石有一百多塊。「有三塊每塊重量超過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塊重量為1770公斤，大大超過了美國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隕石的重量（1078公斤）。這次隕石雨無論是數量、重量和散落的範圍，都是世界罕見的。」[1]

儘管新華社以頗為自豪的口吻進行了報導，人們心中仍然感覺是不祥之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以天上星宿對應地上人間的「天人感應」說法。偉人將逝，必有流星隕落。如今一落三顆巨星，聯想到已經逝世的周恩來，還會有誰呢？正是人人意中有，卻是人人口中無，只沉重地壓在心頭。

飽讀經書的毛澤東也被隕石雨的報導吸引住了。他少有地從病榻上坐起來，注意地聽着，唸完消息。他讓人攙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天際，深思着。他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甚麼大的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頭（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說《三國演義》裏就有不少這樣的說法。要死誰呢？他沒有說。

然而，新華社的報導卻已用另一種方式聯繫了人間的沉浮：「這次隕石雨的考察工作，是在深入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罪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好形勢下進行的。」粉碎「四人幫」近一年後，新華社在第二篇報導〈隕石雨的來龍去脈初步弄清楚了〉中，又提供了另一種聯繫人間的迷信：「廣大科研人員在英明領袖華主席、黨中央的關懷下，以揭批『四人幫』為動力，在短時期內就取得研究成果，使我國隕石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2]

其次是「地裂」。早在1960年代，中國已經進入了地震群發頻繁的周期。1966年的邢台地震之後，最嚴重的是1970年1月5日雲南省通海縣發生的震級為7.7級的大地震。震中烈度為10度強，

1 《人民日報》，1976年4月22日。

2 《人民日報》，1977年9月4日。

震源深度為10公里，死亡15621人，傷殘32431人，為中國1949年以來繼1954年長江大水後第二個死亡萬人以上的重災。但是，對於這樣一場地震，三十年後，人們才知悉真情。當時的報導隻字未提傷亡情況，只說：「雲南部分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人民，當地軍民信心百倍地進行抗災救災。」當時被廣泛宣傳的是1975年2月4日19時遼寧省海城縣發生的震級為7.3級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9度強，死亡1328人，重傷4292人。經濟損失8.1億元。由於此次地震被成功預測預報預防，使更為巨大和慘重的損失得以避免，因此被稱為20世紀地球科學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跡。1976年5月29日，雲南西部龍陵、潞西發生7.3和7.4級地震，由於地震部門作出了比較準確的預報，僅僅死亡98人。有關部門產生了地震可以預報的樂觀感覺。

再次是「洪水」。1975年8月8日凌晨1時，河南省駐馬店板橋水庫垮壩。其後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計60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60億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橫流。1015萬人受災，超過2.6萬人死難。倒塌房屋524萬間，沖走耕畜30萬頭。文城成為洪水中損失最巨的地區：全公社3.6萬人口中，有1.8萬餘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餘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板橋水庫8日垮壩後，僅一小時，洪水就沖進45公里外的遂平縣城，遂平縣40萬人，此時有半數漂沒水中，一些人被途中的電線、鐵絲纏繞勒死，一些人被沖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廣線鐵路高坡時，墜入漩渦淹斃。洪水將京廣鐵路的鋼軌擰成絞絲狀，將石油公司50噸油罐捲進宿鴨湖中。板橋水庫垮壩五小時後，庫水即泄盡。汝河沿岸，14個公社、133個大隊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見的衝擊災害。洪水過處，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盡，黑土蕩然無存，遺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鮮黃色。翻越了京廣鐵路的洪峰，從西平、遂平兩縣境內繼續向下游沖擊，駐馬店地區4.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盡成澤國。縱貫中國南北的京廣線被沖毀102公里，中斷行車

16天，影響運輸46天，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成為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垮壩慘劇。[3]

這樣一場洪災，長期以來卻不被歷史學者關注。幾乎所有的中國當代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說到1975年，都隻字不寫這場災難。直到三十年後，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才聚集鄭州，重新進行理論研討，認為這次事件中折射出的問題值得人類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4]

最後是「人禍」。1975年一般不被當代史提及的，還有雲南沙甸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死人最多的性質惡劣民族事件。事件發生的雲南省紅河州蒙自縣雞街公社沙甸大隊，是一個有8000人口的回民聚居村。事件的起因，最早是「文革」「破四舊」強迫關閉清真寺。以後「劃線站隊」運動，又將百分之八十的當地幹部、群眾批鬥，迫使附近的回民跑到沙甸避難。1968年12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譚甫仁派出一個營的部隊包圍沙甸，抓走571人，捆綁吊打，使14人被打死。這些，都極大地激化了回民與當地政權的矛盾。1974年11月，回民在昆明組織了街頭遊行抗議，隨後又成立沙甸「回民民兵團」保衛自己。1975年1月，為貫徹中共中央2號文件，即關於浙江、雲南停止武鬥收繳武器的通知，雲南省委成立了雲南收繳槍支執行小組。2月中旬，建水縣民兵與回民發生衝突，回民被打死9人。雲南省委嚴重偏袒一方，5月23日發布「通告」，用飛機到沙甸上空撒發，宣布「反動教長」和「反革命分子」煽動「鬧事」，只有放下武器，迎接解放軍進村，才是唯一出路。幾千份「通告」被憤怒的回民集中燒毀，堅持只歡迎少數部隊進村落實政策。

7月5日，中共中央根據雲南省委報告，發出〈關於沙甸問題的批示〉，毛澤東圈閱同意。雲南省委作出「性質變了」、「政治解決已無可能」的結論，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得到鄧小平主持的中央軍委批准。7月29日凌晨，部隊開始對沙甸回民包圍，進行武裝鎮壓。以

---

3 資料均引自錢鋼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新華社每日電訊：〈30年後，世界最大水庫垮壩慘劇真相大白〉，2005年11月26日。

後對大莊、新寨、田心、茂克、車白等回民村也進行包圍鎮壓。沙甸回民憑據地形熟，拚死反抗，進行街巷戰、房屋戰。30日，進攻部隊佔領制高點及有利地形，對沙甸村進行猛烈炮火轟擊，使用了火焰噴射器。31日，通過反覆勸說，兩千餘老弱婦幼、傷殘病的回民集隊出村，留在村中的繼續殊死抵抗。整個軍事行動歷時21天，至8月18日結束。造成大批人員傷亡。回民死亡1341人，重傷420人；解放軍死亡143人，傷708人；被摧毀民房4400多間。「沙甸」事件被定性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製造的、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

粉碎「四人幫」後，沙甸回民不斷上訪請願，要求平反。經過新任雲南省委調查和向中央匯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對這一事件平反。1979年2月15日，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合發出〈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指出：沙甸事件不是反革命叛亂，採取軍事解決是錯誤的，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消，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以後又撤消了該通知中遺留的個別錯誤結論。中央和雲南省先後撥出4000萬元進行撫恤和救濟，重建村莊。[5]

然而，與唐山大地震相比，以上異變災禍，卻都相形見絀，只能算是預警。

2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54.2秒，河北省唐山市（震中緯度39.4度，東經118.0度）發生震級為7.8級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1公里。主震區東起市郊的越河鄉、西至梁家屯、河北礦冶學院，南自女織寨，二十一中學，賈各莊、打靶場一帶，呈東北走向的橢圓形，面積約47平方公里，長軸約10.5公里，短

5 當代雲南編輯部：《當代雲南簡史》，未刊稿，2003，頁128、161。

軸約3.6至5.5公里。烈度10度區，呈東北窄西南寬的瓢形，長36公里寬15公里，面積320平方公里；唐山地區都處於7度區內。

這次地震是迄今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慘的一頁，相當於400枚廣島原子彈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殼中猛然爆炸，強烈的搖撼中，這座100萬人口的城市頃刻間被夷為平地。242419人喪生（包括天津等受災區。還包括在華的日本人3人、法國人1人），36萬多人受重傷，70萬多人受輕傷，15886戶家庭解體，7821個妻子失去丈夫，8047個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為截癱患者，25061人肢體殘廢，遺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兒4204人，數十萬和平居民轉眼變成失去家園的難民，全國人民被投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

唐山市城鄉民用建築68萬餘間約1000多萬平方米，被地震損毀65萬餘間，達96%；唐山火車站、小山、解放路、宋謝莊、復興路、新立莊、風井和梁屯一帶，建築物被毀蕩然無存。唐山280多公里柏油路被嚴重破壞，71座大中型橋樑、160座小型橋樑、1000餘個道路涵洞塌陷垮裂，至天津、北京、東北和沿海的主要公路幹線路基塌陷或出現裂縫；公路交通基本斷絕；東西鐵路幹線被切斷，京瀋鐵路癱瘓。工業建築倒塌或者嚴重毀壞達70%－80%。開灤煤礦因斷電癱瘓，井下積水1.5億噸，38萬米巷道被淹機電設備3萬多台，350萬平方米的建築幾乎全部倒塌。北方瓷都唐山，2000台設備只剩下300餘台，40多萬平方米的建築只有1萬平方米沒倒。唐山鋼廠工業建築遭到嚴重破壞，民用建築幾乎全部震毀。1萬多噸機電設備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唐山市的直接經濟損失約30億元，唐山地區的損失達54億元，全國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在100億元以上。

唐山地震事先沒有得到預報。海城地震發生後，關於京、津、唐地區是否還有大震的問題在地震界曾引起爭論，一批地震工作者對這一地區的監視一直持續到唐山地震發生之前。中央最終沒有得到來自國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臨震預報意見，以致唐山市最終沒有預防。地震發生後，雖然僅僅相距一百五十多公里，國家地震局卻不能測出震中。北京附近幾個地震台的測震儀，有的被震翻，有的記錄出

格。外地台的報告尚未收到。4時30分，蘭州、南京、昆明等十個台報來測震數據，其中給出震級的僅六個台，有的定8級以上，有的定7級以下，懸殊甚大。至於震中，大都只能確定在「北京附近」。當日清晨5點整，國家地震局決定，地震地質大隊、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隊和國家地震局機關，兵分四路，立即開赴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在200公里範圍內人力尋找震中。震中基本確定後，國家地震局根據不完全的各台站報告彙總，初步確定震級為7.5級。7月29日新華社據此公布第一條唐山地震消息〈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　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　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後經各台站都報告震測結果，才核準為7.8級。

7月28日凌晨4點10分左右，地震發生後不到三十分鐘，一輛紅色救護車吼叫着從開灤唐山礦開出，拚盡全力奔馳向西。這是地震後唐山市第一輛蘇醒的車。車上有唐山礦工會副主任李玉林等四人。三個多小時後的早晨8點06分，他們和唐山機場乘飛機趕到的兩位空軍幹部一起進入了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當時，中央政治局關於大地震的緊急會議剛剛結束，震中已初步確定，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和煤炭部部長蕭寒奉命立即乘飛機趕赴唐山。

會議室裏，李先念、陳錫聯、陳永貴、紀登奎、吳德、吳桂賢正圍着桌上的一幅大地圖商議。李玉林一進去，就喊着：「首長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陳永貴、紀登奎過來把他抱住，所有人都問：怎麼樣？李哭了起來：「首長啊！唐山100萬人，至少有80萬還被壓着吶！」在座的人都哭了。陳錫聯叫李畫一幅唐山草圖。吳德走過來問：「開灤總管理處那座英國人蓋的大樓在哪個位置？」他當過唐山市委書記，知道那座英國人蓋的老樓那樓十分堅固，牆有一米厚。李指着圖說：「在這兒。已經塌了……」吳德歎了口氣說：「……唐山不存在了，唐山不存在了。」應領導人要求，李玉林等人提了三條救急建議：派軍隊，派礦山救護隊，派醫療隊。他們說一條，會議上議一條。幾個副總理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會議室裏一片緊張的聲音：「叫總參來人！」「叫空軍來人！」「通知衛生部、商業部、國家

物資總局的領導，立刻到這裏開會！」「煤炭部，還有煤炭部！蕭寒呢？」「跟子厚上機場了……」「噢，對，叫他留在唐山，別回來了！通知煤炭部副部長。」主持會議的是紀登奎。李先念低頭坐在一邊，紀登奎有時問他，李先念就說自己的意見，心情十分沉重。[6]

7月28日上午10時整，北京軍區副參謀長李民率領指揮機關先頭人員，乘飛機在唐山機場緊急着陸。11時，河北省委、省軍區先頭人員到達。12時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蕭選進、副政委萬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鄭希文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馬力，省軍區司令員馬輝、煤炭部部長蕭寒乘坐的飛機降落。下午2時，三架飛機載來瀋陽軍區指揮機關人員和遼寧省醫療隊。下午4時起，五架飛機分別運載大同、陽泉、峰峰、撫順、淄博、淮南礦山救護隊趕到唐山。此時，救災部隊正由西南和東北兩路向唐山開進。半個月中，參加救災部隊共計10萬人，包括北京軍區、瀋陽軍區、空軍、海軍、鐵道兵、工程兵等部隊。截至8月10日，共救出12245人。

8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派出以華國鋒為總團長的中央慰問團，到強烈地震受災地區慰問受災群眾。中央慰問團總團副團長是陳永貴、烏蘭夫、郭玉峰、范子瑜、張才千、黃玉昆、張宗遜、楊俊生、謝靜宜、解學恭、許誠、劉子厚、馬輝等十三人。總團下設唐山分團、天津分團、北京分團，已於7月30日分別到達唐山、天津、北京等地受災地區的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和醫院，看望受災群眾。唐山人民在全國支援下開展了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災鬥爭。

另一方面，當時也出現了許多不可理喻的做法。7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慰問電，號召災區人民，首先是「認真學習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開展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其次才是「團結起來，向嚴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鬥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

6 以上資料均引自錢鋼：《唐山大地震》（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衛一清、丁國瑜主編：《當代中國的地震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利！」[7]當時的新聞報導標題，很多是「深入批鄧促生產，支援災區多貢獻」一類。8月11日，姚文元修改批准《人民日報》發表的〈深入批鄧，抗震救災〉社論說：

> 解放以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每當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也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激烈的時候。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妄圖利用自然災害造成暫時的困難，扭轉革命方向，復辟資本主義。[8]

據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報導說，「『四人幫』竟然喪心病狂地叫嚷：『整個唐山才100萬人口，全國有8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里，抹掉個唐山算得了甚麼？』」[9]而且，中國拒絕了一切願意提供的國際援助。[10]

唐山大地震發生前後，毛澤東許多時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身邊人員立即跑到毛澤東居住的書房，幾個人拉住一個大被單，罩在毛牀上空，怕東西墜落砸傷他。毛的神智還很清醒，知道發生地震，但是說不出話來，只用手擺擺，大概意思是不要驚慌。清晨，中央辦公廳負責人來到毛澤東處報告唐山地震情況，建議他盡快離開目前的住處游泳池，搬到較為安全的地方。毛用手勢表示同意「搬家」，就用軟擔架把他遷移到中南海內新建的平房「202」號。他躺在牀上，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地震災情內參。8月18日，毛澤東圈閱了他生前的最後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他身邊的醫療組成員、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王新德回憶道：「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

---

7 《人民日報》，1976年7月29日。

8 《人民日報》，1976年8月11日。

9 《人民日報》，1976年11月12日。

1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506。關於「四人幫」中是誰說了「抹掉個唐山算得了甚麼」一類話，以及中國拒絕國際援助是誰決定的，至今不見任何詳細報導。前者的說法值得懷疑。

這場地震傷亡達24萬多人，其他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後，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11]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鄧小平夫婦因為吃了安眠藥，睡得死死的，兒女們只好撬開臥室門，把他架到四合院的院子中，在絲瓜架下倉促地搭了個用塑料布蓋上的簡易棚。但當天就被大雨澆垮，只好在客廳裏用三層三屜桌和牀板搭成屋中屋，鄧小平每天就鑽進鑽出，睡地鋪。因為地下潮濕，老人又腿腳不方便，兒女們又在院子裏搭了個稍為堅固的抗震棚。鄧小平就在這裏度過了他七十二歲的生日。

唐山大地震的陸地有感範圍約二百一十七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近四分之一的中國。東北的滿洲里，寧夏的吳忠，河南省正陽，都有明顯的震感。而其引起的心理震撼和恐懼，更是遍及全國。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陷入了混亂。人們從睡夢中驚醒，喊着叫着，扶老攜幼，穿着內衣甚至赤身裸體逃出室外，恐懼而驚慌失措。次日，從長安街到小胡同兩側，搭滿了用塑料布、竹杆、木板、破席等構建的簡陋抗震棚，遠遠望去，匯成難民營式的兩條長龍，形成了共和國歷史上從不曾有的奇異景觀。油氈、塑料薄膜、木棍、鐵絲等成為緊缺物品，需要控制配給。家家戶戶都擺放着倒置的酒瓶或者其他土製地震「報警器」。而繼續發生的雲南地震，更給惶恐的人們帶來驚弓之鳥的感受。常常在半夜裏，不知是誰驚呼一聲：「地震了！」人們就倉皇逃竄。連續多日天降暴雨，水流成河，人們在水中淹泡着。有條件的，到遠方或農村去投親靠友避難。沒有條件的，直至入冬寒風凜冽，還蜷縮在簡易棚中瑟瑟發抖，不時發出一聲聲歎息：這樣的日子，甚麼時候是個頭啊！

1976年，由於唐山大地震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及周恩來、毛澤東先後去世引起的全國「四五」運動和其他全國性悼念和抗議活動，社會、經濟生活再度出現混亂局面。

「四五」運動被鎮壓之後，全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上了一個大台階。萬里、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張愛萍、鄧力群等在

11 《大地》，2002年第12期。

1975年整頓中起到骨幹作用的中央領導幹部及地方上執行整頓方針的廖志高等領導幹部受到調查和嚴厲批判，被迫離職。周榮鑫被批鬥五十多次，最後心臟病發作昏倒在現場，以至去世。地方上的造反派人物再次崛起，搶奪權力，製造派性鬥爭。致使因1975年整頓已經出現好轉的社會秩序和經濟形勢再度混亂。鐵路運輸又有十幾條線路經常不暢通，其中被河南造反派唐岐山等奪回權力的鄭州鐵路局，全年發生十二起全局性的大堵塞，京廣鐵路半癱瘓，影響了半個中國的物資和旅客運輸。

是年，國民收入下降2.7%，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仍增長1.7%，遠低於原計劃的7%－7.5%。主要產品產量，與計劃相比，絕大部分都沒有完成：糧食為99%，棉花為79%，鋼為79%，原煤為101%，原油完成下限指標，發電量為96%，棉紗為88%，鐵路貨運量為91%。基本建設投資完成比上年減少32.8億多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僅為58.9%，建設項目投產率僅5.7%，是1949年以來最差的年份之一。社會商品零售額比上年增長71億元，進出口貿易比上年減少13.1億美元。全民所有制職工比上年增加434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27%，比上年降低0.3%。國家財政收入完成比上年減少64億元，相當於1971年水平，當年出現財政赤字29.6億元。據估算，從1974年批林批孔開始到1976年，與正常年份相比，工業總產值損失了1000億元，財政少收400億元。[12]

二 毛澤東逝世

毛澤東對自己的生命走到盡頭，已經有預感。1975年10月1日國慶時，他突然自言自語道：「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後一個國慶節了，最後一個十一了。」工作人員說：「怎麼會呢？主席，您可別這麼

12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376－377。

想。」毛澤東說：「怎麼不會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

毛澤東要考慮的大事，仍然是接班人問題。

在此前，毛澤東雖然選定了華國鋒作為國務院代總理，但與王洪文、葉劍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卻沒有拉開距離。中間更有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毛遠新。

有人說，當時毛澤東還在猶豫中。在《紅都女皇》事件沒發生時，他確實想讓江青接班。《紅都女皇》事件一來，感到不行了，要培養毛遠新做接班人。天安門事件他坐臥不安，不斷叫毛遠新問情況。毛遠新問他叫誰接班，他的意見是張春橋。毛遠新說，張春橋太陰，不孚眾望。毛澤東問毛遠新的意見，毛遠新說讓華國鋒接班比張春橋好。直到「文革」後毛遠新在被關押中，還在表這個功，說華國鋒當主席是他推薦的。

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姚文元後來交代說：「我一直有個感覺，覺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養毛遠新。」[13]但毛遠新實在是到中央時間太短，沒有資歷也沒有威望。於是，毛澤東別無選擇，在4月7日建議中共中央作出兩個決議的時候，不但建議華國鋒正式擔任國務院總理，去掉代字，而且還加上了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頭銜。這個頭銜，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這明確表示，華已經是他選定的正式接班人了。從1974年10月毛提議鄧小平為從未有過的「第一副總理」，兩個「第一」，只間隔了一年多。

無論如何，毛澤東沒有選擇江青、張春橋、毛遠新作為接班人，是個非常明智而重要的決策。否則，這三人雖然勢必在不久仍將無可挽回地被推翻，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繼承程序也將受到非議，毛的形象也將大打折扣。

4月30日晚，毛澤東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留下向他匯報近期工作。當時在場的張玉鳳回憶道：

---

13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25日。

接見後，華對主席說：「我把外賓送上車，還來同主席談幾件事。」主席說：好。不多會兒，華返回同主席談話，我也在。華對主席說：最近我處理了幾件事，現在有幾個省發生一些問題，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處理，發發了中央文件，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甚麼意見。主席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當時，主席說話已講不清楚了，華國鋒同志聽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話重複一遍。隨後，主席又講了一句話，我聽不清楚。主席要紙和筆，我扶着，他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當時主席寫這三句話是答覆華國鋒同志匯報的幾個問題的意見。後來傳說「照過去方針辦」是臨終囑咐，「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14]

這個「你辦事，我放心」，用紅鉛筆寫在一張無其他字的白紙上，並無落款和時間，顯然是隨手而寫，後來卻被宣傳為毛澤東選擇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的文字證明。在華國鋒下台之後，解釋卻又發生一百八十度度大轉彎，張玉鳳與章含之等遭到華在位時打擊的在場人，都紛紛撰文指正這根本不是指定接班人的文字。更有無稽之談的民間傳說，說這句話後面還有「有問題，找江青」。

其實，這張紙並不是那麼重要，也不是那麼不重要。毛澤東選擇華國鋒作為接班人，是在此之前的「兩個決議」中已經確定的，無須再畫蛇添足地搞甚麼親筆文字「詔書」。而毛對華寫這樣的字，確實也說明了對他的信任。

1976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批外賓——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和夫人。當華國鋒陪同外賓進來時，毛澤東已無法站起來，只能坐在沙發上表示歡迎。會見只進行了十分鐘，雙方簡單地

14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寒暄幾句，就草草結束。6月初，毛澤東突然心肌梗塞，經過搶救，才脫離危險。其後，中共中央向世界公開宣布，毛澤東不再會見外國來訪人士。

毛澤東認為，需要交代一下自己的後事。他在牀邊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毛遠新、王海容等八人，[15] 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說：

>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兩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的這番話，後來被普遍認為是他的「政治遺囑」。然而，其中有很多頗值得玩味的地方。據說，華國鋒至今仍否認毛澤東曾經對他說過這些話。

首先，是資料來源。最早將這一「政治遺囑」公諸於眾的，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後改為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馬齊彬等編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據說該書「文革」部分的內容由國防大學著名文革專家王年一教授編寫），引用毛的此段話與上述引文一字不差，並且前面寫明係毛澤東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所說，但未註明出處。其後，多家出版物轉引，都沒有出處。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著名專家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

---

15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409記載為六人。筆者根據有關資料補充汪東興、毛遠新二人。

東傳（1949－1976）》，是一部極為權威的著作，但其引用註釋也只寫「據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然而，葉的講話談到毛這些話時，只是簡略的大意，文字少得多，也沒有說明在場者，而且葉當時並不在場。顯然，《毛澤東傳》的註釋並非原始出處，所註也不同於該書其他註釋直接寫明來源，而多了一個「據」字，說明只是參考依據，僅證明確有此說。

其次，是時間。《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寫為6月15日。其他出版物大多據此。但胡繩引用時寫作6月13日，後來又更正。[16]逢、金主編的《毛澤東傳》卻寫為「大約是這年6月15日」。作為一部嚴謹的權威著作，想其也未能找到原始來源和時間，故只好如此寫。

儘管缺乏諸多關鍵要素，但是毛的這番話仍然有很高的可信程度，不僅因為其酷似毛的風格，而且因為毛以前也曾經這樣講過。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道：「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17]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也回憶道：「73年，在游泳池開政治局會議。他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我在場。」[18]

最後，我們剖析毛澤東這番極具感情色彩的「政治遺囑」，有五點值得注意的內容：

一、把發動文化大革命看做是與打敗日本侵略者與蔣介石同等重要的大事，而對他領導的三大改造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並無此關注。儘管後人如胡繩出於好心，極力要避開被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澤

16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載《胡繩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179。

17 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645。

18 訪問張玉鳳談話記錄，2001年12月12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45。葉劍英1977年講話中所述內容，可能即這次政治局會議毛所說，而非1976年6月15日毛對華等人所說的更詳細內容。

東一生的豐功偉績歸納為「第一件大事是，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帶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努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19]但是，歷史學家的客觀評價，與本人的主觀申明，完全是兩回事。我們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是他後半生為之奮鬥的終極目標。

二、對於文化大革命在全黨全國眼中的評價與地位，他有了清醒的認識：「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就曾講到對文化大革命：「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但那時他並不認為反對者能佔多數，而且相信他能改變這種狀況：「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以及公報的實行。」[20]因此他胸有成竹、不顧一切地繼續進行下去。而經過十年後的這時，他卻意識到自己仍然處於孤立之中。

三、對他身後的前景，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淒涼：「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顯然，他所說的血雨腥風，並不是指解決台灣問題，而是文化大革命的遺產——包括路線和權力結構——將被否定，甚至會引起流血動盪。如果說天安門事件前，毛澤東還把接班人的選擇，看成是繼承他事業的關鍵的話，那麼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已經看到人心所向，大勢已去。

四、「政治遺囑」的交代對象，是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毛遠新、王海容。能夠接受這一交代的，當然

---

19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載《胡繩文集》，頁179。

20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00－101。

是他最信賴的人。從這八人看，並不是按照中央地位的排名：副主席只有華國鋒、王洪文兩人，葉劍英卻不在內；一個常委張春橋，三個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汪東興，一個聯絡員毛遠新，一個親屬王海容。可以說，他們都是毛認為最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和最忠於他的。同時，毛澤東顯然對他身後，這些人能否繼續執掌最高權力，不抱太大希望，說：「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事實上，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毛澤東當時的判斷，無論是對個人前途，還是「文革」前景，都是準確的預見。

最後，我們還要討論一下，這段話是否能算做毛澤東的「政治遺囑」。根據6月15日這一時間，我們可以推斷，6月初，毛澤東突然心肌梗塞，當被搶救過來後，毛澤東感到在自己還能說話和頭腦清醒時，需要有個交代。他兩次交代當時在他身邊值班的華、王、張、汪和毛遠新五個人要團結。第二次談的時候，因為毛澤東已經發聲含混不清，毛遠新怕華聽不清楚，還特地把華叫到牀前俯身聽毛說。那麼，為甚麼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可能永遠是個謎。我們只能猜想，按照當時對待毛指示的做法，肯定會有整理記錄稿，或者毛自己也許就有手跡留下，只不過也許還有其他內容，當時不便公諸於眾。而粉碎「四人幫」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就更不宜公開罷了。

1976年6月下旬，毛澤東同華國鋒談話時，又寫下「國內問題要注意」幾個字。這是他生前所寫的最後一句話。「國內問題」指的是甚麼呢？除了華以外已經無人知道。7月，王洪文給毛澤東一封信說：毛主席最近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我看國內問題還是要批鄧。全國運動有幾種情況，一種搞得好的，一種比較一般，還有一種是問題比較多的。這後面兩種，佔全國多數，都需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特別是第三種不解決不行。國務院有些部，軍委有些部門，也是這樣。解決的辦法要像有的部已經做的那樣把主要領導幹部換掉。對王洪文的這種解讀，毛澤東沒有答覆。[21]

---

21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82。

7月6日，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歲。同日，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訃告，以及由毛澤東、華國鋒等組成的朱德治喪委員會名單。9日和11日，在首都北京為朱德舉行弔唁儀式，毛澤東等送了花圈。朱德的去世，並沒有在國內外引起特別震動，因為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已經不處於權力的核心層。他的去世，只在周之後繼續表明一個時代的結束。

8月，毛澤東常處於昏迷狀態。但這時，他卻提出要回到湖南韶山休養，落葉歸根。中央政治局根據他的身體狀況，沒有同意他的這一要求。為了使黨內高級幹部了解情況，中央政治局發出了毛澤東病危通報。

9月7日，經過搶救剛蘇醒過來的毛澤東示意要看一本書。工作人員沒能明白是甚麼。毛澤東着急地用顫抖的手握筆寫下一個「三」字，又用手敲敲木製的牀頭。工作人員把那本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傳記找來時，毛點點頭，滿意。但由工作人員托着書，毛澤東只看了幾分鐘，又昏迷了過去。

9月8日下午，毛澤東的血壓開始下降，以後完全無法說話。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去向毛澤東告別。吳德回憶他看到的毛澤東最後異常舉動是：

> 向毛主席告別後，我們剛退身到門口，毛主席又讓葉帥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沒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門口了。我看見葉帥到毛主席身邊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說甚麼話，但已經說不出來。葉帥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22]

毛澤東要對葉劍英說甚麼？多數著作都認為是要向葉託付後事，即要他輔佐政局，表示了對葉的獨特信賴。這種可能不能說沒有，但從毛

---

2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229。

要陳錫聯掛帥取代葉，開政治局會議不要葉參加，最後「政治遺囑」也不找葉參加來看，這種說法比較勉強。

根據醫療搶救記錄，9月8日晚8時30分，毛澤東「四肢發涼」。9月9日零時4分，「抽吸兩下，血壓測不到」。零時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零時10分，毛澤東「心跳停止」。同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全國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逝世：

> 毛澤東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同國內外、黨內外階級敵人的長期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的篇章。他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全部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毅力，同疾病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在病中繼續領導了全黨全軍和全國的工作，一直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為中國人民、為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存的。他贏得了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熱愛和無限的尊敬。
>
> 毛澤東主席的逝世，對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對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23]

同日，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等375人組成毛澤東治喪委員會。

---

23 《人民日報》，1976年9月10日。

9月9日至18日，全國各地和中國駐外使領館及其他駐外機構下半旗誌哀，並停止一切娛樂活動。9月11日至17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毛澤東弔唁儀式，黨和國家領導人守靈。三十多萬人參加弔唁，並瞻仰遺容。電視裏播出了人們悲痛欲絕的哭泣和呼號。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眾百萬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以最隆重的儀式舉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華國鋒在大會上致悼詞。悼詞最後說：

> 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將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24]

早在7月下旬，紀登奎、姚文元就已經代表中央政治局通知中央辦公廳的李鑫、周啟才起草了毛的訃告和悼詞文稿。當時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毛逝世後，對〈告人民書〉政治局都無異議，但9月16日討論悼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夕，汪東興突然對周啟才說：「有一條補充意見，就是在悼詞文稿的適當地方加上毛主席講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條重要指示。我認為加上毛主席這條指示，很有必要。」所謂「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的，緊接着就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甚麼照樣搞呀！」華國鋒聽了匯報，表示很同意。葉劍英、李先念也表示贊成。「四人幫」都不作聲。沒有出席會的汪聽周匯報後說：這幾個人骨子裏是反對悼詞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為主席就是批評他們針對他們講的。

---

24 《人民日報》，1976年9月19日。

追悼大會前十分鐘，還發生了個小插曲。華國鋒讓周再講一下向毛遺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後轉，面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張春橋突然說：「那怎麼行？轉過去，屁股對着廣大群眾，不行！」「四人幫」其他人也跟着說：「是啊！屁股不能對着廣大群眾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許世友等都說，上次政治局會上已經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辦。「四人幫」沒再吭聲。周把這一情況報告給華國鋒，華氣憤地說：「這是他們故意搗亂！」[25] 這當然是搗亂。屁股不對着廣場群眾，就要對着毛，別無選擇。

追悼大會的同時，在全國城鄉廠礦，在行進的列車、輪船和軍艦上，汽笛長鳴，人們就地肅立默哀。各地同時都舉行了隆重追悼大會。據追悼會匯報，廣州市當日參加大會的共計200萬人，暈倒需要搶救者8050人，送醫院處理的174人。

中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僅是因為失去了像神和父親一樣主宰着他們命運的的毛澤東，更因為，中國將向何處去的沉重隱憂，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毛澤東逝世在世界上引起了強烈反響。9月9日，聯合國總部下半旗誌哀。10日，聯合國安理會發出唁電。21日，聯合國第三十一屆大會開幕式上，一百四十多個國家代表為悼念毛澤東肅立默哀。在毛逝世後的10天裏，共有123個國家的政府和首腦向中國政府發來了唁電或唁函，105個國家的領導人或他們的代表到中國使館弔唁，53個國家降半旗致哀，許多國際機構和國際會議上也開展了悼念活動。三十多個國家和政黨舉行了追悼活動，歐洲、亞洲、非洲許多國家的城市舉行了有上萬民眾的悼念遊行。朝鮮決定9月10日到18日為全國哀悼期。18日全國停止一切娛樂體育活動，下午4時肅立三分鐘致哀。毛澤東逝世當晚，聯邦德國幾個城市舉行了悼念毛澤東的火炬遊行。法國1萬多人遊行到巴黎公社社員牆前，舉行了追悼毛澤東的儀式。剛果政府組織了遊行，並決定今後每年在毛澤東逝世周年

25 周啟才：〈毛澤東去世後訃告和悼詞的出台前後〉，香港鳳凰衛視「口述歷史」，2005年2月17日。

紀念日舉行正式紀念活動。巴基斯坦拉合爾800名工人組織了哀悼遊行。埃塞俄比亞有10萬人參加紀念毛澤東大遊行，是世界各國遊行規模最大的。

美國總統福特唁電認為：「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對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國務卿基辛格說：「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音樂歌手身上有一種『顫流』，我承認我自己對此渾然不覺。但是毛澤東卻發出了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稱：「毛澤東主席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創造者之一，是給中國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來道路的人。」

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認為：「新興的中國就是他永久的紀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說：「毛主席作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業績。」外相福田糾夫評價說：「無論對他做多麼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

消息傳到加拿大，旅居多倫多的張國燾被問及如何評判毛澤東之死時，說：「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蘇聯異常地平靜，只在《消息報》倒數第二版的一個角落裏發了一則寥寥數行的報導。

三　撥開解決「四人幫」前的迷霧

長時期以來，對於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史學界都將其比喻為一場「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的舉動，多種帶有傳奇色彩的論著描寫了其驚險和曲折。官方在早期，曾經高度評價這場鬥爭的重要性，將其譽為「偉大的歷史轉折」。只是隨着華國鋒的下台，才逐漸被淡化，轉而強調葉劍英發揮了主要決策者作用，再轉而將轉折點改為劃時代的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一事件發生整整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看到關鍵性的完整檔案材料公布，使得這場被國外稱之為「宮幃政變」的特殊行動依然撲朔迷離，存在着一系列問題：

誰是這場鬥爭的首倡者？

中央政治局裏有多少委員參與和預知了這場行動？

「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的陰謀偽造嗎？

「四人幫」有沒有一個政變計劃？

其實，通過已經披露的大量史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逐漸澄清的內幕——粉碎「四人幫」並不像當時及事後一段時間裏所說的那樣艱難和驚險。雙方實力和數量的對比，決定了這是遲早要發生的結局。民眾只不過在猜測其時機和方式。正如民謠曰：「揪出劉少奇，覺悟不高；揪出林彪，嚇一跳；揪出鄧小平，莫名其妙；揪出四人幫，早就料到。」

1 誰是這場鬥爭的首倡者？

關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幕，過去公認比較權威的著作，是范碩著《葉劍英在1976（修訂本）》和《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26]最近幾年來，雖然在世的主要當事人華國鋒、汪東興仍然沒有發表詳細回憶，但一些當時的親歷者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武健華，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江青護士長馬曉先等，已經寫出回憶錄或接受採訪，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部分過程，有了愈來愈清晰的原貌。

誰是這場鬥爭的首倡者？目前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葉劍英，一說是華國鋒。

依照范碩最近說法，在毛澤東逝世後的參與治喪後事中，葉劍英發現華國鋒正為「四人幫」的困擾苦惱着，便勸華國鋒「站出來，和他們鬥」。華沒有表態，繼續在思考。葉劍英懇切地說：「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並且勸他多到老同志那裏走走，還告訴他，想找誰先打個招呼。聽了

26 范碩：《葉劍英在1976》，修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這些話，華國鋒情緒高起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最後說：「不過，事情很複雜，究竟怎麼辦？讓我再考慮考慮。」華國鋒表明了態度。葉劍英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27]

可是，華國鋒口述卻說：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28]

李先念的秘書、《李先念傳》作者之一程振聲的文章印證了華國鋒本人的說法：9月11日，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突然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向李表示，解決「四人幫」的時候到了。李問：你下決心了嗎？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甚麼時候解決好，採用甚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甚麼方式、甚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先念以驚喜的心情接受了華國鋒交辦的任務。兩人談話不到十分鐘。[29]

吳德回憶此事的時間、經過、談話內容與程文基本相同。只是指出，華去李家不是突然造訪，而是事先打過電話約定。

從史料可靠性的比較看，范碩寫成書採訪了葉，而葉並不是華、李見面的在場人。而華國鋒、李先念都是在場人，華的口述、李秘書根據李回憶和檔案的文章，顯然要更可靠些。[30]吳德雖然不是華、李

27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頁595－596。

28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張曾任吉林省長，1999年3月9日上午，華國鋒詳細地向他介紹了當時的經過情況。

29　程振聲：〈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0　存在的問題是，一、華・李見面的時間是9月10日還是11日？前後相差一天，是在允許的記憶誤差範圍內的。但李先念：《李先念文選，1935－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518註釋寫為「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甚麼方式、在甚麼時間解決為好」。相差十天之多，顯然是編寫者嚴重失誤。二、華國鋒說是他請李來家中密談，而吳和李卻說是華去李家密談。此事無妨大局。

會見的當事人，但是最早參與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消息來自華親口，他的回憶也比較可靠。

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的回憶，又增加了一個重要情節。他說，「毛主席弔唁儀式的第二天，黨和國家領導人繼續參加弔唁和守靈。中間休息的時候，葉劍英副主席到了休息廳」。他對汪東興進行了談話，說到了江青的胡鬧，及對汪的壓力，最後表示：「看來，我們與他們的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汪說：「她（指江青）又要鬧事了。主席逝世後，他們的活動更加頻繁，更加明目張膽了。」葉說：「對於這一點，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31]

弔唁儀式的第二天，就是9月12日，即華派李去找葉中間那天，這時受華之託的李還沒有見到葉，而葉已經和汪有了對「四人幫」看法一致的談話，並且認為與「四人幫」的一仗不可避免，顯然是十分重要的。武沒有說葉、汪談話時他是否在場，只說那一時期他和汪日夜在人民大會堂值班。但是，即使武所說可靠，這些談話還只能說是對「四人幫」不滿，「一仗」可以理解為與他們的黨內鬥爭，還不是徹底解決。

另一個有意思的小人物是原康生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弔唁期間，李鑫曾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找到汪東興單獨晤談，他悄悄建議：「康生已死，現在應該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了吧？」汪東興後來說：最先把解決「四人幫」問題說出口的，正是李鑫。[32]還有一種說法，說李是轉達了康生臨終前的意見，否則李為甚麼不說「毛主席已經逝世」而開口便提到「康生已死」。此外，李如果是在毛弔唁時期對汪說的，也算不得最早，起碼在9月11日華對李先念說之後。因此，李鑫對汪「說出口」的實際時間，可能要早得多，很可能是在康生逝世之後不久。

---

31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32 鄒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鄒吉成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以上諸說，都不能否定華國鋒是發動這場鬥爭的首倡者。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甚至可能毛在世時）華國鋒就已經在考慮這場鬥爭，考慮到了解決的時間和方式，態度積極而堅決，「下了決心」，並沒有甚麼「苦惱」和猶豫。事實上，能夠下這個決心的只有華一人，也只有華才有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格。因為他是毛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毛逝世前及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主持人和最後決策人。汪東興、李鑫即使私下說到時間更早，也不能算作首倡者。因為這個首倡，不僅要有「倡」，而且要有解決的地位和行動。「文革」初期，許世友等許多老幹部都說過要把「四人幫」抓起來，那只是一種發泄，正如汪所形容的「說出口」。至於葉劍英，當然也具備行動的條件，但他在毛逝世前已經受到排擠，時而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連對中央軍委的領導權也被陳錫聯取代。葉「一生唯謹慎」，這時還明顯是在試探。這並不是要貶低葉的作用，事實上，他的作用是以在軍隊將領中的長期威望和廣泛人脈，產生巨大威懾力。可以說，要粉碎「四人幫」，沒有葉也不是絕對不能進行，但粉碎完畢後華要鞏固權力和穩定社會，沒有葉絕對不行。所以時稱「紅花（華）綠葉」。

2 中央政治局裏有多少委員參與和預知了這場行動？

我們先按中央政治局委員參與時間來排序參與決策者。

第一個當然是李先念。華想到他顯然很早，還在毛逝世前後，李提出要去外地養病。華國鋒對他說，現在的情況和問題很複雜，希望李不要離開北京。[33] 9月11日華向李交底後，13日，李先念藉去香山植物園的名義，在未見異常情況下，突然轉往西山，到葉劍英處傳達華國鋒的委託。華國鋒後來回憶說：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

33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35。

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對「四人幫」的看法。李向葉轉達了華的意見和華派他來的意思，兩人都表明了態度，但並未深談。[34] 但也有說法認為，李這次見葉，只泛泛而談，並未提及如何解決「四人幫」事。

李的作用當然至關重要，因此，長期以來，官方對粉碎「四人幫」決策者的排序，都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其他人不再列入。9月30日，華、李與吳德商議，確定了武力解決「四人幫」的決心。以後，李便不再與聞具體策劃。

第二個是汪東興。據吳德回憶，華國鋒告訴他，「他還在11日找了汪東興同志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35] 實際上，汪東興長期在毛身邊，是毛去世前能夠隨時見到毛的不多幾人之一，了解毛的最後言行，有毛代言人身份，又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大內禁軍在握。沒有汪的同意，華是不敢貿然先找李表態的。根據朦朧的感覺，華和汪之間明確粉碎「四人幫」的態度，肯定比李要早，但是因為沒有具體史料證明，姑且將其列為李之後。從後來具體軍事行動的大量部署看，汪東興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作用在李之上。

第三個是葉劍英。據各方面的材料，葉早有解決「四人幫」之心。還在毛逝世前，王震就建議葉把江青等抓起來，葉只不語地翻了翻手。據敘述者解釋，是指毛還在世，投鼠忌器。這符合葉的一貫謹慎態度。吳德回憶說：李受華之託見葉時，當時葉劍英「非常謹慎，他沒有與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36] 後來，葉劍英為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又兩次到華國鋒家裏。但是，葉並沒有參與後來具體行動的部署，直到10月6日晚上才與華一起露面，坐鎮懷仁堂，當面宣布隔離審查「四人幫」。據說，華後來曾說：「當

34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

35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36。

36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36。

時布置抓『四人幫』的事，沒有讓葉帥知道，葉帥年齡大了，去他那裏的人多，他不謹慎，走漏了消息不好。」[37]

葉的重大作用，是聯絡中央一批老革命家，向他們徵求支持和理解。范碩著《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書中介紹，粉碎「四人幫」前後，葉劍英與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王震、譚震林、鄧穎超、康克清、烏蘭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聯繫，一起溝通情況，交換看法；葉劍英還向軍隊將領李德生、粟裕、宋時輪、楊成武、蕭華、梁必業、張廷發、吳富善、蕭勁光、蘇振華、傅崇碧、吳忠、吳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第四個是吳德。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提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38]這是吳德第一次了解華的態度。吳德認為，當時華國鋒是想了解我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但是，因為互相不摸底，開會沒有深談。華國鋒決定搞「個別串連」。[39]

9月26日晚，國務院小禮堂電影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的最佳實施方案。吳德支持華國鋒的決心，說：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無非是兩種，一是抓起來再說，二是開會投票罷免。此後，經過商議，一致認為要武力解決。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和李都說，那一夜商量後，華下了抓「四人幫」的最後決心。吳德在粉碎「四人幫」的具體部署中，起到了控制北京衛戍部隊採取行動和防禦北京外圍的重要作用。因此，吳應當是僅有的幾個核心決策者之一，也是一個方面執行者之一。[40]

37　原商業部長王磊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1981年1月25日。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總16號簡報》。

38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程振聲：〈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9　程振聲：〈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0　吳逝世時，中央批准的〈吳德同志生平〉寫道：「在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過程中，吳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給他的工作。」《人民日報》，1995年12月24日。

以上五人構成了中央政治局抓「四人幫」的集體領導核心。如果按照重要性排隊，應該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有爭議的是汪和李誰在前。按照參與早晚，兩人幾乎同時。按照不可替代性，顯然汪要勝過李。如果汪不支持這一行動，那麼華除了將來尋找機會用別人替換汪的控制中南海要害職務，別無他法。何況，汪在整個行動中調兵遣將，起到了積極、全面的指揮作用。而李，主要是溝通信息，出謀劃策，顯然還不足以決定行動的能否發動和成敗。

除了以上五人，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與這一行動，也存在着間接的支持作用和微妙的與聞態度。

陳錫聯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人、鄧小平之後的總參謀長候選人，軍隊的調動必須由他下達命令。過去都把陳說成是向葉奪權的人，這是一種誤解。據楊勇回憶，早在1975年10月，楊在新疆軍區任司令員，趁着陳率代表團來參加新疆自治區成立慶典，即已私下與陳溝通，得到的印象是，老陳是自己人。據吳德回憶，華曾經對他講，毛逝世後，華國鋒曾先後四次與陳錫聯商談解決「四人幫」的問題。10月3日或4日，華要吳德安排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調動部隊，吳忠提出沒有中央軍委命令無法調動。華聽了後要吳德去找陳錫聯，說陳是比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找到陳，陳說已經知道，顯然華已經向他提前打招呼。陳隨即給吳忠打電話：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指揮。[41]

由上可見，陳是完全支持抓「四人幫」行動的，他代表的中央軍委實際上起到了軍隊支持的巨大後盾作用。但陳為何一直沒有處於決策的前台？也是值得分析的。

紀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負責組織工作的主要人物。吳德回憶說：「紀登奎不了解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而且，似乎還起到了一些負面作用。如前所述，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華國鋒提

41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4。

出怎麼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紀登奎就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紀這樣一表態，別人就不好再說下去了。[42]但是，也有資料證明，紀在逮捕「四人幫」時，也起到了控制公安部的作用。

據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施義之回憶，10月7日，副部長楊貴要他一起叫着「上海幫」派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去視察秦城監獄的防震工作。祝到了秦城後坐立不安，幾次要回去，都被楊藉故拖住。次日午後，接到紀登奎的電話，楊、施趕到國務院，紀問：「祝家耀怎麼樣？」楊回答：「就是為了這，我們把祝家耀帶到秦城去的嘛。」施莫名其妙。紀說：「前天晚上已經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抓起來了。」紀還拿出「你辦事，我放心」的複印件給他們看，要他們回去注意一下祝家耀。施說：「這時我明白紀登奎早就把粉碎『四人幫』的事告訴了楊貴，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43]但究竟紀是在抓「四人幫」之前還是之後向楊貴布置的，尚不得而知。據知情人說，紀在得知「四人幫」被隔離後，很有抵觸情緒，甚至不向分管的國務院部門進行傳達，因而遭到華國鋒的批評。

陳永貴，這個農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掌握要害部門，也沒有材料證實他在這次行動中起到了甚麼作用。但9月16日那次會議，華實際上已經向他明白地預報了將要採取行動。據說，粉碎「四人幫」那天，陳坐立不安，不時問有沒有電話。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開會的電話通知，立即要車出發。

蘇振華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國鋒對吳德說，他也與蘇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也從自己的渠道向蘇打了招呼。蘇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2日，吳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44]

---

4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程振聲：〈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3 施義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未刊稿，2002。

44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2。

倪和蘇一起，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紡織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曾被吳德在分析中央政治局形勢時計算入「四人幫」一夥的「四票半」（吳沒有投票權），因此她不可能預知行動。[45] 以至於她在「四人幫」被隔離的當晚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一進去還驚詫座位不夠。

通過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三人中，除了「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再除了植物人狀態的劉伯承一人[46]，其餘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八人，全部領導、參與、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預知了這一行動。如果投票，已經佔整個政治局在京成員的三分之二。沒有投票權的在京政治局候補委員三人中，蘇振華、倪志福二人預先知道，吳桂賢一人不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明這一行動時說：「政治局全體同志除了『四人幫』之外，同『四人幫』做鬥爭，思想是統一的，認識是一致的，決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來，人不能過多，越少越好。」[47] 準確地說明了當時中央政治局的狀況。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還有幾個人物對這一行動起到了比較重要作用。

陳雲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內職務僅一名中央委員，並無實權，但卻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資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當

---

45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37。吳桂賢以後回憶此事時，也從未提到自己事先知道。2006年6月19日，吳桂賢在深圳家中，接受《鳳凰周刊》記者專訪說，「四票半」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粉碎「四人幫」之後，她仍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正常工作和參加各種活動。比如，1976年10月24日，出席了北京市粉碎「四人幫」的慶祝大會。還參加了政治局對《「四人幫」反黨集團罪行材料》的審查。見《鳳凰周刊》，2006年第19期。

46 1973年以後，劉伯承喪失了思維能力。見李曼村等主編：《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688。

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442。

選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見具有很大影響。姚依林晚年回憶說，毛逝世後，他到陳雲家去送一份關於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陳雲在家裏琢磨的是在即將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有無可能利用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他把中央委員名單反覆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力量還是雄厚的，何況毛剛去世，「黨內因循守舊、封建傳統思想仍成風氣，恐對局勢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會上以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是無把握的事。」[48]

陳雲自己回憶說：

> 同葉帥談過一次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時間在1976年10月2日以後的一個晚上。[49]葉帥派他的姪子葉選基到北長街我家裏來找我，然後由他帶領到北京西山葉帥住地談的。
>
> 到葉帥住地，葉帥同鄧大姐正在一間屋子裏談話。……鄧大姐走後，我進去，葉帥給我看了一份材料。這份材料是謝靜宜記錄的一份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內有毛主席的講話，講話裏面有「幫派」這樣的字眼，詳細內容記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後，葉帥問我，把他們幾個人抓起來，你看怎麼樣？我說，贊成。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問葉帥，這件事是不是告訴聶帥、徐帥？葉帥說，我就要去告訴他們。[50]

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葉想說服陳雲同意武力解決「四人幫」。因為這時箭在弦上，武力解決已成定局。在此之前，陳雲通過王震和葉有信息傳遞，葉可能知道陳的態度，是一貫主張黨內政治鬥爭不能動用軍隊。陳雲兒子陳元回憶，見面後，「葉帥又跟他討論了

---

48 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頁190。

49 據金鳳：《鄧穎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650的記述，鄧穎超是在10月1日去葉劍英家的，出來見到陳雲。而且，10月2日下午葉已去汪辦公室密談一個下午，隨後又去華家商談，要他盡快行動，談到大約晚9時以前。因此，葉當晚再在家中見鄧穎超、陳雲及向聶、徐徵求意見的可能性較小。

50 《陳雲傳》，頁1440－1441。

關於粉碎『四人幫』如何處置問題，是採用黨內鬥爭的方式，還是採用特別非常手段處置問題。……兩個人很深入地交換了意見。」[51]據說，陳雲最後明確表態贊成武力解決「四人幫」，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又說：下不為例。聯繫前後他的態度，是有可能的。以後審判「四人幫」之時，陳雲仍然主張「『文化大革命』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52]對江青「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53]甚至不惜頂撞堅持要殺的鄧小平等人。

據記載，胡喬木也曾悄悄向汪東興建議：張春橋鬧騰得很厲害，應該先把他搞起來。汪東興說：只搞一個人不行。[54]

無論誰最早提出，也無論誰主張方式如何，事實上，黨內高層當時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傾向是驚人地一致。說這一行動代表中央政治局當屬不虛，也看出「四人幫」是多麼地孤立和虛弱。

3 「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的陰謀偽造嗎？

在與「四人幫」的鬥爭裏，「按既定方針辦」是一個被多種史著描寫得繪聲繪色的焦點，稱是「四人幫」的一個大陰謀——偽造了一個毛澤東的「臨終囑咐」，以此來否定華國鋒的「照過去方針辦」，進而爭奪毛澤東的繼承人地位；甚至稱10月4日《光明日報》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反革命動員令、信號彈、宣言書。[55]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發出的「四人幫」罪證材料裏寫道：「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偽造『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為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大造輿論。」[56]

---

51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頁608。

52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04。

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81。

54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頁597。

55 范碩：《葉劍英在1976》，修訂本，頁358－359。

56 中發〔1976〕24號文件。

事情的經過，如前所說，毛澤東在1976年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留下向他匯報近期工作。毛在紙上寫下三句話：「慢慢來，不要焦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只傳達了毛澤東的前兩句話，後一句沒有講。華國鋒傳達這兩句話時，政治局成員都在，江青、王洪文等都作了記錄，沒有提出異議。

然而，毛澤東逝世以後的9月16日，姚文元修改審定發表了一篇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兩報一刊」[57]重頭聯合社論，用黑體字推出了一個「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社論寫道：

> 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當前，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58]

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甚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姚文元9月17日、19日、20日、23日連續給新華社打電話，要他們宣傳好「按既定方針辦」。9月19日電話裏特別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關於『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59]

從那以後，「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的氣氛在中央報刊全面鋪展開來，特別是上海《解放日報》，通欄標題是「遵循毛主

---

57 即《紅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編輯部，在當時是代表中央最高層次聲音的。

58 《人民日報》，1976年9月16日。

59 中發〔1976〕24號文件。

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下列四個小標題，分別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與走資派鬥爭；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認真學習，深入批鄧；按既定方針辦，就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但是，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華國鋒唸的悼詞裏沒有寫這句話。

9月30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將他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稿用急件送給華國鋒審查。10月2日，華看到「中國人民將堅決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把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兩霸的鬥爭作為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這一句時，在「按既定方針辦」的黑體字下劃了一個大問號，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60]本來喬當天就要在聯大發言，因為時差，才趕上修改。但隨後，張春橋又批示：「國鋒同志的批注，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61]江青也同意張的意見。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報》卻突然刊載了「四人幫」寫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警告說：

> 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金光閃閃，字字千鈞，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前進的指南，勝利的保證。
>
> 誰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60 王忠人：〈「按既定方針辦」一文發表始末〉，《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現在各書引用華批註的內容，有數字略不同，精神一致。

61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文件和許多史著至今仍把這篇文章比喻為「四人幫」下的殺氣騰騰戰書，公開向華國鋒宣戰，「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就是指的華國鋒。此事促使華國鋒加快了抓「四人幫」的行動。

其實，「按既定方針辦」是歷史造成的一個陰差陽錯玩笑。其產生，本是一個記錄錯誤，並非「四人幫」的陰謀偽造。那篇「梁效」文章也和「四人幫」沒有直接關係。

此誤最早出於1976年7月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後。會議已經開了二十天，遲遲沒有收尾，因為發生了唐山地震，決定立即結束。7月30日晚上，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吳德、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等人接見了出席會議者。為了避震，是在京西賓館院子裏舉行的。

華國鋒做了簡短講話說：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給大家傳達一下，第一句是「不要招急，慢慢來」。第二句是「照過去方針辦」。剛說到此，王洪文插話打斷說：不對，第一句前面還有「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說：對，第一句是「你辦事，我放心」。由於王的這一插話，在場幾位記錄者後來整理稿子時都沒聽清華那句「照過去方針辦」。當時也沒有錄音機。於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回憶，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整理稿送給計委副主任顧明審閱，還說明，這句話好像是這樣的。但顧明也沒有改動，便批准發出，文件寫道：毛主席最後指示我們：「國內問題要注意。」還指示過我們：「按既定方針辦。」各地區、各部門必須堅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中央的規定去辦。各級領導幹部要抓緊學習，深入批鄧，把革命搞好……

華國鋒看到文件後馬上說：不對，毛主席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我傳達的也是「照過去方針辦」，怎麼變成「按既定方針辦」了。但他並沒有當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於是，「按既定方針辦」不脛而走。

當然，當「四人幫」大肆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時，華國鋒、汪東興已經知道被利用了。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也就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姚文元後來在審訊中交代說：

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多宣傳中央兩個文件。[62]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63]

汪的意思，是要多宣傳不利於「四人幫」的毛「三要三不要」指示。但是圈外人並不知就裏。所以，糊塗的吳桂賢還表態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

姚文元還承認，在修改9月16日〈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時，把毛澤東這句話的產生時間刻意模糊了一下。社論中的原句是「毛主席在病中囑咐我們」，姚在審閱時刪掉了「在病中」三個字。姚沒有說這句話是他們偽造的，審訊員也沒有就這句的真偽問題進行展開調查。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

審訊員：「既定方針」指甚麼？為甚麼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

姚文元：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64]

至於《光明日報》發表「梁效」〈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真相是這樣的：抓起「四人幫」後，1976年10月18日，以劉西堯為

62 指〈告全國人民書〉和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大會上的講話。

63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24日。

64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9月4日。

首的中央工作組宣布對《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隔離審查，責成交代〈永〉文的發表經過和與姚文元的關係。五年後的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黨委報中宣部批准，對莫艾作出結論：〈永〉文的發表與「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陰謀關係。也就是說這篇文章的發表，不是受「四人幫」的指使或者授意。提出寫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報》，命題、內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報》領導小組成員孫關龍等商定，經莫艾同意的。因此，「原來懷疑這篇文章受『四人幫』指使發表的問題，應予解除」。

事實上，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針辦」不準確。10月4日晚，《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受姚文元之託，對莫艾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是主席患病期間談的，傳得不夠確切，以後報上不要再用這句話了。」莫艾說：「《光明日報》今天發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標題就是講這個的。」魯瑛沒有任何表示，繼續說，「你回去把把關，遇到這句話要改掉。新華社發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沒有這句話，有也不要用。這事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傳，我現在也是親自把關。」[65]

然而，王洪文在審訊中的交代，卻說出了另一個來源：

>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可能是張春橋加的。因為在這之前，他曾對我說過，他最後一次見到主席時，主席拉着他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清楚。[66]

張春橋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應當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向毛澤東告別。根據當晚護理記錄，再加上搶救醫生回憶，證明毛「在逝世前幾小時，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

---

65 王忠人：〈「按既定方針辦」一文發表始末〉，《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從10月5日起，《人民日報》沒有再使用過「按既定方針辦」。10月7日，遲浩田受華國鋒委派，接管《人民日報》社。為了穩住「四人幫」餘黨，造成中央沒有發生大變故的假象，經華國鋒批准，遲安排在10月8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又特意刊登了出現過一次「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則地方消息。此後，「按既定方針辦」再也沒有作為毛澤東指示出現過。

66 審訊王洪文記錄，1980年7月9日。

字」。[67]如前述把葉劍英召回，卻始終說不出來。所以，毛不可能對張春橋說此話。況且，從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員是分組值守，[68]毛若對張說此話，不可能其他人都沒有聽到。據說，華國鋒曾問過許多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們都不知道有這個遺囑，只有江青和毛遠新說他們聽到了。究竟張春橋是否編造了這句臨終囑咐？是要掩飾他們將毛澤東「照過去方針辦」搞錯了的罪責？還是真的要製造一個「臨終囑托」來對抗華國鋒？都是謎。

不管張春橋怎樣，負責宣傳工作的姚文元並沒有用「按既定方針辦」來作為發動政變信號彈的企圖。因為，他在華國鋒10月2日批示指出錯誤後第二天下午，親自找《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你得親自把關。」並要魯瑛轉告新華社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莫艾。姚文元還特別強調說：「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你得有思想準備。」[69]另一方面，姚又要魯找人核對華在計劃會議上原話究竟是怎樣講的（如衛生部長劉湘萍也說記得華就是講的「按既定方針辦」），還派人去找主持計劃會議的谷牧，要他「講真話」。這些，似乎是一種洗刷責任的退卻，而不是一種對抗和進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這樁疑案作出一個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針辦」起初確實是個記錄錯誤，並不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但華國鋒為甚麼沒有立即糾正？也許他感到自己也有審查記錄稿不嚴格的責任，更沒有想到「四人幫」後來會大肆公開宣傳此話；也許他對毛是否另外講過「按既定方針辦」確實心裏沒有底。而「四人幫」拚命宣傳此話，無非是施加輿論壓力，希望不要改變毛澤東生前的方針路

---

67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插頁。

68 據毛澤東警衛隊長陳長江回憶，當時張與華國鋒一組。

69 魯瑛交代材料，1980年11月；王忠人：〈「按既定方針辦」一文發表始末〉，《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

線，以這根救命稻草保他們的「穩定」。在這一點上，如果他們一開始就知道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也會大力鼓吹的。這和他們不喜歡毛的「三要三不要」指示，是一個道理。

4 「四人幫」有沒有一個政變計劃？

在隔離審查「四人幫」當天晚上的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說明這次行動的重要性時說：「這次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使我們黨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們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災難，使我們的事業避免了一次大倒退。」這話的含義，就是提前粉碎了「四人幫」將要搞的政變計劃。汪東興發言更加明確：「『四人幫』在主席逝世後一段時間以來準備發動兵變，所以不得不先對他們下手。」以後，葉劍英也回憶說：「得到我們自己的情報，說上海的紅紙已經賣光了。他們在迎接偉大的節日。」「對他們的活動我早有察覺，但沒料到他們要在10號搞政變。」[70]江青也確實說過要迎接「盛大節日」一類話。

以後，從中央文件到不少史著，都說如果不先動手，「四人幫」馬上要搞政變。但奇怪的是，並沒有任何具體證據，只有閃爍其辭的推測，即傳言「四人幫」通過時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的孫玉國從瀋陽軍區調了兩個坦克師進北京，還有張鐵生一類小人物誹謗華的胡言亂語等等。更奇怪的是，1981年對「四人幫」審判之時，定罪是顛覆國家政府罪，但卻沒有毛去世後他們有政變計劃這一條。1999年華國鋒回憶此事時，也只含糊地說：張春橋的弟弟（總政宣傳部副部長）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枝彈藥。[71]

以上幾個方面，都難以說是「四人幫」有政變計劃的證據。

所謂「四人幫」通過孫玉國從瀋陽軍區調了兩個坦克師進北京一說，事出有因，只是毛遠新、王洪文的空想。根據「文革」後瀋陽軍

---

70 紀希晨採訪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11月24日。

71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

區司令員李德生證實，及孫玉國回憶，都根本沒有成為事實。按照毛澤東定下的鐵紀，調動解放軍一個連，都要由中央軍委批准。以至林彪事件時林立果坐擁三軍司令，卻束手無策；解決「四人幫」時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調動自己部下，都要陳錫聯代表中央軍委下指示。所以，「四人幫」要背着中央軍委調兩個師進中央所在地北京，已是癡心妄想；再騙這兩個師去搞政變，更無異夢囈。

至於張春橋的弟弟、總政宣傳部副部長張秋橋親自下到北京郊區坦克六師活動，後來查明，也是進行宣傳活動。當然有拉攏軍隊的潛在意圖，但離搞政變還差十萬八千里。

最後，「四人幫」確實在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枝彈藥。但時間是在毛去世前的8月中旬。而且，「四人幫」人都在北京，搞政變首要控制的也是首都，在上海發槍無濟於事，與其說是政變，不如說是一種示威對抗姿態，或者是狗急跳牆的辦法。數萬民兵抵抗百萬正規軍，無異以卵擊石。更何況，上海民兵知道真相後，有多少願意跟着沒有合法名義的「四人幫」跑？事實證明，北京的「四人幫」被抓後，上海一槍未放，即告瓦解。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四人幫」在這一時期的活動，看看其是否進行了政變的組織、物質和心理準備。

9月9日凌晨，毛澤東剛逝世，姚文元就對魯瑛說：「這幾天要是你們到處找我，突然找不到我這個人了，你要繼續做好報紙出版工作，現在階級鬥爭形勢還是很複雜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樣，還要看一看。」姚後來供認說：「我想用這種暗示的形式和他說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講明。」[72] 魯立即有不祥預感，建議說：「毛主席逝世後，首先要注意軍隊，軍隊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別注意安全，出入行動要小心些。」[73] 姚說的「找不到」，當然是自己遭到不測。如果是他們主動要搞政變，豈有放棄中央黨報這個喉舌不顧之理。

---

72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17日。

73 魯瑛交代材料，1980年11月。

9月13日晚上，姚在日記裏寫了和老婆金英長談的情況：「她的政治嗅覺很敏銳，和我有同樣的預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會趁機鬧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準備。」準備甚麼呢？姚想到了孩子：「我和英最擔心的是孩子，他們尚小，不諳世事，能經受住殘酷鬥爭的考驗嗎？」[74]顯然，姚指的考驗，是自己被捕後孩子的坎坷命運。

不久，考驗真的來了。王洪文看到了許世友兒子、北京軍區某部團長寫給情人、301醫院一護士的一封密信。信中寫道，許世友對他說：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裏。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60軍擺在無錫，就是盯着上海的。

王洪文把信交給了毛遠新，擔心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軍隊怎麼辦。」毛遠新想了想說：「北京軍區和衛戍區全靠不住，……最好的辦法，是盡快從瀋陽軍區調兩個師來。」王洪文說：「調動部隊要有軍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會聽你的？」毛遠新說：「我給孫玉國打個電話，讓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練的名義把部隊調到北京附近。」王表示同意，也找到北京市民兵指揮部和公安局、公安部，要他們調集三千民兵，出動警察和巡邏車，對中南海、釣魚台、人民大會堂進行重點守衛。[75]

在此之前，王洪文幹的一件蠢事，是9月11日通過秘書以中央辦公廳名義，給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指示在毛治喪期發生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請示中央，可直接找他的秘書聯繫。這件事，在「四人幫」罪證材料裏，作為了「四人幫」篡奪黨中央領導權的一條重要依據。其實，事後查明，王完全是個人行為，「四人幫」其他三人也不知情。

10月6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幫」的當天下午，姚文元與張春橋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他們已經預感到有甚麼事即將發生了。姚後來

---

74 姚文元日記，1976年9月13日。

75 審訊王洪文記錄，1980年7月12日。

交代，他當時對張說：「對華主席還是要幫，這是大局。」張冷冷地說了一句：「盡量幫吧。」張還說，華對批鄧不積極，「我想總要開三中全會吧，但還沒有考慮好，你有甚麼想法？」姚說：「華國鋒當主席，應當在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後來姚又說：「我接到一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該提高警惕。」姚雖然沒有說出名字，但張春橋十分清楚，那個「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沒有甚麼反應。[76]此時，張姚希望開十屆三中全會，與其說想搞政變，不如說他們企盼全會能再把自己地位維持一段時間。

姚說的那封信，是1976年7月下旬，新華社河南分社一個記者寫給姚親啟，要他轉給毛澤東的。信中反映了1976年初紀登奎兒子對河南省委組織部長的談話。談話說：

> 現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爭，說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毛主席還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之類的話……

姚文元回憶說：「我看了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另方面，又覺得是不是有某種根據。……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毛主席逝世後，我的確有垮台的可能。」姚說，這封信「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裏。」「沒有這封信，我也會感到自己會被批判的。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姚還回憶了他被捕前的心情：

> 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的

76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17日。

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帶着這種心情離開家的（引者註——指去懷仁堂開會，隨即被抓）。[77]

比起姚文元，張春橋表面上要沉穩一些，早就預料到會有這一天，但是別無他法，只有兩招，一是繼續用空話鼓勵同黨，二是讓上海作準備，發槍。姚文元記述說，張春橋「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許多，似乎有甚麼話要對我講……」[78]

9月23日，張春橋的秘書蕭木派人給上海最忠實於張的死黨、早年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成員朱永嘉、王知常等六人送來一封密信，內容是張9月18日晚上與蕭木的密談，要求看後銷毀。

信中說，蕭木對張表示擔心目前的形勢，特別是軍隊不在我們身邊。張春橋說：「現在的形勢不能同馬克思逝世時比，也比列寧逝世時的形勢好得多，當年托洛茨基是紅軍總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鄧小平雖被打倒了，但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在於誰掛帥。目前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集結起來，缺少掛帥的人物。」

蕭木問中央今後會出現怎樣的局面？張回答：「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只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如果今後要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在中央，在黨內的資產階級。」

蕭木談到現在人們普遍對形勢感到擔心。張說：「要樹立信心，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這是大方向。你轉告上海的同志們，要振奮精神，努力工作，準備鬥爭。」[79]

在張這番談話的前一周，華、葉、李已經建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聯盟。在此後三天，華、葉又初步確定了採用隔離審查的方式。張當然對此毫無覺察，但他即使知道，也無可奈何。所以，他認

---

77 審訊姚文元記錄、1980年7月17日。

78 姚文元日記，1976年9月13日。

79 王知常1976年12月14日交代材料：蕭木1976年9月18日密信（王知常恢復件）。

為目前「資產階級」還沒有掛帥人物，多半是以輕視華的能力來安慰同黨的空話。

給上海發槍，是張春橋與王洪文共同授意的。據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交代，1976年6月，毛澤東病重後，張春橋和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給民兵發槍。馬、徐和王秀珍共同批准，給上海民兵突擊發了大量槍炮，連原定入庫的兩萬多枝半自動步槍都發了下去。毛澤東去世後，徐景賢去北京向張春橋當面匯報：「已有所準備」，「馬老和我們已經給民兵增發了原定入庫的槍枝」。張聽了表示滿意。[80]同日，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將庫存的七萬條槍都發下去」。8月中旬，上海總共發槍炮七萬四千件，彈藥一千多萬發。

這種發槍舉動，毫無疑問是準備武裝對抗北京政權。但是，究竟是準備主動地發動政變，還是被動地防禦「政變」？顯而易見，靠上海民兵是不能保障「四人幫」人身安全的，更不能控制北京。這種「政變」，實際上是被動的割據抗拒。

9月27日，張春橋派秘書蕭木到上海傳達他的話：「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81]這些話，也是要上海防備的意思，並不是要上海主動發難。

最後，讓我們看看「四人幫」的領軍人物江青，這個時期做了些甚麼。

江青的王牌就是毛澤東夫人的地位，毛生前沒人敢動她，毛死後江青自然要繼續高舉這塊牌子。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能掌握毛的一些獨家指示，號令諸侯。於是，江青的第一招，是把眼光落在毛的檔案文件上。張玉鳳後來回憶說：

> 主席逝世前後，江青一反常態，每天到毛主席住處找我。每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跡。我覺

80 徐景賢交代材料，1976年12月15日。

81 審訊張春橋時的提問，1980年7月24日。

得不妥，這不合組織手續。主席逝世後中央還沒有決定文件怎麼辦，我不能隨便給，就沒給她。我推說原稿不在我這。江青、毛遠新看在我這弄不到文件，就給我按上個「偷文件」的罪名，要對我採取「緊急措施」，進行迫害。以達到他們盜騙文件的目的。[82]

汪東興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從釣魚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澤東的文件，交給毛遠新。當時保管文件的是張玉鳳，江青從她那裏「借了兩份文件去，沒有歸還。還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塗」。為此事，汪找華商量開一個會議討論。因為葉生病不能出席，就改為談話。可是江青卻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和毛遠新都叫來了。葉後來也來了。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並由汪東興封存。[83] 9月17日，汪和武健華給毛澤東的臥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前來吃了閉門羹。

江青拚命要找的是甚麼文件？

據說江青拿去的兩份，是毛澤東與楊得志、王六生等人的談話記錄，裏面涉及到對總參謀長人選的一些設想，被江青篡改了。江青模仿毛澤東的字很像，她是如何篡改的，不得而知。楊、王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和他們能談些甚麼重要人事安排，也是個謎。

按張玉鳳的說法，江青想要的，還有毛澤東的「九篇文章」。這是1940年代初，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針對當年江西蘇區臨時中央時期的九份有典型錯誤的文件痛加批判而寫成的一篇黨內通信文章，題目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是他批王明、周恩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激憤之作。1964年被人從檔案館裏找出來，毛澤東寫批語說：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

82 中發〔1976〕24號文件，頁94。

8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採訪汪東興談話記錄，1984年6月15日。

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毛澤東十分喜愛這「九篇文章」，1974年6月曾經修改，臨終前還想修改。

如果說，周恩來在世時江青還可以拿這文章對周發難，那麼周、毛都去世以後，文章對她還有甚麼幫助？仍是個謎。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鬧。由頭多數不是要害問題，如開除鄧小平黨籍，毛澤東的遺體保存，等等。只有讓毛遠新留在中央是件奪權的正事。她的理由是要毛遠新留下參加籌備十屆三中全會。因為毛遠新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三中全會也未確定日程，理所當然地被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拒絕，要他回瀋陽。多數政治局委員都不願意再有個狐假虎威的年輕人來指手畫腳。連姚文元也在日記中對江這種大鬧做法不以為然，說「大家都不滿意，這樣下去很危險。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經開始疏遠她，我不能這樣做……」。[34]

這一時期，江青繼續四處游說。9月末，她到清華大學大興農村分校講話，誣陷鄧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們把蘋果「留在最盛大的節日吃」，把膠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離開大興分校時，她又要人們「等着特大喜訊，準備學習公報」。

這些「盛大節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訊」指的是甚麼？如果是指「四人幫」政變成功上台，為甚麼要愚蠢地在大庭廣眾預先宣示？從「準備學習公報」一句看，應該是指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出版毛選第五卷、建造毛澤東紀念堂一類等已經在考慮中的事。

同樣還被廣泛繼續當作「四人幫」有「篡黨奪權陰謀」的主要依據，還有10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平谷講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打倒！」「今後還可能出甚麼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義。」其實，這類話「四人幫」包括毛澤東「文革」時期一直在講。

10月4日，江青突然提出要到石家莊去，指定專列車頭要用二七廠生產的，還要二七廠一些工人陪她去。華國鋒與吳德商議後認為，

---

84 姚文元日記，1976年9月13日。

江是在試探華是否同意她去外地，便同意了。通過報告，知道江並沒有到石家莊，在保定附近就停下，江「下火車扭扭擺擺採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時間就上車了，在車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幹部講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就回北京了」。[85]

歸納起來看，「四人幫」在毛去世以後這段時間裏，並沒有制定甚麼政變計劃，也沒有做甚麼發動政變的準備，更沒有確定葉劍英所說的10月10日政變時間。他們當然有奪權的野心，但說想完全取代華國鋒，尚為時過早。他們的活動，主要是給華和中央施加壓力，維護和擴大他們自己的權力、地位。或者說，是他們已經十分恐懼地感到了有被抓起來的危險，在做最後的掙扎。「四人幫」雖然做了種種絞盡腦汁的努力，但是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缺少關鍵的力量——軍隊。這是他們無法逾越的根本障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們已經掌權十年，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仍然不能控制哪怕是一個連的解放軍，那麼在毛澤東逝世後，想靠軍隊造反，更是夢想。所以，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輿論宣傳、尋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動鬧事等務虛活動上。就這一點，說「四人幫」就要搞政變，是過於抬高了這批只會拉大旗做虎皮製造動亂而不會打江山的文痞的能力。粉碎「四人幫」以後繼續這樣說，主要是為華、葉、汪等人採取武力解決「四人幫」提供必要性。

其實，武力解決「四人幫」的做法，在黨內雖然不合程序，但「文革」中黨內程序已經蕩然無存。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林彪等，沒有一個是召開正式會議決定的。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更重要的是，華國鋒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是最高領導人。再加上葉劍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地位，按照「文革」的慣例，已經有足夠的理由進行這次行動。更何況，中央政治局委員裏大多數是支持或認可這一行動的。

---

85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5－246。

四 「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

1 武力解決方案的確定與準備

1976年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商量如何處理「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初步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方案，並決定把這個方案在可靠者中徵詢意見。

9月26日晚，國務院小禮堂電影結束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的實施方案。吳德說：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無非是兩種，一是抓起來再說，二是開會投票罷免。開會又分兩種方式，一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投票決定，華國鋒這一派佔有多數；二是召開中央全會投票決定。李先念提出赫魯曉夫下台的例子，不同意開會解決。全面分析和權衡了各種情況後，三人認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政治局開會投票，我們有把握；中央全會開會投票，我們無把握。最後，經反覆掂量，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關於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華國鋒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吳德均表示贊同。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全國人民情緒還未調整過來，三人初步議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然後再動手。討論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5點才結束。隨後，華國鋒再次委託李先念將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葉劍英獲悉後表示完全同意。[86]

9月26日會議確定了粉碎「四人幫」的解決方案和解決時間，意義重大。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曾對李先念、吳德二人說：正是由於這次會議，他才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

9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工農兵座談會後，華國鋒、李先念和吳德在小禮堂旁邊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從那以後，李先念沒有再參加解決「四人幫」的具體部

86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37－239。

署，對何時採取行動也不知道。他曾多次打電話給華國鋒，詢問有關問題。[87]

10月2日下午3時許，葉劍英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葉劍英指出：該攤牌了，不能失掉時機，兵貴神速，乘人之不備。我們要立即找華國鋒同志談，要加速採取果斷措施。接着，葉劍英馬不停蹄地再次造訪華國鋒商談，希望華盡快解決「四人幫」。

汪送走葉後，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武健華來開會。汪直接說：「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四人幫』要採取行動。」汪要兩人先琢磨出一個行動方案，等汪從華家回來，再詳細討論。張、武考慮到了一些重要因素：利用出版《毛選》第五卷，按慣例在懷仁堂行事，以討論重要問題迫使王洪文、張春橋不能不到。

當晚9時，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向華匯報說葉來過，談了一個下午，討論如何解決「四人幫」。華說，葉剛才來過，你們意見和我想的一致。我們商議，由你先拿出一個執行辦法來，我們來議定。汪答應第二天拿出後再來向華匯報。汪回去後，又與張、武兩人進一步商討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時。

當時對解決「四人幫」的順序、處置待遇、行動時間、隔離地點、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細則。為此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包括「四人幫」歷史和現行罪證，由李鑫負責。從10月3日起至6日，李就躲在汪家，起草中央關於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文件和出版《毛選》第五卷及建造紀念堂的決定；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人員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並個別談話。

3日晚9時，汪到華辦公室，向他匯報了實施方案。華說：我認為辦法是可行的，我考慮時間是否再縮短一些，爭取提前解決。兩人並約定，誰先見到葉就徵求他的意見。[88]

---

87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0。

88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同日，華國鋒到吳德住處，問他：「四人幫」在北京市有甚麼爪牙。吳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華國鋒同意，還說：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生大問題。穩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10月3日或4日，吳德到華國鋒處，華提出，葉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華國鋒問如果這個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來，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北京衛戍區靠得住靠不住？吳德說：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對「批鄧」是不滿的，對「四人幫」很反感。我是衛戍區的政委，我相信吳忠是會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我們一致行動的。[89] 實際上，在此之前，葉劍英已通過吳忠的老領導蘇振華，做通了吳忠的工作。吳忠請蘇振華轉告葉：只要我吳忠在，除了來自華總理和葉帥這個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調動衛戍區的一兵一卒。[90]

華國鋒還說：新華社、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飛機場、郵電局等單位要由衛戍區控制起來。

吳德找了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在坦克六師旁邊，北京衛戍區駐有一個坦克團，如有情況，可以起作用。吳德又按華的指示找到陳錫聯。陳錫聯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吳德與吳忠商量了具體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內緊外鬆的戒嚴工作。一件是前面說的坦克六師的問題（後來實際表明，這個師毫無問題），另一件是要防備學生、造反派從清華、北大等學校衝出來，造成混亂。為此，在清華、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當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衝，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堵回去。吳德把與陳錫聯、吳忠商談的情況和部署報告了華國鋒。華又親自與吳忠談了話。[91]

---

89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3。

90 曲愛國：《吳忠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91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5。

10月4日下午，葉劍英來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幫」的行動方案向葉詳細匯報：確定以召開會議名義把王、張、姚找來中南海懷仁堂，名義是：一、討論《毛選》第五卷出版問題。二、討論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解決順序是，先解決王、張，再處置江、姚。毛遠新區別對待，就地監護。葉說，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必會成功。要特別注意保密。汪提出屆時要華和葉到場坐鎮。[92]

同時，華國鋒也把吳德找到家裏，再次全面檢查了準備工作。5點多鐘，吳德剛離開，汪又來到華家，向他匯報了與葉商議的方案，隨即又把吳德找回來。汪東興、吳德在華國鋒家裏進行了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商議。商定：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華國鋒、葉劍英坐鎮中南海懷仁堂指揮，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毛選》第五卷出版問題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會，由華宣布他們的罪狀，隨即由汪組織的人分別對其隔離審查。汪東興派張耀祠到江青住處對她隔離審查。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和吳忠負責解決。三、中南海內如果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的部隊支援。四、由北京衛戍區把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台、中央機關以及由遲群、謝靜宜控制的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鬆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93]

10月5日凌晨2點，汪再次來到華家，匯報行動方案落實情況，提出解決姚文元時要北京衛戍區協作。下午，華、汪前去檢查了準備關押「四人幫」的地下工程。[94]

---

92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93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47

94 有說在中南海的地下室，不確。根據種種分析，應該是關押於北京毛家灣至官園的當時剛建成的地下工程（即現在的中紀委所在地）的不同區段，可以從中南海地下通道驅車通往。1977年4月10日，「四人幫」由此處被移送秦城監獄。

在最後一次的商議中，華說，就照這個行動方案辦。經過五天的準備，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會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這天，《光明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宣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葉劍英注意到這個情況，於10月5日下午找到華國鋒緊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動，盡快解決「四人幫」。華國鋒與葉劍英商定：改變原定國慶節後準備十天再動手的時間，提前到6日晚8時採取果斷措施，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隨後，葉劍英又與負責實施具體行動方案的汪東興進行緊急磋商。汪東興回憶說：

> 本來計劃在國慶後準備10天再動手，後來考慮拖得越久，越危險，便改為六天，定在6日。……我們談得非常興奮了，也很疲勞了，我讓他休息一下，在我這裏吃頓晚飯。他說我們就這樣定了，不要變了。[95]

2 「四人幫」束手就擒，華國鋒順利即位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時，汪東興要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通知政治局常委：華國鋒副主席今晚8時，在懷仁堂正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內容有：一、研究《毛選》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

下午3時，汪東興把張耀祠和武健華叫到辦公室，宣布：「中央決定在今天晚上8時統一行動，粉碎『四人幫』，……」。汪要求張的行動是，先去解決毛遠新，再等武健華來，一起去拘押江青。

為完成這次行動，經過反覆挑選，從中央警衛局的局、處、科級和中央警衛團的師、團、營級幹部中抽調了二十幾名幹部，分成四

95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頁618。

個行動小組。第一小組組長李廣銀，負責解決王洪文。第二小組組長紀和富，負責解決張春橋。第三小組組長高雲江，負責解決江青。第四小組組長滕和松，負責解決江青。

3點半，汪東興分別對每個行動小組進行動員，下達任務，宣布這件事是葉帥和華總理拍板的。頒布了兩條紀律：

一、要絕對保守機密。萬一失密，將給予最嚴厲制裁。

二、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開槍。爭取不響槍、不流血解決問題，這是上策。[96]

考慮到王洪文可能帶槍，有人問：如果有人開槍，怎麼辦？汪東興說：如果有人開槍，你們就往死裏打，打死了你們沒有責任。[97]汪東興又把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找來，通知他今天晚上行動，鄔負責懷仁堂外邊，武健華負責裏邊。

晚上6時30分，各路行動人員就位。汪東興全面進行了檢查。來到懷仁堂前進一步交代：把開會者的隨員都放在懷仁堂南面的來福堂等堂院。又指揮對懷仁堂正廳進行了布置：北側豎立著一扇大屏風，東邊增加一排小屏風，場內擺放一張長條會議桌，後面放了華、葉坐的兩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7時20分，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葉劍英。他握住鄔的手，半天不鬆開，只說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98] 7時40分，第二個到來的是華國鋒。三人進行了簡短商議，汪說：「可以說是萬事具備。」[99]

懷仁堂裏發生的情況，很多著作和回憶錄裏都有描述，細節略有不同：

7點45分，華、葉、汪三人一起走進正廳，華在左、葉在右坐下。華把事先準備好的中央決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葉要汪坐下，汪謙虛地說，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這裏，然後躲到屏風後去指揮。

---

96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稱有三條紀律。

97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頁630。

98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

99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7時55分，王洪文第一個進了小門，身穿軍上衣便裝，夾着皮包，毫無戒意。兩個行動組員立即從兩邊將他胳膊緊緊扭住。王張紅着脖子咕嚕了兩句「你們幹甚麼！你們幹甚麼！……」，然後拚命扭動胳膊，蹦着雙腳，後面的人抓住腰帶將他提起，控制在華正面。[100] 華國鋒伸直兩臂按在桌子上，宣布：「王洪文，你不顧中央的一再警告，繼續結幫拉派，進行非法活動，陰謀篡黨奪權，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

王洪文被扭離現場帶上手銬，這時他歎息一聲：「想不到你們這樣快！」

這時候，即7時58分，張春橋已經心事重重地走進來，身穿灰色中山裝。他迎面看到華、葉端坐中間的異常情況，放慢步子嘀咕着：「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兩個行動組員衝上去快速夾擊，把他扭架到華、葉面前。華宣布同樣的中央決定後，把張押出現場。張臉色鐵青，兩眼微閉，自始至終沉默，一聲不響。

解決兩個人，前後不到10分鐘。然後，按原定計劃，華國鋒給姚文元打電話：「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橋同志在懷仁堂，商量出版毛選五卷的事，有些問題還想聽聽你的意見。是不是請你現在就來，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答應：「好的，我馬上就到。」[101]

等待中間，華給時刻守候在電話邊的吳德、吳忠打電話問，昌平南口那個坦克師有動靜嗎？吳德說沒有異常，也問華，還要多久結束。華說，大約半小時。

安排好後，華問葉、汪：「還要我們出面嗎？」葉說：「免了吧。」決定由武健華對姚宣讀隔離審查命令，華親筆給武現場寫了手令。執行地點改在東休息室。

---

100 汪東興回憶及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稱王曾掙脫向華、葉撲去，只差兩米才被制服。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稱「均屬謬誤流傳，並非事實」。

101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8時25分，姚文元走進來。因為華、葉、汪沒有出面，解決姚的時候他並不像後來被審訊時說已有預感，就是不肯相信此事。三個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警衛員：「小朱！小朱！」「誰讓你們幹的！……」武健華宣讀命令後，姚一邊被架走一邊喊：「我有話要說！我有話要說！」被押解上車以後還不住喊：「你們是哪個部隊的？誰指使你們幹的？」行動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102]

從懷仁堂的東側門裏，共開出了三輛紅旗車。這時，武健華從懷仁堂裏走出來對鄔吉成說：「汪主任要你給張耀祠打一個電話，問他那邊的事搞完了沒有。」電話打過去，張耀祠說：「這邊的事情已經順利結束了。」[103]

武健華等一起來到南院，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警衛、秘書、醫生、護士十餘人宣布說：「你們的首長，現在已經有別的安排了，你們原先的工作也結束了。現在你們把武器交出來。」這時，跟着葉劍英的參謀馬錫金和衛士牟乃川誤解了，一下站起身，瞪圓了眼睛。鄔吉成馬上說：「你們兩個沒事，趕快去懷仁堂那邊照顧首長去吧。」[104]

張耀祠那邊的任務是負責隔離審查江青和就地監護毛遠新。

晚上8時，張耀祠和一中隊指導員李連慶十幾個人先到毛遠新住所，進到他的辦公室，他們正在看電視。毛遠新立即站起來，關了電視機。

張耀祠宣布：「毛遠新，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保護審查，為了你的安全，還住在這裏（中南海），但要換一個房間。現在你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材料和文件由中央辦公廳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同志負責，不准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你寫的交代材料交李連慶同志轉交黨中央。」

---

102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103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張耀祠、武健華都回憶說武健華也參加了解決江的行動，但馬曉先、鄔吉成都回憶武未在場。按：武說他指揮解決姚是在8時30分結束，張說指揮解決江是在8時30分開始，武似乎來不及參加解決江的行動。

104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

宣布完後，毛遠新憤恨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然後就不再說了。一個幹部上去繳了他的手槍、鑰匙。[105]

隨後，8時30分去解決江青。張耀祠帶着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進了中南海新建的201所前門。江青正坐在沙發裏，把腳蹺在蹺腳墩上。張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張紙條宣讀道：「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到另一個地方，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106]

在一邊的馬曉先後來回憶說：江青聽着的時候坐在沙發裏一動不動，表面上沒有顯出慌亂。她自己經常說，我要不就上去，幹一番大事業；要不就可能成為階下囚。等張耀祠把話說完，她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又重複了一遍。江青這才站起身來，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裏，摺好口，拿釘書器釘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然後交給了張耀祠。馬曉先說：「這一連串的動作，江青做得不緊不慢，看似鎮定自若。」然後，她提出要上一下衛生間。張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進去。張耀祠立即要馬曉先把江青的日常生活用品收拾好，準備離開。然而，東西收拾好了之後，江青還沒有從衛生間裏出來。馬曉先進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裏愣神思考着甚麼。馬曉先沒說甚麼就出來了，江青隨後也出了衛生間，坐上了停在前門外的一輛大紅旗轎車。馬曉先記得，轎車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駛入了一條地下通道，最後到一個不知道的地點。[107]

為防止走漏消息，當晚，汪東興即在懷仁堂召開了進駐「四人幫」住地清查的會議，決定連夜進駐清查。「四人幫」的家屬必須重

105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頁162。

106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頁162。

107 馬曉先回憶見王凡、東平：《披露歷史真相：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新安排住處，但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和他的兩個女兒，無論如何也不離開家。汪東興在玉泉山開會時不斷電話催問，最後才解決。

就這樣，驕橫不可一世的「四人幫」，7時55分至8時30分的35分鐘內即全部束手就擒。同時，吳德在北京市委以開會的名義，召來遲群、謝靜宜等，予以逮捕。

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華國鋒便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所開會。通知到李先念時，正好紀登奎接電話，問：「研究甚麼問題呀？」回答：「通報隔離審查『四人幫』的事，還有幾個有關問題一道研究。」[108]

晚9時15分，華、葉、汪離開懷仁堂前往玉泉山。途中，還去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

毛澤東追悼大會結束後，9月20日凌晨，毛的遺體被轉移到代號「769」的地方，在那裏暫時保存。這是位於北京西城毛家灣附近的地下工程，與人民大會堂地下相通。安全保密，也容易密封和低溫。毛的遺體要在這裏放一年左右，直到毛主席紀念堂建好。

10月6日晚9時多，解決了「四人幫」以後，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來到「769」毛澤東遺體前，肅立致哀。張耀祠站在一旁。只聽得華國鋒口中喃喃地唸着：「……我們執行了您的遺願，一舉解決了『四人幫』的問題……請主席安息吧。」[109]

地下室裏靜得可怕。沒有人知道如果毛突然醒過來，這時候會說甚麼話。

隨後，華、葉驅車前往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所。晚10時，中央政治局在京11名成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倪志福、吳桂賢在葉客廳召開會議。會議一開始，華國鋒按照與葉劍英商定的內容向政治局委員們宣布：

---

108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109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266。

我現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時，中央已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為由，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拘捕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來懷仁常列席會議，做些《毛選》文字的修改工作，他來後，在懷仁堂東休息室被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被拘捕的。根據他們篡黨奪權的嚴重罪行，分別向他們宣布了由我簽署的中央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的拘捕是在懷仁堂正廳，葉帥坐鎮，我分別向他們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執行任務的有關負責人員向他們宣讀的。對毛遠新實行了保護審查。「四人幫」在北京的幾個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衛戍區根據中央指示解決。[110]

葉劍英在講話中說：我們粉碎「四人幫」，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強調說：『『四人幫』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不然要出大亂子。』毛主席臨終前，還拉着我的手叮囑說：「我死後江青可能要鬧事，你要協助國鋒同志制止他們。」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堅定的明確的決心。我牢記着毛主席的囑託，協助國鋒同志進行了這場鬥爭。毛主席生前還有一着棋，就是組織安排。周總理病重以後，「四人幫」以為，按照原來的次序，政治局應該由王洪文主持，國務院應該由張春橋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給他們。鄧小平被推下台後，毛主席經過反覆考慮，選定了華國鋒同志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這種安排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毛主席為甚麼要下這盤棋呢？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這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所以我說，這次粉碎「四人幫」，首先要歸功於偉大領袖毛主席。

110 周啟才：〈粉碎「四人幫」當夜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世紀》，2006年第2期。

由於華國鋒、葉劍英事先以不同方式將解決「四人幫」問題同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打了招呼，會議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回憶說：

> 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說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他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七十九歲了，你年紀比我小二十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111]

隨後討論中央16號文件，內容是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通報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吳德回憶，在討論時，好像是紀登奎說，毛主席曾講過對「文化大革命」作三七開的評價，文件是否應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葉劍英說：這個文件不可能解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他做了個手勢，豎起大拇指，說毛主席還是這個。[112]

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和〈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的通知〉：

> 現將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發給你們，請你們立即在黨內傳達。
>
> 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

111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

11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50－251。

政治局會議還討論了一些比較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成立了審查王、張、江、姚的中央專案組，由華國鋒負責，成員即全體政治局委員；專案組下設辦公室，汪東興兼任主任，成員有于桑、嚴佑民、武健華、周啟才、任子超、王志民。會議還決定，就粉碎「四人幫」問題，中央政治局將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會議特別研究了解決「四人幫」上海餘黨、穩定上海局勢的問題。會議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穩定首都局勢，北京不能亂，出事由吳德負責任。凌晨3時，會議結束，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留在了玉泉山。

3 軟硬兼施平息上海叛亂陰謀

解決了「四人幫」以後，華國鋒當即在懷仁堂電話召來已經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飆，給他寫了個條子，讓他帶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耿飆與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丘巍高趕到後，立即集合警衛部隊封鎖電台，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後面見在台裏值班的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宣布接管。把電台的主要領導幹部都集中到會議室，派衛兵把守，規定三天內不得出去。

午夜，中央辦公廳緊急電話召回正在唐山抗震救災的北京軍區副政委遲浩田。10月7日，在中南海由紀登奎、耿飆布置，遲與孫軼青、郗漢生當日接管了《人民日報》社。

10月7日，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等持華國鋒的手令，前往中共中央組織部將「四人幫」歷史檔案借出，編寫罪證材料。

按照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解決上海問題的部署，10月7日凌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長周啟才給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和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打去電話，通知當天由中央派專機接到北京開會。一向與上海幫對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應，馬卻與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商量一陣，才滿腹狐疑地出發。到了北京京西賓館，他們接到中央的四條規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電話，不准外出，不准寫信，不准接客。

當晚，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陳永貴、蘇振華等中央領導人在玉泉山5號樓會議廳接見了參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會議的地方黨政軍負責人，有江蘇省委和南京軍區負責人彭沖、廖漢生、丁盛、許家屯等。10月8日，又在同一地點接見了上海馬天水、周純麟等。

華國鋒等在講話中宣布了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定，並且歷數了「四人幫」的罪行，及毛澤東長期以來對「四人幫」的批評。會場響起了熱烈掌聲。

為了穩住和挽救馬天水等，華說，「四人幫」就是「四人幫」，我們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給他們辦點壞事，說過錯話，一律不追究。要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要因為四人幫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搞到一起，搞「四人幫」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是篡黨奪權。

葉劍英說，「四人幫」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據地。「上海就是張春橋，張春橋就是上海」，這話不好，上海要和張春橋分開。

李先念說，上海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對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上海的問題，馬老要鼓起勁，上海一月風暴要肯定，要相信上海的黨和群眾。

接見結束後，華國鋒對馬天水說：「你回京西賓館後，立即給徐景賢、王秀珍打電話，告訴他們明天來京開會。」並要周啟才陪同去監視馬打電話。[113]

馬天水當面雖然也熱烈鼓掌和握了手，回到住處，他卻對秘書說：「這簡直是突然襲擊，宮廷政變。」「搞一個假表態可以回去，回去以後也要大幹或小幹的。」但又歎息：「一旦幹起來損失太大，現在看來大勢所趨，幹是不行了。」對中央要求他的表態，第二天馬不

113 周啟才：〈粉碎「四人幫」當夜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世紀》，2006年第2期。

顧周純麟的勸告，說：建議中央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張春橋在一月風暴、大聯合中是有影響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對待。[114]

這時候，上海市委的「四人幫」餘黨焦躁不安，通過各種渠道都聯繫不上「四人幫」，感覺不妙。終於，他們從馬天水的秘書那裏得到含糊的回答：「老胃病復發。」於是緊急派出人前往北京打探。10月8日晚，從上海派到全國總工會的金祖敏那裏得到約定暗號：「我娘心肌梗死」——「四人幫」被抓。同時上海幫安插的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也電話報告：「人員集中了，門上加鎖了，不能動了。」

徐景賢、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開會商議，朱永嘉說：「要拉出民兵來幹！打一個星期也是好的，時間拖得越長越對我們有利，讓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樣！」大家決定立即緊急動員民兵，成立兩套班子：徐景賢率王少庸（上海市委常委）、張宜愛（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李仁齋（上海警備區師長）、朱永嘉進一號指揮點；王秀珍、馮國柱（上海市委常委）、李彬山（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楊新亞（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等進二號指揮點。徐景賢下達了手令：「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2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同時，徐還向李仁齋下手令，要求調兩個連，一個聽電台指揮，一個「聽從市委的指揮」。[115]

上海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鍾定棟接受任務後，12日制定了兩個方案，其一為「捍一」：控制首腦機關、報社、電台、機場和市區橋樑、車站、碼頭、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為「方二」：以江蘇、浙江為作戰目標，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設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體內容有：全市準備動用武裝民兵33000餘人，炮85門、機槍78挺、槍枝27000餘枝、彈藥296餘萬發；民兵幹部徹夜值班；基本指揮所在江南造船廠，預備指揮所在中國紡織機械廠，10月9日

114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頁104－105。

115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頁42。

11時進駐完畢；開設電台15部，組成兩個聯絡網；動用汽車125輛、摩托車100輛；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處設六個控制圈；派出武裝漁輪巡邏，控制黃浦江渡口；規定反空降方案和口號、暗令、標記。

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幹青、徐成虎也連夜組織1300多人的武裝民警，還組織了緊急演習。

10月8日晚12時，王秀珍還在民兵指揮部召集了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頭目，宣布：北京右派政變了，修正主義上台了！我們要對着幹！打三天、四天也好，讓全國知道，也教育後代！

10月9日，由廖祖康組織，擬出二十條口號：

否定文化大革命絕沒有好下場！

誰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就和他鬥到底！

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

一月革命風暴精神萬歲！

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

決不容許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116]

……

北京的回答是，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選》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指出：「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

116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頁47。

一軟一硬的兩項措施，把繼承毛澤東的旗幟抓在了北京手裏，上海幫被推到了兩難處境。徐景賢再三考慮，不得不與王秀珍商量後同意上海兩報轉載中央兩個決定。這時，接通馬天水電話，馬說：「見到了王、張、姚三位首長，他們身體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較忙，讓我們按既定方針辦。」[117] 上海幫半信半疑，卻終於沒有勇氣發動叛亂，王秀珍電話通知：「撤消五位數（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數（即3500人），恢復正常。」[118]

接到要徐景賢、王秀珍也來北京開會的中央通知後，徐、王經過通宵密謀，不敢不去，只好前往。10月10日，兩人到了北京，中央給他們看了大量「四人幫」材料，中央政治局委員與他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陳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們懸崖勒馬。同時，要他們每天往上海打一次電話，穩住上海留守的餘黨，「一切等他們回來再定」。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餘黨亂哄哄地群蛇無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動作。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向上海派工作組接管上海的問題。華國鋒說：現在看來上海市委這些人已經無法工作了，他們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和中央對抗，妄圖發動武裝叛亂。中央應該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會出大亂子。葉劍英表示贊成華國鋒的意見，他說：要派一位無論是在軍隊還是在地方都能壓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蘇振華堪當此重任。他資格老，林彪、「四人幫」整得他很慘，但他鬥爭很堅決，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起了重要作用。華國鋒、李先念還分別建議倪志福、彭沖與蘇振華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關於工作組去上海的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是：「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119] 華國

117 陳藏金：《將軍捲進漩渦：「四人幫」上海餘黨覆滅記》（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頁174。

118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採寫：《共和國大審判》（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29－30。

119 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5）。

鋒、葉劍英派這三人，頗費了一番心思。蘇是海軍政委，能夠控制上海附近的東海艦隊，具有威懾力；倪是上海工人代表和勞動模範，可以取代王洪文；彭在江蘇任領導，富有地方工作經驗，可以協調周邊關係。最後確定的中央工作組總數226人，其中部省級幹部17人、司局長幹部59人。

當日晚10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陳錫聯、紀登奎、吳德、汪東興、蘇振華、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接見了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華國鋒先要馬天水談談，馬天水匯報了幾天來的思想認識過程，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對篡黨奪權的「四人幫」採取的果斷措施。

華國鋒等講話繼續揭露了「四人幫」的罪行。葉劍英嚴厲地警告說，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幫」方面，對自己的工作沒有好處。你們在上海同他們工作那麼久，希望不是站在個人的立場，要對他們陰謀篡黨劃清界限。對上海的幾位領導同志寄於很大的希望。也有電報，說上海民兵有行動，中央信任你們，對你們放手，把上海事情辦好，信賴你們。

華國鋒說，要提醒你們，在他們蒙蔽下，確實存在着一些錯誤，確實轉變立場後，會發現一些問題。自己的問題作些自我批評。我們不會採取「四人幫」對別人的辦法，亂戴帽子，亂整人。有錯誤改了就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廖祖康、蕭木要來京辦學習班，他們是青年，要幫助改正錯誤，我們相信你們能搞得更好。

最後，馬天水、周純麟都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果斷措施。徐景賢、王秀珍說，這次來北京前，把王、張、江、姚當作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代表，和馬天水、周純麟又通不上電話，以為有壞人把幾位領導逮捕了，就在上海和軍隊的幾位同志會合在一起，還調動了民兵，準備決一死戰。現在了解了這幾個人原來是篡黨奪權的「四人幫」，感到極大的義憤。他們表示要堅決和「四人幫」劃清界限，決心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華國鋒笑着說：你們回去別人會罵你們是叛徒！你們把立場轉變過來，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10月13日上午，表態後的馬、徐、王從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時，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了上海幫最後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會。馬天水低沉地介紹了中央打招呼會議情況，中間還夾雜着稱「四人幫」為「同志」，被徐急忙地打斷糾正。徐、王也無可奈何地傳達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剛傳達完，黃濤放聲大哭，指着馬天水說：你在北京，原來沒有看到王、張、姚，……這不是欺騙我們嗎！朱永嘉也邊哭邊斥責馬、徐、王是「叛變」。會議室裏一片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表示想不通，說憑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幫」……王少庸激動地說，我們上海這幾年在路線上沒有甚麼彎子可轉！……馬天水急忙制止他，最後總結說：有想不通的問題，是允許的，認識總有個過程，不過我們大家要好好去想想。會議遂告結束，上海幫鳥獸散。

10月14日上午，上海把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到各區縣局和大學負責人，下午開始向群眾傳達。上海沸騰了，全市一下湧出成千上萬張大字報、大標語。從外灘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樓，貼滿了標語：

誓死捍衛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絞死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砸爛「四人幫」在上海的老窩！
揭開上海市委階級鬥爭蓋子，徹底肅清「四人幫」流毒！
市委為甚麼不傳達中央關於上海是「四人幫」基地的指示？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必須老實交代！

從10月15日下午起，手持紅旗和標語的遊行隊伍一隊一隊來到市革命委員會大樓，外灘人山人海。上海市委已經失去控制力。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十分緊張，於10月15、18日連續兩次電話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據你們來電話要求派人，據上海的要求，中央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去上海了解情況，幫助工作。他們今晚已到上海，會給你們聯繫的。」[120]

120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頁12。

這時候，蘇、倪、彭已經率中央工作組住進了上海海軍基地。在此之前，中央已經秘密派去了陳錦華等八人在上海探聽情況。當時有人提議駐紮在無錫的60軍向上海方向拉練，造成一種威懾。葉劍英表示，不需要這樣做，要相信上海工農群眾，軍隊一調動，馬上就會引起恐慌了。[121]

10月27日晚上，在上海市展覽館宴會廳召開上海市委領導幹部會議，正式宣布：中共中央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倪志福兼任第二書記，彭沖兼任第三書記。撤消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黨內外一切職務。

為了防備上海發生動亂，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來決定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保密兩個月以後才公布。但是，情況的順利發展，使得10月中旬就在全國城市爭相傳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夜在玉泉山會議上通過的宣布隔離審查「四人幫」的16號文件。《通知》包括六點，主要內容有：

一、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行反黨篡權的陰謀活動，罪行極為嚴重。

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行了多次嚴肅地批評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們就是不肯改悔。

三、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四、在揭發和批判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中，要注意政策。

五、反對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一律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

1976年10月21日晚，新華社播發消息：

121 陳錦華：《國事憶述》。

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

由此，「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諸於世，也實際上宣布了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告結束。

連日來，全國從城市到鄉村，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和集會。遊行的隊伍裏，自發參加的群眾佔了相當多的比例。許多人把「四人幫」畫成漫畫，舉在標語牌上；更有人將其製作成傀儡人，吊起來遊街示眾。人們再也不是過去那樣被動員上街的無奈表情，而是歡聲笑語，滿面春風，感到獲得了「第二次解放」。

實際上，在新華社消息公布前，人們就已經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得知了「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大家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奔走相告，擺酒相慶。據說北京、上海一些地方，本來就要憑票供應的酒，一時都售缺了。廣為流傳的笑話是：市場上的螃蟹被「三公一母」地串在一起賣，以此來表示人們對橫行多年的「四人幫」的痛恨。

善於與政治風雲唱和的詩人郭沫若，一反他五個多月前寫的〈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0月21日發表了他發自內心，也是他詩詞創作中最直白，卻最受中國人歡迎的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粱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後記

一疊厚厚的清樣放到面前，我才感到，如卸重負——一部帶有歷史使命的著作終於要出版了。所謂歷史使命，並不是說自己想「名留青史」，或是「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是了結了一樁時常被歷史責任驅動着的夙願。

我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但一直對這段歷史情有獨鍾，甚至超過自己的本來專業。記得1980年代在大學裏，朋友們一起面對星空，徹夜長談，撫今憶昔，感慨萬千，總覺得當代有無數沒有揭開的謎，最後囑咐我，一定把我們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寫出來。當時，自己是沒有那種勇氣的，所以雖也寫了不少有關研究論文，卻不急於發表，而是為撰寫這部書做準備。目的只有一個，記錄那個時代和我們那些同學少年曾經走過的路——當年為之呼喊和痛苦的理想。

在後人看來，那究竟是一種甚麼情懷？不僅僅是血淚、汗水和苦澀，還浸潤着愛。不是嗎，你在本書中看到的金觀濤、劉青峰伉儷，在大野和惶惑中淒美的愛情書信傳遞，難道不是一代人的追求？起碼我也是這樣，直到現在，已經是一個略有名氣的教授了，但夜深人靜，閉目瞑思，腦海中常常翻滾着的，還是那從中學生到青年工人的一幕幕。雖然，只是雪泥鴻爪。

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觀濤教授和他的夫人劉青峰教授，給了我一個實現夙願的機會，並且從人類文化角度予以啟發寫作。

還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教授和他的夫人李丹慧教授，在我寫作此書時給予的幫助。特別是李丹慧教授，慨然應允承擔本書的合寫和修訂。合作過程中，我深深感到了她學識的精湛廣博和一絲不苟。

我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愛人陸風，是她陪伴我的那些不眠之夜，共同的撫今憶昔，使我重新觸摸到歷史脈搏，找到寫作靈感。正像我們的日記裏留下的那句話：風起雲走，雲在回首。

史雲

2007年1月19日寫於大學靜園

2號公寓17樓6單元584室

大事記

1972年

1月6日　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逝世。毛澤東參加追悼會，並在談話中肯定陳毅和鄧小平的歷史貢獻。

1月13日　中共中央轉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

2月5日　毛澤東、周恩來批准國家計委〈關於引進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

2月21日－28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進行會談，雙方簽訂上海聯合公報。中美關係走向緩和。

3月13日　中國和英國簽署聯合公報，決定將兩國關係由代辦升格為大使。

3月26日　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謝富治逝世。

3月30日　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稅條例（草案）〉，進行稅制改革。

3月31日　財政部發出〈關於改進財政收支包乾辦法的通知〉，對去年已經進行的財政收支包乾改革作出補充規定。

4月7日　國家計委發出〈關於嚴格控制增加職工，充分挖掘現有勞動力潛力的通知〉，5月30日，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等發出〈關於加強基本建設管理的幾項意見〉。6月9日，國務院發出〈關

於加強工資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對國民經濟出現的「三個突破」問題進行控制治理。

4月24日　《人民日報》發表根據周恩來意見寫成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求對新、老幹部一視同仁對待。

5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

5月8日　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指出北京市招收的工農兵學員初中程度的佔百分之六十，必須進行補習。

5月21日－6月2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對林彪集團進行揭發批判。周恩來於6月10日至12日在會上做了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六次路線鬥爭的反省報告，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過分的剖析。

6月　劉家峽水電站的劉天關輸電線建成輸電。

7月2日　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

7月14日　周恩來指示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要把理科基礎理論水平提高。

7月17日－1973年2月20日　中共海軍黨委四屆五次全會擴大會議召開，進行海軍內部的批林整風。張春橋給蕭勁光扣上「上林彪賊船」罪名。

7月21日－8月1日　周恩來批評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外交部極左思潮沒有批透。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在接見《人民日報》社領導時提出反對批極左意見，形成了批林彪的「極左」還是「極右」的爭論。

8月1日　國防部舉行建軍四十五周年招待會。陳雲、王震等老幹部重新露面。

同日　新華社報導，長沙馬王堆漢墓考古發掘取得重大成就，出土保存完整的女屍和帛畫。

8月14日　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作出批示。鄧小平在信中做了自我檢查，希望重新安排工作。毛澤東批示肯定了鄧小平的歷史貢獻。

8月21日　中共中央發出徵詢意見通知，規定已經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撤消「三支兩軍」的軍隊人員。

同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從西德和日本進口1.7米軋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

8月25日起　江青同美國女教師維特克進行六次談話，將她與毛澤東的私生活信息大量泄露。後社會上流傳「紅都女皇」事件，中共中央決定派人買回該書版權。毛澤東批示要將江青撵出政治局。

9月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

9月25日－30日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

10月6日　《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龍岩文章〈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這兩篇文章是根據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指示撰寫的。張春橋、姚文元組織人追後台，進行反擊。

10月13日　湘黔鐵路建成通車。

11月12日　北京等地舉行孫中山誕辰106周年紀念儀式，「民主黨派」「文革」以來第一次恢復活動。

11月26日　中越簽訂1973年中國對越援助協定。中國對外經濟援助達到空前規模。

11月28日　中聯部和外交部提出批判林彪極左思潮的報告。周恩來表示同意。江青和張春橋批示反對。

12月1日　原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逝世。

12月5日　《人民日報》王若水上書毛澤東，反映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問題。12月17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和張、姚談話，認為極左思潮要少批一點，批林要批極右。從此，全國批林輿論開始轉向，不許批極左。

12月10日　中共中央轉發報告，傳達毛澤東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此後，全國人防工程建設形成規模。

1973年

1月2日　國家計委提出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提出進口預計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技術設備計劃，建設26個工程項目。被稱為「四三方案」。毛澤東、周恩來批准了報告。

1月7日至3月30日　全國計劃會議召開，着手研究解決國民經濟「三個突破」的嚴重問題。

1月26日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自殺。

2月12日－9月　全國恢復成立各省、市、自治區一級共青團、工會、婦聯組織。

2月15日－19日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中美雙方商定建立聯絡處。

2月26日　國家計委擬出〈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提出十項具體措施。但文件被張春橋反對而不能下發。

3月8日　周恩來在慶祝三八婦女節招待會上，向受打擊迫害的來華外國專家道歉。

3月10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4月12日鄧小平復出公開參加外事活動。

3月17日　國務院科教組發出通知，恢復北京財貿學院等一批被撤消的高等院校。

3月23日　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知識分子屠德雍向全國投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狀〉傳單。

4月1日　河北農民段正寶投寄為劉少奇鳴冤的傳單。

4月25日　毛澤東給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家長李慶霖覆信。

5月20日－31日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傳達了毛澤東要批判孔子的指示。宣布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十三名老幹部，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參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7月3日　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意見，決定全國中專、技校開始恢復招生。

7月4日　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批評周恩來分管的外交部。

7月10日　中央專案組提出〈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建議開除林彪、陳伯達等八人黨籍。

7月16日　國務院計劃生育小組領導小組成立。計劃生育被列入「四五」計劃，成為基本國策。

7月19日　《遼寧日報》發表張鐵生的一封信，製造「白卷事件」。

7月28日　江青等審查湘劇電影《園丁之歌》，橫加指摘。

8月13日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成立，江青任名譽校長。

8月24日－28日　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秘密召開。通過新黨章，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當選為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成為實際上的毛澤東接班人，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

8月26日　中國第一台每秒運算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

10月22日　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

10月和11月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開始「反右傾回潮運動」。

11月15日　亞運會理事會通過確認中國為會員、驅逐台灣的決定。

11月21日－12月上旬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對周恩來會見基辛格時「接受核保護」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嚴厲批判。周恩來違心地做了過分的檢查。

11月28日　《光明日報》介紹「社來社去」的朝陽農學院經驗。

12月12日　《北京日報》發表〈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批判師道尊嚴。

12月22日　中共中央通知，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

12月30日　根據毛澤東指示，北京突擊進行「考教授」。

1974年

1月12日　毛澤東批准王洪文、江青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的建議。批林批孔運動開始。

1月15日　蘇聯駐華大使館秘書與派遣中國特務李洪樞秘密接頭，被中國公安部門當場擒獲。

1月19日－20日　中國海軍與南越海軍進行西沙之戰。

1月19日－21日　江青派遲群、謝靜宜調查製造河南馬振扶中學事件。

1月24、25日　江青召集駐京部隊和中央、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2月22日　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戰略。

2月22日－25日　梁漱溟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作反對批判孔子的長篇發言。

2月23日　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建成。

3月　陝西臨潼驪山北麓發現秦始皇兵馬俑坑。1976年又發現二號、三號秦俑坑。

4月6日　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

4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批林批孔中不搞戰鬥隊、不串聯。

5月15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在渤海地區建成大港油田。

6月1日　周恩來因患膀胱癌住院治療。

6月7日　新華社報導，山東臨沂銀雀山考古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

7月1日　鑑於批林批孔運動以來生產遭到衝擊，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7月17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等人說「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8月－9月10日　中央召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會議，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受到批判。

9月15日　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基本建成。

9月25日　湘黔鐵路建成通車。

9月2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同日　國務院科教組、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開門辦學的通知。

同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在渤海灣地區建成勝利油田。

9月30日　風慶號萬噸輪船遠航歸來，江青等人製造事端。

10月1日　毛澤東提議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提名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

10月18日　王洪文受江青集團指派，飛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恩來、鄧小平。

11月10日　「李一哲」在廣州貼出呼喚民主和法制的大字報。

12月23日－27日　毛澤東與周恩來、王洪文談話，確定四屆全國人大的組閣人選。

1975年

1月5日　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總參謀長，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

1月8日－10日　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追認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免除李德生的中央副主席。

1月9日　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逝世。

1月13日－17日　第四屆全國人大在北京召開，通過新憲法，選舉朱德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還任命了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周恩來在報告中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2月4日　遼寧營口、海城發生7.3級地震，死亡1328人。震前進行了預報。

2月5日　中共中央決定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

2月9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指示。

2月25日－3月8日　中央召開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鄧小平作重要講話，開始全面整頓。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

3月1日　根據毛澤東指示，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文章。4月1日，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發動「反經驗主義」活動。

3月18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全部釋放在押戰犯。

4月2日　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董必武逝世。

4月4日　反對極左錯誤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在瀋陽被慘無人道地割斷喉管，槍決殺害。

5月3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批評「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

5月27日和6月3日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批評。

5月8日－29日　中央在北京召開鋼鐵工業座談會，鄧小平發表講話，開始鋼鐵整頓。

6月24日－7月15日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鄧小平、葉劍英講話，開始軍隊整頓。

6－11月　根據鄧小平指示精神，有關部門起草三個關於整頓的文件。後被批判為「三株大毒草」。

7月14日　毛澤東作關於調整文藝界政策的談話。後又批示為電影《創業》等平反。

7月2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開始整頓地方黨組織。

7月29日－8月18日　雲南發生出動軍隊鎮壓回民的沙甸事件，造成回民死亡1341人的惡性後果。

8月8日　河南省駐馬店板橋水庫垮壩，造成死亡2.6萬人以上巨大災難。

8月13日　毛澤東評論《水滸》。後擴展為「評水滸」運動。

8月13日和10月13日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兩次通過鄧小平上書毛澤東，狀告遲群和謝靜宜。

8月23日－30日　教育部召開四省市中小學教育座談會。周榮鑫講話，開始教育整頓。

8月30日　中共中央軍委發出調整配備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主官的通知。

9月12日－28日　第三屆全國運動會舉行。

9月15日－10月19日　第一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

10月19日　毛澤東在談話中指責劉冰上書「矛頭是對着我的」，並批評鄧小平。

10月20日－31日　袁隆平培育的籼型雜交水稻通過鑑定。

11月3日　吳德在清華大學傳達毛澤東指示，教育領域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

11月15、16日　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批評鄧小平。

11月24日　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傳達〈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11月26日　中國第一次成功發射並回收衛星。

12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12月1日－5日　美國總統福特訪華。

12月14日　中共中央轉發〈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

12月16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康生逝世。

12月24日　新華社報導，焦枝鐵路建成通車。

1976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1月15日鄧小平在追悼會上致悼詞。

2月2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2月下旬起　中共中央分批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打招呼會議，傳達〈毛主席重要指示〉。

3月8日　吉林市郊區散落大量隕石雨。

3月26日　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由清華、北大人員當面批判鄧小平。

3月下旬－4月初　北京、南京及全國各地發生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四五」運動。

4月5日　中共中央決定對天安門廣場群眾進行鎮壓。

4月7日　經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6月15日　毛澤東在牀邊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毛遠新、王海容等八人，談「一生中的兩件大事」的「政治遺囑」。

7月6日　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

7月28日　唐山地區發生7.8級大地震，造成死亡242419人、36萬多人受重傷的極其慘重損失。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逝世。

9月11日　華國鋒委託李先念找葉劍英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李9月13日前往葉家。

9月26日　華國鋒、李先念和吳德商議，決定用武力解決「四人幫」問題，葉劍英獲告後表示同意。

10月2日　汪東興組織擬出隔離審查「四人幫」的行動方案，報華國鋒、葉劍英同意。

10月6日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在中南海採取行動，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同時被隔離審查的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當晚，在玉泉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10月7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10月7日－15日　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大軍區負責人到北京進行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情況。10月7日「四人幫」上海餘黨馬天水應召到京，10月9日徐景賢、王秀珍也到京。

10月8日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關於建立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

10月8日－12日　上海「四人幫」餘黨聞知消息，陰謀組織叛亂，因群蛇無首未成。

10月14日　上海市委向下傳達粉碎「四人幫」消息，上海市民湧上街頭慶賀。

10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知，宣布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決定。

10月21日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解放軍各部隊舉行盛大遊行集會，慶祝粉碎「四人幫」。

10月24日　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慶祝粉碎「四人幫」。

11月9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解決保定地區武鬥問題的公告。

11月24日　毛澤東主席紀念堂奠基儀式舉行。

12月10日　中共中央下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

12月10日－27日　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北京舉行。

參考文獻

一　檔案

1970年計劃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1970年3月18日
《人民日報》社黨組揭發魯瑛的材料，1979年8月
中共中央〈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附件二，1972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組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1983年11月
中共中央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中共中央關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
中共中央關於擴大〈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發放範圍的通知，1972年1月1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文件
毛主席同巴盧庫談話記錄，1968年10月1日
毛遠新筆記，1975年9月至11月
毛澤東同毛遠新談話記錄，1976年1月21日

毛澤東在外交部關於向美國友人等談林彪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批語，1972年7月
《毛澤東指示要點》，1974年9月12日
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談話（記錄傳達稿），1971年10月4日
毛澤東會見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談話記錄，1975年4月20日
毛澤東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記錄，1975年10月21日
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談話記錄，1975年9月21日
毛澤東與尼雷爾的談話，1974年3月25日
毛澤東與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1970年12月18日
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
周家慤交代材料，1979年12月3日
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1972年5月21日
周恩來在中央選舉準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3年8月20日
周恩來會見旅日、旅美華僑陳焜旺、梅子強等四十六人的談話，1972年10月6日
姚文元日記
紀希晨採訪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11月24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藏文化大革命檔案
徐景賢交代材料
國家計委檔案，20-0149
張曉剛譯：〈大平外務大臣、姬鵬飛外交部長會談（紀要）（1972年9月26－27日）〉，昭和53年5月打字付印，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存，《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張曉剛譯：〈田中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記錄（1972年9月25－28日）〉，昭和63年9月打印形成，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存，《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10期
清華大學黨委揭發材料，1980年8月20日
華國鋒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75年6月26日
菲爾·奧迪恩致基辛格備忘錄，1973年6月8日。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 June 8, 1973. Top Secret Subject: NSSM 169 — Nuclear Policy June 8, 1973

福建省檔案館，全宗 244 ，目錄 1 ，卷宗 77

審訊王洪文記錄

審訊姚文元記錄

魯瑛交代材料

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 1972 年，卷號 52 、 53

NSC files,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II

二 文獻

〈1971 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黨的文獻》，2000 年第 2 期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等人的談話，1969年3月22日，《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
王洪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人民日報》，1973年9月2日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3年9月1日
〔美〕威廉・伯爾（William Burr）著，龐偉譯：《基辛格秘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徐曉主編：《民間書信（1966－1977）》（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
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84
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赫海彥主編：《中國知青詩抄》（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鄧小平在萬里向國務院匯報徐州鐵路局情況時的插話〉，《黨的文獻》，1999年第6期

三 著作

丁東：《精神的流浪》（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下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內部發行
《小靳莊「典型」始末》（徵求意見稿），未刊稿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中國與第三世界（論文集）》（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1984年）》（香港：華潤貿易諮詢有限公司，198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文化部藝術研究院研究室編：《文藝大事記》（內部未刊本，1979）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王春才主編：《中國大三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王爰飛：《西哈努克沉浮錄》，上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石林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內部發行
多勃雷寧著，蕭敏等譯：《信賴——多勃雷寧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曲愛國等編：《援越抗美——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朱佳木主編：《當代中國與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屆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朱洪：《黃鎮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
宋成有等：《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李海文主編：《周恩來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杜修賢、顧保孜：《紅鏡頭中的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增訂本（長沙：湖南出版社，1988）
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一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
杭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浙江文革紀事》（杭州：《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內部刊印本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青野、方雷：《鄧小平在1976》（大連：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
〔南〕佩羅·茲拉塔爾著，陽果、雲飛譯：《霍查政治傳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施義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未刊稿，2002
柳隨年、吳群敢：《「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
范碩：《葉劍英在1976》，修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范碩等：《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唐家璇主編：《中國外交辭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夏義善編：《蘇聯外交六十五年紀事：勃列日涅夫時期（1964－1982）》（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孫平化：《中日友好隨想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
孫平化等監修、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時殷弘：《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柴成文等：《三大突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黨中央副主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曹衛東：《紅病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莫遠人主編：《江蘇鄉鎮工業發展史》（南京：南京工學院出版社，1987）
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
陳東林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卷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02）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陳敦德：《毛澤東尼克松在1972》（北京：崑崙出版社，1988）
陳楓主編：《血與火的歷練——施義之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陳肇斌：《戰後日本的中國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陳識金：《將軍捲進漩渦：「四人幫」上海餘黨覆滅記》（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賀龍傳》編寫組：《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越南國防部軍史研究院編，廖賢春等譯：《越南人民軍歷史》，第二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雲水：《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華社大事記》，未刊稿，1989
新華通訊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
楊匡滿：《「遺言」製造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
《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主編：《當代中國》叢書各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1984－1999）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
當代雲南編輯部：《當代雲南簡史》，未刊稿，2003
董志凱等：《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電視文獻紀錄片
靳凡編著：《公開的情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趙蔚：《趙紫陽傳》（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錢鋼：《唐山大地震》（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
錢鋼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羅伯特・羅斯（Robert S. Ross）著，叢鳳輝等譯：《風雲變幻的美中關係（1969－1989）：在談判中合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2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6)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 R. Dee, 1996)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四　論文

丹童：〈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親王〉，《黨史文匯》，2000年第1期
〈「文革」中的手抄本小說《一隻繡花鞋》浮出水面〉，《北京晚報》，2000年12月5日
方玄初：〈《教育工作匯報提綱》出台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輯
王忠人：〈「按既定方針辦」一文發表始末〉，《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

王英、孫中範：〈一九七五年黨組織整頓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1年第8期

王廣沂：〈譚甫仁被害案偵破始末〉，《人民公安》，2003年第12期

司任：〈毛澤東與「出逃」前的林彪〉，《傳記文學》，1995年第2期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北京大學博士論文，未刊稿，2005

吉偉青：〈《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發表的前前後後——推翻「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親歷記〉，《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10月號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灣），第20期

李丹慧、陳東林：〈論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學術部編：《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李丹慧：〈三八線與十七度線——朝戰和越戰期間中美信息溝通比較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赤男：〈林彪事件後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黨史博覽》，2005年第4期

辛雨：〈30年前轟動全國的《知青之歌》誕生奇聞〉，《街道》，1998年7月號

宗道一：〈153期《新情況》和基辛格第六次來訪給周恩來帶來的政治災難〉，《中華兒女》，2001年第9期

林蘊暉：〈蘇共二十大與毛澤東走自己的路〉，《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俄〕貢恰羅夫等：〈蘇聯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4期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胡繩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范承祚：〈阿爾巴尼亞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始末〉，《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4期

郝建生：〈總理提名楊貴調公安部，使死因大白天下〉，《中國老年報》，2005年5月31日

張化：〈也談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1975年整頓〉，《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5期

張序江：〈重溫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520聲明發表的前後〉，《世界知識》，2004年第12期

張神根：〈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發展農業三種思路的變動軌跡〉，《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5期

陳少京：〈張志新冤案還有新的秘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

陳東林：〈二十年恩怨未了情：60－70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透視〉，《黨史博覽》，1999年第1期

程振聲：〈毛澤東1975年「兩條路線鬥爭」提法的來由〉，《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

程振聲：〈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熊向暉：〈1972年毛澤東同尼克松的談話〉，《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四十二輯

劉志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

鄭有貴：〈「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業生產波動及其動因探析〉，《當代農史研究》，1998

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黨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魏光奇：〈「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

譚乃彰：〈十年對外關係研究（1966－1976）〉，《國史研究參閱資料》（29）

蘇採青：〈圍繞「風慶輪問題」的一場鬥爭〉，未刊稿

五　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中曾根康弘：《政治與人生——中曾根康弘回憶錄》（東京：講談社，1992）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三、四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周啟才：〈毛澤東去世後訃告和悼詞的出台前後〉，香港鳳凰衛視「口述歷史」，2005年2月17日

周啟才：〈粉碎「四人幫」當夜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世紀》，2006年第2期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

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5）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劉岩：〈我所了解的陳毅追悼會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內部刊印，2005）
諾羅敦・西哈努克、〔美〕伯納德・克里舍合著，秋同譯：《我所認識的世界領袖們》（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諾羅敦・西哈努克著，晨光等譯：《西哈努克回憶錄——甜蜜與辛酸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ited, 1979)

六　報刊

北京圖書館館藏紅衛兵報刊
《人民日報》，1968、1972－1976年

《北京日報》，1974年
《光明日報》，1972、1976年
《紅旗》，1972年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 22

索引

一畫

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　75
1975年憲法　422－427
1975年整頓　366, 501, 526－528, 557, 657

二畫

丁東　477
丁盛　321, 323, 537, 708
人造地球衛星　248, 538, 569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307, 321－324, 327
卜占亞　366, 367

三畫

《三上桃峰》事件　353
三木武夫　92, 606, 664, 668
「三五」計劃　224, 232－234, 237, 238, 240, 247, 252, 255, 259, 260, 262, 270, 274, 278, 281, 298, 459, 559, 562, 563, 567
三線建設　112, 239, 246, 258－276, 278－280, 289, 563, 564
「三株大毒草」　550, 558
三個世界　79, 127, 130－138, 153, 156, 551
三個突破　237, 241, 242, 244, 247, 559, 561, 563
「三項指示」　502, 555
「三箭齊發」　358, 379, 519, 525
上山下鄉　20, 46, 48, 54, 58, 62, 149, 253, 289, 367, 374, 411, 413, 429, 435, 437, 460, 463－472, 476, 479, 486－488, 492, 496, 642
于光遠　551, 552
于伶　193
于桑　315, 317－320, 707
于會泳　220, 353－355, 370, 405, 406, 420, 442, 546, 548, 580
千比　414
大平正芳　93－100, 124
小阪善太郎　93
小靳莊十件新事　361, 452
工會　143, 317, 363, 368, 373, 396, 418, 419, 628, 653, 709
工農兵學員　359, 380, 431, 434, 435, 437, 438, 540, 634

四畫

《公開的情書》 484
《文匯報》事件 624, 625
中日邦交正常化 92, 93, 98, 105
中日聯合聲明 93, 95, 99, 102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535, 536, 538
中央讀書班 318, 329, 363, 367, 395, 543, 550
中共十大 172, 187, 208, 216, 218－221, 307, 321, 324, 327, 333, 336, 346, 364, 393, 408, 411, 426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209, 246, 265, 338, 661
中阿關係 146, 150
中美緩和 111－115, 170
中美聯合公報 80, 89
中曾根康弘 92
「五七一工程」紀要 13, 15－18, 25, 186, 188, 229, 335, 381
五七幹校 21, 159, 289, 317, 341, 433, 461－464, 473, 475, 499
五二〇聲明 157
反右傾回潮 71, 73, 77, 395
反經驗主義 187, 219, 512, 513, 516－519, 521, 523－525, 582
反潮流 74－76, 216, 219, 336, 348, 357－359, 362, 364, 365, 367, 376, 377, 396, 443, 470, 543, 553, 556
反擊右傾翻案風 224, 366, 444, 451, 453, 495, 538, 543, 546, 575, 581, 583, 586, 589, 598, 601, 607, 613, 621, 623, 630, 632, 637, 641, 642, 648, 654, 656, 680
反霸鬥爭 124, 135
天安門事件 346, 420, 495, 631, 636, 641－645, 647, 658, 662
孔子 72, 209, 307, 327, 329－340, 342－347, 365, 378
孔丘 327, 343－345, 347, 617
孔丘其人 327, 343, 345
孔石泉 537
少正卯 347, 349, 365
尤兢 193
巴巴耶夫斯基 475
巴桑 414
巴盧庫 143, 147, 151, 153
戈培爾 641
戶縣農民畫 450, 451
手抄本小說 496, 498
扎米亞金 475
文藝政策調整 546
方強 210
方毅 407, 419
方劍文 47, 364, 366
比蘭德拉 176
毛迪秋 414
毛雷爾 164
毛遠新 38, 56, 74－76, 187, 189, 217, 284, 316, 327, 328, 333, 357, 362, 398, 406, 439, 440, 501, 537, 538, 542, 551, 587－589, 591－595, 610, 611, 613, 615, 620－622, 633, 635, 636, 638－640, 642, 644, 658, 660, 662, 663, 685, 686, 688, 692, 693, 698, 699, 702, 703, 705
毛澤東 7－9, 12－18, 24－32, 34－41, 43－46, 48, 49, 51, 52, 54, 56, 57, 59, 61－64, 66, 68, 70－72, 74, 76,

77, 79, 80, 82 — 86, 93, 102 — 112, 114 — 116, 120 — 124, 126 — 139, 141 — 148, 150, 151, 153, 155 — 159, 164, 167 — 179, 181 — 189, 196 — 210, 212 — 226, 231 — 234, 238, 241, 243, 246, 249, 253, 255, 259 — 261, 264, 268, 275, 280 — 282, 288 — 290, 292, 294, 295, 301, 303, 306, 307, 313 — 315, 318, 319, 321 — 336, 338 — 342, 344 — 346, 354, 356 — 358, 362, 367, 369, 371, 373, 375, 377 — 385, 387 — 395, 397, 398, 400 — 410, 412, 413, 421, 422, 424, 425, 429, 430, 432 — 437, 445, 449, 451, 454 — 458, 460 — 462, 464, 466, 469 — 472, 474, 475, 477, 479 — 481, 483, 484, 489, 501 — 515, 517 — 523, 525 — 527, 529, 530, 534, 537, 538, 542 — 544, 546 — 551, 553 — 555, 557, 562, 569, 574, 575, 577 — 596, 598 — 601, 603 — 622, 625 — 627, 630, 631, 633 — 636, 638 — 644, 647, 648, 650, 655 — 669, 672, 679 — 681, 683 — 685, 687, 689, 691 — 695, 704, 705, 707, 708, 710, 711, 713

毛澤東批評「四人幫」 383, 579

毛澤東逝世 144, 153, 643, 657, 665, 667, 669, 672, 680, 694

毛澤覃 520

牛成山 368, 369

牛發和 414

牛漢 499

王力 151, 198, 315

王子達 364 — 366

王大賓 48

王小鷹 446

王六生 537, 692

王少庸 709, 713

王文堯 76

王平 537

王立山 629

王必成 309, 537

王丙乾 252

王世泰 414

王世敏 343

王世惠 414

王年一 387, 660

王安石 104, 346

王自正 309, 310

王光美 353

王光偉 539

王芳 320

王作山 414

王志民 707

王志政 309

王宏坤 537

王里岩 308 — 310

王治秋 414

王秀珍 47, 220, 414, 620, 691, 707 — 713

王良恩 311 — 318, 321, 323

王希哲 57, 58

王克強 414

王明 36, 169, 175, 192, 193, 199, 334, 385, 516, 517, 519, 602, 618, 692

王若水 69 — 71

王若飛 11

王建安 395

王茂全 414
王茂湘 509
王承書 497
王知常 346, 690
王季範 64
王秉璋 7
王洪文 46, 53, 57, 65, 131, 150, 168, 172, 174－176, 184, 187, 188, 190, 204－210, 212－214, 216－221, 299, 323－327, 329, 339, 340, 350, 352, 354, 355, 363－368, 370, 371, 381, 389, 393, 395－403, 406－409, 501, 516, 518, 521, 524－526, 534, 535, 538, 543, 544, 582, 601, 606, 608, 610－612, 620－622, 627, 637, 658, 660, 662, 663, 665, 676, 677, 680, 682, 684, 686, 688, 691－693, 696, 698, 700－702, 705, 712, 713, 714
王效禹 38, 608
王海容 66, 171－175, 177, 188, 203, 217, 378, 379, 384, 402, 406, 466, 502, 521, 586, 587, 591, 660, 662, 663
王淦昌 414
王曼恬 64
王超柱 48
王國權 91, 92
王堯山 196
王景升 414
王朝文 343
王道義 414
王新德 655
王諍 220, 420
王震 40, 415, 417, 440, 503, 530, 557, 642, 673, 674, 678
王稼祥 30, 197, 210, 220, 394
王醒 366
王耀花 414
王觀瀾 189, 196, 197, 414

五畫

加謬 474
北方地區農業會議 281, 285, 286, 289
卡翁達 131, 132, 178, 303
卡達爾 144
古元 451
古柏 520
古納瓦達納 474
司馬義·艾買提 537
司馬懿 334
司湯達 476
史良 414
史保嘉 495
史國衡 343
台灣問題 80－82, 86－90, 92, 95, 96, 98, 117, 123, 125－127, 170, 178, 183, 662
「四人幫」 173, 174, 178, 184, 187, 190, 192, 195－197, 220, 299, 316, 320, 329, 381, 383, 389, 390, 399, 401, 408, 418, 420, 421, 427, 444, 445, 451, 453, 497, 502, 511, 512, 515－519, 521－524, 527, 536, 538, 540, 541, 543, 546－548, 550, 551, 553－555, 558, 575, 579－582, 585－589, 593, 595, 598, 601, 606, 607, 609, 621, 622, 624－627, 629, 630, 642－644, 647, 648, 651, 655, 663, 666－679, 681－688, 690, 691, 693－699, 703－709, 711－715

四三方案 115, 257, 292, 296, 301, 569
「四五」計劃 229, 237, 238, 241, 243, 245－247, 250, 255－257, 261, 266, 270, 273, 274, 277－279, 281, 286, 433, 440, 441, 459, 466, 503, 528, 558－566, 570, 574
四五運動 622
四屆全國人大 63, 75, 239, 359, 391－394, 397, 399, 405, 409－411, 414－416, 419, 423, 470, 501, 526, 530, 540, 546, 568, 573, 608
四個現代化 269, 410, 412, 415, 513, 539, 549, 567, 573, 575, 631
外交部《新情況》 172, 184
尼克松 79－89, 91, 93, 103, 104, 111－113, 115－118, 120－123, 125, 126, 138, 150, 154, 163, 170, 179, 294, 351, 473, 475, 584, 600, 661
尼克松訪華 79－82, 93, 112, 113, 115, 117, 118, 150, 294, 473
布托 659
布邁丁 132
布魯斯 124, 170, 171
平息上海叛亂陰謀 707
永樂中學事件 357
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 418, 686, 707, 714
甘英 9
甘祖昌 414
田中角榮 90, 93－99, 101－105
田家英 509, 510
田維新 318
田餘慶 343
田曉青 495
申茂功 47
申紀蘭 48
白如冰 537
白居易 335
白卷事件 75
白迪·海山 414
「白洋淀詩群」 492, 493
白堅 30
白啟嫻 358, 359
白智清 53
白壽彝 414
皮定均 322, 537
石少華 64, 65
石西民 346
石油工業 248, 256, 257, 262, 264, 534, 569
印紅標 479

六畫

伍修權 414
仲曦東 174
任子超 707
任公偉 479
任思忠 323
任弼時 29
任毅 488－490
任繼愈 331
「全面專政」 514
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 470, 471
全國計劃會議 225, 226, 237－239, 241, 242, 244, 245, 252, 253, 255, 275, 281, 503, 528, 553, 561, 567, 574
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549, 580

列寧 50, 69, 113, 122, 135, 187, 207, 214, 215, 341, 392, 413, 422, 424, 444, 473, 477, 504, 505, 509－512, 515, 522, 614－616, 665, 690, 710
吉田茂 91
吉拉斯 474, 484, 515
向守志 537
向忠發 207
合作醫療 225, 445, 456－459
地下文學 487, 499
地下讀書活動 472
地方五小工業 569
安東尼奧尼 350, 351
安定團結 219, 223, 377, 409, 502, 503, 520, 527, 543, 550, 551, 555, 556, 601, 608, 614
托洛茨基 21, 474, 476, 690
托爾斯泰 476
曲折 463
朴春子 414
朱永嘉 207, 208, 346, 690, 709, 713
朱良才 414
朱克家 414
朱棟 400
朱德 30, 34, 158, 218, 388, 391, 405, 411, 414, 415, 520, 548, 575, 582, 588, 606, 625, 639, 647, 664
朱熹 346
朱鴻霞 39, 47
朱學勤 25, 478
江一真 30
江青 7, 13－15, 19, 28, 29, 33－35, 37－39, 41－44, 48, 49, 51, 53, 57, 62－66, 68－72, 76, 77, 111, 115, 116, 167, 170, 174－178, 185－190, 196－200, 203, 206, 211, 212, 217－220, 263, 293, 295, 296, 299, 307, 312, 313, 315, 316, 318, 320, 323, 324, 327－329, 332－334, 336, 339－342, 344, 347－358, 360－362, 364－366, 369－371, 377－390, 392, 394－408, 417－420, 442, 443, 445, 448, 452, 453, 455, 456, 501, 502, 511, 516－522, 524－526, 536, 539, 540, 546－549, 580－583, 585, 587－589, 591－593, 595, 598, 601, 606, 611, 619－622, 624, 630, 631, 633, 635, 638, 641, 643, 644, 658－660, 662, 663, 669, 671, 673, 676－682, 685, 686, 691－693, 698－700, 702, 703, 705, 713, 714
江華 210, 415
江海雲 47
江渭清 210, 537
江澤民 279
江禮銀 414
牟乃川 702
竹入義勝 93
考教授事件 76, 379
艾什瓦爾雅 176
艾爾索普 114
西沙之戰 448
西哈努克 29, 42, 154－159
西哈莫尼 159

七畫

「社來社去」 362, 439, 440, 542
社隊工業 262, 288－292

佛朗哥 630
何芳川 343
何長工 30
何偉 42
何輝燕 264
何澤慧 497
佐藤榮作 91
余立金 537
余秋里 63, 69, 119, 233, 241, 243, 256, 260, 264, 294, 415, 417, 419, 460, 503, 530
克尤木·買提尼牙孜 414
吳小如 343
吳玉英 414
吳玉章 42
吳成志 193, 195
吳旭君 26, 661
吳印咸 64, 65
吳有訓 414, 497
吳仲超 189, 194 — 196
吳先鋒 414
吳同寶 343
吳冷西 30, 414, 506, 509, 510, 551
吳克華 537
吳忠 315, 636 — 638, 656, 674, 675, 687, 697, 698, 701
吳承濟 414
吳述森 480
吳述樟 480
吳法憲 7, 12, 13, 39, 113, 115, 167, 211, 249 — 251, 274, 276, 320, 324, 328, 392, 421
吳起 349
吳冠中 449
吳烈 674
吳健雄 497
吳桂賢 49, 218, 220, 415, 417, 418, 420, 471, 515, 519, 530, 653, 677, 683, 704, 712
吳從樹 414
吳階平 220, 221
吳富善 674
吳毅 509
吳廣 629
吳德 64, 206, 210, 218, 220, 313, 315, 340, 351, 375, 405, 408, 414, 501, 518, 523, 585, 592, 598, 632, 633, 636 — 638, 640, 642, 653, 664, 667, 669, 670, 673 — 677, 682, 693, 695, 697, 698, 701, 704, 706, 707, 712
吳德峰 414
吳耀宗 414
呂正操 414, 537
呂玉蘭 48, 406, 414
呂美英 414
宋立英 48
宋永毅 474, 476
宋柏年 343
宋振鼎 193 — 195
宋時輪 537, 674
宋慶齡 29, 405, 414
希思 124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223, 502, 503, 527, 530, 543, 550, 551, 555, 556
批判「三字經」 360
批林批孔 56, 77, 219, 223, 224, 307, 328, 329, 336, 338 — 342, 347 — 350, 354, 355, 357, 360 — 383, 395, 397,

398、400、407、439、448、450－452、480、495、511、518、519、521、523－525、527－529、532、536、538、539、543、555、593、602、632、657
批林整風 8、23、32、33、37、49、68、72、209、210、215、316、317、328、336－338、340、365、512、522、580
批極左還是極右 70
抓革命促生產 376
李一夫 30
李一氓 30
李一哲大字報 58
李力群 34
李大章 537
李天佑 28
李井泉 210、220、262、414、595
李水清 419
李仁齋 709
李民 654
李白 332、448、449
李立三 36、175、618
李正天 57
李四光 65
李玉林 653
李世英 48
李世榮 414
李可染 355
李自成 548、549
李再含 38
李成芳 210、420
李先念 8、10、29、63、69、153、155、186、218、243、256、264、294、295、298、300、305、306、354、368、373－375、390、399、401、403、405－407、415、416、419、455、471、501－503、523、532、545、552、591、592、594、608、613、615、632、653、654、666、667、670－675、677、695、704、708、711
李志民 537
李克如 30
李君旭 626
李延祿 414
李良模 467
李作鵬 7、13、27、39、113、167、211、212、249、250、274、328、392、421
李昌 539、553、595
李宗仁 498
李卓然 30
李金榮 414
李金德 394
李苦禪 356
李春光 548
李政道 438
李秋夢 481
李班 120
李悝 349
李素文 48、396、406、414、418、419、613
李時珍 418
李國堂 400、401
李家寬 343、344
李連慶 702
李強 419
李敏 386、588
李彬山 709
李偉信 18、19
李雪峰 7、212、313
李斯 331、349

李琪 509
李瑛 446
李富春 29, 63, 226, 234, 259, 260, 566
李葆華 210, 220
李順達 414
李瑞山 418, 537
李瑞環 48
李鳳蘭 414
李聚奎 414
李際泰 419
李德 169
李德生 10, 15, 29, 32, 42, 53, 63, 150, 210, 212, 213, 218, 220, 307, 321, 323, 326 — 328, 345, 370, 371, 379, 387, 392, 537, 606, 674, 687, 688
李雯 44, 315, 317 — 320
李廣銀 700
李樹慈 190, 191
李慶霖 414, 466, 469, 470
李鴻章 346, 347
李學鰲 446
李雙江 445
李耀東 471
李鑫 316, 551, 666, 671, 672, 696
杜平 323
杜布切克 143, 144
杜米 147
杜甫 448, 449
杜林 477, 547
杜魯門 474
沙千里 414
沙夫 474
沙白 446
沙風 419
沙馬力汗 414
沙菲 139, 334
沈平 352
汪東興 13, 15, 29, 42, 167, 174, 187, 190, 199, 200, 202, 204, 218, 220, 221, 312, 313, 354, 470, 502, 535, 579, 591 — 593, 602, 604, 607, 611, 635, 643, 644, 660, 662, 663, 666, 669, 671 — 673, 675, 677, 679, 682, 683, 686, 692, 696, 698 — 700, 703, 704, 707, 708, 712
汪洋 420
汪家道 369
汪湘君 47
沃爾夫·菲利普 128
狄更斯 476
狄福才 64, 65
谷牧 415, 417, 419, 460, 503, 530, 532, 533, 685
貝克特 474
貝時璋 414
赤腳醫生 225, 413, 457 — 459, 465
車爾尼雪夫斯基 476
辛溫 465
邢卓 76
邢燕子 48, 463
那拉氏 630
阮文紹 120 — 122, 162
阮氏萍 121, 161
阮友壽 176
阮章競 446
阮進 118
阮維楨 122

八畫

「兩個基本估計」 187, 429, 431, 433, 540, 542
卓琳 188
周一良 334, 343, 345
周世釗 54, 367, 414
周助綱 11
周宏寶 217, 220, 397
周建人 414
周長庚 290
周長貴 486
周叔弢 414
周秉德 169
周恩來 7－16, 26－30, 32－45, 50, 52, 53, 57, 61－72, 77, 79－89, 91－103, 107, 109－121, 123, 125, 127, 131－133, 138, 139, 144, 145, 150, 151, 153, 155－157, 159－164, 168－189, 195－197, 202, 203, 207, 209－221, 224, 231, 233, 234, 237－239, 241, 243－246, 249, 251, 254, 256, 259, 264, 265, 275, 280－283, 285, 293－300, 303, 306, 307, 309, 312－320, 325－327, 332, 334－337, 340, 342, 344, 345, 349, 351, 354, 355, 360, 371－373, 378－388, 390－395, 397－412, 414－417, 431, 432, 438－440, 453－456, 459, 462, 470, 471, 481, 482, 497, 502, 504, 513, 516－519, 521, 522, 525, 526, 528, 532, 539, 541, 544, 548, 559, 561, 567－569, 575, 580－582, 585, 587－589, 600－609, 611, 622－631, 647, 648, 656, 692, 693
周恩來去世 600, 604, 607, 625
周恩來在各個領域恢復政策 38
「周恩來總理臨終遺言」 625
周華康 457
周家怒 621
周海嬰 548
周純麟 707－709, 712
周啟才 666, 707, 716
周培源 66, 77
周揚 191－193, 484, 547
周瑞文 449
周福蘭 452
周榮鑫 406, 420, 440, 540－543, 595, 598－600, 616, 656, 657
周慧芬 414
周興 309, 537
周錫林 414
奈溫 145
孟子 337
季方 414
岩帥 414
岳重 493, 495
帕奇米拉 148
拉扎克 145, 146
拉赫曼 138, 139
林立果 14, 16, 17, 186, 250, 327, 687
林巧稚 414
林庚 343
林莽 495
林彪 7－18, 20, 22－39, 44, 45, 48－51, 53, 54, 57－60, 62, 64, 66－72, 79, 111－116, 138, 147, 167－169, 175, 185－189, 196－202, 204, 206, 209－212, 214－216, 218－

220, 224, 227, 229, 239, 241 — 244, 249 — 252, 263, 265, 274, 282, 283, 289, 301, 307 — 310, 313 — 318, 320 — 329, 333 — 342, 345 — 348, 364, 366, 370, 372, 375, 377, 380, 381, 387, 392 — 395, 398, 399, 421, 422, 442, 445, 472, 477, 497, 501, 504, 510, 512, 514, 520, 523, 525, 528, 534, 547, 555, 562, 582, 584, 587, 602, 608, 610, 614, 618, 624, 669, 687, 691, 694, 711
林彪事件 7 — 15, 17, 37, 39, 45, 49 — 51, 53, 54, 62, 66, 70, 79, 114, 138, 147, 167 — 169, 175, 200, 206, 209, 210, 224, 252, 281, 294, 307, 309, 313, 314, 317, 322, 326, 329, 334, 335, 364, 366, 372, 377, 393, 394, 398, 445, 472, 497, 501, 528, 534, 584, 587, 687
《林彪與孔孟之道》 333, 339, 340, 342, 370
林楓 30
林福生 193, 195
林麗韞 414
林鐵 30, 509
松村謙三 91, 92
武元甲 114
武則天 620
武健華 669, 671, 692, 696, 699 — 702, 707
武新宇 414
武衡 539
波爾布特 145, 154 — 156, 159, 504, 505, 510
況浩文 496, 498
《知青之歌》 489
知青文學 488, 496, 499
知識青年 48, 50, 73, 74, 143, 253, 289, 291, 358, 367, 374, 413, 435, 446, 461, 463 — 468, 470 — 473, 476 — 483, 486 — 489, 496, 642
邱會作 7, 13, 113, 167, 211, 212, 249, 250, 274, 328
金日成 517
金沖及 660
金秀清 414
金祖敏 47, 220, 396, 414, 697, 698, 709
金訓華 414, 464
金燦然 191
阿沛・阿旺晉美 414
阿利雅 154, 606
阿爾巴尼亞 112, 113, 142, 143, 146 — 154, 303, 305, 306, 444, 598, 606
冼恒漢 537
冼星海 548, 549
「放火燒荒」 370
長沙告狀 399

九畫

「思想文革」運動 146 — 148
「思想村落」 478, 479, 486
「思想通訊」 484
侯雋 48, 414, 463
侯賈林 394
保利茂 92
俞英 356
俞鶴峰 414
勃列日涅夫 110, 180
南萍 364

哈耶克 474
哈特林 502, 503
哈爾套「社會主義大集」 284
姚士昌 414
姚文元 15, 66－71, 76, 115, 150, 170, 174, 176, 185, 187, 190, 199, 213, 218－220, 316, 328, 333, 336, 342, 346, 349, 350, 353－356, 381, 384, 386, 387, 392, 400, 401, 403, 408, 430－432, 436, 442, 454, 455, 457, 461, 497, 501, 511, 512, 517, 518, 521, 546, 579, 581, 589, 613, 620－625, 627, 631－634, 636, 637, 641－643, 655, 658, 660, 662, 663, 666, 676, 677, 680, 682－685, 687－690, 692, 693, 698, 701, 702, 704, 705, 713, 714
姚依林 678
姚連蔚 396, 406, 414, 418, 419, 516
姚雪垠 548, 549
彥涵 356
姜世偉 493
恰科 147
恢復鄧小平工作 41
施尚英 709
春水 119, 120
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 155, 159
柯切托夫 475
柯西金 109
柯慶施 505, 506
查爾查尼 153
柳下跖 347
柳宗元 332, 333
段正寶 52
洪秀全 347, 629
洛克菲勒 296
洛德 83, 180
科技整頓 538
紀宇 446
紀和富 700
紀登奎 10, 11, 14－16, 29, 42, 63, 176, 202, 210, 218, 220, 281, 294, 307, 317, 326, 354, 366, 368, 373, 375, 383, 392, 403, 415, 416, 501, 524, 530, 538, 543－545, 585, 594, 596, 602, 608, 613, 653, 654, 666, 674－677, 682, 689, 704, 706, 712
約塞 148
約翰遜 180
美濃部亮吉 92
胡子昂 414
胡守均 476
胡旭東 26
胡良才 47
胡志明 154, 164, 165
胡勇 47, 367, 368
胡風 192
胡厥文 414
胡喬木 540, 547－549, 551－553, 555, 557, 583, 586, 590, 595, 619, 656, 679
胡煒 418
胡愈之 54, 414
胡榮 156
胡適 334, 547
胡續偉 555
胡繩 414, 551, 661
胡耀邦 316, 465, 482, 497, 539, 540, 542, 553, 554, 590, 595, 656

范子瑜 420, 654
范文同 27, 114, 116, 155, 161, 163
范長江 30
范達人 342, 343, 345
范碩 387, 669, 670, 674
茅以升 414
英・薩利 158
計劃生育 459, 460
軍事工業 239, 241, 248 — 250, 252, 257, 260, 266, 268, 277, 562, 563
軍隊整頓 534, 535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159, 187, 223, 412, 505, 510, 513, 516, 550
韋國清 218, 414, 537, 606
風慶輪事件 299, 399
修改黨章 209, 213, 216, 217, 422
「紅都女皇」 378, 383
「按既定方針辦」 669, 679 — 685

十畫

「核保護傘」計劃 179, 183
「流氓」思潮 486, 487
倪志福 218, 366, 636, 676, 677, 682, 704, 716
唐山大地震 224, 575, 647, 651, 655, 656
唐克碧 414
唐岐山 657
唐忠富 47, 367, 368
唐亮 537
唐納 37
唐聞生 66, 171 — 174, 182, 188, 203, 378, 379, 402, 406, 502, 521, 586, 587
哥達 477, 507
哥穆爾卡 144
埃切維里亞 458
埃亞德馬 328
夏伊勒 474
夏邦銀 47, 220
夏衍 191
夏菊花 48, 414
夏琦 365, 378, 544
姬鵬飛 16, 80, 81, 89, 93 — 95, 98 — 100, 102, 103, 123, 124, 174, 405, 414, 415
孫一先 9
孫中山 46, 330, 332, 385
孫平化 93
孫立哲 465
孫玉國 396, 414, 686 — 688
孫武成 360
孫健 396, 415, 417, 418, 530
孫關龍 684
孫儷 487
孫權 104
徐今強 420
徐向前 29, 45, 112, 186, 398, 414, 535, 674
徐君萱 449
徐其孝 264
徐明清 197
徐浩淵 479
徐景賢 220, 346, 360, 620, 691, 707 — 709, 711 — 713
徐學惠 48
徐曉 480
徐懋庸 192
恩亞立 76

恩格斯 207, 473, 477, 509, 511, 547, 616
晉桂香 414
晁錯 349
朗諾 155－158
核潛艇 248, 268, 269, 498, 538, 569
栗士征 493
柴沫 30
柴啟琨 365
格瓦拉 475
殷誠忠 414
海瑞 185, 187, 335, 336, 344, 346, 623
浩亮 64, 406, 414
浩然 447, 448
烏蘭夫 210, 220, 414, 654, 674
班達拉奈克 31, 606
祝家耀 217, 220, 319, 396, 676, 709
祝誠 350
秦基偉 210, 220, 538
粉碎「四人幫」 178, 190, 192, 195, 196, 316, 320, 329, 389, 390, 399, 418, 445, 451, 453, 497, 527, 575, 582, 643, 647, 648, 651, 655, 663, 668, 669, 672－674, 676, 679, 682, 688, 694, 695, 698, 705, 707, 708, 711, 714, 715
翁森鶴 47, 364, 365, 366, 543
索維 128, 132, 474
索爾仁尼琴 474
納吉 635, 645
耿景洪 465
耿飆 159, 306, 707
茹夫一 275
荀況 349
袁隆平 61
郝建秀 48
馬力 105, 236, 254, 414, 654
馬小六 634
馬天水 41, 46, 208, 360, 389, 400, 620, 624, 691, 707－709, 711－713
馬立克 140
馬吉蜂 191
馬克思 11, 35, 50, 59, 67, 69, 71, 108, 113, 135, 145, 151, 167, 187, 207, 214, 215, 330, 336, 339, 341, 347, 355, 360, 392, 413, 422, 424, 443, 454, 473, 474, 477, 480, 484, 505, 507－509, 511, 512, 515, 519, 522, 541, 554－556, 579, 604, 613, 615, 617, 624, 625, 665, 666, 681, 690, 710, 714
馬佳 495
馬恒昌 414
馬振扶中學事件 352, 379
馬純古 414
馬海德 44
馬振龍 710
馬寧 340, 369, 537
馬齊彬 660
馬爾登 658, 680
馬爾琴柯 109
馬輝 654
馬曉先 669, 703
馬錫金 702
馬學禮 414
高島 95, 97, 102
高振忠 56
高崗 10, 34, 175, 224, 618
高雲江 700
高粱 384
逢先知 660

十一畫

匪業亮 414
商鞅 331, 345, 349
國務院文化組 63, 64, 340, 347, 351, 353, 354, 356, 405, 443, 444, 450, 451, 455
國務院科教組 65, 66, 72, 73, 77, 336, 337, 349, 357, 360 — 362, 435 — 440
國務院業務組 62, 63, 203, 249, 611
基辛格 79 — 81, 83 — 89, 113, 116 — 118, 122, 123, 125, 126, 135, 138, 150, 161, 170, 173 — 176, 178 — 184, 475, 524, 584, 668
婦女代表大會 47
尉鳳英 48
屠格涅夫 476
屠德雍 51
崔海龍 414
崔萬秋 190, 191, 193
康生 12, 15, 37 — 39, 64, 156, 167, 185, 188, 189, 196, 212, 213, 218, 222, 312, 316, 337, 347, 392, 393, 400, 408, 414, 418, 421, 602
康世恩 256, 264, 420
康克清 384, 414, 674
康泰 498
康濯 497
張才千 654
張天民 548
張木生 480 — 482, 484
張文裕 497
張友漁 427
張世忠 47, 396, 414, 634
張世英 343
張平化 367, 383, 537
張永生 39, 364 — 366, 543
張永枚 448
張玉勤 352
張玉鳳 26, 171, 173, 184, 189, 377, 378, 518, 551, 578, 579, 587, 603 — 605, 608, 610, 635, 636, 638, 658, 659, 661, 691, 692
張再 170
張池明 537
張西挺 38
張佐良 26, 176, 220, 222
張抗抗 446
張廷發 537, 674
張志新 54 — 57
張孝騫 457
張延成 414
張宜愛 709
張宗遜 537, 654
張勇 465
張茜 28, 29
張厚 367, 368
張勁夫 420
張建中 495
張洪池 414
張春橋 12 — 15, 29, 30, 41, 42, 66 — 73, 115, 155, 166 — 169, 172, 174, 175, 184 — 197, 199, 204 — 206, 208, 210, 212 — 214, 217, 220 — 222, 244, 245, 313, 314, 316, 323, 324, 326, 328, 331, 333, 346, 350, 353, 355 — 357, 371, 372, 381, 383, 387, 392, 393, 400, 401, 403, 405, 407 — 409, 411, 415 — 418, 421 — 423, 431, 432, 436, 445, 454, —

456, 489, 497, 501, 505－514, 517, 518, 521, 522, 524, 535, 537, 538, 540, 546, 553, 582, 594, 595, 598, 599, 606－608, 610－612, 620－622, 624, 626－628, 632, 636, 637, 640, 642, 644, 658, 660, 662, 663, 665, 667, 676, 677, 679－681, 684－692, 696, 698, 700－703, 706, 707, 709, 710, 715, 716
張秋橋　687, 697
張桂珍　414
張國亮　471
張國清　414
張國燾　36, 618, 668
張揚　496－498
張雲生　12
張鼎丞　414
張越男　451
張達志　414, 537
張聞天　53, 195, 202, 334, 394
張福財　414
張愛萍　537－539, 656
張穎　384－386, 388－390
張霖之　621
張樹迎　169
張錫媛　204
張耀祠　669, 696, 699, 700, 703－705
張寶瑞　496, 498
張鐵生　73, 77, 414, 686
張頸揚　264
戚本禹　187, 198
接班人問題　167, 168, 206, 658
教育整頓　540, 542, 543
曹荻秋　185
曹爽　334
曹軼歐　414
曹操　207, 332, 616
曹錦清　292
梁必業　414, 674
梁吉泉　414
「梁效」　327, 338, 342－346, 348, 349, 599, 681－683, 699
梁漱溟　46, 347, 348
梁興初　7
梅斯梅爾　124
梅羅　148
現代主義詩人　492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175
《第二次握手》　496－498
第三世界　124, 128, 131－140, 144, 148, 302－304, 413
符寧　156
組閣之爭　392
莫文驊　537
莫艾　684, 685
莫尼克　159
莊希泉　414
莊則棟　397, 420, 525
許世友　175, 206, 212, 218, 255, 307, 312－316, 321, 323－325, 364, 377, 382, 537, 606, 626, 628, 667, 672, 688
許存貴　414
許家屯　708
許誠　654
許肇昌　47
許滌新　30
許德珩　414
郭小川　499

郭化若 30
郭玉峰 315, 318, 323, 351, 395－397, 654
郭宏傑 47
郭沫若 29, 332, 333, 342, 414, 416, 448, 715
郭林祥 537
郭映福 414
郭超 396
郭路生 492, 499
郭嘉 207
郭德潔 498
陳一陽 57
陳小農 481
陳元 678
陳正人 42
陳玉娘 414
陳永貴 218, 222, 280, 354, 356, 415, 417, 501, 515, 519, 549, 653, 654, 674－677, 704, 716
陳丕顒 30
陳此生 414
陳先瑞 537
陳再道 40, 395
陳伯達 7, 12, 17, 23, 27, 31, 33, 34, 64, 68, 155, 185－187, 190, 199－201, 211, 214, 239, 241, 257, 312－314, 318, 320, 348, 383, 392, 477, 481, 507, 509, 510, 624
陳亞丁 370
陳阿大 47, 414, 710
陳長江 26
陳奇涵 414
陳香梅 390
陳海涵 264
陳康 310
陳造反 47, 368, 369
陳紹昆 419, 420, 533, 620
陳野萍 366
陳淑清 414
陳偉達 365
陳望道 414
陳勝 629
陳雲 30, 37, 40, 111, 218, 255, 259, 297, 306, 414, 501, 586, 674, 677－679
陳逸松 414
陳毅 13, 27－29, 31, 63, 112, 186, 324, 603, 629
陳毅追悼會 29
陳慶璋 191
陳獨秀 36, 175, 334, 618
陳勵耘 206, 364, 375
陳錫聯 56, 218, 321, 375, 398, 403, 407, 415, 416, 501, 523, 525, 532, 535, 538, 593, 612, 637, 639
陳鶴橋 537
陸孝彭 61
陸定一 185
陶利 356
陶勇 308
陶峙岳 414
陶魯笳 210, 537
陶鑄 186, 199, 383, 694
章太炎 333
章伯森 367, 368
章含之 66, 174, 189, 402, 587, 588, 659

十二畫

「割資本主義尾巴」 148, 284, 285
「無標題」音樂事件 354
傅玉芳 414
傅秋濤 414
傅崇碧 674
傅斯年 334
凱萊奇 147
博古 11, 169
喬冠華 89, 118, 122, 125, 140, 150, 157, 174, 175, 182, 184, 189, 588, 681
喬森潘 156, 158, 159
寒春 44
彭沖 537, 708, 711, 713, 714
彭剛 495
彭華 352
彭真 185, 259, 321, 336, 427, 509
彭紹輝 414
彭德懷 10, 15, 61, 107, 175, 199, 262, 347, 481, 511, 512, 520, 522, 582, 618
惠特拉姆 297
惠特曼 492
援越抗美 563
斯大林 14, 199, 207, 444, 472, 474, 475, 479, 481, 509, 513, 614, 690
斯特朗 129, 130, 474, 475
斯諾 86, 109, 231, 334, 384, 462
景林 368
景儒林 309
曾山 42
曾生 415
曾志 415
曾希聖 210
曾卓 499
曾思玉 537
曾紹山 537
曾憲九 457
朝陽農學院經驗 362
椎名悅三郎 95
湯一介 343
程世清 7
程振聲 670
童小鵬 394
童第周 414
粟裕 63, 398, 414, 535, 537, 674
舒同 30
舒曼 114
華林森 47
華國鋒 10, 63, 77, 174, 190, 206, 210, 218, 290, 294, 318, 319, 326, 354, 357, 368, 369, 374, 375, 377, 399, 415, 416, 419, 427, 501, 527, 530, 553, 575, 581, 582, 594, 600, 607, 610－613, 619－621, 626, 633, 634, 637－641, 644, 647, 654, 658－660, 662－670, 672－677, 679－682, 685, 686, 689, 693－708, 710－713, 715
華銀鳳 47
華羅庚 414
萊爾德 179
評《水滸》 577, 580, 581
費孝通 291
賀子珍 385, 386
賀捷生 547
賀敬之 497
賀誠 30
賀賢春 364, 366, 543
賀龍 30, 39, 40, 199, 547, 621, 694

賀龍平反 30
越南戰爭 88, 107, 114, 116, 117, 120－122, 140, 155, 166, 243, 306
開門辦學 361, 436, 437
陽早 44
雅勒 129
雄飛 193
雲南沙甸事件 650
項英 385
馮天瑜 617
馮友蘭 330, 331, 343, 617
馮牧 497
馮國柱 709
馮雪峰 192, 195, 196
黃永玉 356
黃永勝 7, 13, 39, 113, 167, 211, 249, 250, 274, 310, 366, 398
黃玉昆 654
黃作勤 414
黃克誠 107, 398
黃金海 710
黃帥 75, 76
黃宵 355
黃厚民 64, 65
黃華 121, 138, 152, 174
黃家駟 457
黃硯田 471
黃新廷 537
黃維 46
黃歐東 56
黃濤 713
黃鎮 124, 125, 183
黑格 81－83, 117, 183
「黑畫」展覽 355

十三畫

塞克 176
塞拉西 25
塞林格 475
愛倫堡 474, 475
楚圖南 54
楊力 142
楊大易 367, 368
楊天成 352
楊成武 27, 30, 64, 153, 398, 399, 403, 404, 674
楊克明 343
楊佩蓮 414
楊東莼 54, 414
楊坡蘭 406, 414
楊勇 27, 28, 220, 537, 675
楊俊生 654
楊健 494
楊振寧 66, 350, 351
楊得志 38, 307, 313－316, 321, 323, 325, 326, 537, 692
楊開慧 629, 630
楊絳 499
楊賈 319, 676
楊富珍 48
楊煉 495
楊瑞 483
楊新亞 709
楊樺 495
楊榮國 331, 333, 336, 337, 339, 414, 617
楊德中 66
萬里 64, 530, 531, 656
萬桂紅 396

萬海峰 654
萬曉塘 509
經濟管理體制大變革 224
葉文珊 379
葉辛 446
葉昌明 47, 710
葉飛 30, 420, 496
葉挺 11
葉海亞·汗 138
葉群 7, 14, 39, 48, 113, 211, 249, 313, 315, 324, 328, 338, 339
葉劍英 8, 13, 27－29, 31, 42, 45, 53, 61, 80, 88, 112, 173－177, 179, 182, 186, 204, 212, 213, 218, 221, 222, 321, 340, 378, 390, 394, 398, 399, 416, 419, 448, 455, 501, 518, 521, 523, 526, 535, 536, 538, 548, 568, 585, 586, 601, 606, 612, 613, 625, 632, 643, 658, 661, 663－677, 685, 686, 694－701, 703－709, 712, 714
董天禎 414
董必武 218, 405, 414
董加耕 414, 463
董其武 414
解力夫 415, 685
解放幹部 42
《解放軍報》姜相停刊事件 371
解學恭 313, 654
賈一民 265
賈小山 471
賈平凹 446
賈克 353
賈誼 349
路易斯 108, 129, 133, 134, 474, 475
農業學大寨 280, 281, 283, 549, 580
達爾文 477
雷鋒 58, 346, 536
電影《中國》事件 350, 379
鄔吉成 669, 700, 707, 708
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479
廖志高 210, 537, 657
廖承志 103, 220, 415
廖祖康 709, 710, 712
廖漢生 27, 28, 537, 708
榮毅仁 394, 414
熊曼宜 480
熊復 551
熊應堂 364, 375
福克 144
福特 125－127, 668

十四畫

維特克 383－390
臧克家 446
豪爾 180, 182
賓努 158, 159
赫胥黎 477
赫魯曉夫 107, 161, 185, 474, 481, 601, 627, 629, 695, 710
趙一凡 479, 480
趙文龍 353
趙匡胤 322
趙兵 359
趙辛初 537
趙忠堯 414
趙紀彬 331, 347
趙俊禎 414
趙紫陽 266, 370, 537, 549

趙夢桃 417
趙蒼璧 309
齊瓦尼約利 476
蒯大富 48, 617, 618

十五畫

「窮過渡」 280, 281, 283, 549
「靠山、分散、隱蔽」 263, 273, 281
劉大年 414
劉大杰 405
劉子厚 653, 654
劉仁 9
劉少奇 14, 24, 27, 29, 33, 40, 51, 52, 61, 77, 168, 175, 185, 197－202, 204, 214, 219, 225, 259, 262, 330, 331, 334, 336, 337, 347, 353 － 355, 391, 481, 513, 525, 582, 593, 602, 608, 610, 614, 615, 618, 669, 694
劉文輝 414
劉西堯 65, 419, 683
劉光濤 38
劉邦 349, 616
劉伯承 29, 202, 218, 414, 535, 677
劉志華 291
劉志堅 537
劉恆 349
劉建章 32
劉連勳 537
劉青峰 484
劉盆子 205, 207, 208, 608
劉春華 449
劉炳華 265
劉格平 38
劉軒亭 325
劉華清 280
劉啟 349
劉章 207, 446
劉斐 414
劉湘屏 318, 420
劉結挺 38
劉景範 30
劉燁 487
劉慶棠 64, 74, 75, 355, 406, 546, 580
劉賢權 64
劉曉 196
劉興元 323, 537
劉錫昌 47
劉豐 318, 320
劉藝 509
德欽巴登頂 145
德熱拉斯 476, 477
樣板戲 48, 64, 74, 185, 349, 356, 364, 373, 388, 405, 413, 442 － 446, 448, 451 － 453, 456, 546
樊崇 207
樊德玲 415
潘婧 475
潘國平 48
潘復生 38
滕代遠 40, 398
滕和松 700
蔣子龍 446
蔣介石 80, 87, 90, 91, 95, 97, 101, 102, 297, 348, 505, 660, 661
蔡文林 56
蔡立堅 463
蔡順禮 309
蔡暢 414

蔡樹梅 415
蓬皮杜 65, 124
諸惠芬 414
鄭希文 654
鄭維山 7
鄭騰天 449
鄧力群 642, 656
鄧小平 27, 29, 30, 38, 41, 42, 53, 61, 70, 110, 125－127, 132, 133, 141, 145, 152, 159, 160, 163, 166, 168, 184, 185, 188, 189, 197－204, 213, 219, 222, 224, 234, 259, 260, 262, 290, 306, 321, 328, 340, 346, 354, 355, 374, 383, 395, 397, 398, 400－407, 409, 412, 415－417, 427, 440, 444, 448, 501, 502, 505, 513, 516－518, 520－522, 525－536, 538－555, 557－560, 574, 577, 580－598, 600－602, 606－613, 619－622, 624－626, 630－637, 639－641, 643－645, 648, 650, 654, 656, 658, 669, 675, 679, 680, 690, 691, 693, 694, 705
鄧初民 414
鄧崗 707
鄧發 11
鄧穎超 11, 37, 176, 204, 218, 220, 414, 601, 607, 631, 674
魯迅 60, 190－193, 340, 445, 446, 450, 454, 455, 547－549, 578, 579, 617
魯志立 480
魯瑛 68, 69, 72, 622, 623, 633, 684, 685, 687
魯瑞林 310
魯燕生 495
魯雙芹 495
黎清毅 8
黎筍 114, 157, 161, 163, 165, 581
黎德壽 120－122

十六畫

《戰地新歌》 451
「儒法鬥爭」 348
蠃政 349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477, 502, 503, 511, 517, 550, 597
整團 46, 583
整黨 73, 394, 543, 544－546, 548
蘭木 402, 218, 690, 691, 712
蘭克 537
蘭灼基 509
蘭勁光 328, 537, 674
蘭華 537, 674
蘭望東 537
蘭寒 653, 654
蘭選進 654
賴可可 364, 377
遲群 65, 66, 72, 75－77, 327, 336, 337, 340－345, 349, 350, 352, 357, 358, 362, 364, 370, 378－380, 402, 406, 432－434, 439, 516, 542, 584, 585, 589－592, 597, 598, 621, 622, 697, 700, 706
錯其 415
錢之光 420
錢三強 497
錢正英 420
錢江 548

錢浩梁 406, 546
錢韻玲 548
鋼鐵工業座談會 532, 533, 550
閻紅彥 308
霍查 148 — 151, 153, 154, 305
駱小海 481
龍書金 7, 363
龍梅 414
龍潛 364
薩空了 54
薩特 474

十七畫

「幫周會議」 381, 394
戴立清 710
戴高樂 128
戴夢鰲 624
戴奧多西 147
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 125, 132
薄一波 262
薛明 39, 40
薛濟泉 415
薛喜梅 415, 465
薛幹青 710
謝芳 498
謝胡 149, 153, 305, 606
謝韋思 111
謝振華 39, 354
謝唯俊 520
謝富治 29, 43, 44, 197, 220, 317, 318, 320, 420
謝靜宜 48, 72, 77, 338 — 345, 350, 352, 364, 370, 378, 380, 396, 402, 406 — 408, 415, 579, 584, 585, 587, 591, 597, 621, 654, 678, 697, 700, 706
謝鐵驪 548
賽福鼎 218, 414, 537, 606
鍾夫翔 420
鍾志民 357, 358
鍾定棟 709
鍾哲民 343
鍾學林 358
韓先楚 307, 313 — 316, 322 — 325, 329, 537
韓東山 264
韓非子 347
韓愛晶 48

十八畫

瞿秋白 36, 175, 618
聶元梓 48, 617, 618
聶耳 548, 549
聶榮臻 29, 63, 112, 398, 414, 535, 538, 583, 674
豐子愷 499
雙突風潮 365
魏光奇 484
魏秉奎 47, 56, 396, 415
魏建功 343, 345
藤山愛一郎 92

十九畫

關鋒 315, 330
譚甫仁 308 — 311, 318
譚政 30
譚厚蘭 48
譚啟龍 364, 375 — 377, 544, 549

譚善和 537
譚震林 13, 30, 186, 202, 210, 220, 414, 674
羅天奇 352
羅旭 174
羅叔章 414
羅杰斯 89
「羅思鼎」 346, 349
羅曼・羅蘭 476
羅章龍 36, 175
羅博 150
羅瑞卿 30, 31, 259, 262, 398
邊疆 106, 258, 264, 273, 420, 441, 464
蘇元勳 370
蘇羽 56, 58
蘇杰 265
蘇格拉底 330
蘇振華 30, 218, 340, 370, 398, 639, 674, 676, 677, 682, 697, 704, 708, 711, 712－714

二十畫以上

嚴力 495
嚴佑民 190, 707
嚴政 537
嚴洪華 465
嚴陣 446
嚴家淦 297
嚴濟慈 414
賈日勒岱 414
賈守芳 624
鐵托 143
鐵瑛 364－366, 544
鐵路整頓 531, 532, 534
顧工 446
顧文廣 400
顧光斗 193
顧明 682
顧炳華 531
聽濤克己 130